

鄧文寬

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

敦煌天文历法考索

上海古籍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代敦煌学者自选集 邓文宽 著

邓文宽 敦煌天文历法考索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邓文宽敦煌天文历法考索 / 邓文宽著. — 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12

(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

ISBN 978-7-5325-5747-9

I. ①邓… II. ①邓… III. ①敦煌学—古历法—研究
IV. ①P194.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10618号

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 邓文宽敦煌天文历法考索 邓文宽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网址: www.guji.com.cn

(2)E-mail: guji1@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6.625 插页2 字数 387,000

2010年12月第1版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300

ISBN 978-7-5325-5747-9

G·511 定价:48.00元

如有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编纂缘起

郑炳林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是 20 世纪古文献四大发现地之一。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敦煌文献主要部分流散到了国外，分别收藏在英国、法国、俄国、日本等国家，劫余部分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等单位。由于敦煌文献收藏的国际性，“敦煌学”一出现就成为一门国际显学，长期引领着国际学术潮流。敦煌文献内涵博大精深，敦煌石窟艺术内容丰富多采，作为敦煌学的研究对象，一直受到中外学术界的极大关注。

中国敦煌学研究的起步基本始于敦煌文献的发现。中国学者最早从事敦煌学研究，是 1904 年金石学家叶昌炽至酒泉，从汪宗翰等人手中共得绢本《水月观音》、《地藏菩萨像》及写本《大般若经》、《开益经》等，均作了考订，将有关见闻写入《语石》及后来撰写的《邠州石室录》中。后来由于王国维、罗振玉、蒋斧等进入，中国敦煌学研究掀起第一个高潮。而中国敦煌学的真正兴起是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春风吹起，敦煌学迎来了自己的新生。到目前为止，中国敦煌学研究已经走过百年的学术历程，中国敦煌学界经过最近 30 年的努力，彻底改变了“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国外”的局面。在中国敦煌学百年研究的历程中，涌现出了一批著名的专家学者，出产了一批影响巨大的研究成果。在中国敦煌学研究的百年之际，需要对百年来中国敦煌学界的研究工

作进行回顾和总结,并对今后的研究进行展望。由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利用“985 工程”平台经费资助,邀请中国敦煌学界 30 余位专家,选取他们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以“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的名义,结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为中国敦煌学界研究之参考。

作为该项工作发起单位的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敦煌学也是兰州大学的重点学科。早在 1979 年,兰州大学就建立敦煌学研究机构,1983 年筹建敦煌学专业资料室,创办了敦煌学专业期刊《敦煌学辑刊》,建立敦煌学硕士学位授权点,1985 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兰州大学建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兰州大学资料中心,1986 年通过教育部申请到美国基督教亚洲高等教育基金会的资助,1998 年建成敦煌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并成为甘肃省重点学科单位,1999 年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成为首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2003 年建成敦煌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007 年兰州大学敦煌学成为国家重点培育学科。敦煌学还是兰州大学“211 工程”、“985 工程”建设的重点学科,先后投入经费 1400 万元进行重点建设,使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资料建设、学术交流等方面都取得很大的进展,并逐步发挥其优势,在国内外敦煌学界起到了引领研究的作用。近年来,兰州大学与敦煌研究院通过联合共建,实现了优势互补,这一优势在双方的研究成果和博士生的培养中得到了体现。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与美国密歇根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耶鲁大学东亚研究会(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Yale University)、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东方文献研究所、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早稻田大学艺术学院、台北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南华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成功大学等机构在学术交流、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等方面进行合作,与耶鲁大学联合筹建了国际佛教艺术与文化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he

人的成果要尊重,但不能迷信;二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胡适之语),解决问题时思路要开阔,不囿于一种见解,又能提供证据,力求自治;三是“Read Between the Lines”(读书得间),要努力从旧资料中读出新意。总之,学术研究贵在创新,如果不能提供新东西,反复咀嚼前人说过的话,那就离制造学术垃圾不是很远了。

检讨自己已经走过的学术道路,我感觉喜忧参半。喜者,在于自己一直勤奋工作,至少无愧于人民为我提供的衣食;说得高一点,还为“敦煌学”这门学问增加了一点东西,尽过绵薄之力。至于近20年蔓延于社会和文化学术界的“浮躁”之风与“急功近利”,在我身上并未发生作用,我还是很迂腐地走着自选的学者道路,于学术良心差可告慰。忧者,我对自己并不太满意,总觉得自己本该做得更好一些,成果更多一些,但一直未能如愿。随着年岁的增长和知识的积累,三年前突然意识到:作为一个读书人,在生命史上一生都面临着两个无法克服的矛盾:一是宇宙的无限性和个体生命的有限性;二是知识的无限性与个人能够掌握的知识的极端有限性。这两对矛盾永远无法解决。在知识的大海面前,个人未免显得太卑微了,因此,只能选择谦虚谨慎,别无他途。

另一方面,我也不想放弃人文知识分子的道德坚守和言论之责。即使不合时宜,我也仍旧坚持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批判态度和健全人格。也许直至生命的终结,我都不能完全做到,但心向往之,于我足矣。

“任重道远”(张广达师囑语),我将继续努力。

2010年3月3日于北京寓所

学 术 自 述

我自 1975 年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步入学术界,迄今已 35 年。1975—1979 年,曾在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今为国家天文台)古天文组学习和研究天文学史。1979 年,我又考回北大历史系读硕士研究生,师从张广达教授。1982 年毕业后,即到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前身为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中国文物研究所)供职,直至 2009 年退休。退休前任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敦煌研究院兼职研究员,兰州大学、首都师大、上海师大兼职教授。

我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天文学史、隋唐五代史、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尤以其中的天文历法文献为主攻方向)。

1979 年读研究生时,我曾考虑以后不再做天文学史的研究,原因在于我是文科出身,缺少必要的数理知识。但跟随导师学习三年之后,深感“敦煌学”的诸多领域都已有不少学者涉足并成果丰硕,而天文历法领域涉足者少,成果有限。犹豫再三,终于决心以敦煌吐鲁番文献中的天文历法为主攻方向,因为我已在天文台工作过四年,具有了一定的初级知识。30 年来,我虽偶尔也涉足别的分支学科,但天文历法史始终是我的基本工作范畴。迄今已出版三种学术作品:《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敦煌吐鲁番出土历书》(河南教育出版社,1997)、《敦煌吐鲁番天文历法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详见本书后附“著译目录”)。在这些工作中,我曾

经揭示出《北魏太平真君十二年(451)历日》有两次准确的月食预报,也曾从俄藏敦煌文献中考出公元834年的印本历日小残片,进而将从我国发现的雕版印刷品实物的绝对年代提前了34年(原为公元868年的《金刚经》)。此外,在敦煌、吐鲁番、黑城等地发现的10余件残历的年代亦经我考证而明晰。

我的另外一项工作是关于敦煌禅宗南宗文献的整理与研究。1992年起,我与荣新江先生共同着手敦煌本禅宗南宗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其中《六祖坛经》主要由我负责。我们共同出版了《敦博本禅籍录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一书;我自己出版了《大梵寺佛音——敦煌莫高窟〈坛经〉读本》(台北如闻出版社,1997),《六祖坛经——敦煌〈坛经〉读本》,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发表了10余篇文章。在这项工作中,我读出了24对100余处唐五代河西方音替代字,又对《坛经》中的口语词花大力气去解读。需要说明的是,台湾敦煌学界的前辈潘重规教授也正确地解决了《坛经》中的方音替代字问题。不过,我的单篇论文在潘先生出书前已经发表,因此,我与潘老是各自独立完成的。

进入21世纪之后,我用较大精力进行了《敦煌本“邈真赞”校论》一书的研究与写作。其中,也发现了有50余对方音替代字(前人共揭出14对)。由于健康原因,这项工作一直断断续续,迄今尚未将书稿正式交出版。

除了上述几项主要工作之外,隋唐史、归义军历史、均田制、谱牒、语言文学、简牍学等,我或多或少地都曾涉足并发表过文章。迄今为止,共出版学术作品七本,发表各类文章150余篇。

我自问不敏,“勤能补拙”是我时刻牢记的信条。数十年来,除了健康原因,我一直不敢懈怠,加以本师“宠利勿居人前,德业勿落人后”的教诲一直萦绕于耳际,我就只能是“不须扬鞭自奋蹄”了。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我贯彻三条原则:一是“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语),对前

Study of Chinese Buddhist Art and Culture),以促进本学科向“国际化”的进一步发展,提高兰州大学敦煌学专业的培养水平。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于1985年建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兰州大学资料中心,目前拥有中外文图书7万馀册,在本学科的科学研究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对外交流上发挥了巨大作用。不仅保证了敦煌学专业的科研教学,同时也对敦煌学界提供服务。研究所还创建了敦煌学资料信息服务中心网站,在条件成熟后将可为整个学术界的研究提供网上信息服务。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拥有除本科以外齐全的人才培养体系,拥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博士授权点,积极为学术界培养人才。到2010年为止,出站的博士后4人,毕业博士54人,14人晋升教授,其中5人任博士生导师,20人晋升副教授,33人获得国家基金项目支持。十余名博士生得到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的资助,赴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密歇根大学、印第安纳大学,日本京都大学、九州大学,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等深造学习,一人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两人博士学位论文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同时还为中国港台地区和国外培养敦煌学研究人才,先后招收的学生有读博和短期研修两种形式,主要来自于中国台湾地区南华大学,韩国国立首尔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京都大学、东京大学、九州大学、青山学院大学、成城大学、东北大学、东京艺大学、东京女子艺术大学、龙谷大学,美国密歇根大学,前后接收学生四十余人,其中毕业的博士生2人,这些学生普遍得到派出单位的好评。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承担国家、教育部、国家文物局、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和国际交流基金项目一百二十多项,经费一千多万元,陆续推出了“敦煌学研究文库”、“敦煌学博士文库”、“西北史地文化研究文库”、“国际敦煌学丛书”、“丝绸之路研究文库”、“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法国汉学精粹”、“丝绸之路历史文化”

等丛书,即将启动的有“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和“敦煌讲座”丛书。研究所编纂、出版的论著在学术界得到普遍的好评,分别获得中国国家图书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甘肃省优秀图书奖、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甘肃省社科优秀成果奖多项,研究成果入选《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等。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的发展是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扶持的结果,也是中外敦煌学界各位专家扶持的结果。由此,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也是敦煌学界的共同学术研究基地和交流平台,希望在今后的发展中各界继续给予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更多的支持。

因敦煌学研究的特殊性质,遵照专家的意愿和实际需要,本丛书论述性著作一般以简体出版,以方便阅读;考据性著作以繁体出版,以避免录文和释文的歧义。由此繁简混合出版带来的丛书格式不统一,希望读者给予谅解。

“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的酝酿、发起到实施,得到了很多专家的支持和帮助,特别是老一代敦煌学家的支持和帮助,否则很难有这个项目的实施。丛书出版得到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该社出版的俄藏、法藏敦煌文献,对敦煌学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丛书的诸位编委,也为“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的出版付出了很多劳动,对此表示真挚的感谢!

目 录

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编纂缘起·····	郑炳林	1
学术自述·····		1
敦煌天文气象占写本概述·····		1
敦煌文献中的天文历法·····		21
跋敦煌文献中的两次日食记录·····		29
敦煌本北魏历日与中国古代月食预报·····		38
敦煌本北魏历日曾有准确月食预报·····		49
敦煌文献 S. 2620 号《唐年神方位图》试释·····		52
比《步天歌》更古老的通俗识星作品——《玄象诗》·····		61
隋唐历史典籍校正三则		
——兼论 S. 3326 号星图的定名问题·····		69
跋两篇敦煌佛教天文学文献·····		83
敦煌吐鲁番历日略论·····		90
敦煌残历定年·····		104
敦煌古历丛识·····		121
敦煌历日与出土战国秦汉《日书》的文化关联·····		137

敦煌历日与当代东亚民用“通书”的文化关联	153
传统历日以二十八宿注历的连续性	177
敦煌三篇具注历日佚文校考	182
我国发现的现存最早雕版印刷品	
——《唐大和八年甲寅岁(834)具注历日》	192
从“历日”到“具注历日”的转变	
——兼论“历谱”与“历书”的区别	194
敦煌具注历日与《四时纂要》的比较研究	205
“吐蕃纪年法”的再认识	216
跋吐鲁番文书中的两件唐历	228
吐鲁番出土《唐开元八年(720)具注历日》释文补正	238
吐鲁番新出《高昌延寿七年(630)历日》考	242
吐鲁番出土《明永乐五年丁亥岁(1407)大统历》考	255
黑城出土《宋淳熙九年壬寅岁(1182)具注历日》考	262
黑城出土《西夏皇建元年庚午岁(1210)具注历日》残片考	271
黑城出土《宋嘉定四年辛未岁(1211)具注历日》三断片考	277
出土秦汉简牍“历日”正名	296
天水放马滩秦简《月建》应名《建除》	305
尹湾汉墓出土历谱补说	311
居延新简《东汉永元二年(90)历日》考	
——为纪念王重民先生百年诞辰而作	319
敦煌本《六祖坛经》书写形式和符号发微	328

英藏敦煌本《六祖坛经》的河西特色

——以方音通假为依据的探索····· 337

敦煌本《六祖坛经》口语词释····· 352

北魏末年修改地、赋、户令内容的复原与研究

——以西魏大统十三年计帐文书为线索····· 360

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代均田制研究····· 381

《张淮深变文》“驄马政”考实····· 387

也谈张淮深之死····· 392

敦煌文献《河西都僧统悟真处分常住榜》管窥····· 400

三篇敦煌邈真赞研究

——兼论吐蕃统治末期的敦煌僧官····· 416

敦煌邈真赞文献中的唐五代河西方音通假字例释····· 426

新发现的敦煌写本杨炯《浑天赋》残卷····· 441

敦煌写本《燕子赋》(甲种)“将军”释词····· 448

敦煌文献《唐贞观八年高士廉等条举氏族奏抄》辨正····· 452

敦煌吐鲁番文献重文符号释读举隅····· 474

史道德族出西域胡人的天文学考察····· 486

中国古代历日文化对柬埔寨的影响

——(元)周达观《真腊风土记》读记····· 493

王珣《伯远帖》与“伯远”考····· 502

著译目录····· 507

敦煌天文气象占写本概述

所谓“天文气象占”，就是通常所说的“星占学”，是一种通过观测天象和气象^①变化以占测人事吉凶的数术。自有文献记载以来，中国人就认为“天”是有人格的，可以赏善或罚恶；而天象的变化，系由人的行为善恶引起。《周易·系辞》“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②，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因此，中国古代有关天文气象的占测活动一直十分盛行，并形成了一种专门学问即“天文气象占”。

由于天文气象占测可以沟通天、人，故历来颇受统治者的重视。历代王朝政府多设有专门机构和专职官员，以司其职。例如，汉代设有太史，隶属于奉常（也作“太常”）^③，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就担任过这一机构的长官“太史令”。唐代设有太史局，隶属于秘书监，并具有很高的机密性质^④。这些名目不同的机构，其主要职责都是观测天象和编制历书，亦即为皇帝和朝廷探寻“天意”并及时作出相应的建议。因此，天文气象占常常是决断国家政事的一个重要依据。汉宣帝在催促老将赵充国立即用兵匈奴时，曾教训说：“今（前 61 年）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战者吉，弗敢战者凶。”^⑤显然，在汉宣帝看来，“五星出东方”和“太白出高”两种天象乃是汉军必胜匈奴的征兆，故严辞责令赵充国火速用兵。不仅如此，天文气象占甚至还在发动宫廷政变时起过重要作用。公元 626 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时，就曾利用当时太史令傅奕“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的密奏大造舆

论^⑥。当然,由于和政治的关系过于密切,天文气象占在得到历代统治者重视的同时,也受到了严密的控制。历代统治者大都视天文气象占术为皇家禁脔,禁止民间私习^⑦。因此,天文气象占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数术中影响最大和地位最为特殊的一类。

正因为古代由官方主持的星占活动十分发达,所以有关星占学的著作也就非常丰富。这些著作在古代图书目录中的著录情况比较稳定,从《汉书·艺文志》开始,到后来的《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此类书籍都是以“天文”的名义著录于阴阳数术类文献的开头部分。宋代郑樵的《通志·艺文略》亦沿袭此法,但将“天文”细分为“天象”、“天文总占”、“竺国天文”、“五星占”、“杂星占”、“日月占”、“风云气候占”、“宝气”等八小类。另外,著录于兵书中的某些军事数术书籍也应属于天文气象占文献。如《隋书·经籍志》兵书类中著录的《对敌占风》、《用兵秘法云气占》、《气经上部占》、《天大芒雾气占》等,就应是专门占测作战吉凶的天文气象占书籍。

不幸的是,早期书目所著录的这些天文气象占书籍大部分都已亡佚,只有极少几种保存下来。尽管如此,与其它数术门类相比,天文气象占类可供研究的传世文献应该说仍然是最多的。例如,我们拥有唐代编纂的《乙巳占》、《开元占经》等大部头天文气象占书籍的全本,还拥有唐代编纂的《天文要录》^⑧、《天地瑞祥志》^⑨的残本,以及北周时编纂并经宋代重编的《灵台秘苑》全本。这些书籍,是研究唐及唐以前天文气象占的基本史料。与此同样重要的,是正史的《天文志》、《律历志》、《五行志》,即天文学史专家所说的“天学三志”。三志虽然各有侧重,但总体上都与天文星占有关。就研究早期天文气象占而言,当然以其中的《史记·天官书》、《汉书·天文志》、《续汉书·天文志》、《宋书·天文志》、《晋书·天文志》、《隋书·天文志》等最具史料价值。除上述两类专门书籍外,不少传世文献也保存了一些重要的早期天文气象占史料,

可供参考。这主要是:(1)正史以外的其它史书中的材料,如《越绝书·记军气》、《通典·兵典·风云气候杂占》等;(2)诸子书中的记载,如《墨子·迎敌祠》、《淮南子·天文训》等;(3)宋以来出现的天文气象占文献中,保存有部分唐以前的史料,如明代编成的《天元玉历祥异赋》^⑩就对研究早期天文气象占具有参考价值。另外,在纬书(如《河图帝览嬉》)和兵书(如《太白阴经》、《武经总要》)中,也有一些这一方面的记载可供参考。甚至在日本阴阳道保存的古代文献中,也能找到一些中国早期天文气象占方面的材料,如其中的“三家星官簿赞”所载内容就与P. 2512的《三家星经》大体一致,说明二者至少有共同的来源^⑪。考古发掘所获出土文献中也有一些天文气象占文献,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发现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的《五星占》和《天文气象杂占》^⑫。随着佛教的传入,印度星占书通过佛经翻译也大批流入中土,迄今尚存者以《宿曜经》、《摩登伽经》、《曜宿仪轨》等最为有名。这些书籍,对研究唐代前后的天文气象占测,也有参考价值。

如上所述,古代著录的天文气象占著作虽多,但完整保存至今的却很少。因此,从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同类著作就显得格外珍贵。迄今为止,我们从英、法两国所藏敦煌文献中拣选出19个编号归入“天文气象占”。这些写本以卷轴装为主,偶有册页装(即P. 2811、S. 5614两件),几乎全系残本而少有完整者。一般说来,同一写本所抄内容多属同一性质。但也有少数例外,即同一写本上抄有几种内容互不相干的文献。如P. 2811号,前抄天文气象占著作,后抄侯昌业《直谏表》。《直谏表》写于黄巢起义的庚子年,即公元880年。经仔细比对,发现《直谏表》与天文气象占书写的笔迹不同,故《直谏表》的抄写年代不能作为天文气象占书抄写年代的参照系数。又如S. 5614,前部抄《玄象西秦五州占》,后部抄《摩醯首罗卜法》。这两部分性质不同,应分别归入“天文气象占”和“数卜”两类。个别写本系数术文献汇抄,故分类时颇费斟酌。

如 P. 3288、S. 2729 两写本在《玄象西秦五州占》的后面，都抄有以《太史杂占历》为主要内容的其它占文。类似的占文，又多见于 P. 2610。这些占文中，有属于天文气象占的内容，也有属于《逆刺占》、式法及其它杂术的内容，而多数则与时日选择有关。为便于介绍，现将它们与经常合抄于一起的《玄象西秦五州占》归为一类。

上述 19 件敦煌天文气象占写本，从内容上又可再分为三小类，即“天文云气书”、“《玄象西秦五州占》”和“佛教天文书”。“天文云气书”是古天文星占书的常见类型，同样性质的文献多见于传世文献。“《玄象西秦五州占》”主要关注和占测西秦五州的吉凶，是一种新发现的天文气象占书籍类型，在传世文献中殊为少见。佛教天文书则是指佛经译本中的天文著作，大致相当于《通志·艺文略》天文类中的“竺国天文”。下面，是具体的分类表：

1. 天文云气书，七件：

P. 2512, P. 2536V, P. 2811, P. 3589R, P. 3794;
S. 2669V, S. 3326。

[敦博 076V]

2. 《玄象西秦五州占》，六件：

P. 2610R+V, P. 2632R, P. 2941R, P. 3288R;
S. 2729V, S. 5614。

[Dh1366V]

3. 佛教天文书，六件：

P. 3055V, P. 3571V, P. 4058CV;
S. 1648, S. 3374, S. 6024。

[Dh519]

除英、法两国所藏外，其它地方收藏的敦煌写本中也有少量的天文气象占文献。如中国甘肃敦煌市博物馆藏敦煌写本 076 号背面，绘有

星图及云气图,从内容、形式、性质看,都与 S. 3326 相近。又如,俄藏 1336 号背面(Dh1366V),残存占城气、占日暝、占日斗等部分的占文 31 行,其内容亦见于 P. 2632R、P. 3288R 的《玄象西秦五州占》,文字则与 P. 3288 更为接近,可以确定为《玄象西秦五州占》的另一残抄本^③。俄藏 519 号,为《舍头谏经》的残片,笔迹与 S. 1648、S. 6024 两残件所抄《舍头谏经》相同,三者应为同一写卷的残片。此外,德藏 3316 号(Ch3316)残存占风文字及占八方风图,也属于天文气象占文献。

19 件天文气象占写本中提到了不少历史人物,引用了不少古代数学专家的说法,对研究古代历史具有参考价值。其中出现较多或较为著名的人物有:巫咸(P. 2512、P. 2610、P. 3288R、S. 2729)、墨子(S. 3326)、子胥(P. 2610、P. 3288R、S. 2729V)、师公(P. 3288R、S. 2729V)、范蠡、吕不韦(S. 3326)、范曾(增)(S. 3326)、陈平(S. 3326)、高后(P. 3589R)、汉惠帝(P. 3589R)、光武帝(P. 3589R)、汉和帝(P. 3589R)、后汉顺帝(P. 3589R)、京房(P. 2632R)、王乔(P. 2632R)、李合(P. 3589R)、陈卓(P. 3589R)、晋穆帝(P. 2536V)、晋安帝(P. 2536V)、宋高祖(P. 2536V)、桓温(P. 2536V)、檀道鸾(P. 2536V)、李靖(P. 2632R、P. 3288R、S. 2729V)、李淳风(P. 2632R、S. 3326)等。写本中提到了不少古代典籍,如《三家星经》(P. 2512)、《二十八宿次位经》(P. 2512)、《日月五星经纬出入瞻吉凶要诀》(P. 3589R)、《许七曜利害吉凶征应瞻》(P. 3589R)、《玄象西秦五州占》(P. 3288R)、《风书》(P. 2632R)、《地镜》(P. 2610)、《太史杂占历》(P. 3288R、S. 2729V)、《解梦及电经》(S. 3326)、《玄象诗》(P. 2512)、《五行传》(P. 3589R)、《(续)晋阳秋》(P. 2536V)、《宋志》(《宋书·天文志》)(P. 2536V)、《晋天文志》(《晋书·天文志》)(P. 2632R)等,是研究古籍流传的珍贵资料。写本中提到的古代地名甚多,较为集中的如 P. 2512 列有各种分野名单, P. 3589R 记有对各州郡的吉凶占测,《玄象西秦五州占》诸写本载有对

敦煌、酒泉、晋昌、张掖、武威五郡的吉凶占测。此外,还提到了未央宫(P. 3589R)、鬼山(P. 2632R、S. 5614)、金山(P. 2632R、S. 5614)、天台山(P. 2610、S. 2729V)等地名。写本中还提到匈奴(P. 2811)、鲜卑(P. 2536V、P. 2610、P. 3288R、S. 2729V)、南蕃(P. 2610、P. 3288R、S. 2729V)等,也具有社会史的研究价值。19件写本中只有三件存有题记,一件为S. 2729V,表明该写本抄于“大蕃国庚辰年”即公元800年,其时正值吐蕃占领敦煌之时,抄写地点是“沙州”即敦煌。另一件为P. 2632R,表明该写本抄于“咸通十三年”即公元872年,其时敦煌一带由归义军统管,抄写地点是“晋昌郡”即瓜州。第三件为P. 2536V,表明该写本抄于“同光貳年甲申岁”即公元924年,抄写地点不详。

1. 天文云气书

a. 佚名天文云气书:P. 2512, P. 3589R, S. 3326, P. 2811, P. 3794, [敦博076V]。

b. 与《乙巳占》有共同来源的天文云气书:P. 2536V, S. 2669V。

此类共七个写本,其中P. 2512、P. 3589R、S. 3326、P. 2811、P. 3794五件篇幅较大,具有天文气象占文汇抄性质;P. 2536V, S. 2669V两件篇幅较短,与李淳风《乙巳占》的有关内容接近,应为两种与《乙巳占》具有共同来源的天文云气书。

P. 2512。是一件长达301行的长卷,首尾皆残,所有内容大致由五部分构成。(1)星占。存中官占,外官占,占五星色变动,占列宿变、五星逆顺、犯者、守国分野等内容。卷中记有与二十八宿相配的地域名称79个,全系汉代郡名和侯国名,所述古今分野之变亦止于汉武帝时代,故有人认为这是吴末晋初太史令陈卓所定^④。(2)《二十八宿次位经》利《石氏、甘氏、巫咸氏三家星经》。这是本卷最有价值和最为今人重视的部分。写本依次记述二十八宿的距度、距星、去极度和分野。所记赤道距度与《淮南子·天文训》、《汉书·律历志》、《续汉书·律历志》相

同,并以南斗附尾数为二十六度四分度之一。写本与《开元占经》所列距度、距星、去极度略异,但与同书卷一百六所列“古度”同,说明是较早的材料。《三家星经》总计 283 座,1464 星,与陈卓“定纪”数目完全相同。其占辞与《隋书·天文志》一致,某些地方甚至完全相同,可知是李淳风编撰《晋书》、《隋书》“天文志”的依据之一。因此,本卷《二十八宿次位经》和《三家星经》,是现存陈卓“定纪”后的年代最早的星表。(3)《玄象诗》。五言为句,存 264 句,加上脱漏文句,估计在 270 句左右。它是为便于记诵前面的《二十八宿次位经》、《三家星经》的星官而作,是现存比《步天歌》更古老的通俗识星作品^⑮。诗中提到“三垣”,是迄今所见记载“三垣”名称的最早文献。(4)五行及二十八舍。内含“四时更王所主分[野]”和“五行守廿八舍以其色定其福败”,从内容看,此部分似未抄完。(5)日月旁气占。存日月旁气占 13 条,每条都有图像和说明文字,其中三条图像已佚。据写本第 163 行“自天皇已来至武德四年,二百七十六万一千一百八岁”之句,可推定其抄写年代不能早于唐武德四年^⑯。

P. 3589R。首尾皆残,所存内容可分为三部分。(1)《玄象诗》残文。存诗 161 句,因前部已残,故无题名。但据其内容与 P. 2512《玄象诗》比较,可知亦为《玄象诗》写本。其编排方法与 P. 2512 不同。P. 2512 依“三家”排列,即先从角宿起叙石氏,再从角宿起叙甘氏,复从角宿起叙巫咸,最后总叙紫微垣。要记住全天星名须在天区转三匝,颇不方便。本卷《玄象诗》试图克服这一困难,实现在天区转一匝即可识星的目的。但仍未脱“三家”窠臼,故在摘引的各段诗句上标明“赤”、“黑”、“黄”、“紫”以示区别。这说明,本卷《玄象诗》比 P. 2512《玄象诗》产生要晚。从这两件《玄象诗》写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传统的星官记忆方法正由“三家”体系向《步天歌》的“三垣二十八宿”体系过渡。(2)《许七曜利害吉凶征应瞻》。标题之后只抄有出自《后汉书·李合传》的

一则故事,似未抄完。(3)《日月五星经纬出入瞻吉凶要诀》,为“太史令陈卓撰”。历代书目所著录的陈卓著作均无此篇,盖为陈卓佚作。所存内容只有日占,月占和五星占已佚。

S. 3326。首尾皆残,现存内容由三部分组成。(1)气象占。原有48条,今存25条,每条上图下文,今图文完整者17条,仅当原卷三分之一强。据题记,这是李淳风从古书中抄撮的。(2)全天星图。名称系据内容暂拟,未必准确,或许它就是《隋书·经籍志》著录的“《二十八宿分野图》一卷”或“《天文十二次图》一卷”^⑦,亦未可知。由十三个小图组成:第1—12图为按十二次划分的横图,次序为子、亥、戌、酉、申、未、午、巳、辰、卯、寅、丑;第13图为北极和紫微垣图。每幅图下皆注各月日会星宿及昏、旦中星,所用乃郑玄注《礼记·月令》中的文字。全图用彩色绘成,用黑色代表甘德星,用橙黄色、圆圈、外圆圈内橙黄点代表石申和巫咸星,石、巫二家星区分不甚严格。紫微宫图的方位是左东右西上北下南,与仰视星空相一致。图上的星数,虽各家计算略有出入,但都在陈卓“定纪”的1464星范围之内。(3)电神象及题记。绘有一弯弓射箭的“电神”象,后面有“其解梦及电经一卷”题记,似尚未抄完即搁笔,确切含义尚待研究。据马世长研究,该写本可能抄于公元705—710年之间^⑧。与该写本性质相同的内容,亦见于敦煌市博物馆藏076号背面。敦博076号背面亦抄有《占云气书》一卷,今存“观云章”和“占气章”。写本用彩色绘出云气图形,并于其下写有占辞。“观云章”有图26幅,有占辞29条;“占气章”有图22幅,有占辞24条。此后尚有占气图27幅,却未抄写占辞^⑨。在云气占的前面,还残存一紫微宫图。图前面残去部分估计亦为横图,至于如何划分,则不得而知。紫微宫图的方位是左西右东上南下北,虽与S. 3326全天星图方位恰好相反,但仰视星空的效果却是一样的。这两幅图,正好体现了中国古代处置星图方位的两种基本方法。紫微宫图用黑红二

色绘制,存黑星 87,红星 51,共计 138 颗。黑色仍代表甘德星,红色则代表石、巫二家星。

P. 2811。所存内容可分为四个部分。(1)五星占。存镇星占的一部分及太白占、辰星占的全部,岁星占和荧惑占已佚。(2)流星占。(3)气占。(4)风占。卷中有个别文句与《乙巳占》同,知此本亦是李淳风编写《乙巳占》的材料来源之一。气占部分有“匈奴入界”语,疑原著可能是汉代作品。据写本讳“民”推测,应是抄写于唐代。写本于正背两面书写,背面在此书之后隔一行抄有侯昌业《直谏表》。从书写风格看,侯昌业《直谏表》应系另一人手笔。

P. 3794。所存内容可分为三部分。(1)刑德、式占等占文。标题已佚,残存文字据刑德、六煞及其它与式占有关的方法占测用兵吉凶。(2)风云气候占。有标题“风云气候第四”,据风角、云气占测用兵吉凶。(3)灾祥变异占。有标题“灾祥变异第五”,据军中出现的各种怪异现象占测用兵吉凶。同样性质的占文,亦见于《乙巳占》卷十、《开元占经》卷九十一、《太白阴经》卷八。

P. 2536V。所存内容有三部分。(1)月食二十八宿占残文。占测月食二十八宿的吉凶,与《乙巳占》“月食五星及列宿中外官占第十四”的月食二十八宿占文基本一致。(2)月食中外官占。有“月食在中外官占第十八”标题,占测月食中外官诸星的吉凶。(3)题记。作“同光貳年甲申岁”,知写本抄于公元 924 年。其文字与今本《乙巳占》卷二“月食五星及列宿中外官占第十四”基本一致,但篇目及序号不同。因此,该写本应与《乙巳占》至少有共同来源^②。

S. 2669V。所存内容可分为三部分。(1)帝王气象占残文。只存一行,其余皆佚。(2)将军气象占。描述将军之气的形状及吉凶,标题残存“象占第二”四字,据内容可补为“将军气象占第二”。(3)军胜气象占。描述军队能获胜时的云气形状及吉凶,标题为“军胜气象占第三”。

其文字与《乙巳占》卷九“帝王气象占第五十三”、“将军气象占第五十四”、“军胜气象占第五十五”三篇基本一致,但篇序不同。因此,该写本应与《乙巳占》至少有共同来源^④。

上述七件天文云气书,虽然书名、作者及成书年代多不可详考,但在中国古代文化史研究中的地位却非常重要。尤其是 P. 2512《三家星经》和 S. 3326“全天星图”的发现,对科学史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大家知道,以往学术界对《开元占经》所记“三家星经”的来历一直不甚清楚,对卷六十六和卷六十七之间的缺漏也疑惑不解。敦煌本《三家星经》的面世,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原来,《开元占经》是以石氏为主而把三家拆散排列,观测资料则只取了石氏一家。而敦煌本《三家星经》是陈卓“定纪”后未经拆散的“三家星经”,显然就是《开元占经》据以改编的原始材料^⑤。同样,《开元占经》卷六十六和卷六十七之间的缺文,亦可据 P. 2512 补出。S. 3326 所载“全天星图”,是现存中国古代最早的全天星图。大家知道,中国古代的星图绘制在当时的世界天文学史上是处于领先地位的。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先生曾指出:“了解到世界各地绘制天图的情况,我们就会明白,决不可轻视中国星图从汉到元、明这一完整的传统”,“蒂勒(Thiele)、布朗(B. Brown)和《科学史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Science*)的作者萨顿(G. Sarton)都认为,从中世纪直到十四世纪末,除中国的星图以外,再也举不出别的星图了。在这时期之前,只有粗糙的埃及示意图和主要具有美术性质的形象示意图,而不是星辰本身。”^⑥因此,这幅敦煌星图实际上也是世界上现知最早的全天星图,其科学史价值可想而知。其它几件写本,对研究古代天文星占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例如,P. 2536V 和 S. 2669V 两件写本,所存内容与《乙巳占》有关部分基本一致,说明它们至少与《乙巳占》具有共同的来源,是研究《乙巳占》的重要参考资料。

2. 《玄象西秦五州占》

a. 明确载有《玄象西秦五州占》的写本: P. 2632R, P. 2941R, P. 3288R, S. 2729V, S. 5614, [Dh1366V]。

b. 与《玄象西秦五州占》有关的写本: P. 2610R+V。

此类共有六个写本,其中五个都有部分内容显然是占测西秦五州(即敦煌、酒泉、晋昌、张掖、武威五郡)的吉凶。另外一个即 P. 2610R+V,亦有大部分内容见于上述记有西秦五州占的诸写本,为研究方便,也一并归入。

所谓“玄象西秦五州占”,是一种以占测西秦五州的吉凶情况为主要目的的天文气象占文献。玄象,写本或作“玄像”、“悬象”(二者都与“玄象”为同音通假关系),现依古书的通常写法统一为“玄象”,意思是指天象。古代的“西秦”,本指春秋战国时代位于列国西部的秦国。后来,也将秦国故地即今陕西、甘肃一带称为“西秦”。敦煌天文气象占写本中的“西秦五州”,从有关占文分析,则明显是指当时的敦煌、酒泉、晋昌、张掖、武威五郡。例如, P. 3288 所载“玄像西秦五州占第廿二”说:岁星主西秦张掖郡,荧惑主西秦酒泉,镇星主西秦晋昌,太白主武威,辰星主敦煌。又如,上述五件载有占测西秦五州吉凶内容的写本中,有三件记载了五星符,这五星符就是武威郡用荧惑符、张掖郡用太白符、酒泉郡用镇星符、晋昌郡用辰星符、敦煌郡用岁星符。

五个写本所抄《玄象西秦五州占》都不完整,其中 P. 3288R、P. 2632R、S. 2729V 三件所存文字较多一些。据现存内容分析,原本《西秦五州占》应是一种篇幅不小的著作。现在所见到的这几件残文抄本,都可能只是《玄象西秦五州占》一书的后面部分。至于其开头部分还有哪些内容,现在已无法推测。诸写本所抄内容多有重复,可互相比勘,兹列表于下(原无标题,现据内容暂拟的加方括号表示):

P. 2632R	P. 2941R	P. 3288R	S. 2729V	S. 5614
		玄象西秦五州 占第廿二天镜		
[正月占城气法]		正月占城气法		
占十二日暝法		日暝西秦	[占日暝]	日暝占第卅六
占日斗十二月 十二日同占法	[占日斗]	占月 ^④ 斗法	[占日斗]	占西秦日斗 法第卅七
西秦日食占	西秦日食	占日食法	[占日食]	占日食吉凶 法第卅八
悬象西秦日 晕 ^⑤ 日耳法第 廿七		悬象占日耳法	悬象占西 秦日耳法第 廿七	
日晕占		西秦占日晕法	西秦日晕 占第廿九	占西秦日晕 第卅九
[占色气法]		占色气法	[占色气法]	
占月光不明 廿三		占月光不明法	占月光不 明第廿三	
[五星符]		[五星符]	[五星符]	

由上表可以看出,相同的内容在诸抄本中的标题和序号并不总是一样。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各写本所用底本不同,还是抄录时调整了编序,尚有待进一步研究。各抄本所用的书名也有差异,如有的称《西秦占》,有的称《玄象占》。我们认为,原名很可能应如 P. 3288 作《玄象西秦五州占》,《西秦占》或《玄象占》皆为其省称。

从残存的内容看,《玄象西秦五州占》是一种十分特别的天文气象占著作。首先,它的目的只是为了占测敦煌、酒泉、晋昌、张掖、武威等西秦五郡的吉凶情况,对别的地方却不甚关心,这似乎表明在编撰《玄象西秦

五州占》的时候,此五郡可能是一个相对独立而封闭的地区。其次,它的占测方法也与一般的天文气象占文献有别。所谓天文气象占,核心是根据天象占测人事吉凶,故天象是占测的主体。但是,在《玄象西秦五州占》的残文中,时间似乎成为了占测的主体,至少是与天象同等重要。它多是占测十二支日或十二月分别发生某种天象时,在西秦五州的吉凶情况。以时间为线索占测吉凶,在传世天文星占文献中也能见到一些,但这并非天文气象占的主体。像《玄象西秦五州占》这样几乎全以十二支日或十二月占测吉凶的文献,在我们见到的天文气象占文献中似乎再无第二种。联系到《玄象西秦五州占》后面所抄《太史杂占历》等内容的选择学性质,《玄象西秦五州占》与选择学的关系是值得注意的。不过,书名中的“玄象”二字,颇能说明该书在当时人看来是一种占测天象的文献。所以,将《玄象西秦五州占》归入“天文气象占”是有理由的。

《玄象西秦五州占》诸抄本中,有两件写有题记。一件为 S. 2729V,存“大蕃国庚辰年五月廿三日沙州”等字。另一件为 P. 2632R,作“咸通十三年八月廿五日于晋昌郡写记”。大蕃,是唐代吐蕃政权的汉文译名。吐蕃统治敦煌时期(786—848)亦自称大蕃,多见于敦煌写本及石窟题记,以干支纪年或仅用地支纪年。S. 2729V“大蕃国庚辰年”,即公元 800 年。P. 2632R“咸通十三年”,是唐懿宗咸通十三年,即公元 872 年。从这两个题记可知,自吐蕃占领的公元 800 年至归义军统治的公元 872 年,《玄象西秦五州占》已在敦煌或晋昌一带流传。这说明,《玄象西秦五州占》最晚应写成于公元 800 年之前。以前有学者据书中的个别词语,推断这一类文献出现于唐末五代即公元十世纪初^⑥,现在看来,是不正确的。至于《玄象西秦五州占》的上限,在写本中没有交待,不易确定。黄正建先生据唐玄宗天宝元年改州为郡,而写本中有敦煌、酒泉、晋昌、张掖、武威五郡之名,因而推定写本应编写于唐玄宗天宝年间^⑦。按,诸写本虽然载有上述五郡之名,但同时又记有“西秦五州”

(P. 2632R、P. 3288R、S. 2729V)、“西秦四州”(P. 2632R、P. 2941R、P. 3288R、S. 2729V、S. 5614)、“西秦二州”(P. 2632R、P. 3288R、S. 2729V、S. 5614)、“武威、张掖二州”(P. 2632R、S. 2729V)之类的叫法。这说明,写本对“州”、“郡”的用法并无严格区分。因此,单凭写本中用“郡”一点来确定时代,恐怕是不够的。仔细分析《玄象西秦五州占》的占文,似乎可以看出这是在西秦五州面临异族入侵的情况下编写的。例如,占文中常提到有“外国兵”来攻城或侵扰(P. 2632R、P. 2941R、P. 3288R、S. 2729V、S. 5614),有“南蕃”(P. 2632R、P. 3288R、S. 2729V、S. 5614)或“外蕃”(P. 2941R、S. 2729V、S. 5614)入侵。众所周知,安史之乱(公元755年)爆发以前,唐朝在敦煌一带的统治是较为稳固的。像《玄象西秦五州占》所反映的情况,似乎不大可能发生在安史之乱以前的河西地区。因此,我们怀疑《玄象西秦五州占》可能是在安史之乱后吐蕃侵占河西地区的前后编写的。也就是说,《玄象西秦五州占》的编成大致不出公元755年至800年之间。当然,这只是根据《玄象西秦五州占》占文提出的一个推测,其确切成书年代仍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以上五个写本中,P. 2941R是一个首尾皆残的卷子,所存内容只限于《玄象西秦五州占》。S. 5614为册页,《玄象西秦五州占》抄于前部,接抄于其后的《摩醯首罗卜法》属于“数卜”类,与“天文气象占”无关。P. 2632R在《玄象西秦五州占》的后面,还抄有“占日傍气”和“占风法”两部分,这两部分都是“天文气象占”的常见内容。写本的末尾所写题记称为“《手诀》一卷”,说明该写本是一件天文气象占的实用性手册。在这种实用性手册中,将专用于西秦地区的《玄象西秦五州占》和其它天文气象占文献合抄在一起,是容易理解的。另外两件即P. 3288R与S. 2729V,在《玄象西秦五州占》的后面都抄有以《太史杂占历》等选择文献为主的其它数术占文。而这些占文,又多见于P. 2610。因此,为研究方便,我们将P. 2610也放在一起介绍。从内容看,上述三件写本

中以《太史杂占历》等选择文献为主的占文,其使用范围应不限于西秦五州。那么,它们为什么总是与《玄象西秦五州占》合抄在一起呢?对于这一问题,写本中也透露了一点线索。三件写本都有关于“四宫占候”法的记载,而 P. 2610 在“四宫占候”法的后面多抄了如下句子:“管内五州杂占天镜并风云气候,但依此图,善恶必应,万无不克。”我们怀疑,这里的“管内五州”,很可能就是指“西秦五州”。由此看来,三件写本中与《玄象西秦五州占》合抄的上述占文,可能仍主要是为西秦五州使用。

《玄象西秦五州占》诸写本的发现,对研究古代数术史和社会史具有重要价值。在古代天文气象占文献中,专门占测某一地区天象吉凶的书籍殊为少见。《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都著录有《荆州占》^②,书名与《玄象西秦五州占》相类。但从《开元占经》、《乙巳占》所保存的《荆州占》佚文看,该书并非专门占测荆州地区的吉凶。之所以以《荆州占》为名,是因为倡议纂辑此书的刘表当时正担任荆州牧^③。因此,《荆州占》和《玄象西秦五州占》并不是同一性质的文献。据目前所知,专门占测某一地区吉凶的天文气象占文献,似乎还只有《玄象西秦五州占》一种。这一新类型天文气象占文献的发现,填补了古代数术史研究的一项史料空白,加深了我们对古代天文气象占的认识。这一文献编成和流行于敦煌地区与外族斗争的过程当中,虽不能当作研究当时社会状况的直接史料使用,但内中确实也反映出当时敦煌、酒泉等五郡人民生存状况和心理状态的某些侧面,对社会史研究也具有参考价值。合抄于这些写本中以《太史杂占历》为主要内容的其它占文,同样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例如,据古书记载,唐代流行太一、雷公、六壬等三式。但是,专门的式法著作在敦煌写本中殊为少见^④。而 P. 2610 即有式法方面的记载,值得引起注意。又如,P. 2610 背面所载《地镜》,多与《开元占经》所载《地

镜》、《天镜》佚文相合,对研究《地镜》、《天镜》及《开元占经》,都具有参考价值。

3. 佛教天文书

a. 《摩登伽经》: S. 3374。

b. 《舍头谏太子二十八宿经》: S. 1648, S. 6024, [Dh519]。

c. 《大方等大集经》: P. 4058CV。

d. 疑伪经: P. 3055V。

e. 不知名天文书: P. 3571V。

此类共六个写本,其中 S. 3374 为《摩登伽经》, S. 1648、S. 6024 两件为《舍头谏太子二十八宿经》(简称《舍头谏经》), P. 4058CV 为《大方等大集经》, P. 3055V 为疑伪经, P. 3571V 为不知名天文书。

S. 3374。首尾皆残。原系印度佛经,汉译本今见《大正藏经》卷 21 第 399—410 页。所存系该书的中间部分,约当全书的 28%。此经由支谦和竺律炎(一名竺持炎)共译于三国东吴黄龙二年(公元 230),属于中国早期从印度翻译过来的佛经。写本与传本文字小异,可用于校勘。内容是通过婚姻故事讲述印度天文星占学的知识,包括 16 项内容:(1)二十八宿的名称、星数、形状,及相应的祭品;(2)月离位置(月亮运行在二十八宿间的具体位置)与此时出生的人的命运;(3)月离位置与所修城邑的吉凶善恶关系;(4)月离位置与下雨的关系;(5)月离位置与日月食所主的吉凶;(6)月离位置与所应举作之事;(7)各月地动所主灾异;(8)各月昼夜长短时节;(9)里数由旬之法,即长短等计量单位;(10)月离位置所主疾病及禳祭之法;(11)月离位置与系囚解脱迟速;(12)人体黑子(黑痣)所主吉凶;(13)月会诸宿及其昼夜时分;(14)历日置闰法,十九年七闰,五年再闰;(15)七曜周期;(16)二十八宿所主各种人等。除“人体黑子所主吉凶”,在中国人看来应归入相术外,其余均与天文星占相关。《隋书·经籍志》天文类著录“《摩登伽经说星图》一卷”,有人

认为应即此《摩登伽经》的说星图品^⑩。但该“品”内容十分有限,是否当时就以“一卷”行世,仍需研究。

S. 1648、S. 6024。两件均系断片,但笔迹相同,应是同一写卷破败散落者。此外,Dh519号也属同一写卷的残片。《舍头谏经》是《摩登伽经》的不同译本,比《摩登伽经》译本后出约半个世纪。译者竺法护,是西晋时的译经名僧。译本今存于《大正藏经》第21卷第410—419页,译文忠实原典,但读起来诘屈聱牙。写本所存文字,约当全书30%左右。

P. 4058CV。前端已残,后有另一人抄写的“推十二相属法”。所存内容属《大方等大集经》。译本今存于《大正藏经》第13卷第137—143页,译者是昙无讖。写本所存内容,是该经的“宝幢分第九三昧神足品第四”。写卷字体颇具隶意,个别文字的写法具有明显的北朝特征,如“敝”字即作典型的北朝俗字形状^⑪。因此,其抄写年代可定于北朝。该写本尚未抄完,隔两行接书一日至三十日所配二十八宿名称,其中一日与二十九日配“室”,二日与三十日配“壁”。在写经正文各宿右侧,又批注了相应的日期。其内容是讲属于各宿的人的性情禀赋。写本文字与传世本略异,可用于校勘。

P. 3055V。从内容看,是据《妙法莲华经马鸣菩萨品第三十》改写的疑伪经。《妙法莲华经马鸣菩萨品第三十》译文今存《大正藏经》第85卷第1426—1431页,译者是鸠摩罗什。写本首尾皆残,存34行,字迹极为潦草。第23行有“《论语》之中‘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如(而)众星拱之’”,显系编造者加入,故方广钊博士认为应属疑伪经。又,写本以“如”代“而”,这是唐五代西北方音特征之一。据此,不排除此本是敦煌或西北人编写的可能。

P. 3571V。首尾皆残,存26行。由于各行上部均残去三分之一,故无法连读,其性质难于判定。现存部分开端正中有“镇宿”二大字,其意义以及与后面正文的关系,亦不清楚。残存占文,似主要讲日月食所

伴随的气象状态及其吉凶。文中有“白月”、“黑月”、“帝释天”、“摩醯首罗天王”等说法,可知与印度天文星占学关系密切。写本正面所抄亦与佛教有关,黄永武《敦煌宝藏》曾拟题为“佛家破妖伪说”,法国《敦煌汉文写本目录》则定名为《真言要诀》。其准确性质,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值得指出的是,写本正面有避讳“民”字的痕迹(但并不十分严格),似可佐证定此本正面抄写时代早不过唐太宗时代的旧说。写本背面的星占文献,亦当抄写于唐代或稍后。

以上六件佛教天文书写本,虽多数有传本存世,但其文字与传本偶有差异,在校勘学上很有用处。同时,它们对研究佛学和印度天文星占学在中国的传播,也具有参考价值。

以上,我们对敦煌天文气象占写本的内容和研究价值作了简要的讨论。从中可以看出,敦煌天文气象占写本内容丰富,价值重大,值得学术界深入探讨。可惜写本多数已不完整,有的还残缺严重,给研究造成很大不便。又由于其抄本性质,多数未曾著录于古代书目,故许多内容难与传世文献互证,理解起来也很困难。我们的工作,旨在尽量为读者多介绍一些现有研究成果和解决问题的线索。但是,由于学养和研究能力所限,我们不一定圆满完成了预定的任务。衷心希望今后有更多的学者来关心和研究这批资料,共同发展和壮大敦煌数学文献研究这一新的学术领域。

(与刘乐贤合作。法文版原载 Marc Kalinowski ed.
Divination et société dans la Chine médiévale, Études des
manuscripts de Dunhuang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et de la British Library, pp. 34—79; 中文版
原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9卷,中华书局,
2006年,第409—424页)

注释:

- ① 应该指出的是,现代科学分类中的天文现象和气象现象,在中国古代并无严格区别。中国古籍所谓“天文”,系与“地理”或“人文”相对,是将气象现象也包括在内的。因此,古代的“天文”基本上等同于今天我们所说的“天天气象”。
- ② 《十三经注疏》,第 82 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年。
- ③ 《汉书》,第 726 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
- ④ 《大唐六典》卷十“秘书省·太史局”,(日)广池千九郎训典本,横山印刷株式会社,昭和四十八年。
- ⑤ 《汉书》,第 2981 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按,1995 年新疆尼雅遗址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质护膊,与《汉书》所记可以互证。见《中国文物精华》图版第 117,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年。
- ⑥ 《资治通鉴》,第 6009—6010 页,北京,中华书局,1956 年。
- ⑦ 参看江晓原《天学真原》,第 62—68 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 年。
- ⑧ 李凤《天文要录》,《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天文卷》影印本,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7 年。
- ⑨ 萨守真《天地瑞祥志》,《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天文卷》影印本,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7 年。
- ⑩ 《天元玉历祥异赋》,《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天文卷》影印本,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7 年。
- ⑪ 参看冯锦荣《敦煌本〈二十八宿次位经〉〈三家星经〉(P. 2512)与日本平安时期阴阳寮所藏〈三家星官簿赞〉》,“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香港,2000 年 7 月 25—26 日。
- ⑫ 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五星占〉释文》,《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第一集),第 1—13 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78 年;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西汉帛书〈天天气象杂占〉释文》,《中国文物》第 1 期,第 26—29 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 年。参看刘乐贤《马王堆天文书考释》,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 年。
- ⑬ 但是,《俄藏敦煌文献》将该写本定名为《立像西秦五州占第廿二》(按,“立像”应释为“玄像”),完全等同于 P. 3288 的前部,却不一定可靠。
- ⑭ 潘鼎《敦煌卷子中的天文材料》,《中国古代天文文物论集》,第 223—242 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年。
- ⑮ 邓文宽《比〈步天歌〉更古老的通俗识星作品——〈玄象诗〉》,《文物》1990 年

第3期,第61—65页。

- ①⑥ 按,此句所记应属某种历法的上元纪年。对此,潘鼐曾有解释,见《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天文卷》第四册,第602页,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张培瑜在回复笔者的信中也就此谈了如下意见:“此历元只与东汉四分历相近,与战国、汉初古六历也相近,与其它历法皆不合。但估计2761108中之8或武德四年两者内必有一小误(差几年)”。
- ①⑦ 《隋书》,第101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参看邓文宽《隋唐历史典籍校正三则——兼论S.3326星图的定名问题》,载《敦煌吐鲁番天文历法研究》,第25—37页,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
- ①⑧ 马世长《“敦煌星图”的年代》,《中国古代天文文物论集》,第195—198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
- ①⑨ 何炳郁、何冠彪《敦煌残卷占云气书研究》,台北,艺文印书馆,1985年。
- ②⑩ 黄正建认为写本应属《乙巳占》,见《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第49页,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年。
- ②⑪ 黄正建认为写本应属《乙巳占》,见《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第50页,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年。
- ②⑫ 席泽宗《敦煌卷子中的星经和玄像诗》,《中国传统科技文化探胜》,第45—66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年。
- ②⑬ 《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小组译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第252—253页,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78年。
- ②⑭ 据文义和其它写本,此处“月”字应为“日”之误。
- ②⑮ 据文义和其它写本,此处“日晕”二字应为衍文。
- ②⑯ 高国藩《敦煌民俗学》,第332—333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
- ②⑰ 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第42页,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年。
- ②⑱ 诸书对《荆州占》的著录情况,参看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的有关概述,《二十五史补编》,第5570—5571页,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
- ②⑲ 《晋书·天文志》说:“及刘表为荆州牧,命武陵太守刘睿集天文众占,名《荆州占》。”《晋书》,第32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 ③⑩ 关于敦煌写本有关式法的零散资料,可参看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第32—41页,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年。
- ③⑪ 江晓原《天学真原》,第360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
- ③⑫ 参看秦公《碑别字新编》,第317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

敦煌文献中的天文历法

在数万件敦煌文献中,天文历法写卷虽然只有 60 余件,却以其独特的形制、丰富的内涵为人瞩目。

一 敦煌历日产生的背景

历书行用区域,自古以来就是封建王朝权力所及的重要标志。唐德宗贞元二年(786)以前,敦煌地区使用的就一直是唐王朝的历书。

唐德宗贞元二年(786),吐蕃军队最后攻占了敦煌,敦煌同中原王朝的联系被割断,象征王权的中原历书也无法颁行到那里了。吐蕃使用地支和十二生肖纪年,这既不符合汉人行之已久的用干支纪年、纪月、纪日的习惯,也无法满足敦煌汉人日常生活的需要。于是,敦煌地区开始出现当地自编的历书。60 余年后,尽管张议潮举义成功,使敦煌重新回到了唐王朝的怀抱,但敦煌地区自编历书已成习惯,民间仍继续使用自编历书。其时,不独敦煌一地,剑南西川(今四川)也在自编历书。敦煌历书中有一件唐中和二年(882)《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日]》,就是由成都流传到敦煌的私撰历日。相对于封建王朝颁行的历书来说,这些地方历日常常被称作“小历”。从现存敦煌历日来看,敦煌地区自编历日一直延续到宋初,前后达两个世纪之久。

二 敦煌历日的丰富内容

敦煌历日,广义上是指从敦煌石室发现的古代历书,既包括当地的,也包括来自中原王朝和外地的;狭义上则指敦煌地方自编的历日。在现存敦煌历日文献中,来自中原的历书为数寥寥,绝大部分是敦煌地方自编的历日。

敦煌历日中,现在可以明确肯定只有四件不属于敦煌地方自编。一件即前面提到的“樊赏家”私印历日,虽属印本,却只残存三行文字。一件是《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和十二年(451)历日》。历日内容甚为简单,如太平真君十一年历正月全部内容是:“正月大,一日壬戌收,九日立春正月节,廿五日雨水。”其余各月间有社日、腊日、始耕(即籍田)的注记,仅此而已。其朔日干支同陈垣《二十史朔闰表》则完全一致。这件历书的特点之一是改天干“癸”字为“水”,如太平真君十二年七月一日干支为“水未”,八月一日为“水丑”,大概是避讳北魏道武帝拓跋珪的“珪”字而改的。尽管内容极为简略,这件历书却是现存敦煌历日中年代最早的一件,而且,也是现知唯一的北魏历书实物。第三件是《唐乾符四年丁酉岁(877)印本历日》,此历存二月廿日至年末(中有残缺),是来自唐王朝的历书。可以说,这是现存敦煌历书中内容最丰富的一件。据严敦杰研究,此历用唐长庆宣明历术。历书内容分两部分,上部为历日,下部为各种迷信历注的推算方法。据原件末尾题识,此历估计是五代敦煌历法专家翟奉达的收藏品。第四件是《唐大和八年甲寅岁(834)具注历日》,虽仅存一小片,却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印本历日。

敦煌地方自编的历日,现知最早者为《唐元和三年(808)戊子岁具注历日》,是一个只存四月十二日至六月一日的断片,最晚者为《宋淳化四年(993)癸巳岁历日》,总计有四十余件。这四十余件历日中,原有明

确纪年的共有九件,最早的是唐大和八年(834)历日,最迟的是宋淳化四年(993)历日。其余多是断简残编。经过中外学者的艰苦努力,这些残历的年代也基本上被考订了出来。

从形制上看,敦煌历日大体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繁本,一种是简本。书写格式也有两种,一为通栏,一为双栏。双栏书写的历日一般为单月,下为双月。这里我们仅以 P. 3403《宋雍熙三年丙戌岁具注历日一卷并序》为例,介绍一下敦煌历日的内容,以便窥一斑而见全豹。

此历为安彦存撰,首尾完整,通栏书写,共 354 日。历日题名之后有一个长达 31 行的“序”。其中介绍了制历的重要意义,多是套话,然后介绍了本年几十种年神的方位,再次为“太岁将军同游日”,年、月九宫亦即“九宫飞位”,“三白诗”,“推七曜直日吉凶法”,各种宜吉日的选择和凶日的避忌,最末一行是全年各月的大小。除最末一行内容,几乎全带迷信说教。在历日序的中间顶端,画出了当年的年神方位图,与序言中的文字相辅相成。每月开头有当月的月九宫图、月大小、月建干支,其下为八种月神方位、日期和太阳出入方位。历日部分由上而下分成八栏。最上一栏注“蜜”(星期日)。其次为日期、干支、六十甲子纳音和建除十二客,如正月一日是“一日庚午土定,岁首”,其中“土”为该日“庚午”的纳音,“定”是建除十二客。第三栏是弦、望、人日、祭风伯、祭雨师等注记。第四栏是二十四节气和七十二物候。第五栏是极为繁杂的吉凶注,如正月一日注:“岁位、地囊、复,祭祀、加官、拜谒、裁衣吉。”地囊等迷信注记均有严格的排列规律,敦煌历日所以称作“具注历”,也主要是因为有些吉凶注。第六栏为昼夜时刻,使用的是中国古代的百刻纪时制度,随节气变化昼夜互有增减,春秋二分日昼夜各五十刻。第七栏是“人神”,第八栏是“日游”,这两栏内容均是不变的套数。总括看来,迷信和科学内容参半。

敦煌历日的朔日与同一时期的中原历不尽一致,常有一到二日的

差别；闰月也很少一致，比中原历或早或晚一、二月。这种差别何以产生，目前尚无法说明，因为迄今仍未获知敦煌地方历日编制的依据。尽管如此，纪日干支同中原历却十分一致，表明中国古来干支纪日法的连续性并未因地方自编历日而中断。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现知来自基督教的星期制度最早引入我国历法是从敦煌历开始的。一星期的各日在敦煌历日中依次称作“蜜”（星期日）、莫（星期一）、云汉（星期二）、啗（星期三）、温没斯（星期四）、那颢（星期五）、鸡缓（星期六）。一般来说，敦煌历日要在正月一日注上星期几，如 P. 3403 正月一日顶端注“那颢日受岁”，意即这天是星期五，以后只在星期日那天注一“蜜”字。个别历日只在当年正月初一注上星期几，以下不注，自然人们可以由此去推算，只是麻烦一些罢了。至于这些奇怪的名称究竟来自哪里，目前说法不一，但所注的星期日除偶有抄错外，基本正确无误。

敦煌历日在我国历法史上地位十分重要。古代历书如何演进发展，以前因实物太少而难寻觅其发展轨迹，敦煌历日的问世，大大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从出土秦汉简牍看，那时的历日内容都很简单，到北魏时仍极简略。吐鲁番出土的《唐显庆三年（658）具注历日》和《唐仪凤四年（679）具注历日》内容就比较丰富了，但大体也只是同敦煌发现的简本历日相仿佛。唐末五代宋初敦煌繁本历日的内容大大丰富起来，基本上奠定了宋至清代历日的格局。敦煌历日所存的繁、简两种形制，恰好反映了古历由简到繁的演进过程。

三 精美的古代星图

在敦煌文献中，有两幅精美的古代星图，一幅是 S. 3326《全天星图》，现藏英国图书馆；一幅是《紫微垣星图》，现藏甘肃省敦煌县博物

馆,画在《唐人写地志》(076号)残卷的背面。其中《全天星图》是世界上现存星数最多(1348颗)、也是最古老的一幅星图。

《全天星图》从十二月开始画起,根据每月太阳位置的所在,把赤道带附近的星分成十二段,利用类似麦卡托(1512—1594)圆筒投影的方法画出来,最后再把紫微垣画在以北极为中心的圆形平面投影图上,这比麦卡托发明此法早了七、八百年。每月星图下面均有说明文字,其中太阳每月的位置所在,沿用的是《礼记·月令》中的说法,例如:“二月日会奎,昏于星中,旦牛中”,并非绘图时的实际观测。这幅星图的画法在天文学史上是一个进步。此前星图的画法,一种是以北极为中心,把全天的星投影在一个圆形平面上,汉代的“盖图”大概都是如此,现存苏州的宋代石刻天文图仍无改变。这样的画法缺点很大:越到南天的星,彼此在图上相距越远,而实际上是相距越近。另一种办法是用直角坐标投影,把全天的星绘在所谓“横图”上,此法出现于隋代。采取这种办法,赤道附近的星与实际情况较为符合,但北极附近的星就差得太远,根本无法会合到一起。为了克服这两种画法的缺点,只得把天球一分为二:把北极附近的星画在圆图上,把赤道附近的星画在横图上。《全天星图》就是我们现在所知按照这种办法画得最早的一幅。这种办法一直应用到现代,所不同的只是现在把南极附近的星再画在一张圆图上。

《全天星图》彩绘而成,其中甘德星用黑点,连以墨线,石申和巫咸星画成圆圈,连以橙红线。恒星的这种画法是继承了三国陈卓和刘宋钱乐之的办法。图中十二次的起讫度数和《晋书·天文志》中所录陈卓的完全一样,说明文字则与唐《开元占经》卷64的《分野略例》大体相同。

我们称这幅星图为《全天星图》,是因为它囊括了当时北半球肉眼所能见到的大部分恒星,当时看不到的南极及其附近恒星自然不在其

中,这是它同现代《全天星图》的不同之处。

《全天星图》早就吸引了中外科技史专家的注意力。英国研究中国科技史的专家李约瑟教授在对比了我国古代各种星图包括这件《全天星图》同欧洲各种星图之后说:“欧洲在文艺复兴以前可以和中国天图制图传统相提并论的东西,可以说很少,甚至简直就没有。”(《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天学》,中译本第253页)至于星图的绘成年代,李约瑟定在公元940年前后,马世长则根据同卷《气象杂占》中的“臣淳风言”、“民”字避讳缺末笔而不讳“旦”字,以及卷末电神的服饰特征等,认为应当抄绘于公元705—710年之间。

《紫微垣星图》也是彩图,画在两个同心圆上。在紫微垣近阊阖门处,标注“紫微宫”三字;垣的东西两侧分别标注“东番”和“西番”,意即“番卫”;内圆(即紫微垣)画成一个封闭的圆圈,垣的前后面都设有缺口作为垣门。图中的星点也用红、黑两种不同颜色。此外,凡是不属于“紫微宫”的,虽离北极较近,例如造父和钩星,都略去不绘;反之,像传舍、八谷、玄戈、太阳守等,虽离北极较远,因属紫宫,仍予绘出。外圆直径26厘米,用以表示上规,即天极上北极出地的恒显圈。根据其中传舍、八谷和文昌等星推测,这幅星图观测地点的地理纬度约为北纬 35° 左右,相当于西安、洛阳等地。

四 遨游苍穹的《玄象诗》

P. 2512 是一卷重要的天文星占著作,残存内容包括四部分:(一)星占的残余部分;(二)《二十八宿次位经》和甘德、石申、巫咸三家星经;(三)《玄象诗》;(四)日月旁气占,内容格外丰富。在《二十八宿次位经》之后有“自天皇以来至武德四年(621)二百七十六万一千一百八岁”的记载,表明这一卷书是唐初的著作。它的前两部分在辑佚和校勘方面

十分重要。传世的《开元占经》由印度来华僧人瞿昙悉达编纂而成，该书卷 66 的最末一项内容为“太微星占四十六”，卷 67 的开篇却是“三台占五十三”，两不衔接，中间缺了六个星官。所缺星官在 P. 2512 的“石氏中官”里则完整无缺地保存着。

紧接三家星经之后的就是《玄象诗》。自古以来，人们就对夏夜星宿的妩媚、冬夜繁星的冷峻怀有浓厚的兴趣。可是要想记住天穹上各星官的位置和次序却非易事。于是古人创作了许多韵文和诗歌，借以介绍全天星官。唐以前的韵文作品中，大约以北魏张渊的《观象赋》为最早，时间约在公元 438 年；后来隋朝李播还作过《周天大象赋》。唐开元时王希明所作的《步天歌》，是后世流传最久的识星作品，这以前的恐怕也只有 P. 2512 保存下来的《玄象诗》了。

《玄象诗》是配合它前面的三家星经作的，全篇五言为句，共 264 句。其特点是先从角宿起叙石氏星经，再从角宿起叙甘氏星经，再从角宿起叙巫咸星经，最后将三家合在一起总叙紫微垣。这样，人们只要以这篇诗作为指南，便可迅速将全天主要星官铭记在心。如其开端：

角、亢、氏三宿，行位东西直。库楼在角南，平星库楼北。南门楼下安，骑官氏南植。摄、角、梗、招摇，以次当杓直。

这浅显易懂的诗句，十分便于记诵。把这 264 句诗背熟，再去对照满天星斗，人们就可以在无限苍穹遨游了。

不过《玄象诗》也有缺点。它是按照三家星经编次而成的，故每回都要从角宿开始。要记住星官再去认星，则须顺次在天空转三圈，不甚方便。为了克服这个缺点，有人便把《玄象诗》重新排列，尽量按照星官的次序一次对照，P. 3589《玄象诗》残卷就是这样排列的。虽方便了许多，但仍不彻底，于是至唐代有《步天歌》出（见郑樵《通志·天文略》）。

《步天歌》不再顾及三家星经的区分,而按三垣二十八宿的次序去编排,七言为句,配以星图,就更能满足人们便于记忆星官的需要了。这或许正是《步天歌》得以长久流传,而《玄象诗》未能传世的原因之所在。尽管如此,《玄象诗》毕竟反映了古人记忆星官的一个重要阶段,它使我们得以明白古代这类作品的演进和发展过程。

[原载《文史知识》1988年第8期(敦煌学专号),第48—53页]

跋敦煌文献中的两次日食记录

13年前,我曾揭出敦煌文献中有两次准确的月食预报^①,但我却未注意到敦煌文献中也有准确的日食记录。2006年4月,浙江大学许建平博士来电话询问P.2663尾部题写的有关问题,并告知那里有日食记事。我当即翻开施萍婷教授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②,发现施先生已有释文。这引起了我的关注与兴趣,并着手进行研究。现将个人一得之见披露如后,还望雅士通人有以教之。

一 原件释文与疏证

P.2663为《论语卷第五》(尾题)残卷,存末尾十六行,内容为《论语·乡党篇》^③。有关日食的记录写在尾题左侧的空白处。现将有关文字释录如后并进行必要的疏证:

1. (半行藏文题写)即将
2. □^④后有丑年三月月^⑤生六日学吴良弟^⑥。
3. 甲寅年二月月^⑦生二日日食^⑧,未时日食。
4. 丙寅十二月二日己(巳)时日食。
5. 丙寅年十二月二日己(巳)时日食。

我们知道,第1行的“郎将”是一个职官名称,但书写于此处,究何所指,尚无法说明。第2行的“丑年”是只用十二地支纪年的一种形式。我们从敦煌文献中看到,虽然吐蕃统治敦煌时也有用类似汉族六十甲子那样的纪年方式^⑨,但更多的是单独用十二地支或十二生肖纪年。再加上第1行有半行古藏文题写,与单用地支“丑”纪年可相印证。“学吴良弟”中的“学”当是“学士郎”或“学郎”之省。由此可知,此件《论语卷第五》很可能是学郎吴良弟的课本。因《论语》正文与吴良弟题写的字迹迥异,所以,这个课本并非吴学郎手抄之物,可能来自别处。

虽然吴良弟的题写并非我们要讨论的核心问题,但它仍提供了一个大的时代背景,我们在后面的研究中会参照它。

与我们的论题直接相关的是第3—5行的内容。经过对笔迹细致比对,我们发现,这3行文字笔迹与第2行吴良弟所写不同,而且这3行文字笔迹也不同,而是出自3人之手。概而言之,本件题写,至少是由4人题写而成。现将理由说明如下:

第一,第2—4行中全有“月”字。第2、3两行中的“月”字比较规范,但用笔不同;第4、5两行的“月”字近于行书,但用笔也相异。

第二,第3行有“甲寅”,第4、5两行有“丙寅”。但第3行之“寅”字为敦煌文献中习见的俗写,即上部宝盖写成“穴”字;而第4、5两行的“寅”字与现行“寅”字一致,但二“寅”字也不同,第4行该字中部为“田”,第5行该字中部为“日”。三个“寅”字三种写法,并非出自一人手笔。

第三,第2、3、5行各有“年”字,均近于正体书写,但用笔却别。

第四,第3、4、5行均有“食”字,但三个“食”字亦是三种写法,无法认作一人写成。

这样,我们就有理由认为,该卷尾部的题写是由四个人在不同年代分别写成的。

我们特别关注的是,第2行有“月生六日”,第3行有“月生二日”两

个纪日日期。它们指几日呢？该如何理解？

过去，我们在敦煌文献中不时遇到“蓂生×叶”或“蓂凋×叶”的纪日方式，那是以理想中的蓂草日生一叶或日落一叶为依托进行设计的，事实上根本不存在。而“月生×日”是我在敦煌文献中首次遇到。实际上，它也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纪日方式。

《黄帝内经·素问·缪刺论篇第六十三》：“邪客于臂掌之间，不可得屈，刺其踝后，先以指按之痛，乃刺之。以月死生为数，月生一日一瘡（音 wǎi），二日二瘡，十五日十五瘡，十六日十四瘡。”唐代宗宝应元年（公元 762）王冰为该书写成的注文说：“随日数也，月半已前谓之生，月半已后谓之死，亏满而异也。”^⑩，成书于汉代的《黄帝虾蟆经》^⑪，首篇记载了一整月中的虾蟆随月生毁图，初一至十五各日分别称作“月生一日，月生二日……月生十五日”，下半月则称作“月毁十六日、月毁十七日……月毁三十日”。^⑫

如果我们再往前追索，还可看到，形成于战国末期的湖北云梦出土《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中也有相同的纪日方法：“作女子：月生一日、十一日、二十一日，女果以死，以作女子事，必死。”^⑬

由以上例证可知，作为一种古老的纪日方法，所谓“月生一日”即初一日，“月生二日”即初二日等等^⑭。同理，P. 2663 尾部题写中的“月生六日”自然就是初六了，“月生二日”就是初二了。

第 5 行“十二月二日”中的第二个“二”字，原件笔划不清晰，故施萍婷先生空一字格，未释。笔者反复审览，难于释作“一”字。今从许建平博士所释作“二日”。

二 公元 834 年 3 月 14 日的日食记录

原卷第 3 行题写的日食是在“甲寅年”。如前所述，第 1 行有半行

藏文题写,第2行又有“丑年”的纪年,表明此件年代很可能在吐蕃占领敦煌时期(786—848)。而这一时期中的“甲寅年”只有一个,即唐文宗大和八年甲寅岁(834),因此,它应该成为我们的首选年代。但是,为求稳妥,我们将可能的年代范围放宽一些进行检索。在刘次沅教授和马利萍博士合编的《中国历史日食典》^⑮上逐一寻检,结果如下:公元894年6月7日日食(农历甲寅年五月初一壬戌);公元954年(甲寅年)无日食;公元1014年1月4日日食(农历上年[癸丑年]十二月初一戊午);公元1074年(甲寅年)无日食;公元774年(甲寅年)无日食;公元714年8月15日日食(农历甲寅年七月一日丙戌);公元654年(甲寅年)无日食。而公元834年3月14日的日食,合中原历甲寅年二月初一壬午日。

由上可知,公元654年、774年、954年、1074年均无日食发生,可以不予考虑;而894年日食在农历五月一日,714年在农历七月一日,1014年在上年十二月初一日,与此处的“二月月生二日日食”,即二月初二日日食均相去较远,唯一靠近的是834年二月初一日那次。

很显然,敦煌文献中的本次日食记录与中原历有“二日”与“一日”之别。从理论上说,日食只能发生在朔日即初一。但由于所制历日不准确,也有记在晦日(月末一日,即二十九日或三十日)或初二日的。根据我们多年对敦煌历日的研究,知道敦煌当地自编历日与中原历日常常有一到三日的差异。但是,公元834年,敦煌人自编的历日,即P.2765号《甲寅年历日》却是流传下来的。不过,该年二月初一日中原历与敦煌历干支均为壬午^⑯,没有差别。我们只能遗憾地说,记录者将“月生一日”之“一”误书为“二”了。

不过,让我们十分欣慰的是,本次日食有时辰记录,即第3行的“未时日食”。我们知道,中古时代,用十二辰纪时是当时人的生活习惯。以夜半为“子”时,相当于今之23时至凌晨1时,“未时”即相当于今之

中午 13 时至 15 时。为了对这两次日食获得更为准确的科学认识,我求教于国家授时中心、天文学家刘次沅教授^⑦,2006 年 7 月 30 日刘教授答复如下:公元 834 年 3 月 14 日的日环食,在敦煌一地,初亏为 12 点 47 分,食甚为 14 点 21 分,复圆为 15 点 47 分,食分为 0.77。“食甚”即看到日食的最大面积,发生于 14 点 21 分,正在“未时”(13—15 点),可以说完全吻合。

那么,这次日食在历史典籍中是否有相关记载呢?回答是肯定的。《旧唐书》卷十七下《文宗下》为:“二月壬午朔,日有蚀之。”^⑧《旧唐书》卷三十六《天文下》为:“大和八年二月壬午朔,开成二年十二月庚寅朔,当蚀,阴云不见。”^⑨《新唐书》卷八《文宗纪》:“[大和]八年二月壬午朔,日有食之。”^⑩《新唐书》卷三十二《天文二》为:“大和八年二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在奎一度。”^⑪《唐会要》卷四十二“日食”条记作:“文宗朝三:太和八年二月壬午朔,开成元年正月丙辰朔,二年十二月庚寅朔,司天奏:‘是日,太阳亏,至时阴雪不见。’”^⑫《资治通鉴》卷二四五唐纪六十一大和八年:“二月壬午朔,日有食之。”^⑬

比较以上史书所记,可以看出,这些记载颇有歧异。其中新、旧《唐书·文宗纪》和《通鉴》所记最为简略,仅云“日有食之”。这当是史家编书时过于省略的结果。而《旧唐书·天文志》和《唐会要》的记载接近未经过分剪裁的原始记录,它们告知:据预测,该日当有日食,但届时因天阴而未看见。至于《新唐书·天文二》说是“日有食之,在奎一度”,也当是预推的结果,因为司天台的观测结果是“阴云不见”。换言之,这次日环食,无论是在当时的都城长安,还是在皇家天文台(河南登封)都未实际观测到。

但是,生活在河西走廊西端沙州敦煌郡的唐人是看到了这次日食的,而且记载了其发生的时间是“未时(13—15 点)日食”,为其他史料所不及,这正是其珍贵之处。唯一的瑕疵是“月生一日”误书成了“月生

二日”，让人稍觉遗憾。

三 公元 846 年 12 月 22 日的日食记录

在本文第一节我已指出，P. 2663 尾部题写的第 4、5 行并非一人写成。但这两条日食记录的内容却完全相同，仅第 4 行漏一“年”字（当作“丙寅年”）。显然，这是在有人写过本次日食之后（第 4 行），另一人又重写了一遍。好在内容完全相同，我们放在一起，当作一次日食记录来研究。

本题写第 1 行的半行藏文和第 2 行的“丑年”纪年，很自然地使我们考虑它们书写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786—848 年）。而这期间，据《日食典》，786 年无日食发生，首选年代便成了公元 846 年，即唐武宗会昌六年丙寅岁。

根据刘次沅教授提供的数据，公元 846 年 12 月 22 日发生的是日全食，在敦煌一地，初亏时间是上午 9 点 13 分，食甚是 10 点 32 分，复圆是 11 点 57 分，食分 0.82。而 P. 2663 尾部题写有“巳时（9—11 点）日食”，与日食实际发生的时间完全一致。

不过，公元 846 年 12 月 22 日在农历为甲寅年十二月一日戊辰，而非二日己巳，题记写作“二日”，也有一误差。如前所言，此时敦煌行用的是民间自编历日，与同期中原历的朔日常有一到三日的差距。但敦煌文献中没有留下该年的当地历日，也未见到这一年的纪年资料。因此，我们还不能对“二日”与“一日”的差别做出完全准确的说明。

为求稳妥，我们将公元 846 年（丙寅年）前后几个丙寅年的日食情况，也在《日食典》上进行寻检，结果如下：906 年 4 月 26 日日环食，合农历丙寅年四月一日癸未；966 年无日食；1026 年 11 月 12 日日环食，合农历丙寅年十月一日癸酉；786 年无日食；726 年 1 月 8 日日环食，合农

历上年(乙丑年)十二月初一庚戌;666年无日食。情况表明,上述各年中,有日食的年仅为公元726年(上年农历十二月一日庚戌)的月日较靠近。但纪年干支当作“乙丑”而非“丙寅”,故不存在可能性。唯一的可能年代仍为公元846年。

这里,我们也要检查一下历史文献的记载情况,以便比较。对于此次日全食,《旧唐书·武宗纪》和《旧唐书·宣宗纪》会昌六年十二月均无日食记录^⑥;《旧唐书》卷三十六《天文下》记曰:“会昌三年二月庚申朔,四年二月甲寅朔,五年七月丙午朔,六年十二月戊辰朔,皆蚀。”^⑦《新唐书》卷八《武宗纪》会昌六年“十二月戊辰朔,日有食之。”^⑧《新唐书》卷三十二《天文二》:“[会昌]六年十二月戊辰朔,日有食之,在南斗十四度。”^⑨《资治通鉴》卷二四八唐纪六十四会昌六年“十二月,戊辰朔,日有食之。”^⑩《唐会要》卷四十二“日食”条则曰:“武宗朝四:……六年十二月戊辰朔。”^⑪

对于此次日食,历史文献记载不像公元834年3月14日那次日食有“阴云不见”之类的话,说明公元846年12月22日天气较好,生活在长安的人们和工作在河南登封的观象人员是看到了这次日食的,并做了记录。其中《新唐书·天文二》记有“在南斗十四度”,指此次日食发生在天区的位置。但所有资料均未记录发生日食的具体时间,只有敦煌文献有“巳时日食”的记载,价值已在历史文献之上了。

我国古代文献中的日食记录,每每失之简略。像《新唐书·天文志》,应是记载得最详细的,一般也只是告知日食发生的天区位置,多数都不记日食发生的时刻。笔者详检有唐289年和五代53年的全部日食资料^⑫,342年中仅有三次记载了日食发生的时间:《旧唐书》卷三十六《天文下》载:唐肃宗上元二年七月癸未朔(761年8月5日)，“日有食之,大星皆见。司天秋官正瞿昙谏奏曰:‘癸未太阳亏,辰正后六刻起亏,已正后一刻既,午前一刻复满。亏于张四度。’”^⑬《旧唐书·天文下》

又记:唐代宗大历三年三月乙巳朔(768年3月23日),“日有食之,自午亏,至(按,“至”后当脱一字)后一刻,凡食十分之六分半。”②《通鉴目录》记载:后唐明庄天成元年八月乙酉朔(926年9月10日)日食,“食二分,甚在辰初。”③除了这三次日食有时刻记录,就再也没有了。敦煌文献可补834年3月14日日环食和846年12月22日日全食的发生时刻,本身就已弥足珍贵。

最后,我想对P.2663正文《论语卷第五》的年代谈一点认识。此篇正文文字规整,尾部日食题写与正文不可同日而语。我们已知发生日食的甲寅年是公元834年,其前一行(第2行)的“丑年”就很可能是833年(癸丑年)。但这个“丑年”也可以再往前推几个,从而不具有唯一性。不过,我们可将公元834年作为此件正文形成的年代下限:晚于此年,该年的日食记录就不会写在它的尾部空白处了。由此也可进一步推断,吴良弟其人当生活于公元834年前后,约当九世纪中叶。

(原载刘进宝、高田时雄主编《转型期的敦煌学》,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531—537页)

注释:

- ①《敦煌本北魏历日与中国古代月食预报》,收入拙著《敦煌吐鲁番天文历法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89—200页。
- ②《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中华书局,2000年,第249页左栏。
- ③参李方《敦煌〈论语集解〉校证》,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85页。
- ④□:此字草书未识出。
- ⑤月:此字原形为重文符号。
- ⑥弟:许建平在其博士论文《敦煌经籍叙录》(打印稿第168页)释作“义”,此从施萍婷所释。
- ⑦月:此字原形为重文符号。
- ⑧“日食”二字右侧有一勾检符号。
- ⑨参见《敦煌学大辞典》“吐蕃纪年法”条,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第

- 464 页。
- ⑩ 郭霭春主编《黄帝内经素问校注》，人民卫生出版社，1992 年，下册，第 772 页。
- ⑪ 此书成书年代学界认识歧异较多，此从马继兴教授之说。
- ⑫ 《黄帝虾蟆经》，中医古籍出版社，1984 年，第 1—32 页。
- ⑬ 《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 年，释文第 207 页。
- ⑭ 在对“月生×日”的阐释中，我们较多地参考了刘乐贤博士的《马王堆帛书〈出行占〉补释(修订)》一文，载简帛网·简帛文库·帛书专栏。谨致谢忱。
- ⑮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6 年 1 月。以下简称《日食典》。
- ⑯ 同年中原历干支参见张培瑜《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 年，第 234 页；敦煌历二月一日干支壬午见拙编著《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 年，第 145 页。
- ⑰ 在此，我谨对刘次沅教授的热情帮助表示诚挚的谢意。
- ⑱ 中华书局标点本《旧唐书》，第 553 页。
- ⑲ 同上书，第 1319 页。
- ⑳ 中华书局标点本《新唐书》，第 235 页。
- ㉑ 同上书，第 813 页。
- ㉒ 武英殿聚珍版《唐会要》，日本中文出版社影印，第 761 页。
- ㉓ 中华书局标点本《资治通鉴》，第 7895 页。
- ㉔ 唐武宗死于会昌六年三月，当月宣宗继位。该年另九个月的史实记在“宣宗本纪”，故一并寻检。
- ㉕ 中华书局标点本《旧唐书》，第 1319 页。
- ㉖ 中华书局标点本《新唐书》，第 246 页。
- ㉗ 同上书，第 831 页。
- ㉘ 中华书局标点本《资治通鉴》，第 8028 页。
- ㉙ 同注㉘，第 761 页。
- ㉚ 依据北京天文台主编的《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总集》，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 年。
- ㉛ 中华书局标点本《旧唐书》，第 1324 页。
- ㉜ 同上书，第 1326 页。
- ㉝ 《通鉴目录》卷二十七，第 22 页。转引自同注㉚《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总集》，第 179 页左栏。

敦煌本北魏历日与中国古代月食预报

在五十余件敦煌历日文献中,《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历日和十二年(451)历日》是最早的一份,也是现知唯一的北朝历书实物,但原件至今下落不明。1950年,台湾学者苏莹辉先生在《敦煌所出北魏写本历日》^①一文中公布了一个录文;1992年,中国大陆学者刘操南先生在《敦煌本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十二年残历读记》^②一文中公布了另一个录文。由于近十年来我一直致力于敦煌吐鲁番天文历法文献的研究,所以对这方面的新材料十分重视和敏感。两个录文的公布,尤其是刘操南先生新公布的录文,给我的工作提供了诸多方便。同时也发现两种录文均存在错误和不达一间之处。于是,在1992年9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举办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我提交了《敦煌所出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十二年历日抄本合校》的论文,并呼吁:“望天下公私有知其下落者赐告笔者或馈赠照片,以便对这份珍贵的古写本历日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我的报告甫一结束,日本著名敦煌学家池田温教授当即表示,他收藏有此历日的复印件,愿意送我研究。本文使用的原始资料就是由池田温先生提供的。在此,我谨向池田温先生表示诚挚的谢意。需要说明的是,据前述苏、刘二先生的录文,此两年历日共有27行文字,但现在只能看到前面24行,缺尾部3行。我曾就此请教过池田温先生。因他的复印件也是别人赠送的,所以原因尚未查明。

此两年历日抄于《国语》卷三《周语下》韦昭解的背面，纸幅大小未详。正面《国语》文字隶意浓重，带有明显的北朝特征。背面历日近于行书，字迹也带有北朝特征。现据复印件重新释文并校补；对于前述两种录文的错失一并指出，出校记说明。原卷竖写，今改为横书；俗体字一律改为现行标准汉字；为便于省览，每行前加上了行号。

释文：

1. 太平真君十一年^[1] 历[日]^[2] [太]^[3]岁在庚寅 大阴^[4]大将军[在子]^[5]
2. 正月大一日壬戌收 九日立春正月节 廿五日雨水
3. 二月小一日壬辰满 十日惊蛰^[6]二月节 廿五日春分 廿七日社
4. 三月大一日辛酉破 十一日清明三月节 廿六日谷雨
5. 四月小一日辛卯闭^[7] 十二日立夏四月节 廿七日小满
6. 五月大一日庚申平 十三日望种^[8]五月节 廿八日夏至
7. 六月小一日庚寅成 十四日小暑^[9]六月节 廿九日大暑
8. 七[月]^[10]大一日己未建 十五日立秋七月节 卅日处暑
9. [闰]^[11]月小^[12] 一日己丑执 十五日白露八月节
10. 八月大一日戊午收 社 二日秋分 十七日寒露九月节
11. 九月小一日戊子满 二日霜降 十七日立冬十月节
12. 十月大一日丁巳破 四日^[13]小雪 十九日大雪十一月节
13. 十一月小一日丁亥闭^[14] 四日冬至 十九日小寒十二月节
14. 十二月大一日丙辰平 五日大寒 十^[15]三日腊 廿一日立春正月节
15. 太平真君十二年历日 其年改为正平元年^[16] 太岁在辛卯 大将军在卯^[17] 大阴在丑

16. 正月小一日丙戌成 二日始耕^[18] 六日雨水 廿一日惊蛰^[19] 二月节^[20]

17. 二月大一日乙卯建^[21] 四日社 七日春分 十六日月食^[22]
廿二日清明三月节

18. [三]^[23]月大一日乙酉执 八日谷雨 廿三日立夏四月节

19. 四月小一日乙卯开 八日小满 廿三日望种五月节

20. 五月大一日甲申满 十日夏至 廿五日小暑六月节

21. 六月小一日甲寅危 十日大暑 廿五日立秋七月节

22. 七月大一日水未^[24]闭^[25] 十一日处暑 廿七日白露八月节

23. 八月小一日水丑^[26]定 十二日秋分 十六日社月食^[27] 廿七日寒露九月节

24. 九月大一日壬午成 十三日霜降 廿九日立冬十月节

(以下三行据两种录文校补)

25. 十月小一日壬子除 十四日小雪 廿九日大雪十一月节

26. 十一月大一日辛巳执 十五日冬至^[28] 卅日小寒十二月节

27. 十二月小一日辛亥开 十六日大寒^[29] 十八日腊

校记:

[1] 年:原有,苏抄本脱。

[2] 日:原卷及两种抄本均无,据下文第 15 行“太平真君十二年历日”例补。

[3] 太:原卷及两种抄本均无,据下文第 15 行太平真君十二年历日之“太岁在辛卯”例补。

[4] 大阴:古历年神多作“太阴”。大、太古语多不分,“大阴”即“太阴”。下不出校。

[5] 在子:两种抄本均无。原卷二字残,但仔细辨认,仍可看出字痕。又,“寅”年太阴、大将军二年神均在“子”位,参拙作《敦煌古历丛识》之“年神方位表”,载《敦煌学辑刊》1989 年第 1 期。“在子”二字可确认。

[6] 蛰:刘抄本作“蜚”,误。

- [7] 闭:苏抄本释作“用”,刘抄本释作“开”,且眉批:“开或作𠂔”,均误。参拙作《天水放马滩秦简〈月建〉应名〈建除〉》,载《文物》1990年第9期。
- [8] 望种:刘抄本眉批:“芒字作望。”按,西北方音中“望”与“芒”音近,故得通借。此点蒙杭州大学黄征、张涌泉二先生见告,谨致谢忱。下不出校。
- [9] 暑:原字作“𩇛”,即“暑”之俗体,乃北朝写法。参秦公《碑别字新编》引《魏镇北大将军元思墓志》,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242页。下不出校。
- [10] 月:刘抄本眉批:“月字原缺。”苏抄本有“月”字。按,原无,今据此两年历例补。
- [11] 闰:刘抄本眉批“闰字已蚀”,是。但将补字符号[]误放在下文“月”字上。苏抄本有“闰”字,今从复印件看已蚀。
- [12] 小:刘抄本作“大”,误。此闰七月朔日己丑,下月(八月)朔日为戊午,由两月朔日日期关系亦可知当作“闰月小”,原本不误。
- [13] 日:刘抄本作“月”,误。
- [14] 闭:刘抄本作“开”,苏抄本作“用”,均误。见校记[7]。
- [15] 十:刘抄本脱。
- [16] 其年改为正平元年:刘抄本眉批:“其年八字,原为旁行,疑为增入。”苏抄本无。今从复印件可知,此八字确系增入,且笔迹与原抄本为同一人所写,刘抄本是。我在《关于敦煌历日研究的几点意见》(载《敦煌研究》1993年第1期)中说:“苏抄本无此八字,可证确为后人增入。”因未见照片判断失当,今改正。
- [17] 卯:两种抄本同。按,原卷误。“卯”年大将军在“子”位,参前揭拙作《敦煌古历丛识》之“年神方位表”。此“卯”字系涉上文“太岁在辛卯”句致讹。
- [18] 始耕:刘抄本作“始祈”,苏抄本作“始耕”,释文均误。参前揭拙作《敦煌古历丛识》之“始耕即籍田”一节。
- [19] 蛰:刘抄本作“蜇”,误。
- [20] 二月节:原有,刘抄本脱。
- [21] 建:刘抄本同,苏抄本作“黑”。我在《关于敦煌历日研究的几点意见》一文中,认为“苏抄本为是”,并解释为北魏避昭成皇帝什翼犍名讳而改,系判断失当,今改正。
- [22] 月食:两种抄本均作“月会”,误。“食”字识读,得到祁德贵、王素、苏士澍诸先生的帮助,谨致谢忱。
- [23] 三:两种抄本均有。复印件上已蚀。
- [24] 水未:即癸未。“水”系避讳改字。参前揭拙作《敦煌古历丛识》之“北魏避讳改干支”一节。

- [25] 闭:刘抄本作“开”,苏抄本作“用”,均误。见校记[7]。
- [26] 水丑:即癸丑。“水”亦避讳改字。见校记[24]。
- [27] 十六日社月食:刘抄本作“十六日社会乙”,且眉批:“会下乙……书在旁,原为补字。”苏抄本作“十六日社念月”。均误。细审原卷,“十六日社”以下字先写作“食月”,又在右侧加一倒钩符号“乙”,故当读作“月食”。“食”字左下有一污点,或系抄写时不慎点入,造成识读困难。
- [28] 至:苏抄本有,刘抄本无。按,“冬至”为十一月中气,故苏抄本是。原卷如何,今未得知。
- [29] 大寒:苏抄本作“大腊”,误。按,“大寒”为十二月中气。原卷如何,今未得知。

跋

以下研究与本太平真君历日相关的四个问题。

(一) 此北魏历日的出土地点问题

据苏莹辉先生在《敦煌所出北魏写本历日》一文中介绍,原写本于1944年冬由董作宾先生得于敦煌市廛;1948年,董先生将一份抄本寄示苏先生,并囑其考证发表,从而推测说:“其出处可能与敦煌艺术研究所新发现之写经六十余种同一起来源。”而刘操南先生则云:“1943年西安李俨乐知先生悉余之好历算也,书以递示,余移录之,而奉赵焉。”说明至晚在1943年李俨先生就已有此历的抄本。所谓“敦煌艺术研究所新发现之写经六十余种”,就是通常所说的土地庙遗书。而土地庙遗书却是1944年8月30日和31日才被发现的^③。如果此历日属于土地庙遗书,断不可能在1943年时就已有了抄本。由此可以肯定,此北魏太平真君写本历日同出于敦煌莫高窟今编17号窟,即通常所说的“敦煌石室”。后来原件又流入社会,辗转流传,今已不知下落。

(二) 历注中的“社”和“腊”

太平真君十一年历日在二月二十七日和八月一日,十二年历日在

二月四日和八月十六日均注“社”。“社”即社祭,为祭祀土地神的典礼。十一年二月壬辰朔,二十七日干支为戊午;八月一日干支亦戊午。十二年二月乙卯朔,四日干支戊午;八月水(癸)丑朔,十六日干支为戊辰。可知,此两年历日中四次“社”祭均在“戊”日。我国自汉以后,以立春后第五戊日为春社,以立秋后第五戊日为秋社^④。此两年历中的“社”祭日与此相合不悖。但此前的汉简历谱,尚未见以“社”日注历者。以“社”日注历,此北魏历书是现知最早的一份。

太平真君十一年历日在十二月十三日,十二年历日在十二月十八日均注“腊”,即腊祭百神日。两日干支均为戊辰。《初学记》卷四《腊第十三》:“汉以戌日为腊,魏以辰,晋以丑。”即腊祭汉在戌日,魏在辰日,晋在丑日。此“魏”为三国曹魏而非北魏。但北魏即以“魏”为国名,其“腊”祭亦应在“辰”日。《旧唐书·礼仪四》:“季冬(十二月)……辰日腊享于太庙。”唐朝于“辰”日腊祭,沿用的亦是曹魏制度。

(三) 北魏太平真君历日的历法依据

《魏书·律历志》载:“太祖天兴初(398)命太史令晁崇修浑仪以观星象,仍用《景初历》。岁年积久,颇以为疏。世祖平凉土(440),得赵默所修《玄始历》,后谓为密,以代《景初》。”“高宗践祚(452),乃用敦煌赵默《甲寅》之历。”《魏书》这段记载可能有误。实际上,直到太平真君十二年,北魏仍在《景初历》。现据张培瑜先生据《景初历》术推算此北魏历日的月朔、节气、中气结果如下表:

纪年	月大小	朔日	节气	中气
太平真君十一年	正月大	壬戌	立春庚午	雨水丙戌
	二月小	壬辰	惊蛰辛丑	春分丙辰
	三月大	辛酉	清明辛未	谷雨丙戌
	四月小	辛卯	立夏壬寅	小满丁巳

(续表)

纪年	月大小	朔日	节气	中气
太平真君十一年	五月大	庚申	芒种壬申	夏至丁亥
	六月小	庚寅	小暑癸卯	大暑戊午
	七月大	己未	立秋癸酉	处暑戊子
	闰月小	己丑	白露癸卯	
	八月大	戊午	秋分己未	寒露甲戌
	九月小	戊子	霜降己丑	立冬甲辰
	十月大	丁巳	小雪庚申	大雪乙亥
	十一月小	丁亥	冬至庚寅	小寒乙巳
	十二月大	丙辰	大寒庚申	立春丙子
太平真君十二年	正月小	丙戌	雨水辛卯	惊蛰丙午
	二月大	乙卯	春分辛酉	清明丙子
	三月大	乙酉	谷雨壬辰	立夏丁丑
	四月小	乙卯	小满壬戌	芒种丁丑
	五月大	甲申	夏至癸巳	小暑戊申
	六月小	甲寅	大暑癸亥	立秋戊寅
	七月大	癸未	处暑癸巳	白露己酉
	八月小	癸丑	秋分甲子	寒露己卯
	九月大	壬午	霜降甲午	立冬庚戌
	十月小	壬子	小雪乙丑	大雪庚辰
	十一月大	辛巳	冬至乙未	小寒庚戌
	十二月小	辛亥	大寒丙寅	立春辛巳

① 此表中的节气、中气栏,因太平真君十一年闰七月,故自该年八月以下,“节气”栏为“中气”,“中气”栏为“节气”。

② 太平真君十二年十二月，辛亥朔，二十九日干支为己卯；“立春辛巳”实在次年正月二日。原历中仅有十二月中气大寒，无立春正月节。

以此表与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十二年历日对照，其月序、月大小、朔日干支、闰月位置、中节日序干支等历日事项无一不合^⑤。由此可以确定，此北魏太平真君历日的历法依据是《景初历》。

(四) 太平真君十二年历日中的两次月食预报

太平真君十二年历日共提到两次月食。一次在二月十六日庚午，即公元 451 年 4 月 2 日；另一次在八月十六日戊辰，即公元 451 年 9 月 27 日。当我初步认为这是两次月食后，为慎重起见，曾就该年的月食次数、见食范围等天文学问题，请教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张培瑜教授。张先生在 1993 年 3 月 10 日的回信中答复说：

这年月食简况如下：公元 451 年总共只有二次月食发生，并且的确都是历书上记载的这两天。(1)451 年 4 月 2 日，月偏食，发生在中午，北京时 12:45 望，食分 0.653，初亏 11:24，食甚 12:53，复圆 14:21。这次月偏食中国全境皆不得见。(2)451 年 9 月 27 日，月偏食，发生在凌晨。北京时 2:35 望，食分 0.814，初亏 1:10，食甚 2:41，复圆 4:13，中国全境皆可见。我认为此历书所注的应是月食预报，不是观测记录。原因有二：(1)4 月 2 日月食，中国绝不可见(因为月亮在地下)，故定非月食记录。(2)9 月 27 日月食，中国全境可见。但月食观测记录应记作“9 月 26 日晚四更、五更食”，或“八月十五日晚日加丑月加未食”，不会记作十六日(9 月 27 日)。但预报以历书计算为准，历书是以子夜(夜半)作为日的分界的。这确是一项重要的发现。即使月食预报，丝毫不比月食记录逊色。这反映了我国是时对日月食的认识以及推算的精确程

度。您的这一发现,值得庆贺。

张培瑜教授是我国著名历法专家和天文学史家,享誉国际天文学界,他的意见值得重视。上文所引两次月食数据也是他的计算结果。张先生认为这是两次月食预报而非月食记录也完全正确。经查对,我国历史文献中,公元451年只有一次月食记录,见于《宋书·律历下》:“[元嘉]二十八年(451)八月十五日丁夜月食。”^⑥这个“八月十五日丁夜”即公历9月26日夜间2时左右。由于记录时间是从天亮到天亮为一天,而预报则以夜半为日的分界,故比预报发生的月食早记一天。这正与前述张培瑜先生的解释相符合。此外,北魏历书上的“月食”若是月食记录,则该年4月2日的月食也不应在传世文献中无任何记载。现将这两次月食的有关资料绘表如下(望和月食有关数据均为北京时):

历史纪年	太平真君十二年二月十六日	太平真君十二年八月十六日
公元纪年	451年4月2日	451年9月27日
月食	月偏食	月偏食
望	12:45	2:35
初亏	11:24	1:10
食甚	12:53	2:41
复圆	14:21	4:13
食分	0.653	0.814
文献记载	无	《宋书·律历下》:“[元嘉]二十八年八月十五日丁夜月蚀。”

如前所述,此北魏太平真君历日的历法依据是《景初历》。同样,这两次月食预报的推算依据也是《景初历》的有关数据。

《景初历》是三国曹魏尚书郎杨伟在东汉末年刘洪《乾象历》基础上创造的,开始行用于曹魏景初元年(237年),故名。《景初历》改进了朔望月的数据,以 $365 \frac{455}{1843}$ 日为岁实,以 $29 \frac{2419}{4559}$ 日为朔策,仍用汉以来的19年7闰法。它的另一特点是,年月日数的分数,虽各以纪法、日法的不同数值,而其他法数,均以日法为分母。刘宋时何承天称《景初历》比《乾象历》优点更多,当是事实。因此,这部历法虽然在曹魏仅行用了28年,但西晋泰始元年(265)改用的《泰始历》,刘宋永初元年(420)改用的《永初历》,实际都是《景初历》术,北魏使用它直到太平真君十二年(451)。这部历法前后实际行用了215年之久^⑦。

《景初历》更主要的优点是对日月食的预推。推食分多少、日食亏起方位等是其特创^⑧。它以朔望位置在黄白道交点十五度(在赤道上计算)以内为发生交食的必要条件,这同现代日食内限值十分接近。清代阮元在《畴人传》中曾评论说:“至其推交会月食,以去交度十五为法,论亏之多少,以先会后交,先交后会,论亏起角之东西南北,皆密于前术,足以为后世法者也。”^⑨北魏太平真君十二年(451)是《景初历》行用的最后一年,对月食的预报仍然如此准确,确令今人叹服!

敦煌本北魏太平真君十二年历日上的两次月食预报,为迄今出土的汉简历谱和敦煌吐鲁番历日所仅见,也是现知中国最早的月食预报材料,且极为准确,应当引起足够重视。

(原载《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集》,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6年,第360—372页)

注释:

① 原载台湾《大陆杂志》一卷九期,后收入苏著《敦煌论集》,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第305—308页。

② 载《敦煌研究》1992年第1期,第43—44页。

- ③ 参见李正宇《土地庙遗书的发现、特点和入藏年代》，载《敦煌研究》1985 年第 3 期，第 92—97 页。
- ④ 参见陈久金、卢莲蓉《中国节庆及其起源》，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89 年，第 66 页。
- ⑤ 见张培瑜《试论新发现的四种古历残卷》，载《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第五集，科学出版社，1989 年，第 104—125 页。
- ⑥ 中华书局标点本《宋书》，第 310 页。
- ⑦ 参见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 3 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1444—1445 页。
- ⑧ 参见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编著《中国天文学史》，科学出版社，1981 年，第 79 页。
- ⑨ 《畴人传》卷五《杨伟传》，上海商务印书馆 1955 年 5 月重印本，第 1 册，第 61 页。

敦煌本北魏历日曾有准确月食预报

我国古代对日月食的发生曾有过多次准确记录。但对日月食的预报,此前出土的汉简历谱和敦煌吐鲁番历日上从未发现。最近,从敦煌本北魏太平真君十二年历书上发现了两次准确的月食预报。这是中国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员邓文宽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

《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十二年历日》抄本,1900年发现于敦煌莫高窟,原件下落至今不明。苏莹辉先生在1951年,刘操南先生在1992年各自公布过一个抄本,但都因文字识读有误,未能发现这两次月食预报。不久前,日本著名敦煌学家池田温教授将这份历日照片赠送给了邓文宽,邓文宽依据照片重新释文,悉心研究,终于将这两次月食预报揭示出来。

两次月食预报分别记录在《太平真君十二年历日》的二月和八月。原文是:“二月大 一日乙卯建 四日社 七日春分 十六日月食 廿二日清明三月节”;“八月小 一日水(癸)丑定 十二日秋分 十六日月食 廿七日寒露九月节”。记载月食的这两天分别是公元451年的4月2日和9月27日。根据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张培瑜研究员提供的数据,这一年只有两次月食发生,而且的确就是历书上记载的这两天。4月2日的月食情况是:望(北京时,下同)12点45分,初亏11点24分,食甚12点53分,复圆14点21分,食分0.653;9月27日的月食情况是:望2点35分,初亏1点10分,食甚2

点 41 分,复圆 4 点 13 分,食分 0.814。两次都是月偏食。

这两次月偏食中,4 月 2 日的一次因发生在北京时间的中午,中国境内无法看到,所以也无文献记载。9 月 27 日的一次,中国全境都可看到,文献也有著录,见于《宋书·律历下》:“[元嘉]二十八年八月十五日丁夜月蚀。”(中华书局标点本第 310 页)。这个“八月十五日”相当于公元 451 年的 9 月 26 日,由于月食记录是从天亮到天亮为一天,而月食预报以历法为依据,以“子夜”(夜半)作为日的分界,所以记录比预报早了一天,“丁夜”即夜间 2 点左右,与现代计算值完全一致。从文献著录情况可知,如果这只是两次月食记录,那么,4 月 2 日的一次不应没有文献记载;事实上,这次月食中国境内也见不到。因此,它们只能是月食预报,而不可能是月食记录。

太平真君十二年,北魏使用《景初历》。《景初历》是三国曹魏尚书郎杨伟依据东汉末年刘洪《乾象历》加以创造的,曹魏景初元年(237)开始行用。这部历法具有许多优点。它在曹魏虽仅行用了 28 年,但西晋泰始元年(265)改用的《泰始历》,刘宋永初元年(420)改用的《永初历》,实际都是《景初历》术。北魏使用《景初历》一直到太平真君十二年(451)。这部历法前后实际行用了 215 年之久。《景初历》更主要的优点是对日月食的预报。推食分多少、日月食亏起方位等计算是其特创。它以朔望月的位置在黄白道交点十五度(在赤道上计算)以内为发生交食的必要条件,这同现代日食内限值十分接近,清代阮元在《畴人传》中对此评论道:“至其推交会月食,以去交度十五为法,论亏之多少,以先会后交,先交后会,论亏起角之东西南北,皆密于前术,足以为后世法者也。”北魏太平真君十二年是《景初历》行用的最后一年,对月食的预报仍然如此准确,确令今人为之叹服!

张培瑜研究员在评价这项成果时说:“这确是一项重要的发

现。……反映了是时我国对日月食的认识以及推步的精确程度。您的这一发现,值得庆贺。”

(原载《光明日报》1993年7月18日第6版,署名“苏雅”)

敦煌文献 S. 2620 号《唐年神方位图》试释

敦煌文献 S. 2620 号,《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曾拟题为《大唐麟德历》;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藏此件放大照片、台湾出版黄永武博士主编的《敦煌宝藏》,拟题均同。英人翟林奈所编《英国博物馆所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7037 号,题为《大唐麟随历》,“随”系“德”之误释。众口铄金,确乎为历书无疑。笔者在整理敦煌历日时反复审览,无论如何它都不是历书,更不存在是所谓《大唐麟德历》的可能。然对其确切内涵,仍觉茫然。后求教于天文学史专家席泽宗教授,方知是一件年神方位图。由此出发,笔者对其性质、内容、作成年代进行探讨,披露管见于此,敬请海内外方家是正。

此件前缺,存残图二幅,整图六幅。在第三幅整图之外,倒写“大唐麟德历”五字,正是各家拟题所据。此外有尾题二行,内容如下:

右从下元天宝九载(至)庚寅,覆前勘算至乙未。天宝十五载改为至德,自后计算于今,却入/上元甲子旬中已来,一十八年至辛巳年。

由是可见,确定此件性质和年代时,除去应注意“大唐麟德历”五字,尾题和六图更为重要。先考释尾题如下。

由尾题得知,原件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从天宝九载庚寅(750)至

乙未即天宝十四载(755)共六年,为“覆前勘算”部分。“勘算”内容如何,因前缺而难详。第二部分自天宝十五载改元至德起,逐年计算,直至再入“上元甲子”。古代历家有上元、中元、下元亦即“三元”之说。所谓上元甲子,系由隋仁寿四年(604)甲子岁起算,此六十甲子为上元;至唐麟德元年(664)甲子岁转入中元,开元十二年(724)转入下元,至兴元元年(784)又回到上元甲子,如此往复不穷。显然,天宝九载正在下元年中,故尾题谓“下元天宝九载”云云。所谓“计算于今,却入上元甲子”,当即计算至此一下元之最后一年即唐建中四年癸亥岁(783),然后再转入兴元元年(784)之上元甲子。这与残存六幅整图的纪年干支颇为一致。

原件各图均注纪年干支,残存六幅整图顺次为戊午、己未、庚申、辛酉、壬戌、癸亥,纪年连续。癸亥为六十甲子之末,结合尾题,可知它是原件下元年之最后一年,即建中四年(783)。进而可知,残存的六幅整图是由大历十三年戊午岁(778)至建中四年癸亥岁(783)共六年,每年一图。尾题既云“计算于今”,此“今”就是这件文献的写成年代,即唐建中四年(783)。

原件从天宝十五载(756)计算,至建中四年(783)共二十八年,年各一图,当有图二十八幅。存留部分仅当原图的四分之一,而四分之三的图业已残失。

此外,尾题末云“却入上元甲子句中已来,一十八年至辛巳年”。兴元元年甲子岁后的十八年是贞元十七年辛巳岁(801)。原件尾题至此,语意欠明,颇疑尚未写完。

次考存图内容。为方便起见,我们以大历十三年图和建中二年图为例,分项考释如下:

(一)方位。每图四周以十二地支和乾、艮、巽、坤表示方位,各图全同,无一例外。其所示方位是,子居下为北,午居上为南,卯居左为

东,西居右为西,其余各地支分别表示一定方位。用八卦表示的方位,乾为西北,艮为东北,巽为东南,坤为西南。古代这类图形完整的方位共有二十四个。除十二地支和八卦中的乾、艮、巽、坤,还有十干中的八个,即甲、乙、丙、丁、庚、辛、壬、癸。因此,本件图中的方位是不完整的。但就其所要表现的年神方位来讲也已够用。

(二) 年神。方位之外的害气、岁破、岁煞、黄幡、太阴、豹尾等均是本年神将,与一定的方位相对应。依堪舆家和阴阳家说,凡年神所在地,均应避忌。这在敦煌具注历日中颇为习见。如 P. 3403《宋雍熙三年丙戌岁具注历日一卷并序》序言云:“凡人年内造作,举动百事,先须看太岁及已下诸神将并魁、罡,犯之凶,避之吉。”接着详列雍熙三年各神将所在方位。这部分内容本采自阴阳家和堪舆家的陋说,俗不可耐,但每年年神所在方位同该年地支却有固定对应关系,从而可以利用年神方位准确地找出对应的年地支,成为敦煌残历定年的方法之一。其对应关系如附表^①。

方 位 年 神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岁 德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太 岁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岁 破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大将军	酉	酉	子	子	子	卯	卯	卯	午	午	午	酉
奏 书	乾	乾	艮	艮	艮	巽	巽	巽	坤	坤	坤	乾
博 士	巽	巽	坤	坤	坤	乾	乾	乾	艮	艮	艮	巽
力 士	艮	艮	巽	巽	巽	坤	坤	坤	乾	乾	乾	艮
害 气	巳	寅	亥	申	巳	寅	亥	申	巳	寅	亥	申
蚕 室	坤	坤	乾	乾	乾	艮	艮	艮	巽	巽	巽	坤

(续表)

方 位 年 神	年 地 支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蚕 官		未	未	戌	戌	戌	丑	丑	丑	辰	辰	辰	未
蚕 命		申	申	亥	亥	亥	寅	寅	寅	巳	巳	巳	申
丧 门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太 阴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官 符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白 虎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黄 幡		辰	丑	戌	未	辰	丑	戌	未	辰	丑	戌	未
豹 尾		戌	未	辰	丑	戌	未	辰	丑	戌	未	辰	丑
病 符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死 符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劫 煞		巳	寅	亥	申	巳	寅	亥	申	巳	寅	亥	申
灾 煞		午	卯	子	酉	午	卯	子	酉	午	卯	子	酉
岁 煞		未	辰	丑	戌	未	辰	丑	戌	未	辰	丑	戌
伏 兵		丙	甲	壬	庚	丙	甲	壬	庚	丙	甲	壬	庚
岁 刑		卯	戌	巳	子	辰	申	午	丑	寅	酉	未	亥
大 煞		子	酉	午	卯	子	酉	午	卯	子	酉	午	卯
飞 鹿		申	酉	戌	巳	午	未	寅	卯	辰	亥	子	丑

以此表检查大历十三年图,岁破在子,岁煞在丑,[大]将军在卯,太阴、豹尾在辰,太岁、岁刑在午,黄幡在戌,其对应年地支均是“午”。图中框内第一行所示“戌午”即大历十三年纪年干支,完全对应。依照此表检查其它五幅整图,也无不相合。

(三) 纪年干支。各图框内第一行第一项即本年干支,如大历十三年图“戌午”,建中二年图“辛酉”,意义明确,兹不赘。

(四) 年九宫,即九星术或称九宫飞位。大历十三年图“戊午七”之“七”,即该年七宫居中;建中二年图“辛酉四”之“四”,即该年四宫居中。九宫飞位亦是星命家的说教,以隋仁寿四年上元甲子(604)为一宫,此后以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配入各年,依次倒转。星命家又以七种颜色配入各宫成为:一白,二黑,三碧,四绿,五黄,六白,七赤,八白,九紫。故时而以数字表示九宫,时而又标以颜色。大历十三年图框内前为“戊午七”,三、四行间有一“赤”字,“七”与“赤”对应。建中二年图框内前为“辛酉四”,与四宫对应的颜色应为“绿”,可是二、三行之间先注一“紫”字,圈掉后改为“碧”。原作者发现“碧”仍不对,故在框外乾、亥之下注明“碧错黄是”。然而这仍是错误。此年既是四宫居中,其对应颜色作“绿”方是。同样,我们发现建中元年图作“庚申五”,对应颜色应为“黄”,可是却错注为“白”;建中三年图作“壬戌三”,对应颜色应为“碧”,却错注为“绿”。残存六幅整图中有三幅中宫颜色注错,足见原作者对九方色是何等生疏!可以相信,如果全部二十八幅图都保留下来,那么九宫颜色注错的则更多。

黑	赤	紫
白	碧	黄
白	白	绿

(建中三年)

绿	紫	黑
碧	黄	赤
白	白	白

(建中元年)

白	黑	绿
黄	赤	紫
白	碧	白

(大历十三年)

白	白	白
紫	黑	绿
黄	赤	碧

(建中四年)

碧	白	白
黑	绿	白
赤	紫	黄

(建中二年)

黄	白	碧
绿	白	白
紫	黑	赤

(大历十四年)

九宫颜色图复原

这件文献中同年九宫相关的还有两项内容。一是夹杂在方位之间表示颜色的字,如大历十三年图子、丑间的“碧”字,未、坤间的“绿”字;

大历十四年图丑、艮间的“紫”字，寅、卯间的“碧”字等。这些字是表示该年中宫以外其它有关各宫颜色的。为便于比较，我们将这六幅图正确的九宫颜色图复原如上页图（依原图次序，由右至左，先上后下）。很清楚，大历十三年图子、丑间的“碧”字，正当该年九宫图下行正中“碧”字，“绿”字在右上角，处于未、坤之间，完全对应。同样，其它五图各方位之间表示颜色的字也是表示中宫以外有关各宫颜色的。但由于原作者对九宫颜色不熟悉，注错的也不在少数。如大历十四年图寅、卯间当作“绿”，却错注为“碧”。其它只要认真核查即可自明，恕不一一指出。

另一项内容即各图的方框。原件每图方框有两个特点，一是不闭合，各图不闭合部位各异；二是方框中的一些小段颜色很浅，如建中二年图的左下角。起初我感到十分费解，但当我把它同九宫图联系起来分析时，问题便迎刃而解。

用前面复原的各年九宫图与原图对照，凡是方框不闭合的部位均是白色的位置。如大历十三年图右下、左下、左上全是白色，这正是原图不闭合的三个部位。建中二年九宫图上行中间，右上角、右行中间全是白色，原图相应的部位均不闭合。诚然，由于原作者对九方色生疏，也有涂错的，如建中元年图的下行。

原图方框中的浅色部分也同九宫颜色有关。大历十四年图右下角、建中二年图左下角颜色都很浅，而对应部位九宫颜色是“赤”。由此明确，在黑白照片上反映出的浅色部位，原件都是红色。尽管限于条件，我们无法看到藏在英国图书馆的原件，也未得到原件的彩照，只能使用黑白照片，且是黑底白字的正片，仍然可以确信这个推断正确无误。只是由于原作者对九宫颜色的生疏，也将一些部位的颜色涂错，如建中四年图“赤”在下行正中，原图却在右上角“白”的部位涂上红色，这是很有趣的。

由以上分析可得如下结论，原图方框不闭合的部位是白色，闭合部

位是其它各色。由于年代遥远,这些用不同颜色涂成的方框,在黑白照片上似乎都成了黑色(亦即正片上的白色)。可以确认,原图方框部分是彩绘而成的。它们同前述方位之间表示颜色的字,以及图中中宫颜色字,共同组成该年的年九宫图。类似的组图方法,亦见于斯坦因编号P. 6《唐乾符四年丁酉岁印本历日》之各月九宫图^②。

九宫颜色也用于表现吉凶。P. 3403《宋雍熙三年丙戌岁具注历日一卷并序》序言有一首《三白诗》云:“上利兴功紫白方,碧绿之地患痼疮。黄赤之方遭疾病,黑方动土主凶丧。五姓但能依此用,一年之内乐堂堂。”足见紫、白二色主吉,其余五色主凶。这些无疑都是迷信、无稽之谈。

(五) 建除十二客,又称建除十二直。大历十三年图“戊午七危”之“危”,建中二年图“辛酉四开”之“开”均属此。《史记·日者列传》褚先生曰:“臣为侍郎,与太卜待诏为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时,聚会占家问之,某日可娶妇乎?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丛辰家曰大凶,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可知远在西汉,建除即为一家,与其它各方术之家并称。建除十二客是以建、除、满、平、定、执、破、危、成、收、开、闭十二个字各主一定吉凶。此件残存六图的建除十二客顺次为危、成、收、开、闭、建,次第相连,估计是与本年相配的。我们在敦煌石室和吐鲁番出土的北魏、初唐、晚唐至宋初的历日中看到,每日之下都配有建除十二客,而未见到同年相配,此件是一个特例。但无论如何都是表示吉凶的。至于它同年份的配置关系及配年规律,仍有待深究。

(六) 六壬十二神。大历十三年图“玄武中宫”之“玄武”,建中二年图“功曹中宫”之“功曹”,以及其它四图中的天后、贵人、六合和勾陈均属此。清儒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七《六壬十二神》条云:“六壬家又有贵人、腾蛇、朱雀、六合、勾陈、青龙、天空、白虎、太常、元(玄)武、太

阴、天后十二神，分布十二方位。”所谓“玄武中宫”于此件当指玄武居九宫之中宫，而非分布于十二方位，其余依此。这些六壬神将配入九宫之中宫后，所主吉凶如何？通观六图，仅大历十四年图为“天后中宫，宜修，吉”。清《协纪辨方书》卷六义例四引《总要历》曰：“天后者，月中福神也。其日宜求医、疗病、祈福、礼神。”故将二者配在一起。其它五图，仅建中元年图云“贵人中宫，不宜修”，另四图全注明“不宜修，大凶”。所以如此，除了这四年的中宫颜色主凶外，配入的神将也是主凶的。如大历十三年图中宫七赤所配之“玄武”，建中四年中宫二黑所配之勾陈，《协纪辨方书》引《神枢经》云：“玄武、勾陈者，月中黑道也。所理之方，所值之日，皆不可兴土功、营屋舍、移徙、远行、嫁娶、出军。”黄道主吉，黑道主凶，无怪乎它们所配入的年九宫均是“不宜修，大凶”了！

（七）魁月、罡月。大历十三年图“年中又忌二月、八月，修之凶”；建中二年图“又忌五月、十一月，修者凶”，这里的月份全是魁、罡之月。魁月、罡月之间相距六个月，以正、七、二、八、三、九、四、十、五、十一、六、十二月分成六组，依次配入各年，是年中的忌月。P. 3403《宋雍熙三年丙戌岁具注历日一卷并序》序言又云：“今年六月天罡，十二月河魁。魁、罡之月，切不得修造动土，大凶。”恰可作为此件各年应避忌月份的注脚。

以上就笔者学识所及，对 S. 2620 号的性质、内容和作成年代作了考释。从以上考释可知，这件文献的性质是年神方位图，作成于唐建中四年（783）；残存六图包括了大历十三年至建中四年的内容，因此应题名为《唐年神方位图》。同类图形不仅见于一些较为完整的敦煌具注历日，如 P. 3403，而且一直沿用到清代。清乾隆六十年《时宪书》第 2 页的《年神方位之图》^③，与此件各图大致相同，可作为此件定性、定名的参考。

那么，为什么前贤均拟题为《大唐麟德历》呢？如前所述，这是源自第三幅图上部的倒写“大唐麟德历”五字。然而细审原件胶卷，此五字同这件文献的关系却十分暧昧。原件各图和尾题在同一张纸上，纸的

上部边沿到图为止，磨破的纸沿尚十分清晰；而“大唐麟德历”五字却在纸沿之外，显然是写在另一张纸上的。写此五字的那张纸是否用来裱托这件《年神方位图》的呢？因未睹原件而难下断语。但可以确定的是，“大唐麟德历”五字同此件《年神方位图》无关，故不能以它作为定名、定性的依据。

年神方位图纯属迷信，无科学意义可言，属于古代文化中的糟粕部分。但它们又多包含在古代历书中，成为研究敦煌历日不可回避的问题。从文化史角度看，研究它不仅必要，而且也有一定意义。

（原载《文物》1988年第2期，第63—68页）

注释：

- ① 此表采自陈遵妣《中国天文学史》第3册，第1644—164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并作了少许补充、修正。
- ② 图版见《中国古代天文文物图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66—67页。
- ③ 参见前揭陈著，第1618—1619页。

比《步天歌》更古老的通俗 识星作品——《玄象诗》

我国传世文献所收的古代通俗识星作品，素以唐开元年间王希明作的《步天歌》（见郑樵《通志·天文略》）为最古^①，并为人称道。此前的同类作品，如北魏张渊的《观象赋》、隋朝李播的《周天大象赋》，都属于文人骚客的赋兴之作，严格说来还算不上识星作品。令人欣慰的是，敦煌文献中保存下两份比《步天歌》更古老的通俗识星作品——《玄象诗》，编号为 P. 2512 和 P. 3589。其中 P. 2512 一件，罗振玉曾录文刊布于《鸣沙石室佚书》。但罗氏只对原卷文字照描，识错的文字不在少数，不便使用。笔者试对这两篇识星诗作进行释文、断句，互为校勘，并略述个人的认识。校勘时，以 P. 2512 为底本，称甲卷，以 P. 3589 与甲卷互校，称乙卷，择善而从。原卷中的俗体字，直接录为现行文字；别字和形近而误的错字，在字后圆括弧内写出正字、互通字；脱漏文字用方框表示；增补文字放入方括号内；尚未确释的字，其后标出(?)；原卷的错误径录不改，在校记中作说明；为便于排版，一律用简体字。校释错误不当之处在所难免，仍盼行家示正。

《玄 象 诗》

角、亢、氐三宿，行位东西直。库娄(楼)在角南，平星库娄(楼)北。

南门娄(楼)下安,骑官氏南植。摄、角、梗、招摇,以次当杓直。两咸俱近房,积卒在心旁。龟、鱼、傅尾侧,天江尾上张。箕安尾北畔,鳖在斗南厢。建星与天弁,南北正相当。建星在斗背(北),天弁河中央。市垣虽两扇,二十二星光。其中有帝坐,候、官(宦)东、西厢。前者宗正立,官(宦)侧斗平量。宗人宗在^[1]左,宗在候东厢。七公与天纪,市北东西行。公南贯[索]^[2]位,纪女北正林^[3]。房^[4]。唯余有天棓,独在紫墙[东]^[5]。九坎至牵牛,织女、旗、河鼓。牛东须女位,女位^[6]。女上离珠府。败白天南际,瓠[瓜]^[7]河畔错(?)。瓜左有天津,津下虚、危所。室、壁两星间,上有腾蛇舞。王良虽五星,并在河心许。臼东北落门,门东羽林府。土空、仓、困、苑,例(列)位俱辽远。奎、娄、胃、昂、毕,並在中天出。阁道河中央,傅路在其旁。将军在娄北,阁道几相当。

天船河北岸,大陵河南畔。卷舌在^[8]其东,虽繁有条贯。天仓天囷北^[9],头东向昂侧。天关东(车)、柱南,正是参西北。参孤^[10]有十星,头上戴一觜。右脚玉井中,左角^[11]参旗[意]^[12]。厕当左足下,厕南有天矢(屎)。矢(屎)^[13]南有屏星,厕东有军市。市中有野鸡,东有狼、狐(弧)矢。老人以渐^[14]远,出见称祥美。东井与五车,俱在^[15]河心里。水位南北列,五侯东西齿。北河五侯北,南河河东溪。东南有积薪,西北有积水。欲知二星处,并在三台始。轩出柳星[东]^[16],轮困垂^[17]鬼北。柳左号为星,河末^[18]称为稷。三台自文昌,斜连太微侧。下台下有星,少微与张、翼。轸在翼[星]^[19]东,太微当^[20]轸北。太微垣十星,二曲八星直。其中五帝坐,各各依本色。屏在帝前安,常阵(陈)坐后植。郎位常阵(陈)东,星繁遥似织女^[21]。郎将独易分,不与诸星逼。天门在角南,天田在角北。平道有二星,角半东西直。进贤平道西,乳星居氏北。车骑骑南隐,将军骑东匿。阵骑车北安^[22],折威东西直。亢池摄提近,帝座^[23]梗河侧。周鼎东垣端,依行^[24]在垣北。日落房、心分,气廩^[25]飘箕舌。□前库娄(楼)居,市内^[26]。农、苟(狗)鳖旁边。天鸡

[与]^[27]苟(狗)国,南北正相当。天鸡近北畔,苟(狗)国在南方。罗堰牛东列,天田坎北张。败在瓠瓜侧,旗居河鼓旁。渐台将辇道,俱邻织女房。津东有造父,津北有扶匡(筐)。策在王良侧,车父(府)腾蛇旁。人在危星上,杵、臼人东厢。命、禄、危、非卦(?),重重虚上行。盖屋危星下,哭、泣在南方。八魁在壁外^[28],土吏危星背(北)。土公东壁藏,雷星营[室盖]^[29]。壁西霹雳惊,羽林云雨霈。屏、涿居奎下,钺、库^[30]在仓前。园、乌天苑接^[31],天节、九州连。二更夹娄侧,军门当奎北。天谗与尸、水^[32],处置依常式。咸池及五潢^[33],并在车中匿。厉石在河内,船、车两边逼。天高毕御(?)^[34]东,诸王天高北。河月及天街,咸依毕、昴侧。军井屏星南^[35],九游玉井侧。司怪与坐旗,车东正南直。司怪井、钺近,坐旗车、柱逼。井北天樽位,井南水府域。市(屎)南丈、子、孙,井东^[36]疏四渎。杜出老人东,丘在狼、弧^[37]北。外厨居柳下,天苟(狗)在厨边。内平列轩侧^[38],耀星鬼上悬。酒旗轩足^[39]置,天纪在厨前。天庙东瓠接,青丘、器府连。明堂列宫外,灵台两相对。门东谒者旁,公、卿、五侯辈。太子当阵(陈)^[40]前,从、幸西、东边。阳门库娄(楼)左,顿顽骑官侧。房下有从官,房西有天福。罚在东咸西,键闭钩钤北。屠肆与白(帛)度,次次宗旁息。列肆斗西维,车肆东南得。[天]^[41]鹵杓前置,天关次居北。奚仲天津北,钩星奚仲旁。天桴牛北累^[42],诸国次^[43]东行。璃(离)瑜白西隐,天苟^[44]白中藏。天钱北落北,天厖王良侧。铁钺^[45]羽林藏,天纲羽门塞。虚梁危下安^[46],天阴毕头息。

长垣少微下,赉位在魁前^[47]。天(太)尊中台北^[48],天相七星边。司空器府北,军门轸下悬。紫微垣十五,南北两门通。七在宫门右,八在宫门东。钩陈与北极,俱在紫微宫。辰居四辅内,帝坐钩陈中。斗杓^[49]将帝极,向背悉皆同。华盖宫门北,传舍东西直。五帝、六甲坐^[50],相^[51]旁近门闕。天厨及内皆(阶),宫外东西域。天柱、女御宫^[52],并在钩陈侧。柱史及女史^[53],尚书位攢逼。门内近极旁,大理

与阴德。门外斗杓横，门近天床塞^[54]。欲知门大小，衡端例同则。天一、太一神，衡北门西息。内厨以次设，后与夫人食。臣、相^[55]及枪、戈，攒聚杓旁得^[56]。执^[57]、守衡南隐，天理魁中匿。三公魁上安，天牢魁下植。以次至文昌，昌则^[58]开八谷。北斗不^[入咏]^[59]，为是人皆识。正背^[60]有^[61]奎、娄，正南当轸、翼。以此^[62]记推步^[63]，众^[64]星安可匿？

校记：

[1] 宗在：误。当作“宗正”。

[2] 索：原脱，径补。贯索一座在七公座南。

[3] 纪女北正林：全句误。当作“纪北正女床”。女床一座在天纪座北。

[4] 房：上下不相属，疑衍。

[5] 东：原脱，径补。天棓一座在紫微垣墙之东。

[6] 女位：承上文衍。

[7] 瓜：原脱，径补。

[8] 在：乙卷作“附”。

[9] 天仓天囷北：乙卷作“天廩囷东北”，是，甲卷误。

[10] 参孤：乙卷作“参体”。

[11] 左角：乙卷作“右角”，是，甲卷误。

[12] 意：原脱，据乙卷补。

[13] 矢：乙卷作“井”，是，甲卷误。

[14] 以渐：乙卷作“已次”。

[15] 在：原脱，据乙卷补。

[16] 东：原脱，据乙卷补。

[17] 垂：乙卷作“临”。

[18] 河末：意义未详；乙卷作“星下”，意义明了。

[19] 星：原脱，据乙卷补。

[20] 当：乙卷作“居”。

[21] 女：乙卷无，合本诗五言句式，但意义不及甲卷明了。

[22] 阵骑车北安：当作“阵车骑北安”。阵车一座在骑官北。

[23] 帝座：误。当作“帝席”。帝席一座在梗河西侧。

- [24] 依行：意义俟详。
- [25] 气廩：意义俟详。
- [26] 市内：上下有脱文。
- [27] 与：原脱，依上下文义径补。
- [28] 八魁在壁外：乙卷作“八魁壁全外”。
- [29] 室盖：原脱，据乙卷补。
- [30] 库：乙卷作“庾”，是，甲卷误。
- [31] 园、乌天苑接：乙卷作“乌蒿(藁)天苑侧”。
- [32] 天谗与尸、水：乙卷作“尸、水与天谗”。
- [33] 五潢：乙卷作“天潢”，是，甲卷误。
- [34] 毕御(?)：乙卷作“毕口”，是，疑甲卷误。
- [35] 南：乙卷同，疑当作“北”。
- [36] 东：乙卷作“南”，是，甲卷误。
- [37] 狼、弧：乙卷作“狐(弧)、狼”。
- [38] 侧：乙卷作“腹”，胜甲卷。
- [39] 轩足：乙卷作“星上”。
- [40] 当阵(陈)：乙卷作“常阵(陈)”，是，甲卷误。
- [41] 天：原脱，径补。
- [42] 累：乙卷作“置”，胜甲卷。
- [43] 次：乙卷作“坎”，是，甲卷误。
- [44] 天苟：乙卷作“[天]垒”，是，甲卷误。
- [45] 铁钺：乙卷同，若作“铁钺”更确切。
- [46] 安：乙卷作“置”。
- [47] 贡位在魁前：乙卷作“贡位下台前”，胜甲卷。
- [48] 北：乙卷作“侧”。
- [49] 斗杓：乙卷作“斗衡”。
- [50] 五帝、六甲坐：乙卷作“六甲、五帝坐”。
- [51] 相：乙卷作“杠”，是，甲卷误。
- [52] 女御宫：乙卷作“御女宫”。
- [53] 柱史及女史：乙卷作“女史及柱史”。
- [54] 门外斗杓衡，门近天床塞：乙卷作“衡北至门南，中有天床塞”。
- [55] 臣、相：乙卷作“公、相”，是，甲卷误。
- [56] 攒聚杓旁得：乙卷作“以聚杓头息”。
- [57] 执：乙卷作“势”，是，甲卷误。

[58] 则:乙卷作“前”,是,甲卷误。

[59] 入咏:胶卷上今为空洞,据乙卷补。罗振玉《鸣沙石室佚书》作“是气”二字,意义费解,亦不知其所据。

[60] 背:乙卷作“北”,是,甲卷误。

[61] 有:乙卷作“是”。

[62] 以此:乙卷作“以次”。

[63] 推步:乙卷作“推排”,文义不及甲卷。

[64] 众:乙卷作“诸”。

跋

《玄象诗》是一篇完整的古代通俗识星诗作。除个别文句脱漏,整理后存完整的诗句 264 句,1300 余字。全诗五言为句,通俗易懂。古人凭借这样一篇诗歌,便可迅速认出全天常见的主要星座,在无限的苍穹遨游。从俗文学史角度看,它也不失为一篇琅琅上口的好作品。敦煌文献问世后,文学史家对其中的诗赋作品已做了大量的整理研究工作。但因多数从事敦煌文学研究的学者对古天文知识不太熟悉,以致此诗少有问津。笔者认为,《玄象诗》在敦煌文学史乃至中国俗文学史上也应该占据一席之地。

现存两份《玄象诗》,甲卷(P. 2512)属于某种天文星占书的一部分。此卷共存四项内容:(1)星占的残余部分;(2)《廿八宿次位经》和《石氏、甘氏、巫咸氏三家星经》;(3)《玄象诗》;(4)日月旁气占。《玄象诗》是配合它前面的《廿八宿次位经》和《三家星经》作的,因此,它是按照二十八宿和《三家星经》体系排列的:先从角宿起,叙石氏星经;再从角宿起,叙甘氏星经;再从角宿起,叙巫咸氏星经;最后将三家合在一起总叙紫微垣。因此,要凭借此一诗作识星,便需在周天转三圈,不甚方便,这是其主要缺陷。

乙卷(P. 3589)正、背两面均有文字。正面起于《玄象诗》残文,之后有《许七曜利害吉凶征应瞻》、太史令陈卓的《日月五星经纬出入瞻吉凶要决(诀)》;背面为《相书一卷》。因此,乙卷也属于某种天文星占书的一部分。其排列则与甲卷不同。它是将完整的《玄象诗》分段拆开,按照在周天转一圈、一次达到识星目的的要求排列的。同时为区别《三家星经》和紫微垣,在各段诗句上面注明“赤”、“黑”、“黄”、“紫”,分别代表石氏、甘氏、巫咸氏和紫微垣。换言之,它已能达到在周天转一圈就可识星的目的,克服了甲卷的主要缺陷,这是乙卷的方便之处,也是它比甲卷进步之所在。但它仍未完全摆脱《三家星经》的羁绊。整理后,乙卷残存 161 句,其中石氏(赤星)52 句,甘氏(黑星)51 句,巫咸氏(黄星)16 句,紫微垣(紫星)42 句,约占《玄象诗》全文的五分之三。

尽管乙卷的排列方法比甲卷进步,但甲、乙二卷有共同的缺陷,那就是不能摆脱《三家星经》的束缚;再者,大多未能表明各星座的具体星数,而只停留于对星座相对位置和形状的描述。于是,到唐开元时^①,有《步天歌》出。《步天歌》置《三家星经》于不顾,完全按照三垣二十八宿的次序叙述;不仅有各星官的相对位置,而且兼及星数,且有星图配合,文字也优于《玄象诗》,最终形成了更为成熟的通俗识星作品。因此,《步天歌》得以长久流传,而《玄象诗》却湮没不闻了^②。然而,《玄象诗》比《步天歌》早得多,它秘藏千年之久,使我们今天得以了解古代这类作品的演变发展过程,其珍贵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前已指出,甲卷《玄象诗》是配合它前面的《廿八宿次位经》和《三家星经》作的。就在同卷《廿八宿次位经》之后,注明了“自天皇已来至武德四年(621)二百七十六万一千一百八岁”,表明这一天文星占书是唐初的著作,《玄象诗》自应与之相当,因此它至少比开元时形成的《步天歌》早了二百年。至于乙卷,因为它是将完整的《玄象诗》拆开重排的,

形成时间当在完整的《玄象诗》作成之后。现存甲、乙二卷抄于何时,则有待进一步考察。

(原载《文物》1990年第3期,第61—65页)

注释:

- ① 关于《步天歌》的作成年代,学术界尚有争议。本文采用的是夏鼐先生的意见。见夏鼐《另一件敦煌星图写本——〈敦煌星图乙本〉》,载《中国科技史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 ② 参阅席泽宗《敦煌卷子中的星经和玄象诗》,载薄树人主编《中国传统科技文化探胜》,第45—66页,科学出版社,1992年。

隋唐历史典籍校正三则

——兼论 S. 3326 号星图的定名问题

我在这里提出需要校正的隋唐历史典籍，除一则出自敦煌文献外，其余二则均出自我们经常使用的《隋书·经籍志》和《大唐六典》，内容均属于天文学方面。研读隋唐历史者或较为陌生，或措意不够，极易造成熟视无睹。故而不惮琐屑之讥，将读书中的愚者一得披露如后，以与诸大雅切磋云尔。

—

1973年中华书局标点本《隋书·经籍三》“天文类”著录有“《石氏星簿经赞》一卷”^①，郑樵《通志》卷68“艺文六”之“天文略”有完全相同的著录。但《新唐书·艺文志》则著录为“《石氏星经簿赞》一卷，石申”^②；《旧唐书·经籍志》亦为“《石氏星经簿赞》一卷，石申甫撰”^③。“星簿”和“星经”何者为是？我颇疑当时校勘《隋书》和两《唐书》时，校者并非没有发现它们之间的差别，只是对古天文知识过于生疏，以致于使之成为漏网之鱼。

我们知道，这几种书名中的“石氏”即石申或石申甫，是战国时代魏国人。据南朝·梁·阮孝绪《七录》记载，他曾著有《天文》8卷。这可能是其著作的本名，约在西汉后此书被尊称为《石氏星经》^④。《石氏星经》的内容今散见于《史记·天官书》、《汉书·天文志》和《唐开元占

经》，三国·吴·陈卓整理后的完本则见于敦煌文献 P. 2515 号之《石氏、甘氏、巫咸氏三家星经》^⑤。因此，单从石申此一著作的原名来看，两《唐书》经籍（艺文）志的“《石氏星经簿赞》一卷”是顺理成章的，而《隋书·经籍三》的“《石氏星簿经赞》一卷”则扞格难通。

所可注意者，这部书虽在中国早已遗失，但在日本却留下了相应的记录和近似于原本的传本。日本藤原佐世所撰《日本国见在书目》（约成于公元890年）著录：“簿赞三卷，石氏星经簿赞二卷。”卷数虽与两《唐书》有别，但书名却很一致。又据记载，日本天平二十年（唐天宝七载，748年），奈良正仓院文书的《写章疏目录》中有如下记载：“石氏星经簿赞一卷石申造；簿赞一卷陈卓撰；传赞星经一卷”^⑥。除了上述两种日籍著录之外，1984年，日本东京市若杉家将家藏阴阳书2235种赠给了“京都府立综合资料馆”。若杉家原为江户时代阴阳道士御门家的家司，而土御门家也就是平安时代世袭职司阴阳寮天文历算阴阳五行之学的安倍氏（安倍晴明）的后代。所赠第82号文书由“石氏簿赞”和“杂卦法”两部分相续而成。前者外题“石氏簿赞”，内题则作“石氏星官簿赞”，同时包含有“甘氏星官簿赞”和“巫咸星官簿赞”^⑦。“星官”与“星经”用字不同，但意义无别。

以上从日本旧籍著录和重新浮出水面的日藏中国古籍名称可以看出，《隋书·经籍三》之“《石氏星簿经赞》一卷”中的“簿”、“经”二字，属于误倒，应予乙正，当以两《唐书》著录为确。

附带指出，我国研究数学、天文学史的前辈学者钱宝琮先生也早就觉察到了《隋书·经籍志》的这一错误。1937年，钱先生曾撰有《甘石星经源流考》，内云：“汉魏以来星占家数多至二十余，可谓盛矣。《隋书·经籍志》所载星占书标甘氏、石氏之名者有下列诸种：《石氏浑天图》一卷、《石氏星经簿赞》一卷……”^⑧钱氏所引，显然是经他校正过的，因为这已非《隋书·经籍志》的原文了，只可惜后来校勘《隋书》者未能读到钱先生的高论。校书之难，于此可见一斑。

二

现今治隋唐史者，谁也离不开唐代行政法典《大唐六典》一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此书在中国没有太理想的本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共有两种版本正在流行：一种是199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北京大学历史系已故陈仲夫先生的点校本；一种便是日本广池千九郎训点、内田智雄补订，于昭和四十八年（1973）出版的校本。1981年，我在北大读研究生时，昔日同室好友、加拿大留学生保罗·白瑞南（Paul Brennan）来华访问，我托他从日本给我买了一本广池本《大唐六典》。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为应学术界急需，三秦出版社将此书加以翻印流布，所据便是我这本由朋友赠送的、被我视作珍宝的广池本《大唐六典》。当然，这些均是题外话。

我现在提出需要校正的正是广池本《大唐六典》中的一个错误。

此书卷十秘书省之太史局“灵台郎”条云：“掌观天文之变而占候之。凡二十八宿，分为十二次：寅为析木，燕之分（原小注：自尾十度至斗十一度）；……巳为鹑尾，楚之分（原小注：自张十五度至轸十一度）……”^⑨其余各“次”的次名，与十二支的对应关系，各“次”在二十八宿中的起讫度数，均见附表第一栏。

“十二次”是中国古代的一个天文学名词，它是由“岁星纪年”产生的。所谓“岁星”，就是五大行星中的木星，其绕太阳一周为11.86年，以整数计就是12年。岁星每年在周天走一“次”，十二年一周天，走完十二“次”。而要知道它每年所在天区的位置，则需以二十八宿为背景来观测。这样，二十八宿就被分配到十二次中去了。再者，中国人认为太阳每天在天区运行一度，一年 $365\frac{1}{4}$ 天，周天也就是 $365\frac{1}{4}$ 度。将

周天度数分为十二份,于是便有了每“次”在二十八宿各宿间的起讫度数。一般认为,十二次产生于战国中期;至于将二十八宿分配到十二次中,现知始于班固撰《汉书·律历志》^⑩。

附:八种文献所载十二次起讫度数表

	《大唐六典》卷十	《晋书·天文上》 ^⑪	《乙巳占》卷三 ^⑫	《汉书·律历志下》 ^⑬	《唐开元占经》卷六十四 ^⑭	敦煌文献 S. 3326 星图 ^⑮	《旧唐书·天文志下》 ^⑯	《新唐书·天文志》 ^⑰
析木(寅)	自尾十度,至斗十一度。	同左	同左	初尾十度,终于十一度。	同左	自尾十度,至斗十二度。	起尾七度,终斗八度。	同左
大火(卯)	自氐五度,至尾九度。	同左	同左	初氐十二度,终于尾六度。	同左	同左	初氐二度,终尾六度。	同左
寿星(辰)	自轸十二度,至氐四度。	同左	同左	自轸十二度,终于氐四度。	同左	同左	起轸十度,终氐一度。	同左
鹑尾(巳)	自张十五度,至轸十一度。	自张十七度,至轸十一度。	自张十七度,至轸十一度。	初张十八度,至轸十一度。	同左	同左	自张十五度,终轸九度。	同左
鹑火(午)	自柳九度,至张十六度。	同左	同左	初柳九度,终于张十七度。	同左	同左	初柳七度,终张十四度。	同左
鹑首(未)	自井十六度,至柳八度。	同左	同左	初井十六度,终于柳八度。	同左	同左	起井十二度,终于张八度。	同左

(续表)

	《大唐六典》卷十	《晋书·天文上》 ^①	《乙巳占》卷三 ^②	《汉书·律历志下》 ^③	《唐开元占经》卷六十四 ^④	敦煌文献 S. 3326 星图 ^⑤	《旧唐书·天文志下》 ^⑥	《新唐书·天文志》 ^⑦
实沉(申)	自毕十二度,至井十五度。	同左	同左	初毕十二度,至井十五度。	同左	同左	起毕十度,终井十一度。	同左
大梁(酉)	自胃七度,至毕十一度。	同左	同左	初胃七度,至毕十一度。	同左	同左	起胃四度,终毕九度。	同左
降娄(戌)	自奎五度,至胃六度。	同左	同左	初奎五度,终于胃六度。	同左	同左	自奎二度,终胃三度。	同左
营(亥)	自危十六度,至奎四度。	同左	同左	初危十六度,终于奎四度。	同左	同左	起危十三度,终奎一度。	同左
玄枵(子)	自女八度,至危十五度。	同左	同左	初婺女八度,终于危十五度。	同左	同左	起女五度,终危十二度。	同左
星纪(丑)	自斗十二度,至女七度。	同左	同左	初斗十二度,终于女七度。	同左	同左	起斗九度,终于女四度。	同左

为了核对广池本《大唐六典》十二次起迄度数的准确与否,我将汉至唐代共八种记载十二次起迄度数的文献编为一表(见上表),以便省览与分析。

从上表可以看出,汉至唐代十二次的起讫度数共有三个系统:《大唐六典》、《晋书·天文志》和《乙巳占》是一个系统。它们中间仅“鹑尾”一次有差别,这正是我们将要校正的问题,容待后述。第二个系统是《汉书·律历志》和《唐开元占经》以及敦煌文献 S. 3326 星图,三者间仅有小讹。第三个系统便是两《唐书》“天文志”的材料。显然,《汉书·律历志》、《晋书·天文志》二系的材料是较早的,据说来自《三统历》^⑧。因此,现存这二系的材料差别很小,仅仅在“鹑尾”、“鹑火”两次的起讫度数上小有差别,其余全同。但两《唐书》一系与前二系差别就大了。原因是前二系所用是较古的材料,而两《唐书》所记是唐代的材料。《旧唐书·天文下》序云:“至开元初,沙门一行(按,即张遂)又增损其书,更为详密,既包今古,与旧有异同,颇裨后学,故录其文著于篇。”^⑨说明使用的是开元年间僧一行编制《大衍历》时所测的数据。至于今度与古度的差别,当由“岁差”所引起,这里不再赘述。

如前所述,十二次度数是将周天度数等分的结果。所以,仔细读一下附表,就会发现,表中下面一次的“至××度”与上面一次的“自××度”度数都是衔接的,如“大火”次的“至尾九度”与“析木”次的“自尾十度”度数是衔接的,而且上面一次的起算度数大于下面一次的截至度数。这样一看,发现广池本《大唐六典》“鹑尾”一次的“自张十五度”出了问题。因为其下面一次为“鹑火”,截至度数是“至张十六度”,其上面一次的起度则应为“起张十七度”才是。《晋书·天文志》和《乙巳占》这两种出自唐初天文星占学家李淳风之手的材料正作“自张十七度”,也是完全正确的。出问题的是广池本《大唐六典》。

我们再看一下陈仲夫先生的点校本。陈先生校点后的正文是:“已为鹑尾,楚之分(小字注:自张十七度至轸十一度)。”^⑩在这句之下,陈先生做了一条校勘记:“自张十七度至轸十一度:‘七’字原本讹作‘五’,正德以下诸本皆然,据《晋书·天文志》改。”^⑪与上文所论相较,可以看

出,陈先生的校改是完全正确的。《大唐六典》的这条错误存在了许久,广池本也未改正,而最终由陈仲夫先生纠正了过来,厥功难泯。顺便说一句,陈先生是邓之诚(文如)先生的学生,功底深厚。但一生坎坷,多历磨难。我在北大读书时,曾听过陈先生的古汉语课。他在黑板上写的大字极为漂亮,当年还是毛头小伙子的我十分惊叹和钦佩。30年过去了,依然记忆犹新。

按理说,这个问题到此已经清楚了。但我还有一个问题。众所周知,《大唐六典》成书于开元二十七年(739)。而此时,僧一行主持编撰的《大衍历》也已修成(729年始行用),是唐代当时行用的历法。《大唐六典》卷十亦云:“大衍历: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嵩山僧一行承制旨而考定,最为详密,今见行焉。”^②《大唐六典》的作者既认为《大衍历》“最为详密”,那么,为何在十二次的起讫度数上不用《大衍历》的数据,反而用西汉时代《三统历》的数据呢?岂非厚古而薄今?再者,由华化印度人瞿悉达编纂的《唐开元占经》成书于开元六年(718)至十六年(728)之间,与《大衍历》产生于同时,为何又取《汉书·律历志》一系的材料,也不肯用《大衍历》的数据呢?看来,《大衍历》最初的地位并非像后人看得那么高。这其中或许还有别的什么原因,也说不清。

三

第三则是关于敦煌文献 S. 3326 号星图的定名问题。

敦煌文献 S. 3326 号的内容由三部分构成:(1)气象占。内中有“臣淳风言”(43行),尾部有给皇帝所上短奏,说明是李淳风从古书中抄撮的48条气象占验材料,上呈皇帝(唐太宗或高宗)参考使用的;(2)星图,共由十三幅分图组成,前十二幅图依十二次划分,最后是紫微垣星图;(3)画一神像持弓射箭,其右书“电神”二字,左书“其解梦及电经一

卷”，似未抄完。显然，此卷现存内容是由几种天文气象占书籍汇抄而成的。

第二部分的星图十分或者说极端重要。它是现存中国乃至全世界时代最早的全天星图。其图用彩色绘成，用黑色代表三家星中的甘德星，以橙黄色、圆圈或外圆圈内橙黄点代表石申和巫咸星，石、巫二家区分不十分严格。其星数在 1300 几十颗，在三国陈卓“定纪”的 1464 颗星数内，故而是现存陈卓“定纪”后一份最古的星图。英人李约瑟在评价这件星图时说：“了解到世界其他地区绘制天图的情况，我们就会明白，决不可轻视中国星图从汉到元、明这一完整的传统。公元 940 年左右的中国星图手稿是所有现存实物中最古老的一种。蒂勒(Thiele)、布朗(B. Brown)和《科学史导论》的作者萨顿(Sarton)都认为，从中世纪直到十四世纪末，除中国的星图以外，再也举不出别的星图了。在这时期之前，只有粗糙的埃及示意图和主要具有美术性质的希腊天图，后者所表现的只是星座的形象示意图，而不是星辰本身。”^②李约瑟认为 S. 3326 星图成于“公元 940 年左右”是不确切的，我们后面将会谈到。但他对这份星图的价值所做的评估却毫不过分。

这份星图绘在“气象占”的后面，内容是完整的，但却未留下一个准确的名称。这样，我们在对其性质和功用进行判断时就会产生不少困难。中国学者最早研究这份星图的，是中科院院士、著名天文学史专家席泽宗教授。1966 年席先生发表《敦煌星图》^④一文，对这份星图的内容做了考释和解读。后来，马世长师兄又发表《“敦煌星图”的年代》^⑤一文，据卷中讳“民”不讳“旦”，卷末“电神”服饰特征等，认为此图当抄绘于公元 705—710 年间，而不同意李约瑟所说的公元 940 年左右。马先生用“敦煌星图”指代此图，且加了引号，说明他只是踵继席泽宗先生的说法，而对此图的准确名称有保留意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我在编著《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一书时，将此图称为“全天

星图”，并解释说：“此件旧题《敦煌星图》，仅是突出地体现了它发现于敦煌，实际上它包容了古代北半球肉眼所能看到的主要星官，虽与现今《全天星图》相比还不完整，但在古人的认识范围内，已是《全天星图》。因此，我们不再踵用《敦煌星图》的说法，而改称为《全天星图》。”^{②⑥}我将此图称为《全天星图》后，已有一些学者说到或改用这个名字了。如施萍婷先生在其主编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S. 3326 号下说：“按，中国学者席泽宗、马世长，英国学者李约瑟对此件均有研究专文，定名为‘敦煌星图’。邓文宽定名为‘全天星图’。”^{②⑦}黄正建先生则径称为“全天星图。”^{②⑧}现在的问题是，定名为“敦煌星图”固然不确，改称为“全天星图”就是正确的吗？当年在为此星图改定名称时，自己觉得是可行的，因为其内容确实是“全天星图”。但时间过去了十几年后，渐觉不安，自己对自己屡屡提问：这样定名妥当吗？因为“全天星图”是一个很现代的名称。那么，这份星图的原始名称是什么呢？这正是我想继续探索的问题。

如前所述，马世长先生已考定此图抄绘于唐前期的公元 705—710 年间。而且此件第一部分的编者是唐初著名天文星占家李淳风（602—670），那么，此图就极可能同李淳风有关。因此，我们应当从唐初那些与李氏有关的典籍中寻找此图的原始名称。

众所周知，唐初由官方主持编修的《晋书》和《隋书》二“天文志”，均出自李淳风之手，李氏自己又有《乙巳占》一书传世。此外，李淳风也参与了“《隋书》十志”的编写工作^{②⑨}。当然，唐代在李氏之后更著名的星占著作是《唐开元占经》。它们与 S. 3326 星图都是同时代存在或形成的，其间应有联系。我们即从上述这些文献入手寻找该星图的原名。

下面，我们举例将 S. 3326 星图的说明文字、《乙巳占》、《晋书·天文志》和《唐开元占经》的对应文句作一些比较：

关于“实沉”之次：

S. 3326 星图：“自毕十二度至井十五度，于辰在申，为实沉。言七月之时，万物雄盛，阴气沉重，降实万物，故曰实沉。魏之分也。”

《乙巳占》卷三：“毕、觜、参，晋魏之分野。自毕十二度至井十五度，于辰在申，为实沉。言七月之时，万物极盛，阴气沉重，降实万物，故曰实沉。”^⑨

《晋书·天文志》：“自毕十二度至东井十五度，为实沉，于辰在申，魏之分野，属益州。”^⑩

《唐开元占经》卷六十四：“毕、觜、参，魏之分野。自毕十二度至东井十五度，于辰在申，为实沉。言七月之时，万物极茂，阴气沉重，降实万物，故曰实沉。”^⑪

关于“析木”之次：

S. 3326 星图：“自尾十度至斗十二（一）度，于辰在寅，为析木。尾，东方木宿之末；斗，北方水宿之初。次在其间，隔别水、木，故曰析木。燕之分也。”

《乙巳占》卷三：“尾、箕，燕之分野。自尾十度至斗十一度，于辰在寅，为析木。尾，东方木宿之末；斗，北方水宿之初。次在其间，隔别水木，故曰析木。”^⑫

《晋书·天文志》：“自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为析木，于辰在寅，燕之分野，属幽州。”^⑬

《唐开元占经》卷六十四：“尾、箕，燕之分野。自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于辰在寅，为析木。尾，东方木宿（按，脱“之末”二字）；斗，北方之（按，此“之”字衍）水宿宿（按，衍一“宿”字）之初。次在其间，隔别水木，故曰析木。”^⑭

其余十“次”的比较从略，读者可看原文。

从以上两组对比即可看出，《乙巳占》、《唐开元占经》的文字与

S. 3326星图的文字几乎完全一致,仅有少数几个字有异,如“井”又作“东井”,“斗”又作“南斗”。另有少数几个字在流传中鲁鱼亥豕,发生讹变。最明显的差别则是,《乙巳占》和《唐开元占经》是将分野置于句首,而 S. 3326 星图则置于句末。不过,意义却完全相同。至于《晋书·天文志》的文字,则是将同样文句加以简化的结果。由此,我们可以大胆地说,李淳风在编《乙巳占》和《晋书·天文志》时,瞿昙悉达在编《唐开元占经》时,都曾使用过与 S. 3326 星图完全相同的材料;换言之, S. 3326 星图是编写《乙巳占》、《晋书·天文志》和《唐开元占经》所依据的原始材料之一,殆无疑义。

前又说过,李淳风还参加过“隋书十志”的编写工作。也就是说,《隋书·经籍志》的“天文类”著作应该出于他之手,至少他看过或审定过。无论如何,这些“天文类”著作都同他有瓜葛。我们不能想象,他在编《晋书·天文志》和《乙巳占》时所用过的一些重要书籍,如上面的星图,在《隋书·经籍志》“天文类”中不出现。那么,我们就查看一下《隋书·经籍志》“天文类”中有关星图的著录情况。计有:

天文横图一卷(原小注:高文洪撰);

天文十二次图一卷(原小注:梁有天官宿野图一卷,亡);

杂星图五卷;

摩登伽经说星图一卷;

星图二卷(原小注:梁有星书图七卷);

二十八宿二百八十三官图一卷;

二十八宿分野图一卷^⑤。

上面七种星图中,《摩登伽经说星图》一卷源自印度佛经,姑置不论。其余六种,何者是 S. 3326 星图的原名呢?

我们看到, S. 3326 星图说明文字的内容包含有十二次名及其意义;分野;在二十八宿中的起讫度数。这些说明文字,李淳风在《乙巳占》中是放在“分野第十五”一目下的^⑤;瞿昙悉达在《唐开元占经》中也是放在“分野略例”下的^⑥。也就是说,这两位当时使用过这份星图的天文星占家是将它放在“分野图”的范围来认识的。从实际文字看,各古国分野范围与十二次对应,十二次的各自范围又依二十八宿划分。因此,上述六种有关星图的书名中,最能与此相应的恐怕是“二十八宿分野图一卷”了,此外,沾边的还有“天文十二次图一卷”,其余均相距甚远。

我最初怀疑此图的名称可能是“天文十二次图一卷”。为此我请教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刘乐贤博士和法国远东学院华澜博士这两位年轻学者。他们认为,与其认为是“天文十二次图一卷”,还不如认为是“二十八宿分野图一卷”更合适。经过我们三人讨论,更经过上面的比较与论证,看来他们二人的看法是有道理的。

顺便指出,《二十八宿分野图一卷》在绘画史上也占有重要位置。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述古之秘画珍图”下载:“古之秘画珍图固多,散逸人间,不得见之。今粗举领袖,则有……二十八宿分野图一……上略举其大纲,凡九十有七,尚未尽载。”^⑦因此,这份星图不仅具有科学价值,也是上乘的绘画作品,其价值不容低估。

我现在将 S. 3326 号星图更名为《二十八宿分野图一卷》,是耶?非耶?我相信,即便仍不能视作定论,总比用“敦煌星图”或“全天星图”都更靠近一些。否则,这么珍贵的古星图,我们连一个准确名称都给不出,实在说不过去。

(原载邓文宽《敦煌吐鲁番天文历法研究》,
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5—37页)

注释：

- ① 中华书局标点本《隋书》，第 1018 页。
- ② 中华书局标点本《新唐书》，第 1544 页。
- ③ 中华书局标点本《旧唐书》，第 2036 页。
- ④ 参见王健民《石氏星经》。《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学卷》，第 319 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0 年。
- ⑤ 参见拙编著《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第 3—32 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 年。
- ⑥ 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史料编纂挂编纂《大日本古文书》卷三，第 90 页。转引自冯锦荣《敦煌本〈二十八宿次位经〉〈三家星经〉(P. 2512)与日本平安时期阴阳寮藏〈三家星官簿赞〉》，“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香港，2000 年 7 月 25—26 日。
- ⑦ (日)村山修一《若杉家舊藏の陰陽書について》，《史林》(京都)，69 卷 6 号，第 127—146 页，1986 年。我已获得“三家星官簿赞”的照片，是由日本友人成家彻郎先生赠送的。谨志于此，没齿不忘。
- ⑧ 钱宝琮《甘石星经源流考》，原载《浙江大学季刊》第一期，1937 年。今又见《钱宝琮科学史论文选集》，第 271—286 页，引文见第 278 页。科学出版社，1983 年。
- ⑨ 广池本《大唐六典》，第 226 页。
- ⑩ 参见陈遵妣《中国天文学史》第 2 册，第 410—411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
- ⑪ 中华书局标点本《晋书》，第 303—309 页。
- ⑫ 《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天文卷》，第 4 册，影印本，第 489—493 页。河南教育出版社，1997 年。
- ⑬ 中华书局标点本《汉书》，第 1005—1006 页。
- ⑭ 《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天文卷》第 5 册，影印本，第 541—550 页。河南教育出版社，1997 年。
- ⑮ 同注⑤，第 58—93 页。
- ⑯ 中华书局标点本《旧唐书》，第 1312—1316 页。
- ⑰ 中华书局标点本《新唐书》，第 820—825 页。
- ⑱ 《晋书·天文上》，中华书局标点本第 307 页。又，李淳风在《乙巳占》卷三“分野第十五”开头也说：“今辄列古十二次、国号、星度，以为纪纲焉。其诸家星次、度数不同者，乃别考论，著于历象志云。”也说明他所用的是较古的

材料。

- ①⑨ 中华书局标点本《旧唐书》，第 1311 页。
- ②⑩ 陈仲夫点校《唐六典》，第 304 页。中华书局，1992 年。
- ③⑪ 同上书第 319 页，第[一〇一]条校记。
- ④⑫ 广池本《大唐六典》，第 225 页。
- ⑤⑬ 《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四卷“天学”第一分册，第 252—253 页。科学出版社，1975 年。
- ⑥⑭ 见《文物》1966 年第 3 期，第 27—38 页。
- ⑦⑮ 见《中国古代天文文物论集》，第 195—198 页。文物出版社，1989 年。
- ⑧⑯ 同注⑤，第 72 页。
- ⑨⑰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第 101 页，中华书局，2000 年。
- ⑩⑱ 黄正建《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第 51 页，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 年。
- ⑪⑲ 中华书局标点本《隋书》之“出版说明”，1973 年版。
- ⑫⑳ 同注⑫，第 492 页。
- ⑬㉑ 中华书局标点本《晋书》，第 308 页。
- ⑭㉒ 同注⑭，第 547 页。
- ⑮㉓ 同注⑫，第 490 页。
- ⑯㉔ 同注⑪。
- ⑰㉕ 同注⑭，第 543 页。
- ⑱㉖ 中华书局标点本《隋书》，第 1019—1021 页。
- ㉒㉗ 同注⑫，第 489 页。
- ㉓㉘ 同注⑭，第 541 页。
- ㉔㉙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第 41 页，北京，京华出版社，2000 年。

跋两篇敦煌佛教天文学文献

迄今为止,分藏于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已被编为 5 万余号,宗教文献占了 90% 以上,个中又以佛教文献为主。这里我们介绍两篇印度佛教天文学文献,对研究印度天文学史、中印文化交流史和佛教文化,恐不无裨益。

这两篇文献是:藏在英国图书馆东方写本部的斯坦因“收集”品 S. 3374、S. 6024、S. 1648 和藏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的 Дх00519 号。

经查对,S. 3374 为《摩登伽经》,传世本见日本《大正藏经》第 21 卷第 399 至 410 页。写本首尾均残,现存文字系原经中间部位的一部分,约占全经的 28%。S. 6024、S. 1648 和 Дх00519 为《舍头谏太子二十八宿经》(简称《舍头谏经》),传世本见《大正藏经》第 21 卷第 410 至 419 页。前两件前后残失,均系断片。但字迹相同,而且 S. 6024 的末端与 S. 1648 的开端之间仅缺 84 字。以写本每行 16 至 18 字计,两件间约残去 5 行文字。第三件为一小断片,但笔迹与前二件相同。因此,严格说来,此三号是同一写本的三个断片,我们理应将它们当作一篇文献来看待。此篇现有文字约占原经的 30% 左右。

《摩登伽经》和《舍头谏经》是早期传入中国的印度佛经,也是同一经典的不同译本,故一经而二名。《摩登伽经》的译者为支谦和竺律炎。据《出三藏记集》卷十三《支谦传》记载,支谦系大月支人,祖父名法度,

东汉灵帝时率族人归化。支谦少年聪敏，“十三学胡书，备通六国语”；“博览经籍，莫不究练，世间艺术，多所综习”。汉献帝时，黄巾起事，中原板荡，支谦与数十乡人南向奔吴，见重于吴主孙权，拜为博士，“使辅导东宫，甚加宠秩”。支谦语言兼通华戎，有感于不少印度佛经虽传至中土，但尚未汉译，于是发奋译经。“自黄武元年(222)至建兴中(252—253)，所出《维摩诘》、《大般泥洹》、《法句》、《瑞应本起》等二十七经，曲得圣意，辞旨文雅”。据研究，《摩登伽经》是支谦和竺律炎在孙吴黄龙二年(230)共译于建康(今南京)的^①。

竺律炎，又称竺将炎、竺持炎，印度人，生卒年月与世寿不详。据记载，竺律炎于东吴黄武三年(224)与维祇难来到武昌，应吴人之请，二僧共同译出所携之《法句经》二卷。由于他们不大通晓汉语，故所译经典虽很质朴，但义多未尽。维祇难圆寂后，竺律炎才与支谦合译出《摩登伽经》。

《舍头谏经》的译者竺法护，更是西晋时期的译经名僧。其先祖也是月氏人，世居敦煌。八岁出家后师事印度僧人竺高座，从俗改姓为竺。法护“天性纯懿，操行精苦，笃志好学，万里寻师，是以博览六经，涉猎百家之言，虽世务毁誉，未尝介于视听也”。^②晋武帝之世，京邑各处虽尊崇寺庙图像，而佛经要典仍藏在西域。于是，他随师到西域游历诸国，“外国异言，三十有六种，书亦如之，护皆遍学，贯综诂训。音义字体，无不备晓”^③，为他从事译经工作打下丰厚坚实的基础。他还从西域带了很多梵文经典，归国后，“自敦煌至长安，沿路传译，写为晋文”。^④从晋武帝泰始年间(265—274)至愍帝建兴元年(313)，译出佛典154部^⑤，309卷。《舍头谏经》就是在这期间译出的。

支谦语通华戎，竺律炎虽不长于华语，但他来自天竺，又是学问僧，对梵语十分精通。所以，他们二人合译的《摩登伽经》，文字晓畅，语义准确，至今读诵仍备觉畅朗。竺法护所译《舍头谏经》，比《摩登伽经》后

出约半个世纪。由于译者风格不同，法护所译虽称忠实原典，文字质直，但读起来却诘屈聱牙。

这部经典的主要内容是通过叙说一个婚姻故事来宣讲众生平等、无有高下的佛教思想，以及宣传印度天文星占知识的。故事的梗概如下：

很久很久以前，印度恒河边上有一个果园，园中有王名曰“帝胜伽”。帝胜伽本人很有智慧，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其子名曰“师子”，相貌堂堂，学问亦佳。帝胜伽觉得师子已长大成人，该为其婚娶了，于是考虑向何处求婚。那时，印度实行严格的种姓制度：婆罗门最尊贵，其次为刹帝利，第三等为吠舍，第四等为首陀罗，即贱民。而贱民中，男性贱民被称作“摩登伽”，女性贱民被称作“摩登祇”。帝胜伽及其家族即属于贱民阶级，故在此经中被称为“摩登伽”。其时，名为“大兴”的国王统辖下的一个聚落，受封者为“莲花实”，属于婆罗门种姓。莲花实有女名曰“本性”，“德貌殊胜，犹师子耳”。^⑥帝胜伽闻其名，遂由车马扈从陪同，往莲花实聚落为其子求婚。莲花实虽以礼相迎，却看不上他们的低下等级。他问帝胜伽：你是很卑下的等级，来此何干？帝胜伽以实相告，说明自己是来为儿子求婚的，希望允准。莲花实听言大怒，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侮辱，问道：“汝栴陀罗自有种类，何故欲染清胜之人？”^⑦帝胜伽表示，我认为婆罗门与栴陀罗无别，种姓也不是生而就有的。他历数了婆罗门种姓所做的诸多坏事。莲花实听后更怒，向帝胜伽说明婆罗门种姓所以尊贵的原因，并要求他“可宜速还，莫得复语”！^⑧帝胜伽对莲花实的话给予了反驳，并阐明“一切众生，随业善恶而受果报，所谓端正丑陋，贫贱高贵，寿命终夭，愚痴智慧，如此等事，从业而有”，^⑨并非由出身种姓所决定。他又举了许多例子，说明诸种姓是平等的，自己有权利为儿子求婚，至于财宝，任莲花实索取。帝胜伽接着又讲了许多许多道理，终于说服了莲花实，使其“生大欢喜”。^⑩莲花实要求知道帝

胜伽的既往历史和知识的来源。帝胜伽说明自己的远祖也曾是婆罗门,只是后来才降低种姓的。莲花实又考问帝胜伽:“仁者岂知占星事不?”帝胜伽言:“大婆罗门,过此秘要,吾尚通达,况斯小事,而不知耶?汝当善听,吾今宣说。”^⑩此下内容,主要是印度的天文和星占知识。帝胜伽依次解说的内容是:(1)二十八宿的星名、星数、形状、各宿祭祀用品等;(2)月离位置(月亮运行所在二十八宿间的具体位置)与此时出生人的命运如何;(3)月离位置与所修城邑的吉凶善恶关系;(4)月离位置与下雨之关系;(5)月离位置与日月食所主之吉凶;(6)月离位置与所应举作之事;(7)各月地动所主灾异;(8)各月昼夜长短时节;(9)里数由旬之法,即长短等计量单位;(10)月离位置所主疾病及如何禳祭;(11)月离位置与系囚解脱迟速;(12)人体黑子(黑痣)所主吉凶;(13)月会诸宿及其昼夜时分;(14)历日置闰法,十九年七闰,五年再闰;(15)七曜周期;(16)二十八宿所主社会各种人等。帝胜伽终于以其辩才和丰富的知识说服了莲花实。“莲花实闻是语已,赞摩登伽:‘善哉!仁者所言诚谛。今以吾女用妻卿子。不须财物,可为婚姻。’”^⑪故事到此也就结束了。

很显然,此经是用一个美丽的婚姻故事作轴线,通过帝胜伽之口,将印度天文、星占知识全盘托出。在前述所列 16 项内容中,除第 12 项讲人体黑子所主吉凶,在中国人看来属于相术,其余全为天文与星占内容。尤其需加特别注意的是关于二十八宿的内容。

古代中国与印度均有二十八宿(或为二十七宿)。二十八宿是如何产生的?究竟是各自独立产生的,抑或是谁影响了谁?一直是学者们关心的问题。竺可桢先生曾认为中国二十八宿起源于公元前两三千年^⑫;近年学者们的研究又有新进展:沈建华女士从甲骨文中找出了二十八宿的一些星名^⑬,冯时先生揭出了河南濮阳西水坡 45 号仰韶文化时代墓中有用贝壳堆积而成的苍龙、白虎象^⑭。这些均说明,中国的二

十八宿应该是独立产生的,而非受到外来影响的结果。但是,在四川大凉山彝族中流行的一种二十八宿体系,究竟来自何方,则是需要考究的。我们知道,从《史记·天官书》起,中国的二十八宿便是从东方苍龙七宿的“角”宿开始的,但凉山彝族除有此种二十八宿外,还有另外一种体系。1977年秋,笔者在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古天文组工作时,曾与陈宗祥、王胜利二先生对四川大小凉山地区的天文历法做过考察^⑩,发现凉山地区存在一种二十八宿系统,是以西方白虎七宿中的“昂”宿开头的,这与《摩登伽经》所载印度古代二十八宿以“昂”宿开头完全相同。二者到底是什么关系,尚难遽定。这里仅作为一个问题提出,以期引起研究者的关注。

现在再回到本文介绍的两篇敦煌所出佛教天文文献上来。《大正藏经》所收《摩登伽经》共分七品、上下二卷,一至五品为上卷,六、七两品为下卷。但 S. 3374《摩登伽经》分卷与此有别:在《观灾样品第六》的中段,即讲完月离位置与日月食所主吉凶之后、月离与所应举作各事之前,标出“摩登伽经卷中”。既有“卷中”,则应有卷上和卷下。也就是说,写本是一个分上、中、下三卷的三卷本,而非二卷本。《开元释教录》卷二载:“《摩登伽经》三卷,或二卷”。可知,唐时二卷本与三卷本并存。《大正藏经》所收为二卷本,写本则是唐代流行的三卷本。

笔者将写本与《大正藏经》本对勘一过,发现文字小有区别,但多不害意。不过,有些字仍很有益于校勘工作,整理《摩登伽经》时应予参考。这里从略。

竺法护所译的《舍头谏经》不分卷、品,写本与《大正藏经》本相同,亦无卷、品分别。从内容方面来考察,S. 6024 开始的位置,相当于《大正藏经》卷 21 第 414 页中栏中间“我言至诚,当与仁家共结婚姻”一句;止于 415 页上栏倒 10 行“答曰宿止”之“答”字;S. 1648 起于 415 页上栏倒 5 行“二曰长育”之“曰”字,止于同卷第 417 页上栏中间“又问何谓?

则颂偈曰”一句。Jx00519 残存文字相当于同卷第 419 页中栏左侧的一部分文字。因下部残断,故不能连读成文,读偈颂单句则无问题。写本文字与《大正藏经》本也有少许区别,整理时亦应注意。

最后,由这两篇文献还引发了我们对一些问题的思考。《出三藏记集》卷十三有连续的《支谦传》和《竺法护传》,记述了他们的译经事业,但并未提及《摩登伽经》和《舍头谏经》,说明此经在魏晋南北朝时并未受到重视。其所以如此,则是由于此经的主体内容是宣讲印度天文星占知识的,相对正统佛经而言就处于次要位置了。但用今人的眼光看,它却是极端宝贵的。同时,它也说明,中世纪的科学确实是神学的婢女。此其一。其二,英国研究中国科学与文明史的著名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博士曾经指出:“科学与方术在早期是不分的”^①;“在十六世纪,科学一般被称为‘自然魔术’。开普勒就是作为一个星占家而活动的,甚至牛顿也不无道理地被称作‘最后的一位魔法师’。的确,科学和魔术的分化,是十七世纪早期现代科学技术诞生以后的事。”^②《摩登伽经》(《舍头谏经》)不仅将天文学与占星术合在一起,而且也与佛教内容相混合。我们在对它的科学内容进行研究的同时,还应关注与之并存的其余内容。否则,人为地割裂开来,既无法将科学内容认识清楚,也不符合历史主义的基本要求。

(原载《文物》2000 年第 1 期,第 83—88 页)

注释:

- ① 参《佛光大辞典》第 4 册第 3489 页上“竺律炎”条;《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天文卷》第 1 册,钮卫星撰《摩登伽经附:舍头谏太子二十八宿经提要》,河南教育出版社,1997 年出版。
- ② 《出三藏记集》卷十三《竺法护传》。
- ③ 同注②。
- ④ 同注②。

- ⑤ 竺法护译出的佛典部数说法不一，一谓 165 部。
- ⑥ 《摩登伽经·明往缘品第二》。
- ⑦ 同注⑥。
- ⑧ 同注⑥。
- ⑨ 同注⑥。
- ⑩ 《摩登伽经·众相问品第四》。
- ⑪ 《摩登伽经·说星图品第五》。
- ⑫ 《摩登伽经·明时分别品第七》。
- ⑬ 竺可桢《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载《思想与时代》，1944 年第 34 期，第 1—25 页。
- ⑭ 沈建华《甲骨文中所见二十八宿星名初探》，载《中国文化》总第 10 集，第 77—87 页。
- ⑮ 冯时《河南濮阳西水坡 45 号墓的天文学研究》，载《文物》1990 年第 3 期，第 52—60 页。
- ⑯ 考察报告载《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第二集，科学出版社，1981 年，第 101—148 页。并参同书所收笔者与陈宗祥合作的《凉山彝族二十八宿初探》。
- ⑰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中译本第 35 页，科学出版社与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90 年。
- ⑱ 同注⑰。

敦煌吐鲁番历日略论

汉简历日、敦煌吐鲁番历日和明清历书,被称为中国古代历法史研究的三大资料渊藪。其中敦煌吐鲁番历日,以数量多、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为世所瞩目。这批文献或出自敦煌石室,或出自新疆吐鲁番古墓群,均是研究中古时代历法史、文化史和民俗学的珍贵资料。中外学人为研究这些中华瑰宝已付出很多精力,并取得了可喜成绩。随着研究工作的日趋深入,其价值将被进一步揭示出来。

一

从敦煌莫高窟今编 17 号窟发现的历日,现知有 50 余件;另有三件(编号孟 01542、孟 01543、孟 01544)仍藏俄罗斯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迄未公布。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古墓群发现的历日共 5 件。二者总量估计在 60 件左右。

这批文献中最早的一件是《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十二年(451)历日》^①,最晚的一件是《北宋淳化四年(993)历日》(P. 3507),前后跨度达 544 年,历六个世纪之久。在汉简历日和敦煌吐鲁番历日面世之前,我国传世历本以《南宋宝祐四年(1256)会天万年具注历》^②为最早,而汉简历日最晚者为东汉桓帝元嘉三年(153)历(见陈梦家《汉简年历表叙》);中古时代的历日惟赖敦煌吐鲁番历日方能明其究竟。这

一时代正史为数虽多,但其《律历志》所载多是各种历法的编撰经过和推步数据,敦煌吐鲁番历日却展示了实用历本的真面目,可补正史之缺。

敦煌吐鲁番历日源自三个方面:(1)中原王朝颁布的历日,现知有北魏太平真君(450、451)历,唐显庆三年(658)历(载《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六册)、仪凤四年(679)历(载同上书第五册)、开元八年(720)历(载同上书第八册)、乾符四年(877)历^③; (2)由唐代剑南西川成都府流入敦煌的私家历日,如“樊赏家历”^④; (3)吐蕃占领敦煌时期(786—848)和敦煌归义军时期(848—1036),敦煌本地编撰的历日,这是敦煌历日的主体部分。除中原王朝颁布的历日,各地自编历日均属“小历”性质。

以“天命攸归”自居的历代皇帝,一向视“颁正朔”为中央王朝的特权,历日行用区域自然也就成了王权所及的重要象征。北魏王朝颁历自不待言,就是唐王朝,它于贞观十四年(640)平高昌,设西州,开始对高昌地区实行有效的行政管理,唐显庆三年历、仪凤四年历、开元八年历从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被发现,是其证明。诚然,历书在高昌地区的颁行也非孤立事件。唐在高昌设西州后,随之推行郡县制、均田制、户籍计帐手实制以及各种法律行政军事制度,颁行历日仅是其行使权力的一个方面。

尽管历代封建国家操有颁历的垄断权力,每每有禁绝天文图讖之举^⑤,但民间总有少数爱好天文历算的人士,甘冒危险自编历日。《新五代史·司天考》载,唐建中(780—783)时,有术士曹士蒨制《符天历》,只行民间;后周广顺(951—953)中,“民间又有《万分历》”。及至王朝末日将临,皇权式微,民间制历者为数更多。王说《唐语林》云:“僖宗入蜀,太史历本不及江东,而市有印货者,每差互朔晦。货者各征节候,因争执。里人执而送公,执政曰:‘尔非争月之大小尽乎?同行经纪,一日半日,殊是小事!’遂叱去。”^⑥唐僖宗初次入蜀在中和元年(881)(《旧唐

书·僖宗纪》),现存敦煌所出《唐中和二年(882)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日]》,正是其时成都地区售卖的私印历日之一种。至于它是如何流入敦煌的,还有待探讨。

敦煌本地自编历日,更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唐玄宗天宝末年,安史乱起,中原板荡,慌乱中调西北边军勤王,西北边防出现空隙,吐蕃便乘虚而入。此后吐蕃由东而西,逐步蚕食并占据了河西走廊。唐德宗贞元二年(786),敦煌最终陷落于吐蕃手中。吐蕃统治敦煌直到唐宣宗大中二年(848),象征王权的中原历日自然无法颁行到那里。吐蕃统治者使用地支和十二生肖纪年,既不符合汉人行之有效的干支纪年、纪月、纪日习惯,也无法满足汉人日常生活的需要。于是敦煌地区开始自编历日。六十余年后,虽然张议潮举义成功,使敦煌重归唐有,但当地编历已成习惯,且归义军政权处于半独立状态,故敦煌地区仍在使用自编历日。从现存敦煌历日看,敦煌地区行用自编历日一直延续到宋初,前后达两个世纪之久。

敦煌本地历日多为私家撰修,现知撰者有翟奉达、翟文进和安彦存,所撰历日主要在五代至宋初阶段。吐蕃统治时期和归义军前期的撰历人则未详。从敦煌文献和石窟题记可知,翟氏是敦煌地区的望族之一。翟奉达自幼即爱好术数历算,成年后又在归义军节度使衙担任州学博士、随军参谋等幕职,担负撰历重任是责有攸归。翟文进名前常冠“子弟”二字,亦知他是翟奉达之后翟氏大家族的成员之一。略而言之,五代时期的敦煌历日基本出于翟氏家族;只是到了宋初,撰历重任才转入安氏家族,如安彦存之手。

敦煌私撰历日多题曰“撰上”。所谓“撰”,是说属何人所撰,即编者是谁;所谓“上”,即上呈给归义军节度使衙。张、曹二氏归义军政权,虽然受命于中原王朝,但唐末五代战乱频仍,中原王朝对远在西北边陲的敦煌鞭长莫及,使这一政权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以至在唐末五代初年,

张氏归义军政权的第三代传人张承奉一度建立了“西汉金山国”。翟奉达等将所编历日上呈给归义军节度使衙，节度使衙将历日颁发民间行用，其地方政权的权力由此也得到了体现，这与中央王朝以历书行用区域作为权力所及的象征相仿佛。

二

敦煌吐鲁番历日研究大体经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敦煌文献面世至 1964 年。最早关注并研究敦煌历日者当推罗振玉氏。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罗振玉就他所能见到的几件历日录文排印，并写了跋语^⑦。但因未能解决定年方法，故时有错误。其后王重民于 1937 年发表《敦煌本历日之研究》^⑧一文，虽也未能解决定年方法，但确有不少发明。如提出“论敦煌历日与五代北宋历日不同”、“论据五代北宋历不能推敦煌历”、“论敦煌历日与唐不同始于陷蕃以后”等，都是真知灼见。1943 年董作宾发表《敦煌写本唐大顺元年残历考》^⑨，则是对罗振玉将一件残历错定年代的更正。1950 年，苏莹辉在台湾公布了《北魏太平真君历》的录文，同时也做了简单的研究。

第二阶段，自 1964 年至 1983 年。此前学人们的研究工作一直处在摸索阶段，始终未能解决残历的定年方法。因敦煌历日约四分之三是断简残编，无明确纪年，只有解决定年方法，才能确定其准确年代，进而开展更深入的研究。1964 年，日本天文学史专家数内清教授发表了《斯坦因敦煌文献中的历书》^⑩一文，首次将敦煌历日的定年方法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具体方法详下文）。可以说，这篇论文在敦煌历日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后学人们虽也补充了若干方法，但基本方法却是数内清教授确立的。1973 年，日本敦煌学家藤枝晃教授发表《敦煌历日谱》^⑪长文一篇，就是利用数内清的方法对敦煌残历逐件定

年。十年后,我国学者施萍婷又发表《敦煌历日研究》^⑫一文,在藤枝氏基础上又有新进展,并纠正了前人的某些错失。此后,席泽宗、邓文宽补充了利用年神方位确定年地支的方法^⑬;严敦杰补充了利用二十四节气和七十二物候判定残历年代的方法^⑭;邓文宽提出了利用纪日地支和建除十二客对应关系判定残历星命月份的方法^⑮。迄今为止,敦煌历日的定年方法已趋完备。

以上学者们研究出的定年方法,可概括为如下各项:

(1) 利用正月纪月干支确定年天干。其对应关系是:

正月纪月干支	对应年天干	口诀(见敦煌文献 S. 0612 背)
丙寅	甲、己	甲、己之年丙作首,
戊寅	乙、庚	乙、庚之岁戊为头,
庚寅	丙、辛	丙、辛之年庚次第,
壬寅	丁、壬	丁、壬还作顺行流。
甲寅	戊、癸	戊、癸既从运位起,正月直须向甲寅求。

(2) 利用年九宫或正月九宫确定年地支。其对应关系是:

年九宫(中宫)	正月九宫(中宫)	对应年地支
一、四、七	八	子、卯、午、酉(仲年)
二、五、八	二	巳、亥、寅、申(孟年)
三、六、九	五	丑、未、辰、戌(季年)

(3) 将上述所得两个年天干和四个年地支配成四组干支,即该残历可能的四个年份。

(4) 利用残历提供的条件,及其他可参考的资料,最大限度地排出残历各月的月朔。

(5) 以前面排出的四个干支年份为对象,利用排出的月朔,同陈垣《二十史朔闰表》或其他类似年表对照,找出朔日相近的年份。

(6) 如果原历有“蜜”日(星期日)注记,则对照《朔闰表》一书后面所附的《日曜表》进行最后核定。

(7) 如果原历有年神方位,仅是题年已残,利用《年神方位表》可以直接找出该年的纪年地支,而不再用第(2)项方法。

(8) 在残历断缺严重的情况下,可利用残存节气和物候注记推算年代。但此项方法使用时要慎重,不宜轻易案断。

(9) 即使是只存一行的残历片,只要有该日的纪日地支和建除十二客,利用二者对应关系,便可定出其星命月份,时间跨度只在两个临近的节气(非中气)之间。

上述各种方法全是结论,具体推导过程从略,可参前述有关学者的论著。正是利用这一套方法,中外学人已将敦煌吐鲁番历日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定出了准确年代。其余小残片,只要具备必需的条件,也可考知其所在节气范围。

第三阶段,自1983年至今。学者们除了补充、完善敦煌吐鲁番历日的定年方法外,全面系统地整理研究这批文献的工作已在进行。笔者在席泽宗教授指导下,1989年即完成《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一书,但因学术著作出版困难,至今未能同学人见面。

中外学人已经和正在究明我国历法史上的一些疑难问题。比如,唐仪凤三年的闰月问题,《旧唐书·高宗纪》为闰十月,《新唐书·高宗纪》为闰十一月,陈垣《二十史朔闰表》两说并存,遂成难解之谜。利用吐鲁番出土《唐仪凤四年历日》的节气记载,推得仪凤三年十月后的一个月是无中气之月,故仪凤三年当闰十月而非十一月^⑩。敦煌文献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有“唐仪凤三年闰十月”^⑪的记事,与上述推算结果如合符契,此谜于是得以解开。

古代历日内容如何演进发展,以往由于实物太少而无从寻觅其轨迹。跨度达六个世纪的敦煌吐鲁番历日,使我们有了粗略地勾画历日

内容演进轨迹的可能。

银雀山二号汉墓出土的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历谱》，复原后正月的全部内容是：“正月大 戊午 [己未] 庚申反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反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 壬申反 立春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反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反 乙酉 丙戌 丁亥。”^⑩

二百余年后的东汉和帝《永元六年(94)历》，十二月的内容是：“十二月大 一日癸丑建大□(寒) 二日甲寅除八魁……十六日戊辰平□ 十七日己巳平□八魁 十八日庚午定反支□ 十九日辛未执……” (按，十六日为立春)^⑪ 三国两晋南朝的历日迄未发现。

敦煌所出北魏太平真君历，历日首端有帝王纪年和年神方位注记，其十一年(450)历首为：“太平真君十一年历[日] [太]岁在庚寅 大(太)阴大将军在子。”同年二月的全部内容是：“二月小 一日壬辰满 十日惊蛰二月节 廿五日春分 廿七日社。”

迄今为止，虽然我们仍旧受到出土资料的严格限制，但从上述三种历日仍可看出，自西汉中叶至北魏，在长达585年的时间里，我国古代历日内容变化不大。三种历日均有月大小、纪日干支和节气。《元光元年历》的丛辰项目仅有“反”，亦即《永元六年历》的“反支”。此外，《元光元年历》有三伏和腊日注记，《永元六年历》因不全而未见，但比前者增加了“八魁”和“血忌”等丛辰项目以及建除内容。《北魏太平真君历》在年首增加了三个年神，此外有“社”、“腊”、“始耕”(即籍田)等注记。总体上说，这个时期的历注内容十分简单，历日内容也演进得十分缓慢。

进入唐代，情况迥然有别。《唐显庆三年历》虽然残破过甚，但从残存序言部分可知它有“天恩”、“天赦”、“母仓”等丛辰说明，并一次性给出全年各月的大小。各日内容亦增多起来。如正月四日的全部内容是：“四日丁亥土收，岁对小岁后，嫁娶、母仓、移徙、修宅吉。”“收”字为

建除内容,已见于东汉《永元六年历》和《北魏太平真君历》。但“土”字所代表的六十甲子纳音却是此前历注中所不曾有的。至于各日铺注的选择事项,更是前所未见。此外,此历还有“上弦”、“下弦”、“[望]”注记,也属新增。同一时代的《仪凤四年历日》、《开元八年历日》内容大致相同。《唐六典》卷十四太卜署记:“凡历注之用六:一曰大会,二曰小会,三曰杂会,四曰岁会,五曰建除,六曰人神。”出土历日与唐代行政法典的规定基本一致。由上可知,唐前期比汉至南北朝历日内容已有增多,具有这一历史时代的特征——它可以看作古历内容由简到繁的过渡时期。

据张培瑜教授等研究,历注内容由简到繁,唐代开元时僧一行(张遂)的《大衍历》是个转折点^②。这一论断为敦煌历日所证实。如P. 3403《宋雍熙三年丙戌岁(986)具注历日》。它有很长的序文:先介绍了该年的年神方位,计31项,配之以年神方位图;次有男女命宫,魁罡之月;再次有“推七曜直日吉凶法”,即将由西方传入的星期制度中的七日各配以吉凶宜忌;再次对历日注中丛辰项目如九焦、九坎、血忌、归忌等进行概述;再次为五姓(宫、商、角、徵、羽)宜忌;序末最后说明年中各月之大小,然后才转入历日正文。进入正文后,每月又有月序,包括月大小、月建干支、月九宫、得节日期、天道行向、月神日期方位(共8项)、宜忌、四大吉时、日出入方位。每日又包括八项内容:(1)“蜜”日(星期日)注;(2)日期、干支、纳音、建除;(3)弦、望、没、往亡、籍田、社日、释典等注记;(4)节气和物候;(5)吉凶注;(6)昼夜时刻;(7)人神;(8)日游。敦煌历日所以称作“具注历日”,也是由于它注入了上述内容。诚然,并非每日都含八项内容,但在P. 3403中(2)、(5)、(7)、(8)四项则是每日必备的。其余有则注之,无则不注。这些繁杂的内容,不只敦煌本地的“小历”多具备,以“宣明历术”为依据的敦煌出《唐乾符四年(877)历日》内容更为复杂。它分作上、下两部分,上部为历注,下部为各种吉凶宜

忌的推算方法和说明。如“六十甲子宫宿法”，依次表列了从唐兴元元年(784)上元甲子开始，至唐乾符四年(877)共 94 年间每年的男女命宫。其余如“洗头日”告知何日洗头为吉；“五姓种蒔日”告知种禾、豆、荞、麦、床、稻的吉日，如此等等。敦煌历日的繁杂内容，奠定了宋以后历日内容的基本格局。

至此，我们可将我国古代历日内容的演进做如下勾画：自西汉至南北朝，为历日的早期阶段，内容极为简略；唐代前期，历日内容开始增多，为由简到繁的过渡时期；唐中叶起，历日内容突飞猛进地增多，且奠定了宋以后历日的基本格局。虽然仍嫌疏阔，但若没有敦煌吐鲁番历日，我们连这样的勾画也做不出。

敦煌历日中还有一些问题尚未研究清楚。事实表明，敦煌历日的朔日与同年中原历往往有一二日之差，遇有闰月之年差别更大；与中原历闰在同月者极少，往往有一个月之差。由于尚未发现敦煌本土历日编撰时的岁实、朔策等依据，至今仍不能给予科学的说明。这些，仍有待学者们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三

敦煌吐鲁番历日具有丰富的文化和民俗内涵。中古时代历日的功能比现今民用历日大得多。现行民用历日主要是公历月日、星期和各种节日；在我国又有农历月日、二十四节气、三伏、数九等，但总体上说极为简略。它表明，在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后，历日又有了返朴归真的倾向。但从上节介绍可知，敦煌吐鲁番历日完全是另一番面貌，一定意义上可以称之为“民用小百科全书”。

敦煌吐鲁番历日的文化内容，科学和迷信掺杂。其科学内容主要表现在历法本身——它所具有的历学和数学价值。这一方面，可以通

过阅读有关天文学史和历法史的著作加以透视^①，本文不赘。此处着重说明一下它那些迷信、半迷信的成分。因为即令不科学，也是我们祖宗苦苦思索的产物，曾经广泛而深入地影响过我们祖先的思想和生活，今日人们也还不能完全摆脱它们的影子。

被称作“数字魔方”的九宫，马王堆帛书中已见一件，传说起源于《洛书》。汉·徐岳《数述记遗》云：“九宫算，五行参数，犹如循环。”甄鸾注：“九宫者，即二四为肩，六八为足，左三右七，戴九履一，五居中央。”画成图形如图一；换成八卦如图二；至唐代，又有用颜色代数字者（一白，二黑，三碧，四绿，五黄，六白，七赤，八白，九紫）如图三：

四	九	二
三	五	七
八	一	六

图一

巽	离	坤
震	中	兑
艮	坎	乾

图二

绿	紫	黑
碧	黄	赤
白	白	白

图三

在基本图形（图一）的基础上，各种数字递减一（九退后为一，一退后为九），很快就可产生九幅不同的九宫图^②。现存敦煌历日的年九宫、月九宫也就是以这些图形配入的。将敦煌历日中的各种九宫图综合研究，可知它共有三种表示方法：一是数字，二是表示颜色的字，三是直接用各种颜色涂成彩图^③。无论采用哪种方法，其内涵则完全一致。

敦煌历日的九宫图形是用以推算吉凶祸福的，特别是同“男女命宫”相联系后，成为星命家必须掌握的方法之一。但剔除其中的迷信成分，是否也有科学因素呢？恐怕也可以研究。起源于《周易》的“纳甲”（又称“六十甲子纳音”），由于文献记载不足，宋时沈括还在苦苦考索（见《梦溪笔谈》卷七）；至清代，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纳音说》曾给予精确的文字表述。我们将钱氏的论说绘成表格，与敦煌历日的“六十甲子纳音”相对照，结果无一不合。同时也得以究明，纳音术本是以六

十甲子与五音(宫、商、角、徵、羽)相配合,五音又与五行(土、金、木、火、水)相配,于是便用五行代五音,从而绘制出完整的六十甲子纳音表及干支与五行对应关系表^②,进而有可能对古历的纳音内容进行正确校读。显然,这对理解《周易》的相关内容也不无裨益。

渗入古历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建除十二客(又称“建除十二辰”)。至晚从东汉《永元六年历》开始,建除已入历日,后经北魏、唐,直至宋代以降,历日一直沿用不衰。建除十二客是以建、除、满、平、定、执、破、危、成、收、开、闭共十二字各主一定吉凶^③,配入历日。通过对敦煌历日研究,得知它有三个特征:(1)从立春正月节之后的第一个“寅”日注“建”字,顺序循环下排;(2)凡遇节气(非中气)所在之日,重复其前日的十二客一次,再接续下排;(3)由于十二地支和建除十二客均以十二为周期,又使用了节气之日重复其前日一次的方法,导致了各星命月(临近的两个节气间为一星命月,不同于历法月)中建除十二客与上一星命月纪日地支相差一日,从而形成了二者间的固定对应关系。又经与天水放马滩战国秦简对照,表明其固定对应关系早在战国时即已形成^④,也可知“建除家”在秦汉时代作为术士中的一派,曾经十分活跃^⑤。

除上述论及的三项之外,属于阴阳术数文化的还有年神方位、月神日期方位、星命月份、魁罡之月、六壬十二神、选择事项,以及源自道家的人神流注等,内容庞杂,这里从略。

敦煌历日中的民俗文化同样丰富多彩。注入历日的“籍田”(北魏称“始耕”)是古代三公九卿的重要礼仪制度,其用意在于倡导天下崇本,勤于农作。“社”日祭祀土地神,每年两次,反映了农业大国对土地的倚重。“腊”日祭百神,正是汉民族多神教具有的特征。“释典”礼是对儒家鼻祖孔丘及其高足颜回的祭奠,反映了学徒对祖师的崇敬。“洗头日”注入历中,虽然本无吉凶之分,但也表现了讲卫生的良好习惯。“不煞生”注入历中,则说明佛教文化在敦煌的发达及其对民众生活的影

响。总之,敦煌历日的民俗学内容是很值得重视的。

敦煌历日的另一价值是它所透露出的与外来文化交融现象。在《宋太平兴国六年辛巳岁(981)具注历日》(S. 6886 背)的六月二十六日下,注有“马平水身亡”,七日后的七月三日注“开七了”,以后每隔七日注“二七”、“三七”直至“七七”。至十月七日下午注“百日”。这是时人为马平水举行“亡七斋”和“百日祭”的记录。为活人作“生七斋”和为死者作“亡七斋”,都不是中国的传统民俗,而是来自佛教^②。佛教文化艺术传入中国后,为在中国扎根,吸收了中国的儒、道思想,从而具有了中国特色。这种吸收,不仅表现在一些石窟壁画艺术中,同时也渗透到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里,“亡七斋”被注入历日是其表现形式之一,寄托了中国民众对父母生前的孝养和死后的追念,在文化和心理习惯上找到了结合点。这一习俗至今仍被广泛地保存在中国民间以及东亚汉文化圈中。

另一现象是历日中的“蜜”日(星期日)注。星期制度来自西方,它被注入敦煌历日仅具占卜吉凶的意义^③,还未能同中国民众的日常生活相结合。所以如此,是由于古代中国是多神教(如“腊”祭),而基督教(唐称“景教”)却是一神教,二者相去甚远。就其实用性而言,当时中国官方实行旬假制,十日一沐浴假^④,星期制度却是七日一礼拜,二者也难于找到结合点。这一制度只有在辛亥革命我国开始行用公历后,才被广泛地应用起来,而它那套占卜吉凶的内容却被无情地抛弃了。

一代史学宗师陈寅恪先生曾论道:“释迦之教义,无父无君,与吾国传统之学说,存在之制度,无一不相冲突。输入之后,若久不变易,则决难保持。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近虽有人焉,欲然其死灰,疑终不能复振。其故匪他,以性质与环境互相方圆凿枘,势不得不

然也。”^⑨陈寅恪先生这段论述,其意义不限于佛教,对一切外来文化都适用。由敦煌历日反映出的“亡七斋”和“星期制度”这两种外来文化在中国的不同遭遇和命运,也应给我们有益的启迪。

(原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第3期,第40—48页)

注释:

- ① 此历原件下落不明。前人曾公布过两种录文,一见苏莹辉《敦煌所出北魏写本历日》,载台湾《大陆杂志》一卷九期;一见刘操南《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十二年残历读记》,载《敦煌研究》1992年第1期。
- ② 日本金泽文库藏宋刊本具注历半页,共9行。影片见《北平图书馆馆刊》六卷三号插图。
- ③ 原件图版见《中国古代天文文物图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66—67页。
- ④ 斯坦因编号P. 10,藏英国图书馆。
- ⑤ 如《全唐文》卷410常袞撰《禁藏天文图讖制》。其中“元象器物”、“天文图书”、“讖书”、《七曜历》、《太一雷公式》等,均在禁绝之列。
- ⑥ 《唐语林》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256页。
- ⑦ 见罗振玉《敦煌石室碎金》,东方学会印,1925年;《松翁近稿》,1922年。罗跋三种后收入王重民编《敦煌古籍叙录》,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60—163页。
- ⑧ 原载《东方杂志》三十四卷九期,1937年5月。后收入王重民《敦煌遗书论文集》,中华书局,1984年,第116—133页。
- ⑨ 见《图书月刊》三卷一期,1943年11月,第7—10页。
- ⑩ 《东方学报》(京都版)第35期,第543—549页。我国有朴宽哲译文,题为《研讨推定斯坦因收集的敦煌遗书中的历书年代的方法》,载《西北史地》1985年第2期,第115—118页。
- ⑪ 《东方学报》(京都版)第45期,第377—441页。
- ⑫ 见《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编上》,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05—366页。
- ⑬ 席泽宗、邓文宽《敦煌残历定年》,载《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总第12期,1989年,第12—22页。
- ⑭ 严敦杰《跋敦煌唐乾符四年历书》,载《中国古代天文文物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243—251页。

- ⑮ 邓文宽《跋吐鲁番文书中的两件唐历》，载《文物》1986年第12期，第58—62页；《敦煌古历丛识》，载《敦煌学辑刊》1989年第1期，第107—118页；《天水放马滩秦简〈月建〉应名〈建除〉》，载《文物》1990年第9期，第82—84页。
- ⑯ 见前揭邓文宽《跋吐鲁番文书中的两件唐历》。
- ⑰ 见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10页。
- ⑱ 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释文》，文物出版社，1985年，插页《元光元年历谱》（复原表）。
- ⑲ 转引自张培瑜《出土汉简帛书上的历注》，载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编《出土文献研究续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136页。
- ⑳ 张培瑜等《历注简论》，载《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84年第1期，第101—108页。
- ㉑ 可参：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编著《中国天文学史》，科学出版社，1981年；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天学》，科学出版社，1975年中译本；前揭施萍婷文。
- ㉒ 详见前揭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3册，第1659页。
- ㉓ 参见前揭邓文宽《敦煌古历丛识》；《敦煌文献 S. 2620 号〈唐年神方位图〉试释》，载《文物》1988年第2期，第63—68页。
- ㉔ 见前揭邓文宽《敦煌古历丛识》一文。
- ㉕ 见前揭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3册，第1666—1667页。
- ㉖ 见前揭邓文宽《天水放马滩秦简〈月建〉应名〈建除〉》一文。
- ㉗ 《史记·日者列传》：褚先生曰：“臣为侍郎，与太卜待诏为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时，聚合占家问之，某日可娶妇乎？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丛辰家曰大凶，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可证。
- ㉘ 参高国藩《敦煌古俗与民俗流变》，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11页。
- ㉙ 参前揭王重民《敦煌本历日之研究》第七至一〇节。
- ㉚ 《唐六典》卷二“吏部郎中员外郎”条、《唐会要》卷82《休假》条。
- ㉛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载《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50—252页。

敦煌残历定年

现存中国古代所用的历书,以 1973 年在山东临沂发现的元光元年(前 134 年)的历日为最早^①,它是写在竹简上的。写在竹简上的历日还有在此以前在西北地区先后发现的 15 份历日,它们分属于公元前 72 年,70 年,63 年,61 年,59 年,57 年,39 年,17 年,13 年,5 年和公元后 6 年,8 年,94 年,105 年,153 年^②。在此以后,从公元三世纪到七世纪的历本至今几未发现。接着就是写在卷子上保藏在敦煌石窟中的从晚唐到宋初的历本。这些历本的绝大部分于本世纪初被斯坦因(M. A. Stein, 1862—1943)和伯希和(P. Pelliot, 1878—1945)运到了伦敦英国博物馆(1972 年后改藏英国图书馆)和法国巴黎图书馆,保存在国内的已极少。对于这些历本,法国沙畹(E. Chavannes, 1865—1918)^③,中国王重民(1903—1975)^④,日本薮内清^⑤和藤枝晃^⑥都做过一些研究。尤其是藤枝晃,他不但收集了历本,而且将敦煌文献中有年、月、日的记载尽量录出,很有系统。不过,从施萍婷的最近研究^⑦来看,藤枝晃仍有遗漏和不妥之处。本文即在藤枝晃和施萍婷研究的基础上,就历日方面的已有成果予以列表概括,并就断定年代的方法予以详细论证。

中国古代所使用的历本,要比我们现在的月历、日历复杂得多,除给出年份、各月大小、闰月安排、日名干支、晦朔弦望、廿四节气、昼夜长短及日出入时刻等天文内容外,还有大量的关于各日吉凶、宜忌用事等

供占卜、选择用的事项,这些内容称之为“历注”。历注的内容由简到繁,而唐代一行(683—727)的《大衍历》是个转折点^⑧。敦煌发现的历本基本上在《大衍历》之后,都有历注,所以叫“具注历”。一份完整的具注历,不但有天文和星占学上的意义,而且有民俗学上的意义。可惜现在的历本大多残缺不全,有明确年份的很少。怎样由断简残编来确定该历本的年份,这大有学问,根据前人的不断摸索,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种方法:

一 有明确纪年,一望即知

例如,英国图书馆藏的 S. 1473 号卷子一开头写有“太平兴国七年壬午岁具注历日并序”,不用研究,即知此为 982 年历本。但将其序言中所记各月大小和由残存日历推知的朔日干支,与陈垣(1880—1971)《二十史朔闰表》中所载由当时中原所用的历法推得的朔日干支相比时发现,正、二、三、五、八、十、十一和闰十二月的朔日,敦煌历比中原历各早一日。在一年中,竟有三分之二的月份,其朔日不一致。而且不只一份如此。在有明确年代的 9 份卷子(A. D. 450 和 451, 922, 926, 956, 959, 981, 982, 986, 993)中,竟没有一份是和中原历完全吻合的!这是由于安史之乱(755—763)以后,中央政权对于这一地区,已是鞭长莫及,终于在 786 年沦入吐蕃之手。其后,848 年当地汉人豪族张议潮趁吐蕃内讫之机起兵与吐蕃对峙,并于 851 年成为归义军节度使,受唐封位;922 年张氏政权为曹议金所代,924 年受后唐册封,仍为归义军节度使。但此一时期在敦煌和长安之间有一西夏存在,张、曹政权好像孤岛一样存在于西部地区,和中央联系相对较少,且其政权也有相对独立性,他们所用的历本大多是根据中原历法在本地区编的,因而朔、闰往往稍有差异。

二 由年九宫决定年干支

在敦煌卷子 S. 2404 具注历中,不幸年份部分脱落,但在序言中有“九宫之中,年起五宫,月起四宫,日起二宫”,并绘有一图。为了研究方便,将此图重绘为图一,并加数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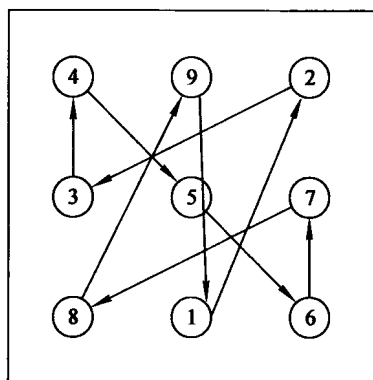
绿(4)	紫(9)	黑(2)
碧(3)	黄(5)	赤(7)
白(8)	白(1)	白(6)

图一

碧(3)	白(8)	白(1)
黑(2)	绿(4)	白(6)
赤(7)	紫(9)	黄(5)

图二

此图名九宫图,在汉朝已经有了。公元 133 年张衡(78—139)《请禁绝图讖疏》中就有“臣闻圣人明审律历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杂之以九宫,经天验道,本尽于此”^⑨一语。所谓“年起五宫”,是因为居中央的黄色,按数字编号为 5,数字与颜色的对应关系为:1 白,2 黑,3 碧,4 绿,5 黄,6 白,7 赤,8 白,9 紫。将每格的数字减 1,并换成其对应的颜



图三

色,即得次年的九宫图(图二);如此递减,可得九幅不同的九宫图。按图三移位办法,也可同样得到九幅不同的九宫图,这叫“太一行九宫”。

9 与 60 的最小公倍数为 180,故干支纪年与九宫纪年的关系为 180 年 1 个周期。又因 180 为 60 的 3 倍,故又有上、中、下三元甲子之称。若上元甲子年为一宫(即 1

白居中),则中元甲子年为四宫(4 绿居中),下元甲子年为七宫(7 赤居中),因 $9 \div 60$ 余 6, $1 + (9 - 6) = 4$, $4 + (9 - 6) = 7$ 。上、中、下三元九宫与干支的关系见表二。要利用表二,首先得知道第一个上元的年份。按照算命先生的说法,这要由天意来决定,它被定在隋仁寿四年(604)。往下推,1864 年为上元甲子,1924 年为中元甲子,1984 年为下元甲子。在本文所讨论的范围内,784—843 年属上元,844—903 年属中元,904—963 年属下元。如果有办法知道某一残历在哪一历元范围内,就可以用表二来断定其年代。S. 2404 残历上正好保存有“随军参谋翟奉达撰”字样。据向达(1900—1966)研究^⑩,翟奉达生于 883 年,902 年时他仅 20 岁,因此残历 S. 2404 应属于 904—963 年下元范围内。在此范围内,与九宫图 5 黄居中对应的年干支应为下列七者之一,3(丙寅),12(乙亥),21(甲申),30(癸巳),39(壬寅),48(辛亥)或 57(庚申)。

表一 干 支 表

	1	2	3	4	5	6	7	8	9	10
0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10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20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30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40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50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十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表二 年干支与九宫关系表

	括号内为中宫颜色数								
上 元	(1)	(9)	(8)	(7)	(6)	(5)	(4)	(3)	(2)
中 元	(4)	(3)	(2)	(1)	(9)	(8)	(7)	(6)	(5)
下 元	(7)	(6)	(5)	(4)	(3)	(2)	(1)	(9)	(8)
干支序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如果不能确定属于上、中、下哪一元,也可以利用表二,不过一个九宫图所对应的年干支就有 20—21 个之多,更难确定具体年份了。

三 由月九宫求年地支

部分具注历每月的开头,也有个九宫图。因为 $4 \times 9 = 3 \times 12$,故九宫图每九个月循环一次,三年完成一次大循环,第四年正月和第一年正月的九宫图一样。但三年只是以十二支命名的十二年的四分之一,故一个九宫图对应四个年地支。根据中国历法传统,以含有冬至的十一月建子之月为岁首,1 白居中宫,十二月建丑 9 紫居中宫,甲子年的正月建寅 8 白居中宫,这样,九宫图和年地支就有表三的关系。

从表三得知,S. 2404 中的“月起四宫”是错误的,只有“月起二宫”才能与“年起五宫”相吻合,所对应的年地支为寅、巳、申或亥。

表三 月九宫与年地支的关系

正月九宫图中宫颜色序号 Z1	年 地 支
8 白	子 卯 午 酉
5 黄	丑 辰 未 戌
2 黑	寅 巳 申 亥

设一年中第 n 月的月九宫图中宫的颜色为 Z_n , 正月中宫的颜色为 Z_1 , 则

$$Z_1 = Z_n + (n-1) \cdots \cdots (1)$$

其中 $n=2, 3, 4, 5 \cdots \cdots 9$, 十月可当作 1 月, 11 月可当作 2, 12 月可当作 3。因此, 只要知道任何一个月的九宫图, 就可求出相应的年地支。

四 由月天干求年天干

中国古时不仅以干支纪年, 自唐代起也以干支纪月。因为一年有十二个月(闰月无干支和九宫图), 故十二支与十二月的关系是固定的, 如正月建寅, 二月建卯, ……十二月建丑。因 $5 \times 12 = 6 \times 10$, 故月天干五年一循环, 每一月天干对应两个年天干, 在 S. 0612 背面有“五子元例正建法”说明这种关系, 其文曰:

甲、己之年丙作首, 乙、庚之岁戊为头; 丙、辛之年庚次第, 丁、壬还作顺行流; 戊、癸既从运位起, 正月直须向甲寅求。

1949 年以前算命先生所用的歌诀, 与此大同小异, 头两句完全一样, 后四句是“丙、辛必定寻庚起, 丁、壬壬位顺行流; 更有戊、癸何方觉, 甲寅之上好追求。”把这些歌诀用表格表示出来(见表四), 更一目了然。

表四 正月干支与年天干的关系表

正 月				
干支序数	干支			
3	丙	}寅	甲	己
15	戊		乙	庚
27	庚		丙	辛
39	壬		丁	壬
51	甲		戊	癸

设一年中第 n 月的干支序数为 gn , 正月干支序数为 $g1$, 则:

$$g1 = gn - (n-1) \cdots \cdots (2)$$

其中 $n=2, 3, 4, 5 \cdots \cdots 12$ 。因此, 只要知道任何一个月的干支, 就可用公式(2)和表一、表四求出其年天干。例如, S. 2404 中有“正月小, 建丙寅”, 由此得出其年天干为甲或己。将此结果与由第二种方法所得的七个干支结合来看, 只有一个甲申是共同的, 由此我们可以确认这份残历属后唐同光二年甲申岁, 即 924 年的历日。

五 朔 闰 对 比

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 将敦煌具注历中的朔日、闰月与陈垣《二十史朔闰表》中的朔日、干支对照时经常有一二日之差, 闰月对照时有一二月之差。但在用本文第二、三、四部分所述的方法求出其可能的年干支后, 仍可用这个办法寻找其最佳吻合者, 确定其年代。例如, 抄在 S. 1439 背面的历日, 残存正月初一日到五月二十四日的部分, 由正月建甲寅, 知年天干为戊或癸, 以此与晚唐至宋初期间戊、癸年的朔闰干支对比, 蔡内清和藤枝晃都把它断为唐大中十二年戊寅岁(858), 虽然此历闰正月比《二十史朔闰表》中闰二月早一月, 五月朔迟一日。

六 星 期 对 比

中国古代不用星期制度,惟独这一段时间用,常常将星期日用红颜色的“蜜”字注出。据 S. 2404 序言中的“推七曜直用日吉凶法”,当时七曜的名称为:第一“蜜”,太阳直日;第二“莫”,太阴直日;第三“云汉”,火星直日;第四“啗”,水星值日;第五“温没斯”,木星直日;第六“那颡”,金星直日;第七“鸡缓”,土星直日。759 年在华印度僧人不空(Amoghavajra)译的《宿曜经》称这些名词为胡语。1913 年沙畹和伯希和考证^①,认为这里所说的胡人系指住在西域康居国(今苏联乌兹别克共和国撒马尔罕一带)说索格底(Sogdian)语的民族。这七个名词的索格底语是 Mir, Map, Wipan, Tir, Wrmzt, Nagit, Kewan, 发音与 S. 2404 中的相近,不过最近也有人认为,这些名词来源于波斯语, Mi 即 Mithras 的第一个音节^②。

索格底、希腊、罗马、波斯的星期日制度都有一个共同起源,均以公元元年 1 月 1 日为星期日,这一天相当于汉元寿二年十一月十九日。根据这一事实,陈垣在《二十史朔闰表》中也附载了《日曜表》,可以用来查考中国历史上的某日属星期几。在可能的年份知道以后,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表来确定残历的具体年代。例如, S. 1439 上的历日, 蕞内清和藤枝晃用方法(四)和(五)定为 858 年;我们又在二月二日上发现一“蜜”字,用陈垣的表一查, 858 年二月初二日果然是星期日,进一步确认了他们二人的断定是正确的。

七 利 用 年 神 方 位 定 年 干 支

最近出版的陈遵妣《中国天文学史》第三册第七编第三章中有岁德方位、金神方位和年天干的关系,太岁等年神方位和年地支的关系,现

将其稍作修正,转录如下(见表五、六):

S. 2404 残历中有“今年岁德在甲”,“今年太岁在申,太阴在午……”等记载,由此亦可得出此年为甲申,与由方法(二)、(四)所断定者一致。

最后,我们再举综合运用以上几种方法的一个例子,作为本文的结束。在罗振玉《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中刊有正月二十八日至二月十二日不足一月的一段历日,看看如何决定它的年份。

1. 由二月九宫图 1 白居中,根据方法(三)得知正月为二黑居中,年地支为寅、巳、申或亥;

2. 由二月建丁卯,根据方法(四)得知正月建丙寅,年天干为甲或己;

3. 将方法(二)和(一)结合,利用表一可得年干支为甲寅,甲申,己巳或己亥;

4. 将历中的“正月大,癸亥朔”,“二月小,癸酉朔”,以及由此推出的三月壬寅朔,与陈垣《二十史朔闰表》中晚唐至宋初一段中甲寅、甲申、己巳、己亥之年这两个月的朔日干支进行对比,发现与后晋天福四年己亥岁(939)的一致;

5. 在二月初三、初十、十七这三天的顶部注有红色“蜜”字,将之与陈垣书中 939 年的《日曜表》进行对比,果然也是吻合的,从而我们可最后断定这份最短的残历属于 939 年。

表五 太岁等年神方位和年地支的关系

年地支 年神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1. 太岁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2. 太阴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3. 大将军	酉	酉	子	子	子	卯	卯	卯	午	午	午	酉
4. 黄幡	辰	丑	戌	未	辰	丑	戌	未	辰	丑	戌	未
5. 豹尾	戌	未	辰	丑	戌	未	辰	丑	戌	未	辰	丑
6. 岁杀	未	辰	丑	戌	未	辰	丑	戌	未	辰	丑	戌

(续表)

年地支 年神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7. 岁 刑	卯	戌	巳	子	辰	申	午	丑	寅	酉	未	亥
8. 岁 破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9. 奏 书	乾	乾	艮	艮	艮	巽	巽	巽	坤	坤	坤	乾
10. 博 士	巽	巽	坤	坤	坤	乾	乾	乾	艮	艮	艮	巽
11. 力 士	艮	艮	巽	巽	巽	坤	坤	坤	乾	乾	乾	艮
12. 蚕 室	坤	坤	乾	乾	乾	艮	艮	艮	巽	巽	巽	坤
13. 蚕 官	未	未	戌	戌	戌	丑	丑	丑	辰	辰	辰	未
14. 蚕 命	申	申	亥	亥	亥	寅	寅	寅	巳	巳	巳	申
15. 丧 门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16. 白 虎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17. 官 符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18. 病 符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19. 死 符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20. 劫 杀	巳	寅	亥	申	巳	寅	亥	申	巳	寅	亥	申
21. 灾 杀	午	卯	子	酉	午	卯	子	酉	午	卯	子	酉
22. 大 杀	子	酉	午	卯	子	酉	午	卯	子	酉	午	卯
23. 飞 鹿	申	酉	戌	巳	午	未	寅	卯	辰	亥	子	丑

表六 岁德等年神方位和年天干的关系

年天干	岁德方位	金神方位
甲, 己	甲	午, 未, 申, 酉
乙, 庚	庚	辰, 巳
丙, 辛	丙	子, 丑, 寅, 卯, 午, 未
丁, 壬	壬	寅, 卯, 戌, 亥
戊, 癸	戊	子, 丑, 寅, 酉

就像这个例子一样,我们将至今所收集到的 39 项材料一一做了研究,现将结果按年代顺序汇总在表七中。

表七 敦煌历日年表

序号	帝王纪年	干支 纪年	公元	资料来源	现存内容	编写者	朔闰情况	方法	备 注
△1	北魏太平 真君十一年	庚寅	450	《大陆杂志》第 1卷9期苏莹辉 文	1~12月		相同	a	藤、施未著录
2	北魏太平 真君十二年	辛卯	451	同上	1~12月		同上	a	同上
	吐蕃占领 时期								
3	唐元和三年	戊子	808	S-Tib. 109(残)	4:12—6:1		朔各早一日	d+e	F.
4	唐元和四年	己丑	809	P. 3900 背(残)	4:11—6:6		闰4S+1,6S-1	e	S
5	唐元和十 四年	己亥	819	S. 3824(残)	5:18—6:9		5S,7S-1	d+e	藤误为 876
6	唐长庆元年	辛丑	821	P. 2583(残)	2:28—4:1		相同	e	Ff1+St14
7	唐大和三 年	己酉	829	P. 2797 背(残)	11: 22— 12: 5		S12-1	a+e	藤、施均著录, 照片 ⁴
8	唐大和八年	甲寅	834	P. 2765(残)	1:1—4:7		1S,4S-1,11S+1	a+e+f	Ff2+St15
	张氏政权 时期								

(续表)

序号	帝王纪年	干支纪年	公元	资料来源	现存内容	编写者	朔闰情况	方法	备注
9	唐大中十一年	戊寅	858	S. 1439 背(残)	1: 1—5: 24		5S+1, R-1	d+e+f	Ff+Y3+S16
10	唐咸通五年	甲申	864	P. 3284 背(残)	1: 1—5: 21		相同	d+e+f	S17
11	唐乾符四年	丁酉	877	S-P. 6(残)	2: 11—12: 30		相同	a+c+d+e+f	Ff4
12	唐中和二年	壬寅	882	S-P. 10(残)	只剩标题				Ff5, 来自成都
13	唐光启四年	戊申	888	P. 3492(残)	9: 7—11: 29		9S, 11S+1	d+e	S18
14	唐大顺元年	庚戌	890	L. 3(残)	2: 1—2: 4		8S+1	d+e	Ff6+S19
15	唐景福元年	壬子	892	P. 4983(残)	11: 29—12: 30	王文君书	11S+1	d+e	S120
16	唐景福二年	癸丑	893	P. 4996 + P. 3476(残)	4: 17—12: 29	吕定德写	R+1; 6S, 闰6S, 7S, 9S, 11S, 12S+1, 8S, 10S+2	d+e+f	Ff7+S121
17	唐乾宁二年	乙卯	895	P. 5548(残)	3: 4—10: 7		3S, 5S, 7S+1, 8S-11S+2	e+d+f	S122
18	唐乾宁四年	丁巳	897	P. 3248(残)	3: 6—8: 10		1S, 2S+1	e+d+f	Ff+S123

(续表)

序号	帝王纪年	干支 纪年	公元	资料来源	现存内容	编写者	朔闰情况	方法	备 注
19	唐乾宁四 年	丁巳	897	L. 4(残)	1:1—4:29		1S, 2S+1	d+e	F. 罗误为 990
20	唐天复五 年	乙丑	905	P. 2506(残)	1:1—2:18		1S+2, 2S+1	d+e	St24
	曹氏政权 时期								
△21	后梁贞明 八年*	壬午	922	P. 3555(残)	1:2—5:26		2S-1	a	St5
22	后梁龙德 三年**	癸未	923	P. 3555B14 (残)	10:1—12: 30		10S+2, 11S, 12S+1	d+e	藤、施未著录, 照片 5
23	后唐同光 二年	甲申	924	S. 2404(残)	1:1—1:4	翟奉达编	1-3S, 11S+ 1; 7S, 9S-1	b+c+ d+e+f+ g	Ff9+St25
△24	后唐同光 四年	丙戌	926	3247 背 + L1 (全)	全 年	翟奉达编	R+1, 2S, 4S, 6-8S, 10-11S -1; 9S, 12S-2	a	Ff10+W+ St6

(续表)

序号	帝王纪年	干支 纪年	公元	资料来源	现存内容	编写者	朔闰情况	方法	备 注
25	后唐天成 三年	戊子	928	向达书 438 页 (残)	只有序言	翟奉达编		a	F
26	后唐长兴 四年	癸巳	933	S. 0276(残)	3: 10—7: 13		7S+1	c+d+e +f	Ff11 + Y2 + St26
27	后晋天福 四年	己亥	939	L. 2(残)	1: 28—2: 22		3S—1	c+d+e +f	F+St27
28	后晋天福 九年	甲辰	944	P. 2591(残)	4: 8—6: 1		5—7S+1	c+d+e +f	Ff12+St28
29	后晋天福 十年	乙巳	945	S. 0560(残)	只留标题			a	F
30	后晋天福 十年	乙巳	945	S. 0681 背(残)	1: 1—2: 12		8S+1	b+c+ d+e+f	Ff13 + Y1 + St29
△31	后周显德 三年	丙辰	956	S. 0095(全)	全 年	翟奉达编	1—3S, 10S, 12S—1; 8S+1	a	Ff14+St7
△32	后周显德 六年	己未	959	P. 2623(残)	1: 1—1: 3	翟奉达编	2S + 1; 6S, 8S—1	a	Ff15+St8

(续表)

序号	帝王纪年	干支纪年	公元	资料来源	现存内容	编写者	朔闰情况	方法	备注
33	宋太平兴国三年	戊寅	978	S. 0612(残)	只留标题和序言	王文坦编		a	Ff16
△34	宋太平兴国六年	辛巳	981	S. 6886 背(全)	全年		1S-1, 6S, 8S, 9S+1	a	Ff17+S19
△35	宋太平兴国七年	壬午	982	S. 1473 + S. 11427BV(残)	1:1-5:6	翟文进编	1-3S, 5S, 8S, 10S, 11S, 12S-1	a	Sf18+S10
△36	宋雍熙三年	丙戌	986	P. 3403(全)	全年	安彦存编	2S, 6S, 7S, 12S-1	a	Ff19+S11
37	宋端拱二年	己丑	989	S. 3985(残)	只留标题			a	
38	宋端拱二年	己丑	989	P. 2705(残)	10: 18-12: 29		11S, 12S+1	c+d+e+f	Ff20+S13
△39	宋淳化四年	癸巳	993	P. 3507(残)	1:1-3:23		R+1, 4S-1, 8S, 10S, 11S, 11S, 12S+1	a	Ff21+S12

* 后梁于贞明七年五月朔已改年号为龙德, 所谓贞明八年即龙德二年, 敦煌与中原交通不便, 不知梁已改元, 仍用贞明。

** 此件为双栏书写, 现仅存上半部分。

在表七第五栏中,S. 表示斯坦因收藏,P. 表示伯希和收藏,L 表示罗振玉收藏,“背”表示写在卷子的背面。第六栏“4:12—6:1”表示残存4月12日至6月1日的历日。第八栏S表示朔,R表示闰,“-1”表示敦煌历比中原历早一日或一月,“+1”表示迟一日或一月。第十栏F表示藤枝晃,Ff表示藤文照片;S表示施萍婷,St表示施文中的表,Y表示藪内清,L表示罗振玉,W表示王重民。序号前加“△”者表示原件有明确的纪年。此外,第4、5、6、15、20诸件,因原历提供条件太少,所定年代可信度较低,暂作如此断定,有待进一步研究。

(与席泽宗先生合撰,原载《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

总第12期,1989年,第12—22页)

注释:

- ① 陈久金、陈美东《临沂出土汉初古历初探》,《文物》1974年第3期,第59—68页。
- ② 陈梦家《汉简年历表叙》,《考古学报》1965年第2期,第103—149页。
- ③ E. Chavanes; Documents Chinoiseses Decouvertes Par A. Steiu, Paris, 1913.
- ④ 王重民《敦煌本历日之研究》,《东方杂志》,1937年三十四卷九期,第13—20页。
- ⑤ 藪内清《斯坦因敦煌文献中的历书》,《东方学报》(京都版),1964年,第35期,第543—549页。又见《中国的天文历法》,第192—201页,东京平凡社,1969年。
- ⑥ 藤枝晃《敦煌历日谱》,《东方学报》(京都版),1973年第45期,第377—441页。
- ⑦ 施萍婷《敦煌历日研究》,1983年8月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暨学术讨论会上的报告,已收入此次会议论文集。
- ⑧ 张培瑜等《历注简论》,《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84年第1期,第101—108页。
- ⑨ 《后汉书》卷59《张衡传》。
- ⑩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第437—439页,三联书店,1957年。
- ⑪ E. Chavanes and P. Pelliot; Un Traite Manicheen Retrouve en China, Jour-

nal Asiatique; II^ève, t1, P. 162, 1913.

- ⑫ Ho Peng Yoke:《Li, Qi and Shu》(An Introduction to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P. 163,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5.

敦煌古历丛识

敦煌文献中存北魏至宋初历书五十余件,自面世以来,中外学人就不断刻意研讨。我国最早研究敦煌历书者当推罗振玉,但他未能解决定年方法,故时有错误。其后王重民先生于1937年发表《敦煌本历日之研究》^①,虽多有发明,但也未能解决定年方法问题。直至1964年,日本天文学史专家藪内清教授发表《斯坦因敦煌文献中的历书》^②,首次将敦煌历日的定年方法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1973年藤枝晃教授发表《敦煌历日谱》^③长文一篇,就是利用藪内清的方法对敦煌历日逐件定年。近年来,我国学者施萍婷先生发表《敦煌历日研究》^④一文,在藤枝氏基础上又有新进展,并纠正了前人的某些错失。对于敦煌古历的定年方法和依据,施先生作了比藪内清和藤枝晃更为详细的解说,笔者受益良多。1989年,席泽宗教授与笔者合撰《敦煌残历定年》^⑤一文,补充了利用年神确定年地支的方法^⑥。就定年方法论,虽可能还有新术,但利用已有的研究成果,即可对敦煌残历的多数定出准确年代,殆无疑义。如今面临的新问题是,应当深入探索敦煌历日的内容,以便进一步认识其价值。近年来,由于笔者担负着《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天文历法专辑》的校辑工作,迫使我必须深入历日内容本身,逐日逐字检核。饮甘茹苦之后,虽然仍有一些内容未获确解,但对其大部分内容已有了认识。在整理过程中,深感有不少问题值得研讨。这些问题如能认识清楚,不仅对校读敦煌历日,且对认识吐鲁番文书乃至秦汉

简牍中的历日都有裨益，并可逐步摸清其渊源流变。现将部分札记汇集成篇，期望有识及同好者指正。

一 九 宫 图 形

九宫又称九星术、九宫算，是把《洛书》方阵的各数，加上颜色名称，分配在年、月、日、时，再考虑五行生克，用以鉴定人事吉凶的方法。敦煌历日中，一般只有年九宫和月九宫，日九宫偶尔在历日序言中提及，不具注于各日之下，与时相配的九宫则未见到。年九宫放在历日序中，与年神方位图画在一起，月九宫放在每月之首。近年法国学者矛甘(MORGAN)发表了《敦煌写本中的九宫》^⑦一文，可知西人于此也有同好者。

九宫起源甚古，马王堆帛书中就有一件，李均明先生曾向笔者见示。其基本图形是五居中央。汉·徐岳《数述记遗》云：“九宫算，五行参数，犹如循环。”甄鸾注：“九宫者，即二四为肩，六八为足，左三右七，戴九履一，五居中央。”绘成图形就是：

四	九	二
三	五	七
八	一	六

若换以八卦，即如下图：

巽	离	坤
震	中	兑
艮	坎	乾

据天文学史专家陈遵妫先生的意见，至唐代，九宫始以颜色来代替^⑧，即一白，二黑，三碧，四绿，五黄，六白，七赤，八白，九紫。因此，九

宫基本图形又可换成颜色如下图：

绿	紫	黑
碧	黄	赤
白	白	白

敦煌历日中九宫图形最常见的表示方法就是用颜色，只是在历日序的文字中才说“今年年起×宫，月起×宫”，这×是用数字表示的，其对应的颜色见上图。因此，只要掌握了每宫的颜色，就可立即将数字换成颜色，反之也是一样。掌握了它同八卦的对应关系，也可立即将颜色和数字换成八卦。

九宫颜色所主吉凶，P. 3403《宋雍熙三年丙戌岁具注历日一卷并序》序中有《三白诗》一首，文曰：“上利兴功紫白方，碧绿之地患痈疮。黄赤之方遭疾病，黑方动土主凶丧。五姓但能依此用，一年之内乐堂堂。”其意大略如此。

年九宫的起算点是以隋仁寿四年上元甲子(604)为坎一，之后以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的次序倒转，依次下排。掌握了这个规律，我们就可在历史年表上添上该年的九宫，使用起来极为方便。需要注意的是，这样添出的仅是该年的中宫数字，其余八宫数字及颜色详见陈遵妣先生《中国天文学史》第三册第 1656 页，这里不再画出。

同样，正月九宫的排列也有其严格规律，其规律来源可参前揭施萍婷文。正月九宫的连续性是 8、5、2、8、5、2、8、5、2，……也是从隋仁寿四年(604)开始。这样，也可以在一份年表上逐年添上它的正月九宫之中宫数。结合前述所添的年九宫之中宫，我们随时即可获知该年的年九宫和月九宫。

九星术虽纯属迷信说教，但年九宫、每月九宫同该年地支却有固定对应关系。日本学者数内清教授正是利用这一对应关系找出了确定敦

煌残历地支的方法;施萍婷先生的解说更为详细,不过她是将两表分开的,我现在把两表合并起来,绘成简表如下,以便研究者检核使用:

年九宫、正月九宫与年地支对应关系表

年九宫(中宫)	正月九宫(中宫)	对应年地支
一、四、七	八	子、卯、午、酉(仲年)
二、五、八	二	巳、亥、寅、申(孟年)
三、六、九	五	丑、未、辰、戌(季年)

当然,敦煌历日多数是断简残编,除年九宫画在历日序中且多已残失外,正月九宫也很少能直接见到。但是我们知道,无论年九宫,还是月九宫,其排列都是从九至一倒转的,因此,知道残历某月九宫,便可反推出正月九宫,然后找出年地支范围。假如某历残存六月以后,六月为六宫,则其前五月为七宫,四月为八宫,三月为九宫,二月为一宫,正月为二宫,正月二宫对应的年地支是巳、亥、寅、申,这便是该历的年地支范围。再依据正月建寅找出年天干,以及月朔、蜜日注等条件,便可定出该历的准确年代来。

敦煌历日中的九宫图,除绝大多数是以表示颜色的字画出外,还有直接用颜色绘成的,斯坦因编号 P. 6《唐乾符四年丁酉岁历日》^⑨,每月九宫图,内部用表示颜色的字,外圈便配以对应的颜色;S. 2620《唐年神方位图》^⑩,现存部分是唐大历十三年(778)至建中四年(783)共六年的年神方位图,其年九宫也配以相应的颜色,两件均堪称图文并茂,只是在黑白照片上不能完全反映出来,致使研究者往往弄错。由是亦知,年九宫和月九宫图,在敦煌历日中共有三种表示方法,一是数字,二是表示颜色的字,三是直接用各种颜色涂成,其中以第二种居多。

二 干支五行与六十甲子纳音

敦煌历日有明确纪年者,常在历日题名之下注明该年干支五行与

甲子纳音。如 P. 3403 前题：“雍熙三年丙戌岁具注历日一卷并序，干火支土纳音土”；S. 1473 前题：“太平兴国七年壬午岁具注历日并序，干水支火纳音木。”又历日每日干支之下也有纳音，如 S. 1473 正月一日是“一日癸巳水定”，这个“水”即是该日干支“癸巳”的纳音。

六十甲子纳音，本是以六十甲子配上五音（宫、商、角、徵、羽），五音又可与五行相配，于是便用五行代五音。其配合方法，清儒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纳音说》解释甚详，陈遵妫先生《中国天文学史》第三册第 1647 页注③也有简略的说明，兹不赘述。我曾将钱氏《纳音说》的文字改绘成表，与敦煌历日对照，除个别抄错者外，几乎无一不合。至于干支与五行的配合关系，陈著第 1652—1653 页也有列表说明。为便于使用，现将钱、陈二氏之说合为一表如下：

六十甲子纳音表(附干支与五行对应关系)

甲木 子水 (金)	乙木 丑土 (金)	丙火 寅木 (火)	丁火 卯木 (火)	戊土 辰土 (木)	己土 巳火 (木)	庚金 午火 (土)	辛金 未土 (土)	壬水 申金 (金)	癸水 酉金 (金)
甲木 戌土 (火)	乙木 亥水 (火)	丙火 子水 (水)	丁火 丑土 (水)	戊土 寅木 (土)	己土 卯木 (土)	庚金 辰土 (金)	辛金 巳火 (金)	壬水 午火 (木)	癸水 未土 (木)
甲木 申金 (水)	乙木 酉金 (水)	丙火 戌土 (土)	丁火 亥水 (土)	戊土 子水 (火)	己土 丑土 (火)	庚金 寅木 (木)	辛金 卯木 (木)	壬水 辰土 (水)	癸水 巳火 (水)
甲木 午火 (金)	乙木 未土 (金)	丙火 申金 (火)	丁火 酉金 (火)	戊土 戌土 (木)	己土 亥水 (木)	庚金 子水 (土)	辛金 丑土 (土)	壬水 寅木 (金)	癸水 卯木 (金)
甲木 辰土 (火)	乙木 巳火 (火)	丙火 午火 (水)	丁火 未土 (水)	戊土 申金 (土)	己土 酉金 (土)	庚金 戌土 (金)	辛金 亥水 (金)	壬水 子水 (木)	癸水 丑土 (木)
甲木 寅木 (水)	乙木 卯木 (水)	丙火 辰土 (土)	丁火 巳火 (土)	戊土 午火 (火)	己土 未土 (火)	庚金 申金 (木)	辛金 酉金 (木)	壬水 戌土 (水)	癸水 亥水 (水)

此表每格左边为干支,右边为该干支对应的五行,下面中间括弧中的字为该干支的纳音。如第二行第一栏干支为“甲戌”,对应的五行是“干木支土”,纳音为“火”,合在一起就是“干木支土纳音火”。其余同此。以此检查 P. 3403《宋熙三年丙戌岁具注历日一卷并序》,该年干支为“丙戌”,下注“干火支土纳音土”,完全对应;太平兴国七年历也相合不悖。

当然,并非所有敦煌历日的干支五行和甲子纳音均正确无误。如 P. 2765,与上表对照,该年干支为“甲寅”,则五行和纳音应是“干木支木纳音水”,可是该历第六行却记为“今年干木支火纳音水”,可知“火”字乃“木”字之误。此表还可用于识读出土历日的工具。《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五册第 231—235 页收一件《唐历》^⑩,第 10 行原编者释为“廿六日甲戌土□”,与表对照,知“土”乃“火”之误释。

利用此表还可将历日的某些残字补齐。P. 3555(背)前题“贞明八年岁次壬午具注历日一卷并序,节度押衙□□□□干水□□□□”,表中“壬午”为“干水支火纳音木”,则“干水”二字下当补“支火纳音木”五字。

六十甲子纳音,敦煌文献中存四件,编号为:S. 1815(2)、S. 3724(3)、P. 3984 背和 P. 4711。但编目者不详其意,题作“干支配合歌诀(拟)”或“干支五行配属表”,颇涉望文生义。这四件的内容大同小异,均是“甲子乙丑金,丙寅丁卯火”等等,全是六十甲子与纳音的关系,而不是干支与五行的配合关系,故应题为“六十甲子纳音”。

三 建除十二客

建除十二客是以建、除、满、平、定、执、破、危、成、收、开、闭十二字配于历日每日之下,各主一定吉凶。P. 2765《甲寅年历日》序云:“除、

平、定、成、收、开、闭，次吉日；……建、满、执、破、危……亦须避会（讳），吉。”即其意之一解。

不过，建除十二客与纪日干支间却无固定配属关系，而是按另外的规律排列的。其主要排列特点是，“立春正月节”后之“寅”日为“建”，由此开始下排，概因古历正月建寅也。然后每逢节气（非中气）之日即须重复前日一次；如上引 P. 2765《甲寅年历日》二月廿日为“开”，廿一日为“青（清）明三月节”，则此日仍为“开”，廿二日才作“闭”。由于有此排列规律，故形成了“建”字与各“月”（指星命家的月份，详下节“迷信历注的月份”）纪日地支间的对应关系如下：

星命家的月份	“建”字对应的纪日地支
正月（立春——惊蛰前一日）	寅
二月（惊蛰——清明前一日）	卯
三月（清明——立夏前一日）	辰
四月（立夏——芒种前一日）	巳
五月（芒种——小暑前一日）	午
六月（小暑——立秋前一日）	未
七月（立秋——白露前一日）	申
八月（白露——寒露前一日）	酉
九月（寒露——立冬前一日）	戌
十月（立冬——大雪前一日）	亥
十一月（大雪——小寒前一日）	子
十二月（小寒——立春前一日）	丑

概而言之，建除十二客的排列特点主要有二：一是节气之日重复前一日，二是“建”字与各“月”纪日地支间有固定对应关系，而与纪日天干

无涉。掌握了这个规律,再去检查敦煌历日,就会发现,除个别抄错者外,基本正确无误。

以上建除十二客的两大特点对我们认识古历颇有帮助。下举二例以见一斑。《流沙坠简·术数类·永元六年历谱》简面载“十六日戊辰平□;十七日己巳平□八魁”。十六、十七日建除十二客均作“平”。王国维考证云:“简上十六日戊辰平之平当作满,缮写之讹字也。”^⑩按,该历前云“十二月大,一日癸丑建大□”,一日为建,则十三日仍为建,十四日为除,十五日为“满”,十六日焉能再作“满”?质言之,十六、十七日均当作“平”,原简无误,且十七日是节气之日(当是立春正月节),故重复前一日,而非“缮写之讹字。”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五册第231—235页《唐仪凤四年具注历日》断片,“廿一日己巳木开”,以下至卅日共九日残建除十二客。第15行上部存“土危”二字,日期干支缺失。假设这是一件连续书写的历日,我们由第22行某月八日“处暑七月中”即知“立秋七月节”在此前十五日多(唐代仍用平气,每气间隔15.218425日),当在第七行“廿三日辛未土□”之下。廿一日为“开”,廿二日则当为“闭”。廿三日既是节气所在之日,则仍作“闭”。以下廿四日建,廿五日除,廿六日满,廿七日平,廿八日定,廿九日执,卅日破,下月一日当作“危”,残历15行有“土危”二字,正相衔接。由建除十二客即可判断残历的连续性。再考以残存的纪日地支和六十甲子纳音,完全可以证实这段历日是连续书写的。我在《跋吐鲁番文书中的两件唐历》一文中已作过详细考述,不再赘论。

又由推得廿四日建除十二客为“建”,该日干支为“壬申”,“建”与“申”对应,由前述“建”字与各“月”纪日地支间的对应关系,即可获知这段历日是在立秋七月节和白露八月节之间,进而考知其月份,亦详前揭拙文。

建除十二客也有与年份相配的，见于 S. 2620《唐年神方位图》，仅存连续六年。由于资料太少，我们还难以确知它与年份配合的方法以及它在这种情况下的排列规律。

总之，建除十二客虽属古代方士的无稽之谈，但只要掌握其排列规律，在校补及判断古历月份时仍不失为一有效手段。

四 迷信历注的“月份”

陈遵妫先生在《中国天文学史》第三册第 1647 页注⑤说，建除十二神的“循环排列是每逢一个月的开始重复一次，这里所谓一个月的开始是指算命家的月，即从节气起算”。其实，不仅建除十二客，敦煌历日中大量的迷信历注都是按算命家的“月”来排列的。历日逐日吉凶注最常见的一些迷信项目如九焦、九坎、天李、地李、血忌、归忌、天门、天尸、煞阴、大败、天火、地火、复日、重日、不将日、地囊等等，其排列起点均是按算命家的“月”计算的。以天李为例，正月在“子”日，这个正月即由“立春正月节”那天开始；二月在“卯”日，二月即由“惊蛰二月节”那天开始。若按通常所说的正、二、三月等去检核，势必大乱，也无法找出其对应关系并判断正误。这是我们整理古历时必须记在心里的一项知识。同时，二十四节气中，十二为节气，十二为中气，算命家的“月”由节气而不由中气起算，也是不容混淆的。十二个节气是：立春、惊蛰、清明、立夏、芒种、小暑、立秋、白露、寒露、立冬、大雪、小寒；十二个中气是：雨水、春分、谷雨、小满、夏至、大暑、处暑、秋分、霜降、小雪、冬至、大寒。

五 男女九宫

清《钦定协纪辨方书》卷三十五《男女九宫》条引《三元经》曰：“九宫

建宅，男命上元甲子起坎一，中元甲子起巽四，下元甲子起兑七，逆行九宫。女命上元甲子起中五，中元甲子起坤二，下元甲子起艮八，顺行九宫。”陈遵妫先生《中国天文学史》第三册第1637页注①曰：“男宫逐年减一，一之后为九；女宫逐年加一，九之后为一。男宫循环的起点，在女宫一循环的中央，反之，也是一样。”排列结果，陈先生的推算方法与上引《钦定协纪辨方书》相同。

但是，敦煌古历所记男女九宫的推算方法与以上所说略异。

S. 612《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应天具注历日》之《六十相属宫宿法》云：“一岁戊寅土，太平兴国三年，男二宫，女一宫。”

S. 1473《宋太平兴国七年壬午岁(982)具注历日》序云：“今年生男起七宫，女起五宫。”

P. 3403《宋雍熙三年丙戌岁(986)具注历日》序云：“今年生男起三宫，女起九宫。”

以上三历，以太平兴国三年为最早。若以该年“男二宫”为起点，逆行九宫（即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则太平兴国七年适得“男起七宫”，雍熙三年适得“男起三宫”；若以太平兴国三年“女一宫”为起点，顺行九宫（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则太平兴国七年适得“女起五宫”，雍熙三年适得“女起九宫”；因此，这三份历日男女九宫并无矛盾。

星命家所说的上元、中元、下元，概以隋仁寿四年甲子岁(604)为上元，664年为中元，724年为下元，784年又为上元，以此循环，往复不绝。至宋太祖乾德二年(964)又是上元甲子。我们以太平兴国三年“男二宫，女一宫”反推回去，则乾德二年上元甲子岁为男七宫，女五宫；再往上推，可得唐天复四年下元甲子(904)男四宫，女八宫；唐会昌四年中元甲子(844)男一宫，女二宫。继续推至隋仁寿四年上元甲子，中间男女九宫与此均同。

以上推算结果,还可同斯坦因编号 P. 6《唐乾符四年丁酉岁(877)具注历日》中的《六十甲子宫宿法》相印证。在那里,唐兴元元年(784)为上元甲子,男起七宫,女起五宫;会昌四年(844)为中元甲子,男起一宫,女起二宫;再往下排,也能得出唐天复四年(904)下元甲子为男起四宫,女起八宫,同上述推算结果完全相合。

由此可知,男女九宫的推算方法,在现存敦煌历日中,上元甲子为男七宫,女五宫,中元甲子为男一宫,女二宫,下元甲子为男四宫,女八宫。比较《三元经》所记,女宫推算方法相同,男宫则整个提前了一个甲子。上面证引的敦煌历日文献,前后相距二百余年,既有中原王朝的历日,也有敦煌本地的历日,但男女九宫排列法却十分一致,很有条贯。《三元经》和敦煌历日的男女九宫法何者为是,仍需研究。

六 始 耕 即 籍 田

籍田是古代封建帝王的一项重要礼仪,以示率先于农,倡导天下崇本。其礼仪沿革,《通典》卷四十六、《初学记》卷十四均有详载。至其称谓,《初学记》云:“凡称籍田为千亩,亦曰帝籍,亦曰耕籍,亦曰东耕,亦曰亲耕,亦曰王籍。”惟独不记称作“始耕”。

《通典》云:“(汉)章帝元和中,正月北巡,耕于怀县。其《籍田仪》:正月始耕,常以乙日;……是月令郡国守皆劝人始耕。”可知,远在东汉时始耕就是籍田的同义词,并著于仪注。敦煌所出《北魏太平真君十二年(451)历日》云:“正月小。一日丙戌成,二日始耕。”^⑬吐鲁番出土一件《高昌章和五年(535)取牛羊供祀帐》,内载:“章和五年乙卯岁正月日,取严天奴羊一口,供始耕”;旁添小字一行:“辰英羊一口,供始耕,合二口。”^⑭可知北魏和魏氏高昌也将籍田称作始耕。

《魏书》卷二《太祖纪》记道武帝拓跋珪于“天兴三年……二月丁亥,

诏有司祀日于东郊，始耕籍田。”“始耕”与“籍田”并称。《通典》卷四十六记为：“后魏太(道)武帝天兴三年(400)春，始躬耕籍田，祭先农用羊一。”由是又知，“始耕”之本意即皇帝“始躬耕籍田”，而且北魏是用羊祭祀先农。同时看出，北魏始耕用羊祭祀先农历史颇久，且一直影响到魏氏高昌，为前引章和五年取牛羊供祀帐(同账)所证实。

七 北魏避讳改干支

敦煌和吐鲁番所出历日，有些干支改“丙”为“景”，是为避唐先祖“李昞”名讳而改，故断为唐代或后唐是不会有什麼错误的，且为人所熟知。其实，因避讳而改干支北魏时就已有过。北魏道武帝名拓跋珪。“珪”与天干之“癸”同音，故北魏曾改“癸”为“水”，且为西魏所沿用。S. 613《西魏大统十三年计帐文书》有如下记载：

刘文成户：“息女黄口，水亥生，年件，小女。”

侯老生户：“户主侯老生，水酉生，年件拾件，白丁。”

其天婆罗门户：“息男归安，水丑生，年拾件，中男。”

邓(?)延天富户：“母白乙升，水亥生，年陆拾伍，死。”

以上四例干支中的“水”，原本均作“癸”，皆因避讳“珪”而改之。

前引敦煌所出《北魏太平真君十二年(451)历日》内云：“七月大，一日水未”，“八月大，一日水丑”，显然，这两个“水”字也是改“癸”而成的。

陈垣先生《史讳举例》搜罗宏富，成为治史之必备工具。在该书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名下仅举“上邽县改上封”，^⑤而未举出改干支的实例，故补记如上，以备参考。

八 年神方位与月神方位、日期

完整的敦煌历日序言中,往往开列数十种年神名称及其所在方位,是与本年纪年地支相对应的(部分与天干对应),如 P. 3403《宋雍熙三年丙戌岁具注历日一卷并序》云:“今年太岁在丙、戌,大将军在午,太阴在申,岁刑在未”等等。其各月月序中则详列月神名称及其所在方位、日期,如同历正月云:“自去旧(按:旧字衍)年十二月十八日立春,已得正月之节(小注略),天德在丁,月德在丙,合德在辛(小注略),月厌在戌,月煞在丑,月破在申,月刑在巳,月空在壬。”共列出八种月神名称及其所在方位、日期。众多的年神名称,其对应年地支及所在方位是固定不变的,因此知道某个年神的方位,便可立即找到该年的纪年地支,成为判断残历年份的重要方法之一。其对应关系,清《钦定协纪辨方书》卷九《立成》列出不少,但敦煌历日中的一部分年神名称却不见于此书记载。陈遵妫先生《中国天文学史》第三册第 1644—1645 页列出一个年神方位表,使用起来很方便。但此表有两个缺陷,一是自 1645 页的“飞鹿”以上的年神方位是与年地支对应的,而以下的岁德、岁德合、岁干合、破败五鬼、金神则与年天干对应,陈书未加区分,全绘在一个表上,似乎都是与年地支对应的,这就容易引起混乱^⑤;二是除去那些与年天干对应的年神外,陈表就只有 25 个年神名称了,数量不多。我在整理敦煌历日时反复排比,虽然仍有一些年神如天杀、地杀、三兵、年黑方等尚未找出其排列规律,但见于敦煌历日的绝大部分年神及其对应年地支方位均已找出,故在陈表的基础上扩而大之,列成一表,以便利利用(与年天干对应的未列入)。至于月神方位、日期,只有 8 个,固定不变,也列成一表。需要注意的是,这月神的月份仍是阴阳家的月份(详“迷信历注的月份”一节),决不可同历日月份相混淆。

年神方位表

方位 年神	年地 支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岁德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太岁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岁破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大将军	酉	酉	子	子	子	卯	卯	卯	午	午	午	酉	
奏书	乾	乾	艮	艮	艮	巽	巽	巽	坤	坤	坤	乾	
博士	巽	巽	坤	坤	坤	乾	乾	乾	艮	艮	艮	巽	
力士	艮	艮	巽	巽	巽	坤	坤	坤	乾	乾	乾	艮	
蚕室	坤	坤	乾	乾	乾	艮	艮	艮	巽	巽	巽	坤	
蚕官	未	未	戌	戌	戌	丑	丑	丑	辰	辰	辰	未	
蚕命	申	申	亥	亥	亥	寅	寅	寅	巳	巳	巳	申	
丧门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太阴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官符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白虎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黄幡	辰	丑	戌	未	辰	丑	戌	未	辰	丑	戌	未	
豹尾	戌	未	辰	丑	戌	未	辰	丑	戌	未	辰	丑	
病符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死符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劫杀	巳	寅	亥	申	巳	寅	亥	申	巳	寅	亥	申	
灾杀	午	卯	子	酉	午	卯	子	酉	午	卯	子	酉	
岁杀	未	辰	丑	戌	未	辰	丑	戌	未	辰	丑	戌	
伏兵	丙	甲	壬	庚	丙	甲	壬	庚	丙	甲	壬	庚	
岁刑	卯	戌	巳	子	辰	申	午	丑	寅	酉	未	亥	
大杀	子	酉	午	卯	子	酉	午	卯	子	酉	午	卯	
飞鹿	申	酉	戌	巳	午	未	寅	卯	辰	亥	子	丑	
害气	巳	寅	亥	申	巳	寅	亥	申	巳	寅	亥	申	
三公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续表)

方位 年神 年地支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九卿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九卿食舍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畜官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发盗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天皇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地皇	酉	申	未	午	巳	辰	卯	寅	丑	子	亥	戌
人皇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上丧门	戌	丑	辰	未	戌	丑	辰	未	戌	丑	辰	未
下丧门	丑	戌	未	辰	丑	戌	未	辰	丑	戌	未	辰
生符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王符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五鬼	辰	卯	寅	丑	子	亥	戌	酉	申	未	午	巳

月神方位、日期表

方位 月神 月份 日期	正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天德	丁	坤	壬	辛	乾	甲	癸	艮	丙	乙	巽	庚
月德	丙	甲	壬	庚	丙	甲	壬	庚	丙	甲	壬	庚
合德	辛	己	丁	乙	辛	己	丁	乙	辛	己	丁	乙
月厌	戌	酉	申	未	午	巳	辰	卯	寅	丑	子	亥
月煞	丑	戌	未	辰	丑	戌	未	辰	丑	戌	未	辰
月破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月刑	巳	子	辰	申	午	丑	寅	酉	未	亥	卯	戌
月空	壬	庚	丙	甲	壬	庚	丙	甲	壬	庚	丙	甲

(原载《敦煌学辑刊》1989年第1期,第107—118页)

注释:

- ①《东方杂志》第34卷第9号,1937年。
- ②《东方学报》(京都版)第35期,1964年。我国有朴宽哲的译文,题为《研讨推定斯坦因收集的敦煌遗书中的历书年代的方法》,载《西北史地》1985年第2期。其实,关于古历的定年方法,我国数学史专家严敦杰先生早在1946年就发表过《飞九宫考》(《东方杂志》第42卷第14号),并不比日人为晚。
- ③《东方学报》(京都版)第45期,1973年。
- ④《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编上》,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
- ⑤载《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总第12期,1989年,第12—22页。
- ⑥关于此法,参本文《年神方位与月神方位、日期》一节。
- ⑦据耿昇《八十年代的法国敦煌学论著简介》,载《敦煌研究》1986年第3期,我未睹原文。
- ⑧见陈著《中国天文学史》第三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655页。
- ⑨图版见《中国古代天文文物图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66—67页。
- ⑩参拙作《敦煌文献S.2620号〈唐年神方位图〉试释》,载《文物》1986年第12期。
- ⑪实为《唐仪凤四年(679年)具注历日》,详拙作《跋吐鲁番文书中的两件唐历》,载《文物》1986年第12期。
- ⑫《流沙坠简》,第90页,中华书局,1993年版。
- ⑬苏莹辉将录文刊布于所作《敦煌所出北魏写本历日》一文,载台湾《大陆杂志》1卷9期。
- ⑭《吐鲁番出土文书》释文本第2册,第39页。
- ⑮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2页。
- ⑯我在《敦煌文献S.2620号〈唐年神方位图〉试释》一文中所列年神方位对照表,即由陈表改编而成。改编时,已注意到陈表的失误,但在删削时未将“破败五鬼”删除,是为失检,特此更正。

敦煌历日与出土战国秦汉 《日书》的文化关联

两年前,我曾撰写过《敦煌历日与当代东亚民用“通书”的文化关联》^①一文,旨在探寻敦煌具注历日与现今仍在广为流行的东亚“通书”的内在联系,亦可视作是在寻求敦煌或中古历日文化的“流变”。而眼前的这篇文章,则是在寻求敦煌历日文化的“渊源”。此二姊妹篇性质的论文,可将中国古代历日文化的渊源与流变上下串通,从中可见其发展变化的大致脉络。

一 出土《日书》的基本情况

战国秦汉《日书》的重新面世,仅仅是距今二十多年的事情。1975年12月,湖北云梦县睡虎地秦墓出土了一大批竹简,内有《日书》甲、乙两种,其中甲种失题,但乙种却有清楚明确的尾题“日书”二字^②,从而使此前与此后同类竹简文字定名有据。上世纪七十年代后,同类简牍文字不断被考古工作者先后发现,内容大为丰富。迄今为止,出土的战国秦汉《日书》大约有如下各种:

1. 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一种(西汉晚期);
2. 1975年12月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两种(战国晚期);

3. 1978 年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一种(西汉晚期);
4. 1981 年 5 月湖北江陵九店砖瓦厂楚墓一种(战国中晚期);
5. 1983 年底至 1984 年初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一种(西汉初期);
6. 1985 年秋和 1988 年初江陵张家山汉墓一种(西汉初期);
7. 1986 年 4 月甘肃天水放马滩秦墓两种(战国晚期~秦始皇三十年);
8. 1993 年湖北江陵王家台 15 号秦墓一种(战国晚期~秦)③;
9. 2000 年 3 月湖北随州孔家坡汉墓一种(西汉初期)。④

在以上九批十一种战国秦汉《日书》中,尤以睡虎地秦墓和放马滩秦墓所出最具代表性。所以,李零和刘乐贤二位先生主编的《中国方术概观·选择卷》⑤所收《日书》也主要是这两批考古资料,同时兼及其他。

二 《日书》的性质与功能

《日书》是古人选择吉凶宜忌的数术类著作,类似于后世的“选择通书”。《史记》有《日者列传》一篇,司马迁解释说:“齐、楚、秦、赵为日者,各有俗所用,欲循(一作‘总’)观其大旨,作‘日者列传’第六十七。”⑥司马迁正是感于各国都有占日以定吉凶者,方有此作。《墨子·贵义篇》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墨子要往北去齐国,遇一“日者”,说今日“帝”杀黑龙于北方,而您面色很黑,故不可北行。墨子不听,继续北行,结果没去成,只好返回。唐人司马贞为《史记》作“索隐”称:“名卜筮曰‘日者’以《墨》,所以卜筮占候时日通名者故也。”⑦可知“占候时日”是“日者”的职业特征,显然,《日书》正是他们占候时日的依据了。可惜这类早期书

籍一份也未传世,只是到了二十世纪下半叶,地不爱宝,古人的著作在地下沉睡了两千多年后又重光于世,这不能不说是当代研究者的幸运。

那么,古代的《日书》在当时是如何被占日者使用的呢?既是用来占“日”,则必须配合当时的实用“历日”才能使用。而近世以来,如同《日书》不断被发现,秦汉时代的实用历日也屡屡面世。截止上世纪末,人们已经能看到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的实用历本了^⑧。众所周知,秦汉时代的主要文字载体是竹木简牍,因此,考古发现的实用历本都是写在竹简和木牍上的。而竹简和木牍上的文字容量是极为有限的,不可能像后世“具注历日”用纸书写,把许多“历注”(包括吉凶选择)直接抄于每日之下。换言之,《日书》虽然是配合历日使用的,但其存在形式却是与历日分开的^⑨。也正因此,我们从出土秦汉历日上能够直接看到的历注内容非常少,如银雀山二号汉墓所出汉武帝《建元七年(元光元年)历日》^⑩、尹湾汉墓所出《元延三年五月历日》^⑪所见。另一方面,二者虽然分开存在,但《日书》的应用价值却是离不开历日的。敦煌所出“具注历日”就是将《日书》一类的选择内容,逐日抄到历日上的。也就是说,由于文字载体由竹木简牍变化为纸张,原先那些单独存在的《日书》类选择内容^⑫被直接抄到历日上面去了。不过,这仅仅是存在形式有了变化,而功能无别。这是我们将敦煌历日与出土《日书》进行比较的认识基础,也是首先要加以说明的。

三 敦煌历日与战国秦汉《日书》的文化关联

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我们拟就敦煌历日与战国秦汉《日书》内容相同或相近的部分加以逐一比较,以揭示其文化关联。

(一) 建除十二客

建除十二客恐怕是迄今所知的一项最古老的历日文化内容。《史

记·日者列传》载：“孝武帝时，聚会占家问之：某日可取妇乎？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丛辰家曰大凶，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可知“建除”是战国秦汉时代占候时日的“日者”队伍之一家。事实也确实如此，它是将“建除”等十二个字各主一定吉凶，按一定规则逐日排入历日中，然后进行选择的。

在出土《日书》中，人们看到了几种大同小异的“建除”内容^⑬。其中睡虎地秦简《日书》中的“秦除”，与甘肃放马滩《日书》甲种的“建除”^⑭，同敦煌历日中的建除内容最为近似。一般来说，敦煌历日是将建除等十二个字注在每日之下的，而《日书》则是给出了其排列规则。不过，将敦煌历日和《日书》的建除归纳一下，二者的排列情况即可编为表一：

表 一

纪日 星命 建除 地支 月份	建	除	(盈) 满	平	定	(拏) 执	破	危	成	收	开	闭
正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二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三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四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五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六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七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八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九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十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十一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十二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所谓“秦除”，即“秦的建除”。虽在秦统一中国之前有几种大同小异的“建除”流行，但秦统一中国后，肯定与张扬的是自己的文化，所以秦的建除也就传了下来，而其他几种近似的“建除”内容便泯而不闻了。

关于“秦除”与放马滩“建除”以及它们与敦煌历日建除的异同，尚需说明如下：

A. 表一所列建除十二个字以敦煌历日为基础，睡虎地《日书》“秦除”之“满”作“盈”，“破”作“披”；放马滩“建除”之“满”作“盈”，“破”作“彼”；“披”“彼”二字与“破”互通。至于“盈”改为“满”，当由西汉人避惠帝刘盈名讳而改。《淮南子·天文训》所载“寅为建，卯为除，辰为满……”，“盈”亦因讳而改为“满”，与后世建除正相一致。

B. 敦煌历日中的“建除”与《日书》“建除”都有“叠日法”，但所叠日期有别。所谓“叠日”，即重复一次前日所注的建除一次。东汉之前，是每月朔日叠值上月晦日一次；东汉之后，却是将二十四节气中的节气（非中气）之日所注建除字，叠值其前日的建除字一次。而这种叠日法，单从表一是看不出来的，只有结合具体的历注才能确定^⑮。敦煌历日所用的当然是后一种方法。

那么，建除等十二个字所主吉凶宜忌又是如何呢？

睡虎地《日书》之“秦除”又云：“建，吉：宜泥饰、修舍宇、修置户室、解安宅舍、出行、祭祀、入学、冠带、作事、求人、参官见贵、上书；凶：忌起工动土、开仓、祀灶、新船下水、行船、装载、竞渡。”“平，吉：宜泥饰垣墙、平治道路、修置户室、祀灶、祭祀、安机、取土修饰；凶：忌开沟渠、种植、耕、经络。”十二个建除字各自都有所主的吉凶事项，今从略，以免辞繁^⑯。

上述“建除”所主吉凶内容，清楚地表明它是供选择使用的，也对我们理解建除的性质提供了直接帮助。

敦煌历日中的“建除”注于各日之下,也是供选择使用的。如 S. 2404《后唐同光二年甲申岁(924)具注历日一卷并序》即云:“建日不开仓,除日不出财,满日不服药,平日不修沟,定日不作辞,执日不发病,破日不会客,危日不远行,成日不词讼,收日亦不远行,开日不送丧,闭日不治目。”^⑦当然,这只是一些比较简单的用法。敦煌文献中还有一些更复杂的建除内容,如 S. 0612 背有“推五音建除法”,当同其时历日中的建除选择有关,这里不再赘论。

可以肯定地说,敦煌历日中的建除同战国秦汉《日书》中的建除存在着直接的文化渊源关系,殆无疑义。

(二) 月煞

月煞是敦煌历日中的八个月神之一,其每月所在日期、方位有别。如 P. 3403《宋雍熙三年丙戌岁(986)具注历日并序》的正月月序内容就有:“天德在丁,月德在丙,合德在辛(小注略),月厌在戌,月煞在丑,月破在申,月刑在巳,月空在壬。”^⑧月煞在全年十二个月(指“星命月”而非历法月)中的方位、日期依次是:正月丑,二月戌,三月未,四月辰,五月丑,六月戌,七月未,八月辰,九月丑,十月戌,十一月未,十二月辰。

睡虎地《日书》的“土忌篇一”和“到室篇”^⑨都有月煞内容。“土忌篇一”云:“正月丑,二月戌,三月未,四月辰,五月丑,六月戌,七月未,八月辰,九月丑,十月戌,十一月未,十二月辰,毋可有为,筑室,坏;树木,死。”“到室篇”在校正后,除有完全相同的排列规则,其吉凶解说则是:“凡此日不可以行,不吉。”《居延新简》所收“破城子探方四三”第 257 号简内容亦是“月煞,丑、戌”。^⑩月煞是月中凶神,古人行事,多所避忌。王充《论衡·讥日篇》批评说:“假令血忌、月煞之日固凶,以杀牲设祭,必有患祸……如以杀牲见血,避血忌、月煞,则生人食六畜,亦宜避之。”^⑪说明其时血忌与月煞避忌甚盛。

从上可知,敦煌历日中的月煞与《日书》中的月煞同样有直接的文化关联。当然,就目前看,《日书》中的月煞还只是一个单纯的忌日,尚未具备敦煌历日中月中之神的地位,这或许是它们的不同之处。

(三) 六甲纳音

六甲纳音也是一项十分古老的文化内容。汉初成书的《淮南子》一书之“天文训”中,有关于五音十二律配六十甲子的关系说明,被今人陈广忠先生绘为一表^②。但敦煌历日中的“六甲纳音”却非直接来自这套内容。敦煌历日中的六甲纳音与《日书》中的“禹须臾”使用的“六甲纳音”恐为同一来源。

“须臾”即快捷简便之意,与后世“立成”同义。《后汉书·方术传》序云:“其流又有风角、遁甲、七政、元气、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专、须臾、孤虚之术……”章怀注云:“须臾,阴阳吉凶立成之法也。今书《七志》有《武王须臾》一卷。”故而,刘乐贤先生认为:“称为‘禹须臾’或‘武王须臾’,是把这一类迷信假托于禹或武王。”^③

《日书》中共有两种《禹须臾》,均与占择出行吉凶有关。今逢录含“六甲纳音”者,原文如下:

禹须臾·辛亥、辛巳、甲子、乙丑、乙未、壬申、壬寅、癸卯、庚戌、庚辰,莫(暮)市以行有九喜。

癸亥、癸巳、丙子、丙午、丁丑、丁未、乙酉、乙卯、甲寅、甲申、壬戌、壬辰,日中以行有五喜。

己亥、己巳、癸丑、癸未、庚申、庚寅、辛酉、辛卯、戊戌、戊辰、壬午,市日以行有七喜。

丙寅、丙申、丁酉、丁卯、甲戌、甲辰、乙亥、乙巳、戊午、己丑、己未,莫(暮)食以行有三喜。

戊申^④、戊寅、己酉、己卯、丙戌、丙辰、丁亥、丁巳、庚子、庚午、

辛丑、辛未，旦以行有二喜^②。

法国汉学家马克·卡林诺斯基教授最早发现上述五组干支是依“六甲纳音”法排列的^③。为了证明敦煌历日中的“六甲纳音”与此同一性质，我们先将敦煌历日中的“六甲纳音”内容归纳为表二^④：

表 二

甲子 金	乙丑 金	丙寅 火	丁卯 火	戊辰 木	己巳 木	庚午 土	辛未 土	壬申 金	癸酉 金	甲戌 火	乙亥 火
丙子 水	丁丑 水	戊寅 土	己卯 土	庚辰 金	辛巳 金	壬午 木	癸未 木	甲申 水	乙酉 水	丙戌 土	丁亥 土
戊子 火	己丑 火	庚寅 木	辛卯 木	壬辰 水	癸巳 水	甲午 金	乙未 金	丙申 火	丁酉 火	戊戌 木	己亥 木
庚子 土	辛丑 土	壬寅 金	癸卯 金	甲辰 火	乙巳 火	丙午 水	丁未 水	戊申 土	己酉 土	庚戌 金	辛亥 金
壬子 木	癸丑 木	甲寅 水	乙卯 水	丙辰 土	丁巳 土	戊午 火	己未 火	庚申 木	辛酉 木	壬戌 水	癸亥 水

表二每格含一个甲子以及该甲子的纳音(以五行替代)。我们将表二内容同上引《日书》中“禹须臾”所含各干支加以比较,就会发现,第一组干支属于宫音(以土代替),第二组干支属于商音(以金代替),第三组干支属于角音(以木代替),第四组干支属于徵音(以火代替),第五组干支属于羽音(以水代替),只是第一组脱了癸酉和甲午,第三组脱了壬子,第四组脱了戊子而已。因此,合乎逻辑的结论应该是,敦煌历日与秦简《日书》“禹须臾”所含六甲纳音有着共同的来源。

至于“六甲纳音”的用途,《日书》中与占测出行有关,概因时人对出行极为看重^⑤;而在敦煌历日中,很可能是用于推测人命吉凶祸福的。

它说明时过数百年后,“六甲纳音”的用途已经部分地起了变化。

(四) 日忌与选择

中国古代历日文化的核心内容是“选择”,亦即趋吉避凶。上文已讨论过的建除、月煞和六甲纳音无不具有这样的意义。但在各类择吉术中,以日为单位的选择术又占有主导地位。无论是在敦煌具注历日中,还是在出土战国秦汉《日书》中,日忌和选择都是重头内容。这里仅就二者相关联者加以讨论与说明。

往亡。《日书》中涉及往亡的至少有四段文字^{②9},今将其最具代表性者抄录如后:“正月七日、二月十四日、三月廿一日、四月八日、五月十六日、六月廿四日、七月九日、八月十八日、九月廿七日、十月十日、十一月廿日、十二月卅日。是日在行不可以归,在室不可以行,是是大凶。”^{③0}敦煌历日中也有“往亡”的历注,其多数所注日期是:立春后七日,惊蛰后十四日,清明后二十一日;立夏后八日,芒种后十六日,小暑后二十四日;立秋后九日,白露后十八日,寒露后二十七日;立冬后十日,大雪后二十日,小寒后三十日^{③1}。表面上看,《日书》与敦煌历日中的往亡安排不一致,其实是相通的。因为《日书》所注日期是历日日期,敦煌历日所注为“星命月”日期,而《日书》时代“星命月”尚未产生,故而有表面上的不同。当然,敦煌历日中也有少量仍按历日日期注往亡的,这里不赘。

至于“往亡”的立意,本在于不可以出行。《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五晋安帝义熙六年二月:“丁亥,刘裕悉众攻城。或曰:‘今日往亡,不利行师。’”(胡注:《历书》二月以惊蛰后十四日为往亡日)裕曰:‘我往彼亡,何为不利!’四面急攻之。”^{③2}明代流行的《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丙集》对“往亡”的解释亦言:“往亡日,不可拜官上任、远行还家,嫁娶、出入并凶。”^{③3}由上可见,“往亡”的含义在《日书》与敦煌历日中是相同的。

归忌。归忌与往亡一样，都是古代十分流行的日忌项目。王充曾批评说：“途上之暴尸，未必出以往亡；室中之殡柩，未必还以归忌。”^④《日书》云：“正月乙丑，二月丙寅，三月甲子，四月乙丑，五月丙寅，六月甲子，七月乙丑，八月丙寅，九月甲子，十月乙丑，十一月丙寅，十二月甲子，以以^⑤行，从远行归，是谓出入归死之日也。”^⑥《后汉书·郭陈列传》载：“桓帝时，汝南有陈伯敬者，行必矩步……还触归忌，则寄宿乡亭。”章怀注引《阴阳书·历法》曰：“归忌日，四孟在丑，四仲在寅，四季在子，其日不可远行归家及徙也。”^⑦而敦煌具注历日“归忌”日期恰同章怀所引。同《日书》比较，可以看出，《日书》时代的“归忌”仅限于一些干支日期，日数较少，而至唐宋，归忌日只定于地支而不计天干，日数增加了许多。但其所在日期之地支与《日书》无别，可以看出其渊源之历史痕迹。至于“归忌”之立意，前引文字中已经说明，不赘，大约自战国至唐宋是没有什么变化的。

天李。天李即天理。“李”、“理”二字互通。《管子·法法》有：“禹为司空，契为司徒，皋陶为李。”戴望注：“古治狱之官，作此李官。”中古时代主管监狱的部门被称作“大理寺”，亦是其意。由是可知，天李是一个十分凶恶的神煞。其排列则《日书》云：“天李正月居子，二月居子（卯），三月居午，四月居酉，五月居子，六月居卯，七月居午，八月居酉，九月居子，十月居卯，十一月居午，十二月居辰（酉）。凡此日不可入官及入室，入室必灭，入官必有罪。”^⑧它在敦煌具注历日中也是一个常见的丛辰项目，其排列规则与《日书》全同。但宋以后，已不用天李注历，而被“天狱”所代替^⑨。如前所述，“天理”就是主管天上牢狱的神名，改称“天狱”亦顺理成章，并不为怪。

四激。《日书》云：“夏三月丑激，春三月戊（戌）激，秋三月辰激，冬三月未激。……凡激日，利以渔猎、请谒、责人，执盗贼，不可祠祀，杀生（牲）。”^⑩四激在敦煌具注历日中也写作“四击”，但使用的次数

却不多；《宋宝祐四年（1256）会天万年具注历》亦称作“四击”^④。至于其排列规则，则与《日书》全同。其立意，《医心方》引汉代的《虾蟆经》云：“四激日：春戌、夏丑、秋辰、冬卯（未）。”并加按语说：“右四时忌日，今古传讳，不合药、服药也。”可知四激日同中医有关。今本《黄帝虾蟆经》亦有：“春戌日，夏丑日，秋辰日，冬卯（未）日，右四时忌日，不可灸判。”^⑤

四废。四废日出现于《日书》之“帝篇”、“室忌篇”、“盖屋篇”等多处。其在“帝篇”内容为：“春三月……四废庚、辛；夏三月……四废壬、癸；秋三月……四废甲、乙；冬三月……四废丙、丁……四废日，不可以为室，覆屋。”^⑥可以看出，《日书》中的四废日以天干为定，而与地支无涉。但敦煌历日中的四废日却是干支日期，其春三月在庚申、辛酉日，夏三月在壬子、癸亥日，秋三月在甲寅、乙卯日，冬三月在丙午、丁巳日。这些日子的天干与《日书》所定全同，亦可看出其由《日书》脱胎而来。

至于四废日的立意，刘乐贤博士做了极为明确的解说，今引录于下：“这个名目因何而设？《永乐大典》卷二〇一九七《诸家选日八十三》云：‘春以庚金为废，夏以壬水为废，秋以甲木为废，冬以丙火为废。’按：春三月于五行属木，庚辛五行属金，木、金相克；夏三月五行属火，壬癸属水，火、水相克；秋三月五行属金，甲乙属木，金、木相克；冬三月五行属水，丙丁属火，水、火相克，所以，四废日者，谓四季各月的五行与其日的天干所属五行相克。”^⑦因其为“废”日，故而“不可以为室，覆屋”。

十二支日避忌。古代日者除了设计过许多神煞名目外，又为天干、地支、弦、望、晦、朔、廿八宿等设计了众多宜忌内容。十二支日避忌即其一，睡虎地《日书》甲种载：

毋以子卜筮，害于上皇。

毋在丑徐（除）门外，害于骄母。

毋以寅祭祀凿井，邸以细□。

毋以卯沐浴，是谓血明，不可□井池。

毋[以]辰葬，必有重丧。

毋以巳寿(禱)，反受其英(殃)。

毋以午出入臣妾、马[牛]，是胃(谓)并亡。

毋以未(未)斩大木，必有大英(殃)

毋以申出入臣妾、马牛、货材(财)，是胃(谓)□□□。

毋以酉台(始)寇(冠)带剑，恐御矢兵，可以渍米为酒，酒美^{④5}。

显然，这组简原脱戌、亥二日的日忌内容。在敦煌具注历日中，我们也看到了关于十二支日日忌的说明，如 S. 2404《后唐同光二年甲申岁(924)具注历日一卷并序》云：“子日不卜问，丑日不买牛，寅日不祭祀，卯日不穿井，辰日不哭泣，巳日不迎女，午日不盖屋，未日不服药，申日不裁衣，酉日不会客，戌日不养犬，亥日不育猪及不伐罪人。”^{④6} P. 2661 也有内容相近的文字。虽然说，至唐宋时代，十二支的日忌内容已有变化，但其基本立意与秦汉时代却是相通的。

弦、望、晦、朔日避忌。这也是古代历日中常见的避忌内容。《日书》云：“弦、望及五辰不可以兴乐□，五丑不可以巫，啻(帝)以刹巫减(咸)。墨(晦)日利坏垣、彻屋、出寄者，毋歌。朔日利入室，毋笑。望，利为困仓。”^{④7}睡虎地乙种《日书》云：“正月、七月朔日，以出母(女)、取妇，夫妻必有死者。以筑室，室不居。凡月望，不可以取妇、家(嫁)女、入畜生。”^{④8}而在敦煌历日中，弦、望、晦、朔日的宜忌也是规定得明明白白的。如 P. 3403《宋雍熙三年丙戌岁(986)具注历日并序》说：“朔日不会客及歌乐，晦日不裁衣及动乐……弦、望日不合酒酢及杀生。”^{④9}其各日的宜忌与《日书》已然有别，反映出随着时代的推移而引起的部分变化，但其基本立意也还是相通的。

(五) 用事内容及语言

古代历日中所设神煞,是同选择“用事”吉凶相联系的。比如,敦煌本 S.0095《后周显德三年丙辰岁(956)具注历日并序》正月有:“七日庚子土开,启原祭,地囊,嫁娶、移徙吉”;“廿日癸丑木开,天恩,修造、治病、符吉。”“地囊”、“天恩”系神煞名,嫁娶、移徙、修造、治病等系用事。当我们将敦煌具注历日与《日书》中的“用事”语词相比较时,发现有大量雷同的内容,诸如:祭祀、入学、冠带、拜官、嫁娶、移徙、安床、解除、沐浴、剃头、除手足甲、裁衣、缮城、筑堤防、竖柱、上梁、经络、市买、纳财、开渠、穿井、安碓碓、扫舍、伐木、疗病、殡埋(葬埋)、坏垣、筑屋等。这些内容固然是古代社会日常生活的常见事项,在数千年的农业社会中变化不大;但它也是古代历日文化相承性的一种表现,恐怕也是不争的事实。从历日文化关联的角度讲,它也体现了其中的一个侧面。

以上就敦煌历日与战国秦汉《日书》文化内容相同或相近的部分做了比较,从中可见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也再次证实了笔者的一个基本看法:战国秦汉时代,限于竹木简牍的文字容量,虽然《日书》与历日是配合着使用的,但在书写形式上却是分开的。只是到了以纸张为基本书写材质的时代,才有可能将历日内容与《日书》选择内容合并书写在一起,完成由“历日”到“具注历日”的转变。

附带指出,我们曾注意到,秦汉时代的一些历注确实来源于《日书》,如“反支”和“天李”。这两个丛辰项目见于睡虎地甲种《日书》^⑤,同时又见于同时代的实用历本^⑥。说明历日中所用历注源自《日书》。但是也有一些历注项目,如“解衍”、“复”、“月省”、“八魁”、“血忌”等,迄今仅见于秦汉时代的历注^⑦,却不见于已经出土的各种《日书》。它说明,这些丛辰项目当源自另外一些佚失的《日书》,或者与《日书》性质相同的术数文献。本文只限于将敦煌历日与已经出土的《日书》作些比较并寻找其关联。至于那些目前还不能直接归入《日书》的历注项目,虽

然它们共见于秦汉实用历本和敦煌具注历日,则暂不讨论,这是要向读者特别说明的。

(原载《姜亮夫 蒋礼鸿 郭在贻先生纪念文集》,
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92—301页)

注释:

- ① 载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国学研究》第八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35—355页。
- ② 见《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55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 ③ 以上八批《日书》参见胡文辉《中国早期方术与文献丛考》,第142页,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
- ④ 《随州市孔家坡墓地 M8 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第9期,第22—31页。
- ⑤ 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
- ⑥ 《史记·太史公自序》。
- ⑦ 《史记·日者列传》。
- ⑧ 参见《关沮秦汉墓简牍》一书,中华书局,2001年。
- ⑨ 随州市孔家坡墓地 M8 发现《日书》简703枚,历日简8枚,共置于头箱(总器号 M8:58,56),是《日书》与历日对照使用的有力证明。见同注④。
- ⑩ 关于此历日的定名,参拙作《出土秦汉简牍“历日”正名》,将刊于《文物》。
- ⑪ 参见《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年。
- ⑫ 《隋书·经籍志三》著录有:“《杂忌历》二卷(魏光禄勋高堂隆撰),《百忌大历要抄》一卷,《百忌历术》一卷,《百忌通历法》一卷,《历忌新书》十二卷,《太史百忌历图》一卷。”这些著作的性质与《日书》无异,应该是隋唐人使用的选择类著作,可惜未能传世。
- ⑬ 详参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中《日书》甲种之“除篇”和“秦除篇”;乙种之“除乙篇”和“徐(除)篇”。台湾文津出版社,1994年。其异同参见同注③之《日书起源考》一篇。
- ⑭ 见《中国方术概观·选择卷》(上),第6—7页,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
- ⑮ 参见金良年《建除研究——以云梦秦简〈日书〉为中心》,载《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第六集,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261—281页。
- ⑯ 其余各日的吉凶内容,详参注③之《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第37—38页。
- ⑰ 参见拙编著《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第374—380页,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6年。以下凡引敦煌历日的历注内容均见该书。

- ⑮ 每个月神在各月的方位、日期可参《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第738页附录三“月神方位日期表”。
- ⑯ 分别见前揭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第138页、161页。
- ⑰ 《居延新简》，第116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 ⑱ 《论衡注释》，第1358—1359页，中华书局，1979年。
- ⑲ 陈广忠《淮南子译注》，第144页“五音十二律旋宫以当六十甲子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
- ⑳ 同注⑬，第163页。
- ㉑ 戊申：原释文作“戊甲”。查图版，原文作“申”，“甲”系排字错误。
- ㉒ 同注②，第222页。
- ㉓ Marc Kalinowski; Lestraitw'sde Shuihudi et L'he'me' eologie Chinise a La Fin Des Royaumes—Combatans, 载《通报》第72期，1986年。
- ㉔ 参同注⑰，第747页。
- ㉕ 参见刘增贵《秦简〈日书〉中的出行礼俗与信仰》，载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二本第三分册，第503—540页。
- ㉖ 见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中的“往亡”与“归忌”》，载《简帛研究》第二辑，第116—124页，法律出版社，1996年。
- ㉗ 同注②，第223页。
- ㉘ 同注⑰，第743页“气往亡表”。
- ㉙ 中华书局标点本《资治通鉴》，第3626页。
- ㉚ 见《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61册，第101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
- ㉛ 《论衡·辨崇篇》，见《论衡注释》第1396页，中华书局，1979年。
- ㉜ 刘乐贤谓“下一‘以’字衍”。见同注⑬，第286页。
- ㉝ 同注②，第223页。
- ㉞ 中华书局标点本《后汉书》，第1546—1547页。
- ㉟ 同注②，第226页。
- ㊱ 同注⑬，第299页。
- ㊲ 同注②，第202页。
- ㊳ 见《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天文卷》第1册，第694页三月七日历注，河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
- ㊴ 《黄帝虾蟆经》，中医古籍出版社，1984年。
- ㊵ 同注②，第195页。

- ④④ 同注⑬,第 130 页。
- ④⑤ 同注②,第 197 页。
- ④⑥ 同注⑰,第 380 页。
- ④⑦ 转引自同注⑬,第 66 页。
- ④⑧ 转引自同注⑬,第 357 页。
- ④⑨ 同注⑰,第 592 页。
- ⑤⑩ 参见同注⑬,第 297、300 页。
- ⑤⑪ 历日注“反(支)”,参见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释文》插页“元光元年历谱(复原表)”。“天李”注历,见《居延新简》,第 448 页“十二日辛卯成天李”,文物出版社,1990 年。
- ⑤⑫ 参见张培瑜《出土汉简帛书上的历注》,载《出土文献研究续集》,第 135—147 页,文物出版社,1989 年;又参拙作《尹湾汉墓出土历谱补说》,载《简帛研究二〇〇一》下册,第 451—455 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年。

敦煌历日与当代东亚民用 “通书”的文化关联

中国传统民用历书的内容，自古迄于上世纪中叶是连绵不断的，而且在东亚地区有着极为广泛的影响。不过，1949年后却发生了一些变化。那就是，传统历书在中国大陆以外的东亚地区仍旧兴盛不衰，但在中国大陆地区，其术数文化内容因受到严厉批判而被抛弃，从而产生了中断。因此，历日中一些本来极为普通而在民众中十分普及的内容，对于大陆的多数人，尤其是对于年轻一代，变得十分陌生了。本人也不例外。1994年末至1995年初，我受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之邀，在著名学者饶宗颐先生指导下进行为期三个月的研究工作，开始关注香港流行的“通书”。经与敦煌历日比较，我惊奇地发现，香港民用“通书”与敦煌历日主体文化内容是一致的，遵循着完全相同或基本一致的编排规则，甚至其中个别编错的地方，我也可以依据敦煌历日去加以纠正。此后数年中，我一直着力收集东亚地区现行民用“通书”的实物样本并加以研究。其间曾得到日本学者妹尾达彦先生、新加坡古正美博士、台湾宗山居士，中山大学林悟殊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育成先生的协助与支持。因此，本课题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是与上述一些朋友的支持分不开的，这里首先要向他们深致谢忱。

一 敦煌历日与“通书”文化内容之比较

我们拿来与敦煌历日进行比较的当代东亚民用“通书”主要有：(1)日本平成十年(1998)高岛易观象学会本部编纂的《平成十年观象宝运历》；(2)日本平成十一年(1999)高岛易断所本部编纂的《平成十一年神圣馆开运历》；(3)1995年中国台湾大义出版社出版、刘德义编著的《大义福祿寿历书》；(4)1995年台湾华淋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我國民曆》；(5)1995年台湾正海出版社出版、高铭德编著的《台湾农民历》；(6)1970年中国香港蔡伯励择日堪輿馆编纂的“永经堂”《日历通胜》；(7)1995年香港郑智恒易理命相玄学院出版、郑智恒编著的《猪年运程》；(8)1999年新加坡增订本《万字通胜》。以上8种通书，除《猪年运程》系笔者购自香港市廛，其余7种全部得自前述各位朋友的馈赠。也就是说，它们的来源有较多的随意性，并非为了论证之需要而挑拣的。另一方面，我所掌握的这8种通书，在整个东亚地区名目繁多的“通书”或“通胜”中恐怕微不足道，算不得丰富，但就我们这里要说明的问题来看，恐怕也还是够用的了。

下面我们将对一些主要项目进行比较。

(一) 建除十二客

关于建除十二客，我已在多篇文章中有过论列^①。现在只想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日本、中国香港和台湾民用“通书”与敦煌历日均以建除十二客注历，而且遵循着共同的排列规则；

第二，在这些历书中，建除注历只与纪日地支相配，而同纪日天干无涉；

第三，根据“星命月”(详下)进行安排，而不依历法月份进行；

第四,不考虑每年“立春正月节”那天所在的历法月份,但见“立春正月节”后的第一个“寅”日即注“建”字,顺序下排;

第五,凡节气(非中气)之日,所注建除须重复前日一次,再继续下排;

第六,每年十二个月,地支和建除都是十二个,因为使用了上一项的重复方法,故形成了各星命月中建除十二客与纪日地支间的固定对应关系。

就建除十二客所用的十二个字来说,除日本历书“收”字作“纳”,其余全同。

日本《簠簋》一书在解释完建除十二客各自所主吉凶之后,又强调说:“所谓此十二运者任节,故譬虽至月,节不到,则不可成当月,运宜可准先月者。”^②这句话颇值得注意。其意思是说,上面建除十二客是按节气进行的。虽然进入某月,然而未至节气所在之日,仍不能算当月,节气日之前各日算作前一个月。就是强调说,建除安排是依“星命月”进行的。这与港、台通书,与敦煌具注历日完全一致。

(二) 九宫图形

从现有材料看,九宫最晚产生于西汉。马王堆帛书中即出土一件九宫基本图形(五居中央)^③,构图规则是:“二四为肩,六八为足,左三右七,戴九履一,五居中央。”画成图形如图一:

四	九	二
三	五	七
八	一	六

图一

巽	离	坤
震	中	兑
艮	坎	乾

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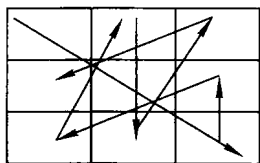
绿	紫	黑
碧	黄	赤
白	白	白

图三

九宫基本图形也可以换成八卦表示,即坎一、坤二、震三、巽四、(五

中)、乾六、兑七、艮八、离九(图二)。到了唐代,又有人用颜色代替数字,即“一白、二黑、三碧、四绿、五黄、六白、七赤、八白、九紫”。基本图形换成颜色表示即图三。以上三种九宫图形的对应关系自古迄今不变,也是其余八宫图形形成的基础。

关于九宫图形的构图规则。这九幅图表面上花里胡哨,但却是按照同一个严格的构图原则画成的。陈遵妫先生曾在《中国天文学史》第三册里有过解说^④。我现在根据自己的理解重新表述如下:九宫图形的画法遵循如下步骤:(1)先确定中宫数字,要画几宫图就就在中宫位置填上几;(2)由左上斜到右下,三个数字要相连(以下几步均是数字相连);(3)右下到右中;(4)右中到左下;(5)左下到上中;(6)上中到下中;(7)下中到右上;(8)右上到左中。其步骤可表示如图四。



图四

求取任何一个公元年代的九宫图形。

九宫配年是从公元 604 年开始的,又从 605 年起不断以从九到一的次序倒转,故可用下列公式求得:

$$(\text{公元年} - 604) \div 9 = X \cdots \cdots \text{余数。}$$

我们要找的是余数。余几,就从九倒数几个数,所得便是该公元年应配入的九宫图形。例如: $(1960 - 604) \div 9 = 152 \cdots \cdots \text{余 } 8$, 从九倒数 8 个数得 2, 则 1980 年应配入二宫图形。

$(1995 - 604) \div 9 = 154 \cdots \cdots \text{余 } 5$, 从九倒数 5 个数得 5, 则 1995 年应配入五宫图形(基本图形)。用这个公式验算敦煌历日或东亚民用通书,以及推算未来任何年代的九宫图形都适用。

现在再根据九宫图形的这些特点对东亚民用通书与敦煌具注历日加以比较,可得如下认识:

1. 这些历书均是以隋仁寿四年甲子岁(604)为起始点,按照九宫

排列规则进行的。

2. 敦煌历日一般强调的是年九宫、月九宫。对日九宫强调得很少,但偶尔也有提及,见于S.1473《太平兴国七年壬午岁(982)具注历日》序:“今年年起八宫,月起六(八)宫,日起一宫。”

日本“通书”同时重视年九宫、月九宫和日九宫。

我国台湾“通书”各家着眼点不尽相同。《我国民历》和《台湾农民历》有年九宫和日九宫,而无月九宫,《福祿寿历书》则年、月、日九宫一应俱全。

香港“永经堂”日历通胜有年九宫和月九宫,而无日九宫;《猪年运程》则有年九宫和日九宫,但无月九宫。

由上可知,就九宫而言,各地各家虽小有区别,但总体上差别不大,是沿着一个总的套路发展下来的。对此,陈遵妫先生曾指出:“日本把九星配于年及日,不大用以配月,我国不但配月,有时还用以配时。配于年月日的九星术,叫做三轮,始于唐代;配于年月日时的,叫做四柱,始于宋代。”^⑤今日东亚民用“通书”各地各家在编历时体现了各自的视角,但总体上源自唐代,殆无疑义。

3. 关于日九宫的安排规则。由于敦煌历日只有一次提到日九宫,材料过少,我们还难于对其排列规则进行最后确认。但是,既是中国传统历日的一个分支,估计它也不会脱离中国中原历日构成的基本规则。对于中国古代历日安排日九宫的规则,陈遵妫先生也曾论道:“九星除配年与月外,也有用以配日的。它取靠近冬至的甲子日,以它为阳始遁而是阴始得势的日子,以一白水星定为入中宫的星;翌日入中宫的星为二黑土星,再翌日为三碧木星,随后为四绿木星,五黄土星等等;即以九星图形(5)^⑥配绘靠近冬至的甲子日,随后顺次配以(4)、(3)、(2)、(1)、(9)、(8)^⑦等等;这样则一百八十天,干支与九星恢复原状,甲子日入中宫的星复为一白水星。靠近夏至的甲子日,入中宫的星虽然没有规定,

但一定是九紫火星,其翌日乙丑入中宫之星为八白土星,接着是七赤金星、六白金星、五黄土星等等;这样可知九星配合的移动方法和冬至以后不同。”^⑧以此与日本平成十年、十一年历对照,完全吻合。香港《猪年运程》日九宫排列与日本历同。但是,台湾“通书”却是按另一套规则排列的。对此,《福禄寿历书》曾详作解释云:“值日九星:每日均有一星掌事,该星便是日九星。换言之,每日均有一星飞入中宫,该中宫之星即为日九星。值日九星或分为顺行与逆行两种,其推法如下:凡冬至后甲子日起一白星,乙丑日起二黑……雨水后甲子日起七赤星,乙丑日起八白……谷雨后甲子日起四绿,乙丑日起五黄……以上均顺布九星。夏至后甲子日起九紫星,乙丑日起八白……处暑后甲子日起三碧星,乙丑日起二黑……霜降后甲子日起六白星,乙丑日起五黄……以上均逆布九星。”^⑨我们虽然不能确指这套日九星安排规则的来源^⑩,但它是由传统日九星术衍化出来的,当无疑问。传统日九星只以冬至、夏至二中气附近的甲子日为始点进行安排,现在则除冬夏二至外,又以雨水、谷雨、处暑、霜降四中气之后的甲子日为始点进行安排了。其总体设计,仍未脱离传统历书的窠臼,只是变得花样更多,更复杂而已。

(三) 星命月

“星命月”这个概念是我使用的,于书未征,仅仅是为了表述方便而已。陈遵妫先生在解释建除十二直的排列规则时说:“它的循环排列是每逢一个月的开始就重复一次,这里所谓一个月的开始是指星命家的月,即以节气起算。”^⑪我将陈氏所说“星命家的月”简化为“星命月”而运用之。可以说,陈先生已使用在先,并非我的首创。

但是,星命月不仅是一个客观存在,而且在历日安排上极端重要:几乎所有的神煞与选择项目都是以它为据的。那么,星命月是如何计算的呢?简言之,它是以每年各月“节气”(非中气)为每月之始,至下一节气(非中气)前一日为一月。全年十二个星命月如下表所示(表一):

表一 各星命月起止日期表

星命月份	起 止 日 期
正 月	立春日 至 惊蛰前一日
二 月	惊蛰日 至 清明前一日
三 月	清明日 至 立夏前一日
四 月	立夏日 至 芒种前一日
五 月	芒种日 至 小暑前一日
六 月	小暑日 至 立秋前一日
七 月	立秋日 至 白露前一日
八 月	白露日 至 寒露前一日
九 月	寒露日 至 立冬前一日
十 月	立冬日 至 大雪前一日
十一月	大雪日 至 小寒前一日
十二月	小寒日 至 立春前一日

由上表可知,星命月是以本月节气所在之日为开始的,而不管该节气日排在历表中农历的哪一天。

关于日本通书用星命月,我们在比较各历建除时已提到过。现在再具体到通书本身。日本平成十年历公历二月栏下注有:“二月四日立春开始,三月五日结束。”查此历日,公历二月四日为旧历一月八日,即立春日,公历三月六日为“启蛰”即汉历惊蛰,五日为惊蛰前一日。故本年公历二月四日至三月五日为星命月之正月。历日注明“二月四日立春开始,三月五日结束”,也就是说这是星命月正月的日期范围,

使用历书时当以此为据。其余十一个月也有类似的说明,意义同此,不赘。

香港《猪年运程》曾分论各月运道。而在“农历二月,己卯”下注明:“一九九五年三月六日~四月四日”。我们查此“通书”后面历表,农历二月初一辛卯日是在公历三月一日,显然,前述所注二月范围不是指农历月。再查历表,公历三月六日为“惊蛰”二月节,四月五日为“清明”三月节,其前一日为四月四日。由此可知,《猪年运程》所说各月运道完全是按照星命月进行的,农历月份反而退居次要位置了。

台湾通书星命月情况亦相仿佛。

星命月份在敦煌所出具注历日中也是十分醒目地加以说明的。比如,P. 3403《宋雍熙三年丙戌岁(986)具注历日一卷并序》云:“自正月十九日惊蛰,已得二月之节。即:天道西南行……”历日是在提示人们,自农历正月十九日已进入星命月之二月了,看历书时当以二月之神煞与选择视之。所有敦煌历日的星命月份,都是以各月节气所在之日为始,而以下一节气所在日之前一日为终,如我们在前面用表所示。

(四) 六甲纳音

六甲纳音也是一项古老的文化内容,现在所见文字材料以云梦睡虎地秦简为最早^⑫。至于其编排规则,清儒钱大昕在《潜研堂文集》卷三《纳音说》曾给予精确的文字表述,我曾据钱说绘成表格,与敦煌历日对照,无不相合;再与东亚民用通书对照,也毫厘不爽^⑬。

既称之为“纳音”,则必同五音(宫、商、角、徵、羽)有关。又因五音可同五行相配,故又用五行代替五音。其配合关系是:宫——土,商——金,角——木,徵——火,羽——水。敦煌历日和东亚通书都不直接用五音,而是用五行代替五音。

不过,单有一个《六甲纳音表》,读历仍有不便之处。因为任何一个干支也可同五行配合,如甲子读成“木水”,己巳读成“土火”,癸亥读成“水火”等。

我们可在《六甲纳音表》上附加天干、地支对应的五行,形成表二:

表二 六甲纳音表(附干支与五行对应关系)

甲木 子水 (金)	乙木 丑土 (金)	丙火 寅木 (火)	丁火 卯木 (火)	戊土 辰土 (木)	己土 巳火 (木)	庚金 午火 (土)	辛金 未土 (土)	壬水 申金 (金)	癸水 酉金 (金)
甲木 戌土 (火)	乙木 亥水 (火)	丙火 子水 (水)	丁火 丑土 (水)	戊土 寅木 (土)	己土 卯木 (土)	庚金 辰土 (金)	辛金 巳火 (金)	壬水 午火 (木)	癸水 未土 (木)
甲木 申金 (水)	乙木 酉金 (水)	丙火 戌土 (土)	丁火 亥水 (土)	戊土 子水 (火)	己土 丑土 (火)	庚金 寅木 (木)	辛金 卯木 (木)	壬水 辰土 (水)	癸水 巳火 (水)
甲木 午火 (金)	乙木 未土 (金)	丙火 申金 (火)	丁火 酉金 (火)	戊土 戌土 (木)	己土 亥水 (木)	庚金 子水 (土)	辛金 丑土 (土)	壬水 寅木 (金)	癸水 卯木 (金)
甲木 辰土 (火)	乙木 巳火 (火)	丙火 午火 (水)	丁火 未土 (水)	戊土 申金 (土)	己土 酉金 (土)	庚金 戌土 (金)	辛金 亥水 (金)	壬水 子水 (木)	癸水 丑土 (木)
甲木 寅木 (水)	乙木 卯木 (水)	丙火 辰土 (土)	丁火 巳火 (土)	戊土 午火 (火)	己土 未土 (火)	庚金 申金 (木)	辛金 酉金 (木)	壬水 戌土 (水)	癸水 亥水 (水)

上表的读法是:(1)每格左边是干支,右边是其对应的五行;(2)每格下面()中的字便是该干支的纳音(用五行表示)。如第一格甲子读作“干木支水纳音金”,第二格乙丑读作“干木支土纳音金”,其余类此。

下面我们将运用表二对敦煌历日和东亚通书进行检验。

敦煌出土《后唐同光四年丙戌岁(926)具注历日一卷并序》^⑭原题:“大唐同光四年具[注]历[日]一卷(原注:干火支土纳音土)……”查表

二,干支丙戌确为干火支土纳音土,二者相合。《后周显德三年丙辰岁(956)具注历日并序》^⑤原题:“显德三年丙辰岁具注历日并序(原注:干火支土纳音土)……”查表二亦相合。

香港“永经堂”《日历通胜》云:“天干属金,地支属土,纳音属金。”此历为1970年即庚戌年历书,查表二,庚戌读作“千金支土纳音金”,二者相合。《猪年运程》原在“前言”中有云:“乙亥年是木火之年。”查表二,乙亥为“干木支水纳音火”,如排除纳音不论,单说五行,则乙亥是木水年而非木火年,制历者失检。

台湾《福禄寿历书》原注:“干木支水纳音属火。”因此历为乙亥年历,故完全正确,不赘。《台湾农民历》和《我国民历》因是同年历书,所注此项全同,且正确无误。

遗憾的是,我手中保存的两本日本平成十年、十一年的通书,均未见“六甲纳音”注历的痕迹。是否由于这两本历书的编撰者不太看重纳音在历书中的用处呢?不得而知。同样,我们也不能依据这两本历书就认为当代日本通书全无纳音内容。因为毕竟我所见到的日本通书十分有限,还不能排除别的编历者也有用纳音注历的可能。

由上述讨论可知,敦煌历日与当代东亚民用通书的“六甲纳音”项目完全相同,即遵循着共同的规则。

(五) 选择

从秦汉时代起,历日中用于选择的神煞名目不断增多,仅敦煌历日即达200余项。这里我们主要就敦煌历日中的年神、月神的排列规则与东亚民用通书进行比较,别的暂略。

我们从敦煌历日排出其规律的年神计39项,另有几项因资料过少而未排出规律。现将已排出规律的列为表三。在表三之右侧附上比较结果,有同项内容者划√,否则出缺。

表三 年神方位之比较

方 位 年 神	年 地 支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日本 历	香港 历	台湾 历
岁 德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			
太 岁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	✓	✓	
岁 破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	✓		
大将军	酉	酉	子	子	子	卯	卯	卯	午	午	午	酉	✓	✓		
奏 书	乾	乾	艮	艮	艮	巽	巽	巽	坤	坤	坤	乾		✓	✓	
博 士	巽	巽	坤	坤	坤	乾	乾	乾	艮	艮	艮	巽		✓	✓	
力 士	艮	艮	巽	巽	巽	坤	坤	坤	乾	乾	乾	艮	✓	✓	✓	
蚕 室	坤	坤	乾	乾	乾	艮	艮	艮	巽	巽	巽	坤		✓	✓	
蚕 官	未	未	戌	戌	戌	丑	丑	丑	辰	辰	辰	未				
蚕 命	申	申	亥	亥	亥	寅	寅	寅	巳	巳	巳	申				
丧 门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太 阴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			
官 符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		
白 虎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			
黄 幡	辰	丑	戌	未	辰	丑	戌	未	辰	丑	戌	未	✓			
豹 尾	戌	未	辰	丑	戌	未	辰	丑	戌	未	辰	丑	✓			
病 符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			
死 符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			
劫 杀	巳	寅	亥	申	巳	寅	亥	申	巳	寅	亥	申	✓	✓		
灾 杀	午	卯	子	酉	午	卯	子	酉	午	卯	子	酉	✓	✓		
岁 杀	未	辰	丑	戌	未	辰	丑	戌	未	辰	丑	戌	✓	✓		
伏 兵	丙	甲	壬	庚	丙	甲	壬	庚	丙	甲	壬	庚				
岁 刑	卯	戌	巳	子	辰	申	午	丑	寅	酉	未	亥	✓			
大 杀	子	酉	午	卯	子	酉	午	卯	子	酉	午	卯				
飞 鹿	申	酉	戌	巳	午	未	寅	卯	辰	亥	子	丑				

(续表)

方位 年神	年地 支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日本 历	香港 历	台湾 历
害 气	巳	寅	亥	申	巳	寅	亥	申	巳	寅	亥	申				
三 公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九 卿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九卿食舍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畜 官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发 盗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天 皇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地 皇	酉	申	未	午	巳	辰	卯	寅	丑	子	亥	戌				
人 皇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上丧门	戌	丑	辰	未	戌	丑	辰	未	戌	丑	辰	未				
下丧门	丑	戌	未	辰	丑	戌	未	辰	丑	戌	未	辰				
生 符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王 符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五 鬼	辰	卯	寅	丑	子	亥	戌	酉	申	未	午	巳		√		

在进行上述统计对比时,我们是将各地区数量不等的通书按地区综合计入的,而限于某地区的某一历书。结果是,在敦煌历日中曾经使用过的 39 个年神,两本日本历书尚存有 15 个,占 38.46%;香港历书有 12 个,占 30.76%;台湾历书有 5 个,占 12.82%。由于敦煌历日各年神是在近 200 年中 50 余份历日的总计,而所使用的日本、中国台湾和香港通书数量均很少,所以这种统计的科学性不宜估计过高。它只是表示,敦煌历日和当代东亚通书中均包含一些共同的年神项目,且均按共同规则来排列(如表三)。

从唐代迄今,历史毕竟过去了一千三百多年。虽说中国传统历书总体上从形制到内容是被继承下来的,且在当代东亚地区影响十分广

泛；但是，各地民用通书的部分内容却发生了嬗变，这是十分自然的事。一些被制历者认为已陈旧的内容减少或被完全淘汰了，又有一些新的神煞被创造了出来取而代之，历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步步演变过来的。

下面我们再对“月神日期方位”加以比较。

月神在敦煌历日中最常见的有八个，如表四所示。我们也在其后侧将比较结果列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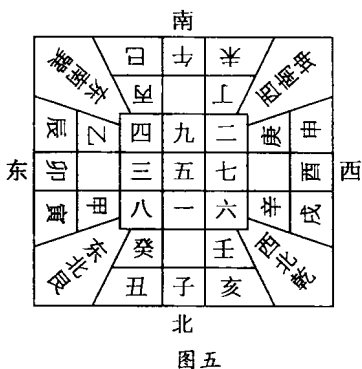
表四 月神日期方位之比较

日期 月 神	月份 正 月	二 月	三 月	四 月	五 月	六 月	七 月	八 月	九 月	十 月	十一 月	十二 月	日本 历	香港 历	台湾 历
天德	丁	申	壬	辛	乾	甲	癸	艮	丙	乙	巽	庚	✓	✓	✓
月德	丙	甲	壬	庚	丙	甲	壬	庚	丙	甲	壬	庚	✓	✓	✓
合德	辛	己	丁	乙	辛	己	丁	乙	辛	己	丁	乙	✓	✓	✓
月厌	戌	酉	申	未	午	巳	辰	卯	寅	丑	子	亥		✓	
月煞	丑	戌	未	辰	丑	戌	未	辰	丑	戌	未	辰		✓	
月破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	
月刑	巳	子	辰	申	午	丑	寅	酉	未	亥	卯	戌		✓	
月空	壬	庚	丙	甲	壬	庚	丙	甲	壬	庚	丙	甲		✓	✓

从上表可以看出，月神在日本当代通书中地位已退居到十分次要的位置。当代日本通书最看重的是所谓“六辉”，即先胜、友引、先负、佛灭、大安和赤口，在历表中有专门的“六辉”一栏。中国台湾的历书已很少关注传统历书中的月神；香港历书虽然固有的八个月神名目仍存，但也已与各种日神混合使用，显然退居次要地位了。但在敦煌具注历日中，完本历日中八个月神几乎在每月的月序中都要出现，处在十分显赫的位置。这些，如同年神发生的部分嬗变一样，也是历书内容在历史长河中渐次衍变的结果。

(六) 历书编排形式

在讨论敦煌历日与当代东亚民用通书的文化关联时,历日的主要文化内容无疑是其核心部分。但从其编排形式,我们也可窥知其关联的一个侧面。由于敦煌历日多数集中在唐后期至宋初的近二百年中,而且越是往后,其内容越是繁复,所以我们用那些最能代表敦煌历日全



图五

面形态的历日,如 P. 3403《宋雍熙三年丙戌岁(986)具注历日一卷并序》,与东亚民用通书加以比较。当然,我们选用的东亚民用通书的形制亦非完全相同,我们只取那些与敦煌历日有可比性的历日项目进行比较。

1. 日出日入方位与时刻。敦煌历日的日出入是以方位表示的。因

为在每份具注历的开端,均绘有一个年神方位图,日出日入方位亦通过此图来显示,其方位图如图五,日在各月出入位置如表五:

表五 各月日出日入方位

月 份	日出方位	日入方位	月 份	日出方位	日入方位
正 月	乙	庚	七 月	甲	辛
二 月	卯	酉	八 月	卯	酉
三 月	甲	辛	九 月	乙	庚
四 月	寅	戌	十 月	辰	申
五 月	艮	乾	十一月	巽	坤
六 月	寅	戌	十二月	辰	申

敦煌历日告诉人们的是日出日入的大致方位,有些粗疏。东亚民用通书告诉人们的是日出日入的准确时刻,这或许对民居、出行生活具

有更大的指导意义。比如,日本平成十年通书告知,在东京,二月一日、十一日和二十一日,日出日入各在几点几分。其余各月均有告白。《台湾农民历》、《我国民历》和《福祿寿历书》均是在二十四节气当日注明当天的日出日入时刻。两份香港通书却未注明日出入时刻或方位。由此可见,当代东亚各地通书不仅关心的内容各异,而且随着时代变迁,人们在历日中标明日出入的方式和内容也已改变。

2. 年神方位图。方位图如图五所示,共用了十二个地支,戊、己之外的十个天干,另有乾、坤、巽、艮四卦,共组成二十四个方位^⑩。在此基础上,因各年年神所在位置有别,便须据本文的表三在方位图上确定其位置,进而判断吉凶。图五中部九格是年九宫。我们惊奇地发现,敦煌历日与当代日本、中国香港和台湾通书的方位图完全一致。历书中大量术数文化内容要通过方位图去观察,去阅读,因此,共同的文化内涵要求必须有共同的表现形式,这就是方位图如此一致的真实原因。

3. 岁时记事。古代历日中有“岁时记事”一类内容,我们在敦煌历日中仅见到一例:S. 612号《宋太平兴国三年戊寅岁(978)应天具注历日》序有云:“六日得辛,七龙治水。”由此我们得知此历当年正月六日为辛卯,七日壬辰,从而推知正月朔日为丙戌。此历不是敦煌当地自编历日,而是一份由中原地区传去的历日,因此较多地体现了当时中原历日的内容。我手中的三份台湾通书也有相似的内容,如《我国民历》云:“七龙治水,大(六?)姑把蚕,十日得辛,蚕食七叶,四牛耕地。”可推知正月一日为壬戌。香港“永经堂”《日历通胜》亦有云:“十二龙治水,五日得辛,九牛耕地,三姑把蚕,蚕食四叶。”可推知正月朔日为丁巳。这些岁时内容虽无科学性可言,但我们却可通过比较看出其关联。

4. 历日栏次。完本敦煌具注历日一般分八栏,自上至下依次是:(1)“蜜”日(星期日)注;(2)日期、干支、纳音、建除;(3)弦、望、灭、没、往亡、籍田、社日、释奠等注记;(4)节气和物候;(5)吉凶注;(6)昼夜时刻;

(7)人神;(8)日游。日本平成十一年历书也分八栏,自上至下依次为:(1)公历日期;(2)曜日(星期几);(3)该日干支;(4)九星(日九宫);(5)六辉(即汉历之六曜);(6)行事,内含节气、上下弦、望、朔晦,各种节日,吉凶选择等;(7)旧历月日;(8)建除十二直。香港《猪年运程》共13栏,自上至下依次为:(1)公历月日;(2)星期;(3)日吉神将;(4)是日吉时;(5)是日忌事;(6)(旧历)日序、干支、纳音、二十八宿值星及建除;(7)紫白日星(日九宫);(8)是日宜事;(9)冲忌;(10)财神方;(11)喜神方;(12)鹤神方;(13)胎神。台湾《福禄寿历书》共10栏,自上至下为:(1)节日;(2)公历日期、星期;(3)神煞名;(4)吉中吉时与凶时;(5)选择忌事;(6)旧历日序、干支、纳音、二十八宿值星、建除、节气与物候,特殊日期如“土王用事”等;(7)日九宫;(8)选择宜事;(9)冲煞;(10)胎神。

从敦煌历日与当代东亚民用通书的栏次设置可知,千余年来,历日中的一些内容已发生嬗变。比如,敦煌历日所关注的日游和人神已消失了,而宋以后新加入的二十八宿值日却很“火爆”。但是也有一些却是经久不衰的,比如旧历日序、干支、纳音、建除、二十四节气、七十二物候,甚至“星期”这种由西方舶来的文化,在唐代历日中使用过一阵子后曾被放弃,后来又被“拾”了起来,以至成为当代生活与工作的重要时间依据,在通书中十分显赫。我们不能不承认历史是发展的,所以历日中的不少内容已经变化;我们也必须承认,历日文化是有传承联系的,否则我们就无法从敦煌历日与当代东亚民用通书中找到那么多共同的内容。

那么,敦煌历日与当代东亚民用通书的文化关联是如何产生的呢?

二 唐代《宣明历》——联接敦煌历日与 东亚民用通书的纽带

当我们在寻求敦煌历日与东亚民用通书的文化关联时,我们发现,

唐代的《宣明历》是这几种历日文化的交汇点。关于唐代的改历情况,《新唐书·历志一》载:“唐终始二百九十余年,而历八改。初曰《戊寅元历》,曰《麟德甲子元历》,曰《开元大衍历》,曰《宝应五纪历》,曰《建中元历》,曰《元和观象历》,曰《长庆宣明历》,曰《景福崇元历》而止矣。”而在这八种历中,麟德、大衍和宣明是三大著名历法。至于《宣明历》在唐代的实行时间,《新唐书·历志六》又云:“起长庆二年(822),用宣明历。自敬宗至于僖宗,皆遵用之。虽朝廷多故,不暇讨论,然《大衍历》后,法制简易,合望密近,无能出其右者。迄景福元年(892)。”可知《宣明历》在唐朝共行用了71年。至于《宣明历》的优点,则在于它改进了《麟德历》、《大衍历》日月五星运动的法数和周期,精度有所提高;计算简化了僧一行的内插公式,使理论易于了解,应用更加简便;更重要的是,在日食计算中首倡时、气、刻三差,使日食计算有了很大进步。^{①7}

如果说《宣明历》在有唐一代仅行用了71年的话,那么,它在唐朝以外的日本、朝鲜半岛行用的时间就十分长久了;它对敦煌本地历日的编撰也产生过十分重要的影响;在中国港澳台地区,我们至今仍能看到《宣明历》的投影。以下我们将分别加以说明。

(一) 关于《宣明历》对唐末五代宋初敦煌本土历日的文化影响

敦煌当地自编行用的历书,自九世纪初至十世纪末,有将近200年的时间跨度。这两个世纪中,敦煌情况也曾发生过不少变化。公元786年至848年为吐蕃占领时期,851年张氏归义军政权成立后,虽然名义上臣属于唐朝,但并不完全奉唐正朔,而是延续吐蕃统治时的习俗,继续自编自行历日,直至十世纪末,实际处于半独立状态。吐蕃统治敦煌时,中原与敦煌来往极少,不易得到822年开始行用的《宣明历》,《宣明历》对敦煌当地自编历日的影响主要发生在九世纪中叶至十世纪的后半期。这里,我们介绍两件相关的敦煌文献为证。

S. P. 6号《唐乾符四年丁酉岁(877)具注历日》是一件唐王朝官颁

历日,而且是《宣明历》的实行历日^⑩。此历正文之外,有收藏者书写的题记2行:“四月十六日都头、守州学博士兼御史中丞翟(此下一草书字未认出)书。报魏大德永世为父子,莫忘恩也。”

同伴的背面又有如下内容:“翟都头赠送东行魏大德,且充此文书一本。后若再来之日,更有要者,我不惜与也。得则莫改行相,称为父子之义也。”

从上面两条题记,我们可以看出,都头翟某对高僧魏某感激涕零,以至二人之间结下“父子之义”。翟都头将某种“文书一本”赠给了魏大德,而且自己表示,只要他还要,自己将“不惜与也”。而他是将这些话写在这份《宣明历》的实行历书上的。于是,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份唐王朝官颁历日可能是由魏氏高僧送给翟氏都头的,翟氏如获至宝,才写了上面那两条题记。

那么,这位翟都头是何许人?他在什么时间得到这份历日的呢?

在讨论敦煌具注历日时,我们自然会想到那位著名的制历专家翟奉达。翟奉达主要活动于十世纪的前半叶。而就现有材料而言,翟奉达有过“州学博士”和“兼御史中丞”的官衔,但尚未看到他有“都头”一职。第一条题记中的“翟□书”,翟下一字是关键字,但尚难准确识读,因此,还不能把得到这份《唐乾符四年丁酉岁(877)具注历日》的翟都头指认为翟奉达。不过,我们知道,翟氏家族属于敦煌望族之一,这位翟都头和翟奉达,以及翟奉达的侄子翟文进,都是敦煌当地历日的编纂者,否则,他得到唐王朝的实行历日,那么激动,对赠送者那么感激不尽,是无法解释的。

根据上面的讨论,我们有理由认为,敦煌翟氏编历者,在编历时是参考了唐王朝《宣明历》的实行历日的。我在整理敦煌历日时,将敦煌当地历日中的术数文化、编排方法,与此《宣明历》实行历书做过比较,结果是几无区别。当然,此乾符历下面那些具体的术数内容则不见于

敦煌本土的历书,但就历日部分来说差别不大,也可见它们之间存在着文化关联。

(二) 关于日本通书与《宣明历》的文化关联

日本历法的情况,我们要较多地借助于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来加以说明^⑩。下面我直接抄录《中日文化交流大系·科技卷》的几段文字。

根据有据可查的史料,日本从 690 年开始行用中国的元嘉历起,到 1684 年采用日本自己的贞享历为止,其间一直是直接使用中国的历法,共近千年之久。此间,除元嘉历、仪凤历之外,还陆续采用过僧一行的大衍历、郭献之的五纪历、徐昂的宣明历。……宣明历在日本的行用时间最长,它制定于 822 年,861 年开始在日本采用,直至江户中期,行用时间达 823 年之久。九世纪以后,中国屡经改历,而日本却一直沿用徐昂的宣明历。^⑪

以上是日本行用唐朝《宣明历》的基本情况。下面再看一下日本历书的编制机构与编历过程:

阴阳寮是大和朝廷掌管天文、历、漏刻和阴阳卜筮的一个机构,是模仿唐朝的体制设立的。不过,在《唐六典》中却见不到“阴阳寮”这样的称呼。如果把《唐六典》和日本的《养老律令》(718)加以比较就可看出,“阴阳寮”实际上就是中国的“太史局”。中国太史局的首长名之为“太史令”;日本阴阳寮的首长则名之为“阴阳头”。不过阴阳寮也并非简单地模仿太史局,而是根据日本国情,略有变通。例如,中国除太史局之外,还另设有太卜署,专司丞、卜的职务;而日本的阴阳寮则是把太史局和太卜署的功能全纳

入一个统一的体制之中。^{②1}

日本历书的历注几乎全部来自中国：

日本的历注几乎全是模仿中国。当时最著名的历注书是《簠簠》，其全名为《三国相传阴阳馆[辖]簠簠内传金乌玉兔集》，据说是由阴阳家、天文博士安倍晴明编撰。参与贞享改历的阴阳头安倍泰福(安倍晴明的后裔)声称：“《簠簠》，真言宗僧作之，安家无之，天文吉备公入唐传来，晴明受之，祭事祓事。安家一子相传也。”不论此说的真伪程度如何，它作为一部秘传书是以唐代的历经(《宣明历经》)为原本，大概不成问题。^{②2}

而现存《簠簠》一书每卷之末的尾题均作“三国相传宣明历经卷第×终”。^{②3}

我们知道，日本在行用中国《宣明历》823年后，又吸收了中国元朝《授时历》之优点，产生了涩川春海编撰的日本自己的《贞享历》^{②4}。而此后的历书编制机构发生过变化，在江户时代设立了“天文方”代替“阴阳寮”。天文方的工作情况如下：

幕府设立天文方之后，结束了阴阳寮垄断天文历学的局面。按过去王朝时代的传统，改历、颁历的工作全是在京都土御门、幸德井家族的世袭控制之下。贞享改历以后，在天文历学中属于观测、计算之类科学性工作的实权，几乎全部转移到关东的天文方。在颁历的时候，先是由江户的天文方计算、编制历的上段属于科学的部分(如月的大小、节气、日月食等)，然后再送往京都的阴阳寮添加历的中下段属于迷信性质的历注^{②5}。

很显然,日本的贞享改历,主要是将历日的科学部分,吸收《授时历》而加以改进,而属于术数文化的历注部分,基本仍旧遵循此前行用的《宣明历》内容。因此,我们可以大胆地说,日本历日文化之根即在于唐之《宣明历》。

(三) 关于朝鲜半岛之通书与唐代《宣明历》的文化关联

在研究这个课题时,我一直考虑要顾及朝鲜半岛的通书情况,但至写作时止,仍未获得朝鲜与韩国的民用通书。因此,这里我们要借助于前贤的研究成果加以说明。研究中朝关系史的专家杨昭全先生指出:“新罗曾派人赴唐学习历法,并采用唐之历法。公元 647 年,新罗之德福从唐学习李淳风创造之麟德历回国。是年,新罗遂改用麟德历(《三国史记》卷 7,新罗本纪 7)。其后,新罗宪德王时(810—826),又改用唐穆宗时(821—824)创造之宣明历,后沿用至高丽朝:‘高丽不别治历,承用唐宣明历,自长庆壬寅下距太祖开国殆逾百年。’(《高丽史》卷 50,历志 1)”。^⑥

历法史专家张培瑜先生曾论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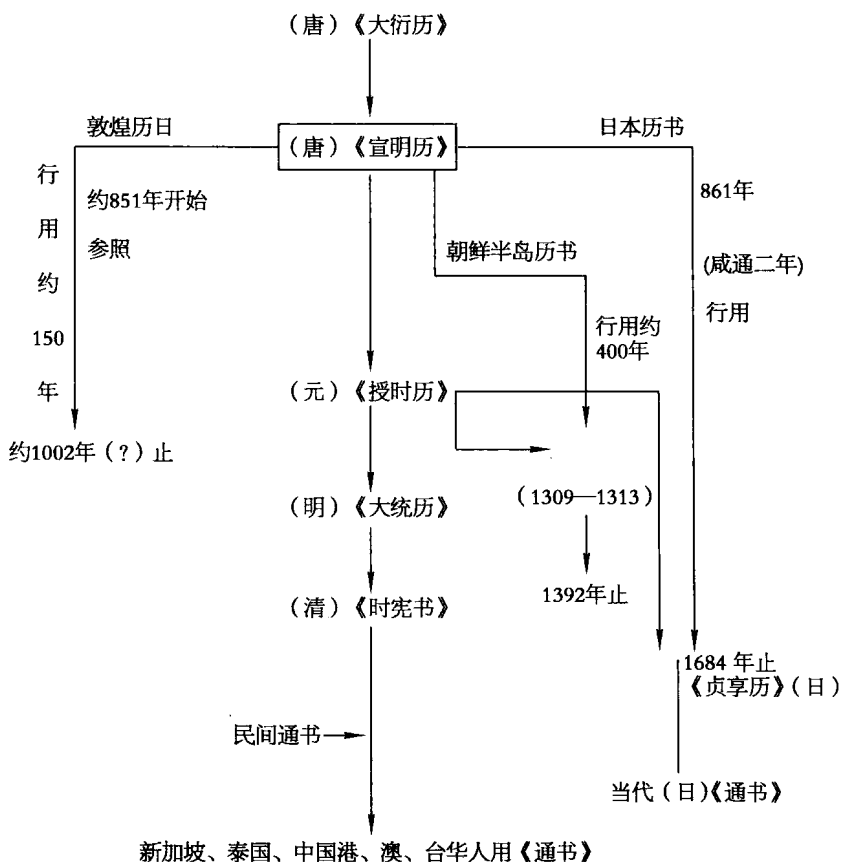
高丽建国即用宣明历,直到中宣王(1309—1313)改用元授时历。而交会术仍循宣明归术,直至 1392 年为李氏朝鲜取代止,行用了也约 400 年^⑦。

可知,《宣明历》在半岛曾行用 400 年之久。虽然也像日本一样后来改用了中国的《授时历》,但宣明历的影响却是根深蒂固的。

(四) 关于香港、澳门、台湾的历书与唐代《宣明历》的文化关联

本文使用了香港和台湾的通书,而未获得澳门华人使用的通书,是个缺憾。但就经验与文化来说,澳门华人使用的通书与香港华人所用不应有太大区别,这是可以预料的。而港、澳、台三地,虽然正式归入中

国版图都是宋以后的事,但众所周知,中国历代统治王朝均视颁历为权力所及的重要象征。因此,这三地所用中国历书应该是宋元明清各朝所用官历以及由此派生出的各种私家通书,自属于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化系统,殆无疑义。自然,如果追根溯源的话,我们也可以追溯到唐代的《宣明历》,以至更早。不过,对于本课题的研究来说,我们追溯到《宣明历》也就够了,因为我们要寻找的是这些历日文化的交汇点。通过上



面的讨论,我们已可清楚地看出,唐代《宣明历》是连结敦煌历日与当代东亚民用通书的纽带。如果不是这样,我们便无法说明它们之间为何会有那么多相同或一致的文化现象。为了将我们的结论表述得更为清楚,这里特别绘制了图六,以供参考。

(原载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中心编《国学研究》第八卷,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35—355页)

注释:

- ① 参见笔者《跋吐鲁番文书中的两件唐历》,载《文物》1986年第12期;《敦煌古历丛识》,载《敦煌学辑刊》1989年第1期;《天水放马滩秦简〈月建〉应名〈建除〉》,载《文物》1990年第9期;《关于敦煌历日研究的几点意见》,载《敦煌研究》1993年第1期。
- ② 引自《董簋》,见《日本阴阳道书的研究》,第262—263页。中村璋八著,汲古书院,1985年出版,1994年第2次发行。
- ③ 见《马王堆汉墓文物》,第134—135页,湖南出版社,1992年。
- ④ 《中国天文学史》第3册,第166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 ⑤ 同注④,第1661页。
- ⑥ 据陈先生书前所画九宫图,此(5)即指“一白中宫”图。
- ⑦ 顺次指“二黑中宫”、“三碧中宫”、“四绿中宫”、“五黄中宫”、“六白中宫”、“七赤中宫”各图。
- ⑧ 同注④,第1661页。
- ⑨ 见《福祿寿历书》,第123页下栏。
- ⑩ 愿知者有以教之。
- ⑪ 同注④,第1647页注⑤。
- ⑫ 见《中国方术概观·选择卷》(上),第49页“禹须臾”一节,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并参饶宗颐《秦简中的五行说与纳音说》,载《古文字研究》第十四辑;刘乐贤《五行三合局与纳音说》,载《江汉考古》1992年第1期,第89—91页。
- ⑬ 后知(清)李光地等奉敕编撰的《御定星历考源》卷一“纳音五行”也有同样的表格。我的表格比之增加了各干支对应的五行,读历时更为方便而已。
- ⑭ 编号为P.3247背加罗1。

⑮ 编号为 S. 0095。

⑯ 图五上的离、坎、兑、震与干、支所示方位重合，一般不计。

⑰ 参张培瑜等《宣明历定朔计算和历书研究》，载《紫金山天文台台刊》第 11 卷 2 期，1992 年 6 月，第 121—155 页。

⑱ 参见注⑰引张培瑜等《宣明历定朔计算和历书研究》。又，严敦杰《跋敦煌唐乾符四年历书》，载《中国古代天文文物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 年，第 243—251 页。

⑲ 主要参考李廷举、吉田忠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大系》(8)，即《科技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年。《中日文化交流大系》全十卷由著名学人周一良教授总主编。

⑳ 同上书，第 27—28 页。

㉑ 同上书，第 29—30 页。

㉒ 同上书，第 32—33 页。

㉓ 见(日)中村璋八《日本阴阳道书之研究》，汲古书院，1985 年。

㉔ 同注⑲，第 33—34 页。

㉕ 同注⑲，第 37—38 页。

㉖ 杨昭全《中朝关系史论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 年，第 33 页。

㉗ 同注⑰，第 121 页。

传统历日以二十八宿注历的连续性

二十八宿连续注历，是自南宋开始传统历日新增的一项铺注内容。其法是按一定规则，将二十八宿各宿分别注于每日之下，循环往复地进行。自南宋以来，这项历日内容是否长期连绵不断呢？从道理上说应该如此。但以往由于资料缺乏而难以证明。近年来，由于有几件宋以后的出土历日相继刊布，再结合传世历日和现行民用“通书”，对这个问题进行论证便成为可能。本文旨在以实证方式证明，自南宋淳熙九年（1182）至二十世纪末的1998年，中国传统历日以二十八宿注历是长期连续进行的，也未发生过错误。

为什么要以南宋淳熙九年作为检验的起点呢？这是由于《宋淳熙九年壬寅岁（1182）具注历日》^①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能看到用二十八宿连续注历的最早历日实物。此件出土于内蒙古额济纳旗的黑城，是一件印本历日残片。原件藏俄罗斯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编号“俄 TK297”。年代由我考证而得^②。从历日残存的二十八宿铺注内容，可以推知正月七日所注为“角”，而“角”宿是中国传统二十八宿的第一宿。由此确知，宋淳熙九年正月七日是历注中某一个二十八宿完整周期的开始。

在此件历日之后，我们能看到的是传世本《宋宝祐四年（1256）会天万年具注历》。此历三月最末一天为“三十日辛酉木执轸”^③。“轸”宿是二十八宿的最末一宿。这就是说，此日是历注中某一个二十八宿完

整周期的结束。自宋淳熙九年正月七日至宝祐四年三月三十日,共有 27104 天^④。 $27104 \text{ 天} \div 28 \text{ 天} = 968 \text{ (周)}$ 。可知,这期间共将 968 个二十八宿完整周期注于历日。

传世《宋宝祐四年(1256)会天万年具注历》四月一日注“角”,又是一个二十八宿周期的开始。此下则是一件出自黑城的元朝历日^⑤,它也是一件印本历日的小残片,原件藏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经张培瑜教授考证,确定为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 年)的历日^⑥。此历七月五日为“七月五日辛酉木满轸”,可知是某一个二十八宿周期之末。自宋宝祐四年四月一日至元至正二十五年七月五日,共有 39900 天。 $39900 \text{ 天} \div 28 \text{ 天} = 1425 \text{ (周)}$ 。由此得知,这期间共将 1425 个二十八宿完整周期注于历日。

在元朝历日之后,我们找到了一件从吐鲁番出土的明永乐五年的大统历。此件现藏德国国家图书馆,编号为 Ch. 3506,照片由荣新江教授从德国购回,年代则由我考证得出^⑦。此件也是一份印本历日的残片,其六月二十三日为“二十三日乙巳火开轸”,是某一个二十八宿周期之末。而前引元至正二十五年历日的七月六日注“角”,则为某个二十八宿周期之始。我们又可以据此对这两个年代之间的二十八宿周期进行计算。自元至正二十五年七月六日至明永乐五年六月二十三日,共有 15344 天。 $15344 \text{ 天} \div 28 \text{ 天} = 548 \text{ (周)}$ 。可知,这期间共将 548 个二十八宿完整周期注于历日。

大约从明朝中叶起,明清两朝近 400 年的历书被保存了下来。但是如果一天天地去对照原历,既无可能,也无必要。我们依然采取上面所用的方法进行抽样检查,并企求得出一个可信的结论。

清乾隆六十年(1795)《时宪书》的一部分内容,曾被已故天文学史专家陈遵妫先生用作书影照片加以刊布^⑧。此历正月二十二日注“轸”,是某个二十八宿周期之末。而前引《明永乐五年丁亥岁大统历》

六月二十四日为“角”，是某个二十八宿周期之始。自明永乐五年六月二十四日至清乾隆六十年正月二十二日共有 141540 天。 $141540 \text{ 天} \div 28 \text{ 天} = 5055 \text{ (周)}$ 。可知，在这 390 多年时间里，共将 5055 个二十八宿完整周期注于历日。

中国传统民用“通书”中的术数内容，1949 年后在大陆地区被废弃。因此，二十八宿注历这项历日文化在中国大陆未能沿用下来。但在中国的香港、台湾、澳门等地，在日本、新加坡、泰国等东亚和东南亚国家，民用“通书”中依然包含着二十八宿注历的内容。我们对其连续性检验如下：

1970 年香港出版的“永经堂”民用“通书”，其农历正月十三日为“十三己巳木轸平”，可知为某个二十八宿周期之末。而前引清乾隆六十年《时宪书》正月二十三日注“角”。自清乾隆六十年(1795)正月二十三日至 1970 年农历正月十三日，共有 63924 天。 $63924 \text{ 天} \div 28 \text{ 天} = 2283 \text{ (周)}$ 。其间曾将 2283 个二十八宿完整周期注于历日。

1995 年，台湾正海出版社出版的高铭德先生编《台湾农民历》，其正月十六日注“轸”，又是某个二十八宿周期之末。而前引香港“永经堂”1970 年民用通书正月十四日注“角”。自 1970 年农历正月十四日到 1995 年正月十六日，共有 9128 天。 $9128 \text{ 天} \div 28 \text{ 天} = 326 \text{ (周)}$ 。其间共将 326 个二十八宿完整周期注于历日。

日本“高岛易观象学会本部”编纂的《平成十年(1998)观象宝运历》，其旧历一月十五日注“轸”，为二十八宿某周期之末。而前引 1995 年《台湾农民历》之正月十七日注“角”。自 1995 年正月十七日至 1998 年正月十五日，共有 1092 天。 $1092 \text{ 天} \div 28 \text{ 天} = 39 \text{ (周)}$ 。可知，其间又将 39 个二十八宿完整周期注于历日。

将以上分段计算的结果综合起来便是：自南宋淳熙九年正月七日，至公元 1998 年农历正月十五日，共有 298032 天，其间共将 10644 个二

十八宿完整周期注于历日[$298032 \text{ 天} \div 28 \text{ 天} = 10644 \text{ (周)}$]。

以上我们对南宋淳熙九年(1182年)至公元1998年这816年间传统历日使用二十八宿注历的情况进行了检验。所使用的历日实物既有传世的,也有出土的;既有中国历史上曾经行用过的,也有当今港、澳、台地区和日本国仍在实行的。结论表明,自南宋以来,传统历日使用二十八宿注历一直连绵未断,而且正确无误。毋庸置疑,它是一项历史悠久的历日文化内容。

但是,中国古人给传统天文学中的二十八宿配以吉凶宜忌的内容,却不是从南宋才开始的。就目前已知的材料看,至晚到战国末年就已存在。1975年,湖北云梦出土的秦简《日书》已有此项内容的记载了^⑨。千余年后,宋人为了“演禽术”的需要,才将其引入历日,此后便一直延续不衰。至于用二十八宿注历始于南宋何年,目前仍难确知,有待出土资料的增加,才有可能最终加以解决。

(原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第173—175页)

注释:

- ① 图版见《俄藏黑水城文献·汉文部分》第4册,第385页下栏至386页上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 ② 参拙作《黑城出土〈宋淳熙九年壬寅岁(1182)具注历日〉考》,载《华学》第4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
- ③ 见《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天文卷》第1册,河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695页。
- ④ 本文所用日期数据,全部根据张培瑜《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一书统计而得。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
- ⑤ 图版见《内蒙古黑城考古发掘纪要》所附“图三七历书(F19:W18)”,载《文物》1987年第7期。
- ⑥ 张培瑜《黑城新出天文历法文书残页的几点附记》,载《文物》1988年第4期。
- ⑦ 参拙作《吐鲁番出土〈明永乐五年丁亥岁(1407)大统历〉考》,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5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63—268页。

- ⑧ 陈著《中国天文学史》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617—1620页。
- ⑨ 见《中国方术概观·选择卷》(上),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第24—25、60—62页。

敦煌三篇具注历日佚文校考

我在已经出版的《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①和《敦煌吐鲁番出土历书》^②二书中,对敦煌吐鲁番所出具注历日做了尽可能的裒辑。但是,在编著这两本书时,国际上有些博物馆和图书馆的资料尚未公布。近年来,随着一批资料陆续公开,就发现前此二书尚不完备。迄今至少发现有七件东西我此前未曾寓目,当然更未收到书中。这七件东西,四件出自德国国家图书馆“吐鲁番收集品”^③中,两件敦煌历日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另一件敦煌历日则藏在日本国会图书馆。本文将对前述分藏于俄国和日本的敦煌历日佚文进行释录和校考。

一 《唐大和八年甲寅岁(834)具注历日》校考

此件图版刊布在《俄藏敦煌文献》第10册第109页上栏,编号为“俄 Дх02880”。这是一块前、后、上、下均已残断的印本历日小残片。残存部分以原刻界栏为界,大体可分作三栏:上栏为月神方位日期残文、月大小和月九宫残文;中间一栏是“蜜”日(星期日)注;其下一栏为日序、干支、纳音和建除。给我的感觉是,其版式、内容与 S. P. 006 号《唐乾符四年丁酉岁(877)具注历日》^④大体相同。由于原件残破严重,所以编者未予定年,仅题为“具注历”。我们在考定其确年之前,需先将

文字释录。释文共分两部分进行，上栏为第一部分；由于第二栏的“蜜”日注是配合第三栏的日期使用的，所以，将这两栏放在一起释录，作为第二部分。凡属推补文字，放入[]中，在讨论中将说明推补的理由和依据。为便于讨论，释文前加了行号；原为竖行，今改横排（本文以下相同，不另说明）。

第一部分：

[前缺]

1. [] [] []
2. [] 寅天德乾。
3. [] 卯月德丙。
4. [] 酉月合辛。
5. [] 午月空壬。

（说明：原件寅、卯、酉、午四字与其下面文字并不十分对齐，更无对应关系。）

6. [六]月大。
7. [黄][白][碧]
8. [绿][白] 白
9. [紫][黑] 赤

[后缺]

第二部分：

[前缺]

1. [十八]戊辰[木] []
2. 十九己巳木 []
3. 廿日庚午土 []
4. 廿一辛未土 []

5. 廿二壬[申金]
 6. 廿三癸酉[金]
 7. 廿四甲[戌火]
 8. 蜜廿五乙亥[火]
 9. 廿六丙子[水]
 10. 廿[七]丁丑[水]
 11. 廿[八]戊寅土
 12. 廿九[己]卯土
 13. 一日庚辰金
 14. 二日辛巳金
 15. 蜜三日壬午木
 16. 四日癸未木
 17. 五日甲申水除
 18. 六日乙酉水满
 19. 七日丙戌土平
 20. 八日丁亥土定
 21. 九[日子]戊火执
- [后缺]

下面对残历年代进行考订并加讨论。

(一) 第一部分 2—5 行的天德乾、月德丙、月合辛、月空壬属于具注历日中月神日期方位的内容。由这几个月神对应的日期,可知它们属于五月月序之内容^⑤。但是 6—9 行却属于六月的内容。为什么呢?我们注意到,第二部分 17—20 行残文中,有注入的除、满、平、定四个建除十二客的内容。依据建除十二客在各“星命月”中同纪日地支的对应关系^⑥,除与申对应、满与酉对应、平与戌对应、定与亥对应,都属于“星

命月”六月的内容。由于第一部分 2—5 行为五月月神,可知残历第二部分十八至二十九日(1—12 行)为五月的历日,而其下一至九日(13—21 行)应是六月的历日。显然,在五月廿九日和六月一日上面一栏的“月大”(第 6 行)二字前应是一个“六”字,“六月大”与第三栏的六月一日是对应的。

(二) 残历第一部分 8—9 行残存“白”“赤”二字。根据敦煌具注历日的编排特点和经验,我们知道这是六月的月九宫图。由此图右下角为“七赤”,即可知其中宫为“六白”,从而根据九宫图的构图规则将残失的七个九宫字全部填出来。由于六月为六宫,逆推回去,可知正月是二宫,而正月为二宫的年份则是孟年(巳、亥、寅、申)。⑦ 这样,我们通过残历六月九宫图查出了它的纪年地支范围,范围就被缩小了。

(三) 由于残历第二部分为五月后半月和六月上旬的内容,且知五月共廿九天,是个月小;六月是大月,朔日庚辰,从而用干支表上逆下顺地去推,得出:[五月小],[辛亥朔];六月大,庚辰朔;七月[?],[庚戌朔]。

(四) 我们将前述五、六、七三个月的朔日,同陈垣先生《二十史朔闰表》公元 800 至 1000 年间的巳、亥、寅、申年相对照,其中同唐文宗大和八年甲寅岁(公元 834 年)相一致。

(五) 残历在五月廿五日和六月三日有两个“蜜”日注。其中五月廿五日合西历公元 834 年 7 月 5 日,六月三日合西历同年 7 月 12 日,查《日曜表》,此二日均是星期日,残历“蜜”注与《日曜表》亦相合。由以上考证,我们确认此件为《唐大和八年甲寅岁(834)具注历日》。

前已指出,本件残历是一个印本历日。正由于此,它就不仅仅限于历史研究的范畴,而且同雕版印刷技术史的研究密切相关。以往我们一直认为敦煌所出《唐咸通九年(868)〈金刚经〉》⑧是现存从中国发现、有确切年代的最早的雕版印刷品,现在看,印本《唐大和八年甲寅岁

(834)具注历日》应是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它比咸通八年提前了34年。可以预期,随着出土文物的增多和研究工作的深入,这个年代还有可能提前。

唐文宗大和八年时,雕版印历是一个什么局面呢?《册府元龟》卷160帝王部“革弊二”记载:“[大和]九年(835)十二月丁丑,东川节度使冯宿奏:‘准敕禁断印历日版。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故命禁之。”私印历日“满天下”便是对当时雕版印历的描述。正由于私印历日极多,冲击了皇帝的“颁历”特权,才有冯宿上奏要求禁断,也才有皇帝发敕禁止。但实际效果恐怕不大。可以说,这件大和八年印本历日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至于它是官印历日,还是私印历日,目前尚不能妄断;但它是由敦煌以外的其他地方流入的,则大致不会有问题。因为就敦煌本土而言,大和八年还是吐蕃统治的后期,敦煌同中原唐王朝的联系尚未恢复。而在同年,敦煌当地使用的是自编历日,有P. 2765写本《唐大和八年甲寅岁具注历日》为证。所以,此件到底是在何时、由何种途径传入敦煌的,都还需要再加研究。

二 《后晋天福十年乙巳岁(945) 具注历日》残文缀合

此件图版刊布在《俄藏敦煌文献》第8册,第182—183页,编号Дх01454、Дх02418V。原件前部、后部、上部残失严重,主要保留着年历总序中的部分文字,正、二两月月序的部分文字,和一些选择残文,纪年干支不存。由于条件太少,所以编著者仅题为“具注历日”,而未定年代。

当我第一眼看到此件图版时,觉得是那么“面熟”,相信自己早已见

到过,而且怀疑它是可以同别的具注历日缀合的。经与刊布在《敦煌吐鲁番出土历书》上的图版比对,发现它可以同 S. 0681 背面的《后晋天福十年乙巳岁(945)具注历日》缀合。不仅笔迹相同,而且撕断的字划也能上下对上。换言之,S. 0681 背面所存为此件残历的上半截,而此两号则存其下半截。今后在收入释文和图录时应将它们加以缀合,题为《后晋天福十年乙巳岁(945)具注历日》,编号为 S. 0681 背加 D_x01454 加 D_x02418V 方妥。

此件 S. 0681 背部的释文见于《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第 460 页至 465 页。如果现在再在这里对其俄藏部分单独释文,似无必要,故从略。将来如有机会修订《辑校》一书,再补充进去为宜。

三 《后周显德二年乙卯岁(955) 具注历日》校考

此件现藏日本国会图书馆,编号 WA37—9。其图版和释文从未公布过。1997 年夏天,日本东京一位研究天文历法史的学者西泽宥宗先生在国会图书馆发现了此件。他也注意到敦煌研究院施萍婷先生于《敦煌研究》1995 年第 4 期公布的日本“国会图书馆古写本”^⑨目录未著录此件。据云,这是由于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忘了提示施先生造成的。我虽然有幸看到了此件的照片复印件,但同时获知,西泽先生已撰文考证,准备将照片一起刊布。我们应该尊重西泽先生的发现功绩和他的优先刊布权^⑩。因此,这里只将文字释录并考证其年代。尽管这样,我也首先要向西泽先生表示诚挚的谢意和感激之情。

下面先将文字录出。依据历日规则推补出的文字不出校记,以免繁琐。

[前缺]

1. [九月][白][绿][白] []

2. [小建] 赤 [紫][黑]在 [] 月厌

3. [丙戌] 碧 黄 [白]用乙、辛、丁、癸时(吉)。 []

4. 一日丁卯火破 往亡 岁对、地囊^[1] []

5. 二日戊辰木危 岁后、天恩 []

6. 三日己巳木成 蟄虫坏户 岁对,加冠 []

7. 蜜 四日庚午土收 罡。 []

8. 五日辛未土开 岁对、不将、母[仓] []

9. 六日壬申金闭 岁对、不将、嫁[娶] [] 殍吉。 []

10. 七日癸酉金建 岁对、天恩^[2],拜官、升坛、沐浴、解吉。

[]

11. 八日甲戌火除 上弦 水始涸 岁位、血忌、母仓,修造、解除吉。 []

12. [九日]乙亥火满 岁位,祭祀、加官、拜官、修仓库吉。人[神在尻尾]。

13. [十日]丙子水平 魁 人神[在腰背]。

14. [蜜十]一日丁丑水定 岁位、母仓,起土、沐浴、解厌吉。日游在外兑官,人神[在鼻柱]。

15. 十二日戊寅土执 岁位、归忌,市买、伐木、符、镇解吉。人神[在发际]。

16. [十三]日己卯土执 寒露九月节鸿雁来宾 岁位、天恩、不[将],嫁娶、祭祀吉。人神[在牙齿]。

17. [十四日]庚辰金破 岁位、大败^[3],破屋、坏垣、治病吉。人神在[胃管]。

18. [十五日辛]巳金危 望 岁对、血忌、天恩、母仓,嫁娶

吉。景四十八卦、
夜五十二卦。人神在[遍身]。

19. [十六日壬午]木成 岁对、不将、天恩、母仓、嫁娶、葬吉。
日游在外乾官，人神在[胸]。

20. 十七日癸未木收 罡^[4]。 人神在[气冲]。

21. 蜜十八日甲申水开 雀入水为蛤 岁对、八魁^[5]，通渠、
□□、出行吉。人神在股内。

22. 十九日乙酉水闭 岁位，修造、□□□□人神在足。

23. 二十日丙戌土建 岁前、母仓，□□□□人神在[内
踝]。

24. 二十一日丁[亥土]除 岁前，祭祀治 □□□□人神在手
[小指]。

25. 二十二日戊子火满 岁位、归忌，拜官、□□□□人神在
外踝。

26. 二十三日己丑火平 下弦 菊有[黄]花 罡。景四十九卦、
夜五十二卦。[6]人
神在肝。

27. 二十四日庚寅木定 行狼、九焦、九坎、起[土]□□□□

28. 蜜二十五日辛卯木执 绝[阳]、母仓^[7]□□□□

29. 二十六日壬辰水破 绝阳、八魁^[8]□□□□

30. 二十七日癸巳水危 绝阳、血忌 □□□□

31. 二十八日甲午金成 霜降九月中 豺乃祭兽 绝阳、地
李，入[学?]□□□□

32. 二十九日乙未金收 魁 □□□□

33. [十]月 [赤]碧 黄自十月十四日立冬，已得十月之
节 □□□□

34. 小 建 [白]白 白 甲、己上取土
及宜修造吉。月厌在丑。月杀在
戌。□□□□

35. [丁亥] 黑 绿 紫 [用甲、庚、丙]壬时[吉]。

□

[后缺]

校记：

- [1] 地囊：“星命月”之八月地囊在丙寅、丙申二日，可知当注在此前一日之“丙寅”下，注于此日误。
- [2] 天恩：癸酉日非天恩日，注于此日误。
- [3] 大败：九月大败在卯日，注于此日误。
- [4] 罡：误。九月建除十二客之“收”日为“魁”日，而非罡日。
- [5] 八魁：误。秋三月（七、八、九月）之八魁在己亥、丁未日，夏三月则在甲申、壬辰日，制历者误。
- [6] 昼四十九刻，夜五十一刻：误。按，夏至后白天日短，夜晚渐长，十五日已是昼四十八刻，夜五十二刻，则此当作“昼四十七刻，夜五十三刻”。
- [7] 母仓：九月母仓在辰、戌、丑、未、巳、午日，注于此日误。
- [8] 八魁：秋三月（七、八、九月）之八魁在己亥、丁未日，注于此日误。参见校记[5]。

下面对残历的年代进行考订。

（一）残历 16 行有“寒露九月节”，31 行有“霜降九月中”，是九月的节气和中气。由于节气注在“十三日”，而不是下半月，因此可以不考虑因置闰而使节气与月份错开。换言之，可以直接判定：残历 1 至 32 行为九月的历日内容，而 33 至 35 行为十月月序之内容。

（二）九月为小月，朔日为丁卯；十月亦小月，朔日干支当为丙申。

（三）残历九、十两月的月九宫均有残文。根据其残存文字，可知九月为九宫，十月为八宫。逆推可得，正月为八宫。而与正月八宫相应的年份为仲年（子、卯、午、酉）。^⑪

（四）以九、十两月的朔日同《二十史朔闰表》中的子、卯、午、酉年对照，在公元 800—1000 年的范围内，同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唐懿宗

咸通三年(862)完全相同;同后周显德二年(955)相近似。

(五) 残历九月四日、十一日、十八日、二十五日均有蜜日注。若认为残历属于显德二年,则九月四日相当于西历公元 955 年 9 月 23 日,查《日曜表》,此日确为星期日,亦即“蜜”日。

由此可以确认,残历为《后周显德二年乙卯岁(955)具注历日》。将残历九、十两月朔日与同年中原历相比较可知,中原历九月丙寅朔,残历九月丁卯朔,晚一日;中原历闰九月丙申朔,残历十月朔日亦丙申,朔在同日。

在以往的敦煌具注历日中,后周显德二年的历日未曾被发现,此历为我们增添了一份新资料。

(原载《敦煌研究》2000 年第 3 期,第 108—112 页)

注释:

- ①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 年出版。以下引此书简称《辑校》。
- ② 河南教育出版社,1997 年出版。收在《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天文卷》第一册。以下引此书简称《通汇·天文卷》。
- ③ 德藏四号的录文由荣新江先生提供。其中对 Ch. 3506 号,我已撰有《吐鲁番出土〈明永乐五年大统历〉考》,刊于《敦煌吐鲁番研究》第 5 卷。另三号残破过甚,难于成文,暂置不论。
- ④ 释文见《辑校》,第 198—231 页。图版见《通汇·天文卷》第一册,第 359—361 页。
- ⑤ 参《辑校》,第 738 页,《月神方位、日期表》。
- ⑥ 参《辑校》,第 741 页,《各星命月中建除十二客与纪日地支对应关系表》。
- ⑦ 参《辑校》,第 746 页,《年九宫、正月九宫与年地支对应关系表》。
- ⑧ 编号为 S. P. 002 号,现藏英国图书馆。
- ⑨ 施萍婷《日本公私收藏敦煌遗书叙录(三)》,《敦煌研究》1995 年第 4 期,第 51—70 页。
- ⑩ 据有关人士讲,西泽宥宗先生将把此件照片连同他撰写的文章一齐刊发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办的《中国科技史史料》杂志上。
- ⑪ 同注⑦。

我国发现的现存最早雕版印刷品

——《唐大和八年甲寅岁(834)具注历日》

长久以来,在雕版印刷技术史的研究中,人们一直认为在我国发现的有确切年代的最早雕版印刷品,是出自敦煌石室、现藏英国图书馆的《唐咸通九年(868)金刚经》(S. P. 002 号)。1998 年底出版并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的《敦煌学大辞典》也是这样著录的(见该辞典 682 页“金刚般若波罗密经”总条)。最近,中国文物研究所邓文宽教授的一项研究成果改变了这一结论,他将在我国发现的有确切年代可考的最早雕版印刷品的年代提前了 34 年。

邓教授的这个结论,是通过一件敦煌石室所出具注历日进行研究得出的。这件历日残片现存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编号为“俄 Дх02880”。图版刊布在上海古籍出版社最新出版的《俄藏敦煌文献》第 10 册第 109 页上栏,刊布时仅题为“具注历”,未标明确切年代。

原件是一块雕印历日的小残片,上、下、前、后均已残损,考定起来甚为不易。邓教授的考证程序大致如下:(1)凭借右上角“天德乾”等四个“月神方位日期”注记,获知其下面的十八至二十九日具注历日属于五月;(2)凭借左下角“除、满、平、定”四个“建除十二神”与纪日地支的对应关系,确认残历一至九日属于六月,从而推知上栏中间“大”字及其上面的半个残字的完整内容是“六月大”。由于知道了六月大、朔日庚

辰,五月二十九天是个小月,从而推出五、六、七共三个月的月朔;(3)凭借残历左上角的“白”、“赤”二字,推知此历六月九宫图为“六白中宫”,进而推出本历正月九宫图为“二黑中宫”,从而找出其纪年地支为孟年(巳、亥、寅、申),缩小了残历的年限范围;(4)以五至七月的朔日同陈垣先生《二十史朔闰表》巳、亥、寅、申年对照,在公元 800—1000 年的可能范围内,发现与唐文宗大和八年(834)完全一致;(5)残历在五月二十五日和六月三日有两次“蜜”日(星期日)注,此二日合西历公元 834 年的 7 月 5 日和 12 日,查《日曜表》,全是星期日,从而可将残历的绝对年代加以确定。

唐文宗大和八年时,民间雕印历日数量巨大,分布很广。《册府元龟》卷 160 帝王部“革弊二”记载:“[大和]九年十二月丁丑,东川节度使冯宿奏:‘准敕禁断印历日版。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故命禁之。”私印历日“满天下”就是对当时民间雕印历日的形象描绘。正由于私历太多,冲击了皇家的“颁历”特权,所以才有冯宿上奏要求禁断,也才有皇帝发诏禁止。但雕印历日具有丰厚的经济效益,禁是禁不住的,客观上却推进了雕版印刷技术的快速发展和进步。这件唐文宗大和八年的印本历日就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产生的。至于它是官历还是私历,尚难确定。大和八年正值吐蕃统治敦煌的后期(公元 848 年张议潮举义归唐);敦煌文献 P. 2765 号又是同年敦煌人自编的写本历日,因此,这件残历不大可能是在敦煌本土雕印的,似应由外地流入。其流入的途径和方式,现在也还不易说明,有待今后考查。

(原载《中国文物报》2000 年 2 月 2 日第三版,署名“苏雅”)

从“历日”到“具注历日”的转变

——兼论“历谱”与“历书”的区别

二十世纪以来，从地下出土的古历实物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同时也提出了许多新问题，要求人们给予解答。统观已有的出土资料，人们不难发现，从秦朝至北朝的古历原名“历日”，而唐朝及其以后的古历，原名多为“具注历日”（清朝称为“时宪书”），这是为什么呢？在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的研究中，人们一般又将汉简历日称作“历谱”，而将唐代及其以后的历日称作“历书”。“历谱”与“历书”的区别界限又是什么？这些问题，古人都未给我们留下现成的答案，有待今人的研究与探讨。

江晓原博士曾就历谱与历书的区别做了专门探讨。他指出：“楚帛书及秦简《日书》为现今所见最早之历忌专书。但择吉择日之类的思想，很可能早在远古时即已发端……”^①而至汉代，王充在《论衡·讥日》篇中指出的“历忌”之书大约有如下六类：葬历——专讲葬事择日；祭祀之历——专讲祭祀活动之择日；沐书——有关沐浴、洗头的各种时日吉凶宜忌；裁衣之书——讲裁衣之时日吉凶；工伎之书——讲造房、装车、治船、掘井等事之择日；堪舆书——较普通的择吉之书，说明“择吉”（或曰选择）在汉代已十分发达。我们也还注意到，秦汉时代的《日书》虽然是配合历谱使用的，但多数情况下单独存在。在《元延三年五月历谱》中，已将八项历忌项目抄在历谱的顶端，观看历谱而使用之^②。但也诚如江晓原先生所指出：“不可简单地认为历书即历忌之学与历谱结合而成——因为

早在汉简历谱中就已屡见历注”了。他在将汉《永元六年历谱》、敦煌《大唐同光四年具注历日》和《宋宝祐四年会天万年具注历》的内容作过比较后说：“最重要、最关键之点则在于：永元六年残谱虽是汉简历谱中历注最繁者，已有建除十二直、反支、天李等历忌项目，却并无任何吉凶宜忌之结论。也就是说，历谱中虽注有历忌项目，但仅可免去人们推算之劳，而欲知该项目出现之日行事究竟有何宜忌，而仍须从历忌之书中去查检其结论——秦简《日书》即此种工具书之典型样本。举例来说，使用汉简历谱，虽能知某日为建、某日反支等等，但还不能得知建日是否宜于入人、反支日是否利于出行之类。而另一方面，以上引第二、第三例为代表之唐宋历书，则已将历忌项目（当然较汉代增加了许多）与有关该项目之吉凶宜忌一起结合进来。在唐宋历书中，人们可以直接得到对日常行事吉凶宜忌之若干具体指导。”江博士最终给历谱和历书下了定义：“历书：历注中有吉凶宜忌之说者。历谱：无历注或历注中无吉凶宜忌之说者。”有无吉凶宜忌内容便成了划分历书和历谱的标准。

对于江氏的这个结论，我原则上表示认同。不过，需要做一些补充说明。其实，历谱与历书的不同，早在它们的原始题名上已经体现出来。见于汉简的完整历谱有原始题名者为武帝元光元年历谱，原题“七年历日”^③；而唐前期的显庆三年、仪凤四年、开元八年三份具注历日^④，原始题名虽然已残，但其内容、书写格式与敦煌所出唐宋“具注历日”大同小异，由此也可推知，它们的原始名称是“××(年号)××(年次)××(干支)具注历日”。简言之，原名“历日”者是历谱，原名“具注历日”者是历书。那么“具注历日”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呢？“历日”二字的意义不难理解，关键在“具注”二字。《唐六典》卷十四太常寺“太仆署”条：“凡历注之用六：一曰大会，二曰小会，三曰杂会，四曰岁会，五曰建除，六曰人神。”可知，大、小岁会，建除和人神，以及在汉代用于注历的“反支”，统称为“历注”，这一点，自汉迄今无别。至于“具”字，《说文

解字》云：“共置也，从廿从贝省。”“共置”即放在一起的意思。《礼记·乐记》：“其功大者其乐备，其治辨者其礼具。”“备”与“具”互文见义，即完备、齐全之意。结合“具注历日”而言，在未将“吉凶宜忌”等历忌（选择）内容列入之前，历日已有反支、建除等“历注”，但尚不完备。只有将“吉凶宜忌”同时列入历日，与历注放在一起（共置）才是内容“完备”的历日，也才是“具注历日”。这应该就是“具注历日”的本始含义。

按照上面划分历谱与历书的标准去衡量，《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十二年历日》^⑤和《高昌延寿七年历日》^⑥就只能属于历谱而非历书了。再比照它们与汉简历谱的形制，可以确认，北魏历日与汉简历谱中的“单板纵读式”简便年历谱相似，而《高昌延寿七年历日》则与汉简历谱中的“编册横读式”年历谱相一致。其区别仅仅在于，这两份北朝历日是写在纸上而非写在简牍上的历谱。

那么，历谱转变为历书是在什么时间发生的呢？江晓原认为“在现今已见并可确定年份的全部古历实物中，451A. D 之前没有历书，而 658A. D 之后没有历谱！由此当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自历谱至历书，其演变过程完成于 451—658A. D 之间。今后伴随出土文物增加，上述时段可望进一步缩小。”这个结论的依据是《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十二年（451）历日》和唐代的《唐显庆三年（658）具注历日》，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这些材料本身也还是受到了限制。以公元 658 年为下限，恐不会有太大问题；但若以公元 450 年作为历谱转变为历书的上限就可能会有困难。其一，迄今为止出土文物中尚未见到西晋、东晋、宋、齐、梁、陈和隋代的历书实物，而太平真君十一年时北魏偏居平城（山西大同），它所使用的历谱内容是否具有普遍性，令人怀疑；其二，如果按照江先生的意见，后来我们又看到了《高昌延寿七年（630）历日》这个历谱，那么可否将历谱到历书的转变时限改划为 630—658A. D 这二十几年之间呢？看来有点悬。其三，由历谱到历书的转变有一个因素需要

考虑进去,那就是文字载体的变化。在既知的秦汉简牍历谱时代,文字载体是竹简和木牍,容量十分有限,因此历谱和《日书》虽然配合使用,但却是各自独立存在的。尽管我们在《元延三年五月历谱》上也看到历忌项目在历谱上成组列出,却还容纳不了“吉凶宜忌”的内容。自东汉时代中国人发明了造纸技术起,文字载体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纸张数量的增多,书写更加容易,将“吉凶宜忌”等内容由原来分开存在而合并书写在一起,以方便检索行事,则是必然趋势。迄今由出土文物得知,西晋是竹简和纸张并用的时代,到东晋纸张则完全取代了竹木简牍而成为文字载体。由此我推测,在两晋时代,大概是历谱和历书并存的时代。也就是说,敦煌所出的《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十二年历日》恐怕不能完全代表这一时代的历日或历书面貌,也许历书的出现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早些。实际情况如何,仍有俟未来出土文物的检验。

至于历谱为何会转变为历书,其契机是什么?江晓原先生说:“此事或可与以传入中土之佛教为代表的异域文化之启发影响不无关系。”然后他举了唐中叶不空翻译的《宿曜经》和此前由支谦和竺律炎合译的《摩登伽经》的一部分内容为证。为了便于讨论问题,我们现将江氏所引的两段文字摘录如下:

《文殊师利菩萨及诸仙所说吉凶时日善恶宿曜经》(《大正藏》NO. 1299)卷下“七曜直日历品第八”云:

夫七曜者,所谓日月五星下直人间,一日一易,七日周而复始。其所用各各于事有宜者、不宜者,请细详用之。……

太阳直日:其日宜册命拜官受职见大人,教旗斗战申威,及金银作持咒行医,猎放群牧,王公百官等东西南北送行。及造福礼拜,设斋供养诸天神,所求皆遂。合药、服食、割甲、洗头、造宅、种树、内仓库、捉获走失、入学、经官,理当并吉。其日不宜诤竞作誓,

行奸必败，不宜先战，不宜买奴婢……

太阴直日：其日宜造功德，必得成就。作喜乐朋僚，教女人裁衣服，造家具、安坐席、穿渠、造堤塘、修井灶、买卖财物、仓库内财、洗头、割甲、著新衣并大吉。其日不嫁娶、入宅、结交私情、出行。不向近远行大凶，奴婢逃走难得，禁者出迟，杀生、行恶、入贼者必凶。

荧惑直日：……

此为七曜直日吉凶宜忌之说。

第二种时日宜忌见《摩登伽经》(《大正藏》NO. 1300)卷下“观灾祥品第六”：

……我今复说月在众星所应为事：

月在毕日：宜应耕垦、婚姻、盖宅、出财、调兽、裁衣等事，不宜责敛、斗战、造酒。其日雨吉。生者慈悲，多欲贪味，丰有财物，寿命延长。

月在轸日：一切事吉，是日生者，端严殊特，聪慧强识，亡失还得。其日有雨，秋稼成熟。

月在轸宿：一切皆吉。宜调象马、授官、造池。不利窃盗。其日有雨必当流溢。生者勇健，盗而多智，长寿少病。

此为月在各宿宜忌之说。

江氏继续指出：“佛经中这些时日吉凶宜忌之说，在六朝隋唐之际广泛流传于中土。例如，《隋书》经籍志三历数类七曜术(或称七曜历)著作被著录者达二十二种。”他最终论道：“作为历书中吉凶宜忌之说理论基础的历史忌之学，在中土本自源远流长，其内容与稍后佛经中输入之异域吉凶宜忌之说也无太大不同。然而中土历史忌之学长期未与历谱发生直接结合，历谱中虽有少数历史忌项目之历注，但始终未能为日常行事

宜忌提供直接指示。至历书出现，乃成为具有指示日常行事宜忌功能之直接指南。而另一方面，佛经中如《宿曜经》、《摩登伽经》等经品却具有同样功能（江氏原注：据笔者初步搜索，汉文《大藏经》中此类作品至少有十五种左右）。……由此推论，历书之出现或系受到佛经作品之启发，确实大有可能。当然，因文献不足，此事尚难成为定论。”

应该说，江先生是一位认真负责的学者，他为自己的“推论”留下了足够多的讨论余地。不过，坦白地说，我不太赞同他的这个“推论”。

第一，如我在前面已经指出过的，在以竹木简牍为主要文字载体的时代，“历日”和《日书》虽然分开书写，但它们是配合起来使用的，而不像江先生所说“中土历忌之学长期未与历谱发生直接结合”，“始终未能为日常行事宜忌提供直接指示”。我们在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中看到这样的记载：“春三月季庚辛，夏三月季壬癸，秋三月季甲乙，冬三月季丙丁，此大败日，娶妻，不终；盖屋，燔；行，傅；毋可有为，日冲。……戊申、己酉，牵牛以取织女而不果，不出三岁，弃若亡。”^⑦显然，历忌“大败日”所在的季节和干支，只有结合历谱才能发生作用，否则是没有意义的。再比如，《后汉书·王符传》转引《潜夫论·爱日篇》说：“明帝时，公车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闻而怪曰：‘民废农桑，远来诣阙，而复拘以禁忌，岂为政之意乎！’于是遂蠲其制。”而关于反支，目前可知至晚在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上已用于注历了。那份历谱上只注一“反”字，并未注明“反支日不受章奏”，可是在东汉明帝时历谱上的“反”字却用于指导具体的生活行事。如果历谱上的“反”字不与《日书》结合使用，所注“反”字还有什么作用和意义呢？总之，在汉简历谱时代，《日书》离不开历谱，就像历谱离不开《日书》一样，二者只有相结合才能有用，并用于指导行事。这些都被历谱、《日书》以及文献所证实。

第二，我们要知道，秦汉时代由于文字载体的限制，历谱的流通是

有限的,不会像我们今天每户都有一份到几份,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那时识文断字的文化人也很少,多数人不能直接看历谱。在民间,普通百姓如有事情想知道“吉凶宜忌”,一般要去请教“术士”。我推测,术士们既拥有历日,也拥有《日书》。历日每年变化,但《日书》却是稳定的。术士们只要将当年历日的纪日干支同《日书》相对照,便可回答民众的提问。

第三,东汉时王充在《论衡·讥日篇》中已指出:“世俗既信岁时,而又信日。举事若病死灾患,大则谓之犯触岁月,小则谓之不避日禁。岁月之传既用,日禁之书亦行。世俗之人,委心信之,辩论之士,亦不能定。是以世人举事。不考于信而合于日,不参于义而致于时。时日之书,众多非一。略举较著,明其是非,使信天时之人,将一疑而倍之。”前已指出,王充举出的较著名而加以批判的有《葬历》、《祭祀之历》、《沐浴书》、《裁衣》、《工伎》、《堪舆》等六大类。而这些内容转化为“具注历日”中“吉凶宜忌”的用语,便是殡(葬)埋、祭祀、沐浴、洗头、裁衣、修车、造井、坏土墙、修宫室、修碓磑等的吉与不吉。这在唐初三历中也俯拾即是,读者可以详参。它说明,一直到唐代初期,移植到“具注历日”中的“吉凶宜忌”内容基本仍是来自汉代以来的各种历忌之书。由此也可以反证,那些历忌之书本来就是配合历谱使用的,只是到了晋和南北朝以后,由于文字载体的变化,容量扩大,把本来分开存在的内容合并在一起罢了(“具”即“共置”)。

第四,由于考古发掘出土了几种《日书》,使我们对中古“具注历日”中“吉凶宜忌”内容的来源加以追溯成为可能,试举证如下:

关于裁衣。睡虎地秦简《日书》有:“衣良日:乙丑、巳、酉、辛巳、丑、酉、吉。丁丑材(裁)衣,媚人。入七月七日乙酉,十一月丁酉材(裁)衣,终身衣丝。十月丁酉材(裁)衣,不卒岁必衣丝。衣忌日:己、戊、壬、癸、丙申、丁亥,必鼠(予)死者。癸丑、寅、申、亥,秋丙、辛材(裁)衣,必入

之。五月六月，不可为复衣。月不尽五日，不可材（裁）衣，丁酉材（裁）衣常（裳），以西有（又）以东行，以坐而饮酉（酒），矢兵不入于身，身不伤。”^⑧这是关于在何日裁衣吉与不吉的“历忌”内容。

关于盖屋。秦简《日书》有：“□□春庚、辛，夏壬、癸，季秋甲、乙，季冬丙、丁，勿以作事，复（覆）内、暴屋。以此日暴屋，屋以此日为盖屋，屋不坏折，主人必大伤。”^⑨这是关于何日盖屋吉与不吉的“历忌”内容。

关于扫屋舍。秦简《日书》：“庚申、丁酉、丁亥、辛卯，以除室，百虫弗居。”^⑩这是关于何日打扫室内卫生吉与不吉的“历忌”内容。

关于葬埋。秦简《日书》：“葬日，子、卯、巳、酉、戌，是胃（谓）男日。午、未、申、丑、亥、辰，是胃（谓）女日。女日死，女日葬，必复之。男子亦然。凡丁丑不可以葬，葬必参。”^⑪这是关于何日葬埋吉与不吉的“历忌”内容。

关于娶妻。秦简《日书》：“取妻龙日，丁巳、癸丑、辛酉、辛亥、乙酉，及春之未、戌，秋丑、辰，冬戌、亥。丁丑，己丑取妻，不吉。戊申、己酉，牵牛以取织女，不果，三弃。”^⑫这是关于何日娶妻吉与不吉的“历忌”内容。

关于朝见与拜谒。秦简《日书》：“吏：子，朝见，有告，听。晏见，有告，不听……丑，朝见，有奴（怒）。晏见，有美言。昼见，禺（遇）奴（怒）。日廌见，有告，听。夕见，有恶言。”^⑬这是关于何日朝拜吉与不吉的“历忌”内容。

秦简《日书》中涉及“历忌”之学的内容十分丰富。我们举出上述数种，是由于这几种“历忌”内容在中古“具注历日”中出现的次数最多。再结合前引《论衡·讥日篇》的相关内容，可以看出，“具注历日”（历书）中的那些选择内容至晚在战国时就已存在；而且，《日书》与历谱是配合使用的，只要文字载体允许容量扩大，它们合并书写在一起是完全自然的事，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换言之，由历谱转化为历书，完全可以由中国历法与术数文化自身生发出来，不待有域外文化的影响才产生。

第五,如前所述,江晓原先生举出了《宿曜经》中的“七曜直日”历忌内容。不错,学者们对七曜日的来源虽未能取得共识,但它来自域外却是可以肯定的。它是否对中国古历由历谱到历书的转变发生过启迪作用呢?恐怕不是。因为我们在本文前面已经看到,至晚到唐初,历谱(历日)已经转变为历书(具注历日),但中国人尚未用七曜直日的“历忌”内容注历。用七曜直日历忌注历,目前所见,大约从九世纪初才开始^⑭,也许时间会更早一些,但唐初官颁三历尚未用七曜直日历忌注历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我认为,与其说七曜直日历忌内容影响了中国古历由历谱到历书的转变,毋宁说中国古历自身由历谱转化为历书后,由于受域外文化的影响,又将七曜直日历忌内容吸纳进本土历书,才更符合历史的真实。

至于江先生所举《摩登伽经》月在二十八宿宜忌之说,以为域外历法影响了中国古历由历谱到历书的转变,恐更难成立。因为在睡虎地秦简《日书》中,已有二十八宿各主吉凶宜忌的文字记载。今摘引如下:

角,利祠及行,吉。不可盖屋。取妻、妻妒。生子,为[吏]。

亢,祠,为门、行,吉。可入货。生子,必有爵。

牴(氐),祠及行、出入货,吉。取妻,妻贫。生子,巧。(中略)

东辟(壁),不可行。百事凶。以生子,不完。不可为它事。

奎,祠及行,吉。以取妻,女子爱而口臭。生子,为吏。(中略)

参,百事吉,取妻,吉。唯生子不吉。

东井,百事凶。以死,必五人死;以杀生(牲),必五生(牲)死。

取妻,多子,生子,旬而死。可以为土事。

……^⑮

显然,远在《摩登伽经》由印度传入中国的几百年前,中国不仅有自

己的二十八宿体系,而且也被术士们赋予了“吉凶宜忌”的历忌内容。前引《摩登伽经》告诉我们,印度有其二十七宿(有时作二十八宿)体系及相应的宜忌选择事项。但在这一点上,中国的二十八宿毫不逊色。至于二十八宿各主吉凶被连续引入历书,目前所知,是南宋的事。但在南宋以前的千数百年,这项文化早被储蓄了,只是届时引入历书而已,以至在当代东亚汉文化圈的民用“通书”中仍旧普遍使用。显然,《摩登伽经》的相关内容也不能成为中国古历由历谱转化为历书的启迪因素。

概括言之,历谱转化为历书,是由于历谱中增加了“吉凶宜忌”的内容,而从其原始题名上就可反映出来,具体表现为“历日”和“具注历日”的不同。再者,由历谱转变为历书,是从中国古历内容及书写纸材的变化生发出来的,而不待来自域外文化的启迪。

注释:

- ① 江晓原《历书起源考》,载《中国文化》总第6期,第150—159页。以下凡引此文不再注出。
- ② 见连云港市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东海县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合编《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年,第21—22页。
- ③ 见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释文》,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233页及插页“元光元年历谱(复原表)”。
- ④ 此三历释文见《吐鲁番出土文书》释文本第6册,第73—76页;第5册,第231—235页;第8册,第130—131页。考证文字参拙作《跋吐鲁番文书中的两件唐历》,载《文物》1986年第12期,第58—62页;《吐鲁番出土〈唐开元八年具注历日〉释文补正》,载《文物》1992年第6期,第92—93页。
- ⑤ 今编号为“敦研0783背(0368背)”。参拙作《敦煌本北魏历日与中国古代月食预报》,载《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360—372页。
- ⑥ 参拙作《吐鲁番新出〈高昌延寿七年(630)历日〉考》,载《文物》1996年第2期,第34—40页。江氏撰文时此历尚未正式发表。
- ⑦ 见《中国方术概观·选择卷》(上),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第39页。
- ⑧ 同注⑦,第51页。

⑨ 同注⑦,第 63—64 页。

⑩ 同注⑦,第 64 页。

⑪ 同注⑦,第 21 页。

⑫ 同注⑦,第 37 页。

⑬ 同注⑦,第 37 页。

⑭ 参拙作《敦煌三篇具注历日佚文校考》,载《敦煌研究》2000 年第 3 期,第 108—112 页。

⑮ 同注⑦,第 24—25 页。

敦煌具注历日与《四时纂要》的比较研究

在现已考定绝对年代的四十余份敦煌具注历日中,除《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十二年(451)历日》是公元五世纪的作品外,其余年代均在公元806年至993年之间,亦即是在唐代中期至宋初的一段时间之内。其所以被称作“具注历日”,是因为在各日之下注上了诸如二十四节气、七十二物候以及本日神煞和吉凶宜忌等供选择的内容。

过去我在整理敦煌历日时,由于需要掌握各种神煞的编排规则,所以必须求助于乾隆时由庄亲王允禄奉旨编集的《协纪辨方书》,以便判断具注历日中选择事项的正误。由于敦煌历日的绝大多数是敦煌当地人自编并行用的,为了弄清楚它与同时代的中原历日的选择事项有何异同,以及其文化关联又是何等面貌,我们又必须对这些选择内容从横向角度做一比较。

但是,目前我们能够确认属于同时代中原王朝出土的历日,仅有敦煌历日中的两份和吐鲁番文书中的三份^①,其中除《唐乾符四年丁酉岁(877)具注历日》大致完好外,别的都是一些残片。这样,就限制了我们做直接的比较工作。幸运的是,唐人韩鄂《四时纂要》中却保存了许多同时代的术数文化内容,因此,我们可以取之与敦煌具注历日加以比较。或者,也可将这种比较视为用历日进行直接比较的一种补充。

韩鄂其人,仕历和年寿均不详,其所撰《四时纂要》(下面简称《纂要》)不见于《旧唐书·经籍志》,但《新唐书·艺文志》和宋人陈振孙《直

斋书录解题》却有著录。《纂要》一书在我国早佚。1960年,在日本发现了明万历十八年(1590)朝鲜重刻的《四时纂要》,1961年由日本山本书店影印出版。我国则有缪启愉先生的《四时纂要校释》一书,由农业出版社于1981年出版。本文使用的即这个校释本。

《纂要》是按月列举应做事项的月令式农家杂录。全书共698条,其中占候、选择、禳镇等348条,约近一半^②。至于这348条术数的来源,据韩鄂自序,系“撮诸家之术数”^③,可知是从当时流行的术数书中抄撮而来的。我们认为这些其时盛行的术数书籍,较好地反映了当时中原地区的一些术数文化,更何况韩鄂活动的地区“当在渭河及黄河下游一带”。^④

另一方面,由于敦煌具注历日的时间跨度较大,且有几十份,我们在比较时也必须选择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这里,我决定使用P.3403《宋雍熙三年丙戌岁(986)具注历日[一卷]并序》为代表,与《四时纂要》作比较。尽管该历日的年代已属宋初,但经过研究,证明其中多数术数文化的排列规则与唐代的敦煌同类具注历日都是一致而不矛盾的,因此并不妨碍我们与唐代的《四时纂要》作比较。如果敦煌历日自身已不一致,我们在比较时将随时予以说明。

一 星命月(太阳月)

“星命月”是古历安排术数选择事项的一个重要前提。无论是敦煌历日,还是《纂要》,虽然其历日是按农历月份编排的,但术数安排并不以这个月份为准,而是按“星命月”进行的。

“星命月”以二十四节气中的十二节气(非中气)为各月之始,而不以每月初一为始。如所谓正月,是指“立春正月节”所在之日至惊蛰二月节之前一日。所以《纂要》每月都有一句说明,如正月云:“自立春即

得正月节,凡阴阳避忌,宜依正月法。”十二月云:“自小寒即得十二月节,阴阳使用,宜依十二月法。”敦煌 986 年历日亦云:“自去年十二月十八日立春,已得正月之节”,“自十一月廿九日小寒,已得十二月之节”,都是提示,由此日始已进入所谓的“正月”、“十二月”等。这种星命月(太阳月)的使用,大概始自东汉^⑤,今天在东亚民用通书中仍十分流行^⑥。

二 天道行向

所谓“天道”,据清《协纪辨方书》卷五义例三引《乾坤宝典》:“天道者,天之元阳顺理之方也。其地宜兴举众务,向之上吉。”^⑦可知,这是所谓兴之者昌的方向。敦煌历日正月月序云:“天道南行,宜向南行,宜修南方。”^⑧而《纂要》正月则云:“是月天道南行,修造、出行,宜南方吉。”^⑨二者相同。此下,三月北方、四月西方、六月东方、七月北方、九月南方、十月东方、十二月西方,全同;而二、五、八、十一共四个月方向有异:二月西南(敦)——西(纂要)、五月西北——北,八月东北——东、十一月东南——南。与《协纪辨方书》所引《广圣历》^⑩比较,敦煌历日与《广圣历》全同,而《纂要》有四个月相异。相异之处在于,敦煌 986 年历日中四个月(二、五、八、十一月)天道方向为四维,《纂要》则只用四向而不用四维。不过,敦煌历日也有只用四向而不用四维的^⑪,说明《纂要》与敦煌历日的一部分天道行向是一致的,也说明敦煌历日在将近二百年时间中所采术数书籍并非一贯,其间应有出自不同术数家及其著作的差别。

三 天 赦

清《协纪辨方书》引《天宝历》曰:“天赦者,赦过宥罪之辰也。天之

生育……其日可以缓刑狱、雪冤枉、施恩惠，若与德神会合，尤宜兴造。”^⑫因此，天赦是上吉的大好日子。其规定为，每季一个干支日期为天赦日，全年共四个干支日期：春三月的戊寅日，夏三月的甲午日，秋三月的戊申日，冬三月的甲子日。比较结果，敦煌历日与《纂要》天赦日的安排完全一致^⑬。说明来源于同一术数文化。

四 往 亡

这是一个十分古老的神煞名称，顾名思义，“往亡”即往而亡之，是出行的忌日。《纂要》正月条云：“立春后七日为往亡（原注：并立春日数之）。”此后惊蛰后十四日、清明后二十一日、立夏后八日、芒种后十六日、小暑后二十四日、立秋后九日、白露后十八日、寒露后二十七日、立冬后十日、大雪后二十日、小寒后三十日，均为往亡日。

但除此之外，每月还有另一套“往亡”日，即正月寅日、二月巳日、三月申日、四月亥日、五月卯日、六月午日、七月酉日、八月子日、九月辰日、十月未日、十一月戌日、十二日丑日。这后一套所谓“往亡”日，据刘乐贤先生研究，实则为“土忌日”，即动土兴工的忌日^⑭，与“往亡”无关。

敦煌历日中的“往亡”日，据晏昌贵先生研究，共有两套排列规则，一套与《纂要》中的“往亡”排列完全相同，另一套则按历法月进行，如正月初七、二月十四、三月廿一、四月初八、五月十六、六月廿四、七月初九、八月十八、九月廿七、十月初十、十一月廿日、十二月卅日为往亡日。换言之，第一套所依据的是“星命月”，第二套所据为“历法月”^⑮。而据刘乐贤先生研究，第二套“往亡”在睡虎地秦简中已经出现，改为以星命月为据，则是东汉后的事情^⑯。这样，虽然敦煌历日中仍旧同时保留了早期的“往亡”排列规则，但就其主流来说，与《纂要》中往亡排列规则仍相一致，当无疑义。

五 归 忌

与往亡相似,归忌则是归家的忌日。《后汉书·郭陈列传》载:“桓帝时,汝南有陈伯敬者,行必矩步……还触归忌,则寄宿乡亭。”唐·章怀注引《阴阳书·历法》曰:“归忌日,四孟在丑,四仲在寅,四季在子,其日不可远行、归家及徙也。”章怀所引《阴阳书》恰是唐人吕才的作品,今仍有少量佚文存世^⑦。比较结果,敦煌历日、《纂要》归忌日的安排与《阴阳书·历日》全同。需要说明的是,《纂要》九月记“丑为归忌”,“丑”系“子”字误写。

六 月 神 方 位

敦煌历日中每月共有八个月神及其方位^⑧,即天德、月德、合德、月空、月厌、月煞、月刑、月破。《纂要》除无“月破”外,其余名目全同。其排列规则,除七月“天德癸”,《纂要》作“天德坎”外,其余全同。但在古代方位系统中,癸、坎均在北方,故而二者实际无别。至于其使用,则均同动土有关。如986年敦煌历日正月月序云:“天德在丁,月德在丙,合德在辛(原注:丙、辛上取土及宜修造吉)。”《纂要》正月条则云:“月内吉凶地:天德在丁,月德在丙,月空在壬,月合在辛,月厌在戌,月杀在丑。凡修造宜于天德、月德、月合上取土吉;厌、杀凶。”而“月刑”亦系于各月“起土”一目中。一致表明,就月神方位而言,敦煌历日与《纂要》有着共同的文化来源。

七 天 罡(刚)、河 魁(附建除)

此二日为月内凶日。清《协纪辨方书》引唐·桑道茂曰:“天罡、河

魁者，月内凶神也。所值之日百事宜避。”曹震圭为之解曰：“魁罡者，乃月建四煞之辰，平收之日也。”^⑩与敦煌历日相比较，完全一致。其安排规则可概括为：一、三、五、七、九、十一月之平日为天罡，收日为河魁；二、四、六、八、十、十二月之平日为河魁，收日为天罡。但是，《纂要》的天罡、河魁日却是以纪日地支为根据的，如正月“巳为天刚，亥为河魁”；二月“子为天刚，午为河魁”。表面上看，这二者不同，实际上却完全相同，因为在“星命月”中，正月“建”日与“寅”日相对应，则“平”日必在“巳”日，“收”日必在“亥”日，二月“平”日必在“午”日，“收”日必在“子”日。其余各月与此相仿。为便于读者对照省览，今将“各星命月中建除十二客与纪日地支对应关系表”附在这里：

纪日地支 星命月份	建除十二客	建	除	满	平	定	执	破	危	成	收	开	闭
正 月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二 月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三 月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四 月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五 月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六 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七 月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八 月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九 月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十 月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十一月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十二月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由以上比较可知，就天罡、河魁二凶神而言，敦煌历日与《纂要》亦有共同的文化来源。同时还要指出，天罡、河魁的安排均同建除安排有

关,且以建除及与之对应的纪日地支为据。既然敦煌历日与《纂要》天罡、河魁相一致,则二者建除安排也当一致。

八 九 焦(九 坎)

清《协纪辨方书》引《广圣历》曰:“九坎者,月中杀神也。其日忌乘船渡水、修堤防、筑垣墙、苫盖屋舍。”^②其排列规则,则又引《历例》曰:“正月在辰,逆行四季;五月在卯,逆行四仲;九月在寅,逆行四孟。”这里所谓的季、仲、孟,是对十二地支的划分。曹震圭释曰:“坎者陷也,险也、不平也,义与九焦同。”因此,敦煌历日“九焦九坎”连称,而《纂要》则单称“九焦”。它们在历日中的安排规则,用通俗语言表达,即:正月辰日,二月丑日,三月戌日,四月未日,五月卯日,六月子日,七月酉日,八月午日,九月寅日,十月亥日,十一月申日,十二月巳日。经对比,证明敦煌历日、《纂要》与此完全相同,毫无差别。

九 血 忌

血忌日亦一大忌日,忌针灸出血也。敦煌 986 年历日云:“血忌日不杀生、祭神及针灸出血”^③;《纂要》正月“丑为血忌,不可针灸、出血”,立义完全相同。至其安排规则乃是:正月丑日,二月未日,三月寅日,四月申日,五月卯日,六月酉日,七月辰日,八月戌日,九月巳日,十月亥日,十一月午日,十二月子日。敦煌历日与《纂要》亦毫无差别。

十 阴 阳 不 将

阴阳不将乃堪輿家言,其立义较为繁琐^④,这里不赘。至其应用,

则是规定每月之内有 12 至 14 个干支日属于阴阳不将日,为结婚嫁娶大吉之日。《纂要》正月列出十三个日子为阴阳不将日,其下注曰:“已上十三日不将日,嫁娶吉。”亦见其义。清《协纪辨方书》所定各月之干支日,与《纂要》各月阴阳不将日全同,无一日有差别。但在敦煌历日中,其表达形式则有三种:一在历注中,直接注明“阴阳不将”四字,如 986 年历日之二月十二日庚戌:一为简写成“不将”,如同历之三月十七日乙酉,十九日丁亥;一为“嫁娶吉”,如 986 年历日正月十日己卯、廿日己丑。至于其安排的干支日,亦与《协纪辨方书》所引《历例》相合不悖。

十一 行 狼、了 戾

行狼、了戾二煞亦出于《堪輿经》^②,规定三、四、九、十月各有一个干支日期为行狼,一个干支日期为了戾。具体而言,则三月甲申行狼,丙申了戾;四月乙未行狼,丁未了戾;九月庚寅行狼,壬寅了戾;十月辛丑行狼,癸丑了戾。比较 986 年敦煌历日,与此完全一致。但与《纂要》相较,则有一些问题。《纂要》记为:三月“甲申、丙申为行狼”,四月“乙未、丁未为行狼”,此二月是将各自的了戾混入行狼而未单列;九月则“庚寅为行狼、了戾”,显然在“狼”下脱“壬寅为”三字;十月则云“此月辛丑、癸丑为行狼、了戾”,干支不误,但表述方式亦欠准确。不过,行狼、了戾在《纂要》中亦仅见于三、四、九、十月,其余各月全无。这说明,《纂要》仅是具体文字有误,当作校勘,但其立义、规则与敦煌历日则是一致的。

十二 日 出 入 方 位

《纂要》卷一之末,绘有一副“日出没图”。就人们的直觉来说,住在北半球的人们看到每天太阳东升西落,而且由于季节的不同,其出没位

置在呈周期性的变化:夏至时约升于东北,没入西北,春秋二分升于东而没于西,冬至时升于东南而没入西南。至于其位置,古人是在一个方位图上进行表示的,此图共二十四个方位,正北为子,正南为午,正东为卯,正西为酉……《纂要》正月、九月日出乙入庚,敦煌历日载于正月月序中的日出入方位与此亦同,全年十二个月毫无差别^{②4}。

十三 四大吉时(四煞没时)

四大吉时,即每个月中,有四个时辰属于大吉大利之时,亦即无四恶煞之时,“以四煞既没,故又曰四大吉时。”^{②5}至其具体分布,《协纪辨方书》“四大吉时”条引《星历考原》曰:“正、四、七、十,四孟月用甲、丙、庚、壬时;二、五、八、十一,四仲月用艮、巽、坤、乾时;三、六、九、十二,四季月用癸、乙、丁、辛时。”敦煌 986 年历日与此完全相同。《纂要》表述上更为详细,如正月有云:“四孟之月,用甲时寅后卯前,丙时巳后午前,庚时申后酉前,壬时亥后子前。已上四时,鬼神不见,可为百事,架屋、埋葬、上官并宜用之。”由此可知,敦煌历日所用四大吉时,属于简化了的文字,而《纂要》则详引全文,区别仅此而已,其核心内容则相同。

十四 地 囊

地囊同纳甲有关,立义比较复杂^{②6},这里不赘。但就其所规定的日子来说,则每月有两个干支日,全年共有二十四个干支日属于地囊。《纂要》将其编入“起土”一目中,并云:“已上地不可起土修造,凶。”^{②7}可知它是同动土兴造有关的选择日期。这二十四个干支日期,清《协纪辨方书》引《历例》详述其干支,但清人认为有误,故又有一套校正意见^{②8}。《纂要》所列二十四个干支日,与《历例》有九个不合;敦煌 986 年历日中

共有十个干支日属于地囊,与《历例》相较,有一例不合;与《纂要》有四例不合。尽管如此,就整体来说,我认为《纂要》和 986 年敦煌历日都靠近《历例》,而与清人的校正意见相差更远。不过,986 年敦煌历日的地囊恐难代表敦煌历日的全部,在 P. 3284 背《唐咸通五年甲申岁(864)具注历日》中,似乎有另一种体系的地囊被使用。至于它的全貌,现在还不清楚,有待做进一步研究。

小 结

以上我们将敦煌历日与唐人韩鄂《四时纂要》所引唐代流行的术数文献中的选择事项,就其相同者进行了比较,结果是历日中最常见的十五个项目(包括建除)的选择立义与排列规则,基本一致,出入甚小。当然,这种比较的范围还是有限的,因为有些项目见于敦煌历日却不见于《四时纂要》,有些项目则相反,尚不能逐个进行直接比较。不过,可以直接比较者来说,我们大致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敦煌历日中的术数文化内容,基本属于中原文化系统,当无疑义。

注释:

- ① S. P. 6 号《唐乾符四年丁酉岁(877)具注历日》、S. 0612 号《宋太平兴国三年戊寅岁(978)应天具注历日》和《唐显庆三年(658)具注历日》、《唐仪凤四年(679)具注历日》、《唐开元八年(720)具注历日》。
- ② 谬启愉:《四时纂要校释》,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 年,第 5 页。
- ③ 同注②,第 1 页。
- ④ 同注②,第 3 页。
- ⑤ 刘乐贤:《简帛数学文献探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 335 页。
- ⑥ 邓文宽:《敦煌吐鲁番天文历法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 80—81 页。
- ⑦ 《中国方术概观·选择卷》(上),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 年,第 98 页。

- ⑧ 邓文宽《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593页。
- ⑨ 同注②，第5页。
- ⑩ 同注⑦，第198页。
- ⑪ 同注⑧，第118、145、165、172、182、189页。
- ⑫ 同注⑦，第204页。
- ⑬ 关于“天赦日”，亦请参见陈遵妣先生《中国天文学史》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654页注①。
- ⑭ 同注⑤，第297—314页。
- ⑮ 晏昌贵《敦煌具注历日中的“往亡”》，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9辑，武汉大学文科学报编辑部编辑出版，2002年，第226—231页。
- ⑯ 同注⑤，第307页。
- ⑰ 同注⑤，第79—84页。
- ⑱ 同注⑧，第738页。
- ⑲ 同注⑦，第174页。
- ⑳ 同注⑦，第213—214页。
- ㉑ 同注⑧，第592页。
- ㉒ 同注⑦，第189页。
- ㉓ 同注⑦，第192页。
- ㉔ 同注⑧，第174—175页。
- ㉕ 同注⑦，第261页。
- ㉖ 同注⑦，第243—244页。
- ㉗ 同注②，第17页。
- ㉘ 同注⑦，第244页。

“吐蕃纪年法”的再认识

吐蕃民族的历史,始终是“敦煌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这不仅因为从公元786年(唐贞元二年)至848年(唐大中二年)吐蕃是敦煌的统治民族,而且这段时间及其前后的历史包含着丰富的汉藏文化交流融合的内容。其中关于吐蕃民族的纪年方法,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问题之一。当年在编撰《敦煌学大辞典》时,我曾负责撰写了“吐蕃纪年法”词条,原表述是: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纪年方法。自唐初起,吐蕃王朝同中原王朝间来往密切,汉族的医药、历法等知识传入今西藏地区。吐蕃统治者积极吸收汉族传统的干支纪年法,但亦有所改变。自唐贞元二年(786)至大中二年(848),吐蕃贵族一直是敦煌的统治民族。这一时期,除当地汉人自编历日仍在使用干支纪年法外,吐蕃统治者使用一套具有民族特色的纪年方法。其具体方法是:汉族的十干变成木、火、土、铁、水并各分阴阳,仍具十数;汉族的十二地支以相应的十二生肖替代,二者相配,仍得六十周期的纪年方法,与汉族六十甲子的对应关系如表:(今略)。本表的读法是:吐蕃的“木阳鼠年”即相当于汉族的“甲子”年;“木阳狗年”即相当于汉族的“甲戌”年,其余类同^①。

这里我首先要做检讨的是,表中的“木阳”、“木阴”等,均当改作“阳木”、“阴木”等。《辞典》出版不久,我就发现了这个错误,当即通知副主编严庆龙先生,要求在重印时更正(已更正)。同时,吐蕃民族的纪年方法,除了上述词条的表述外,还应加上直接用十二辰或十二生肖纪年。这也是应该体现在词条里的,我却未写进去,当是失误。

显然,对于吐蕃这种纪年方法,我认为是他们积极吸收汉族的干支纪年法并加以改造的结果,这套方法用于纪年始于吐蕃民族。

不久前,李树辉先生对上述词条的表述提出了质疑。李先生在《敦煌研究》2006年第1期发表了《“阴阳·五行·十二兽相配纪年法”非吐蕃所创》一文(以下简称“李文”)。其主题思想是:“阴阳·五行和十二地支均为汉族传统文化。汉文、粟特文和回鹘文文献的记载也表明,‘阴阳·五行·十二兽(地支)相配纪年法’为汉族道家所创,是汉族僧侣所习用的纪年形式。如若根据创制者和最初的使用者命名,可称之为‘汉族僧侣纪年法’,而不宜称作‘吐蕃纪年法’。”^②

李文的发表引起了我的重视。为了探求学术真理,我又查阅了大量书籍,并求教了有关专家。最终的看法是,李文的基本观点难于立论,这一套纪年方法仍当称作“吐蕃纪年法”。

李文立论的主要根据有两个方面。其一为,“该纪年法至晚自五世纪后半叶开始,便为敦煌和高昌的汉人所使用,且一直使用到唐初。”为证实这一论点,李文举证了吐鲁番文书中的9条资料,时间自公元423年至623年,涉及的干支有:423年水亥岁(癸亥岁)、443年水未年(癸未年)、543年水亥年(癸亥年)、493年水酉年(癸酉年)、483年水亥年(癸亥年)、573年水巳岁(癸巳岁)、583年水卯岁(癸卯岁)、623年水未岁(癸未岁)。毫无疑义,以上各例纪年干支均由改“癸”为“水”形成。对此,李文解释道:“以上纪年中的‘水’字,学者们多认为系因避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名讳由‘癸’字而改(‘癸’、‘珪’同音),五行说‘壬癸为水’,

故改用‘水’字。这种纪年形式虽肇始于北魏，因避讳而为，但可视为‘阴阳·五行·十二兽相配纪年法’的间接证据。”

这里，李文存在着论证方法的不足和逻辑缺失。

作者认为北魏因避道武帝拓跋珪名讳，据“壬癸为水”改“癸”为“水”，是可以成立的。但由此认为，这种改字“可视为‘阴阳·五行·十二兽相配纪年法’的间接证据”，便走得太远了。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阴阳家那里，方位、干支、五行、五音相配时有如下关系：东方甲乙木（角音），南方丙丁火（徵音），中央戊己土（宫音），西方庚辛金（商音），北方壬癸水（羽音）。这种配合关系，就传世文献来说，至晚在《淮南子·天文训》中已有记载^③；就出土资料来说，约在公元前278年至前246年间形成的睡虎地秦简《日书》中也有部分反映^④。也就是说，将天干分为五组，每组二个，与五行（木、火、土、金、水）相配，早在战国秦汉时即已存在。而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是，这种我称之为“吐蕃纪年法”的纪年方法里，用以代替十干者，是将五行各分阴阳而成的。这里特别重要的是将五行各分阴阳用以代替十干。但李文所举的资料至多只能证明中国古代十干与五行的简单配合关系，并在北魏避讳时曾加应用，丝毫不见五行各分阴阳以代十干的踪影。同时，“吐蕃纪年法”又用十二生肖代替十二地支，在作者所举9条材料中，连一点蛛丝马迹也没有。可是作者却说，这是他所认为的“‘阴阳·五行·十二兽相配纪年法’的间接证据”。作者所用资料不能应对他的立论命题，这不免使我感到十分遗憾。

李文立论的第二组资料依据是敦煌吐鲁番所出具注历日。李文说：“敦煌吐鲁番文献中保存有大量的历书，许多当地编撰的历书都采用的是‘日期、天干、地支、五行、建除十二客’相配的方法。……其中有5点颇值得注意……2，五行名均依次使用了两次，正与回鹘和吐蕃使用的‘阴阳·五行·十二兽相配纪年法’相合；……”李文进一步设问并

论证说：“敦煌、吐鲁番汉文文献中是否有直接使用‘阴阳·五行·十二兽(地支)相配纪年法’的材料呢？编号为 S. 2506、P. 2810a、P. 2810b、P. 4073、P. 2380 的 5 件文书的内容，为唐代与《庄子》并重非常流行的道经《文子·下德篇》及写经题记；B 面为《唐开元九年(721 年)至贞元四年(788 年)大事记》，……这 5 件文书不仅全使用了这一纪年方法，五行名世(字?)连续使用了两次，而且连续记载了唐开元九年至贞元四年 64 年间的大事。”为了进一步支持自己的观点，李先生又举王国维对 S. 2506 的论述：“每年下纪甲子名及所属五行。盖占家所用历，以验祸福者，非史家编年书也……”李文接着说，“称其为‘占家所用历’，与笔者的观点正相吻合。5 件文书 A 面的内容正是道教的经典《文子·下德篇》，且写经题记也明确表示，进行初校、再校、三校的人为‘道士’。”“笔者推测，该纪年法为道家所创，并为敦煌、吐鲁番地区(亦可能为全国)的道家所沿用。自河西陷蕃，当地同中原王朝的联系被阻断后，该纪年法便与翟奉达、翟文进、王文君、安彦存等人编撰的历书同时为民间所采用。”

读完李文的上述内容，我心情不免有几分沉重。因为，不论是国学大师王国维，还是该文作者李树辉先生，都将代替天干的五行和代替五音的五行混为一谈了。

在敦煌吐鲁番所出的数十件中古具注历日中，每天纪日的那一栏中，一般由“日序加干支(不是李文所说的‘天干加地支’，而是一个完整的‘纪日干支’)加纳音加建除”组成，其中“纳音”原应为宫、商、角、徵、羽，但却用土、金、木、火、水分别加以替代。李文所举的 S. 2506 号纪年干支加“五行”实际也是该干支与其对应的“五音”配在一起，而非干支与“五行”配合的结果。宋人沈括曾解释说：“六十甲子有纳音，鲜原其义。盖六十律旋相为宫法也。一律含五音，十二律纳六十音也。凡气始于东方而右行，音起于西方而左行，阴阳相错，而生变化。所谓气始

于东方者，四时始于木，右行传于火，火传于土，土传于金，金传于水。所谓音始于西方者，五音始于金，左旋传于火，火传于木，木传于水，水传于土。”^⑤清儒钱大昕在《潜研堂文集》卷三“纳音说”中也有详明的解说，兹不详具。我曾将敦煌文献中的“六甲纳音”绘为一表^⑥，亦可参看。而李文所举 S. 2506 等五件文书中的纪年干支所配“五行”，正是“六甲纳音”。

我们所讨论的“吐蕃纪年法”，将五行配上阴阳后，其与天干的对应关系为：甲——阳木，乙——阴木，丙——阳火，丁——阴火，戊——阳土，己——阴土，庚——阳铁，辛——阴铁，壬——阳水，癸——阴水；而“六十甲子纳音”法的对应关系则为“甲子、乙丑金，丙寅、丁卯火”等等。前一知识中的五行只同天干有关，而与地支无涉；后一知识中的“五行”却与一个完整的干支（包含天干与地支）相连，且用以代替五音。这两种知识是不能互代的。试举二例以见其不同。在我所编制的《六十甲子纳音表（附干支与五行对照表）》^⑦中，“丁亥”这个干支，天干“丁”为“火”，地支“亥”为“水”，而“丁亥”这一干支的纳音为“土”。纳音“土”与天干“火”怎能互代？再如，“辛酉”中的“辛”为“金”，“酉”亦为“金”，但“辛酉”这一干支的纳音为“木”。纳音“木”与天干“金”又怎能混为一谈？

正因为在对敦煌文献原始含义的理解上发生了基本的知识性错误，所以李文用以支持自己观点的材料（S. 2506 等），同他的论题之间已不搭界，自然无法获得支撑。进而认为“道士”所进行的初校、二校、三校，可以证明这种纪年法源自道家，就更加难于成立了。

当我初次拜读李文时，也曾推想，如果这种纪年法果真出自道家，那么在道教文献和文物中应该有所体现。于是，我去电话请教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的王卡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王育成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刘屹博士。这三位道教文献与文物研究专家的共同答复是：“没见过。”

顺便说明一下,李文还出现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虽然已非本文主旨,但为避免产生误导,还是指出为好。李文云:“甲子纪年早在甲骨文中便已出现。”我们知道,甲骨文中已有完整的六十干支表,但干支用于纪年却是很晚的事情。已故天文学史专家陈遵妫先生曾指出:“一般认为东汉四分历,开始以六十干支纪年,谓之青龙一周。自此以后,连续至今没有间断。”^⑧用干支纪年始于东汉,这已是学术界的共识。那么,此前古人用什么方法纪年呢?是“岁星纪年法”和“太岁纪年法”。今天,很多历表上先秦年代亦有干支,但那是后人推补上去的,万万不可上当。

既然李文的立论困难重重,不能成立,那么这一套纪年法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我们先看一下当今最流行的几种工具书对这种纪年方法的解释:

《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学》有已故科技史专家严敦杰教授所写的“藏历”条目,内云:“今西藏自治区拉萨大昭寺前保存有长庆年唐蕃会盟碑,碑文为藏文,碑中有藏历与唐历的对照。碑文中说:‘大蕃彝泰七年,大唐长庆元年,即阴铁牛年,孟冬月十日也。’孟冬月为冬季第一个月。藏历纪年以五行、十干、十二支配合。十干配五行,木以甲阳乙阴,火以丙阳丁阴,土以戊阳己阴,金以庚阳辛阴,水以壬阳癸阴。干支纪年以五行区别阴阳,不用十干之名。十二支则用十二兽名。故上阴铁牛年(铁为金)即为辛丑,与唐长庆元年干支相合。”^⑨

由著名天文学家叶叔华教授主编的《简明天文学词典》亦设“藏历”辞条,内云:“《藏历》亦采用干支纪年,但以‘阴阳’与‘木、火、土、金、水’五行相配代替十干,以十二生肖(鼠、牛、虎……)代替十二支,再以阴阳五行与十二支相配成特殊的干支:甲子为阳木鼠,乙丑为阴木牛,丙寅为阳火虎……例如,1986年的《夏历》为丙寅年,《藏历》则为阳火虎年。”^⑩

中国历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所编《中国历史大辞典》同样设了《藏历》一条，中曰：“《藏历》亦采用干支纪年，以‘阴阳’与‘木、火、土、金、水’五行相配代替十天干，以十二生肖（鼠、牛、虎……）代替十二地支，再以天干、地支相配成：阳木鼠、阴木牛、阳火虎……其对应如下两表（今略）。”^⑪

如果我理解不误的话，上述三种辞书与我在《敦煌学大辞典》中对“吐蕃纪年法”所作的表述属于大同小异。只不过我强调了“吐蕃统治者积极吸收汉族传统的干支纪年法，但亦有所改变”。

我这样说，根据何在？

这里，要想将相关问题解释清楚，仅仅从汉文典籍着眼是不够的，我们有必要借助藏学研究者的成果来说明问题。

《西藏研究》1982年第2期发表了藏族学者催成群觉、索朗班觉两位先生的《藏族天文历法史略》^⑫一文，同文附有汉族学者陈宗祥与藏族学者却旺二先生所作的校释。该文虽然不长，却较为系统地论述了藏族天文历法的发展简史，其中说到：

公元七〇四年，赤德祖赞时期黄历历书《暮人金算》、《达那穷瓦多》、《市算八十卷》、《珠古地方的冬、夏至图表》、《李地方的属年》、《穷算六十》等典籍传至吐蕃地区^⑬。

陈宗祥、却旺二先生为《穷算六十》做了如下的解释：

《穷算六十》的“穷部”byung rtsi 是个姓氏。“穷算六十”与“李地方”的算法不同。其主要特点是十二生肖与五行配合算的。每两年配一“行”。（着重点为本文笔者所加，下同）例如去年（按，指1978年）土马，一九七九年是土羊，一九八〇年是铁猴，一九八一

年是铁鸡……等。 $12 \times 5 = 60$ ^⑭。

这至少可以说明，在公元七〇四年，即中原王朝武则天统治的末期，有一套变异了的《六十甲子表》传入了藏区。这套表格的内容是，以五行（木、火、土、铁、水）各用两次，仍具十数，又以十二生肖代替十二地支。虽然这套方法的原始产生地，我们尚不能指证，但认为它来自汉地，大概不会有错。

不过，有了这一套变异的干支搭配，却不等于说它立即就用来纪年。就像六十干支表远在甲骨文中已经出现，但用于纪年却始于东汉《四分历》一样，这套变异了的干支用于纪年并引入历法，约在百年之后。催成群觉和索朗班觉的文章进一步指出：

吐蕃赞普赤松德赞点燃了算学的明灯，曾把四名吐蕃青年派往内地，投向塔提里学习算学经典。其中朗措东亚(lang tsho ldong yag)之孙定居在康区。他的后代木雅·坚参白桑(mi nyag rgyal mtshan dpav bzang)从康区来到西藏，居住在玉波扎朗的山洞(今称扎朗县的“握嘎山洞”)。坚参白桑对初译汉历的五行推算、黄历等是很精通的。他到西藏后反复研究当地的天文历算、气象和地理。他深入实际，吸取群众的经验，连放羊者、渔民也成为他访问的对象。他根据青藏高原的特点，结合汉历和黄历，以木鼠为年首进行推算，撰写了有关天文和历法的书。后来出现了坚参白桑的后裔，诵持密咒的伦珠白，和许多精通天文星算的学者，并推行了“山洞算法”。^⑮

木雅·坚参白桑，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人！是他认真学习了汉地的天文算学，吸纳了汉历和黄历的知识，创造了“以木鼠为年首进行推算”的

历算方式。而这一套方法已见于公元704年传入藏区的《穷算六十》，百年后成为藏人的纪年方式，并沿用至今。诚如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编著的《中国天文学史》所指出的那样：“藏族不但完全接受了十二生肖法，而且还配上也是来自汉族的金、木、水、火、土这五行和阴阳，构成了六十循环的纪年法。这是汉族六十干支法的一种生动具体的形式。”^⑩

这里还需说明的是，赤松德赞的在位时间为公元755—797年^⑪，相当于唐玄宗天宝末年至唐德宗贞元中期。既然朗措东亚等四人是他在位时派往汉地学习天文历算的，而且朗措东亚的子孙辈创造性地借用了汉地已经变异的六十甲子以纪年，其开始使用时间当在公元八世纪下半叶至九世纪初前后。不过，其最下限的时间不能晚于公元823年，即唐穆宗长庆三年。因为著名的《唐蕃会盟碑》上已用了我所称的“吐蕃纪年法”以纪年代。

与“吐蕃纪年法”相比，《穷算六十》的六十周期表，虽然每连续两年用五行中的一“行”，但该“行”却未见分出“阴阳”。我不知道是催成群觉等先生未表达出来，还是原本就是如此？若果原本未分阴阳，对连续两年使用的一“行”分一下阴阳，则十分简单。因为吐蕃人吸收了许多汉地阴阳文化的知识。

催成群觉等在论文中又据《西藏王统记》记载指出，早在唐初文成公主进藏前后，松赞干布就曾派过四位青年赴汉地学习算学等学问。此后“在西藏传播最广泛的有：以五行计算的算学，十二生肖纪年法，人寿六十花甲，八卦、九宫黄历推算，二十四个节气，‘年算’等。其中十二生肖纪年法和六十周期纪年法，在群众中有深刻影响。……西藏广大地区是以十二生肖来记年，以五行配合来分别的记岁法，群众中如今仍在应用。”^⑫

藏学专家王尧教授亦曾指出：1434年成书的《汉藏史系》记载，松

赞干布时，四位派去汉地学习的青年，所习内容有《摄集证树之木续》、《神灯光明之火续》、《甘露净瓶之水续》、《隐匿幻艳之土续》、《黑色丹铅之铁续》以及其它十支古籍秘诀等等^⑩。五行学说在藏区流布之广泛由此可见一斑。换言之，在连续二次使用的同一“五行”中，区分一下阴阳应当是十分简单的事情。

根据以上所述，我在“吐蕃纪年法”词条中说“吐蕃统治者积极吸收汉族传统的干支纪年法，但亦有所改变”，“吐蕃统治者使用一套具有民族特色的纪年方法”，恐怕没有什么大错吧？

不过，吐蕃民族的这一纪年形式在藏区并不十分流行，藏历专家黄明信先生在《西藏的天文历算》一书中指出：“六十干支纪年——用金、木、水、火、土各分阴阳以表示十天干，虽已见于会盟碑，但在当时未必曾经通行，现在我们所见到的确实可靠的吐蕃王朝时期的文献里，除会盟碑一例外，只有使用十二动物纪年的，而没有表示十天干的阴阳五行的。”“尤有甚者，《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大事编年》记公元 650—763 年 110 余年间的的大事，写于金成公主进藏后 50 余年，纪年仍只用十二动物属肖，没有一处，一处也没有用到阴阳五行表示的天干。”^⑪若然，我在“吐蕃纪年法”词条中，就更应该强调吐蕃使用十二生肖与十二地支纪年。进而我更感到自己所写词条存在不周之处。

木雅·坚参白桑据汉族变异了的六十甲子表所创的这一套纪年方法，虽然在藏区不很流行，但在靠近藏区的其他一些少数民族中却得到了传播。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我在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工作期间，为配合《中国天文学史》一书的编写，曾与几位同事共同进行过一些少数民族天文历法的考察工作。陈宗祥、王胜利二位先生与我一起到大小凉山彝族地区去过。在甘洛县文化馆，我们见到一本“毕摩”（巫师）推算祸福的彝文《年算历》，其中所用的纪年方法与“吐蕃纪年法”完全相

同^①。只不过,我们当时未用“阴阳”,而是用“公母”去区分。由于我不懂彝文,只能听从彝文专家的意见。今天来看,所谓“公”与“母”,实质上就是“阳”与“阴”,还是用“阴阳”为好。

所谓的“吐蕃纪年法”,在云南纳西族文献中亦有记载。纳西历史专家朱宝田先生和天文史专家陈久金教授在他们合作的《纳西族东巴经中的天文知识》一文中也指出:“人们也曾设法将汉区的六十干支介绍到纳西地区,但由于干支的名称没有具体的意义,记忆起来很是不便,因而便试图从其他途径来间接地传播和应用这种知识。幸好藏族人民已经对六十干支作了适合藏民使用的改革,将十二属相代替地支,以五行加阴阳代替十干,这就大大地方便了人们的记忆,因而纳西人便从藏民那里学得了以五行配十二属相组成的六十个序数作为纪年的周期。……藏民学习了五行思想后,是以铁代金的,六十纪时序数传入纳西地区以后,也保持了以铁代金的习惯。”^②

在另外一处,陈久金教授又指出:“这种六十周期的配合方法,在古羌语系民族,例如藏族、党项族、彝族中均有发现。”^③

综合上述所论,大概在唐代武则天末期,一种变异了的六十干支表由汉地传入藏区。约在八世纪下半叶至九世纪初前后,藏人木雅·坚参白桑据之创造了“吐蕃纪年法”。此法在吐蕃地区使用虽少,但却传入了西南地区的其他少数民族,变成各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可以说,由汉到藏,再传布到其他一些民族,使人不能不认为这是中国古代史上汉族与西南各少数民族互相学习、共同进步的极为辉煌灿烂的一页!

(原载《敦煌研究》2006年第6期,第97—102页)

注释:

①《敦煌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第464页。

②《敦煌研究》2006年第1期,第72页。以下凡引李文不再出注。

- ③ 陈广忠《淮南子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第108页。
- ④ 《中国方术概观·选择卷》(上)，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第62页。
- ⑤ 李文泽、吴洪泽《梦溪笔谈全译》，巴蜀书社，1996年，第69页。
- ⑥ ⑦ 拙编著《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747页，附录十二。
- ⑧ 陈遵妣《中国天文学史》第三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359页注③。
- ⑨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0年，第558页。
- ⑩ 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第595页。
- ⑪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第3251页。
- ⑫ 《西藏研究》1982年第2期，第22—35页。
- ⑬ 同上，第25页。
- ⑭ 同注⑫，第32页。
- ⑮ 同注⑫，第27页。
- ⑯ 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16页。
- ⑰ 藏族简史编写组《藏族简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7页。
- ⑱ 同注⑫，第25页。
- ⑲ 王尧《河图·洛书在西藏》，载《中国文化》总第5期，1991年12月，第135—137页。
- ⑳ 黄明信《西藏的天文历算》，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93—94页。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迄今所见，“吐蕃纪年法”除见于《唐蕃会盟碑》外，还见于敦煌莫高窟第365窟藏文题记：用“水阳鼠年”指公元832年(壬子年)，“木阳虎年”指公元834年(甲寅年)。详见黄文焕《跋敦煌365窟藏文题记》，载《文物》1980年第7期，第47—49页。
- ㉑ 陈宗祥、邓文宽、王胜利《凉山彝族天文历法调查报告》，载《中国天文学史文集》(2)，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01—148页。“彝族纪年六十周期表”见第113页。
- ㉒ 同上《中国天文学史文集》(2)，第41—44页。
- ㉓ 陈久金主编《中国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丛书·天文历法卷》，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第356页。

跋吐鲁番文书中的两件唐历

1973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曾出土两件唐代写本具注历日。一件出自二一〇号墓(载《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六册,第73—76页),一件出自五〇七号墓(载《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五册,第231—235页)。虽残破过甚,但均是唐代早期历日实物,对研究初唐历日制度和历日内容的演进,仍堪称珍贵。

一

二一〇号墓历日释文如下(序号为行数,原为竖行,下同):

[前缺]

1. 恩天赤^①母

2. 四月小

3. ☐月大 八月☐ 九月☐ 十月大 十一月☐

4. ☐月大

5. ☐☐甲申水破 岁位、阳破阴冲。

6. ☐日乙酉水危 岁位、小岁往后(“往后”二字间原有互乙符号)亡、葬吉。

7. ☐日景戌土成 岁对小岁后。

8. 四日丁亥土收 岁对小岁后、嫁娶、母仓、移徙、修宅吉。
 9. 五日戊子火开 岁对母仓、加冠、入学、起土、移徙、修井
 灶、种蒔、疗病 [吉]。

10. 六日己丑火闭 岁对归忌、血忌。

11. □□□□□□ 三阴孤辰。

[中缺]

12. □□□□□□□ □□□ [岁]前九坎、疗病、斩草吉。

13. □□□□□□□ [满] 岁后小岁前，母仓。

14. □□九日己亥木平 岁后，祭祀、纳妇、加冠吉。

15. 廿日庚子土定 岁后，加冠、拜官、移徙、坏土墙、修官
 室、修碓硙吉。

16. 廿一日辛丑土执 岁后，母仓、归忌、起土吉。

17. 廿二日壬寅金破 岁后，疗病、葬吉。

18. 廿三日癸卯金危 岁后，结婚、移徙、斩草吉。

19. 廿四日甲辰火成下弦 阴错。

[中缺]

20. □□□□□□□ [九] [月] [节] [岁] [对] 天恩、[母] [仓]、祭祀、拜官、
 结婚、[嫁] [娶]、入[学] [修] □□□□

21. 四日癸未木收 岁对天恩，纳征、嫁娶吉。

22. 五日甲申水开 岁对葬、解除。

23. 六日乙酉水闭 岁位小岁前，塞穴、解除、葬吉。

24. 七日景戌土建 岁位小岁前。

25. 八日丁亥土除 岁位小岁前，修井、碓、硙，疗病，解除，
 扫舍吉。

26. 九日戊子火满上弦 岁位归忌。

27. 十日己丑火平 岁位。

28. 十一日庚寅木定 行□。

29. □二日□□□□ □□□□

(73TAM210:137/1、137/3、137/2)

残历 7 行、24 行两“丙戌”均作“景戌”，系避唐先祖名讳而改，可知为唐代历日无疑^②。对于其确年，原编者在释文前说明如下：“本件纪年已缺。知前为正月，并推知元日为甲申。又据行二〇‘九月节’一句，知此段为残九月历，并推知一日为庚辰。12 至 19 行虽残，未知何月，亦可推知一日为辛巳。查《二十史朔闰表》知唯高宗显庆三年元日为甲申，九月一日为庚辰，其年七月一日为辛巳。因定本件纪年为唐显庆三年。”所定年代正确无误，这里略加分析。

其一，关于第 20 行“九月节”。查二十四节气，九月节为寒露；四日癸未，一日当为庚辰，即其朔日，以此段为九月历日亦无误。所可注意者，古代历日所标某月节气与历日月份并不完全对应。节气是按照太阳在黄道位置确定的，而历日月份则是朔望月，以月亮圆缺为依据。因此，十二个朔望月同二十四节气一周相差近十一天。古人为使节气所在农历月份相对稳定，以利农业生产，便需置闰。而一旦发生闰月，节气与原在月份就会错开，进入上月之后半月，约经十个月才能逐渐恢复到对应的月份。如此历所标“九月节”在九月三日，若此前数月内有一闰月，“九月节”就会提前，注在八月后半月某日之下，本文以下讨论的第二件历日即属此类。因此，单凭节气月份判断残历月份并不可靠。幸好显庆三年无闰月，显庆二年虽闰二月，但相去已远，故这里的“九月节”与九月正好相当，否则就需格外注意。

其二，原编者说明 12 至 19 行一段历日“未知何月，亦可推知一日为辛巳”。辛巳为此段历日月朔无疑，月份亦可考知。依据残历 14 行“[十]九日己亥木平”，并据六十甲子纳音^③及建除十二客的排列次

序^④，逆推可得：13行是“十八日戊戌木满”，12行是“十七日丁酉火除”，再前一日是“十六日丙申火建”。建除十二客虽是古代历日中推算吉凶的迷信方法，但“建”字与所在日期地支间却有一定规律，其对应关系是：

“建”字所在日期范围	对应日期地支
立春——惊蛰前一日	寅
惊蛰——清明前一日	卯
清明——立夏前一日	辰
立夏——芒种前一日	巳
芒种——小暑前一日	午
小暑——立秋前一日	未
立秋——白露前一日	申
(以下依次排列，略)	

立秋为七月节，白露为八月节。由残历推出的“十六日丙申火建”，“建”与该日地支“申”相应，正处于二节之间。由残历“九月节”寒露在九月三日又可推知，该年立秋、白露二节分别在七月初和八月初，可知此段历日当在七月初至八月初。残历日期又都在下半月，故知此段历日当属七月。这样，此墓出土的三段历日，分别为正月、七月和九月，朔日依次为甲申、辛巳和庚辰。以此三月朔日并结合2—3行所记各月大小，与《二十史朔闰表》相对照，同唐显庆三年完全一致，就可确知其均为显庆三年(658)历日。

显庆三年，唐用傅仁均《戊寅历》。此历颁行于武德元年(618)，至显庆时误差已多，故又于麟德二年(665)改行李淳风的《麟德历》^⑤。从历法史角度看，残历是《戊寅历》行用后期的历日，也是现知《戊寅历》实

行期间的唯一历日实物。此时定朔尚未引入历日，残历中的朔日都应是平朔，节气也是平气。

二

五〇七号墓历日释文如下：

[前缺]

1. ☒丑金破望
2. ☐八日景寅火危
3. 十九日丁卯火成
4. 廿日戊辰木收
5. 廿一日己巳木开
6. 廿二日庚午土 ☐
7. 廿三日辛未 ☒土 ☐
8. 廿四日壬申 ☒金 ☐
9. 廿五日癸酉 ☐ ☐
10. 廿六日甲戌 ☒土^⑥ ☐
11. 廿七日乙亥 ☐ ☐ ☐祭祀^祀内财
12. 廿八日景子 ☐ ☐ ☐位祭祀加冠纳
13. 廿九日丁丑 ☐ ☐ ☐归忌。
14. 卅日戊寅 ☒土 ☐ 岁位解除吉。
15. ☒土 危 岁位天恩往亡结婚
16. ☒辰金成^{后伏} 岁对厌天恩母仓
17. 金收 岁对天恩加冠
18. 木开 岁对天恩加冠

19. 木闭 岁对天恩母仓

20. 水建 岁对复

21. 除 三阴

22. 处暑七月中

[后缺]

(73TAM 507:013/4—1)

以下还有数段，因过分残碎，于断年无补，从略。

残历 2 行“景寅”、12 行“景子”，仍系讳“丙”而改，知其为唐代历日。至于确年，原编者态度审慎，仅题为《唐历》，不作定论。笔者认为也可考明。

残历 15 行以下日期全失，但 14 至 15 行间系两纸粘连处，本身已具有纪日连续性的可能。从纪日干支看，14 行卅日戊寅，15 行当为下月一日己卯，16 行二日当为庚辰。16 行干支残存一“辰”字，正相符合。以下可逐日填齐，直至八日“景戌”。从六十甲子纳音看，14 行卅日戊寅为土，下一日己卯亦为土。残历 15 行虽失日期干支，但仍存一“土”字，也与所推干支相符合。从建除十二客看，第 5 行廿一日己巳为“开”，第 15 行为“危”，中间残失某月廿二日至卅日的建除十二客。二十一日既作“开”，以下由二十二日至卅日依次当作：闭(廿二日)、闭(廿三日)、建(廿四日)、除(廿五日)、满(廿六日)、平(廿七日)、定(廿八日)、执(廿九日)、破(卅日)，与 15 行的“危”正相衔接。“闭”字所以重复一日，亦取决于建除十二客的特殊规律：节气(非中气)所在之日重复前一日一次。以此检查残历，22 行注有“处暑七月中”，为八日，则此前的“立秋七月节”当在处暑前十五天多(其时用平气)，即第 7 行廿三日之下。廿二日为闭，则廿三日应重复一次，仍作“闭”。^⑦以上说明，残历的干支、六十甲子纳音、建除十二客都是连续的，应是连续书写的历日。

残历月份。由前述考察可知,第8行“廿四日壬申金□”,“金”字下当填“建”字。“建”字所对应的该日地支“申”之日期,应在立秋七月节和白露八月节之间(详前)。前又推得“立秋七月节”在第7行“廿三日辛未”,正当其前。但这并不能说明残历前14行是某年七月的历日。前已说明,只要此前数月内曾有闰月,则节气就会提前进入上月之后半月,节气月份与农历月份不再对应,本件历日即属此类。“处暑七月中”注在22行八日(推算所得),则“立秋七月节”所在的上月廿三日应属六月。换言之,残历所存是某年六月十七日至七月八日部分。而由残历日期干支又可推得,六月大,己酉朔;七月[?],己卯朔。

残历确年。前由讳“丙”为“景”得知,此历为唐代历日。以六月己酉朔与七月己卯朔,同《二十史朔闰表》相对照,有唐一代仅唐高宗仪凤四年(679)和唐文宗大和三年(829)与此相当。同墓所出数十件文书,有确切纪年者,上限为高昌延寿六年(629),下限为唐高宗调露二年(680),仪凤四年(679)正在此一时间范围之内,而文宗大和三年在一百数十年之后,相距甚远。再检以《二十史朔闰表》,仪凤三年闰十月,致使节气和月份错开,正是残历立秋七月节注在六月下旬的原因。因此,应定此件为《唐仪凤四年具注历日》。

仪凤四年,唐朝行用李淳风的《麟德历》。此历有两大创新,一用定朔排历谱,二以无中气之月置闰,但节气仍用平气^⑧。不过,使用定朔并不彻底。为了克服四个大月或三个月小月相连的现象,制历者或将朔日下推一日,使第三个月小月变为大月,或上退一日,使第四个大月变为小月。故残历的朔日并非一定全是定朔,节气则是平气。

传世文献所载仪凤三年之闰月,《旧唐书·高宗纪》为闰十月,《新唐书·高宗纪》为闰十一月,故陈垣先生《二十史朔闰表》两说并存,遂成千古之谜。以此残历“处暑七月中”在仪凤四年七月八日,逆推可得,仪凤三年冬至十一月中气在十一月一日,且上月为小月,则大雪十一月

节气必在该小月之十五日，此月遂成无中气之月，即闰月。质言之，仪凤三年当闰十月，而不闰十一月。此谜由此而涣然冰释。反之，由闰月的确定也可证明我们所定年代正确无误。

三

历书行用区域，是封建王朝权力所及的重要象征。唐于贞观十四年(640)平高昌国，设西州，开始对高昌地区实行有效的行政管理。两件历书出土于阿斯塔那墓地，亦是明证。

两《唐书·历志》所载《戊寅历》和《麟德历》，主要是其推步方法和数据，而此前却未见到二历的实物样本^⑨。显庆三年和仪凤四年唐历的出土，恰好弥补了这一不足。

古代历日内容如何演变发展，以往由于实物太少而无从寻觅其发展轨迹。见于敦煌文献的数十件历书，最早者为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历和十二年(451)历^⑩，此外大多是晚唐至宋初的敦煌地方具注历日，间有中原王朝历日，也为数甚少。唐前期的历书则未见到。这两件历日实物的出土，使我们有了粗略地勾画历日内容演进轨迹的可能。

北魏太平真君历内容至为简单。如十一年历正月是：“正月大，一日壬戌收，九日立春正月节，廿五日雨水。”其下各月仿此，间有社日和腊日的注记。总体上看，也只有月大小、朔日干支、建除十二客和二十四节气。除建除十二客属于迷信，其余都很实用。至唐初，显庆三年历和仪凤四年历不仅包含了北魏历日的基本内容，而且又增入如下各项：(1)序言中注明各月大小；(2)逐日日期、干支、六十甲子纳音；(3)弦望；(4)三伏天；(5)逐日吉凶注。(1)、(3)、(4)为实用内容，(2)、(5)多为迷信。但内容仍较简单。至晚唐五代，不仅敦煌地方历日，而且中原历日，如《唐乾符四年历》^⑪，内容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晚唐至宋初的敦

煌历日大体可分繁简两种。简本历日与显庆三年和仪凤四年历大致相同,而繁本迥异。一般来说,繁本历日包括八项内容:(1)日期、干支、六十甲子纳音、建除十二客;(2)弦、望、往亡、没、籍田等注记;(3)节气、物候;(4)逐日吉凶注;(5)昼夜时刻;(6)日游;(7)人神;(8)蜜日(星期日)注,以朱书或墨书注于当日顶端。每件历日都有较长的序言,内有年九宫图、年神方位,五姓吉凶月所在等。每月之首有月九宫图、月大小、月建干支及天道行向、月神所在位置、四大吉时等。科学内容和迷信几乎是在同步猛增。其中星期制度系经西域引入,当时仍用于占卜^②,但也反映了唐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繁荣。月建干支传为唐代方士所创^③,一改此前长久的以地支纪月。繁杂的吉凶注,则由汉代以来阴阳家、堪舆家、建除等家著述中的陋说撮取而成。晚唐五代繁本历日的内容,奠定了宋至清代历书的基本格局,可知这是古代历日由简到繁的转折时期。

总之,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阿斯塔那墓地所出两件唐历都很有价值。

(原载《文物》1986年第12期,第58—62页)

注释:

- ① 赤:当释为“赦”,此行残存四字,前当填“天”,成“天恩”;后当填“仓”,成“母仓”。依堪舆家说,天恩、天赦、母仓均是吉辰,于此并列而言。就每项而论,在敦煌历日中颇为习见,释“赤”即难通解。
- ② 五代后唐以唐为正宗,历日亦改“丙”为“景”。如罗振玉《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所收后晋天福四年己亥岁(939)具注历日。此时已入后晋,但敦煌不知中原改年号,仍奉后唐正朔,历日以“丙”作“景”。故不可一概而论。
- ③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纳音说》。
- ④ 建除十二客的排列次序为:建、除、满、平、定、执、破、危、成、收、开、闭。凡节气(非中气)所在之日重复前一日。如残历20行当是“三日壬午木成寒露九月节”,则上一日是“二日辛巳金成”,一日注“危”字。参见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三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646页及第1647页注⑤,第

1665—1666 页。

⑤ 参见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编《中国天文学史》，科学出版社，1981 年，第 83 页。

⑥ 土：原字残存上半，依六十甲子纳音法，甲戌徵音属“火”，释“土”误。

⑦ 同注④。

⑧ 同注⑤。

⑨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之《斯坦因劫经录》2620 号题名《大唐麟德历》，误。这件文献的确切内容是唐大历十三年（778）至建中四年（783）的年神方位图。台湾所出《敦煌宝藏》亦未辨明。

⑩ 苏莹辉将录文刊布于所作《敦煌所出北魏写本历日》一文，载台湾《大陆杂志》1 卷 9 期。

⑪ 藏英国图书馆，编号 S. P. 6，图版见《中国古代天文文物图集》，文物出版社，1980 年，第 66—67 页。

⑫ 参见王重民《敦煌本历日之研究》，见《敦煌遗书论文集》，中华书局，1984 年，第 116—133 页。

⑬ 参见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 3 册，第 1366 页。

吐鲁番出土《唐开元八年(720) 具注历日》释文补正

吐鲁番阿斯塔那 341 号墓出土一件唐代历日残片(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 8 册,第 130—131 页)。历日虽仅存 5 行,且文字不全,但仍然是极为难得的唐代历日实物。残历经整理已发表释文,笔者不揣谫陋,特试作补正如下。

为便于讨论,兹将原释文和注释逐录如下(原为竖行):

唐开元八年具注历

1. 八 日 〇 〇 〇 〇 …… 岁 位 加 官 拜 官 修 宅 吉

2. 九日庚寅木危大暑六月中伏返雉至岁位斩草祭祀吉

3. 十日辛卯未[注一]成 岁位

4. 十一日壬辰收 岁位疗病修宅吉

5. 十二日癸巳水閤(闭)没 岁位

[后缺]

注释

[一]“未”应为“水”字之误。

编者将此残历定在唐开元八年(720)是完全正确的。在说明文字中曾指出:“据‘大暑六月’一句,知是六月残历,并推知初一为壬午。据《二

十史朔闰表》知武周永昌元年、唐开元八年、天宝五载，六月初一皆为壬午。今依《麟德历》推之，开元八大暑干支适为六月庚寅，与此残历所记相吻合。”这里再作一点补充说明。据张培瑜先生新著《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①一书，武周永昌元年(689)大暑在六月二十七日戊申，唐开元八年(720)大暑在六月九日庚寅，天宝五载(746)大暑在六月二十六日丁未。此墓出土文书所见纪年，最早为武周大足元年(701)，其余有开元早期的纪年，只有开元八年是唯一吻合的，因此所定年代正确无误。

但在这五行残历的具体释文中有数处错误和遗漏，今分别补正如后。

一、关于九日正文下面的小注。原释文为：“大暑六月中伏返瓠至”。“大暑六月中”一句意义完整，清楚无误，也是本残历据以确定为唐开元八年的主要依据。问题在于“伏”字到“至”字4个字如何理解。这个“伏”字应与三伏天有关。我国古代历日注三伏，即初伏、中伏、后伏，以表示一年中最热的天气，概以农历夏至后第三庚日起为初伏，第四庚日起为中伏，立秋后第一庚日起为末伏或后伏。据前引张培瑜书，开元八年夏至在五月八日庚申，则第二庚日在五月十八日庚午，第三庚日在五月二十八日庚辰，即为初伏日。因五月是小月，则第四庚日在六月初九日庚寅，是为中伏日。但从原释文看，“大暑六月中”自成一句（说明文字中将“大暑六月”断为一句不当），意思是大暑是六月的中气。此类句型屡见于敦煌文献中唐至宋初历日，并不为奇。由此可知，原释文中的“伏”字不能说明开元八年六月初九日是中伏，“伏”字前必脱一“中”字。“大暑六月中”与“中伏”恰好有两个“中”字相连，唐人于此种情况对第二个“中”字多用重文符号“々”来代替。此处释文脱漏一重文符号，或原脱而释文未予补足，以至使“伏”字意义不明。

“伏”字后面的3个字，最后一个“至”字清楚无误，前二字仅是对原卷的摹写，而未弄清其真实含义。依据现知唐代历例，在注明节气之

后,一般要在相应的日期下注明本节气所含的3个物候。“伏”字后面的3个字也应是1个物候名称。《旧唐书·历志》载有李淳风的《麟德历》和僧一行的《大衍历》,并详细记载了两历各节气所含物候。《麟德历》大暑下的3个物候是:温风至、蟋蟀居壁、鹰乃学习;《大衍历》大暑下的3个物候则是腐草为萤、土润溽暑和大雨时行。《大衍历》是开元十七年(729)才开始行用的,开元八年行用的是《麟德历》。我们从残历中看到“至”字清楚无误,且此前只有两个字与“至”字相连,那么这个物候名称就只能是《麟德历》大暑下的“温风至”3字。

归纳起来,残历九月正文下面的小注应作:“大暑六月中々伏温风至”。这样,六月的中气是大暑,中伏开始,物候是温风至,三层意义便完全连贯晓畅了。

二、关于“十日辛卯”之后的“未”字。编者在注释中说明:“‘未’应为‘水’字之误”。原历如作“未”字,固属错误,但注释改为“水”字仍不正确。这份残历的内容与敦煌写本历日大致相同,日期、干支之后用金、木、水、火、土所记的字,是表示各干支同纳音的关系。六十甲子纳音,清儒钱大昕在《潜研堂文集》卷三《纳音说》一节述之甚详。我曾据钱氏此说绘成一表^②,用以核对敦煌历日,证明钱说完全正确。六十甲子与纳音的对应关系,见于敦煌文献的也有4件,编号为S.1815(2)、S.3724(3)、P.3984背和P.4711,内容均是“甲子乙丑金,丙寅丁卯火……庚寅辛卯木,壬辰癸巳水”等等。显然,同干支“辛卯”对应的纳音只能是“木”,既不能是“未”,也不能是“水”。

三、“十一日壬辰”与“收”字间脱一字。从残存历日可以看出,干支“壬辰”之下必然注有与之相对应的纳音关系。由于壬辰和癸巳的纳音均为“水”(详上),则“壬辰”和“收”字间当补一“水”字,历日内容方能完整,并合乎历例。

四、“十二日癸巳水”后的“闭”字误。敦煌吐鲁番所出唐至宋初历

日,一般各日开头均是四项内容,即日期、干支、纳音和建除十二客。这里的“闭”字当属建除十二客的内容。建除十二客共 12 个字:建、除、满、平、定、执、破、危、成、收、开、闭,各主一定吉凶,在战国时的秦简中已有记载^③,后世历日多沿用不改。其排列特点主要有二,一是自立春正月节后的第一个寅日注“建”字,顺次往下排列;二是凡节气(非中气)所在之日的建除十二客要重复前日一次,于是各星命月里纪日地支同建除十二客之间便形成了固定的对应关系^④。依照 12 字的排列顺序,“收”字后只能是“开”字,而不可能是“闭”字;依照上面提到的固定对应关系,本历六月十二日的纪日地支为“巳”,从小暑六月节到立秋七月节之间,亦即古代星命家的“六月”中,与纪日地支“巳”相对应的建除十二客也只能是“开”,而不是“闭”。由此可知,此“闭”字乃“开”字之误。

(原载《文物》1992 年第 6 期,第 92—93 页)

注释:

① 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 年 7 月版。

② 参拙作《敦煌古历丛识》,载《敦煌学辑刊》1989 年第 1 期,第 107—118 页。

③ 见《文物》1989 年第 2 期何双全《天水放马滩秦简综述》一文及同期图版伍甲 1—甲 12 简。

④ 参拙作《天水放马滩秦简〈月建〉应名〈建除〉》,《文物》1990 年第 9 期,第 83—84 页。

吐鲁番新出《高昌延寿七年 (630)历日》考

1986年10月,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新出土一件历日残片。两年后我得知这一消息。由于研究的旨趣所在,我极想看到原件或其照片,以便进行探讨,但迟迟未能如愿。在耐心等待7年之后,终于如愿以偿。1995年8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吐鲁番召开“敦煌吐鲁番学术著作研讨会”,我应邀赴会。承蒙东道主柳洪亮先生的厚意,得以目睹原物。感激之情,不尽言表。这里对这件残历作一整理和研究。

一

原件编号为86TAM387:38—4^①,残高19.7、残长11.5厘米,汉文墨书。现将文字释录如下(顶端从右到左1~10为行号,右侧从上到下[一]~[一〇]为列〈排〉号,均为笔者所加):

10	9	8	7	6	5	4	3	2	1	
□	□	□	□	□	□	□	□	□	□	[一]
		建								
□	□	己	戊	丁	丙	乙	□	□	□	
□	□	酉	申	未	午	巳	辰	□	□	[二]
□	□	定	平	满	除	建	闭	□	□	

辛巳	庚辰	己卯	戊寅	丁丑	丙子	乙亥	甲戌	癸酉	□
闭	开	收	成	危	破	执	定	平	□
									[三]

庚戌	己酉	戊申	丁未	丙午	乙巳	甲辰	癸卯	壬寅	辛丑
平	满	除	建	闭	开	收	成	危	破
									[四]

庚辰	己卯	戊寅	丁丑	丙子	乙亥	甲戌	癸酉	壬申	辛未
成	危	破	执	定	平	满	除	建	闭
									[五]

己酉	戊申	丁未	丙午	乙巳	甲辰	癸卯	壬寅	辛丑	庚子
建	闭	开	收	成	危	破	执	定	平
									[六]

□	□	□	丙子	乙亥	甲戌	癸酉	壬申	辛未	□
□	□	□	丑	除	建	闭	开	收	□
□	□	□	平	满					[七]

戊申	丁未	丙午	乙巳	甲辰	癸卯	壬寅	辛丑	小雪	□
收	成	危	破	执	定	平	满	中	□
									[八]

□	丁丑	丙子	乙亥	甲戌	癸酉	壬申	辛未	□	□
□	除	建	闭	开	收	成	□	□	□
									[九]

□	□	丙午	乙巳	甲辰	癸卯	□	□	□	□
□	□	定	平	□	□	□	□	□	□
									[一〇]

据有关著录,残历是从墓内女尸右脚纸鞋中拆出的。此墓出有墓志,知女尸是领兵将领张显祐的妻子,死于魏氏高昌延寿十三年(636)三月^②。原历被剪作鞋样使用,残存部分应是鞋样的前半部。正是因为这一特殊用途,所以残存的十列中,有的日数多,有的日数少。

二

我们首先要对残历的年代进行考定。

就残历的现存面貌看,每日有两项内容,即纪日干支和建除十二客。此外,第八列右侧残存“小雪中”三字。残历所能提供的信息仅此而已,但十分重要,它们正是我们考定其年代的依据和出发点。

“小雪中”三字所在的纪日干支和建除十二客已残。但从其左边(即下一日)为“辛丑满”,不难推知“小雪中”所在之日为“庚子除”,再前一日是“己亥建”。据此,我们可以确知此历“小雪”所在日的干支为“庚子”。

很显然,这件历书原来是注有全年二十四节气的,只是除小雪这个十月中气外,其余二十三个节气全部残失了。但我们已知“小雪中”在庚子日,则其余残失掉的二十三个节气所在之日的干支就有可能推求出来。

我们知道,我国中古时代历书所注节气是按照平气进行计算的,使用定气是很晚的事情。因此,可以设定这份历日用的也是平气。同时又知,二十四节气是以太阳回归年长度 365.2422 日为依据建立的。二十四节气的平气值是将一个回归年长度平分为 24 等份,每份为 15.218425 日。既然已知“小雪中”的纪日干支是庚子,以此为基点,向下顺推,向上逆推,就可推出各节气所在之日的干支来。不过,平气值 15.218425 日不是一个整数值,每过四个节气多就会多占一日;再者,所取“小雪中”在庚子也非原历计算平气位置的起始点。因此,所推出的二十三个节气日期干支只能是近似的,而非绝对位置,容有一日甚至二日的误差。尽管如此,我们获得的二十四节气所在之日的干支对确定残历的年代仍极具价值(说详下)。经依前述方法推算,此残历“小雪中”之外二十三个节气所在之日近似日期之干支是:立春节(辛亥),雨水(丙寅),惊蛰(壬午),春分(丁酉),清明节(壬子),谷雨中(丁

卯),立夏节(壬午),小满中(丁酉),芒种节(癸丑),夏至中(戊辰),小暑节(癸未),大暑中(戊戌),立秋节(甲寅),处暑中(己巳),白露节(甲申),秋分中(己亥),寒露节(乙卯),霜降中(庚午),立冬节(乙酉),大雪节(乙卯),冬至中(庚午),小寒节(乙酉),大寒中(庚子)。

残历出自阿斯塔那古墓,其历法依据与同一时代中原王朝颁布的官历或有出入。但中古时代所用的回归年长度和平气值不会有太大的差距。换言之,我们可用上述推算出的节气干支与同一时代的中原历进行对照,找出其相近的年份,再用其他条件加以靠定。此墓所出墓志已告知女尸死于高昌延寿十三年(636),相当于唐贞观十年。可知,公元636年是这份残历的年代下限,历书的实际年代应在公元636年及其以前不太久的一段时间内。

历法专家张培瑜教授的大作《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③一书,对中国古代自秦朝以来每年二十四节气的日期干支有十分详明的著录。我们将前述推出的残历各节气干支同张著对照,发现从公元600年至636年,仅公元630年的节气干支相近,其余均相距太远或全无可能。张著所列公元630年(唐贞观四年)二十四节气的干支是:立春(上年闰十二月辛亥),雨水(丁卯),惊蛰(壬午),春分(丁酉),清明(壬子),谷雨(戊辰),立夏(癸未),小满(戊戌),芒种(癸丑),夏至(戊辰),小暑(甲申),大暑(己亥),立秋(甲寅),处暑(己巳),白露(乙酉),秋分(庚子),寒露(乙卯),霜降(庚午),立冬(乙酉),小雪(辛丑),大雪(丙辰),冬至(辛未),小寒(丙戌),大寒(壬寅)。

由此可以确定,残历的年代是公元630年,即魏氏高昌延寿七年。残历的这个年代,我们在后面的讨论中将进一步提供证据并加以靠定。

三

残历被剪作鞋样,残存纪日干支仅71个。其本始面貌如何,我们

可否将各日干支复原出来呢？回答是肯定的。

对中国古代历法有过接触的人均不难判断，残历是以类似表格的形式编制的。其本始面貌应该是：顶端从右至左纪日期，即由一日到卅日；其右侧从上到下纪月份。在这样一份类似表格的历日中，虽然月份不同，但每日之下各月同一日期的干支应该是对齐的，残历现存面貌正是如此。困难在于，它已被剪作鞋样，月份、日期均不可见，仅存 71 个干支及其建除；其左、右两边各被剪去多少日子也难于知晓。以下我们将逐一解决，最终将其加以复原。

（一）现存残历的月份

由于原历右侧纪月份部分已失，我们无法直接获知残存部分的月份。但是，如前所述，残历每日包含干支和建除两项内容。其中纪日地支同建除十二客间有着固定对应关系，我在几篇文章中已反复申论^④。特别是在《天水放马滩秦简〈月建〉应名〈建除〉》一文中，我曾经给出了在各“星命月”中纪日地支与建除十二客对应关系表，可以当作工具使用。简言之，建除注日有如下几个特点：（1）由立春后的第一个“寅”日注“建”，顺次下排；（2）凡逢节气（非中气）之日重复其前日的建除一次，接续下排；（3）由于建除十二客（建、除、满、平、定、执、破、危、成、收、开、闭）与纪日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均是十二个，又使用了上述节气之日重复一次的办法，于是形成了各“星命月”[由一个节气（非中气）到下一个节气（非中气）]二者间的固定对应关系，如“正月”“寅”日注“建”，“卯”日注“除”，“二月”“卯”日注“建”，“辰”日注“除”等等。尽管这种固定对应关系仅限于“星命月”，但历日中的历法月份（正月至十二月）同“星命月”相距不会太远，至多是将本月节气（非中气）提前注在上个月的后半月而已。因此，我们仍可利用这种固定对应关系判定现存残历的月份是：第一列三月，第二列四月，第三列五月，第四列六月，第五列七月，第六列八月，第七列九月，第八列十月，第九列十一月，第十列十二月。

(二) 残历左、右两侧残失的日数及其干支

前已考出,此历是麹氏高昌延寿七年(630)的历日,而且也知现存部分十列是由三月到十二月部分。因此,只要获知延寿七年三月到十二月间任何一个月的朔日,便可判断各列右侧残失的日数,并用逆推法将各日干支补出。幸好,高昌出土墓砖为我们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高昌赵悦子妻马氏墓表》载:“延寿七年(630)庚寅岁七月□□朔,十六日己卯……”^⑤十六日己卯,则朔日为甲子。残历第五列正是该年七月的历日,现存最右边的一日干支为辛未,其前逆推七日方得甲子日。换言之,残历七月右侧被剪掉了七日。又由于此历采用类似表格的形式进行编制,各月同一日干支上下对齐,从而可知:第一列三月右侧失去十四日,第二列四月右侧失去九日,第三列五月右侧失去八日,第四列六月右侧失去七日,第六列八月右侧失去七日,第七列九月右侧失去八日,第八列十月右侧失去九日,第九列十一月右侧失去十日,第十列十二月右侧失去十一日。进而用干支表向右逆推,可得:四月朔日乙未,五月乙丑,六月甲午,七月甲子,八月癸巳,九月癸亥,十月壬辰,十一月壬戌,十二月壬辰。知道了四至十二月的朔日干支,即可先将残历左、右两侧四至十一月所缺日期干支全部补出。

至于三月朔日和十二月的月大小,我们拟另加解决。三月一整月仅残存“建”字的下半部。依据建除十二客同纪日地支的固定对应关系,“星命月”三月“建”与“辰”对应,从而可知“建”字所在纪日地支为“辰”。由“辰”日顺推地支至“午”日,与四月朔日之“未”相接,则三月只能是小月。由于四月初一是乙未,将天干逆推加入三月“建”字所在“辰”日,知“建”字所在干支为庚辰。再将干支逆推十四日,便可得出三月朔日为丙寅,同时也已将全月各日干支补出。

十二月朔日是壬辰,顺推干支至二十九日为庚申。但本月是大月还是小月?《高昌曹妻苏氏墓表》载:“延寿八年(631)辛卯岁,正月辛酉

朔,十三[日]水(癸)酉。”^⑥延寿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庚申与延寿八年正月朔日辛酉正好相接,则延寿七年十二月只能是小月。

《高昌曹妻苏氏墓表》对我们的研究至关重要。它不仅使我们确定了高昌延寿七年十二月是小月,更证明了我们确定残历年代为高昌延寿七年完全正确,这是不言而喻的。

至此,我们已将残历三月至十二月共十个月的日期、干支全部补出并加以确定。

(三) 残历正月至二月的内容

残历上部残失严重,既不见日期(一日至卅日),也不知正月至二月的任何内容。如果简单操作,就会认为上部原来除有日期一列外,仅有正、二月两列。实际情况却非如此。在本文前面推定本历二十四节气的干支时,已知“立夏节”在三月壬午(十七日),谷雨中在三月丁卯(二日),则“清明节”在二月中旬的壬子日,“春分中”在二月初的丁酉日,“惊蛰节”壬午应在二月前一月中旬的十五天左右,本月可能无中气。这种情况提示我们,二月前的一个月很可能是无中气之月,即闰月。

我国古代使用阴阳合历。阴历一个月只考虑月亮围绕地球一周的时间,即一个朔望月,合 29.53 日;阳历一年只考虑地球围绕太阳转一周的时间,即 365.2422 日。十二个朔望月合 354 天或 355 天,与回归年长度相差 10 到 11 天。为使二十四节气在各农历月份的位置相对稳定,不违农时,就必须置闰,从而形成阴阳合历。自西汉武帝太初元年(前 104)颁行《太初历》始,我国一直采用无中气之月置闰的办法,所谓“朔不得中,是谓闰月”。这种置闰方法一直延用到现代仍在使用。例如 1995 年农历闰八月,这个闰月仅有一个九月的节气寒露,注在十五日,而无中气。因此,残历二月前的一个月无中气,应是闰月,即此延寿七年历日闰正月。从而可知,残历三月之上在日期一列下原有三列,即

正月、闰正月和二月。我们可先将这三个月的列次设定下来。

在此基础上,很需要知道正月、闰正月和二月的朔日,以便将此三个月的各日干支全部补出。遗憾的是,尚未有直接的出土材料可资利用。不过,我的同事王素先生此前曾有《魏氏高昌历法初探》^⑦一文,依据出土资料和必要的历法知识对魏氏高昌历法进行过推拟,可供参考。现在即据王素先生的推拟意见补为:正月丁酉朔,闰正月丁卯朔,二月丙申朔。进而将其余各日干支一并补出。

在前述分项讨论的过程中,事实上我们已将残历全年的各日干支全部补出,现在再总括为一表。

高昌延寿七年(630)历日复原表

卅日	廿九日	廿八日	廿七日	廿六日	廿五日	廿四日	廿三日	廿二日	廿一日	廿日	十九日	十八日	十七日	十六日	十五日	十四日	十三日	十二日	十一日	十日	九日	八日	七日	六日	五日	四日	三日	二日	一日	
丙寅	乙丑	甲子	癸亥	壬戌	辛酉	庚申	己未	戊午	丁巳	丙辰	乙卯	甲寅	癸丑	壬子	辛亥	庚戌	己酉	戊申	丁未	丙午	乙巳	甲辰	癸卯	壬寅	辛丑	庚子	己亥	戊戌	丁酉	正月
	乙未	甲午	癸巳	壬辰	辛卯	庚寅	己丑	戊子	丁亥	丙戌	乙酉	甲申	癸未	壬午	辛亥	庚辰	己卯	戊寅	丁丑	丙子	乙亥	甲戌	癸酉	壬申	辛未	庚午	己巳	戊辰	丁卯	闰月
乙丑	甲子	癸亥	壬戌	辛酉	庚申	己未	戊午	丁巳	丙辰	乙卯	甲寅	癸丑	壬子	辛亥	庚戌	己酉	戊申	丁未	丙午	乙巳	甲辰	癸卯	壬寅	辛丑	庚子	己亥	戊戌	丁酉	丙申	二月
	甲午	癸巳	壬辰	辛卯	庚寅	己丑	戊子	丁亥	丙戌	乙酉	甲申	癸未	壬午	辛亥	庚辰建	己卯	戊寅	丁丑	丙子	乙亥	甲戌	癸酉	壬申	辛未	庚午	己巳	戊辰	丁卯	丙寅	三月
甲子	癸亥	壬戌	辛酉	庚申	己未	戊午	丁巳	丙辰	乙卯	甲寅	癸丑	壬子	辛亥	庚戌	己酉定	戊申平	丁未满	丙午建	乙巳建	甲辰闭	癸卯	壬寅	辛丑	庚子	己亥	戊戌	丁酉	丙申	乙未	四月
	癸巳	壬辰	辛卯	庚寅	己丑	戊子	丁亥	丙戌	乙酉	甲申	癸未	壬午	辛亥	庚辰开	己卯收	戊寅成	丁丑危	丙子破	乙亥执	甲戌定	癸酉平	壬申	辛未	庚午	己巳	戊辰	丁卯	丙寅	乙丑	五月
癸亥	壬戌	辛酉	庚申	己未	戊午	丁巳	丙辰	乙卯	甲寅	癸丑	壬子	辛亥	庚戌平	己酉满	戊申除	丁未建	丙午闭	乙巳开	甲辰收	癸卯成	壬寅危	辛丑破	庚子	己亥	戊戌	丁酉	丙申	乙未	甲午	六月
	壬辰	辛卯	庚寅	己丑	戊子	丁亥	丙戌	乙酉	甲申	癸未	壬午	辛亥	庚辰危	己卯危	戊寅破	丁丑执	丙子定	乙亥满	甲辰除	癸卯水	壬寅建	辛丑闭	庚子	己亥	戊辰	丁卯	丙寅	乙丑	甲子	七月
壬戌	辛酉	庚申	己未	戊午	丁巳	丙辰	乙卯	甲寅	癸丑	壬子	辛亥	庚戌	己酉建	戊申闭	丁未开	丙午收	乙巳成	甲辰危	癸卯破	壬寅执	辛丑定	庚子平	己亥	戊戌	丁酉	丙申	乙未	甲午	癸巳	八月

(续表)

卅日	廿九日	廿八日	廿七日	廿六日	廿五日	廿四日	廿三日	廿二日	廿一日	廿日	十九日	十八日	十七日	十六日	十五日	十四日	十三日	十二日	十一日	十日	九日	八日	七日	六日	五日	四日	三日	二日	一日	
	辛卯	庚寅	己丑	戊子	丁亥	丙戌	乙酉	甲申	癸未	壬午	辛巳	庚辰	己卯	戊寅	丁丑	丙子	乙亥	甲戌	癸酉	壬申	辛未	庚午	己巳	戊辰	丁卯	丙寅	乙丑	甲子	癸亥	九月
辛酉	庚申	己未	戊午	丁巳	丙辰	乙卯	甲寅	癸丑	壬子	辛亥	庚戌	己酉	戊申	丁未	丙午	乙巳	甲辰	癸卯	壬寅	辛丑	庚子	己亥	戊戌	丁酉	丙申	乙未	甲午	癸巳	壬辰	十月
辛卯	庚寅	己丑	戊子	丁亥	丙戌	乙酉	甲申	癸未	壬午	辛亥	庚辰	己卯	戊寅	丁丑	丙子	乙亥	甲戌	癸酉	壬申	辛未	庚午	己巳	戊辰	丁卯	丙寅	乙丑	甲子	癸亥	壬戌	十一月
	庚申	己未	戊午	丁巳	丙辰	乙卯	甲寅	癸丑	壬子	辛亥	庚戌	己酉	戊申	丁未	丙午	乙巳	甲辰	癸卯	壬寅	辛丑	庚子	己亥	戊戌	丁酉	丙申	乙未	甲午	癸巳	壬辰	十二月

需要说明的是,三到十二月所补各日干支均有确凿依据,正月至二月共三个月所补是以推拟结论为据,实际情况如何,仍有待检验。这一年因有闰月,共有 13 个月,全年 384 天,原历残存 71 天,我们补出 313 天。其次,原历注有全年二十四节气和各日建除十二客,我们未予补出。这是由于前述推出的节气干支位置是相对的,有一日至二日的误差,不宜强行拟补。建除十二客的重叠日又正好在节气(非中气)日之下,节气日尚未确定,则建除日也难确定。虽然中气日附近的建除也可按照规律推补出来,但意义不大,从略。

(四) 对原历闰正月的历法检验

在表一中,我们根据推算出各节气所在日的干支位置,设定高昌延寿七年闰正月。这个设定是否可信,仍需接受历法和出土资料的检验。

中国古代历法的基本闰周是十九年七闰,即十九年中加入七个闰月。在一个闰周中,一般采用前八年加三闰和后十一年加四闰的闰法。虽然南北朝时代,各国也采用了一些更大的闰周,以求将闰月安排得精确一些,但均是以前述闰周和闰法为基础的。据王素先生的意见,高昌国是以延昌三十二年(592)为一闰周之始安排闰月的^⑧。第一闰周在

公元592—610年,则第二闰周在611—629年,第三闰周在630—648年(640年唐灭高昌)。高昌延寿七年(630)正是闰周之始。依照闰法,此年当闰正月。这同我们依据残历推算的结果颇为一致。

我们再以出土资料为据进行检验。

吐鲁番出土《高昌延寿四年(627)参军汜显祐遗言文书》:

延寿四年丁亥岁,闰四月八日……^⑨

吐鲁番出土《高昌延寿四年闰四月威远将军魏仕悦奏记田亩作人文书》:

□□岁润(闰)四月五日……^⑩

由此可知,高昌延寿四年历闰四月。

吐鲁番出土《高昌延寿九年(632)闰八月张明意入剂刺薪条记》:

壬辰岁闰八月剂刺薪一车……^⑪

吐鲁番出土《高昌延寿九年调薪车残文书》:

至闰八月初……^⑫

由此又知,高昌延寿九年闰八月。

自延寿四年五月至九年八月,相距五年有奇,中间必有一个闰月,否则是说不通的。依前述所说的闰周和闰法,延寿四年在第二闰周的后十一年,安排四个闰月,故闰月设置在四月;延寿九年在第三闰周的

前八年,安排三个闰月,故闰在八月。显然,因延寿七年是第三闰周之始,也属于前八年置三闰的范畴,故闰月当在正月。这三次闰月在闰周和闰法上正好是互相衔接的。

以上从闰周、闰法以及出土资料所作的检验表明,此残历原来确实闰正月。

四

高昌国有其独立的历法;最早是由已故李征先生提出的^⑬。后来的研究者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李先生的启迪。出土文书、墓志、墓砖表明,高昌历法的朔日、闰月同中原历有所不同。即以本件延寿七年历日为例,与同年唐历比较,可知:唐历闰上年(贞观三年)十二月,高昌历闰本年正月,闰迟一月。十三个月的朔日中,唐历二月丁酉朔,高昌历为丙申,早一日;唐历四月丙申朔,高昌历为乙未,早一日;唐历十二月辛卯朔,高昌历为壬辰,迟一日。其余各月朔日同。这再次表明,李征先生生前不仅为吐鲁番古墓的发掘和文书整理作出过重要贡献,而且对高昌历法的认识先声夺人,尤为卓见。

对于魏氏高昌历法的认识,以往因无直接材料,尚难睹其真颜。现在有了延寿七年的历日实物,使我们的认识深入了一步。但毕竟仅此一件,仍嫌太少。我们期待有更多的北朝历日实物出土,以便将研究工作推向深入。

五

我们也有必要将这件历日的形制放在中国古代历日形制的总发展中加以考察。

中国古代传世历本以《南宋宝祐四年(1256)会天万年具注历》^①为最早。近世以来,由于汉简历日和敦煌吐鲁番历日相继面世,使研究者对早期历日的内容和编制形式有了具体而真切的认识。就汉简历日而论,一般通用历谱可分为四种形制:(1)单板横读月历,如本始二年、神爵元年;(2)单板直读月历,如五凤元年、居摄元年;(3)单板直读简便年历日,如永光五年、永始四年;(4)编册横读日历,如元康三年、神爵三年等^②。就敦煌吐鲁番历日而论,除《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十二年(451)历日》^③与汉简历日的单板直读简便年历(第三种)相类,其余虽有繁、简之分,但内容日趋增多,形制日益复杂,与汉简历日多不相同^④。显然,中国古代历书形制的演变受到了书写材质的影响。写在竹简上的历谱内容不可能太多,写在纸质上的历日内容逐步增多,这是必然趋势。

但是,这件《高昌延寿七年历日》虽以纸为书写材质,编制形式却与汉简历日的编册横读历日(第四种)相同,即保存了汉简历日编制形式之一。换言之,它是早期历日到后世具注历日间的一种过渡形态,也是迄今所见此种形制写在纸上的惟一一件。如果我们把中国古代历日形制看成一个发展链条,此件高昌历日上承汉简历日,下接后世具注历日,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仅此一端,也可看出其价值不容小视。

(原载《文物》1996年第2期,第34—40页)

注释:

- ① 吐鲁番地区文管所《1986年阿斯塔那古墓发掘简报》,载《考古》1992年第2期。
- ② 柳洪亮《新出魏氏高昌历书试析》,载《西域研究·新疆文物特刊》1993年第2期,第16—23页。
- ③ 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
- ④ 参见拙作《跋吐鲁番文书中的两件唐历》,载《文物》1986年第12期;《敦煌

- 古历丛识》，载《敦煌学辑刊》1989年第1期；《天水放马滩秦简〈月建〉应名〈建除〉》，载《文物》1990年第9期；载《关于敦煌历日研究的几点意见》，载《敦煌研究》1993年第1期。
- ⑤ 黄文弼《高昌砖集》，第65页。
- ⑥ 同注⑤。
- ⑦ 《出土文献研究续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148—180页。
- ⑧ 同注⑦。
- ⑨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5册，文物出版社，1983年，第70页。
- ⑩ 同上书，第3册，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278页。
- ⑪ 同注⑨，第193页。
- ⑫ 同注⑩，第248页。
- ⑬ 说见李征与穆舜英、王炳华合撰《吐鲁番考古研究概述》，《新疆社会科学研究》第20期（总第120期）。
- ⑭ 日本金泽文库藏宋刊本具注历日半页9行。照片见《北平图书馆馆刊》六卷三号插图；又见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613—1615页。
- ⑮ 各历图版见《中国古代天文文物图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形制分类参见陈久金《敦煌、居延汉简中的历谱》一文，载《中国古代天文文物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111—136页。
- ⑯ 此敦煌出北魏历，以往不知其下落。1994年冬，我应饶宗颐教授之邀，赴香港中文大学访学。饶公面谕，他于1982年率领学生赴日实习，期间得以参观“八代聚珍展”，看到此历陈列在展品中，后向主人索得照片一份。1993年初，日本敦煌学家池田温教授亦赠我此历拷贝扩印件一份，与饶公所得同。说明此历日珍品今已流落在日本国。关于此历日内容，参见拙作《敦煌本北魏历日与中国古代月食预报》，载《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360—372页。
- ⑰ 参见拙编著《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

吐鲁番出土《明永乐五年丁亥岁 (1407)大统历》考

1996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由我编著的《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一书,对敦煌所出天文历法文献做了释录和校考;1997年河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拙编《敦煌吐鲁番出土历书》^①,又专就两地所出历日的图版加以汇集并做了释文。如今,绝大多数的敦煌吐鲁番出土历日可从这两部书中见到。不过,仍然难称完备。随着新资料的陆续公布,有些文献就需要再做工作。本文研究的《明永乐五年丁亥岁大统历》残片就是其中之一。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所使用的录文资料是由荣新江教授提供的,对此,谨表诚挚的谢忱。

原件今藏统一后的德国国家图书馆,编号 Ch. 3506。据荣新江抄录时所做记录,此件系一刻本,前、后和下部均残,顶端有一小截粗墨线边框,残存尺寸为 8cm×22cm。就残存部分看,原历在边框内至少由细线隔为四栏:现存上栏有“末伏”注记;其下一栏为日序、干支和六甲纳音;再下一栏为建除和二十八宿注历;再下一栏为吉凶宜忌等选择事项。现在录文时要做如下技术处理:原为竖行,为便于排版而改横书;为便于讨论和省览,每行前施以行号(1—9行);原件残失严重,据上下文推补的文字放入□中,不出校记;中间残字数量不能确定者,施以 表示。

[前缺]

1. [] [二]十一日[癸卯金]成[张],宜 []
2. [] [二十二日甲]辰[火]收翼,宜纳财、[]
3. [] [二十]三日乙巳火开轸, []
4. [] [二十四日丙]午水闭角,宜祭祀、立券、交易、剔头、安葬,不宜出行、□□。
5. 二十五[日丁未]水闭亢,立秋七月节,宜祭祀,不宜出行、栽种、针刺。
6. 二十六日戊申土建氏,日入酉正三刻,（唐五十六刻）宜祭祀、嫁娶。
宜用辰时。不宜动土。
7. [二十]七日己酉土除房,宜祭祀、沐浴,不宜出行、[移]徙、栽种。
8. 末伏 二十八日庚戌金满心,宜进人口、裁衣,宜用辰时。开市、交易、纳财。
9. [二十九日辛]亥金平尾,宜 []
[后缺]

下面将根据残历提供的条件,对其准确年代进行考定。

(一) 关于残历的月份

由残历第5行所注“立秋七月节”即可推知,残历是七月或七月前的一段历日。中国古代自汉武帝《太初历》以后使用二十四节气注历,每月一节气、中气。但是,节气所注日期并不一定就在其对应的月份。如本历“立秋”是“七月”的“节气”,它可以注在农历七月的上半月,也可以注在农历六月的下半月。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游移,是因为使用闰月产生的结果。人们知道,二十四节气属于阳历系统,而朔望月则属阴历系统。十二个朔望月为三百五十四、五天,与一回归年相差十一天左右,故需置闰,才能使节气相对稳定在一定的月份之内。尽管如此,

一旦置闰,就会使下月节气提前进入上月之后半月。这种情况,我们在吐鲁番出土的《唐仪凤四年(679)具注历日》^②中已经遇到过,不足为奇。本件历日残存日期为二十一日至二十九日,“立秋七月节”又注在二十五日,我们根据前面所说节气位置游移的原因即可判断,此段属于某年历日中六月下旬的一段。

(二) 关于“立秋七月节”

这个七月节注在二十五日丁未。由于前已考知,此段历日属于某年六月下旬,那么“立秋七月节”就是注在六月二十五日丁未这一天的。历法专家张培瑜教授在其《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③一书中,给出了自秦朝以来“历代颁行历书摘要”,内含每年的四时、八节、二十四节气。我们从宋朝立国的公元960年起开始检查,一直到辛亥革命,立秋在六月二十五日丁未的,只有明永乐五年(1407),此外一例相同的也没有。因此,可以初步认为,此历日为明永乐五年的具注历日。对于这个年代,我们还需用残历提供的其他条件加以靠定。

(三) 关于二十八宿注历

迄今为止,在以往从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北朝至北宋初年的历书中,尚未看到用二十八宿连续注历。这很正常。因为用二十八宿连续注历是从南宋时起历家为演禽术所加的历注类目,此前自然尚未在历书中连续出现,但用二十八宿连续注历具体起于何时,清人已经说不清楚^④。不过,传世本《南宋宝祐四年(1256)会天万年具注历》已用二十八宿注历了。此后连绵不断,以迄今日东亚民用《通书》而不绝如缕。如果残历确实是明永乐五年的,我们就要检查一下自南宋以来二十八宿注历是否与这件明历相连。需要指出的是,1983至1984年间,内蒙古文物工作者在黑城曾发掘出土一件印本残历^⑤,其中也用二十八宿注历。张培瑜先生考证此历为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授时具注历日^⑥。此残历使我们增多了一次检验的机会,看看这三件历日的二十八宿注

历是否都在南宋以来二十八宿注历的序列链条上。下面进行具体检查。

《南宋宝祐四年会天万年具注历》四月一日为“四月一日壬戌水破角”。“角”宿为二十八宿的开头,可知,此年四月一日为某一个二十八宿注历周期之始;

《元至正二十五年具注历日》七月五日为“七月五日辛酉木满轸”。“轸”宿为二十八宿的最末一宿,可知,此年七月五日是某一个二十八宿注历周期的终结。

自宋宝祐四年四月一日至元至正二十五年七月五日,共有39900天。

$$39900 \text{ 天} \div 28 \text{ 天} = 1425 \text{ (周)}$$

可知,其间用了1425个二十八宿周期注历。

《元至正二十五年具注历日》七月六日是“[六日壬]戌水平角”,又是一个二十八宿注历周期之始;

《明永乐五年丁亥岁具注历日》六月二十三日为“二十三日乙巳火开轸”,是某一个二十八宿注历周期的终结。

自元至正二十五年七月六日至明永乐五年六月二十三日共15344日。

$$15344 \text{ 天} \div 28 \text{ 天} = 548 \text{ (周)}$$

可知,其间用了548个二十八宿周期注历。

还可知,自南宋宝祐四年四月一日至明永乐五年六月二十三日共得:

$$(39900 \text{ 天} + 15344 \text{ 天}) \div 28 \text{ 天} = 1973 \text{ (周)}$$

大约在151年间共用了1973个二十八宿周期注历。

检验结果证明,无论黑城出土的《元至正二十五年具注历日》,还是吐鲁番出土的《明永乐五年具注历日》,都符合二十八宿注历的规则,也

都在这一连绵不断的长序列上。这也可以证明残历是明永乐五年的历日。

(四) 关于“末伏”

中国古代用三伏注历,表示一年中最热的天气,自汉代即已开始。但那时注在夏至或立秋后第几“庚”日尚不规则。大约从唐代开始,三伏日期固定为:夏至后第三庚日为初伏,第四庚日为中伏,立秋后第一庚日为末伏。残历二十八日最上面一栏注有“末伏”二字,其日干支为庚戌。检张著《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一书,明永乐五年五月九日壬戌夏至,其后第一庚日为五月十七日庚午,第二庚日为五月二十七日庚辰;五月为小月,则第三庚日为六月八日庚寅,此日即初伏。六月十八日庚子为夏至后第四庚日,亦即中伏。六月二十五日立秋,六月二十八日庚戌为立秋后第一庚日,即“末伏”,或称“后伏”。残历所存“末伏”注记与明永乐五年夏至、立秋日期及三伏所在完全吻合。

(五) 关于二十六日“日入酉正三刻,昼五十六刻,夜四十四刻”的纪时内容

“酉正三刻”这样的纪时用语最早是元朝郭守敬的《授时历》使用的。《元史·历志一》“昼夜刻”载:“日出为昼,日入为夜,昼夜一周,共为百刻。……春秋二分,日当赤道出入,昼夜正等,各五十刻。自春分以及夏至,日入赤道内,去极浸近,夜短而昼长。自秋分以及冬至,日出赤道外,去极浸远,昼短而夜长。以地中揆之,长不过六十刻,短不过四十刻……今京师冬至日出辰初二刻,日入申正二刻,……夏至日出寅正二刻,日入戌初二刻……”黑城所出《元至正二十五年具注历日》残片上,七月月序内容有“一日丁巳午初初[刻](下残)”的用语。明永乐五年时使用的是明代《大统历》(详下),但纪时用语一仍其旧,以至到清代《时宪书》也还在使用^⑦。

至于残历所纪“昼五十六刻,夜四十四刻”,显然是“百刻”纪时制的

产物。元代实行百刻纪时制已见上引《元史·历志一》，明代实行的仍是这一制度。只是到清代后才改为96刻制^⑧。由此可见，残历的纪时制度也在我们推定的年代范围之内。

从以上检验可以确认，残历是《明永乐五年丁亥岁大统历》。

永乐五年时，明朝所用《大统历》实即著名的元朝《授时历》的延续。郭守敬所制《授时历》，是中国传统历法最高成就的体现。元朝末年朱元璋起兵以后，于公元1367年的十一月冬至，太史院使刘基率其属下高翼上呈次年历书，即《大统历》。名虽有别，但实际却同《授时历》完全一样。无怪乎1384年漏刻博士元统上书时曾说：“历以‘大统’为名，而积分犹踵‘授时’之数，非所以重始敬正也。”此历后在元统任钦天监监令时做了一些修改，一直使用到明末。故薄树人先生认为：“从实质上说，也就是授时历一直行用到明末。”^⑨

如前所述，此残历属于刻本历日。而黑城所出《元至正二十五年具注历日》也是刻本。我虽然未见到《明永乐五年大统历》的照片，但将本文使用的录文与黑城所出元历对照，发现栏次、板式基本相同，一如本文开头所述。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这两件残历都属于《授时历》系统的实行历书。

那么，这件明朝官颁历日是如何到达吐鲁番地区的呢？就该地区的历史来说，大约从公元1283年至1756年，是蒙古民族统治的时代。这期间，元朝在公元1368年灭亡后，吐鲁番地区被察合台汗国所占领。后来又经过几种势力的消长变换。但总体上说，吐鲁番地方王国对明朝是表示臣属的，并且朝贡不绝，与明朝中央政府保持着密切往来^⑩。而“颁正朔”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权力所及的重要象征。吐鲁番地方王朝既向明朝称臣，明朝历书颁行到该地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这或许正是这件残历出现在吐鲁番地区的原因^⑪。

还要指出的是，大约从明朝中叶起，明清两朝近400年历书基本完

整地保存了下来^⑫。但明初的历书实物仍属少见。我们这件《明永乐五年大统历》虽仅剩一小残片,但对研究《大统历》早期的内容、形制,以及与《授时历》的关系,仍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原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第263—268页)

注释:

- ① 见《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天文卷》第1册,河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
- ② 参拙作《跋吐鲁番文书中的两件唐历》,载《文物》1986年第12期,第58—62页。
- ③ 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
- ④ 参(清)《协纪辨方书》卷一“二十八宿纪日”条。见《历代方术概观·选择卷上》,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第98—99页。
- ⑤ 见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阿拉善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黑城考古发掘纪要》,载《文物》1987年第7期,第1—23页,残历见此文配图37(F19;W18)。
- ⑥ 见张培瑜《黑城新出天文历法文书残页的几点附记》,载《文物》1988年第4期,第91—92页。
- ⑦ 参(清)《协纪辨方书》卷十二“日出入昼夜时刻”条。
- ⑧ 参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编著《中国天文学史》,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17—118页。
- ⑨ 参同注⑧,第87页。《明史·历志一》云:“惟明之《大统历》,实即元之《授时》,承用二百七十余年,未尝改宪。”
- ⑩ 胡戟、李孝聪、荣新江《吐鲁番》,三秦出版社,1987年,第82—85页。
- ⑪ 由于德藏吐鲁番文书多从佛寺的藏书室中发现,我们不排除它也可能由别的途径到达吐鲁番。
- ⑫ 张培瑜《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见“前言”第2页。

黑城出土《宋淳熙九年壬寅岁 (1182)具注历日》考

由俄罗斯著名敦煌学家孟列夫教授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俄藏黑水城文献》，公布了一大批以前未尝面世的中古时代文献，尤以刻印本文献居多。这批文献的价值，各界学者正在各自研究领域展开探讨，其价值将日益彰显。由于个人研究的主旨所在，笔者对其中刊布的具注历日尤为关心。本文将考察一件印本残历日。此件编号为“俄TK297”，刊布在《俄藏黑水城文献·汉文部分》第四册第385页下栏至386页上栏。刊布时仅题“历书”，而未标明其确切年代。孟列夫教授在此前出版的《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中也曾对此件作过著录。他指出：“两件木刻本残片，卷子装，按某本书的面幅剪下来的残片，宋体字，宋刻本（十二世纪前三十年的）。残片1. 43cm×19.5cm，卷子的一部分，两残纸，从某月的11日至23日。……残片2. 11.5cm×12cm，卷子的下半截，第4和第5纵行，第4纵行的末尾有干支‘丙午’……”^①

为了讨论方便，笔者根据自己对图版的观察，再做说明如下：原件确为一雕版印本历日，前、后、上、下均有残失。就现存面貌看，残存内容由上到下至少有五栏：（1）日期、干支、六甲纳音和建除；（2）二十八宿注历；（3）望、蜜、沐浴、归忌等；（4）鸿雁来等物候内容；（5）月神、日神、时神等神煞及选择宜忌。第五栏每栏有2至5行字。这样，我们在录文时就必须做一些特殊处理：原则上以日为单位，每日一行为一栏，标为

1 2 3……等;每日第五栏内的行次再分为①、②、③……。我们在讨论时可能同时提及,比如 1①行便是第 1 行第五栏的第①小行,如此等等。依据历日推补的内容放入[]中,不出校记,讨论时将予说明。

先释文如下:

残片一:

[前缺]

1. [十日辛巳金] [] 坎九五;公渐;葬事出兵 [] []

(按,此三小句各在一栏,不能连读)

2. [十]一日壬午木定 心

① 吉日。岁位、天德合 []

② 月空、天喜、天马 []

③ 民日、鸣吠、时阴 []

④ 宥、招集贤良、纳綵 []

⑤ 会亲姻、远行、移[徙]、[]

3. [十]二日癸未木执 尾

① 吉日。岁位、天恩、枝 []

② 玉堂黄道,宜宣政 []

③ 舍字、和会、交关、捕捉 []

4. [十]三日甲申水破 箕

① 大耗、天牢黑道、徙 []

② 伐日。不宜临政事 []

③ 师旅与修造动 []

5. [十]四日乙酉水危 斗 沐浴

① 吉日。岁对、小岁后 []

② 守日、神在 []

③ 宜葬埋、祭祀

6. 十五日丙戌土成 牛 鸿雁来

① 吉日。岁对、小岁后

② 三合、天府明星、司

③ 四相。宜造宅舍

④ 药、尊师傅、会

7. 十六日丁亥土收 女 望 辟泰

① 天魁、重日、劫杀

② 勾陈黑道

③ 嫁娶、开仓、剃

④ 词讼、迁居、筑

8. 十七日戊子火开 虚 蜜

① 天火、天狱、不举

② 不宜论讼、上官

9. 十八日己丑火闭 危 归忌、除手甲

① 吉日。岁对、七圣

② 执储明星、明堂

③ 宜祀神祇

10. [十九日庚寅木建 室]

① 小时、天刑黑道

[后缺]

残片二：

[前缺]

11. [廿三月癸亥]

① 四月十六日乙酉(按,当为丙辰)其夜子初三刻后,艮时

② 坤乾时、寅前

12. [廿四日甲子金] ☐ 家人

① 月刑、小时、地火、土府、土符、伐日、

② 兵禁、月厌。不宜兴发军师，攻

③ 讨城寨，掘凿动土，盖屋、经络、

④ 嫁娶、纳亲、牧放群畜。

13. [廿五日乙丑金]

① 吉日。岁后、月德合、六合、兵宝、大明。

② 吉期、神在。宜修宫宅第，兴发

③ 土工，训卒练兵，祀神市估。

14. [廿六日丙寅火] 鸱始鸣

① 吉日。岁后、月空、驿马、天后、天巫、大明，

② 兵吉、福德、相日、神在、鸣吠、岁德

③ 青龙黄道、七圣。宜训练军师、营葬

④ 坟墓，安置产室，进口、经络。

15. [廿七日丁卯火]

① 天刚、五盗、死神、天吏、天贼、致死、五离、

② 复日。不宜动土工、出远行、会宾客、

③ 营葬礼、兴词讼、合交关。

④ 开(?)导井泉 ☐ ☐ 针刺。

16. [廿八日戊辰木]

① 岁后、小岁位、天恩、月恩、四相、生气、

② ☐ 安、夏天德、天岳明星、神在、七圣、

③ 时阳。宜宣覃恩宥，旌拜功勋，策试

④ 贤良，崇尚师傅，祭祀神祇，出行牧放。

17. [廿九日己巳木]

① 吉日。岁后、四相、王日、玉堂、七圣。

② 宜临政、上官、闭塞孔穴、修补垣墉、

③ 泥饰宅舍。

18.

① 自四月二十七日丁卯午正三刻芒种，已得五月之节

② 宜向西北行，又宜修造西北维。天德在乾，月厌

③ 月德在丙、月合在辛，月空在壬，丙、辛、壬上取

19. 丙午(二字较大) 用艮巽、丑后、辰后

[后缺]

以上我们共录出十七天具注历日的内容(1—17行)和两行月序文字的内容(18—19行)。现在对其年代进行考订并加讨论。

(一) 残历十至十九日(1—10行)的月份

残历共存两断片，第一片即1至10行，第二片为11—19行。第一片中，十五至十八日(6—9行)的日期是完整的，其前数日则可依日序和干支表补齐。残存八日中，每日均有建除注历。依据建除十二客同纪日地支的对应关系，定与午、执与未、破与申、危与酉、成与戌、收与亥、开与子、闭与丑相对应，全是星命月中正月的内容^②。残历6行又有一个物候注“鸿雁来”。而在传统历书中，它是“雨水正月中”气下的一个物候。由此我们即可判断，残历1—10行属于正月历日。从十五日干支为丙戌可推知正月朔日为壬申。

(二) 残历的纪年天干范围

第18行有“天德在乾”、“月德在丙”、“月合在辛”、“月空在壬”等月神方位日期，而这些全是五月月序的内容^③。第19行又有较大的“丙午”二字，当是五月的纪月干支。五月为丙午，则正月经月干支为壬寅，与之对应的纪年天干是丁或壬^④。就是说，此历的年天干不是丁，便

是壬。

(三) 残历 11—17 行的月份与日期

前已说明,18 行是五月月序内容。那么在其前面且与之相连的 11—17 行当是四月的历日。但我们不知四月的月大小,无法确定 17 行是四月二十九日还是三十日。可是 18①行有“自四月二十七日丁卯午正三刻芒种”云云,即可获知四月二十七日干支为丁卯。如果四月是大月,则此丁卯日当在 14 行;如果是小月,则在 15 行。我们看到 15②行有“复日”注记。从敦煌历日中众多的复日注记,我们知道,复日仅与天干对应,而不与地支对应。在“星命月”的五月里,复日是注在“丁”日的。由于芒种五月节不在 14 行,就在 15 行,而一进入芒种就算进入“星命月”之五月,所以,由复日可知,15 行天干当是“丁”,此日也必是丁卯日,不可能是 14 行了。既然 15 行是二十七日丁卯,则 16 行为二十八日戊辰,17 行为二十九日己巳。再往下便是五月一日了,五月朔日当为庚午。四月二十七日丁卯,则四月朔日当为辛丑。现将已考出的三个月朔整理如下:正月[?],[壬申朔];四月[小],辛丑朔;五月[?],[庚午朔]。

(四) 残历的年份

第 19 行注有“四月二十七日丁卯芒种”,说明某年的芒种五月节在四月二十七之丁卯日。张培瑜先生《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⑤一书给出了自秦朝以来每年的节气所在日期及干支,使用起来极为方便。由于此残历有二十八宿注历(见 2—9 行),而此法连续使用始于南宋,故南宋以前可不考虑。我们从公元 1127 年查起,发现宋孝宗淳熙九年壬寅岁(1182)的芒种是在四月二十七日丁卯,与残历相一致。故可初步考虑它就是残历的年份。

(五) 残历 8 行,即正月十七日戊子有一“蜜”日(星期日)注

如果认为此历为公元 1182 年历日,则此日合西历 1182 年 2 月 21 日。查《日曜表》,恰是星期日。淳熙九年干支为壬寅,与前此考出的此

历纪年天干不是丁便是壬也符合；正、四、五月的月朔也相一致，故可将残历的年代加以最后确定。

（六）对残历二十八宿注历的检查

从对残历进行定年的角度而言，我们的工作到此应该说已经结束。但是此历是用二十八宿注历的，于是就给我们提供了一次对所定年代进行检验的机会。

残历2行注“心”，是十一日，反推上去，则十日为“房”，九日为“氐”，八日为“亢”，七日为“角”。“角”宿是中国传统二十八宿的第一宿。因此，宋淳熙九年正月七日是某一个二十八宿注历周期的开始。

传世南宋《宝祐四年(1256)会天万年具注历日》也是用二十八宿注历的，其三月最末一天为“三十日辛酉木执轸”^⑥，“轸”宿是二十八宿的最末一宿，可知此日是某一个二十八宿注历周期之末。

从淳熙九年正月七日至宝祐四年三月三十日共有 27104 天^⑦，

$27104 \text{ 天} \div 28 \text{ 天} = 968 \text{ (周)}$

可知在这 74 年左右的时间里，共用了 968 个二十八宿周期注历。淳熙九年的二十八宿注历与宝祐四年的二十八宿注历是连贯的，与黑城出土的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历日、吐鲁番出土的《明永乐五年丁亥岁(1407)大统历》^⑧也是连贯不断的。它证明我们所定年代完全可靠。

淳熙九年宋朝行用的是《淳熙历》。此历颁行于淳熙四年(1177)。宋朝自南迁之后，命运多舛，理国维艰，所制历法无太多优长可言者。此淳熙历的历法亦无太明显的长处，以致行用十年后，国学进士石万上奏指出：“《淳熙历》立元非是，气朔多差，不与天合。……南渡以来，浑仪草创，不合制度，无圭表以测日景长短，无机漏以定交食加时……”^⑨尽管如此，此件残历也是南宋早期的历书实物，十分珍贵。

这里我们还要指出两点：第一，此淳熙九年历日是现存用完整二十八宿注历最早的一件，而且与其后的宝祐四年历日相连贯。以二十八

宿连续注入历日,各主吉凶,以往仅知始于南宋,而且南宋实物仅有传世的宝祐四年历。此历比宝祐四年历早了75年。显然,用二十八宿注历一法比淳熙九年还早。相信以后随着出土实物的增多,此法之起始点会日渐明朗。同时,因为与宝祐历相连,所以,残历注入各日的二十八宿也可当作检验坐标,尤其是淳熙九年正月七日为“角”,更应成为一个标尺。第二,敦煌历日中最晚的一件是《宋淳化四年癸巳岁(993)具注历日》,至此淳熙九年共过去189年。我们发现,此历所注入的一些神煞内容,如七圣、天魁、玉堂、民日、天喜、天马、伐日、小时、土府、土符、神在、福德、相日、驿马、天巫、天后、大明、月恩、四相、生气、时阳等,在敦煌历日中尚未见到。这就说明,自中唐至南宋,是中国传统历书中术数文化内容大步发展的时代。众所周知,清人辑成的《协纪辨方书》是术数文化的集大成之作。但是,这一由少到多的发展过程以往并不十分清楚。仰赖出土文献和文物,其发展线索才逐渐清晰起来。我们期待着再有更多的历日实物出土,以便对术数文化的发展史能获得更深层次的认识。

(原载《华学》第四辑,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8月,第131—135页)

注释:

- ① (俄)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40页。
- ② 参拙编著《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见《各星命月中建除十二客与纪日地支对应关系表》,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741页。以下引此书简称《辑校》。
- ③ 参见《辑校》,第738页,附录三《月神方位、日期表》。
- ④ 同上书,第745页,附录一〇《正月月建与纪年天干对应关系表》。
- ⑤ 张培瑜《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
- ⑥ 见《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天文卷》第1册,河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695页。

- ⑦ 依据张培瑜《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朔闰表计算。
- ⑧ 拙作《吐鲁番出土〈明永乐五年丁亥岁(1407)大统历〉考》，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五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63—268页。
- ⑨ 《宋史·律历志十五》。

黑城出土《西夏皇建元年庚午岁 (1210)具注历日》残片考

1913—1915年间,斯坦因在进行第三次中亚探险时,曾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的黑城子进行过发掘。在所发现的纸质文书中,有一件印本历日残片,编号为 K. K. 11. 0292(j)。此件为正、背两面印刷,背面为何内容尚需研究,但正面为历日则毫无疑问。不久前,沙知先生在其《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一书中,刊布了此件图版,附有释文,并题作“元印本具注历残页”。^①不过,准确年代尚未究明。笔者利用古代历法的专门知识对其年代进行考订,以飨读者,并祈教正。

根据图版左下方所附比例尺,经过计算,该件为 10.2cm×13.5cm 的小残片,内容为印本历日,事实上只属于某月四、五两日的相关内容,今释文如下:

五	长	四
日	星	日
庚		己
申		未
木		火
建		闭
箕		尾

不难看出,残存两天历日的内容,从上到下依次是:日序,纪日干支,该干支的纳音(以五行代替),该日所注的建除和二十八宿。这些在古代

历日中均为习见内容,没有多少特别之处。但正是它们,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信息,从而使揭示其绝对年代成为可能。

为方便讨论,我们今据残片四、五两日的内容往前推补三天:

[一日丙辰土成 氏]

[二日丁巳土收 房]

[三日戊午火开 心]

上述推补的根据是:日序及其干支据干支表上推,各干支之纳音据《六甲纳音表》^②;建除十二客的排序为:建、除、满、平、定、执、破、危、成、收、开、闭,虽在“星命月”之第一日需重复前日一次,但我们尚不知此段历日“星命月”之一日所在,姑且按建除十二客之顺序补之;二十八宿东方七宿次序为“角、亢、氏、房、心、尾、箕”,其排列也不重复,故可顺次推补。

从推补可知,此二日残历的月朔为“丙辰”。我们进一步想知道的是,此丙辰为几月的朔日?

笔者过去在多篇文章中反复指出,建除十二客同纪日地支间有固定对应关系。残历四日为“未”,建除为“闭”,五日为“申”,建除为“建”,这都是在“星命月”七月范畴内的现象^③。而所谓“星命月”之七月,是指“立秋七月节”到“白露八月节”前一天的那段时间。理论上,农历十二个月每月各有一个节气和一个中气。但由于农历月份是朔望月,每月仅 29.53 天,而二十四节气是一个回归年(365.2422 日)等分为二十四份的结果,每份 15 天还多,于是便需置闰。置闰的结果,就使各月节气所在之农历日期,或注在上月的下半月,或注在当月之上半月。若注在上月下半月,该“星命月”范围便延至当月之下半月;若注在当月之上半月,该“星命月”便延至下月之上半月。因此,残历四、五二日既在“星

命月”七月之范围,那么它的历法月便有两种可能:要么是七月,要么是八月。也就是说,该残历七月或八月朔日为丙辰。

我们推出的该历当月一至三日的二十八宿内容十分有用。二日注“房”值得注意。中古时代,大约从唐中期开始,人们使用由西方传来的“七曜日”注历,星期日称作“蜜”。大概从五代开始,人们又使用二十八宿注历(后来曾中断)。七曜日是七天一周期,二十八宿是二十八天一周期,且都不重复,于是,二十八宿注历同“七曜日”注历之间便形成了一种固定对应关系。

“七曜日”的排列次序为日、月、火、水、木、金、土。二十八宿从“角”宿开始,“角”为东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之首,而古代阴阳家又将东方与“木”相配(“东方甲、乙木”),亦即是说,“角”宿必与“木曜日”相值,于是形成下列固定关系:

七曜日	木	金	土	日	月	火	水
二十八宿	角	亢	氐	房	心	尾	箕
	斗	牛	女	虚	危	室	壁
	奎	娄	胃	昂	毕	觜	参
	井	鬼	柳	星	张	翼	轸

从上可知,历日上凡注房、虚、昂、星四宿的日子均为“日曜日”,亦即星期日,当时称作“蜜”。残历二日注“房”,当是蜜日所在。

上述考论的结果是,该历日残片属于七月或八月,朔日丙辰,初二为星期日。

用上述内容,在陈垣先生《二十史朔闰表》上进行搜寻,结果是:从公元1001—1911年,共有17年七月朔日为丙辰,它们是:1019,1086,1112,1143,1205,1236,1329,1396,1422,1453,1582,1639,1706,1763,1830,1856,1887年。其中仅1639年(明崇祯十二年)七月初二为日曜

日,其余 16 年七月初二全不是。但根据张培瑜先生《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④一书,该年立秋在农历七月初九甲子日。而我们前已指出,残历初四“未”与“闭”对应,初五“申”与“建”对应,表明它们均在“星命月”七月之内,亦即是说,三日之前已注过“立秋七月节”,而不可能注在初九日。故尔,1639 年亦在排除范围。这就是说,该残片不是七月的历日,而应是八月的历日。

又从《二十史朔闰表》检得,自公元 1001—1911 年,也有 17 个年份农历八月朔日为丙辰:1024,1117,1148(闰八月),1210,1241,1267,1334,1427,1458,1520,1551,1577,1644,1675,1701,1768,1892 年。但其中仅 1210、1241、1701 三年八月初二为日曜日,其余全不是,当予排除。

查《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1241 年农历六月二十日丁丑立秋,白露八月节在七月二十二日戊申,则“星命月”七月在六月二十日至七月二十一日之间。这期间初四、五日只能属于七月。但我们前已考知,此残片非七月历日,故 1241 年当予排除。

又据《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1210 年农历七月九日乙未立秋,白露八月节在八月十日乙丑;1701 年农历七月初五庚寅立秋,八月六日辛酉白露,“星命月”之七月与二历均相符合。如何选择呢?

首先,根据建除十二客的排列规则,每月第一日即节气所在之日的建除,应该重复其前日一次。而残历四日为“闭”,五日为“建”,不曾重复,证明五日不是立秋七月节所在之日,即与 1701 年农历七月初五庚寅立秋不合。其次,我们知道,公元 1701 年是清康熙四十年,所用历本为《时宪书》。而清代历日几乎全有传世本,藏在故宫博物院。《时宪书》格式与敦煌历日每天一竖栏相仿^⑤,而与本文研究的残片相去甚远。此残历的现存格式与笔者过去从俄藏黑水城文献中考出的 1182 年具注历日、1211 年具注历日^⑥几乎完全相同。这样,从建除和印本历日的格式,便可确定该历日残片为公元 1210 年的具注历日。

公元 1210 年,相当于南宋宁宗赵扩嘉定三年、西夏襄宗李安全皇建元年。这就必然存在一个问题:该汉文历日到底是南宋王朝所颁历日,还是由西夏王朝所颁发?近来,西夏文和西夏史著名学者史金波教授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⑦。他注意到,黑城出土的 1182 年和 1211 年具注历日中,“明”字因避讳而右侧“月”字缺末二笔,认为这是西夏人避太宗李德明名讳所致,从而认为该二历日应是西夏人印刷的汉文历日。西夏历日种类繁多,有刻本西夏文历日,写本西夏文—汉文合璧历日,汉文刻本历日和汉文写本历日。史先生进一步认为,笔者以前所定的《宋淳熙九年壬寅岁(1182)具注历日》和《宋嘉定四年辛未岁(1211)具注历日》应分别更名为《西夏乾祐十三年壬寅岁(1182)具注历日》和《西夏光定元年辛未岁(1211)具注历日》。史先生的见解是正确的认识,笔者在这里表示诚恳接受,并更正自己既往的定名。至于本文研究的 1210 年历日残片,因过分残碎,虽未见有“明”字缺笔,但残存格式与其后仅一年的西夏光定元年历日完全相同,故亦应从西夏年号定名为《西夏皇建元年庚午岁(1210)具注历日》。

附带指出,残历五日右上角有“长星”二字,此属历注内容。清《协纪辨方书》卷十“宜忌”云:“长星、短星:忌进出口、裁制、经络、开市、立券、交易、纳财、纳畜。”^⑧而同一历注,亦见于黑城出土的《西夏光定元年辛未岁(1211)具注历日》的七月八日右上角^⑨。这同样可以作为本文研究的历日残片属于皇建元年(1210)具注历日的旁证。

(原载《文物》2007 年第 8 期,第 85—87 页)

注释:

- ① 沙知、吴芳思编著《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上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年,第 316 页。
- ② 参拙编著《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附录十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 年,第

747 页。

③ 参同上书,第 741 页。

④ 张培瑜《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 年,第 368 页,第 368 页。

⑤ 参陈遵妣《中国天文学史》第 3 册,所收清乾隆六十年《时宪书》书影照片,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1620 页。

⑥ 参拙著《敦煌吐鲁番天文历法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 262—289 页。

⑦ 史金波《西夏的历法和历书》,载《民族语文》2006 年第 4 期,第 41—48 页。

⑧ 《中国方术概观·选择卷》(上),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 年,第 357 页。

⑨ 俄 ИHBNO. 5229 号。载《俄藏黑水城文献·汉文文献》第 6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第 315 页。

黑城出土《宋嘉定四年辛未岁 (1211)具注历日》三断片考

在近年陆续出版的《俄藏黑水城文献·汉文文献》一书中,刊布了一些具注历日的断片,颇受关注。其中“俄 TK297”号我已考订为《宋淳熙九年壬寅岁(1182)具注历日》^①,属于南宋“淳熙历”的实行历书。今再考察另外三个残段,最终证明它们都是《宋嘉定四年辛未岁(1211)具注历日》。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三个断片中,“俄 TK269”号、“俄 ИНВ. NO. 5469”号已正式刊布^②,而“ИНФ. NO. 8117”号则是我国著名西夏文专家史金波教授于 2000 年夏赴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整理该所未编目文献时发现的。其发现之功不可泯没,著录于此,以表敬意。

一 ИНВ. NO. 5282 号加 8117 号

此号即史金波教授新发现的一段。从照片复印件看,上下左右均有残失,估计下部残失更严重一些,但属于一印本历日无疑。现存部分由两片组成,分别编为 8711(一)和 8711(二);自上至下仍存五栏,分别是:(1)日序、干支、纳音和建除;(2)二十八宿注历;(3)往亡、除手甲、蜜日注等;(4)物候注;(5)吉凶宜忌等选择事项。我们在释文时,原则上仍以日为单位进行;因现存第(5)栏有 4 到 5 行文字,我们在各日之下又分别用①、②、③、④、⑤来标具此栏内的各行,以示区别。一般不出

校记,需说明时以“按”说明之。

先释文如下:

[前缺]

1. [二]十三日乙亥火破 女 下弦

① 不宜嫁娶、出行、开

② 启攒、栽植、种蒔

2. [二]十四日丙子水危 虚,沐浴、蜜、往亡(按,自沐浴至往亡共3项占一栏)

① 吉日。大小岁前、天德

② 天愿守日,岁德、不将

③ 七圣、兵吉。宜修

④ 理垣墙,集福、祈恩和合

3. [二]十五日丁丑水成 危 归忌、除手甲(按,归忌与除手甲占一栏)

① 吉日。大小岁前、天喜、天

② (模糊不清)

③ 七圣、 宜尊

④ 祷告神祇,泥饰庐舍

4. [二]十六日戊寅土收 室 卿比

① 天牢黑道、天刚、月

② 土符、伏罪、伐日、不

③ 伐,兴作土工,远出征行

④ 事营葬、祭祀、扫饰

5. [二]十七日己卯土开,辟(壁) 王瓜生

① 吉日。岁前、天恩、月、母

② 生气、普护、神在、时阳

③ 五合 宜宣覃

④ 勋庸、立木、上梁、安置栏

⑤ 师傅、祭祀、远行。

6. [二]十八日庚辰金闭 奎

① 吉日。岁后、天恩、月德

② 神在、复、天德、天府、明

③ (模糊不清)

④ 塞穴、筑墙、祷祀神[祇]

7. [二]十九日辛巳金建 娄

① 小时、重日、土府、伐日、王勃黑道。日出寅正四刻

② 伐日、王□黑星。□讨伐城、

③ 塞穴、发土、上(?)营葬迁居筑

④ 室、远出、□图、嫁娶 [日入]戌初初刻

白白白

8. 四月大 紫黑绿 建癸巳

黄赤碧

(以下四月月序即④⑤两栏,原并作一栏,今不改)

① 自三月十七日己巳□□初刻立夏,已得四月[之节]。

② 即天道西行,[宜向西行],又宜修造西方。天[德在辛],

③ 月厌在未,月煞在辰,[月德]在庚,月合在乙,月[空在]甲,乙、庚上取土及宜[修造]。

④ 此月初七日戊子戌[正□刻]后,甲时、丙时

⑤ 及壬时,卯前、午前、

9. [一]日壬午木除 胃

① 吉日。岁后吉期。天□□龙黄道

② 圣心、兵宝，官日、吠(?)，神在

③ 大(?)明、宜宣赦宥，☐建修饰

④ 垣墉、祭祀、解除

[后缺]

下面对其年代进行考订。

(一) 残历的月份

第 8 行有醒目的“四月大”三字，可知其前的 1—7 行属于三月的历日，第 9 行属于四月一日历日。因原件上部有残失，故我们在录文时作了增补，共得三月二十三日至四月一日的历日。从录文可知，三月二十九天，是小月；二十三日乙亥，则月朔为癸丑。四月大，朔日壬午。又可推得五月朔日为壬子。这样，残历三、四、五共三个月的月朔已可获知。

(二) 残历的纪年地支

残历四月月九宫为二黑中宫(第 8 行)。因月九宫是从正月开始，以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的次序逆向排列的，今反推回去，可知正月月九宫为五黄中宫，而正月五黄中宫，则其纪年地支为丑、未、辰、戌^③。

(三) 残历的纪年天干

残历第 8 行月九宫图下有“建癸巳”，则此历正月建庚寅；正月建庚寅，则其纪年天干当作丙或辛^④。

(四) 残历的纪年干支

将上述所得两个天干与四个地支相配，共得丙辰、丙戌、辛丑、辛未四个干支，此即残历应在的四个纪年干支，必在此四个年份求得。

(五) 残历的绝对年份

我们注意到，此历是以二十八宿注历的。而就目前所知，连续用二十八宿注历始于南宋，故南宋以前可不考虑。我们以陈垣先生《二十史朔闰表》为据，从公元 1127 年查起，在丙辰、丙戌、辛丑、辛未四个干支

年份里,与上述所推的此历三、四、五三月份月朔全合者为南宋宁宗嘉定四年(公元 1211),因此可考虑此年为其应选年份。残历三月二十四日有“蜜”日注(第 2 行),而此日合公元 1211 年 5 月 8 日,查《日曜表》,确为星期日,由此可知,此历为公元 1211 年,即宋宁宗嘉定四年的具注历日残片。

二 俄 TK269 号

俄国著名敦煌学家孟列夫教授在其以往出版的《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中,曾对此件著录道:“历书,保存下来的是中间一条的 3 栏:①指出吉凶征兆;②太阳经过黄道的周相;③庇护神。”“木刻本,原先大概是卷子装,54cm×8cm 的长条,两残纸。11 天的栏日(第 1 和第 11 天的残),宋体字,宋版本,十二世纪前三十年的。此长条被剪开作封皮用和被叠成为折面为 5cm×3cm 的折子……”^⑤

现在再根据我对原件图版的观察说明如下:原件确实被剪成了折子形状,乍一看好像是册子装的书页。现存内容共三栏,第一栏为神煞和宜忌,第二栏为日出日入时刻及昼夜时刻;第三栏为人神流注。第三栏的内容是将“人神”二字刻或排在中间,余字分布于“人神”两侧。如“人神在胸”,“在”字居于“人神”之右,“胸”字居于“人神”之左。今录文时为方便计,一律改为直行即“人神在胸”,好在并不妨害原意。释文时,我们以“折”为单位进行,每折中的栏次分为 1、2、3(无内容者跳过),每栏中的行次为①、②、③……,推补文字放入[]中。

[前缺]

第一折

1. ① 动土

② 留(?)进人

3. [人神在]气冲。

第二折

1. ① [鸣]吠对，

② 守日。

③ 狱缓刑，

④ 官(?)视官。

2. ① 昼五十三刻，

② 夜四十七刻。

3. 人神在股内。

第三折

1. ① 天德合

② 宝明星，

③ 续世，

④ 恩行庆。

3. 人神在足。

第四折

1. ① (图版模糊)

② (图版模糊)

③ 至(?)

3. 人神[在]内踝。

第五折

1. ① 九空

② 伐日

③ 盖(?)造舍

④ 征行运。

3. 人神在手小指。

第六折

1. ① ☐ 复日

② ☐ ☐ 食

3. 人神在外[蹠]及胸。

第七折

1. ① 七圣

② 胗(?)盖

③ 药疗病

④ 德(?)相日。

2. ① 日入酉正二刻。

3. 人神[在][]阳明。

第八折

1. ① 七圣

② 出使

③ ☐ 进人

3. 人神在胸。

第九折

1. ① 触水龙，

② 不宜命、

③ 舟船兴

④ 理灶

2. ① 日出卯初三刻，

② 日入酉正初刻。

3. 人神在膝。

第十折

1. ① 合、金堂，

② 宜修葺、

③ 学、立契

3. 人神在阴。

第十一折

1. ① 道德

② 结会亲姻

③ 执(?)捕寇盗

3. 人神在膝胫。

第十二折

1. ① 九醜(二字左侧字划残失)

[后缺]

现在对残历的内容进行研究并考订其年代。

(一) 残历十二折的各自日期

残历第三栏的内容是人神流注。而根据我们对众多敦煌具注历日的研究,在每月三十天中,每天所注人神是固定不变的,即:一日在足大指,二日在外踝,三日在股内,四日在腰,五日在口,六日在手小指,七日在内踝,八日在长腕,九日在尻尾,十日在腰背,十一日在鼻柱,十二日在发际,十三日在牙齿,十四日在胃管,十五日在遍身,十六日在胸,十七日在气冲,十八日在股内,十九日在足,二十日在内踝,二十一日在手小指,二十二日在外踝,二十三日在肝,二十四日在手阳明,二十五日在足阳明,二十六日在胸,二十七日在膝,二十八日在阴,二十九日在膝胫,三十日在足趺^⑥。以此与本件残历各折对照,可知:第一折为十七日,第二折为十八日,第三折为十九日,第四折为二十日,第五折为二十一日,第六折为二十二日,第七折为二十四日或二十五日,第八折为二

十六日,第九折为二十七日,第十折为二十八日,第十一折为二十九日,第十二折暂不明了,下面再议。由是可知,这段历日基本上是连续的,只是缺了二十三日及二十四或二十五日中的一日。

(二) 残历的月份

残历第九折第1①行中有“触水龙”注记,而此折属于二十七日(详前)。在一个甲子六十日中,只有三天即丙子、癸未、癸丑属于“触水龙”^⑦。第十折①行又有“金堂”一目,其排列规则依“星命月”为:正月辰日,二月戌日,三月巳日,四月亥日,五月午日,六月子日,七月未日,八月丑日,九月申日,十月寅日,十一月酉日,十二月卯日^⑧。而此折属于二十八日(详前),与第九折相连贯。所以,此“金堂”所在日的日支必须与第二十七日可能的三个纪日干支(丙子、癸未、癸丑)相连。而子下为丑,未下为申,丑下为寅,对照“金堂”所在各月日支之日期,可能的月份为八月、九月、十月共三个月,其它均不在应选择条件之内,换言之,此残历之时限是“星命月”八、九、十共三个月中的某一个月。

残历第二折第2①行和2②行有昼夜时刻注记,即“昼五十三刻,夜四十七刻”。我们知道,在中国古历实行百刻纪时制时,夏至白昼六十刻,夜晚四十刻;冬至白昼四十刻,夜晚六十刻。春秋二分昼夜平分各五十刻。过了夏至,白昼减刻,夜晚增刻,过了冬至,白昼增刻,夜晚减刻,因此,历注中的“昼五十三刻,夜四十七刻”每年共有两次,一次在二月,约在清明三月节与谷雨三月中之间;一次在处暑七月中前后^⑨。由于前面我们已将此残历的月份考定在“星命月”的八、九、十共三个月中,则此处之“昼五十三刻,夜四十七刻”当靠近“处暑七月中”这个中气,可以考虑的月份是历日的农历七、八两个月,而九、十两月应被排除。那么,此残历的农历月份到底是七月还是八月呢?读者如果细心的话,准会注意到我们几次提到“星命月”这个概念。历日中的农历月

份是每月一日至二十九日或三十日,但“星命月”则是以十二个节气(非中气)各自所在之日至下一个节气的前一日为一月,编入历书时处在游动状态,以至本月节气可注在上月的下半月至本月的上半月,而中气则在本月一个月内游动。前述我们所考“触水龙”注在二十七日,“金堂”注在二十八日,而这两天虽然是农历日期,但其前必然已注了“白露八月节”,否则不会符合它们各自在“星命月”八月的安排规则。换言之,它们虽在“星命月”之“八月”,而历日的农历月份应为七月。简单说,我们可确认此段残历属于农历七月。

(三) 残历各日干支

前已指出,第十折 1⑩行“金堂”一目于“星命月”之八月在丑日,九月在申日,十月在寅日。而我们已排除此历在九、十两月的可能,只剩一个“八月丑”日了。因此,第十折的二十八日当为“丑”日,即其纪日地支是丑。其前一日之“触水龙”的干支为丙子、癸未、癸丑三者之一,在丑日前且能够与“丑”日相连的只有丙子日,也就是说残历二十七日的日干支为丙子(第九折)。由此上推下移可知,二十八日(第十折)为丁丑日,二十九日(第十一折)为戊寅日,二十六日(第八折)为乙亥日,二十五日(可能第七折)为甲戌日,二十四日(也可能是第七折)为癸酉日,二十三日(佚失)为壬申日,二十二日(第六折)为辛未日,二十一日(第五折)为庚午日,二十日(第四折)为己巳日,十九日(第三折)为戊辰日,十八日(第二折)为丁卯日,十七日(第一折)为丙寅日。再往前推,可知此段七月历日的月朔为庚戌。

那么,七月是大月还是小月呢?我们发现第十二折 1⑪行的“九醜”二字残文十分有用。己卯日是“九醜”之一,其余八日(戊子、戊午、壬子、壬午、乙卯、辛卯、乙酉、辛酉)全然不能同其前之二十八日戊寅(第十一折)相连。由此可以确认,三十日干支是己卯,此七月共三十日,是大月,八月朔日为庚辰。

(四) 残历年份

根据前述推出的七月大、庚戌朔和八月庚辰朔,我们从宋朝立国的公元 960 年起,在陈垣先生《二十史朔闰表》上进行检索,直至清末,共得到以下十一个年份与残历相同:宋天禧四年(1020)、元祐二年(1087)、绍兴十四年(1144)、嘉定四年(1211)、咸淳四年(1268)、明洪武三十年(1397)、景泰五年(1454)、正德十六年(1521)、万历六年(1578)、明福王弘光元年(1645)、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可喜的是,我们在本文上节考出的 ИНФNO. 8117 号为宋嘉定四年(1211),亦在上述十一个年份之中。由于它们都是印本历日,且字迹相同,则此段七月残历当是原来宋嘉定四年具注历日中的一部分残片。因被剪裁后派作它用,故残破过甚,致使我们不得不用过多的笔墨进行考辨,好在终于找到了它的原始归属!

为保险起见,我们对所定年代再检核如下。在前述讨论时,我们已指出,残历二十七日(第九折)所注“触水龙”、二十八日(第十折)所注“金堂”,是历日已进入星命月八月的表征,亦即是说,在此二日之前历注已有“白露八月节”了。查检张培瑜教授《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①一书,此年白露八月节在七月二十一日庚午,从此日始便进入了“星命月”之八月。它表明我们对此残历所定年、月均与事实相符。

三 俄 ИНБNO. 5469 号

先释文如下:

[前缺]

1. [十九]日戊戌木除 室 侯 归妹内

① 月害、

② 不宜□官上□ 刺受 □□□

③ 奴婢，出放资财。

2. [廿]日己亥木满 辟(壁) 沐浴

① 吉日。岁后，□□，月德□□□

② 天后、天巫、相日、七圣□□□

③ 宜上梁、立木、安置□枋□□□

④ 宜□穿穴、取土、追纳□□□

⑤ 络、裁缝。

3. [廿]一月庚子土平 奎

① 天魁、死神、兵禁、往亡□□□

② 九虎、天吏。宜训练兵□□□

③ 攻击城池，修盖邸第，筑垒□□□

④ 嫁娶、出行、经络、赴任□□□

4. [廿]二日辛丑土平 娄 寒露九月节鸿雁来宾 兑九侯
归妹外

① 月虚、天刚、月煞、死神□□□

② 狱日、□武、□□、阴私、黑□□□

③ 不宜盖屋、上梁、筑墙、取土□□□

④ 结会亲姻、兴狱讼、葬死丧□□□

⑤ 请医、冠带、合酱。

5. [廿]三日壬寅金定 胃 下弦 除足甲

① 吉日。[岁]后、月空、三合时□□□

② □□明星、七圣、鸣吠、四相□□□

③ □命黄道大明，宜盖宅□□□

④ 木、筑墙、结会亲姻、营葬□□□

6. [廿]四日癸卯金执 昴 蜜

① 吉日。岁后、六合、枝德、鸣

② 圣心、四相、不将、五合、七圣

③ 宜结会亲姻、修饰宅舍、修

④ 土畋 仇。

7. [廿]五日甲辰火破 毕 大夫无妄

① 大耗、四击、五盗、

② 远出征行、挂服、举哀、开仓

③ 结亲、婚嫁、营葬墓坟

8. [廿]六日乙巳火危 觜 上

① 吉日。岁后、母仓、续世、执储

② 阴德、七圣、明堂、黄道

③ 神在 宜请求

④ 祭祀鬼神、修葺庐舍、筑垒

9. [廿]七日丙午水成 参 雀入大水 为蛤

① 吉日。岁前、小岁对、天德、月[德]

② 母仓、天 、三合、要安、岁德

③ 神在、鸣吠、母仓、宜

④ 释放禁 、命将出师、发

⑤ 开拓疆境、选择贤能、结定

⑥ 安葬 、竖立契券、合和

10. 宪皇后大忌[廿八]日丁未水收 井

① 天魁、月刑、五虚、朱雀黑道

② 刑、

③ 盖屋、造宅、取土、筑墙、迁居

④ 渡水乘舟、合 药饵兴

11. [廿九]日戊申土开 鬼 沐浴

① 吉日。岁前小岁对、天赦

② 、生气、金堂、神在

③ 天宝、明星、二仪、绝阳

④ 金匱黄道，宜行庆 赏

⑤ 立木、上梁、安栏置枋、修础

⑥ 神祇。

12. [卅]日己酉土闭 柳 沐浴 除手足爪

① 吉日。岁前、天恩、天对、明

② 天德黄道、七圣、鸣吠、神

③ 火(模糊不清)宜修

④ 舍庐安置础碓，泥墙、塞穴、祀

⑤ 筑堤[防]

黄白碧

13. [九]月小 绿白白 建戌戌

紫黑赤

① (按，全残，今不见)

② 天道南行，宜向南行，又宜[修]

③ 月厌在寅，月煞在丑，月德在[丙]

④ 丙、辛上取土及宜修造。

⑤ 用癸、乙

⑥ 月十五日甲子卯正一刻后

⑦ 丁、辛时[吉](与⑤连读为“用癸、乙、丁、辛时吉”)。

14. 一日庚戌金建 星 蜜 卿 明夷

① 阴错、小时、白虎黑道、牢日、兵禁

② 天棒、黑星(?)、土府、不宜出

③ 师、讨伐、动土、筑墙、经络、迁居、举

④ 官赴任、竖造栏 、兴 词讼

15. [二日辛] 亥金除 张 沐浴 菊有[黄花]

① 吉日。岁前，天德合、月德 、天[恩]

② 天 五富、 期、敬安

③ 兵宝、相日、玉堂黄道、岁德

④ 旌赏功勋、策试贤良。

⑤ 择 修 饰屋庐

16. [三日壬] 子木满 翼 血忌

① 天火、天狱、大杀、天牢黑道

② 天狗、九醜、不宜盖造邸第、结

③ 词 迎娶、归家、祭祀、决水

17. 皇后大忌[四日] 癸丑木平 轸 土王用事

① 天刚、月 、死符、 黑

② 阴 黑星、狱日 日、触水

③ 八专、章光、[月] 虚、不宜

④ 赴任、 请医、嫁娶、会亲、放

⑤ 渡水、迁移宅舍，兴发讼词

18. [五日甲] 寅水定 角 除足甲

① 吉日。岁后，天府、 、阳纯(?)

② 七圣 司命、黄道

③ 三合、 五合 鸣吠 时

④ 宜破土、启攒，修德 惠。

19. [六日乙卯] 水执 亢 手足爪

① 岁后、 枝

② 守日、七圣、神在、五合、鸣吠对

③ 宜畋猎捕兽、请福祀神

20. [七日丙辰]土破 氏 霜降九月中 兑六三 豺乃祭兽
☐困

① 大耗、四击、五

② 往亡、雷公黑道

③ 攻战、、讨击贼城、临丧

④ 征行、理灶。

21. [八日]丁巳土危 房 上弦 蜜

① 吉日。岁前小岁后，神在

② 执储明星，明堂黄道，兵(?)

③ 、月德，宜训习戎师、选择

④ 修葺邸舍，筑垒墙壁，贮纳

⑤ 库、求嗣、祭神。

22. [九日戊午火成 心]

① 吉日。岁前、母仓、大会 ☐吉。

[后缺]

以上我们共录出 22 行文字。其中第 13 行属于月序内容，一览便知；其前有 12 天历日内容，其后有 9 天历日内容，共 21 天。下面对其年代进行考订。

(一) 残历月份。从图版看，此历上部已残，有缺字。但第 4 行有“寒露九月节”，由此可知靠近九月。又因置闰原因，节气(非中气)的位置总是注在本月上半月或上月下半月。此“寒露九月节”在某月下半月，可知，13 行前的 12 天内容属于农历八月，13 行是九月月序的内容，14—22 行属于九月一至九日的内容。又据残历可知，八月大，庚辰朔；九月小，庚戌朔；十月[?]，己卯朔。

(二) 残历的纪年地支。由 13 行九月月序可知,此历九月九宫为六白中宫,则正月为五黄中宫,与之对应的纪年地支为辰、丑、戌、未^①。

(三) 残历的纪年天干。又由 13 行九月月序得知,九月“建戊戌”,则正月应建庚寅,对应的年天干为丙或辛^②。

(四) 残历的纪年干支。以上述所得两个天干与四个地支相配,可得丙辰、丙戌、辛丑、辛未。此即残历应在的四个纪年干支,必是其中之一。

(五) 我们从南宋开始的 1127 年起,在陈垣先生《二十史朔闰表》上进行检查,上述四个干支年中,与残历八、九、十共三个月月朔相合的为宋嘉定四年辛未岁(1211)。

(六) 残历八月廿四日、九月一日和八日均有“蜜”日注。此三日合西历公元 1211 年 10 月 2 日、9 日和 16 日,查《日曜表》,此三日全是星期日,由此可将残历的绝对年代加以确定。

上面经过严密的考证程序,我们证明俄 ИНБ NO. 5285 加 8117 号、俄 ТК269 号、俄 ИНБ NO. 5469 号的共同年代是南宋嘉定四年(1211),也就是说,它们是《宋嘉定四年辛未岁(1211)具注历日》的三个断片。为稳妥起见,我们再对这个年代进行一次检验。

我们已注意到此历是用二十八宿注历的。残历三月二十七日所注为“辟(壁)”,其前十四天当注“角”,即在三月十四日。我们又知传世《南宋宝祐四年(1256)会天万年具注历》也是用二十八宿注历的,其中三月三十日注“轸”。^③自嘉定四年三月十四日至宝祐四年三月三十日共 16436 日。

$$16436 \text{ 日} \div 28 \text{ 日} = 587 \text{ (周)}$$

可知,其间共用了 587 个二十八宿周期注历。

残历三月十四日注“角”,九月四日注“轸”,这期间共有 168 日。

$$168 \text{ 日} \div 28 \text{ 日} = 6 \text{ (周)}$$

又知,这期间又用了6个二十八宿周期注历。

检验结果,证明我们所定年代正确无误。至于TK269号,因其过残,看不到二十八宿注历的痕迹,我们就不能使用同一方法进行检验了。

四 残历属于南宋《开禧历》的实行历书

在中国历法史上,有宋一代,制定和颁历虽多,但多数不出唐历范围,多数情况下是增损积年日法,演撰强弱之率,以求合于当时,多未经过实际观测,所以行之不久,便有误差,需要改历^⑭。

在《开禧历》产生之前,南宋行用的是《统天历》。此历为杨忠辅所撰,修成并颁行于庆元五年(1199)。此历的最大优点是回归年数值最准确,并认为回归年数值在变化,古大今小^⑮。但也存在缺点,行用数年后,日食便不准确。开禧三年(1207),大理评事鲍澣之对《统天历》提出批评,秘书监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曾渐也有微辞。“于是,诏[曾]渐充提领官,[鲍]澣之充参定官,草泽精算造者、尝献历者与造《统天历》者皆延之,于是《开禧新历》议论始定。诏以戊辰年(即嘉定元年,1208年)附《统天历》颁行之。”不久,布衣阮泰发就指出《统天历》和《开禧历》皆有差。至三年,邹淮又“言历书差忒,当改造”。至四年春,新历成,未及颁行,其事遂寝。韩侂胄当国时,又议改历。有人认为属不急之务,于是“《开禧历》附《统天历》行于世四十五年”,^⑯至公元1252年被《淳祐历》所代替。

从以上讨论可知,黑城所出《宋嘉定四年(1211)具注历日》属于《开禧历》的实行历书,而且是现知《开禧历》的唯一实行历书,其在中国历法史和学术史上的价值则是毋庸置疑的。

(原载邓文宽《敦煌吐鲁番天文历法研究》,
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71—289页)

注释:

- ① 见拙作《黑城出土〈宋淳熙九年壬寅岁(1182)具注历日〉考》,载《华学》第四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第131—135页。
- ② “俄TK269”号,图版见《俄藏黑水城文献·汉文文献》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55—357页。“俄TK5469”号将刊于同书第六册中。
- ③ 参拙编著《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附录一——“年九宫、正月九宫与年地支对应关系表”,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746页。
- ④ 同上书附录一〇《正月月建与年天干对应关系表》,第745页。
- ⑤ 王克孝译本。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9页。
- ⑥ 同注③附录九“逐日人神所在表”,第744页。
- ⑦ 参见(清)《钦定协纪辨方书》卷四“义例二”。
- ⑧ 参同上书卷六“义例四”。
- ⑨ 参同注⑦卷三十五“推测日刻”。
- ⑩ 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
- ⑪ 同注③。
- ⑫ 同注④。
- ⑬ 见《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天文卷》第一册,河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695页。
- ⑭ 参陈遵妣《中国天文学史》第三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476—1477页。
- ⑮ 《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0年,第561页。
- ⑯ 见《宋史》卷82《律历志十五》。

出土秦汉简牍“历日”正名

二十世纪是考古资料批量面世的一个世纪。单就实用历本而言，世纪之前，人们所能看到的最早实物，仅是传世《南宋宝祐四年丙辰岁（1256）会天万年具注历》^①；而至世纪之末，人们已能从出土文物中看到秦始皇三十四年（前 213）的实用历本^②了，将时间提前了 1469 年。其间除三国、两晋、南朝和隋代的历本尚无实物呈现于世，其余秦、两汉、北朝、高昌国、唐、五代、宋、元、明诸时代历本均有出土，不仅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眼界，而且也为古代历日研究的深入提供了基础和先决条件。

出土历本实物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秦汉简牍、敦煌吐鲁番文献和黑城文物。不过，这些总量近百份的历本实物多属断简残编。除了敦煌吐鲁番出土的残“历日”或“具注历日”可据完本定出其准确名称外，秦汉简牍历本少有完本（仅一份原有题名，说详下）。如何给这些残历定名，便成了一个大问题。而至二十世纪末，秦汉简牍历本出土实物已近 40 份。如果我们不能给这批文物（亦可视作文献）定出一个准确的、符合历史实际的名称，势将妨碍对它们的认识和理解，而且也会妨碍今后同类文献出土后的定名工作。职是之故，我在这里对出土秦汉简牍历本的定名问题略陈管见，以期引起学术界同仁的关注和讨论。

经查，最早将汉简中的历本定名为“历谱”者，是罗振玉和王国维先生。罗、王二氏在《流沙坠简》中将一些零散历简分别定名为“元康三年

历谱”、“神爵三年历谱”、“五凤元年八月历谱”、“永光五年历谱”、“永元六年历谱”^③等。这样的定名,便被后世学者沿用了下来。如陈久金、陈美东二先生有《从元光历谱及马王堆帛书〈五星占〉的出土再探颛顼历问题》^④发表。近年来,《文物》杂志发表过彭锦华先生的《周家台 30 号秦墓竹简“秦始皇三十四年历谱”释文与考释》^⑤。中华书局出版的《尹湾汉墓简牍》一书收有定名为《元延元年历谱》和《元延三年五月历谱》^⑥的文献;《关沮秦汉墓简牍》除收有定名为“历谱”的一组秦朝历本,同时收有张培瑜、彭锦华二先生的大作《周家台三〇号秦墓历谱竹简与秦、汉初的历法》^⑦。文物出版社最新出版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也将自汉高祖五年(前 202)至吕后二年(前 186)的一组实用历本定名为“历谱”^⑧。诚然,上述所举,绝非以往给同类文献定名的全部,但已可看出,罗、王二氏给实用历本定名为“历谱”的影响十分巨大。

问题在于,将这些出土历本实物定名为“历谱”是否正确。

当年罗、王给《流沙坠简》中的历日简定名“历谱”时,并未说明他们之所以这样做的理由,推测本自于《汉书·艺文志》“历谱”类的名称。但仔细推敲一下,《汉志》“历谱”和出土的这些历本根本不是一回事。为便于讨论,现将《汉志》“历谱”类著录的文献名称以及班固对“历谱”的解释引录如下:

《黄帝五家历》三十三卷。《颛顼历》二十一卷。《颛顼五星历》十四卷。《日月宿历》十三卷。《夏殷周鲁历》十四卷。《天历大历》十八卷。《汉元殷周谍历》十七卷。《耿昌月行帛图》二百三十二卷。《耿昌月行度》二卷。《传周五星行度》三十九卷。《律历数法》三卷。《自古五星宿记》三十卷。《太岁谋日晷》二十九卷。《帝王诸侯世谱》二十卷。《古来帝王年谱》五卷。《日晷书》三十四卷。

《许商算术》二十六卷。《杜忠算术》十六卷。

右历谱十八家，六百六卷。

历谱者，序四时之位，正分至之节，会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杀生之实。故圣王必正历数，以定三统服色之制，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会。凶厄之患，吉隆之喜，其术皆出焉。此圣人知命之术也，非天下之至材，其孰与焉！道之乱也，患出于小人而强欲知天道者，坏大以为小，削远以为近，是以道术破碎而难知也。

我之所以不惮其烦地将《汉志》这段文字全文抄录，就是为了便于了解班固所说的“历谱”究何所指。略而言之，他所开列的18种书名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属于“历术”，也就是编制“历日”的方法和计算数据，相当于后世的“历经”；另一类属于帝王世谱、世系之类，相当于后世所说的“谱系”、“家谱”、“族谱”。但无论其中哪一类，与出土实用历本都不相同。换言之，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并未将实用历本单列为一个门类，也未涵盖在“历谱”之中。因此，虽然我们今天已看到几十份这类实用历本，却不能据《汉志》将其定名为“历谱”。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班固本人对他所讲的“历谱”已有解释。在上引文字中，共有三处阐释“历谱”二字，即“其术皆出焉”，“此圣人知命之术也”，“道术破碎而难知也”，都是说“历”属于“术”，而不同于据“术”而编的实用历本。“历”字含义虽多，但其一义为“术”，殆无疑义。《淮南子·本经训》：“星月之行，可以历推得也。”高诱注：“历，术也；推，求也。”是其证。同时，班固这三处对历谱的解释同他在前面所开列的书名性质也是互相照应的，是一致而不矛盾的。问题出在后人的理解上，也就是说，误将出土实用历本理解为“历谱”了。

我的基本看法是：出土的这几十份秦汉历本，其原始名称就是“历日”，而不必改称为“历谱”。理据如下：

第一，汉代人就称这类文字为“历日”。主要有两个人，一是郑玄（127—200），二是王充（27—约97），都是东汉人。《周礼·春官·冯相氏》有句“以会天位”，郑玄注：“会天位者，合此岁月辰星宿五者，以为时事之候，若今历日大岁在某月某日某甲朔日直某也。”“某甲朔日”即朔日干支是××；“直”通“值”，“值某”即该日所应遇到的神煞。所言全是历日的内容，与出土历本亦相合不悖。由是可知，郑玄所言“今历日”也就是他所生活的东汉时代行用的“历日”，殆无疑义。

如果说郑玄所称“今历日”还较为抽象的话，那么，王充在《论衡·是应》篇中所讨论且称作“历日”者，应当指实实在在的实用历本。今将王充这段议论抄录如下：

儒者又言：“古者蓂莢夹阶而生，月朔，日一莢生，至十五日而十五莢；于十六日，日一莢落，至月晦莢尽。来月朔，一莢复生。王者南面视莢生落，则知日数多少，不须烦扰案日历以知之也。”夫天既能生莢以为日数，何不使莢有日名，王者视莢之字则知今日名乎？徒知日数，不知日名，犹复案历然后知之，是则王者视日则更烦扰不省，蓂莢之生，安能为福？……蓂莢生于阶下，王者欲视其莢，不能从户牖之间见也，须临堂察之，乃知莢数。夫起视堂下之莢，孰与悬历日于宸坐，傍顾辄见之也？……古有史官典历主日，王者何事而自数莢？……⑨

“蓂莢”又称“蓂草”，是古人理想化的一种瑞草，认为它可以自动生落，于是用于计日，相当于历本。王充不同意这种理想化的设计，故加以辩难。他的这段文字，共有三处直接同历日相关：一云“日历”，二云“历日”，三云“典历主日”。“日历”与“历日”二者或有一误？我手中共有四种版本的《论衡》，情况如下：《诸子集成》本《论衡》、1974年上海人

民出版社版《论衡》、1979年中华书局版《论衡注释》，都将原来的“日历”和“历日”各自保留，不加校改；而商务印书馆版黄晖《论衡校释》，则将“历日”改作“日历”^⑩。也许“日历”和“历日”本可并存，不必校改。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可看出，王充当年就将这种实用历本称作“历日”这样一个基本事实。

第二，东汉之后，三国人也称实用历本为“历日”。吴人杨泉曾撰《物理论》，其书虽残，但仍有一些佚文见之于后世典籍著录。唐人欧阳询所纂类书《艺文类聚》卷五《岁时下·历》载：“杨泉《物理论》曰：……‘昔神农始治农功，正节气，审寒温，以为早晚之期。故立历日。’”^⑪是其证。

第三，南朝文献中亦记此类文字为“历日”。《梁书·傅昭传》载：“[傅]昭六岁而孤，哀毁如成人者，宗党咸异之。十一，随外祖于朱雀航卖历日。”另一梁人庾肩吾曾撰有《谢历日启》，内云：“凌渠所奏，弦望既符；邓平之言，锱铢皆合……初开卷始，暂谓春留，未览篇终，便伤冬及”^⑫云云。立春、春分等节气必在“历日”的开头，故云“初开卷始”；立冬、冬至等节气，必写于“历日”的后部，接近结尾，故云“未览篇终”。因此，庾肩吾这里所说的“历日”只能是实用历本，舍此别无他求。

以上表明，我们可从历史文献中看到这些实用历本的原名就是“历日”。

第四，北朝人也是这样称呼的。敦煌石室出有《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十二年(451)历日》^⑬，是石室所出年代最早的历本。二历本除记明年代外，十一年只书一“历”字，十二年则书作“历日”，我曾据后者将前者补足为“历日”^⑭。这份历本虽以纸张为书写材质，但内容是每月一条，形制相当于汉简历本中的“简便年历”，可比照者有永光五年、永始四年等历本^⑮。它可以用作旁证，证明秦汉时代的实用历本原名应作“历日”。

第五,经整理,敦煌文献中可以确定出准确年代的历日也有近40份,其中8份原有题名,如《宋雍熙三年丙戌岁(986)具注历日一卷并序》^⑩等。在这近40份历日中,除前引北魏太平真君时代的那两份原称“历”及“历日”,与唐中和二年(882)《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日]》外,其余全是“具注历日”。我认为,唐宋时代的“具注历日”是由秦汉时代的“历日”演化发展而来的。这里需要考察一下出土《日书》的使用和中古时代书写材质的变化。上世纪以来,各地共出土了战国秦汉时代的《日书》10数种,今知其内容主要是供选择(即择日、择吉)使用的。在具体使用时,秦汉时代以至更早,《日书》应是配合历日对照着使用的。我推测,那时官府每年要颁历日,告知月朔置闰,供社会各阶层人民生产和生活运用;但《日书》所载多是选择项目,必须对照历日才能实现择吉的目的。也就是说,《日书》虽与历日配合使用,但是其保存形式却是分开的:历日每年重新颁布,《日书》却相对稳定,变化不大,不需要经常修改。它们之所以要分别存在,同当时的书写材质是简牍密切相关。众所周知,简牍上能够书写的文字数量是有限的,不可能将那么多的选择内容都抄到历日的每天之下。我们从秦汉时代的历本上看到,直接抄上去的选择项目仅有“反支”、“八魁”、“血忌”等有限的几个,说明当时人们不是不想将更多的选择内容抄上去,只是条件尚不允许。而到了纸张能够批量生产,且成为基本书写材质的时代,文字容量大为扩大,将众多的选择事项分抄于每日之下,并说明该日的“宜”与“不宜”(亦即“忌”),一览便知,使用起来更为便捷^⑪。这里要注意“具注历日”中“具注”二字的含义。“注”字当指“历注”,即年神、月神、日忌之类的历注和选择项目^⑫;而“具”字,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作“共置”,即放在一起的意思。也即是说,原先“历日”与《日书》分别存在,现在可以将“历日”与选择项目合写在一起了,故而其名称也由早期的“历日”演化为“具注历日”。

如果上述分析尚且合乎逻辑的话,则唐宋时代“具注历日”的名称也应成为我们考察秦汉时代实用历本原始名称的一把钥匙。反过来说,如果秦汉时代实用历本原名是“历谱”,那么,其演变的直接结果应是“具注历谱”,而不应是“具注历日”。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概而言之,我认为以上理由能够支持将出土的这几十份秦汉实用历本定名为“历日”。

这里附带讨论一下山东临沂银雀山二号汉墓出土的那份所谓“元光元年历谱”的定名问题。这份历本是现存几十份秦汉实用历本中惟一有原始题名者,所以弥足重要。其原名为“七年□日”,第三个字因尚未确释,今用“□”代替。“七年”即汉武帝建元七年(前134年),同年改年号为“元光”,亦即元光元年。但我们知道,历日都是在头一年年底编定,而供新的一年使用的。因此,此历编写的时间当在建元六年,其时改元“元光”尚未发生,“七年”是按照已有的“建元六年”预设的。整理者将此历日名称改为“元光元年”恐为欠妥。我觉得,似应遵从其原始题名,且加注释,写作“建元七年(元光元年)□日”方妥。

就本文要讨论的问题来说,更关键的是我们用“□”代替的那个字。如果这个字清晰无误,那么一切问题早已迎刃而解,不在话下。然而,从图版上看,“日”字清晰无误,而此字却欠清晰,故有学者释作“𠂔(历)”或“𠂔(历)”^⑩,也有学者认为是“视”字^⑪。“历日”是一个名词语词,已如前述。“视日”二字也能搭配使用:一见前引王充《论衡·是应》篇“是则王者视日则更烦扰不省”;另见《史记·陈涉世家》所载:“周文,陈之贤人也,尝为项燕军视日……”裴骃集解曰:“如淳曰:‘视日时吉凶举动之占也……’”亦即周文为项燕看日时之吉凶以定是否举兵。这两处“视日”之“视”,都是“看”的意思,与前引王充文章中“视荚生落”、“欲视其荚”、“视堂下之荚”的用法无别,指一个看的动作。可以说,“视”、“日”二字是动宾关系,而非名词。然而,银雀山二号汉墓所出“七年□

日”之“□日”，理应是一个名词，亦即“七年”的“□日”。显然，若释作“视日”，在这里恐扞格难通。退一步讲，即便从纯文字学的角度将此字隶定为“视”或别的字，亦应据历学校改为“历”。

以上这些认识是逐步形成的。以往我也未对“历日”与“历谱”严加区分，时常混用，并不比别人高明。现在将一些新认识提出来，旨在推进对这个问题的再思考。我真诚地欢迎学者们的不同意见乃至批评，以便获得真知灼见。

附记：“历谱”不能用来指称出土秦汉实用历本，最早是由法国巴黎高等研究实验学院马克·卡林诺斯基(Mac Kalinowski)教授提出的。2000年9、10月间，马克·刘乐贤和我在巴黎进行合作项目时曾加议论，回国后我一直难于释怀，不断思考这个问题。我也曾同华澜博士(法国远东学院)、刘乐贤博士、吴九龙研究员交换过意见，文中还吸收了他们的一些看法和提供的资料。谨向上述四位学人致以诚挚的谢忱。

(原载《文物》2003年第4期，第44—47、51页)

注释：

- ① 抄本收入《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天文卷》，第1册，河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刻本书影见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615页。
- ② 见《关沮秦汉墓简牍》，中华书局，2001年。
- ③ 《流沙坠简》，中华书局，1993年，第83—87页。
- ④ 今见《陈久金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33—155页。
- ⑤ 《文物》1999年第6期，第63—69页。
- ⑥ 见《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年，第21—22页。
- ⑦ 《关沮秦汉墓简牍》，第231—244页。
- ⑧ 《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1—4页(图版)、

第 127—131 页(释文)。

⑨《论衡注释》，中华书局，1979 年，第 998—1000 页。

⑩见《论衡校释》，第 755—756 页。

⑪见中华书局标点本《艺文类聚》，第 97 页。

⑫同上书，第 98 页。

⑬原件今藏甘肃省敦煌研究院，编号为“敦研 0368V”。

⑭见拙编著《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 年，第 101—110 页。

⑮参见陈久金《敦煌、居延汉简中的历谱》，载《中国古代天文文物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 年，第 111—136 页。

⑯编号 P. 3403，今藏法国国家图书馆东方珍本部。

⑰前述北魏太平真君历日虽写在纸上，但形式仍同于汉简的“简便年历”，可以看作是一种过渡形态。同样，吐鲁番所出《高昌延寿七年(630)历日》，也是写在纸上的，但形制类同表格，相当于汉简中的“编册式横读”历日，亦属过渡形态(参拙作《吐鲁番新出〈高昌延寿七年(630)历日〉考》，载《文物》1996 年第 2 期)。真正属于“具注历日”的，目前所见，最早者是出自吐鲁番古墓的《唐显庆三年(658)具注历日》(参拙作《跋吐鲁番文书中的两件唐历》，载《文物》1986 年第 12 期)。

⑱《大唐六典》卷十四太常寺太卜署：“凡历注之用六：一曰大会，二曰小会，三曰杂会，四曰岁会，五曰建除，六曰人神。”

⑲陈久金、陈美东《临沂出土汉初古历初探》，载《文物》1974 年第 3 期，第 59—68 页；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释文》，文物出版社，1985 年，第 233 页。

⑳此属我道听途说，尚未见到正式文字发表。

天水放马滩秦简《月建》应名《建除》

《文物》1989年第2期发表了何双全同志《天水放马滩秦简综述》一文，概述了甘肃天水放马滩1号秦墓出土竹简的主要内容。据文章叙述，此墓出土《日书》有甲、乙两种，内容大部分相同。文章介绍了甲种《日书》的主要内容，并将其分作8章，给第1章定名《月建》。《文物》同期图版伍还刊载了此章12枚竹简的全部照片（甲1—甲12）。《综述》将此12枚竹简作为一章定名为《月建》，似有未谙，特提出商榷。

《综述》首先介绍了12枚简中的月序、建除十二客及十二地支的各自起讫顺序，并逐录了甲1简的释文和甲2简的部分释文，然后分析说：“三统历中，夏正建寅，农历正月为岁首；商正建丑，农历十二月为岁首；周正建子，农历十一月为岁首。据此，1至12简的内容当为夏正的《月建》。”这正是《综述》定名《月建》的依据。为便于讨论，兹将甲1简的原释文抄录于下：

正月建寅、除卯、盈辰、平巳、定午、执未、彼申、危酉、成戌、收亥、开子、闭丑。

我们首先讨论上简释文的断句。将“正月建寅”断为一句，并理解为夏正“正月建寅”，显然认为此“寅”字是正月的纪月地支。那么，其后的文字与“正月建寅”一句是何关系？这是无法说明的。通观该简内

容,所表达的是正月里建除十二客与各纪日地支间的对应关系,而不是其它。因此,应断句如下:

正月:建寅、除卯、盈辰、平巳、定午、执未、彼申、危酉、成戌、收亥、开子、闭丑。

简文含义是,正月里“建”字与“寅”日对应,“除”字与“卯”日对应,等等。这样,该简的内容便十分完整,贯为一气了。其余 11 枚简亦当作如是读。

其次,“正月”“建寅”之“寅”字,“二月”“建卯”之“卯”字等等,在这些简中均代表纪日地支,而非用于纪月,说已详上,可不赘述。

再次,也是更重要的,简中的“正月”、“二月”至“十二月”等月序,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历法中的月序,而是星命家的“月份”。星命家的“月份”以二十四节气中的十二个节气(非中气)作为各月的开始,如正月是从“立春正月节”那天开始,二月是从“惊蛰二月节”那天开始。古代建除家在历日中安排建除十二客,正是按照星命家的“月份”而不是按照历法月份进行的。不论“立春正月节”是在上年十二月的某日,还是在当年正月的某日,凡遇“立春正月节后”的第一个“寅”日,便开始注“建”字,由此循环下排。以后至各月第一日(即节气所在之日),则需重复其前一日的建除十二客一次,然后再接续下排。由于十二纪日地支同建除十二客均以十二为周期,又使用了上述节气所在之日重复前日一次的办法,就导致了各月建除十二客与上月纪日地支相差一日,故正月“建”与“寅”日对应,“除”与“卯”日对应,二月“建”与“卯”日对应,“除”与“辰”日对应,如此等等。

对于以上建除十二客的排列规律,陈遵妫先生在《中国天文学史》第 3 册第 1647 页注⑤曾作过解释:“建除十二神……它的循环排列是

每逢一个月的开始就重复一次,这里所谓一个月的开始是指星命家的月,即以节气起算。例如某年一月六日为‘闭’,七日小寒(笔者按:即十二月的节气),则七日仍为‘闭’。”^①陈先生又指出:“正月节后最初的寅日的十二直为建,翌日即卯日为除,再翌日即辰日为满,余类推。”^②陈先生的这些意见,我在整理数十件敦煌历日文献时反复对照,证明完全正确。现在再用这个结论去检验前述放马滩 12 枚秦简的内容,也相合不悖。笔者曾撰有《敦煌古历丛识》一文^③,对建除十二客的特点及其安排规律,以及星命家的“月份”,亦有论列,均可参阅。

《综述》最初在概括这 12 枚简的内容时曾说,它们是“记述正月至十二月每月建除十二辰相配十二地支的对应循环关系”。应该说这已开始接近其内容实质。但在其后的阐述中却偏离了这个正确轨道,以至最终归结为是“夏正的《月建》”,并以此定名,这未免令人惋惜。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放马滩所出这 12 枚简的内容,是星命家的各月份中,建除十二客同各纪日地支间的对应关系,而不是其它,故应定名为《建除》,与《日书》第二章所题《建除》属于一类。《综述》所区分的第一章和第二章,其内容差别仅仅在于,所谓“第一章”是讲建除十二客与纪日地支的对应关系,“第二章”则讲各个建除十二客所主吉凶宜忌,本质上同属《建除》一类,不宜各自分章。

在明确前述 12 枚简的内容及其内在联系的基础上,我们可绘表如下:

纪 日 地 支 星 命 月 份	建 除 十 二 客	建	除	盈	平	定	执	彼 (破)	危	成	收	开	闭
	星命月份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正 月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二 月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三 月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续表)

纪 日 星命月份	建 除 十二客	建	除	盈	平	定	执	彼 (破)	危	成	收	开	闭
	地 支												
四 月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五 月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六 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七 月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八 月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九 月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十 月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十一月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十二月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上表读法是：“正月：建寅、除卯、盈辰、平巳、定午、执未、彼申、危酉、成戌、收亥、开子、闭丑。”“二月：建卯、除辰、盈巳……”其余各月读法同此。它不是对原简的逐字、逐句释文，而是采用表格形式对其内容进行解释。表虽简略，却囊括了 12 枚竹简相关部分的全部内容，也便于表现它们的内容实质和内在联系。

尚需说明的是，简中建除十二客的“彼”字，在汉简和敦煌吐鲁番同类文献中均作“破”。《综述》在介绍《四时音》时，对乙 209 简曾有如下释文：“春子夏卯秋午冬酉是，是人彼（破）日，不可筑室、为畜夫。娶妻嫁女，凶。”如果此简中“彼”字当作“破”释读不误，那么循此例，甲 1—12 简中的“彼”字亦当作“破”。简中建除十二客的“盈”字，在后世文献中多作“满”。满、盈同义，可以互训。之所以改盈为满，或许是西汉初年因避惠帝刘盈名讳而改^④，此后便成为定式。

附带指出，《综述》一文在《秦用寅正问题》一节中也存在问题。《综述》云：“秦使用的是以夏正十月为岁首的颛顼历，但这是秦统一后颁布

实施的历法。那么秦统一前使用的是什么历呢？甲、乙种《日书》中的《月建》章整理时按原出土次序排列，得出了以正月、二月、三月至十二月为次的建正表。始正月建寅，止十二月建丑。未发现以十月为岁首的任何文字。由此可见，当时秦使用的是以正月建寅为岁首的夏历。”《综述》这个看法，是从对甲 1—12 简的释读引申出来的。我已指出这 12 枚竹简应该如何断句，以及它们的内容实质和内在联系。显然，由于释读和理解不当，由此引申出战国时秦用“以正月建寅为岁首的夏历”的看法也是难于成立的。从这 12 枚简中，我们只知道战国时代星命学家在安排建除十二客同各月纪日地支间的对应关系时，在星命家的“月份”中“正月”是从“寅”日开始排列的，以及其后各星命月份中两者间的对应关系，尚难得出战国时秦用夏历以正月为岁首的结论。至于战国时代秦用何种历法，以何月为岁首，目前由于文献记载和出土资料的不足，学术界异说纷呈，还处在继续探索的阶段，无法从放马滩这 12 枚竹简得出最后结论。

（原载《文物》1990 年第 9 期，第 83—84 页）

[附记]

这篇小文发表后，关于这 12 枚竹简应定性为《建除》而非《月建》，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并被接受。但是，关于建除十二客的“叠日”方法的看法却存在问题。本文认为自古迄今都用“星命月”进行安排并重复各“星命月”的第一日。金良年先生曾发表《建除研究——以云梦秦简〈日书〉为中心》（载《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第六集，第 261—281 页，科学出版社，1994 年）提出批评，认为秦和西汉建除安排，是每月朔日重叠上月晦日一次，用“星命月”叠日是东汉以后才有的。金先生的看法是正确的见解，本文存在以偏概全的失误，当予改正，并向读者致歉。

注释：

① 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② 同注①，第1666页。

③ 载《敦煌学辑刊》1989年第1期。

④ 汉惠帝名刘盈，因避讳改“盈”为“满”。见陈垣《史讳举例》，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130页。

尹湾汉墓出土历谱补说

1993年2月江苏省连云港市尹湾汉墓出土的简牍文献,早已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经过考古与文物工作者的辛勤努力,1997年岁末,中华书局终于将《尹湾汉墓简牍》一书出版,实是学术研究的幸事。

笔者由于长期致力于出土历日研究,故对M6出土汉代历谱怀有特别的兴趣。历谱共两件,编号分别为木牍10正面^①和木牍11。两件历谱的年代,被整理者定在汉成帝元延元年(前12)和元延三年(前10)五月,是完全正确的。就定年工作来说,此两件历谱并不十分困难。因为M6所出简牍已有“永始”和“元延”年号出现,可知为汉成帝晚期之物。借助一些年表如陈垣先生的《二十史朔闰表》之类工具书,便可将历谱年月确定下来。

值得注意的是,此两件历谱,尤其是元延元年历谱的形制有其独到之处。诚如原编者所说:“先将该年十三个月名(包含‘闰月’,即闰正月)分列两端,注明月的大小及朔日干支;然后将其余干支分书于两旁,并将四立、二至、二分、三伏、腊等各为某月某日注于相应干支之下。由于排列方法巧妙,六十干支正好按顺序围成一个长方形。此历谱把一年的历日浓缩在一块木牍的一面之上,颇具巧思。”的确如此。此年共十三个月,384天,仅用一个甲子周期便将如此丰富的内容表达了出来,映照出编历者(或是抄写者)的聪明才智,为两千年后的今人所叹服。

历谱的具体内容,有些易于理解,有些不太好理解。今略加补说,裨便对原历内容加深认识。不妥之处,仍祈方家指正。

关于元延元年历谱:

(一) 两个“立春”

我们注意到,原历历注有两个“立春”:在历谱右侧干支“壬子”下注有“正月十四日立春”,干支“丁巳”下又注有“十二月廿四日立春”。这是为什么呢?正确的理解应该是,前者为元延元年之立春日,后者为元延二年(前11)之立春日。由于节气是根据阳历(回归年,365.2422日)系统来划分的,而月份则为朔望月(29.53日);两个节气所含平气长度为:

$$(365.2422 \text{ 日} \div 24) \times 2 = 15.218425 \text{ 日} \times 2 = 30.43685 \text{ 日}。$$

长于朔望月的长度。因此,尽管理论上各月都有自己的节气(非中气),如“立春正月节”、“惊蛰二月节”、“清明三月节”等等,但实际上,节气(非中气)的具体日期总在上个月的后半月与本月前半月之间游动,而不能固定在某一日。本历谱立春在正月十四日,下月便为无中气之月,即没有正月的中气“惊蛰”,只有二月节气“雨水”②,“朔不得中,是谓闰月”,故该历闰正月。又由于此年闰了正月,故自二月起,节气又提前注在上月之下半月,这就是历谱中“立夏”(理论上为四月节)注在“三月十九(“九”当作“六”,说详下)日,立秋(七月节)注在六月廿日,立冬(十月节)注在九月廿二日的原因。顺此而下,下年(元延二年)的立春(正月节)也提前注到元延元年的十二月廿四日了。本历谱中所以出现两个“立春”,根本原因即在于此。

(二) 立夏日期与释文校正

历谱左侧干支“癸未”下注“三月十九日立夏”。按,“三月十九日”当是“三月十六日”之误。正月为大月,十四日立春,余16日;闰正月小,29日;二月大,30日,“三月十九日立夏”,立春至立夏共得94日。

在实行平气的情况下,立春至立夏的时间应为:

$$15. 218425 \text{ 日} \times 6 = 91.31055 \text{ 日}。$$

此为回归年长度的 $1/4$, 断不为 94 日, 可知“十九日”为“十六日”之误。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历法专家张培瑜教授的大著《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立夏在三月十六日癸未^③, 甚是。再者, 就历谱本身来说, 元延元年三月戊辰朔, 十六日上为癸未, 现于“癸未”下出现“三月十九日”, 已是两不相谐矣。细检原书图版“YM6D10 正”(页 21), 此“三月十六日”之“六”字不十分清晰, 易误释为“九”, 当用历法知识予以校正。

(三) 后伏日期

历谱右侧干支“庚申”下注“六月廿五日后伏”。此历五月丁卯朔, 三日夏至为己巳, 四日庚午, 十四日庚辰, 廿四日庚寅, 故历谱左侧干支“庚寅”下有“五月廿四日初伏”之历注。五月为小月, 六月五日庚子为夏至后第四庚日, 故历谱右侧“庚子”下有“六月五日中伏”之历注。历谱六月廿日乙卯立秋, 其后第一庚日为庚申, 故历谱右侧“庚申”下注“六月廿五日后伏”。简言之, 此历谱三伏之历注与后世全同。但我们注意到, 汉成帝元延元年之前一年, 即永始四年(前 13)的历谱已有出土^④。此历出自中国西北敦煌、居延一带, 初伏、中伏的安排与元延元年历谱相同。但“后伏”却在立秋后第三庚日(七月九日庚戌立秋, 十九日为庚申, 廿九日庚午为后伏)。此历仅在元延元年的前一年, 但后伏安排却两不相同。对此, 张培瑜教授解释说: “唐以前三伏并无统一规定, 随各历家不同。而唐以后情况则全按《阴阳书》之规定。”^⑤ 可供参考。

(四) 分至八节日期

用前引张培瑜教授《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与此历谱对照, 分至八节(四立、二分、二至)日期同, 即: 正月十四日壬子立春, 三月十六日(历

谱释文误作“十九日”，详前）癸未立夏，六月廿日乙卯立秋，九月廿二日丙戌立冬；二月一日（朔）戊戌春分，八月六日庚子秋分，五月三日己巳夏至，十一月九日壬申冬至；次年立春在本年十二月廿四日丁巳。出土历谱证明《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对此年历谱的推算完全准确。

以下补说元延三年五月历谱：

（一）“乙亥十日”当作“乙亥廿日”

我们注意到，此五月历谱由“丙辰一日”到“[甲申九日]”共 29 天，干支是连续的；但在用数字纪日时，则成为“一日”至“十日”、又一个“一日”至“十日”，再“一日”至“九日”共三句。由于干支连续，所以在对日序的理解上不至于发生错误。但就纪日方法而言，第二个“一日”至“十日”当作“十一日”至“廿日”方妥。同墓所出有元延二年记事日记，以单月（正、三、五、七、九、十一月）和双月（二、四、六、八、十、十二月）各为一组简编制而成，其二十日写作“第廿”（原书第 140、143 页）；元延元年历谱中也有“五月廿四日初伏”、“六月廿五日后伏”、“九月廿二日立冬”、“十二月廿四日立春”的历注，均可成为此一“十日”当为“廿日”的佐证。历谱中“乙亥”日为第二十日，故所书“乙亥十日”宜校正为“乙亥廿日”。

（二）从辰项目

历谱最上一栏由右至左书写“五月小”、“建日午”等 9 个项目。除最末一项仅残存一“子”字外，其余均较清楚。这 9 项中，除“五月小”表明本月是小月 29 天，其余 8 项应是来自《日书》类书籍的从辰（又名“选择”）项目。从出土的简牍《日书》和历谱看，两汉之际，《日书》内容绝大部分仍未直接编入历谱（编入的仅反支、八魁、血忌几项），而是以单独存在为主。诚然，它的使用仍离不开历谱，两者需配合使用。此五月历谱先将 8 个从辰项目抄在历谱上部，配合下面的历谱使用，为迄今所仅见。

（三）“建日午”

此项属于建除十二客（又名“建除十二直”、“建除十二辰”）的内容。

历谱仅说“建日午”，即此月地支为“午”的日子需注“建”字，顺次便是除、满、平、定、执、破、危、成、收、开、闭十一个字，但不一定写出来。这十二个字各主一定吉凶，供选择使用。此时的“建除”安排规则，看来与东汉以后的历谱不同：它是依据历法月份（即一日至廿九日或卅日），而不据“星命月”[即一个节气（非中气）至下一节气（非中气）之前一日]，每月朔日再叠值上月晦日一次^⑥，西汉地节元年（前69）历谱^⑦、元康三年（前63）历谱^⑧均是如此用建除注历；而至东汉永元六年（94）历谱，则使用“星命月”叠日，即使用在交节之日叠两值日的方法了^⑨。故此，我意此五月历谱所注建除，仍用历法月，尚未用“星命月”。若理解不误，则三日戊午、十五日庚午、二十七日壬午均当注“建”。

（四）“反支未”

“反支”是现知最早用于历注的丛辰项目，见于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历谱^⑩。《后汉书·王符传》：“明帝时，公车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唐·章怀注引《阴阳书》曰：“凡反支日，用月朔为正：戊、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此五月历谱朔日丙辰，“己未四日”，故“反支未”，与文献所记正合。但文献所记其义未尽。事实上，以上所论仅是注各月第一个反支日的日期，此下在每个历法月份之内，凡间隔六日便注一反支，元光元年历谱可为佐证^⑪。具体到本五月历谱，“己未四日”为第一个反支日，以下十日乙丑、十六日辛未、二十二日丁丑、二十八日癸未均是“反支”日。

（五）“解衍丑”

“衍”字与“魘”字同音，故借作“衍”，即“解魘”在“丑”日也。“魘”为后起字，古字为“厭”，因此古书多写作“解厭”。汉代好“厌胜”、“厌魅”之术，用迷信方法祈祷鬼神或诅咒，陷人于祸，对付的方法便是“解厌”，行之予以禳除。据此五月历谱，知其时五月于“丑”日行解禳之术。

(六) “复丁、癸”

其义为：五月的“复日”，注在天干为丁和癸的日子。历中二日、八日、十二日、十八日、二十二日、二十八日，因纪日干支或为丁，或为癸，故皆是复日。此丛辰项目在后世历日中亦多使用。笔者在整理敦煌吐鲁番出土历日时，经反复排比，其安排规则为：正月在甲、庚日，二月在乙、辛日，三月在戊、己日，四月在丙、壬日，五月在丁、癸日，六月在戊、己日，七至十二月将前面一至六月的安排重复一遍即可^⑫。它与本五月历谱复日安排亦相吻合。

(七) “𠂔日乙”

意谓纪日天干为“乙”的日子属“𠂔日”。“𠂔日”用于历注，目前在汉简历谱中以此为首见，敦煌吐鲁番出土历日已不使用。可喜的是，我们在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中找到了“𠂔日”的立意与安排规则。《日书》云：

四月甲𠂔，五月乙𠂔，七月丙𠂔，八月丁𠂔，九月己𠂔，十月庚𠂔，十一月辛𠂔，十二月己𠂔，正月壬𠂔，二月癸𠂔，三月戊𠂔，六月戊𠂔。……凡𠂔日，可以取（娶）妇、家（嫁）女，不可以行，百事凶……^⑬

可知，“𠂔日”也是供选择使用的。“五月乙𠂔”与历谱五月“𠂔日乙”正相一致。

(八) “月省未”

“月省”这个丛辰项目为迄今所仅见，仅知五月注在“未”日。其原始立意和总体安排规律尚未明了，俟考。

(九) “月煞丑”

意谓历谱中“丑”日注“月煞”，即注在十日乙丑和二十二日丁丑。敦煌历日中此项排列结果是：正月丑，二月戌，三月未，四月辰，五至八月、九至十二月各再重复前四个月的安排一遍^⑭。它与本五月历谱月煞安排亦相一致。

(一〇)“□□子”

这是一个五月安排于“子”日的丛辰项目，惜已残失。从敦煌历日得知，五月注于子日的丛辰项目有月破、月虚和天李。此五月历谱中究竟该注哪一项，尚难遽定。

以上就笔者学识所及，对尹湾汉墓所出两件历谱做了一些疏证与补说，尚未敢完全自信，欢迎读者参与讨论并赐正。

这里尚需特别说明的是，历谱中这些丛辰项目的安排，与后世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即：此时历谱是据历法月份安排丛辰的；而东汉以后却是据“星命月”进行的。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北魏至宋初历日，现代东亚地区的民用通书中，丛辰均据“星命月”去划定月份。这一点，我们在读古历时应予以注意，不可将历法月份同“星命月”相混淆。否则，极易产生混乱，也找不出丛辰项目的准确安排规则。

(原载《简帛研究二〇〇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年，第451—455页)

注释：

- ① 原书“前言”在解说该历谱时，将“木牒一〇”的反面亦注作历谱（第3页），恐不确。细观此件释文（第127页），其内容为借贷契约，似当单独作一项内容来处理。
- ② 此时历谱中“惊蛰”为正月中气，“雨水”为二月节气，与后世不同。
- ③ 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7月，第93页右下。
- ④ 图版见《中国古代天文文物图集》，第37页图②，原说明文字为“永光五年历谱”，误，实为“永始四年历谱”。文物出版社，1980年出版。释文见《中国古代天文文物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118页之⑨。
- ⑤ 见张培瑜等《历注简论》，《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84年第1期，第101—108页。
- ⑥ 参见殷光明《从敦煌汉简历谱看太初历的科学性和进步性》，《敦煌学辑刊》，1995年第2期（总第二十八期），第94—105页。
- ⑦ 图版见同上刊封三，释文见同上刊，第105页。

- ⑧ 图版同注④《图集》，第 36 页图一，释文同注④《论集》，第 112 页。
- ⑨ 参前引注⑥殷光明文；又，张培瑜《出土汉简帛书上的历注》，载《出土文献研究续集》，文物出版社，1989 年，第 135—147 页。我在《天水放马滩秦简〈月建〉应名〈建除〉》（载《文物》1990 年第 9 期）一文中曾认为，战国秦时“建除”也是依“星命月”而非历法月去叠日的，看来并不准确。就现有资料看，“建除”之叠日法曾有变化：西汉以前大约是本月朔日叠值上月晦日，东汉后才是节气日叠值其前一日了。随着出土资料的增多，我们的认识将更加丰富，我的这个错误的认识也应予以纠正。
- ⑩ 参见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释文》，文物出版社，1985 年，插页“《元光元年历谱》（复原表）”。
- ⑪ 同注⑩。
- ⑫ 参见拙编著《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 年。
- ⑬ 《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 年，第 202 页。
- ⑭ 同注⑫。

居延新简《东汉永元二年(90)历日》考

——为纪念王重民先生百年诞辰而作

今年是著名敦煌学家王重民先生百年诞辰。王重民先生为敦煌学事业做出过重大贡献,也是我国早期在这一国际显学领域拓荒的有数几位学者之一,受到人们普遍的尊重。王先生的《敦煌本历日之研究》,更是我研究敦煌历日时的重要案头书之一。先哲已矣,大作独留;后学吸乳,高山仰止。今将笔者新近考证《东汉永元二年历日》的小文献上,以纪念王先生百年诞辰,表达永远的怀念。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额济纳旗破城子汉代遗址进行了好几次科学发掘,收获颇丰。这些以简牍为主体的汉代文献资料已陆续刊出,成为学者们研究古代文史极可宝贵的资料。目前较易见到的是《居延新简》^①和《居延新简·甲渠候官》^②二书,本文将要考证的这件东汉永元二年实行历日也刊载在上述二书之中^③。

原件编号为“E. P. T65—425A—425B”。从图版上看,墨迹十分模糊,从而给释文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已经公布的二份释文错误较多,下面我们将予以讨论并加匡正,进而将其绝对年代考出。

(一) 先讨论原件正面(425A)的释文。现抄录原释文如下:

四月

一日辛丑建金□^④

二日壬寅除复□

□□三日癸卯满□□^⑤

此件为一木牍，正面(A面)共残存4行文字，但3、4两行十分模糊。在未见到图版前，我曾怀疑“四月”二字释文有误。因为释文是“一日辛丑建金”，地支“丑”日与建除十二直之“建”对应，应发生于十二月^⑥，而不是四月。但当我去看图版时，发现“四月”二字是大字，而且清晰无误，那么就必须重新审视其下三行的释文了。因为“四月”二字正确无误，而四月“建”字只与“巳”日对应^⑦，因此，就不得不考虑“丑”字是否属于误读？仔细审查，发现一日干支为辛巳，而非“辛丑”。这样，它自身就与该段历日为“四月”一致而不矛盾了。由于一日干支为辛巳，故二日当为壬午，三日当为癸未。原释文这三天的纪日干支全部有误，当予改正。

简而言之，该木牍A面为某年四月一至三日的历日，四月朔日为辛巳。

(二) 讨论原件背面(B面)的释文。抄录原释文如下：

九日□□

十日己丑破四□□□卅日□

十一日庚寅危仲伏

十二日辛卯成天李

十三日壬辰收八块

十四日癸巳开厌□

十五日甲午闭亡

十六日乙未建反支

十七日丙申除

十八日丁酉满血忌往亡

(该简下部尚有其他杂书文字,此处不录)

我们首先要讨论一下这段残历日的月份。前已述及,古历中的纪日地支与建除十二直的十二个字(建、除、满、平、定、执、破、危、成、收、开、闭)间有固定的对应关系。因正月建“寅”,故正月“建”注于“寅”日;二月“建”在“卯”日,三月“建”在“辰”日,四月“建”在“巳”日,五月“建”在“午”日,六月“建”在“未”日……^⑧

而此段历日的十六日是“十六日乙未建反支”,即“建”字与“未”日对应,故它当属于六月^⑨。我们还注意到,十一日有“仲伏”(即中伏)的注记,其日当为“夏至五月中”之后的第某个“庚”日,也可为我们判断此段历日属于六月提供佐证。

由残历十日干支为己丑,可推得此历六月朔日为庚辰。

下面再就该段历日中的几个释文和历注问题加以讨论:

a. 第二行(十日)末尾的“卅日□”。细审图版,“卅”字似可确认,但“日”字却难以确认。强行释为“卅日”,未免牵强。第一,从此段历日的抄写顺序来看,它是各日连续抄写的。“卅日”怎么会突然写在“十日”后面呢?不伦不类;第二,将此处释为“卅日”已误导学者将该六月当作大月,并推出了七月的所谓朔日,从而导致对历日年代的误断^⑩,所以这是不可取的,建议将“日”字删除或用□代替。

b. 十三日的“八块”二字。“块”字释文不误,读如“魁”,作“八魁”方是。“块”字通“魁”。《文选·司马长卿〈长门赋〉》:“正殿块以造天兮,郁并起而穹崇。”吕向注:“块,大也。”清·钱学纶《语新》卷下:“培原初当营卒,躯干块伟,善饭多力。”是其比。《后汉书》卷三十上《苏竟杨厚列传》:“夫仲夏甲申为八魁。八魁,上帝开塞之将也,主退恶攘逆。”唐·李贤注引《历法》云:“春三月己巳、丁丑,夏三月甲申、壬辰,秋三月己亥、丁未,冬三月甲寅、壬戌为八魁。”^⑪而此历“八块(魁)”注在六月

的壬辰日,属于夏三月,完全正确。

c. 十五日最末一字“亡”通“望”。“亡”字通“忘”,《诗·小雅·沔水》:“心之忧矣,不可弥忘。”《经义述闻》卷五:“亡,犹已也。作忘者假借字耳。”而“忘”与“望”同音,故得相借,可知此月“望”在十五日。

(三) 以下我们将根据残历自身提供的条件,对其确切年代进行考订。

如前所述,我们已考知残历四月朔日是辛巳,六月朔日为庚辰。在残历可能存在的时限范围内,我们进行了搜索。经与张培瑜教授《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⑩一书的汉代历表对照,在从公元前104年到公元220年的范围内,共有四年是四月辛巳朔,六月庚辰朔。它们是:西汉建昭四年(前35)、西汉建平三年(前4)、东汉永元二年(90)和东汉光和六年(183)。换言之,以上四年是该残历可能具有的实际年份。

那么,其中哪一年是惟一选择呢?

先看历日的“仲伏”。以“三伏”注历远在西汉《建元七年[元光元年(前134)]历日》即已存在^⑪。唐代以后,我国历日概以夏至后的第三个庚日为初伏,第四个庚日为中伏,立秋后的第一个庚日为末伏;但在汉代,三伏所在庚日尚不固定,中伏可以在夏至后的第三个庚日,也可在第四庚日以至第五庚日^⑫。而作为“仲(中)伏”,此段历日对前述四个年份全部通用,因此,无法据此进行筛选。

我们注意到,该历四月一日为“辛巳建”,而“建”与“巳”对应当在“四月”。不过,据下文对“往亡”的考述,这个“四月”只能是“星命月”而非历法月。“星命月”的“四月”,是从进入“立夏四月节”那天开始计算的。而“立夏”在古历中的位置,既可以在四月的前半个月,也可以在三月的后半个月。此历四月一日已是“建”与“巳”日对应,说明它的“立夏”是注在三月下旬的。而历日的节气(非中气)之所以提前注在上月的下半月,又是因为此前不久有过闰月的缘故。这就提示我们,此历不

久前的几个月内曾有过闰月。

以此检查上述四个年份,前 35、前 36 年均无闰月,与此不合,故前 35 年当予排除。公元 182、183 年均无闰月,故公元 183 年亦当排除。前 4 年闰三月;90 年当年无闰月,但 89 年闰过七月,故前 4 年与 90 年在可选范围之内。

真正能使我们将该残历绝对年代加以判定的,是残历六月十八日的历注“往亡”。

“往亡”是古代术士所认为的出行与打仗用兵的大忌日。清代官修《星历考原》卷四引《堪舆经》曰:“往者去也,亡者无也,其日忌拜官、上任、远行、归家、出军征讨、嫁娶、寻医。”^⑤作为一个神煞,它出现得很早,且有自己的安排规则。睡虎地秦简甲种《日书》第 107 背和 108 背简文云:

正月七日,二月十四日、三月廿一日、四月八日、五月十六日、六月廿四日、七月九日、八月十八日、九月廿七日、十月十日、十一月廿日、十二月卅日,是日在行不可归,在室不可以行,是是大凶^⑥。

晏昌贵先生认为其各月计算的起始点在于月朔,从而有:

正月七日

二月 $7 \times 2 = 14$ 日 三月 $7 \times 3 = 21$ 日

四月八日

五月 $8 \times 2 = 16$ 日 六月 $8 \times 3 = 24$ 日

七月九日

八月 $9 \times 2 = 18$ 日 九月 $9 \times 3 = 27$ 日

十月十日

十一月 $10 \times 2 = 20$ 日 十二月 $10 \times 3 = 30$ 日^{①⑦}

依据这套排列规则，六月往亡当注在廿四日，而本残历“往亡”是注在六月“十八日”的，故不适用。

但是，古历除上引之外，也还有另外一套安排往亡的规则，即依据“星命月”而非历法月。星命月之始是每月节气所在日，故清《协纪辨方书》卷六《义例四》引《历例》曰：“气往亡者，立春后七日，惊蛰后十四日，清明后二十一日，立夏后八日，芒种后十六日，小暑后二十四日，立秋后九日，白露后十八日，寒露后二十七日，立冬后十日，小雪后二十日，小寒后三十日，皆自交节日数之。”^{①⑧}

依据“气往亡”的安排规则，“往亡”当注在“小暑六月节”后的第二十四日。现以这一标准，对前面推出的四个年份核定如下^{①⑨}：

前 35 年小暑在六月初五甲申日，距六月十八日仅 14 日，不合，当予排除；

前 4 年小暑在五月十七丙寅日，且五月为大月，距六月十八已 32 日，不合，当予排除；

183 年小暑在六月初三壬午日，距六月十八仅 16 日，不合，当予排除；

90 年小暑在五月廿五日甲戌，且五月为大月，距六月十八正好 24 日，是惟一相合者！

由知可知，此木牍残历的绝对年代为公元 90 年，即东汉和帝刘肇永元二年。至此，残历的绝对年代终被揭出。

在同一探方(E. P. T65)出土的竹简中，不单这一件是永元年代之

物,还出过“永元十三年二月……”^②的纪年简一枚;破城子房屋二二(E. P. F. 22)也出有“□永元十年三月乙未朔十四日□”^②的纪年简一枚。这些同一遗址或相近遗址所出纪年资料,均可作为本残历定年的参考。

由于已知本残历的年代为公元90年,而据张培瑜教授《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一书,本年大暑在六月十日己丑。对比残历,发现该日释文后部有三个□□□,即有字而难以识出。我意末后两个方框当是“大暑”二字。而“大暑”前的“四□”当是“四激”,这也是一个选择神煞。《睡虎地秦简》甲种《日书》第143至144简背云:“入月七日及冬未、春戌、夏丑、秋辰,是胃(谓)四激,不可初穿门、为户牖、伐木、坏垣、起垣、彻屋及杀,大凶;利为啬夫。”残历在六月十日己丑注“四激”,正与《日书》“夏丑”相合。顺便说到,“四激”在唐宋敦煌具注历日中已作“四击”,但排列规则一仍其旧。

就该历日本身来说,它也不是迄今在西北地区出土的惟一一件永元年间的历日。此前曾在敦煌出有永元六年(94)的历日,在居延出过永元十七年(105)的历日^②。因此,本件永元二年历日在破城子的存在并非孤立现象,它为我们研究汉代历法史增添了一份新资料。

从历法史的角度讲,东汉从章帝刘烜元和二年(85)开始行用编欣、李梵所编“后汉四分历”,残历上距元和二年仅六年,知它是“后汉四分历”的早期实用历本。

最后,还要特别指出,我们注意到四月一日历注中有一个“金”字。这在以往出土的秦汉实用历本上尚未见过。我们知道,在出土的唐宋历日实物中,每日日期干支之后便是“六甲纳音”一项,用金、木、水、火、土分别代替商、角、羽、徵、宫等五音。六十甲子各自的纳音有如下关系:“甲子、乙丑金,丙寅、丁卯火,……庚辰、辛巳金……”^③此残历四月一日干支辛巳,纳音正是“金”。若果释文不误,这便是迄今我们在历日

中见到的最早的纳音用例。但目前所见仅此一例,即使释文不误,能否确认,也还有待出土材料的增多。

附记:本文初稿完成于2003年4月上旬。一周后,同研究所李均明先生即向我见示他最新收到的、日本富谷至先生编集的《边疆出土木简的研究》(京都,朋友书店,2003年2月出版),内收吉村昌之先生《出土簡牘資料にはみれる歴譜の集成》一文,所列该残历亦为永元二年(90),堪称殊途同归。不过,也有区别。第一,我未见到吉村先生的定年方法,而我自己则有一套严密的考证程序;第二,吉村的录文采自释文本《居延新简》,原释文的失误一仍其旧。而我已将大部分校正,并补出了一些原未释出的文字。因此,本篇小文自有其学术价值在。这里之所以加以说明,是为避免有掠美之嫌。

(原载《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5年,第284—287页)

注释:

- ①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居延新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
- ②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中华书局,1994年。
- ③ 同注①,第447—448页释文;同注②,上册,第197页释文,下册,第445页图版。
- ④ 此□符号《居延新简》释文无。
- ⑤ 同上。
- ⑥ 各月建除十二直与纪日地支的对应关系,请参笔者《天水放马滩秦简〈月建〉应名〈建除〉》一文,原载《文物》1990年第9期,今收入拙著《敦煌吐鲁番天文历法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90—295页。
- ⑦ 同注⑥。
- ⑧ 同注⑥。

- ⑨ 如果此段历日的日期为下旬,则虽然“建”与“未”对应,历日却属五月,应当小心案断。
- ⑩ 晏昌贵《敦煌具注历日中的“往亡”》,载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十九辑,第226—231页。
- ⑪ 中华书局标点本《后汉书》,第1045页。
- ⑫ 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
- ⑬ 参见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释文》插页之“元光元年历谱(复原表)”,文物出版社,1985年。汉代实用历本当称“历日”而非“历谱”,详参拙作《出土秦汉简牍“历日”正名》,载《文物》2003年第4期,第44—47页。
- ⑭ 参见张培瑜《出土汉简帛书上的历注》,载《出土文献研究续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135—147页。
- ⑮ 参见刘乐贤《简帛数术文献探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98页所引。
- ⑯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223页。
- ⑰ 同注⑩第228页。
- ⑱ 见李零主编《中国方术概观·选择卷》(上),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第248页。
- ⑲ 下引四年的小暑日全据前引张培瑜《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一书。
- ⑳ 释文见《居延新简》,第422页,图版见《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下),第415页。
- ㉑ 释文见《居延新简》,第513页,图版见《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下),第548页。
- ㉒ 参见《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天文卷》第1册,河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29、241页。
- ㉓ 参见笔者编著《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747页,附录十二“六十甲子纳音表”。

敦煌本《六祖坛经》书写形式和符号发微

自从本世纪二十年代日本学者矢吹庆辉先生从敦煌文献中发现了一种《六祖坛经》写本以后,敦煌本《六祖坛经》便成了中外学人刻意寻找并加以整理研究的重要禅宗文献资料。中外学者的整理研究工作经久不衰,成果迭出^①。由于某种机缘,自一九九二年起,我和荣新江先生也跻身这一行列,我们的研究成果将以《敦博本禅籍录校》^②一书问世。

在对四种《六祖坛经》抄本做过系统的整理研究之后,我们感到,尽管中外学人以往的整理取得了不少成就,但仍有很多问题尚未解决,其中对于书写形式和符号的认识即是问题之一。这可能是由于以往参与整理研究工作的多是禅学史研究者,尚未有专职敦煌学者参与其事。而我们二人均是多年从事敦煌学研究工作的,一定程度上或可补前贤之不足。正是从这一视觉出发,兹篇专就敦煌写本《六祖坛经》的书写形式和符号略作讨论。

一 省代符号

敦煌本《六祖坛经》有如下文字:“世人尽传,南宗(案:“宗”衍)能北秀,未知根本事由。且秀禅师于南荆府堂杨悬(当阳县)玉泉寺住持修行,惠能大师于韶州城东三十五里漕(曹)溪山住。法即一宗,人有南

北,因此便立南北。”

上引文字,英藏本 S. 5445 号和敦煌市博物馆藏 077 号大体一致。如果不加细究,似乎也可通读。但从敦煌写本书写特征考虑,却有脱文,即“惠能大师于……曹溪山住”一句的“住”后脱去“持修行”三字。

我们知道,《六祖坛经》是惠能在韶州大梵寺讲法时弟子们的听讲记录,后由弟子法海“集记”而成。这就有如现代人的速记,对于重复出现的字句可以采用省代符号。这类省代敦煌文献中有不少实例。如: S. 4571《维摩诘经讲经文》:“当日世尊欲说法,因更有甚人来也唱~。”据研究,“唱”后的省代符是“将来”二字。《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经文》:“指示恒河沙数了,经中便请唱唱罗。”同卷下文有:“又请欲心合掌手,依前好~。”据研究,所省代的即上文出现过的“唱唱罗”三字^③。类似例子尚多,不备举。

这些说明,敦煌写本中确有将重复出现的字句用“~”加以省代的习惯。由此我们也就有理由认为,前引《坛经》中的相关文字应作:“且秀禅师于南荆府当阳县玉泉寺住持修行,惠能大师于韶州城东三十五里曹溪山住~。”“住”字及其后的省代符号是用来代替“住持修行”的,但在流传中却将省代符号丢失了。我们应根据敦煌写本的书写特征校补为“住持修行”。

二 空 字 省 书

为了节省书写时间,古人除用省代符号代替某些字句之外,另一种方法是用空格即不写字而省略。所空位置原应有字,但在流传中比省代符号还易忽略,以致给今天的研究工作带来困难。但只要认识到敦煌写本的书写特征,我们仍可以复原,进而研究几种不同写本形成的先后次序。

敦博本《六祖坛经》：“《菩萨经》云：‘我（案：衍）本源自性清净。’
识心见性，自成佛道。‘即时豁然，还得本心。’”

所空四字格，北图本仅空一字格，英藏本则连书不空格。

前引《坛经》文字中的四个空格及其下文，在《坛经》别一处作：“《维摩经》云：‘即时豁然，还得本心。’”语出《维摩诘所说经》卷上，见《大正藏经》第十四册第54页上栏。很显然，敦博本所空四字格应是“维摩经云”四字，抄写者为节省时间略而不书，但空出了相应的位置。在已经出版整理过的敦煌本《六祖坛经》中，仅铃木大拙正确地补入了“维摩经云”四个字。不过，铃木校本所据是英藏本，而此本是连书不空格的，与我们这里要讨论的问题无直接关系。

敦博本之所以将“维摩经云”四字空格不书，是由于《维摩经》所云“即时豁然，还得本心”是禅家极为熟悉的文句；更重要的是，这个抄本是抄写者本人使用的，只要他自己明白即可。不过，再被转抄时却容易发生问题。我们看到，北图本仅空一字格，至英藏本则干脆连书不空格了。说明转抄者并不了解原空格的意义。同时这种变化也透露出，虽然这三种《坛经》抄本同出一系，但敦博本的产生应比其他两种为早，且更接近早期抄本的面貌。同时也为铃木大拙所补四字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尽管他当时仅能见到连书不空格的英藏本。

三 重 文 符 号

中古时代的手写文字中，同样是为了节省时间，重文符号使用极多，类型复杂，我在《敦煌吐鲁番文献重文符号释读举隅》^④一文中，已做了归纳并举例说明。就敦煌本《六祖坛经》来说，重文符号使用得也很多，其中漏、衍均有。这里我们重点讨论一种重文符号的特殊用法。

《坛经》云：“何名千百意化身佛？不思量，性即空寂；思量，即是自

化,思量恶法,化为地狱;思量善法,化为天堂;毒害化为畜生;慈悲化为菩萨;智慧化为上界;愚痴化为下方。自性变化甚多,迷人自不知见……”

上引文字,敦博本、北图本、英藏本基本相同,中外学者的整理本均遵从原卷而不改。但这并非没有问题。问题在于这段文字在转抄中失去了四个“思量”的重文符号。我们可举《日本国现在书目录》的重文符号使用规则来加以说明。这部书是日本藤原佐世(?—897)奉敕撰写的,全书一卷,现存者是十二或十三世纪的略抄孤本。书中大量著录唐代各种书籍,其中一些明确标明是著名学者吉备真备从唐朝带回日本的。因此,这部书中的重文符号使用规则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唐代手写文字重文符号的书写习惯。现将一部分法律书名引录如下。为便于理解,将重文符号所代替的文字放在其后的括弧中,原书错误不加校改:

唐永徽律十二卷,々々々々(唐永徽律)疏卅卷伏无忌等撰,……
垂拱格二卷,々々(垂拱)留司格二卷,开元格十卷,々々々(开元格)私记一卷,々々(开元)新格五卷……开元皇口敕一卷,々々(开元)后格九卷。

很显然,在这些书名中,“唐永徽律”、“垂拱”、“开元格”、“开元”都是用重文符号来替代的。其共同特征是,重文符号并不紧随已经出现过的文字,二者间有别的文字间隔,但意义却明白无误。

以上表明,唐人在书写文字时,对邻近出现或连续出现的某一词语,不再写出,而仅用重文符号替代。这一书写特征,同样适用于前面所引的《六祖坛经》文字。

前引《坛经》文字中,“思量恶法,化为地狱;思量善法,化为天堂”意

义十分明确。但“毒害化为畜生,慈悲化为菩萨,智惠化为上界,愚痴化为下方”四句意义却不十分明确。从前引《日本国现在书目录》的重文符号用法,我们有理由怀疑,这四句前面均脱掉了“思量”二字。又因“思量”二字在前二句已出现过,故这四句的“思量”用重文符号替代即可。我推测,其原始面貌应作:“思量恶法,化为地狱;思量善法,化为天堂;々々毒害,化为畜生;々々慈悲,化为菩萨;々々智惠,化为上界;々々愚痴,化为下方。”阅读时,只需将重文符号还原为“思量”二字即可。若如此,则整段文字的意义也就明白无误了。可惜的是,这四处重文符号在转抄中全然脱漏了,造成今日整理工作的极大困难。

四 删 除 符 号

敦煌文献中有些字,抄者写好后又觉得需要删去,于是在其右侧加一删除符号。这种符号一般用[⋮]、[┘]、[┐]、[┑]等表示。在《六祖坛经》中也有出现。

惠能讲其身世时说:“惠能慈父,本官(贯)范阳,左降迁流岭南,[作]新州百姓。”敦博本先有[岭]字,又在其右侧加一删除符号[┘],英藏本则无[岭]字。应该说,有“岭”字是正确的,表明敦博本以前的本子有此字,但不知敦博本为何要删去?英藏本则直接删去了。它透露了这些本子的形成次序,即敦煌祖本→敦博本→英藏本。这与前述讨论“空字省书”时所得认识是一致的。

五 界 隔 号

界隔号是为了隔断上下文义,避免混读而使用的符号,其形状作[|],加在被隔断之文首字的右上角。这一符号对研究《六祖坛经》的准

确题目关系至巨。

由于北图本首缺,无法得知其题目书写形式。现将其他三种敦煌本《六祖坛经》的题目彙录如下:

敦博本:

1. 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波(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
2. 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兼受(授)无相 戒弘
法弟子法海集记(“戒”及其以下文字为小字)

英藏本:

1. 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
2. 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
3. 兼受(授)无相(此四字为小字) 戒弘法弟子法海
集记

旅博本:

1. 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
2. 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兼受(授)
无相
3. 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

上述《坛经》的三种标题,英藏本同旅博本比较接近,而敦博本却是另一番面貌。值得注意的是,旅博本第二行首字“六”比第一行低二字格,第三行首字“戒”又比第二行低二字格,且“六”、“戒”二字上均加有界隔号,用于避免混读。这说明《坛经》原标题分三层含义:(一)其正题是“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二)副题是“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兼授无相戒”;(三)“弘法弟子法海集记”是

整理者署名。惟一的错误是，“戒”字该属上文，英藏本和旅博本均误属在下文。

对《坛经》标题的这种认识，还可由其内容本身获得证实。《坛经》中有如下文句：

惠能大师于大梵寺讲堂中升高座，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受（授）无相戒。

今即忏悔已，与善知识授无相三归依戒。

善知识，总须自听，与受（授）无相戒。

这表明惠能此次在大梵寺的活动包括两项内容，即“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和“授无相戒”，与《坛经》副题的说明完全一致。

在以往的研究著作中，只有印顺法师充分认识到了惠能此次活动的内容。他说：“慧能在大梵寺，‘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授无相戒’。”^⑤应该说是极有见地的。至于将这一认识转化为对《坛经》原题目的基本正确的理解，则是潘重规先生的功绩。潘先生在《敦煌六祖坛经读后管见》^⑥一文中，曾根据印顺法师的认识，将英藏本《坛经》的题目标列为：

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

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

兼受无相戒

弘法弟子法海集记

这种表述的缺陷在于，仍未能完全摆脱《坛经》抄本原格式的窠臼。我认为，只要把握了原题目的三层含义，则应用现代标点符号作如下处理：

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

——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兼受(授)无相戒

弘法弟子法海集记

这样,就将《坛经》的正题、副题和作者区分得明明白白,而不再为写本原格式所束缚。

敦煌本《六祖坛经》的标题始终是一个问题。现在能够获得这样的整理结果,除了对其内容的正确理解,旅博本的两个界隔号无疑起了重要作用。顺便指出,虽然敦博本是现存四种抄本中最好的本子,但其标题方式不及英藏本和旅博本接近原貌,因而是不可取的。

以上我们对敦煌本《六祖坛经》的五种书写符号逐一进行了讨论,并阐明其意义。这些均是前贤所未曾措意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确理解写本中的各种符号,对校理敦煌本《六祖坛经》极其重要。要知,我们面对的是古人的手写本。如同今人有许多书写习惯,古人在印刷术尚不发达的时代,更有许多书写习惯,其中一些习惯是约定俗成的。只有明了这些书写习惯及其意义,才能对写本原貌产生真切的认识,进而加以正确校理。诚如荣新江先生在给我们合作的《敦博本禅籍录校》一书起草的前言中所指出:“从‘敦煌学’的角度,以‘敦煌学’的方法来整理这部禅籍,是我们的目的与手法。”这篇小文所反映的也仅是我们这种工作方法的一个侧面。

(原载《出土文献研究》第三辑,中华书局,1998年,第228—233页)

注释:

- ① 据粗略统计,中外学者的主要研究论著有:a. 铃木贞太郎(铃木大拙)、公田连太郎《敦煌出土六祖坛经》,见民国《普惠大藏经》;b. 阎波尔斯基(Philip

B. Yampolsky)《敦煌写本〈六祖坛经〉译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7年出版；c. 石井修道《惠昕本〈六祖坛经〉的研究》，其中也有对英藏本的录校，载日本《驹泽大学佛教学部论集》第一一号（1980年）、第一二号（1981年）；d. 郭朋《坛经校释》，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e. 金知见《校注敦煌六祖坛经》，载金编《六祖坛经的世界》，韩国民族社，1989年出版；f. 凯瑟琳·杜莎莉(Catherine Toulssaly)《六祖坛经》，巴黎友丰出版社，1992年出版；g. 田中良昭《敦煌本〈六祖坛经〉诸本之研究——特别介绍新出之北京本》，载《松ヶ岡文庫研究年報》，1991年；h. 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出版；I. 潘重规《敦煌坛经新书》，台湾佛陀基金会印，1994年。

②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③ 参见郭在贻、张涌泉、黄征《敦煌写本书写特例发微》，载《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上海汉语大辞典出版社，1990年，第310—346页。

④ 载《文献》1994年第1期，第160—173页。

⑤ 印顺《中国禅宗史》，上海书店，1992年重印本，第246页。

⑥ 载《中国文化》第7期，1992年，第48—55页。

英藏敦煌本《六祖坛经》的河西特色

——以方音通假为依据的探索

在现知敦煌所出四种《六祖坛经》抄本中，藏在英国图书馆的 S. 5475 号，是被人们最早发现、也研究得最多的一个抄本。迄今为止，这个抄本已被译成英、法、日、韩等几种文字在国际上流行。不过，人们对这个抄本是否获得了真切、透彻的认识，或许还有问题。我在《英藏敦煌本〈六祖坛经〉通借字刍议》一文中^①，曾就其中的文字通借尤其是方音通假现象做了胪列和辨析。虽然结论之一是“这个抄本是唐五代敦煌人使用的”，但是缺少理论的分析，因此也难称真切、透彻。本文即在前文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前贤的音韵学研究成果，进一步阐释其中的方音通假现象，从而揭示它所具有的河西特色。

一 止摄和虞(鱼)摄混同互通

止摄和虞(鱼)摄有条件地混同互通，是唐五代敦煌乃至河西方音的重要特征之一。对此，邵荣芬、李正宇二先生已做过精到的研究^②和详细论述，这里不赘。这种混同现象在 S. 5475 号《坛经》抄本中同样大量存在。但中外整理研究《坛经》抄本者多不谙音韵，尤其是唐五代河西方音，因此既未措意，更未能揭示出来，故而在整理时常常以意改删或失校。其实，只要将这项成果引入《坛经》研究，原来许多滞碍难通的

文句便可获得通读。兹分述如下：

(一)“起”、“去”混同互通

“起”、“去”混同互通，在敦煌变文、诗词中都曾出现过^③，在英藏本《六祖坛经》中同样存在。其中云：“即缘名(迷)人于镜(境)上有念，念上便去(着重点为笔者所加，下同)耶(邪)见，一切尘劳妄念从此而生……世人杂见不起，于念若无有念，无念亦不立。”文中“去”字当校作“起”，敦煌市博物馆藏 077 号(以下简称敦博本)正作“起”；文中的“起”字敦博本同，但当校作“去”。因为惠能的“无念法”要求去掉邪见，以便明心见性，而非要求“起”杂见。

试比较以下材料：S. 5591 释愿清《十恩德赞》：“去坐大(待)人扶。”^④北图周字 87 号、S. 5601 等俱作“起坐”，是。S. 2614《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汝若不去[慈]悲，岂名孝顺之子？”^⑤北图丽字 85 号“去”作“起”，是。

“起”、“去”二字混同互通，在英藏本《坛经》中约出现十次左右，对校理写本至为重要。虽是一字之差，但如果不能给予正确校理，则很难把握惠能的禅法思想，以致会南辕北辙。

(二)“汝(音你)”、“以”、“与”混同互通

《坛经》云：“五祖曰：‘吾向与说，世人生死事大……’”“与”字敦博本作“汝”，是。“大师谓志诚曰：‘吾闻与禅师教人，唯传戒定惠。与和尚教人戒定惠如何？当为吾说。’”二“与”字敦博本并作“汝”，是。

《坛经》又云：“其夜受法，人尽不知。便传顿法及衣，汝为六代祖。”“汝”字敦博本作“以”，是。“善知识，我于忍和尚处一闻，言下大伍(悟)，顿见真如本性。是故汝[顿]教法流行后代。”“汝”字敦博本、北图冈字 48 号(以下简称北图本)均作“以”，是。

《坛经》又云：“心修此行，即与般若波罗蜜经本无差别。”“与”字敦博本同，但北图本却作“以”，应作“与”。这个字虽非出现在英藏本上，

但也说明“以”、“与”二字可通用。

试比较以下材料：《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浚水在长安东南，以渭河相连”；“周人曰：‘此山乃周之分野，所生草木皆我武王所有，以食粟何别？’”⑦“以”字均当校作“与”。《庐山远公话》：“道安答曰：‘贫道天以人为师，义若涌泉，法如流水，汝若要问，但请问之，今对与前疑速说。’”⑧“与”字当校作“汝”。《明马文昇墓志》：“孝皇嗣辟，□臣是赖，曰兹本兵，虚席汝待。”⑨“汝”即“以”之借字。

在英藏本《坛经》中，“汝”、“与”混同凡七见，“汝”、“以”混同凡四见，“以”、“与”混同凡一见，三字混同凡十二见。

（三）“虽”、“须”混同互通

“虽”、“须”二字混同互通，蒋礼鸿先生曾利用敦煌文学资料做过详细论证^⑩，诚为不刊之论。《坛经》中同样存在二字混同互通现象：

“说即须万般，合离（理）还归一。”“须”字敦博本作“虽”，是。“第三祖僧璨和尚颂曰：‘花种虽因地，地上种化（花）生……’”“虽”字敦博本作“须”，是。

试比较以下材料：S. 1477《祭驴文》：“汝若来生作人，还来近我；若更为驴，莫驮醋（措）大……猛雪里虽行，深泥里虽过……”二“虽”字据上下文义均当校作“须”^⑪。P. 2718《王梵志诗》：“偷盗须无命，侵欺罪更多。”^⑫P. 3656、P. 3716“须”字作“虽”，是。

“虽”、“须”混同互通在英藏本《坛经》中共出现三次。

（四）“知”、“之”、“诸”混同互通

“诸”、“之”、“知”同音不分，蒋礼鸿、邵荣芬二先生曾加论证并举例说明^⑬。英藏本《坛经》中用例亦多。

《坛经》云：“迷人于不悟，便执成颠。即有数百盘（般）如此教道者，故之大错。善知识，定惠犹如何等？如灯光。有灯即有光，无灯即无光。灯是光知体，光是灯之用。”敦博本“之”作“知”、“知”作“之”，是。至于

“灯是光知体”之“知”当作“之”，由下句“光是灯之用”亦可鉴别。

《坛经》又云：“善诸识，此法门中，座（坐）禅元不着（看）心，亦不着（看）净，亦不言[不]动。”“诸”字敦博本作“知”，是。

《坛经》还云：“大师灭度诸日，寺内异香氤（氛）氤，经数日不散。”“诸”字敦博本作“之”，是。

英藏本《坛经》中“知”、“之”混同凡七见，“知”、“诸”混同凡三见，“诸”、“之”混同凡二见，三字混同互通共出现十二次。

因此类混同互通为研习敦煌文献者所熟知，旁证材料从略。

（五）“依”、“衣”、“于”混同互通

这三个字混同互通在英藏本《坛经》中出现频率极高。请看：

“刺史遂令门人僧法海集记，流行后代与学道者，承此宗旨，递相传授，有所于约，以为秉承，说此《坛经》。”“于”字敦博本、旅顺关东厅博物馆旧藏本均作“依”^⑬，是。

“两月中间，至大庚（庾）岭。不知向后有数百人来，欲拟头（捉）惠能，夺于法。”“于”字敦博本作“衣”，是。

试比较以下材料：S. 4504《乙未年就弘子贷生绢契》：“其绢限一个月[内还]。若得一个月不还绢者，逐日于乡原生里（利）”。^⑭“于”字当校作“依”。P. 2598 背抄诗《锦于篇》，S. 2049(2)、P. 2544 皆题为《锦衣篇》，是。

英藏本《坛经》中“依”、“于”混同凡七见，“衣”、“于”混同凡五见，共计出现十二次。

（六）“如”、“于”混同互通

“愿闻先性（圣）教者，各须净心闻了。愿自余（除）迷，于先代悟。”“于”字敦博本作“如”，是。

试比较：《庐山远公话》：“相公闻语，由于甘露入心，夫人闻之，也似醍醐灌顶。”^⑮王庆菽先生校“由于”为“犹如”，甚是。同篇又有：“五者，喻于天地覆载众生，若也天地全无，万象凭何如（而）立？”^⑯“于”字亦是

“如”之同音借字。

英藏本《坛经》中“如”、“于”混同互通凡一见，已具如上。

以上我们就英藏本《坛经》中止、虞(鱼)二摄混同互通，选取了“去——起”、“汝(你)——以——与”、“虽——须”、“知——之——诸”、“依——衣——于”、“如——于”共6组15个字进行讨论。这6组字具有典型的唐五代河西方音同音互通特征。若按更严格的音韵学理论标准加以核定，则还有“如——而”、“是——事——示——时”、“致——置”、“此——次”等组。由于这些混同互通字在校勘时较易识别，这里不再讨论，以免费辞。

二 声母端、定互注

由于敦煌本《开蒙要训》采用直注音法，能够较好地反映唐五代河西方言的读音特征，罗常培先生在其名著《唐五代西北方音》^⑩中用较多的篇幅作了研究。其中声母“端定互注例”罗先生举出：

“锻《切韵》音丁贯切 tuan；段《切韵》音徒玩切 d'uan。”

“蹬《切韵》音徒瓦切 d'æg；等《切韵》音多肯切 tæg。”^⑪这表明唐五代河西方音的确存在声母“d”、“t”混同现象。这种现象在英藏本《坛经》中也有出现。

“一时端坐，但无动无净(静)，无生无灭，无去无来，无是无非，无住，但然寂净(静)，即是大道。吾去已后，但衣(依)法修行，共吾在日一种。”前一“但”字，敦博本作“坦”，是；后一“但”字，敦博本作“坦”，以“但”为是。

“但”、“坦”二字混同互通，亦见于唐代墓志。《唐马光亮墓志》：“地平但但，松竹青青。”^⑫二“但”字均是“坦”之同音借字。

声母“d”、“t”不分，在现代方音中也还存在。笔者原籍山西稷山县

(晋南地区)。所姓“邓”，现代汉语标准读音 deng，但老年人均读为 teng；那里也有不少“段”姓，标准音应读如 duan，但民间至今仍读作 tuan。此亦可作写本《坛经》“但”、“坦”同音互通的旁证。

“但”、“坦”混同互通在英藏本《坛经》仅一见，已具如上。

三 声母以审注心

对于《开蒙要训》声母以审注心，罗常培先生举出“绣——守”二字作了研究^②。其实，这种现象在英藏本《坛经》中表现得更为充分，下面举四组字加以讨论。

(一) “少”、“小”混同互通

“少”、“小”混同互通，应是治文史者的常识。但因历来整理《坛经》者多是佛学家，古汉语修养欠足，难于甄别，以致有认为是形近而误者^③，因此仍有讨论的必要。

《坛经》云：“惠能慈父，本官(贯)范阳，左降迁流[岭]南，[作]新州百姓。惠能幼小，父小(亦)早亡。”前一“小”字敦博本作“少”，然作“小”是。

“秀上座言：‘罪过，实是神秀作，不敢求祖。愿和尚慈悲，看弟子有小智惠(慧)，识大意否？’”“小”字敦博本作“少”，是。

由于“少”、“小”混同互通在敦煌文献中极为习见，旁证材料从略。

“少”、“小”混同在英藏本《坛经》中凡五见。

(二) “识”、“息”混同互通

“学道者用心，莫不息法意。”“息”字敦博本作“识”，是。

“门人得处分，却来各至白(自)房，递相谓言：‘……神秀上座是教授师，秀上座得法后，自可于(依)止，请(偈)不用作。’诸人息心，尽不敢呈偈。”“息”字敦博本作“识”，然作“息”是。此字虽非出现于英藏本，但

亦可证明二字通用。

“识”、“息”混同互通，写本《坛经》中凡二见，已具如上。

(三) “圣”、“性”混同互通

《坛经》云：“法达，汝听一佛乘，莫求二佛乘，迷[即][离?]却汝_性。”

“圣”字敦博本作“性”，是。

“教是先_性所传，不是惠能自知。愿闻先_性教者……”二“性”字敦博本俱作“圣”，是。

英藏本《坛经》中“圣”、“性”混同互通凡四见。

(四) “身”、“深”、“心”混同互通

这三个字的混同互通为以往整理《坛经》写本者所迷惑，多未能正确校理，更有详加讨论的必要。

《坛经》云：“智人与愚人说法，令使(?)愚者悟解_深开。迷人若悟[解]心开，与大智人无别。”“深”字敦博本、北图本均作“心”，是。下句“迷人若悟[解]心开”亦可证。

《坛经》云：“如付山(此)法，须德(得)上恨(根)知(智)，心_信佛法，立[于]大悲，持此经以为衣(乘)承，于今不绝。”“心”字敦博本作“深”，是。

《坛经》还云：“若欲修行云(求)觅佛，不知何处欲求真。若能_身中自有真，有真即是成佛因。”“身”字敦博本同，但当校作“心”。因为惠能禅法是“心性”之学，要求“明心见性”。惠昕本、契嵩本、宗宝本《坛经》正作“心”字。

试比较以下材料：P. 2637、P. 2703《辟谷方》：“阿难如来，偈足五方如来。若暂闻者，当得升天，何况受持，依法忆念？凡作此法，若在家，若出家，先于佛前发愿，休歇攀缘，净其_身意；令无散乱；观其心意，亦莫昏沉……”^②这是佛家药方之一种，亦是一种修持法。文中“身意”当作“心意”，下文“观其心意”可证。《五更转·南宗定邪正》：“三更侵。如

来智慧本幽深。唯佛与法乃能见。声闻缘觉不知音……”“幽深”一词北图露字6号、S. 2679号均作“幽心”，他本均作“幽深”^②。应作“幽深”为是。

英藏本《坛经》中“深”、“心”混同互通凡二见，“身”、“心”互通凡五见，共计出现七次。

以上属于声母以审注心者，我们共举出“少——小”、“识——息”、“圣——性”、“身——深——心”四组九字。这四组互通字也具有明显的唐五代河西方音特征。它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正确校理写本《坛经》，也可补前贤研究唐五代河西方音时所举例证之未备。

四 韵母青、齐互注

韵母青、齐互注，实际是-ŋ尾消失或增加的问题。对此，罗常培、邵荣芬二先生均持十分审慎的态度。龙晦先生则认为：“唐代西北方音里是有东韵失去-ŋ尾现象的。”^④龙先生的主要依据是敦煌歌辞中的韵脚。如：“行”读he，从而与“纷”（失去-ŋ尾）、“归”为韵。“康”读如“柯”，从而叶“波”韵；“功”读如“歌”，叶“歌”韵；“性”、“并”、“骋”、“令”、“定”均失去-ŋ尾，从而与“比”、“帝”叶韵。其论证颇具说服力。我在英藏本《坛经》中共找出六例失去或增加-ŋ尾的文字，详论如次：

（一）“定”、“第”（弟）混同互通

《坛经》云：“若不得《坛经》，即无禀受。须知[受?]法处、年月日、性（姓）名，遍（递）相付嘱。无《坛经》禀承，非南宗定子也。”“定”字敦博本作“弟”，是。

《坛经》又云：“吾灭后二十余年，邪法辽（撩）乱，惑我宗旨。有人出来，不惜身命，弟佛教是非，竖立宗旨……”“弟”字敦博本作“定”，是。

试比较:敦煌本《叶净能诗(书)》:“皆奉天曹正(匹)配,与之作第三夫[人]……使人回至店中见净能,俱传岳神言语,云皆奉天曹正(匹)配,为定三夫人,非敢专擅。”^⑤前文已云“第三夫人”,知此“定”字当作“第”。

英藏本《坛经》中“定”、“第”混同互通凡二见,已备如上。

(二)“令”、“礼”混同互通

“前头人相应,即共论佛语(义),若实不相应,合掌令劝善。”“令”字敦博本作“礼”,是。惠昕本、契嵩本、宗宝本《坛经》均作“令”,但作“礼”为是^⑥。

试比较:敦煌本《茶酒论一卷》:“酒乃出来:‘……酒食向人,终无恶意。有酒有令,人(仁)义礼智,自合称尊,何劳比类?’”^⑦但 P. 3910“令”字却作“礼”。

英藏本《坛经》中“令”、“礼”混同互通凡一见,已备如上。

(三)“国”、“广”混同互通

《坛经》云:“何名摩诃?摩诃者是‘大’,心量广大,犹如虚空……又有名(迷)人,空心不思,名之为‘大’,此亦不是。心量大,不行是少(小)。”引文中的“心量大”北图本同,但敦博本先写作“心量国大”,后在“国”字旁加一删除符,表示废读,因此释文应与英藏本、北图本相同。但是,抄写者为何先写出一个“国”字呢?应是“广”字失-ŋ尾后同音所致。前文已出现过“心量广大”句,可知“心量大”当在“大”前补“广”字。这里恐怕不能排除《坛经》传抄中将“心量广大”写成“心量国大”的可能。这个问题虽出在敦博本上,但我们恰可据初写的“心量国大”校补“心量大”为“心量广大”。

“国”、“广”混同互通在写本《坛经》中仅一见,已备如上。

(四)“迷”、“名”、“明”混同互通

“迷”、“名”混同互通已见上条材料所举一例,下面再举三例:

“向者三身[佛]在自法性，世人尽有，为_レ名不见，外觅三[身]如来，不见自色身中三性(身)佛。”“名”字敦博本、北图本均作“迷”，是。

“故遇善知识开真(正)法，吹却_レ名妄，内外名(明)彻，于自姓(性)中万法皆见(现)。”“名”字敦博本、北图本均作“迷”，是。

“善知识，法无顿渐，人有利钝。明即渐劝，悟人顿修。”“明”字敦博本作“迷”，是。

英藏本《坛经》中“迷”、“名”混同互通凡十三见，“迷”、“明”混同互通凡一见，共计出现十四次。

(五) “西”、“星”混同互通

《坛经》云：“一切法尽在自姓(性)，自姓(性)常清净，日月常名(明)，只为云覆盖，上名(明)下暗，不能了见日月西辰……”“西”字敦博本、北图本均作“星”，是。

英藏本《坛经》中“西”、“星”混同互通仅一见，已备如上。

(六) “听”、“体”混同互通

“善知识，总须自_レ体，与受(授)无相戒。”“体”字敦博本、北图本俱作“听”，是。此字虽非出现于英藏本，但亦说明二字同音通用。

“六祖言：‘……汝等悲泣，即不知吾[去]处；若知去处，即不悲泣。性_レ听无生无灭，无去无来。’”“听”字敦博本脱，但当校作“体”。佛教“圆通”一词的含义是：“妙智所证之理曰圆通，性体周遍为圆，妙用无碍为通。”^②

试比较：敦煌本《五更转·南宗赞》有如下文句：“了五蕴，体皆亡”；“无为法会体皆亡”；“法身体性本来禅”。P. 2963、北图周字 70 号二写本“听”、“体”混用不分^③。P. 2641 敦煌名僧道真有一首告诫游人勿在洞窟壁画上乱题名字的诗，以“青”、“名”、“瓶”、“生”、“题”通押。“题”字于此读音“停”，故可谐韵^④。

英藏本《坛经》中“听”、“体”混同互通凡二见，具备如前。

以上属于韵母青、齐互注例，我们共举出“定——弟(第)”、“令——礼”、“国——广”、“迷——名——明”、“西——星”、“听——体”六组十三字。它们亦属于唐五代河西方音所具有的特征，不仅有助于校理敦煌本《坛经》，而且同样可补前贤研究音韵时所举例证之未备。

五 韵母侵、庚互通

罗常培先生说：“在《开蒙要训》的注音里却有一个跟《千字文》不同的特异现象，就是侵庚互通的例：禁《切韵》音居荫切 *kjäm*，敬《切韵》音居庆切 *kjiëŋ*。”^⑩由于例证太少，罗先生对这种语音现象未下断语。邵荣芬先生在讨论 -n 尾和 -ŋ 尾互相代用时，从变文中举出下列几组字：“胜——身”、“陵——邻”、“臣——承”、“邻——陵”、“孕——胤”、“生——申”、“隐——影”。但邵先生十分谨慎，不加妄断^⑪。不过，罗、邵二先生的论述对我们读《坛经》也颇有启发。我所关注的是《坛经》中出现的“亲”、“情”二字互代。

惠能在讲“对法”时，“自性居起用对”的最末一对是“有清(情)[与]无亲对”。此“亲”字敦博本同，但当校作“情”。佛学中“有情”与“无情”是一对对立概念，“亲”字当是“情”字之借，正可与邵荣芬先生举出的几组字相比证。

试比较以下材料：敦煌本《汉将王陵变》有如下文字：“但愿汉存朝帝阙，志身甘奉入黄泉。”^⑫项楚先生谓：“‘甘奉’应作‘甘分’，甘愿之义……‘分’所以写作‘奉’，是由于唐五代西北方音中，两字读音相似。”^⑬亦可作为“情”、“亲”互通的旁证。

韵母“禁”、“敬”不分在现代方言中同样具有生命力。我的家乡说“刮风”为“刮分”，“风”、“分”同音，正与“情”、“亲”同音相类似，亦可参证。

以上对英藏敦煌本《六祖坛经》的方音通假现象进行了探索,最后需说明如下几点:

(一)在现知敦煌所出四种《坛经》抄本中,S. 5475 号和敦博 077 号是完本;旅顺关东厅博物馆旧藏本今仅见首尾照片各一帧,无从全面比较;北图冈字 48 号(胶卷号 8024)首残尾未抄完,约有完本的 1/3。之所以选用英藏本进行讨论,是由于这个抄本的唐五代河西方音通假现象最为突出,但不是说敦博本和北图本就不存在方音通假现象,只是少些罢了。这两个抄本的个别方音问题在举证时已经予以说明,读者自可看出。

(二)要特别说明的是,对音韵学我甚少修养。之所以紧紧抓住这个问题不放,是由于在整理《坛经》抄本时无法回避。职是之故,我在引用前贤的音韵学成果时,理解上可能有歧误,还望博学通人谅解并不吝赐教。

(三)在反复阅读 S. 5475 号《坛经》抄本时,家乡方音曾给我不少启示和帮助。文中所举几个现代晋南方音例证均是我亲历并能口说的,任何时候我都不敢杜撰材料以自圆其说。

(四)本文共检出唐五代河西方音混同互通字十八组四十一字。据并非精确的统计,其总的出现次数达九十一一次之多;加以本文尚未论列的一些通假字,其总量达百数以上。我们知道,敦煌本《六祖坛经》总字数仅 12400 余字,方音通假字几乎占了 1%! 这表明,读通敦煌本《六祖坛经》的关键即在于此。

(五)我在《英藏敦煌本〈六祖坛经〉通借字刍议》一文中曾指出:“这个本子是唐五代敦煌人使用的。”由本文的讨论亦可证明前文结论大致不误。现在要补充的是,唐五代敦煌人在使用《六祖坛经》抄本时,由于使用者的方音作用,将其河西化了,从而使之具有了典型的河西特色。至于其河西化的具体过程,容另文探讨。

附 S. 5475《六祖坛经》方音通假字表

音韵类别	互通字	出现次数	旁证材料
止摄、虞(鱼)摄混同	起——去	约 10	S. 5591、北图周字 87、S. 5601
			S. 2614、北图丽字 85
	汝——以——与	12	《张淮深德政碑》、《庐山远公话》、《明马文昇墓志》
	虽——须	3	S. 1477、P. 2718、P. 3656、P. 3716
	知——之——诸	12	(从略)
	依——衣——于	12	S. 4504、S. 2049(2)、P. 2544
	如——于	1	《庐山远公话》
声母端、定互注	但——坦	1	《唐马光亮墓志》
声母以审注心	少——小	5	(从略)
	识——息	2	
	圣——性	4	
	身——深——心	7	《辟谷方》、《五更转·南宗定邪正》
韵母青、齐互注	定——第(弟)	2	《叶净能诗(书)》
	令——礼	1	《茶酒论一卷》
	国——广	1	
	迷——名——明	14	
	西——星	1	
	听——体	2	《五更转·南宗赞》，P. 2641
韵母侵、庚互通	情——亲	1	《汉将王陵变》

(原载《1994 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纪念敦煌研究院
成立 50 周年·宗教文史卷·上》，甘肃民族出版社，
2000 年，第 105—119 页)

注释:

- ① 载《敦煌研究》1994年第1期。
- ② 邵荣芬《敦煌俗文学中的别字异文和唐五代西北方音》，载《中国语文》1963年第3期；李正宇《敦煌方音止遇二摄混同及其校勘学意义》，载《敦煌研究》1986年第4期。
- ③ 参前揭李正宇文；拙作《敦煌文献中的“去”字》，载《中国文化》第9期，1993年。
- ④ 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748、755页。
- ⑤ 王重民等《敦煌变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739页。
- ⑥ 荣新江《敦煌写本〈敕河西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校考》，载《周一良先生八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209页。
- ⑦ 前揭《敦煌变文集》，第188页。
- ⑧ 《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卷（一）》下册，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390页。
- ⑨ 《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4次增订本，第424—425页。
- ⑩ 前揭李正宇文。
- ⑪ 项楚《王梵志诗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541页。
- ⑫ 前揭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第504—506页；前揭注②邵荣芬文。
- ⑬ 旧藏旅顺关东厅博物馆，原件下落今不明。今日所见，仅首尾照片各一帧，系荣新江先生在日本访学时所获。
- ⑭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110页。
- ⑮ 前揭《敦煌变文集》，第184页。
- ⑯ 同上书，第188页。
- ⑰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十二，1933年出版。
- ⑱ 同上书，第79页。
- ⑲ 见《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卷（一）》下册，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165页。
- ⑳ 前揭《唐五代西北方音》，第84页。
- ㉑ 见《敦煌新本六祖坛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14页。
- ㉒ 马继兴主编《敦煌古医籍考释》，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第463页。
- ㉓ 前揭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第1443页。
- ㉔ 龙晦《唐五代西北方音与敦煌文献研究》，载《西南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

1983年第3期;又见前揭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第1819、1824页,引文见后书第1822页。

⑮ 前揭《敦煌变文集》,第217—218页。

⑯ 我在《敦煌文献中的“去”字》一文中,曾对“令”、“礼”二字的不同提出疑问,盼有识者赐教。现在可以明确,“令”、“礼”混同互通亦属于唐五代河西方音通假现象。

⑰ 前揭《敦煌变文集》,第267页。

⑱ 丁福保编《佛学大辞典》,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169页。

⑲ 前揭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第1429、1432页。

⑳ 参见颜延亮主编《敦煌文学概论》,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7页。

㉑ 前揭《唐五代西北方音》,第110页。

㉒ 前揭注②邵荣芬文。

㉓ 前揭《敦煌变文集》,第43页。

㉔ 项楚《敦煌文学丛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76页。

敦煌本《六祖坛经》口语词释

众所周知,《六祖坛经》是禅宗六祖惠能(亦作慧能)在大梵寺的讲法和授戒记录;敦煌本《六祖坛经》又是现知最早的《坛经》传抄本,由惠能弟子法海“集记”而成,因此,是最贴近《坛经》原貌的。而惠能又“不识文字”,完全口授,必然要使用一些那个时代(即唐代)的口语词。本篇即对这些口语词给予解释,以便对《坛经》的相关文句获得准确认识。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有些词语早在唐代之前即已出现,但唐人仍在使用,因此我们仍将其视作唐代口语。若有不妥,还望是正。

(一) 故(故故)

“惠能答曰:‘弟子是岭南人,新州百姓。今故远来礼拜和尚,不求余物,唯求作佛!’”

“故”又可说成“故故”,均是特地、特意的意思。《北史》卷七二《牛弘传》:“[杨]素将击突厥,诣太常与弘言别。弘送素至中门而止,素谓曰:‘大将出征,故来叙别,何相送之近也?’弘遂揖而退。”白居易《过郑处士》诗:“故来不是求他事,暂藉南亭一望山。”薛能《春日使府寓怀》:“青春背我堂堂去,白发欺人故故生。”惠能说他“今故远来”,就是说“现在特意远道而来”。千余年后,“故故”一词在口语中仍在使用。如在我故里(山西省稷山县)可以听到人们说“我故故来看你”,意义未变。

(二) 火急

“五祖忽于一日唤门人尽来。门人集讫,五祖曰:‘……有智惠(慧)

者自取本性般若之知，各作一偈呈吾。吾看汝偈，若悟大意者，付汝衣法，稟为六代。火急作！”

“火急”即赶快、抓紧时间的意思。《北史》卷八《齐本纪下》：“[后主]特爱非时之物，取求火急，皆须朝征夕办，当势者因之，贷一而责十焉。”王梵志诗：“普劝诸贵等，火急造桥梁。运度身得过，福至生西方。”①“不见念佛声，满街闻哭响。生时同毡被，死则嫌尸妨。臭秽不中停，火急须埋葬。”②《目连缘起》：“目连见母作狗，自知救济无方，火急欲来白佛。”③《庐山远公话》：“远公曰：‘只如汝未知时，吾早先知此事。若夫《涅槃经》之义，本无恐怖，若有恐怖，何名为涅槃？汝与众僧，火急各自回避……’”④弘忍要弟子们“火急作”偈，就是要他们抓紧时间作偈。

（三）下手

“大师堂前有三间房廊，于此廊下供养，欲画楞伽变，并画五祖大师传授衣法，流行后代为记。画人卢珍看壁了，明日下手。”

“下手”就是动手干的意思。《汉武故事》：“今继母无状，手杀其父，则下手之日，母恩绝矣。”《北史》卷九十《马嗣明传》：“武平末，从驾往晋阳，至辽阳山中，数处见榜，云有人家女病，若能差之者，购钱十万。又诸名医多寻榜至是人家，问疾状，俱不下手。唯嗣明为之疗。”唐·曹唐《小游仙诗》之五十一：“玉皇欲蓄红龙哀，亲唤金妃下手裁。”“下手”一词现代依旧在用，仍是动手、着手的意思。

（四）颠

“善知识，又见有人教人坐[禅]，看心看净，不动不起，从此致功。迷人不得，便执成颠。”

“颠”是“癡”的本字，指神经错乱，精神失常。《北史》卷四十五《柳玄达传》：“卒，改封夏阳县，子绛袭。绛弟远，字季云，性粗放无拘检，时人或谓之‘柳癡’。”《新唐书·李白传附张旭传》：“嗜酒，每大醉，呼叫狂

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世呼‘张颠’。”所谓“柳癫”、“张颠”，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柳疯子、张疯子。六祖说“迷人不能悟，便执成颠”，是指因不能自悟而过分执著，以致成了疯子。

(五) 一时

“善知识，总须自听，与授无相戒。一时逐惠能口道，令善知识见自三身佛……”

“一时”即一起、一齐。《北史》卷三五《郑羲传》：“连山性严暴，挝挞僮仆，酷过人理。父子一时为奴所害，断首投马槽下，乘马北逃。”《持世菩萨》：“天女……一时皆下于云中，尽入修禅之室内。”⑤《丑女缘起》：“于是王郎既被唬倒，左右宫人一时扶接，以水洒面，良久乃苏。”⑥惠能对听众说“一时逐惠能口道”，即“一起随我来说”。在所说内容之下标注“已上三唱”，即惠能领大家口念了三遍。“一时”这个词今天仍在用。我家乡人们说“我同张三一时来的”，就是“我同张三一起来的”，其意义未变。

(六) 下心

“‘无上佛道誓愿成’，常下心行，恭敬一切，远离迷执……”

“下心”即虔诚之意。天台宗智顗《菩萨戒义疏》卷下有四十八轻戒，其第二十二为“骄慢不请法戒”，又称“下心受法戒”。“下心受法”即虔恭受法。六祖说“常下心行”，就是要经常以虔敬之心身体力行。“下心”这个词现在仍用，但其意义如“屈意从人”，如“俯首下心”、“低首下心”，与古义不同。

(七) 在在处处

“若不同见解，无有志愿，在在处处，勿妄宣传，损彼前人，究竟无益。”

“在在”意同“处处”，连在一起多作“在处”，仍是到处之意。唐·张籍《赠别王侍御赴任陕州司马》诗：“京城在处闲人少，惟共君行并马

蹄。”薛逢《六街尘》诗：“六街尘起鼓咚咚，马足车轮在处通。”王梵志诗：“立身存笃信，景行将胜金。在处人携接，谙知无负心。”⑦“在在处处，勿妄宣传”，就是“不要到处乱加宣传”。

(八) 可不

“使君问：‘法可不如是西国第一祖达摩大师宗旨？’”

“可不”意即“岂不”。《太平广记》卷二四九“长孙玄同”条引隋·侯白《启颜录》：“玄同在幕内坐，有犬来，遗糞秽于墙上，玄同乃取支床砖，自击之。旁人怪其率，问曰：‘何为自撤支床砖打狗？’玄同曰：‘可不闻：苟利社稷，专之亦可？’”《伍子胥变文》：“与子娶妇，自纳为妃，共子争妻，可不惭于天地！”⑧王梵志诗：“亲还同席坐，知卑莫上头。忽人人怪责，可不众中羞！”⑨元代李寿卿《伍员吹箫》第一折：“报与伍员知道，可不好也！”“可不”这个词现代仍用，意义未变，如说“干这件事的可不就是他么”？

(九) 自家

“在家若修行，如东方人修善。但愿自家修清静，即是西方。”

“自家”犹自己。《魏书·太宗纪》：“[神瑞元年]冬十一月壬午，诏使者巡行诸州，校阅守宰资财，非自家所赍，悉簿为贼。”唐·施肩吾《望夫词》：“自家夫婿无消息，却恨桥头卖卜人。”《庐山远公话》：“云庆见和尚再三不肯回避，雨泪悲啼，自家走出寺门，随众波逃。”⑩《天竺国菩提达摩禅师论》：“此是自家真如心、本性清静心，不可以言说分别显示。”⑪“自家”一词在现代民间用语中仍有活力，如“我自家”就是“我自己”，“你自家”就是“你自己”。

(一〇) 底

“善知识，汝等尽诵取，依此偈修行。去惠能千里，常在能边；依此不修（不依此修？），对面底千里远。”

“底”通“抵”，意即相当。杜甫《春望》诗：“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

金。”“对面底千里远”，意谓虽在面前，却相当于千里之遥。

(一一) 生佛

“合座官僚道俗，礼拜和尚，无不嗟叹：‘善哉大悟，昔所未闻。岭南有福，生佛在此，谁能得知！’”

“生佛”即“活佛”，“生人”即活人。《北史》卷八十九《许遵传》：“遵曰：‘遵好与生人相随，不欲与死人同路。’”王梵志诗：“同时小出家，有悟亦有错。憨痴求身肥，每日服石药。生佛不拜礼，财色偏染著。白日趁身名，兼能夜逐乐……”^⑩《释门正统》卷三：“时优填王不堪恋幕，铸金为像。闻佛当下，以象载之，仰候世尊，犹如生佛。”《坛经》这里所言“生佛”，即指六祖惠能。

(一二) 弄

“大师言：‘神会，向前见不见是两边，痛不痛是生灭。汝自性且不见，敢来弄人！’”

这是神会初见六祖时，问“和尚坐禅见不见”而引发的六祖同他的对话，以致批评他是“弄人”。“弄”即欺骗，戏弄。《汉书·东方朔传》：“自公卿在位，朔皆敖弄，无所为屈。”《北史》卷八七《酷吏·燕荣传》：“贪暴放纵日甚。时元弘嗣除幽州长史，惧辱，固辞。上知之，敕荣曰：‘弘嗣杖十已上罪，皆奏问。’荣忿曰：‘竖子何敢弄我！’……每笞不满十，然一日或至三数。”唐·杨凝《春怨》诗：“绿窗孤寝难成寐，紫燕双飞似弄人。”“弄”字现代仍用，意义未变。

(一三) 头

“大师言：‘汝等十弟子近前。汝等不同余人。吾灭度后，汝各为一方头。吾教汝说法，不失本宗……’”

“头”字出现在 S. 5475 号写本，敦博 077 号作“师”。“头”即为首之人。《旧唐书·外戚·薛怀义传》：“凡役数万人，曳一大木千人，置号头，头一喊，千人齐和。”“头”即是为首者，自然有他人“师”之意。敦博

本作“师”，是较文的说法。此字意义至今未变，如“头儿”、“头领”者是。

(一四) 阿谁

“六祖言：‘神会小僧，却得善业，毁誉不动，余者不得。数年山中更修何道！汝今悲泣，更忧阿谁？忧吾不知去处在？若不知去处，终不别汝……’”

“阿谁”就是谁。《隋唐嘉话》下：“李昭德为内史，娄师德为纳言，相随入朝。娄体肥行缓，李屡顾待不即至，乃发怒曰：‘叵耐杀人田舍汉！’娄闻之，反徐笑曰：‘师德不是田舍汉，更阿谁是？’”^⑬“更阿谁是”即“还有谁是”。《舜子变》：“舜子问云：‘冀郡姚家人口，平善好否？’商人答云：‘姚家千万，阿谁识你亲情？……’”^⑭《茶酒论一卷》：“暂问茶之与酒，两个谁有功勋？阿谁即合卑小？阿谁即合称尊？”^⑮这个词现在仅说“谁”，语助词“阿”多数情况下已消失。

(一五) 前头

“前头人相应，即共论佛义，若实不相应，合掌礼劝善。”

“前头”即“前面”，实即后来、未来、以后。《庐山远公话》：“远公曰：‘阿郎但不用来，前头好恶，有贱奴身在，若也相公欢喜之时，所得钱物，一一阿郎领取。’白庄曰：‘前头事，须好好祇对，远公勿令厥错。’”^⑯“前头好恶”即“未来（的事情）好与不好”，“前头事”即“后面之事”。P. 2633、S. 4129《崔氏夫人训女文》，是女儿临出嫁时母亲的嘱咐之言，内云：“教汝前头行妇礼，但依吾语莫相违。”也是要女儿以后在夫家行妇道，同样指未来之事。《坛经》说“前头人相应”，即“后来人与此相应”。此词现在仍用，在方向上是指前面，如“往前头走”；在时间上仍指未来，如“前头的事谁料得准”。

(一六) 好住

“大师言：‘汝等门人好住，吾留一颂，名《自性见真佛解脱颂》。后代迷人识此颂意，即见自心自性真佛。与汝此颂，吾共汝别。’”

由引文最末一句可知,这是告别时说的话。唐人告别时,留下不走的人对出发者说“好去”,出发者对留下的人说“好住”,均是安慰之辞。敦煌出有一首释子辞曲《辞娘赞》:“好住娘,好住娘,娘娘努力守空房,好住娘。儿欲入山修道去,好住娘……”^⑦通篇所写,都是一位出家人临行时对母亲依依不舍的深情,共用了二十九个“好住娘”,意即“再见吧,妈妈”。唐·元稹《酬乐天醉别》诗:“前回一去五年别,此别又知何日回?好住乐天休怅望,匹如元不到京来。”《伍子胥变文》:“子胥别姊称‘好住’,不须啼哭泪千行。”^⑧《坛经》此处“好住”,用指六祖将与诸弟子门人诀别,是其本义的延伸。

(一七) 过

“真如净性是真佛,邪见三毒是真魔。邪见之人魔在舍,正见之人佛即过。”

“过”即给予。《后汉书·第五伦传》:“[光武]帝戏谓伦曰:‘闻卿为吏蒞妇公,不过从兄饭,宁有之邪?’伦对曰:‘臣三娶妻皆无父,少遭饥乱,实不敢妄过人食。’”《北史》卷三三《李孝伯传附李士谦传》:“有牛犯其田者,士谦牵置凉处,饲之,过与本主。”《阿育王传》卷二:“僧集坐定,王自行水,手自过食与尊者。”《翻诃书一卷》:“欺我,打我,弄我,骂我,只是使我,取此(柴)烧火,独春(春)独磨,一赏不过,犹嗔懒惰。”^⑨“正见之人佛即过”意即:持正见者佛即给予真如净性也。

(一八) 大痴人

“若能身(心)中自有真,有真即是成佛因。自不求真外觅佛,去觅总是大痴人。”

“大痴人”一词意义较为显白,即“大傻瓜”之意。《北史》卷二十八《刘尼传》:“宗爱既杀南安王余于东庙,秘之,唯尼知状。尼劝爱立文成。爱自以负罪于景穆,闻而惊曰:‘君大凝人!皇孙若立,岂忘正平时事乎?’”同书卷三十四《游道传》:“后除司州中从事。时将还邺,会霖

雨，行旅拥于河桥。游道于幕下朝夕宴歌。行者曰：‘何时节作此声也？固大痴！’游道应曰：‘何时节而不作此声也？亦大痴！’”王梵志诗：“天下大痴人，皆悉争名利……”^{②⑩}《坛经》上引文字是说，如能从自心建立真实，即是成佛之因；不从自心去找，求诸外界，便是大傻瓜了。

（原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97—103页）

注释：

- ① 项楚《王梵志诗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73页。
- ② 同上书，第583页。
- ③ 王重民等《敦煌变文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710页。
- ④ 同上书，第171页。
- ⑤ 项楚《敦煌变文选注》，巴蜀书社，1989年，第581页。
- ⑥ 同上书，第739页。
- ⑦ 同注①，第528页。
- ⑧ 同注⑤，第2页。
- ⑨ 同注①，第474页。
- ⑩ 同注③，第171—172页。
- ⑪ 载《藏外佛教文献》第一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39页。
- ⑫ 同注①，第672页。
- ⑬ 中书书局标点本，1979年，第36页。
- ⑭ 同注⑤，第262页。
- ⑮ 同注③，第267页。
- ⑯ 同注③，第176页。
- ⑰ 北图乃字74、S. 1497、P. 2713等。
- ⑱ 同注⑤，第24页。
- ⑲ 同注③，第861页。
- ⑳ 同注①，第771页。

北魏末年修改地、赋、户令 内容的复原与研究^①

——以西魏大统十三年计帐文书为线索

在实行均田令的近 300 年中,自北魏太和九年到唐天宝年间,均田令以及与之相应的赋役令、户令,曾有过多次修改。然而,史籍上留下的各朝田赋户令,却多是各王朝的基本规制。至于在每一王朝统治期内,曾经对田赋户令做过的修改补充,则因史文缺略,或语焉不详,或隐而不显。我们只知道唐代有武德七年令、开元七年令和开元二十五年令,而对唐以前的北魏末年、西魏、北周、北齐、隋朝的田赋户令修改情况,却知之甚少,以致对每一王朝的基本田赋户制也了解得很不完全。这就给研究实行均田令期间田赋户令的详细演变过程带来极大的困难。本文旨在对北魏末年修改地、赋、户令的内容进行复原与研究,不妥之处,恳望指正。

一 西魏大统十三年计帐反映的是西魏 大统制,而非北魏熙平制

我们之所以首先要提出这个问题,是由于在近年发表的研究西魏大统十三年计帐(敦煌文献 S. 0613 号)的论文中,武建国先生《西魏大统十三年残卷与北朝均田制的有关问题》^②一文,认为该残卷反映的地赋户制,就是北魏末年元澄、崔孝芬等人修改过的“地制”。如果这个观

点能够成立,那么,西魏大统十三年计帐就应该成为讨论北魏末年修改地赋户令的全部基础;如果不能成立,我们就要采取别的办法对北魏末年修改地赋户令的内容进行复原。

武建国先生的立论前提,是在赞同周秀女观点的基础上作出的^③。周秀女认为该计帐反映的是北魏太和九年令,武建国则认为它反映的是北魏熙平令,这是他们的不同之点;但认为该计帐反映的不是西魏北周制,二者则是相同的。

该计帐与见于《隋书·食货志》记载的北周田赋令多有不合,因此,它反映的不是北周制,是可以确定的。但它反映的是否是西魏大统制呢?就必须讨论。我们有必要弄清西魏是否颁行过新的田赋制?新制在当时是否立即实行?新制具有什么特点?新制在敦煌地区是否得到有效的贯彻?搞清这些,才能作出确切的回答。

第一,西魏大统十年颁布过新制和《六条诏书》,其中包含均田令和赋役令的内容。

史载大统元年“三月,太祖(宇文泰)以戎役屡兴,民吏劳弊,乃命所司斟酌今古,参考变通。可以益国利民便时适治者,为二十四条新制,奏魏帝行之”^④(着重点为本文笔者所加,下同)。这表明大统元年宇文泰所创新制在当时已开始实行。其后于大统七年“冬十一月,太祖奏行十二条制,恐百官不勉于职事,又下令申明之”^⑤。可见,大统七年宇文泰所创十二条新制也得到了实行。同时担心百官不勤职守,故又下令加以申明。认为新制在当时没有立即实行,显然是困难的。

上述西魏所颁行的二十四条、十二条新制,至大统十年,苏绰加以综合,修改补充,重新颁行。史载:

(大统十年)秋七月,魏帝以太祖前后所上二十四条及十二条新制,方为中兴永式,乃命尚书苏绰更损益之,总为五卷,班于天

下。于是搜简贤才，以为牧守令长，皆依新制而遣焉。数年之间，百姓便之^⑥。

如果说大统元年和七年宇文泰所上二十四条与十二条新制，是以“草案”的方式“试行”的话，那么经过实践，可以确认其大体适用，苏绰再将不适用的部分加以“损益”之后，便以“永式”的方式重新公布于世了。周秀女推测苏绰“损益”新制需要三五年以上的时间，而且以北周行周官及与之同时的田赋制，是在西魏恭帝三年（556，次年改国号为周）颁行，从而认为苏绰修改过的新制也只能在西魏恭帝三年以后实施。这不仅是将官职、田赋两种不同制度的实施年限混淆起来，而且，对西魏、北周田赋制的不同也未加区分，显然是不妥的。

我们说，大统十年颁行的新制包含田令和赋役令，是由于在大统十年颁行的《六条诏书》^⑦中，有“尽地利”、“均赋役”的内容。大统新制和《六条诏书》同时颁布于大统十年，表明二者是密不可分的。如同北魏太和九年颁布均田令，同年十月丁未孝文帝就发布“均田诏书”^⑧一样，《六条诏书》也是为实施新制而专发的。《六条诏书》中说：“租税之时，虽有大式，至于斟酌贫富，差次先后，皆事起于正长，而系之于守令。”说明租税是按照“大式”征收的。这个“大式”应该包含在新制之中。如果大统新制中没有包含田赋令，那么《六条诏书》中的“尽地利”与“均赋役”内容，以及苏绰说的“大式”，就是无的放矢，变得毫无意义。诚如池田温先生所指出：“尽地利，均赋役，即振兴农业生产以使公课的担负获得公平，这一大方针的具体措施，等于均田制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租调役制。”^⑨可以说，西魏大统十年颁行的新制包含着具有西魏特色的田赋制是毋庸置疑的。

第二，大统十年新制中赋役令的特点之一是赋役重，与计帐相一致。

史载[苏]威父(苏绰)在西魏,以国用不足,为征税之法,颇称为重。既而叹曰:“今所为者,正如张弓,非平世法也。后之君子,谁能弛乎?”^⑩苏绰死于大统十二年^⑪。如果他在世时未曾推行新制,那么何以要发出这样的慨叹?此其一。其二,见于大统计帐的赋役额,调布姑且不论,单以租役来说,租,一夫一妇上户四石,中户三石五斗,下户二石;役,实行“六丁兵”制,每丁每年服役两个月,确实很重,与苏绰的话正相一致。

第三,大统十三年时,西魏对敦煌地区的统治十分有效,新制在这里是能够实施的。

敦煌地区自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征服北凉,设镇之后,变为军事要地。魏末六镇叛乱,废镇,改为瓜州(正光五年,524),此后一直在北魏宗室元荣的统治之下。大统十年时,该地区已在元荣的继承者、女婿邓彦(一名刘彦)的统辖之下。大统十一年,宇文泰派给事黄门侍郎申徽为河西大使,密图邓彦。申徽与瓜州主簿令狐整合谋,计擒邓彦。次年,瓜州刺史成庆为城民张保所杀,西魏派独孤信前去征讨。“都督令狐延等起义逐保,启请刺史”。西魏命申徽为假节、瓜州刺史。申徽在瓜州刺史任凡五年,大统十六年才征调入朝,为尚书右仆射、侍中^⑫。在申徽赴瓜州任的同时,西魏又“征[令狐]整赴阙,授寿昌郡守”^⑬。令狐整赴朝之后,宇文护对他说:“以公勋望,应得本州,但朝廷借公委任,无容远出。然公门之内,须有衣锦之荣。”于是乃以其弟“[令狐]休为敦煌郡守”,令狐休“在郡十余年,甚有政绩”^⑭。大统十三年计帐文书中又有效谷县(属效谷郡)和受(寿)昌郡名。因此,至晚从大统十二年起,西魏不仅对瓜州,而且对瓜州属下的寿昌郡、敦煌郡和效谷郡,都开始实行有效的统治,实行新制也就完全可能。

以上考察表明,将西魏大统十三年计帐反映的田赋户制理解为西魏制比较可靠。我国学者王仲荦、韩国磐、唐耕耦诸先生,日本学者山

本达郎、池田温诸先生都是这样看的,理由比较充足,远比作其他解释为妥。

综合以上分析,西魏大统十三年计帐反映的田赋户制,不能作为探考北魏末年修改地赋户令内容的全部基础,必须用别的方法进行研究。当然,这不等于说西魏大统计帐中一点也没有包含北魏末年的地赋户令内容。因为历代田赋户令都有一个继承关系,更何况西魏是从北魏直接分裂出来的。至于计帐中哪些是魏末修改过的地赋户令内容,正是我们要仔细分辨的。

二 北魏末年修改地、赋、户令 内容的复原与研究

这里必须首先说明,自北魏太和九年(485)颁布均田令与次年颁布赋役令起,到北魏分裂为东、西魏(北魏孝武帝永熙三年,534),这49年间,北魏是否对最初颁布的地赋户令进行过修改?回答是肯定的。《魏书》卷一九中《景穆十二王列传·任城王元澄附子元澄传》载:肃宗继位之初,尚书令任城王元澄“又奏垦田授受之制八条,甚有纲贯,大便于时”。同书卷九七《崔挺附子孝芬传》也载:“熙平(516—517)中,[元]澄奏地制八条,孝芬所参订也。”这是见于文献记载的关于北魏熙平改令的极为简略的记载,其“八条”内容却不得而知。其他如太和十九年恢复调绵、麻,迁洛后对还授土地时间的修改等,本文将逐一讨论。总之,太和定令之后,北魏对《地令》、《赋役令》、《户令》都曾作过修改,殆无疑义。

其次,需要说明复原的方法和依据。我们知道,自534年北魏分裂为东、西魏后,西魏、北周与东魏、北齐在数十年间始终处于敌对和战争状态。“东西否隔,二国争强,戎马生郊,干戈日用,兵连祸结,力敌势均”。^⑮因此不存在东魏、北齐抄袭西魏、北周田赋户制而加以实行的可

能,或者相反。可是我们发现,西魏大统十三年计帐反映的西魏田赋户制,与北齐河清三年(564)令,以及河清三年之前北齐实行的某些制度,却有很多相同之处。这些相同的田赋户制内容又与北魏太和九年均田令及太和十年赋役令不同。那么,它们从何而来呢?考虑到西魏、北周与东魏、北齐都是从北魏分裂出来的,那么,这些相同的田赋户制必然来自同一渊源——北魏末年修改过的地赋户令。舍此,很难再作其他解释。以下将逐条予以复原并加以说明。

(一) 成丁年龄由太和令的十五岁改为十八岁,入老年年龄由太和令的七十岁改为六十五(六)岁。成丁年龄组由五十五年缩减为四十七(八)年。

大统计帐反映的西魏制是十八岁“进丁”,六十五岁入老;北齐河清三年令是:“男子十八已上,六十五已下为丁……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调。”^⑩为便于比较,特将西魏、北周、北齐与隋初的黄、小、中、丁、老年年龄列表如下:

朝代	黄年	小年	中年	丁年	入老年年龄	资料来源
西魏	三岁以下	四至九岁	十至十七岁	(男)十八至六十四岁 (女)结婚至六十四岁	六十五岁	大统十三年计帐文书
北周				十八至六十四岁	六十五岁	《隋书·食货志》
北齐		十五岁以下	十六至十七岁	十八至六十五岁	六十六岁	《隋书·食货志》河清三年令
隋初	三岁以下	四至十岁	十一至十七岁	十八至五十九岁	六十岁	《隋书·食货志》开皇二年令

由上表可以看出,这四朝均以十八岁为成丁;入老年龄,西魏、北周同为六十五岁,北齐六十六岁,隋开皇二年六十岁。其中西魏与北齐仅有一岁之差,表明它们有着共同的来源。至于黄、小、中年龄,因与田赋制关系不大,暂且置之不论。

北魏太和九年令虽未明载成丁、中、老年龄,但却有“诸男夫十五已上受露田四十亩”和“进丁受田者恒从所近”^{①7},故知其成丁年龄为十五岁。同时又载:“年十一已上及癯者各授以半夫田,年逾七十者不还所受。”由此又可知其以七十岁为入老年龄,中年是十一至十四岁。此乃史家之通论。对比之下,魏末的成丁年龄组已由太和九年令的十五至七十岁,改为十八至六十五(六)岁,缩减了八年(或七年)。其中进丁年龄改为十八岁早为已故汪钱教授所指出^{①8},只是汪先生的论据我们尚未清楚。

成丁及黄、老、中、小年龄,本属户令范围,但历朝都与田赋令载在一起,如见于《隋书·食货志》的北周、北齐和隋制。这是由于它们本来就不可分割。各种年状年龄界限的变化至关重要,因为它关乎授田与承担课役与否。魏末的成丁年龄组比太和令缩减了八年(或七年),意味着人民负担课役相对减轻。要知,在实行均田赋役令时,是不管是否授足土地,都要按应授田数承担课役的。

(二) 恢复三等户制,使课役负担趋于合理。

见于大统计帐的西魏户等制是上、中、下三等。对于所承担的调额来说,均一夫一妇(一床)布一匹,麻二斤,无户等差别。可是所负担的租额却大不相同:一夫一妇上户四石,中户三石五斗,下户二石。租额中一部分折草缴纳,各户等折草的比率也不相同^{①9}。

北齐的户等制见于河清三年令:“垦租皆依贫富分为三臬。其赋税常调,则少者直出上户,中者及中户,多者及下户。上臬输远处,中臬输次远,下臬输当州仓。”也是三等户制。不过,就租调数量来说,这三等

户只限于缴纳“垦租”，暗示着纳调无户等之分，与西魏颇相一致。

以上表明，西魏与北齐均实行三等户制，而且户等的作用只限于承担租额的多少和负担租调的先后次序，以及输送租调的远近。至于对调额，户等则不发生直接作用。户等对调额不发生作用的原因，大概是授田时，一般先满足桑、麻田，而又基本授足的缘故。至于租额，则因露田实际受田面积差别很大，故不能不作户等的区分。

论者或以为，还在北齐文宣帝时，已“始立九等之户，富者税其钱，贫者役其力”^②，从而认为那时已在租调的负担上实行九等户制。笔者不敢苟同。从“役其力”可知，这个九等户是只管力役的，富人可以不直接服役，而缴纳代役钱，“贫者”则须“役其力”。另外，从北齐河清三年令的如下内容：“率以十八受田输租调，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调”，也可看出，北齐对受田输租调与服力役是分别规定的。因此，适用于服力役的户等，未必能对负担租调的户等发生作用，况且文宣帝时的九等户制到河清定令时是否仍旧保存下来，也令人怀疑。

也有论者认为，西魏三等户制只管租额多少，而不管负担租调的先后次序；北齐户等只管负担租调的先后次序以及输送远近。这也是不正确的。西魏户等不同，负担租额多少也不同，已见于大统计帐。关于负担租调的先后次序，虽不见于计帐，但史书却有记载。

《六条诏书》之六《均赋役》说：“租税之时，虽有大式，斟酌贫富，差次先后，皆事起于正长，而系之于守令。”“斟酌贫富”即据贫富划分户等，“差次先后”即依户等确定负担租调的先后次序。这些都是族长、党正、郡守、县令的职责，是显而易见的。北齐河清三年令云：“垦租皆依贫富分为三皂。”这句话的意义是完整而独立的，说明垦租分三等征收。紧接这句话的下文是：“其赋税常调，则少者直出上户，中者及中户，多者及下户……”是指“赋税常调”的负担先后次序，意义也很清楚。因此，我们可以确定，无论西魏还是北齐，三等户制都是既管负担租额的

多少,又管负担租调的先后次序。至于对调额,则不发生作用。依据我们的研究方法,这种制度也应出现于北魏末年。

准确地说,三等户制并非起于魏末,而是在太和定令之前北魏就实行过的。《魏书·食货志》云,显祖天安、皇兴年间(466—470),“山东之民咸勤于征戍转运,帝深以为念。遂因民贫富,为租输三等九品之制:千里内纳粟,千里外纳米;上三品户入京师,中三品[户]入他州要仓,下三品[户]入本州。”这时的三等九品户只管“租输”多少及输送远近,至于是否也管征发租调的先后次序,则不甚清楚。但它与后来的西魏、北齐之制都是一脉相承的。

可是到孝文帝定均田令和赋役令时,却取消了户等划分,而以三长(邻、里、党)制代之。

史载在设立三长制之初,对于是否要取消户等和实行三长制,曾发生过一场激烈争论。《魏书·李冲传》说,李冲奏行三长制,“著作郎傅思益进曰:‘民俗既异,险易不同。九品差调,为日已久,一旦改法,恐成扰乱。’[文明]太后曰:‘立三长,则课有常准,赋有恒分,苞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何为而不可?’”其他人也发了一番议论。结果是“群议虽有怪异,然惟以变法为难,更无异议。遂立三长,公私便之”。原来行之已久的三等九品户制遂为三长制所取代。但均田赋役令实行一段时间之后,由于其不彻底性和维护私有制的本性,无从改变封建社会小农的贫富差别,这样,恢复旧有的户等之制,以便明确承担租额的多少和缴纳租调的先后次序,便成为必要的了。即如我们在唐代看到的情况,武德六年以三等定户,至贞观九年,又以“未尽其详”,再分为九等^①,其立意都是相通的。

户等的划分,在封建社会里,虽然不能排除官吏及富户的诈伪作弊,但总比分户等而一概承担同样的租额合理一些,如西魏大统计帐反映的情况就比太和赋役令相对合理。这正是魏末恢复三等户制的意

义之所在。

(三)“未娶者(单丁)输半床租调”，“奴婢各准良人之半”。

见于大统计帐的西魏单丁(未婚丁)租调额，是一床的一半。计帐中一床调布一匹，麻二斤；租，上户四石，中户三百五斗，下户二石。单丁调布二丈，麻一斤；租，上户二石，中户一石七斗五升，下户一石。如均以单个丁计算，则未婚单丁与已婚丁(丁男成丁妻)租调负担额相同。计帐中只有丁婢一例，属上户，调布一丈，麻八两(半斤)，租四斗五升。丁婢负担的布、麻又是单丁的一半，租额不足单丁的 $1/4$ 。

东魏、北齐的单丁和奴婢租调额，凡有两条材料。《隋书·食货志》载：“旧制，未娶者输半床租调。阳翟一郡，户至数万，籍多无妻。有司放劾之，帝(文宣帝高洋)以为生事。由是奸欺尤甚，户口租调，十亡六七。”这条材料记载的是文宣帝高洋以前的“旧制”，说明它远在河清令之前。而在此之前又未看到东魏对田赋令的修改。故此，其时间规定性已说明这是北魏末年的制度。至如河清令规定的奴婢租调负担额，则是“奴婢各准良人之半”。我理解这句话是说，单个奴或婢承担单丁(良人)的一半，亦即一床的 $1/4$ ，而非一床的一半^②。如果这样理解不误，那么其基本原则与西魏也是相通的，换言之，它也当源自魏末。

北魏末年的单丁、奴婢租调负担额与太和十年令差别很大。为了便于比较，兹引太和令如下：

其民调，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民年十五已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妇之调；奴任耕、婢任绩者，八口当未娶者四；耕牛二十头当奴婢八。其麻布之乡，一夫一妇布一匹，下至牛，以此为降。

由此可以算出，太和令规定的单丁(年十五已上未娶者)只负担一床的 $1/4$ ；奴婢负担一床的 $1/8$ 。排除已婚、未婚及男女性别差异，单丁租调

额只是已婚丁(丁男或丁妻)的一半,而单个奴或婢仅及已婚丁的 $1/4$,这是非常不合理的。只是因为结了婚,就要比未娶者多负担一倍租调;加之丁女只能受露田四十亩,也要比单丁(授田百亩者)多负担一倍租调,几乎是有些荒唐!因此,必须修改,否则不能促进成丁结婚,为统治阶级增殖劳动力和增加赋役。

魏末改为单丁输半床租调,奴婢各准良人之半,对这两种人来说,租调负担额比太和令增加了一倍。但单丁与已婚丁的负担相同,则是趋于合理的。当然也非绝对合理。因为丁妻只授妇田四十亩,也要与单丁负担同样的租调。所以,尽管改定了租调制,到了北齐,仍是“户至数万,籍多无妻”。这个问题的最后解决,是在隋炀帝“除妇人及奴婢部曲之课”^②之后。说是最后解决,也仅是就令文而言,至于实行过程中的不合理因素,仍不在少数。

(四) 调物品种恢复了桑土调绵、麻土调麻的内容。

由前引太和令可知,太和令只规定桑土地区一夫一妇调帛一匹,麻土地区一夫一妇调布一匹,无调绵与调麻的内容。可是我们在西魏大统十三年计帐中看到,西魏在调布之外,要另外调麻,一夫一妇二斤,单丁一斤,丁婢八两。这是麻土地区。至如桑土地区也要调绵,不应例外。北齐河清三年令规定:“率人一床,调绢一匹,绵八两。”至如麻土地区是否调麻,不见记载。但在授田规定上却有:“土不宜桑者,给麻田,如桑田法。”由是推测,麻土地区在调布之外,还要调麻,是可以肯定的。西魏、北齐在调物品种上都有绵、麻,大致不成问题。

要想搞清西魏、北齐调绵、麻的来源,就需考察一下这两种调物在北魏的演变过程。

《魏书·食货志》在追述太和八年“班百官之禄”以前的北魏租调制时说:

先是，天下户以九品混通，户调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其司、冀……东徐十九州，贡绵绢及丝；幽、平……东海郡之赣榆、襄贲县，皆以麻布充税。

可见，还在孝文帝颁行均田令之前，北魏已有桑土调绵、丝与麻土调麻的规定。但在太和十年定赋役令时，调物中的绵、麻即被取消，已如前述。此后至太和十九年（495），又恢复了调绵、麻之制。《魏书》卷七八《张普惠传》记载，普惠在神龟元年^②上疏说：“伏闻尚书奏复绵麻之调，尊先皇之轨……仰惟高祖（孝文帝）废大斗，去长尺，改重秤，所以爱万姓，从薄赋。知军国须绵麻之用，故云幅度之间，亿兆应有绵麻之利，故绢上税绵八两，布上税麻十五斤。”由是可知，加征绵麻从孝文帝时再度开始。又据《魏书·高祖本纪》，孝文帝“改长尺大斗，依《周礼》制度”^③，是在太和十九年六月戊午下诏实行的。这样就可以看出，北魏于太和十年废调绵、麻之制，中间只有八年未征，便于太和十九年即行恢复。调额是每床绵八两（桑土），麻十五斤（麻土）。

但此制行至宣武帝延昌四年（515）再度停废。上引张普惠疏又说：“自兹（太和十九年）以降，渐渐长阔，百姓嗟怨，闻于朝野。伏惟皇太后（胡太后）未临朝之前，陛下居谅闇之日（宣武帝元恪于延昌四年正月死，孝明帝元诩居谅闇），幸辅不寻其本，知天下之怨绵麻，不察其幅广、度长、秤重、斗大，革其所弊，存其可存，而特放绵麻之调，以悦天下之心。”由此可知，北魏“放绵麻之调”是在延昌四年初。三年之后，即神龟元年（518）尚书“奏复绵麻之调”，故而才有张普惠的上疏，并在疏中详述了调绵麻的行废经过及其利弊。

对于神龟元年尚书的奏议，张普惠并未简单地赞成或反对。他提出：“今若必复绵麻者，谓宜先令四海知其所由，明立严禁，复本幅度，新绵麻之典，依太和之税。”只是要求向天下说明恢复征调绵麻的原因，并

禁止扩大调绢及布的幅度，“新绵麻之典，依太和之税”。新恢复的征绵麻之制，是否“依太和之税”了呢？从北齐河清三年令调绢之外，调绵八两可知，至少北齐与太和十九年制相同。估计恢复后的调绵额仍是每床八两。至于征麻的数量是否仍如太和十九年之制，每床十五斤，则不得而详。大统十三年计帐中每床调麻二斤，比太和十九年令少得多，也许从神龟元年后就开始减少了吧？至于其数量，恐怕不一定是每床二斤。但可以确定的是，在太和十九年恢复征绵麻之后，其间虽有延昌至熙平间的短暂中断，但至神龟元年就又恢复了。

北魏于神龟元年再度恢复征调绵麻，为文献所证实。《魏书·食货志》载：“三门都将薛钦上言：‘计京西水次汾华二州，恒农、河北、河东、正平、平阳五郡，年常绵绢及_下麻皆折公物，雇车牛送京。道险人弊，费公损私。’”因此他提出舍陆就船，以便输送。薛钦说的这些地区“年常绵绢及_下麻皆折公物”，只是表明这部分地区将应纳的绵绢和_下麻作了折造，而不直接输送绵绢和_下麻；但反过来看，这些地区依制度应调绵绢和_下麻则是可以确定的。薛钦上书之后，尚书度支郎中朱元旭也表达了对此议的一些看法。而据《魏书·朱元旭传》，朱元旭任尚书度支郎中是在神龟(518—519)前后^②。这表明，神龟元年尚书提出“复绵麻之调”的奏议很快得到了实施。此后直至北魏分裂为东、西魏也未见变化。

由上述比较分析可以明确，西魏大统十三年计帐的调麻与北齐河清三年令的调绢，均非新创，而是遵循北魏制而来，所宗魏制，又非与太和均田令几乎同时颁行的太和十年赋役令，而是孝文帝恢复旧制，到神龟元年又加以改定的制度。当然，不能排除西魏、北齐自己也做了修改，但就加征绵麻这两种调物品种来说，则全是源自太和十九年后的魏制，殆无疑义。

(五) 还授土地的时间，由太和令的每年正月改为十月。

从大统计帐中看不出西魏还授土地的时间。但史载“北齐给授田

令(疑‘令’字有误),仍依魏朝。每年十月,普令转授。”^⑦由“仍依魏朝”一语可知,北齐每年十月还授土地之制是继承魏制而来,明白易晓,无须赘言。

太和令的规定却是:“诸还受民田,恒以正月。”对比之下,北魏在太和定令后确实将还授土地的时间作了修改。北魏无论最初在正月,还是后来改为十月还授土地,都有其历史和自然条件的客观现实性。我们知道,太和定令时,魏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地处雁门关以北。那里以种植谷子、莜麦、胡麻等为主,辅以少量的春小麦,不种植过冬作物。因此正月既是一年之始,也是春耕和一个农作周期之始,在正月还授土地是适宜的。而当迁都洛阳之后,以洛阳为中心的广大中原地区,气候与农作周期和平城有很大差异。黄河中下游地区以种植冬小麦为主,十月既是一个农作周期的结束,也是下一个农作周期的开始。如果仍以正月还授土地,那么当农户在种植冬小麦时,还不知道他耕种的土地到还授时能否归自己占有,他能精耕细作么?因此,必须将还授土地的时间改到十月,以适合中原地区的农作周期性。虽然在十月还授土地,于农时节令不乏紧迫之感,但对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却是适时的。自此以后直至唐代,都在十月还授土地,其原因也不外乎此。可以说,北魏对还授土地的时间进行修改是自觉的,其时间当在太和十七年(493)迁都洛阳之后。同时,单从这一修改也可看出,北魏均田令是实施过的,虽然带有很大的不彻底性。如果均田令不曾实施,那么将还授土地的时间进行修改以适合农作周期,就无法解释了。

(六) 增加官吏职分田,一人一顷,以供刍秣。

《通典》卷二引宋孝王《关东风俗传》云:“魏令,职分公田,不问贵贱,一人一顷,以供刍秣。”这“一人一顷,以供刍秣”的“职分公田”,无论在给予对象上,还是在数量上,以及用途上,与太和令都有明显的区别。

太和令规定:“诸宰民之官,各随地给公田。刺史十五顷,太守十

顷，治中、别驾各八顷，县令、郡丞六顷。更者相付，卖者坐如律。”由这条令文我们至少知道如下几点，(1)所给予的田地是“公田”，“更者相付”，亦即更换职务时即须交给继任者；(2)不许买卖，“卖者坐如律”；(3)授予的对象是地方“宰民之官”；(4)给予公田的数量因职务不同而有多寡之分；(5)这些田土作何使用，不明确。通常都理解这是职分田，应该是正确的。

对比之下，《关东风俗传》所引“魏令”“一人一顷”土地的使用却是明确的。按，“刍秣”一词，《周礼·天官·大宰》“刍秣之式”疏：“养牛马禾谷者。”意即是说，所给予的公田是用于种植牛马饲料的土地。但是，如果将太和令规定的给予刺史以下各级地方官十五至六顷不等的“公田”，也理解为用于种植牛马饲料，显然十分困难。反过来，也不能想象，北魏末期已将各级官吏的“职分公田”，“不分贵贱”地均按一顷给予，这在整个实行均田令期间是找不到先例或后例的。因此，我认为，尽管太和令和《关东风俗传》所引“魏令”所给予的这部分土地均是“公田”，或“职分公田”，但它们应是两种不同的“职分田”。“一人一顷”的“刍秣”“公田”，是在太和令职分田基础上加给的。

北魏所以要加给官吏人各一顷职分田，以供刍秣，也有其历史与自然条件的原因。太和定令时，魏都平城，实行均田也以平城为中心。所以，它给予刺史以下各级官吏的职分田，不排除其中一些用于种植牛马饲料，但绝大部分还是应该用于种植粮食。但当迁都洛阳之后，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自然使田土种植小麦等农作物获利更大，因此，官吏职田也当更多地用于种植小麦等粮食作物。而起家于北方的拓跋鲜卑民族却还有其放牧的习惯，这是必须考虑的。这样，在已有的职分田之外，再给一人一顷职分公田，“以供刍秣”，也就相当必要。可见，所给的刍秣公田，与其说是照顾全体官吏的需要，倒不如说主要是照顾鲜卑官僚的生活习惯。

日本学者堀敏一先生注意到太和令规定给予的职分田仅限于地方官,而没有京官。因此他认为,“一人一顷的‘职分公田’可以认为主要是以京官为对象的。”^⑧这似乎难以令人信服。试想,地方官职田尚有十五顷至六顷的节级差别,而京官的职田却可以“不分贵贱”,概以一顷授给么?这是违背情理的。至于太和令为何没有京官职分田的规定,似应另作考虑,这里不赘。

从前述分析可知,北魏给官吏一人一顷刍秣公田的时间,可能是在迁都洛阳之后。不过,这一顷职分田到北魏分裂为东、西魏时却起了质变。《关东风俗传》在记述前引“魏令”之后又说,“自宣(孝)武出猎以来(按,指西奔长安,投靠宇文泰),始以永赐,得听卖买。”原来的一顷“职分公田”至此变为私有土地了。职是之故,北魏给官吏的刍秣田制也就至此终结,对后世未产生影响。真正对隋唐职分田制产生影响的,还是太和定令时所给的那部分职分田。

以上复原出的六条魏末令文内容,(一)(二)属于户令,(三)(四)属于赋役令,(五)(六)属于地令。这只是就我们目前能够见到的出土文书和文献记载进行的,而且采取的是比较推理的方法(其中(四)、(五)、(六)三条均有确凿的文献记载)。但是,只要我们的研究方法合乎逻辑,符合北朝的历史实际,大概还是可以成立的。同时,这些复原出的地赋户令内容,也不可能是魏末修改地赋户令内容的全部。比如,仅元澄就“奏垦田授受之制八条”,而我们仅复原出六条。至于这六条中,哪些是元澄修改过的“地制”内容,限于资料,也无从案断。但基本都是不同于太和令的魏令,则可以相信。

三 关于应授田数和狭乡授田原则

作为《地令》的核心内容,当是应授田数和授田原则。太和令执行

数十年后,应授田数在北魏末年修改过没有呢?其时狭乡授田遵循着怎样的原则呢?

武建国先生首次明确提出,大统十三年计帐中的应授田数,是按照狭乡正田减宽乡之半的原则确定的。这一点十分重要,应当视为对研究该计帐的新见解。不过,也有意犹未尽之处,需要再作论证和说明。

要想说明西魏实行着狭乡正田减宽乡之半的原则,就需要搞清西魏宽乡的应授田数、田地类别和亩积。西魏宽乡应授田数,史书缺少直接记载,所以迄今为止,笔者还未见到有人论及于此。

我们已经说明,西魏新制和《六条诏书》均颁布于大统十年,而且诏书是为实行新制专发的。虽然新制内容史书上一条也未记载,但在《六条诏书》中我们却发现了西魏宽乡应授田数。《六条诏书》之第三条“尽地利”云:“夫百亩之田,必春耕之,夏种之,秋收之,然后冬食之。”在这句话之后苏绰又说:“三农之隙,及阴雨之暇,又当教民种桑、植果,艺其菜蔬,修其园圃”云云。其中“种桑、植果”等内容,本是北魏太和九年定令时,对桑田作物和种植枣果的规定。在其后第六条“均赋役”中,苏绰还说过“绢乡先事织纴,麻土早修纺绩”的话,这些内容也与均田土地直接相关。把这些话综合起来看,“百亩之田”的记载出现于《六条诏书》,不应是泛泛之论,而就是西魏大统新制规定的宽乡应授田数。由计帐文书又知,西魏时仍有正田与倍田之分^②。这样,这“百亩之田”的田地种类和数量应该分解为:桑田 20 亩+正田 40 亩+倍田 40 亩=100 亩,一如北魏太和之制,也与北周、北齐、隋、唐的宽乡应授田数相同。这就表明,自北魏太和定均田令,直至唐代,田令规定的宽乡应授田数一直是一百亩,未曾变化。只是北魏、西魏将露田区分为正田和倍田,以后合并为露田或口分田,不再做这样的区分罢了。

太和令已有“土广民稀之处”和“地狭之处”,亦即宽乡与狭乡的区别,以及相应的授田原则。其狭乡授田原则是:“诸地狭之处,有进丁受

田而不乐迁者，则以其家桑田为正田分，又不足不给倍田，又不足家内人别减分。无桑之乡，准此为法。”“不给倍田”是处置狭乡授田的主要原则，桑土、麻土均同，已为史家所共认。西魏宽乡的应授田数已由前述考证得知，是桑田二十亩，正田四十亩，倍田四十亩，与北魏相同。在正常情况下，狭乡也应是不给倍田，只授桑田二十亩，正田四十亩。这样的狭乡授田原则不仅见于其前的太和令，而且也为其后的唐代制度所证实，西魏之制不应例外。

奇怪的是，我们在西魏大统计帐中看到了这样的情况：狭乡麻土地区的露田，不仅不给倍田，而且又将正田减了一半，即正田丁男二十亩，丁女十亩，丁婢十亩（丁奴当是二十亩）。这该如何解释呢？

对于这个问题，日本学者池田温 and 堀敏一先生提出过不同的解释。堀敏一先生认为，大统计帐中的“露田即正田，不给倍田，且比原来规定的男夫四十亩、妇女二十亩少一半。这就是‘家内人别减分’。”^③足见他力图用太和令“又不足，不给倍田，又不足家内人别减分”这条原则进行说明的。池田温先生则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太和令的这个规定是在“进丁受田时，在田地不宽裕的情况下，从该户内各人的受田份分出一部分，充当进丁分，而不是规定一般狭乡中应受田额基准减半”^④。但对于大统计帐中出现的上述那种情况究竟应当做何解释，池田温先生也未能提出自己的确切看法。

首先，在对于上引北魏太和令文的理解上，我们应当看到：第一，实行“家内人别减分”的做法只限于同室之内，而不具有普遍性。第二，由于各户原有授田丁和实际授田面积有多寡不同，新进丁口也有丁男和丁女的区别，而且丁男和丁女授田额也不同，因此，“家内人”各减多少“分”以给新进丁口，也只能视具体情况而定，尚难划定一个统一的标准。这样看来，在对太和令文的理解方面，池田温先生的意见可能更加确切。

其次，我们必须承认，西魏大统计帐反映出的狭乡正田一律减半确

实具有普遍性,与太和令的规定不能等同视之。我们已经明确,西魏宽乡应授田数和狭乡不给倍田的原则与北魏太和令没有区别,但并不等于到西魏时处理狭乡授田的原则仍旧一成不变。尽管封建国家在授田方面有一个基本的规制,但并不排除在国家实在拿不出土地以行还授,而狭乡丁口又不愿意迁往宽乡的情况下,采取某种临时性的变通措施,即不仅不给倍田,而且再将正田一律减半,作为狭乡应授田数。恩格斯指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②事实上,历朝封建政府虽对均田令有一个基本的规定,但这个规定仍是不断处在局部修改、补充、调整之中。由于史书保存的材料太少,极易造成我们对某些历史事件的凝固性认识,这是必须注意的。假使所言不谬,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均田令的实际执行过程,不仅表现为田令规定的应授田数和实际授田数的矛盾,而且也表现为某种临时性的处置措施同田令的差别。实际授田数同田令距离很大,与临时确定的标准也有差距。大统计帐中正田数人各减半,是否就是某种临时变通性的措施呢?大概只能有待于今后再有新的出土文书才能给予证实了。

对于这个问题,目前确实还不能给予最后说明。笔者也只是提出一些推测性的意见,以供各位同仁研究时参考。

最后要指出,太和令规定的桑田、麻田数,至魏末均未变化,而且无宽、狭乡之别,一如太和令。西魏的桑田数,我们在前述分析《六条诏书》中的“百亩之田”时已指出,当是二十亩;麻田数则见于大统计帐,丁男十亩,丁女五亩,丁婢五亩(丁奴当为十亩),正好与太和令的麻田数相合。北齐的桑田(永业田)数见于河清令,每丁二十亩,麻田数不见记载,估计也与西魏及北魏相同。此其一。其二,以往在解释太和令“诸麻布之土,男夫及课,别给麻田十亩,妇人五亩,奴婢依良,皆从还受之法”时,不少论者将麻田解释为露田,从而认为也在还授之例。麻田和桑田同属世业田性质,如同正田与倍田同属露田一样,在大统计帐中反

映得明明白白。导致误解的原因,在于对上引令文最末一句“皆从还受之法”理解不确。其实,这句话的意义要宽阔得多。在它之前的令文中,既说明了露田要还授,又说明了桑田不还授。因此,应该理解为:“该还授的还授,不该还授的不还授。”麻土地区种麻不种桑,桑土地区种桑不种麻,桑田不还授,麻田自然也不还授。至于露田,不论桑土还是麻土,依令都是要还授的。

(原载《出土文献研究续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263—276页)

注释:

- ① 均田令在隋唐称为“田令”,在北魏称为“地令”。《魏书》卷四一《源贺附子思礼传》:“诸镇水田,请依〈地令〉分给佃民,先贫后富。”为行文方便,本文在总论各朝时称为田令、赋役令、户令,或合称为田赋户令;在言及北魏时则称地令、赋役令、户令,或合称为地赋户令。
- ② 载《思想战线》1984年第2期。
- ③ 周秀女《从敦煌户籍残卷S. 0613号看北朝均田制的若干问题》,载《浙江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
- ④ 《周书》卷二《文帝下》。
- ⑤ 同注④。
- ⑥ 同注④。
- ⑦ 《周书·苏绰传》。以下引《六条诏书》概不出注。
- ⑧ 见《魏书·食货志》。
- ⑨ 《中国古代籍帐研究》,龚泽铎译本,中华书局,1984年,第138页。
- ⑩ 《隋书·苏威传》。
- ⑪ 同注⑦。
- ⑫ 《周书·申徽传》。
- ⑬ 《周书·令狐整传》。
- ⑭ 《周书·令狐整附弟休传》。
- ⑮ 《周书》卷六《武帝纪》史臣曰。
- ⑯ 《隋书·食货志》。以下引河清三年令概不出注。
- ⑰ 《魏书·食货志》。以下引太和均田令概不出注。
- ⑱ 《对北魏均田令条文的解释》,载《魏晋隋唐史论集》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1981年,第52页。

①⑨ 唐耕耦:《西魏计帐文书以及若干有关问题》,载《文史》第九辑。

②⑩ 《隋书·食货志》。

③⑪ 《资治通鉴》卷一九四贞观九年三月条。

④⑫ 对于河清三年令的这条规定,学者们在理解上有很大差异。日本学者堀敏一先生认为:“北齐以后……良口夫妇的租调额多少也发生了变化,而单丁(未婚单丁)和奴婢皆变为良口夫妇的二分之一。”(《均田制的研究》,中译本,第209—210页)我认为理解单丁是良口夫妇的1/2是正确的,但所谓的“奴婢各准良人之半”,是指“准”单个良人之半,而非良口夫妇一床的一半。故单个奴或婢只负担一床的1/4,而非1/2。这个看法与西魏大统计帐正相符合。当然我是把它们当作共同源自魏末的赋役令来处理的。《隋书·食货志》中记载的隋开皇二年令,在讲过以一床为单位的租调额后说:“单丁及仆隶各半之。”将单丁和仆隶都规定为良口一床的一半。因此我认为,奴婢与良人单丁租调负担额的相同,是至隋初才出现的,而北齐河清三年令那句话则不具备这样的意义。

⑤⑬ 《隋书·食货志》。

⑥⑭ 《通典》卷五《赋税中》云:“孝明帝时,张普惠上疏”云云,具体时间不太清楚。《通鉴》系张普惠上疏于梁武帝天监元年,即北魏神龟元年(518);《魏书·张普惠传》上疏中有“则高祖之轨中兴于神龟”,故知普惠上疏是在神龟元年,以《通鉴》为是。

⑦⑮ 《通鉴》卷一四〇齐明帝建武二年(北魏太和十九年,495)曰:“[六月]戊午,魏改用长尺、大斗,其法依《汉志》为之。”将孝文帝去长尺、废大斗,说成“改用长尺,大斗”,实误。所言“依《汉志》为之”,与《魏书·高祖本纪》“依《周礼》制度”也不同。

⑧⑯ 《魏书》卷七二《朱元旭传》:“频使高丽,除尚书度支郎中。神龟末,以郎选不精,大加沙汰。元旭……以才用见留。”可知朱元旭任尚书度支郎中是在神龟前后。

⑨⑰ 《通典》卷二《田制下》。

⑩⑱ 堀敏一《均田制的研究》,中译本,第195页。

⑪⑲ “倍田”不见于计帐。但文书中有正田,而正田是与倍田对应的名称,故西魏有倍田是可以确定的。

⑫⑳ 同注⑳,第147—148页。

⑬㉑ 《均田制——关于六世纪中叶的均田制》注⑰,转引自堀敏一《均田制的研究》中译本,第148页注①。

⑭㉒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40页。

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代均田制研究

北魏太和到唐代开元天宝年间实行近三百年之久的均田制，一直是二战后研究中国中古社会性质和土地制度的大课题。近几十年来，由于敦煌、吐鲁番发现的大量唐代手实、户籍文书相继面世，经中外学者悉心考释，倾力研讨，对唐代均田制的认识得以日渐明晰。

“均田制”这一概念，若望文生义，极易理解为“均分土地的制度”，其实这同其本意大相径庭。“均田”一词，并不始自唐代，也不肇端于北魏孝文帝。《汉书·王嘉传》载，王嘉上疏中云：“诏书罢苑，而以赐[董]贤(驸马都尉)二千余顷，均田之制从此坠坏。”孟康注道：“自公卿以下至于吏民名曰均田，皆有顷数，于品制中令均等……”《史记·商君(鞅)列传》亦有“卒定变法之令……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的记载。可知，“均田制”的本始含义是按等级高低不同，占田多少有差；同一等级者，占田数额相等。其思想产生可远溯战国。至唐代，作为封建国家法典的《唐律疏议》亦曾规定：“王者制法，农田百亩，其官人永业准品，及老、小、寡妻受田各有等级。”其法律含义与战国、汉人所言“均田”一脉相承。无论从史源学和唐代立法，还是从敦煌吐鲁番文书所载均田制执行的实际，都不能认为均田制是均分土地的制度。

作为封建中央王朝的土地管理法规，唐代均田制包括内容十分广泛：职田、公廨田、驿田、屯田、贵族品官永业田、百姓百亩之田、寺观僧尼道士占田、商人占田等都在其内。但就其主导方面，则是贵族品官永

业田和百姓百亩之田两项内容。

唐令规定,贵族品官受永业田包括职、散、勋、爵四类人:职事官从正一品到从九品下阶,散官五品以上,勋官从上柱国到武骑尉,爵位从亲王到男爵,各个等级占田从100顷到60亩不等,同一等级则数额均等。同时,所“受”田土数额只是允许占田的最高限额,并非实授,不足者可以“请授”,超过者即“占田逾制”,国家要行使权力加以干预,进行“括田”。由于敦煌、吐鲁番地处唐朝边陲,从文书中还很少能看到高品官员的大数额占田,但史籍却不乏记载。人们从文书中看到的以勋官占田实例为多,但多数勋官“已授田”远不足额。它印证了唐令规定的勋官授田数实际上只是允许占田的最高限额,并非实授。尽管文书中职、散、爵占田实例尚少,但窥斑知豹,从勋官占田的实际情况可以推测,唐令所以规定贵族品官“永业田”数,是既保证各类官人在占有土地方面享受特权,但同时又要加以限制,以防土地急遽兼并。另一方面,唐令还规定,官人永业田“皆传子孙,不在收授之限”,由此又知,贵族品官的永业田是其私有土地;文书所见勋官的“勋田”自不例外,只是封建国家对其最高数额加以限制而已。

相对贵族品官永业田而言,无论是史籍留存的唐令法定内容,还是从敦煌吐鲁番文书所见实例,普通民户的“百亩之田”都要丰富得多,从而人们在这个问题上也就获得了多层次、多侧面的深刻认识。敦煌文书中的《大足元年沙州敦煌县效谷乡籍》(P. 3557、P. 3669),《开元十年沙州敦煌县悬泉乡籍》(P. 3898、P. 3877),《天宝六载敦煌郡敦煌县效谷乡□□里籍》(S. 4583),《天宝六载敦煌郡敦煌县龙勒乡都乡里籍》(P. 2592、P. 3354、罗振玉旧藏、S. 3907),《大历四年沙州敦煌县悬泉乡宜禾里手实》(S. 514);吐鲁番文书中的《贞观十四年九月安苦啍延手实》,《武周载初元年西州高昌县宁和才等户手实》,以及大谷文书中的“欠田簿”、“退田簿”、“给田簿”等,都为研究唐代均田制增添了不可多

得的珍贵资料。

唐令规定,普通民户中的丁男和十八岁以上的中男可“受”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八十亩,是为宽乡之制;狭乡则口分减半,即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四十亩。其他还有关于老男、笃疾、废疾、中男、小男及寡妻妾等“受田”的定制。这一制度,由敦煌、吐鲁番文书得到了证实。唐代敦煌属宽乡、吐鲁番属狭乡,故文书中这两个地区丁男应授田额分别为一百亩和六十亩,其他人口应授田数也与唐制相合。

唐制丁男应授田百亩,其思想渊源同样十分古朴。《孟子·梁惠王上》有“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百亩之田,勿夺其时”的说法;《荀子·大略篇》有“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的记载;《汉书·食货志》载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利之教,亦言一夫“治田百亩”;同志又载古制“民受田,上田夫百亩,中田夫二百亩,下田夫三百亩”;西魏时,苏绰在著名的《六条诏书》中也说:“夫百亩之田,必春耕之,夏种之,秋收之,然后冬食之。”由上看出,五亩之宅,百亩之田,是封建时代小农经济的理想产物,其渊源可溯自春秋战国时代的儒家学说。后世由西晋占田制,中经北魏均田制,又经西魏北周、东魏北齐、隋朝直到唐代的均田制,思想体系概出一源。唐代规定丁男和十八岁以上中男“授田”百亩,正是由此衍化而来。成丁和十八岁以上中男授田百亩,老男、中男、寡妻妾“授田”各有等差,同一等级授田均等,这同样也是“均田”。

如同贵族品官永业田是法定允许占田的最高限额,丁男的百亩之田和其他人口所占田数也是法定允许的最高限额,并非实授。不足可以“请授”,超过则须“还公”。就敦煌、吐鲁番两地实际授田情况来看,绝大多数民户都未达到“应授田”额,因此户籍上关于土地通常罗列的大项目有:“应授田”、“已授田”和“未授田。”“应授田”是该民户可以占有土地的最高限额,“已授田”是户籍上该民户实际占有土地的数额,“未授田”是户籍上实有土地数额同允许占有土地最高限额之间的差

数。但如果超过“应授田”数,那就是“占田过限”,封建国家也要行使权力进行干预,不过,文书中这种情况比较少见。

就户籍上应授田数和已授田数的关系而论,学者们发现,应授田数相同的民户,已授田数却很悬殊;应授田数不同的民户,已授田数却有不少相同或相近,实际情况千差万别。由此获得认识,应授田数同已授田数之间不存在相应的关系,换言之,民户的已授田不可能来自官府的平均分配。

再就户籍上已授田中的永业田和口分田的关系而言,学者们同样发现,在登录户籍时,一般都是先满足永业田,剩余部份则归入口分田,甚至还出现如下情况:将一整块田地上的一部分登为永业田,剩余部分登为口分田,如大历四年宜禾里手实唐元钦户,“一段叁拾伍亩 廿一亩永业 一十四亩口分”,显然,想在这三十五亩土地上区分出哪二十一亩是永业田,哪十四亩是口分田,是绝不可能的。其他类似的混合登记文书还有多件。它们一致表明,户籍上的所谓“永业田”和“口分田”,只是一种登记形式,不存在根本的性质差别,其实都是民户的私有土地。

此外,人们从文书中还看到,有的民户“已授田”中包括了“买田”。将买来的田地也记入“已授田”,就更证明了“已授田”属于民户的私有土地。

除以上诸端,敦煌、吐鲁番文书还表明,唐代除封建中央王朝规定有应授田额,亦即允许占田的最高限额,各地因具体情况不同,在实际调解民户占田数额的过程中,另有“乡土法”存在。“乡土法”今不见于唐代史籍,但在日本令中有所保存。唐令规定,丁男在宽乡可占田百亩,狭乡可占田六十亩,只是其基本规制,具体到各个地区,则须视情况要另作“乡土法”。在敦煌,一般授田标准额(乡土法)为:丁男、中男二十亩,当户主的小男及老男、寡妇等非丁男口十亩,勋官三十到五十亩;在吐鲁番,丁男、中男十亩,老男、寡妇四亩,当户主的小男、丁女、老男、

寡妇五亩。这就是说,当地官府判定一个民户是否授足土地,虽然户籍上的“应授田”额是以中央制度计算的,但实际执行中并不以唐令规定的“应授田”额为基准,而是以当地平均授田标准额为准绳。民户的欠田、退田、授田都是以此为依据进行的,至少在敦煌、吐鲁番两地是如此。这显示了唐朝国家制度的原则性和实际执行中灵活性的一致。

对于均田制实行中民户土地的欠、退、授,人们从敦煌、吐鲁番文书,尤其是从大谷文书(主要出自吐鲁番)中的“欠田簿”、“退田簿”和“给田簿”获得了较为明确的认识。首先,这些文书证明了土地还授曾经实行过,从而不能认为唐朝均田令只是一纸具文而无实际意义;其次,民户土地的回授数额一般都很小,是在一、二亩或二、三亩之间,这是由于吐鲁番地区已垦土地本就很少所致;再次,民户退田“还公”主要限于以下几种情况:绝户退田、逃户退田、死亡后“户内回授”仍有剩余退田,此外还有其他几种。绝户和逃户都是土地无人继续耕种,易致荒芜,为法律所不容许;死退则是因户内人口自然减少,其地除回授户内其他人口充作永业口分外,仍超过当地的授田标准额,则须将多余部分退出“还公”,以授受田不足户;第四,还、授土地都须经过严格的程序:欠田户户主要向里正呈递辞文,请受土地,退田户户主要向里正呈报退田原因及应退亩数。这两种文案由里正造成“欠田簿”和“退田簿”,上报县衙。县令核实后,再据本县欠田和退田的实际情况,由属吏造出“给田簿”,县令据之在规定时限内“对共给授”,并立具文案,登入户籍。农民这一小额土地的所有权便由此转移,但并未改变其私有性质;第五,县令在授田时要遵循“先课役后不课役,先无后少,先贫后富”的原则,无论贫富,能否承担课役是第一位原则,其次才是有无土地,第三才是贫富等第。它表明,封建国家之所以要在民户之间进行小额土地占有的调整,其首要目的是保证国家能征收到赋役,不是要在民户中间平均分配土地,这恰同封建国家的剥削本质相表里。

概而言之,唐代均田制的实质,是封建中央集权国家的土地管理法规。其核心内容是保障贵族品官在土地占有方面享受特权,但这个特权并非无限,而是要有所限制;对于普通民户来讲,则是力图保障其能够占有小块土地,以维持正常的社会生产和生活。这也正是其立法精神之所在。如果将均田制错误地理解为平均分配土地,或者以民户“已授田”是否达到“应授田”额去衡量,自然就会得出均田制未尝实行的结论;但如果我们把握了它的本质含义,那么敦煌、吐鲁番文书就已经昭示,这一土地管理法规是毫无疑义地实行了的。根据敦煌、吐鲁番文书,并结合唐代史籍进行研究,多数学者日益认识到,从总体上看,唐代是一个以私有经济为主体的封建社会,私有土地制度是唐朝封建统治大厦赖以存在的主要经济基础。

总之,敦煌吐鲁番文书已经极大地推进了唐代均田制研究。但并不等于所有问题都已完全解决,如对户籍上的“自田”、“部田”等,至今仍聚讼纷纭;又如均田制是否在内地也得到推行,认识也不一致;即便是对大谷文书中的欠田、退田、给田文书,至今也还有完全不同的理解。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的认识会逐步接近并最终获得一致。

(原载《中国文化》第2期,1990年6月,第9—11页)

《张淮深变文》“驄马政”考实

项楚先生在《〈敦煌变文集〉校记散录》一文中，曾对《张淮深变文》中的“驄马政”一词做过解释。项先生说：

去岁官崇驄马政，今秋宠遇拜貂蝉。（第124页）

“驄”当作“总”，“驄马政”与“拜貂蝉”为对，谓总领天下之马政，即官拜太仆卿之意。《旧唐书·职官三·太仆寺》：“卿之职，掌邦国厩牧、车舆之政令，总乘黄、典厩、典牧、车府四署及诸监牧之官属。”即所谓“总马政”也。至于《张淮深变文》的“总马政”，只是说官拜太仆之衔，并不是实际执掌马政之事^①。

实在说，将“驄马政”改为“总马政”，并解释为“太仆卿”之职，并不是一个新观点。1937年，孙楷第先生在其名作《敦煌写本〈张淮深变文〉跋》中就说：“颂赞云：‘去岁官崇总马政。’则谓加授太仆。”^②1962年，唐长孺先生在《关于归义军节度的几种资料跋》一文中也以“驄马政”作“总马政”；但对“总马政”的具体所指，唐先生则不轻下断语^③，足见十分审慎。

然而，《张淮深变文》原写“驄马政”不误，不烦改“驄”为“总”。“驄马政”是一个历史典故，出自《后汉书》卷37《桓荣附桓典传》，现引录如下：

[桓]典字公雅,复传其家业,以《尚书》教授颍川,门徒数百人。举孝廉为郎。居无几,会国相王吉以罪被诛,故人亲戚莫敢至者。典独弃官收敛归葬,服丧三年,负土成坟,为立祠堂,尽礼而去。辟司徒袁隗府,举高第,拜侍御史。是时宦官秉权,典执政无所回避。常乘驄马(引者按:即青白色马),京师畏惮,为之语曰:“行行且止,避驄马御史。”④

由上引文可知,桓典是一个刚正不阿之士。他可以为王吉弃官治丧;任侍御史时又不畏宦官恶党,“无所回避”。因其平日爱乘青白色马,故被时人誉为“驄马御史”,以至成为一个历史典故。

这个典故在以下几种书中均有引例:《初学记》卷12《侍御史第八殿中、监察御史附》之“避马”一目⑤,《艺文类聚》卷92《兽部上·马》⑥,《通典》卷24《职官六·侍御史》⑦,《太平御览》卷227《职官部二五·侍御史》。⑧

其实,这个典故早在唐以前就已多次被文人墨客引入诗作之中了。

南朝(梁)刘孝威《和王竟陵爱妾换马诗》曰:“驄马出楼兰,一步九盘桓。小吏赎金络,良工送玉鞍。龙骖来甚易,乌孙去实难。骖胶妾犹有,请为急玄弹。”⑨

南朝(陈)刘删《赋得马诗》曰:“独饮临寒窟,离群思北风。陈王欲观舞,御史自随驄。边声陨客泪,叶下益桃红。恒持沛艾影,解向平陵东。”⑩

南朝(陈)王由礼《赋得驄马诗》曰:“善马金鞮饰,蹀影复凌空。影入长城水,声随胡地风。控欲青门外,珂宣紫陌中。行行若不倦,唯当御史驄。”⑪

南朝人在诗作中将御史官职同“驄马”相连,正是由于汉人桓典的历史典故,殆无疑义。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张淮深变文》中的“驄马政”应是一个同御史台官员有关的官职,而不是所谓管马政的太仆卿。1986年,我在《张淮深平定甘州回鹘史事钩沉》一文的注五十七中,就已引过桓典的历史典故,并指出:“后世多用为御史或执法严峻之典。”^⑩唐朝《骆宾王集》五《幽繫书情通简知己诗》中也用过这个典故:“驄马刑章峻,苍鹰狱吏猜。”^⑪惜未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对于张淮深此官究系何职,现在再论列如下:

《张淮深变文》云:“去岁官崇驄马政,今秋宠遇拜貂蝉。”由“去岁”和“今秋”可知,张淮深被授予“驄马政”官职是在被授“貂蝉”官的前一年。这个“貂蝉”官,经唐长孺先生考证,系指散骑常侍^⑫。那么,“驄马政”究系何官呢?

我们已经明确“驄马政”典出御史台官员,则张淮深的这个官职必是御史台官职,在唐代,则应是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侍御史三者中的一个。

在现存敦煌所出有关张淮深升迁仕历的资料中,以《敕河西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为最详,内云:

公(按:即指张淮深)则故太保之贵侄也。芝兰异馥,美彻窗(聪?)闻。诏令承父之任,充沙州刺史,左骁卫大将军。初日排蹊,三端继政,琴台旧曲,一调新声。嫡嗣延英,承光累及,筌修贵秩,忠恳益彰,加授御史中丞。河西创复,犹杂蕃浑,言音不同,羌龙温末,雷威慑伏,训以华风,咸会训良,轨俗一变。加授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⑬

我们看到,张淮深的沙州刺史和左骁卫大将军二职,系承袭其父张议谭之职,不属进加之官,可置不论。而在张淮深被加授左散骑常侍兼

御史大夫之前,他只加过一次官,即“加授御史中丞”。就《变文》言,在加授“貂蝉”官(左散骑常侍)之前一年,他被加授过“驄马政”,即御史台官职,难道同碑文所载不是十分一致的吗?因此,张淮深的“驄马政”一职当即碑文所载的“御史中丞”官。这同“驄马御史”的出典及张淮深的加官仕历都是完全吻合的。

这里还有两点需加说明:

一是张淮深头一年被加授的御史中丞官,在次年加授左散骑常侍时,同时升为御史大夫了。《变文》由于文体制约,不能全面反映这些历史内容;而作为散文的碑文,却记录得更为全面、准确,正是其珍贵之处。二是《变文》记叙张淮深这两种官职,用的是文学语言和历史典故,而碑文用的是职衔名称。寻找这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正是我这篇小文的目的,也是我们正确阐释“驄马政”一词所必需的。

以上所说如有不妥,还望项楚先生和各位博学通人有以教之。

(原载《1994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纪念敦煌研究院
成立50周年·宗教文史卷·上》,甘肃民族出版社,
2000年,第357—361页)

注释:

- ① 载《敦煌语言文学论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77页;又见项著《敦煌文学丛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404页。
- ② 周绍良、白化文编《敦煌变文论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724页。
- ③ 沙知、孔祥星编《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63页。
- ④ 中华书局标点本《后汉书》,第5册,第1258页。
- ⑤ 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册,第293页。
- ⑥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新1版,第1616页。
- ⑦ 中华书局标点本《通典》,1988年版,第669页杜佑原注。
- ⑧ 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版,第1076页。

⑨ 见《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新1版，第1621页。

⑩ 同上。

⑪ 同上。

⑫ 《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86年，第5期，第76页。

⑬ 又见《全唐诗》卷79。

⑭ 同注③。史料见《通典》卷21《职官三·散骑常侍》，又《唐六典》卷8《门下省·左散骑常侍条》：“冠武冠，皆银钅附蝉为文，貂尾为饰，谓之貂蝉。”

⑮ 荣新江《敦煌写本〈敕河西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校考》，载《周一良先生八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210页。

也谈张淮深之死

唐末沙州归义军主政人张淮深之死一案，向为学界所瞩目。学者们见仁见智，聚讼纷纭。近来，敦煌研究院李永宁先生发表《竖牛作孽，君主见欺——谈张淮深之死及唐末归义军执权者之更迭》^①一文，牢牢抓住《张淮深墓志铭》^②中“竖牛作孽，君主见欺”一语，追根溯源，掌握了问题的关键之所在。笔者受其启迪，继续探讨，以期向史实靠近。

一 关于“竖牛作孽”

竖牛作孽，典出《左传·昭公四年》，已为李先生探明。但对这一典故的细节，似乎还有深究的必要。为了获得准确认识，现将《左传》中的相关文字节录如下：

初，穆子去叔孙氏，及庚宗，遇妇人，使私为食而宿焉……适齐，娶于国氏，生孟丙、仲壬。梦天压己，弗胜。顾而见人，黑而上倮，深目而猥喙，号之曰：“牛助余”，乃胜之。旦而皆召其徒，无之。且曰：“志之……”既立，所宿庚宗之妇人，献以雉。问其姓，对曰：“余子长矣，能奉雉而从我矣。”召而见之，则所梦也。未问其名，号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视之，遂使为竖。有宠，长使为

政。……田于丘获，遂遇疾焉。竖牛欲乱其室而有之，强与孟盟，不可。叔孙为孟钟，曰：“尔未际，飧大夫以落之。”既具，使竖牛请日。入弗谒。出命之日，及宾至，闻钟声。牛曰：“孟有北妇人之客。”怒将往，牛止之。宾出，使拘而杀诸外。牛又强与仲盟，不可。仲与公御莱书观于公，公与之环，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谓叔孙：“见仲而何？”叔孙曰：“何为？”曰：“不见。既自见矣，公与之环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齐。疾急，命召仲，牛许而不召。（笔者案，后仲壬归国，仍为竖牛杀害）

杜泄见，告之饥渴，授之戈。对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竖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见人。”使置馈于个而退。牛弗进，则置虚，命彻。十二月癸丑，叔孙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

关于竖牛的结局，《左传·昭公五年》又记载：“昭子即位，朝其家众，曰：‘竖牛祸叔孙氏，使乱大从，杀嫡立庶，又披其邑，将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杀之。’竖牛惧，奔齐。孟、仲之子杀诸塞关之外，投其首于宁风之棘上。”^③以上便是竖牛作孽的始末。

这个典故有如下要点：（一）竖牛和孟丙、仲壬是同父异母兄弟而不和，竖牛为庶子，孟丙、仲壬为嫡子；（二）竖牛之所以搞了那么多欺骗父亲的勾当，是“欲乱其室而有之”；（三）竖牛之所以是竖牛，就是因为他杀害兄弟而逼死父亲；（四）竖牛作孽之后，自己并未继位，而是“立昭子而相之”；（五）昭子对竖牛并未宠信，必欲杀之，竖牛终被孟丙、仲壬的儿子杀死。

历史不可能依样画葫芦地重演。但《张淮深墓志铭》的作者张景球使用这个典故来暗喻张淮深之死，其死因必然同“竖牛作孽”之典相去不远，否则使用这个典故就没有意义。我们应当沿着这条线索去继续寻找张淮深的死因。

二 S. 5630《张淮深造窟记》的启示

P. 3720《张淮深造窟记》是张淮深开凿莫高窟第 94 窟的文字记录，为学术界所公认。但是以往人们只瞩目此件，而忽略了同一内容的另一种抄本，即 S. 5630 号。此件前后上下均有残缺，保留文字不及 P. 3720 为多。但尾部 7 行残文，为 P. 3720 所无，其中有张淮深的子嗣名单。现将尾部 10 行逐录如下（行次为笔者所加，非原行）：

1. [] 胜司斯毕，功将就焉。夫人 []
2. [] 德，淑行兼仁，闺门处治理 []
3. [] 尊不弃于蚕桑，在贵不忘 []
4. [] 受宠光，花笈出降于 []
5. [] 虔诚奉托，共建莲宫，远 []
6. [] 延晖、次延礼、次延兴④、次延嗣、次 []
7. [] 称龙驹，学通九部之书，更 []
8. [] 堪柱石，他年捧钺，承(?)德 []
9. [] [] 龙之族。宗人敦煌释门 []
10. [] 三年之内，实效驱驰，成吾 []

第 4 至 10 行是 S. 5630 比 P. 3720 多出的文字。结合 P. 3720 可知，这部分内容是在叙述完张淮深开凿第 94 窟的功德后，接着对其夫人颍川郡君陈氏和子嗣进行赞美。第 6 行提到的人名有：延晖、延礼、延兴、延嗣四人。可惜文字残失严重，否则张淮深儿子的名字还能再见到一些。

《张淮深墓志铭》中，与他同时殒毙的除夫人颍川郡君陈氏，还有六

子，即“长曰延晖，次延礼，次延寿，次延愕，次延信，次延武等，并连坟一莹。”其中延晖、延礼同见于 S. 5630《张淮深造窟记》残文，但延兴、延嗣二人，《墓志铭》却未提及。延兴、延嗣同是张淮深之子，但张淮深被杀时他们并没有死。此外还有张淮深一女也没有死^⑤。可以推测，如果 S. 5630 保存完整的话，那么张淮深可能还有一些未被杀掉的儿子名列其中。以往认为张淮深“举室殒毙”的说法是不合事实的。

同是张淮深之子，为何在一场变乱中有的被杀掉，有的却仍活着？这种现象同“竖牛作孽”之典又有何关系？

目前尽管资料奇缺，但我们不难做出如下推测：在这场“变生肘腋”的祸乱中，张延兴、张延嗣二人同其父张淮深及张延晖等六兄弟，还有张淮深夫人陈氏并非同一势力集团。如果是同一势力集团的话，那么延兴、延嗣二人也同样在劫难逃。

前已指出，“竖牛作孽”的特点之一是杀害兄弟还逼死父亲。我们认为延兴、延嗣二人同其父张淮深等人不是同一势力集团，那就不能排除张淮深等人死于延兴、延嗣之手的可能。如果这个推断不误，则延兴和延嗣既杀了父亲，又杀了兄弟，同室操戈，与竖牛的行为正相一致。

“竖牛作孽”的另一特点，是他作乱之后自己并未继位，而是立了其父之庶子叔孙姁（即昭子）并辅佐他。目前普遍认为张淮深死后首继其位者是张淮鼎^⑥。如果结合“竖牛作孽”来考虑，那么张淮鼎就应是延兴、延嗣扶立起来的。至于张淮鼎究系何人，因材料过分贫乏，还缺乏更深入的了解。但据其“淮”字行，可知是张淮深的同辈兄弟。李永宁先生认为他是张议潮之子，恐怕仍有可商之处。我认为他不一定是张议潮之子，而可能是张淮深的异母兄弟，即张议谭之“庶子”。

据 P. 2762《张淮深修功德文》断片所载，张淮深之父张议谭在咸通八年张议潮入京之前，已“先身入质”，后以七十四岁之龄死于长安永嘉坊之私第。夫人巨鹿郡君索氏亦死于长安，“敕祔葬于月登阁北莹”。

这是随同张议谭入京的一房夫人。此外,我们发现张议谭还有另一房夫人。P. 3552 有四篇《儿郎传》,其中第二篇云:

驱傩圣法,自古有之,今夜扫除,荡尽不吉,万庆新年。长使(史)千秋万岁,百姓猛富足钱。长使大唐节制,无心恋慕腥羶。司马敦煌太守,能使父子团圆。今岁加官受爵,入夏便是貂蝉。太夫人表入之后,即降五色花笺。正是南杨(阳)号国,封邑并在新年……从此敦煌无事,城隍千年万年。

对于这篇《儿郎传》,我在《张淮深平定甘州回鹘史事钩沉》^⑦一文中已做过较为详细的考证,证明其中所载是唐中和三年(883)到四年(884)张淮深两次平定甘州回鹘时的史事,其作成时间在中和四年除夕。文中提到“太夫人表入之后,即降五色花笺,正是南阳号国,封邑并在新年”,说明张淮深的南阳郡开国公封爵是由于“太夫人”在中和四年给皇帝上表求授而得,并非自封。这位太夫人亦应是张淮深之母,同前述与张议谭“连轳归覲”并客死于长安的索氏夫人并非一人。可知张议谭至少有两房夫人。既有两房夫人,于夫人来说就有妻、妾之分,于子嗣则有嫡、庶之别。考虑到张淮鼎与张淮深均以“淮”字行,则张淮鼎是张议谭之庶子、张淮深之庶母兄弟的可能性也就非常之大。进而也就可以推测,张延兴、张延嗣杀死父兄之后,立了其父之庶母弟,亦即他们的叔叔而继位。再比较“竖牛作孽”之典,竖牛立的是其父叔孙豹之庶子,即他的兄弟辈人,而张延兴、张延嗣立的则是其父之异母兄弟。所立者辈分虽有差别,但均属“庶”出。

那么这场公案的基本情况应该是:张淮深的儿子张延兴、张延嗣杀死了张淮深和延晖、延礼等六兄弟及张淮深夫人颍川郡君陈氏,然后扶立张淮深的异母兄弟张淮鼎主政。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相似事件,《张淮

《深墓志铭》的作者张景球才用“竖牛作孽”之典暗示这一血案，并表示自己的愤懑。

三 张淮深死于阍墙之争的家庭因素

李永宁先生认为张淮深死于阍墙之争，这是对的。不过，认为张淮深死于张淮鼎之手，却令人生疑。如果是淮鼎杀死了淮深，那么比照“竖牛作孽”之典，就只有杀死兄弟一节，既无逼死父亲的一节，也无扶立一节。再者，若淮深死于淮鼎之手，那么，延兴、延嗣能不为其生父报仇么？张淮鼎为何又要留此祸根呢？显然这样解释颇有困难。而依据我们上面的分析，则同“竖牛作孽”之典几尽一致，而且也可大致说明为何延兴、延嗣二人未被同时杀害，以及张淮鼎继掌归义军大政而未被立即推翻之一节。

这里我们再对张淮深死于阍墙之争的家庭因素略作分析。将 S. 5630《张淮深造窟记》同 P. 2913《张淮深墓志铭》综合统计，张淮深至少有 8 个儿子，他们是：延晖、延礼、延寿、延鐸、延信、延武（以上为被杀者）、延兴、延嗣。依其排行来看，在 S. 5630《张淮深造窟记》中，延兴、延嗣排在延晖、延礼之后，而在《墓志铭》中延晖是长子，这样就可知延兴、延嗣是张淮深之第三、第四子。他们同大哥延晖、二哥延礼岁数相去不应太远，而长于其他四子。那么，这八个儿子会是同母所生么？看来可能性不大。除此八子之外，张淮深至少还有一个女儿，即那位“周故南阳郡娘子张氏”^⑧。由于资料极少，我们无从得到张淮深子女的总数字，但仅据断简残编就已知张淮深有 9 个子女。可以推断，实际数字可能还要多。众多的子女为同一夫人所生，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妻妾制度是中国古代封建地主阶级婚姻家庭的一大特点，张氏家族亦然。张议潮有几房夫人，我们不得而详，但《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

功德记》就已提到,李明振之妻是“南阳郡君张氏,即河西万户侯、太保张公第十四之女”,可知张议潮至少有 14 个女儿,他绝不是只有一房夫人,而是几房夫人。张淮深的父亲张议谭至少有两房妇人,前已知。那么作为张议潮继承人的张淮深也不可能只有一房妇人,因为我们现知他至少有 9 个子女,实际数字可能还多,不会是一母所生。

妻妾矛盾和嫡庶之争历来都是封建家庭的大难题,也是封建家长常常束手无策的问题。即使像唐高祖李渊,也无良策解决太子李建成、四子李元吉同李世民之间的纷争,最终演出了“玄武门之变”的流血事件,遑论执政于边陲的张淮深!张淮深被杀时年已 59 岁,虽不算高龄,但可以想见其子多已长成,尤其是延晖、延礼、延兴、延嗣这四个较大的儿子更当如此。其时中原多故,华土不宁,唐王朝气将不国,而张氏两代在沙州执政已有 40 余年之久,军政大权均在手中。那么张淮深身后孰继大权,不能不成为诸子最关心的现实问题。正是围绕这一利益攸关的问题,张氏家族演出了一幕血案,张淮深也不幸殒毙于其子之手。考虑到竖牛是以庶子杀嫡子的,而张淮深也不只一房夫人,我认为张延兴、张延嗣是张淮深庶子的可能性同样很大。

张氏家族的阍墙之争实际是一件丑闻。正由于此,作为张氏大家族成员的张景球,在为其“府君伯”张淮深作墓志铭时才不直书其事,而用曲笔,大概也是出于家丑不可外扬的考虑。如果张淮深死于他姓之手,那么可以相信,除了某种不得已的缘故,张景球都会直书其事,大加笔伐的,而他却不这么做。这也反证张淮深是死于阍墙之争,张景球确有难言之隐。出于愤激和无奈,他才在《墓志铭》中“铭曰”:“哀哉运戏,蹶必有时。言念君子,政不遇期。竖牛作孽,君主见欺。殒不以道,天胡鉴知?南原之礼,松楸可依。千古之后,世复何之?……”愤激和悲悯之情跃然纸上。

对于张淮深的死因,持论可谓多矣。然而不论哪种观点,至今都受

到资料的严格限制,只能是推测,本文也不例外。然而,这或许对最终解开此谜仍不无助益?

(原载《敦煌研究》1988年第1期,第76—80页)

注释:

- ① 载《敦煌研究》1986年第2期。
- ② 编号 P. 2913。
- ③ 引自《春秋左传集解》,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
- ④ 原件草书作“𠂔”,本字当是“𠂔”,即“兴”字俗体。
- ⑤ 见 P. 3556《周故南阳郡娘子张氏墓志铭》。
- ⑥ 《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作“张淮□”,缺字李永宁先生据《伯希和笔记·敦煌洞窟题记》释为“鼎”。笔者未睹原件,姑从李说。
- ⑦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5期。
- ⑧ 同注⑤。

敦煌文献《河西都僧统悟真 处分常住榜》管窥

敦煌文献 P. 2187 号存有一件归义军时代的文书,很久以来,深受中外敦煌学者的密切关注。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学者们对其所包含的深刻内容,不断有所发明。不过,也并非没有再加深究的余地。这里即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再做一些探讨。对于文书中“常住百姓”的身份和经济地位,以及它对寺院的人身依附关系,前贤论列已多,不是这里讨论的重点。这里着重对文书本身的一些问题进行讨论,以就正于中外博雅之士。

一 现存文书录校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现存这件文书并非原始文件,而是后人的重抄件,而且未抄完即行搁笔。P. 2187 总共有三项内容:《破魔变一卷》、《四兽因缘》和本件文书。在《破魔变一卷》之后,原有抄写者的题记:“天福九年(944)甲辰祀黄钟之月蕓生拾叶,冷凝呵笔而写记。居净土寺释门法律沙门愿荣写。”而同号三件的笔迹完全相同,可知这件不完整的文书也是由愿荣抄写的。在敦煌文献中,即便是原始文书,错讹衍倒也司空见惯,更不用说是经后人之手再抄一过或几过的文书。职是之故,现存这件文书有不少晦涩难明之处,中外学人的录文也就出现了一些差别。现据缩微胶卷,并吸收中外学者的意见重新过录。对于各

家不同意见以及笔者的认识,出注予以说明。

1. 因兹管内清泰,远人来暮(慕)于戟门。善能抑强,龙家披带而生降,达讷似不呼

2. 而自至,昔为狼心敌国,今作百姓驱驰。故知 三宝四王之力,难可较量,陪(倍)^[1]更遵

3. 奉盈怀,晨昏^[2]岂能懈怠。今既二部^[3]大众,于衙悬诉,告陈使主,具悉根源,

4. 敢不依从众意。累 使帖牒,处分事件,一一丁宁,押印指搦,连粘留符^[4],合

5. 于万固。应诸管内寺宇,盖是先 帝敕置,或是贤哲修成,内外舍

6. 宅、庄田,因乃信心施入,用为僧饭资量;应是户口家人,坛(檀)越将持奉献,永

7. 充寺舍居业。世人共荐共扬,不合侵陵,就加添助,资益崇修,不陷不倾,

8. 号曰常住。事件一依旧例,如山更不改移。除先故 太保诸使等世上给状

9. 放出外,余者人口,在寺所管资庄、水碓、油梁,便同往日执掌任持(住持执掌)^[5]。自

10. 今已后,凡是常住之物,上至一针,下至一草,兼及人户,老至已小,不许

11. 倚形恃势之人,妄生侵夺,及知典卖。或有不依此式,仍仰所由具

12. 状申官,其人重加形(刑)责;常住之物,却入寺中,所出价直(值),任主自折。其

13. 常住百姓亲伍礼,则便任当部落结媾为婚^[6],不许共乡司百姓

14. 相合。若也有违此格,常住丈夫私情共乡司女人通流,所生男女,

15. 收入常住,永为人户驱驰,世代出(无)容出限^[7]。其余男儿丁口,各须随

16. 寺料(科)役,自守旧例,不许(下空)^[8]

校记:

[1] 陪:原文如此。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四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9月,第158页)从原字,未作校改。仁井田陞《唐末五代的敦煌寺院佃户关系文书》(原载《西域文化研究》第二册,译文载《敦煌学译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56页)已注意到“陪”字可能有问题,故特别注明“原文如此”。藤枝晃《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始末〔四·完〕》(《东方学报》京都版第十三册之二,1942年8月)也注意到这个字可能有误。谢和耐《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耿昇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33页)认为“陪”乃“倍”字之别,故在原文后括出以示校改。姜伯勤在其论文《论敦煌寺院的“常住百姓”》(载《敦煌研究》1982年试刊第1期)改“陪”作“倍”,但在其专著《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中华书局,1987年,第150页)又从原字作“陪”,不知何故?按,在敦煌吐鲁番文献中,倍、陪、赔三字常常互借,其例甚多,不必赘证。今从谢和耐氏之说。以下凡引上述论著,除必要者,概不出注。

[2] 晨昏:唐耕耦将此二字属上读,成“陪更遵奉盈怀晨昏,岂能懈怠”,实误。二字当从诸家属下读。

[3] 二部:谢和耐氏在“二部”后的括弧中注为“僧和尼”,姜伯勤从其说,认为是“僧尼二部大众”,这是需要商榷的,详正文。

[4] 符:唐耕耦录作“傅”,误。当从诸家之说。

[5] 执掌任持:此句颇难索解。姜伯勤、仁井田陞、藤枝晃、谢和耐均照录不改。唐耕耦、韩国磐(见译作掘敏一著《均田制的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03页)改“任”为“住”,当是。但“执掌住持”仍难通解。我意原文当作“便同往日住持执掌”。“住持”乃一寺之主,田宅、产业、人口均在其执掌之中。

[6] 其常住百姓亲伍礼,则便任当部落结媾为婚:唐耕耦将“则”字属上读,成“亲伍礼则”,当从诸家属下读。又,“亲伍”不辞,疑有误;“礼”字疑是“里”

字之别,详正文。

- [7] 永为人户驱驰,世代出(无)容出限;除唐耕耦外,诸家均断句为:“永为人户,驱驰世代,出容出限。”案,“永”与“世代”为对文,均是永久之意,故唐氏断句甚是,今从之。出(无)容出限;姜伯勤、仁井田陞、藤枝晃、谢和耐均从原字不改;唐耕耦、韩国磐认为当作“不容出限”,颇有见地。然我意以作“无容出限”更妥。S. 2575 背六《普光寺道场司差发榜》第9—10行“如有不来者,必当重罚,的无容免”,可比证。
- [8] (下空);姜伯勤、谢和耐、唐耕耦注“以下空白”或“下空”;仁井田陞、韩国磐、藤枝晃注为“下阙”或“以下阙文”。按,原文书的确未抄完,“不许”二字后是空白,注“下空”即准确表明原未抄完。

二 文书原形成年代推测

前已说明,这件文书并非原始文件,而是五代时沙门愿荣的重抄件,且未抄完,故尔未见明确纪年。对于原文书的形成年代,学者们曾有过许多推测性意见。那波利贞先生认为,这份文书的写成年代虽是五代初期,但以其文句的内容来说,大概在中晚唐时代就已经实行了。藤枝晃先生认为是张议潮去世(872)之后的张氏时代的,仁井田陞先生赞同藤枝氏的意见^①。谢和耐先生认为“可以确定为九世纪末到十世纪初”^②。姜伯勤先生则认为“很可能写于索勋篡权期间”^③。应该说,这些意见都很有参考价值。但所定年代,或嫌疏阔,或理据欠足,因此仍需细究。

学者们普遍注意到,文书中有“除先故太保诸使等世上给状放出外”一语,认为这个“故太保”是指张议潮,因此文书成于张议潮去世(872)后的一段时间里,这是可以认同的。

此外,文书中还有更为重要的信息:“龙家披带而生降,达讷似不呼而自至,昔为狼心敌国,今作百姓驱驰。”其中“达讷似”的族属与性质,因资料有限,尚待考实,但龙家即龙部落的族属以及他们在公元九世纪八十年代中叶的活动情况,却是大致清楚的。

S. 389 号是肃州防戍都归义军衙门的一件报告文状,详细叙述了甘州回鹘同龙家之间的和断情况,所记为某年十月三十日到十一月九日间事,内云:

今月七日,甘州人杨略奴等五人充使到肃州,称:“其甘州,吐蕃三百,细小相兼五百余众,及退浑王拨乞狸等,十一月一日并往归入本国。(中略)先送崔大夫回鹘九人,内七人便随后寻吐蕃踪迹往向南;二人牵拢嘉麟,报去甘州共回鹘和断事由。其回鹘王称:“须得龙王弟及十五家只(质)便和为定。”其龙王弟不听充只(质):“若发遣我回鹘内入只(质),奈可自死!”缘弟不听,龙王更发使一件,其弟推患风疾,不堪充只(质)。更有迪次弟一人及儿二人内堪者,发遣一人及十五家只(质)。得不得,取可汗处分。其使今即未回。

其龙王衷私发遣僧一人,于凉州温末首令(领)便(边)充使。将文书称:“我龙家共回鹘和定,已后恐被回鹘侵陵。甘州事,须发遣温末三百家已来,同住甘州,似将牢古(固)。如若不来,我甘州便共回鹘为一家,讨你温末,莫道不报。”

其吐蕃入国去后,龙家三日众衙商量,城内绝无粮用者。拣得龙家丁壮及细小壹百玖人,退浑达票、供榆昔达票、阿吴等细小共柒拾贰人,旧通颊肆拾人,羌大小叁拾柒人,共计贰佰伍拾柒(捌)人,今月九日并入肃州,且令逐粮居(下阙)

经研究,这件状文作成于中和四年(884)十一月^④。所叙述的是甘州回鹘同龙家之间的和断(即谈判媾和)情况。后因缺粮,龙家无法在甘州居住下去,于是移往肃州“逐粮居”住,归降于归义军政权的统治。正因有此事件的发生,故次年即唐光启元年(885),张大庆在其所抄《沙

州伊州地志》残卷中说：“龙部落本焉耆人，今甘、肃、伊州各有首领。其人轻锐，健斗战，皆禀皇化。”^⑤

以上说明，龙家是在中和四年(884)冬归降于归义军政权管辖的。而本文讨论的这件文书称“龙家披带而生降”，显然也是说龙家刚刚归降的情况。如果相距时日已远，文书也就不会再用这种因欣喜而溢于言表的语气了。

姜伯勤先生同样注意到“龙家披带而生降，达讷似不呼而自至”这两句话在确定本文书年代时的重要价值。他将这两句话同《张淮深造窟记》^⑥中相似的文句加以比较，并参照其他敦煌文献，认为“本件文书可能写于张淮深之时”。但同时又说：“从文书中提到‘先故太保诸使等世上’，则追溯到不止张淮深一代，至少有二代始可称‘等世’，因之，本件亦很可能写于索勋篡权期间。”对此，我认为“故太保”是指张议潮，“诸使”范围却较广，既可是节度使，又可是沙州刺史等。“先”字在这里既是“故太保”的限定语，又是“诸使”的限定语。那么就不能不考虑张淮深之父张议谭曾任过沙州刺史^⑦的问题。至于“等世”，则不能独立成词，“等”字当属上读，“世”字当属下读。“世上”即在世期间。这样，“先故太保诸使等世上给状放出”，说的就是张议谭、议潮时代的情况。换言之，文书当成于张淮深时代，即唐中和四年(884)稍后不久的光启年间(885—887)。这同前述龙家投归归义军政权的时代背景是完全一致的。退一步讲，就是再将文书形成年代的时限放宽，也不会晚于张淮深死去的大顺元年(890)。

三 文书的整体性

我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由于不少论者在研究这件文书时，往往只强调“常住百姓”的各种问题，而忽略了其他方面。因此，必须将文书当

作一个整体看待,才能确定“常住百姓”在其中占有的位置。

细审原文书,现存内容大致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由开头至“合于万固”(1至5行),是讲所以要发这个文件的原因。第二部分由“应诸管内寺宇”至“便同往日住持执掌”(5至9行),是说明寺院财产及人户的来源,凡“常住”“一依旧例”,“更不改移”。第三部分由“自今已后”至末尾“不许”二字(9至16行),是强调寺产及人户不受侵犯,以及对违犯者的处置方法。我们必须将这三部分内容连贯对待,才能对文书有一个全面、清晰的认识。

首先,发出文书的缘起是由于龙家和达讷似的投诉。文书对这两个部落百姓的归服,表示了由衷的喜悦,并将这一成就归功于“三宝四王”之伟力。接着称:“今既二部大众,于衙恳诉,告陈使主,具悉根源,敢不依从众意”云云。“二部”何所指?谢和耐先生在“二部”后的括弧中注为“僧和尼”,其后姜伯勤先生踵其说。我们不知将“二部”理解为“僧和尼”的根据究竟何在?也许是因为在敦煌文献中“二部”常常用指“僧”和“尼”两个部落的缘故。但在本件文书中却很难作这样的理解。我认为,文书开头已讲到龙家和达讷似的归降,龙家又称“龙部落”,见于前引张大庆抄《沙州伊州地志》残卷,显然这里的“二部”只能是龙家和达讷似两个部落,而非用指其他,更不可能是“僧和尼”。龙家和达讷似之所以要到归义军使衙向张淮深恳切投诉,显然是发生了某种事情,而他们自身又无力对付,只好求助于官府力量的保护。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才使这两个部落不得不投诉于归义军节度使衙呢?由于原文书未作交待而不甚明了,但仍可据文书下文作一些推测。文书称:“自今已后,凡是常住之物,上至一针,下至一草,兼及人户,老至已小,不许倚形恃势之人,妄生侵寻,及知典卖。”如果其时没有发生过形势户即地方豪强对寺产及人户的侵夺和典卖,文书这段文字便成为无的放矢了。反之,便可获知,正由于出现了这类情况,龙家、达讷似深受其

害,又无力抗拒,才不得不向归义军节度使衙投诉。寻求保护,进而才有本文书的产生。

其次,龙家、达讷似仅是“常住百姓”的一部分。谢和耐先生在征引文书开头关于龙家、达讷似归服的文字后注道:“这卷文书意味着在沙州寺院的民户中有许多胡族人。”^⑧这是完全正确的。令人惋惜的是,他却将此后的“二部”理解成了“僧和尼”,由此偏离了研究这件文件的正确轨道。我们知道,大中二年(848)张议潮起义之后,对于境内的少数民族,曾将一部分划为乡管百姓,另一部分则仍保留了原有的部落组织^⑨。而张淮深时代,归义军政权还曾将一些归降的少数民族部落安置在寺院中,成为“常住百姓”,前人对此措意不多,而由本件文书得到证实。如果其时龙家、达讷似未曾安排在寺院中,成为“常住百姓”的一部分,那么文书在处理有关问题时,就不会只强调“常住”,而不过多地谈论这两个部落的问题。而发出文书的缘起却是这两个部落的投诉,显然他们已包含于“常住百姓”之中,否则就是牛头不对马嘴了。

再次,文书中的处理意见,既是面对所有常住百姓的,又考虑到了少数民族的特性。文书称:“其常住百姓亲伍礼,则便任当部落结媾为婚,不许共乡司百姓相合。”按,“亲伍”不辞,疑有误;而“亲伍礼”至今仍难索解。我怀疑“礼”乃“里”字音同而别。如果推断不误,文书强调的就是,在常住百姓“亲伍里”,本部落结媾为婚,而不许同乡管百姓通婚,其着眼点恰在于常住百姓中的某些少数民族特性问题。文书下文云:“其余男儿丁口,各须随寺科役。”如果“常住百姓亲伍礼(?)”是指所有的常住百姓,那么“其余男儿丁口”又是指什么人?显然“常住百姓亲伍礼(?)”与“其余男儿丁口”都只是常住百姓的一部分。而“当部落”也就是“本部落”。似乎可以说,文书所谈的婚姻问题,是直接针对少数民族而言的。通观文书中对于婚姻问题的处理意见,我认为有两层含义:一是常住百姓不许同乡管百姓通婚,二是在常住百姓自身范围内,少数民

族自相婚配。诚然,由于“亲伍礼”三字至今不能通解,我这个意见仍仅是推测性的。

概而言之,本件文书的产生是由于龙家和达讷似向归义军节度使衙投诉而引起;其时归义军所管寺院中有一些少数民族民户居住,成为“常住百姓”的一部分,在婚姻问题上,规定“常住百姓”不能同乡管百姓通婚,而在其内部,各少数民族则在本部落里通婚。文书中的龙家、达讷似和“二部”、“当部落”之间有内在联系,不宜割裂。

四 文书的定名

迄今为止,由于学者们对文书的内容和性质在理解上存在不少差异,因而也就给出了许多不同的名称。那波利贞先生是最早研究这件文书的,他定名为《维护寺院特权宣言》^⑩,而藤枝晃先生则定名为《安堵寺院常住状》^⑪。据仁井田陞先生介绍,藤枝晃定名中的“安堵”一词是借助于日语而使用的,因而他不赞同藤枝氏的定名。至于仁井田陞本人,则未专门讨论本文书的定名问题,只是在一个注中称为《敦煌寺院维护常住文书》^⑫。谢和耐先生虽然也研究了这件文书,但却未给出一个他认为合适的名称。唐耕耦先生称之为《保护寺院常住物常住户不受侵犯帖》。姜伯勤先生则定名为《敦煌诸寺奉使衙帖处分常住文书》,并认为:“从这篇文字来看,本件内容当是一件以使衙帖文(通知书一类的下行文书)为法律根据的榜文,即公告。”^⑬

以上诸家所定名称,实际上反映了对这件文书的研究不断深入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学者们的认识越来越接近文书的实质了,但仍然不尽人意,似乎也还有加以讨论的必要。

我认为,要给这件文书确定一个准确的名称,必须把握如下几个问题:(一)文书是由哪个部门或哪个人发出的;(二)文书属于什么性质;

(三)文书的主体内容是什么。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将其名称确定得更加精确。

细读文书不难发现,现存部分有五处空字以示尊敬(即敬空)。它们是:(一)“故知三宝四王之力”;(二)“告陈使主”;(三)“累使帖牒”;(四)“盖是先帝敕置”;(五)“除先故太保诸使等世上”。其中(一)(四)两项在文书产生的时代任何人都可使用,姑置不论,其余三项则应引起重视。第(五)项在张议潮去世后,归义军节度使衙和敦煌僧俗民众也都可以使用,仍然不能用于讨论文书的定名。真正具有价值的是(二)(三)两项。我们从敦煌文献中看到,归义军节度使在其所下发的公文中可以自称为“使”,见于 S. 1604 第一件张承奉的帖文,但却未见自称为“使主”的。“使主”是归义军政权的下属部门和人员对于节度使的尊称,见于 S. 1604 第二件帖文。而且从使用敬空来说,只有臣下对主上才使用,这一制度为唐代公式令中的平阙式所规定^⑭,但后来在归义军政权的上下级关系上也广泛地使用了。从使用敬空和“使主”这一称谓看,可以断定,这件文书不是归义军节度使衙发出的,而是由它属下的某一个部门发出的。

其次,文书也告诉了我们接受文书的部门和对象。文书称:“事件一依旧例,如山更不改移。……余者人口,在寺所管资庄、水碓、油梁,便同往日住持执掌。”住持是寺院的主管,即三纲(寺主、上座、都维那),时称“纲管”。文书又说:“或有不依此式,仍仰所由具状申官。”“所由”是唐代公文中的习惯用语,指主管部门或主办人员,如在 S. 1604 第二件帖中就称为“所由纲管”。因此,本文书中的“所由”,仍是承接上文用指各寺住持的。可以说,文书的下达对象之一是各寺住持。此其一。其二,文书又反复提到常住百姓等寺院依附人口,时称“徒众”。因此,至少可以说文书的下发对象是各寺院的住持和徒众。

再次,文书还说“应诸管内寺宇”云云,从行文语气看,发文书者又

是负责管理各寺院事务的。若不具有这样的身份和地位,他也就不会向各寺院的住持和徒众说这样的话。

由以上讨论可知,发出文书的机构应是归义军管辖下的某个部门,而这个部门又是管理寺院事务的权力机构。介于归义军节度使衙和各寺院之间,又负责僧务的机构,就只能是都僧统司,舍此别无他求。都僧统司是归义军时代的最高僧政机构,在归义军政权的保护和支持下,曾经进行过大量活动,敦煌文献中许多公文都是它们留下的档案文书,本件文书反映的活动即其一。而在张淮深时代(867—890 主政),主持都僧统司的是著名高僧悟真(869—895 任都僧统)^⑮。这就是说,本件文书是由河西都僧统悟真发出的。

至于文书的性质,前贤或曰“宣言”,或曰“状”,或曰“文书”,或曰“榜文”,不一而足。“宣言”是用现代术语套在古代文书上使用的,实不足取。“状”是上行文书,在敦煌文献中为数极多,与本件下行文书完全不合。“文书”则是泛称,仍旧不能反映本件的特质。真正需要讨论的是,本件究竟是“帖”还是“榜”?

在敦煌文献中,我们看到相当数量由都僧统司下发的帖和榜。一般来就,帖是通知书一类的文件,榜则属于公告一类。二者的区别在于,帖是向有关人员和机构下发的,而不向社会大众公布;榜则直接向社会公布,范围更大一些。但有时帖和榜的区分并不十分严格,如 S. 2575 背七,前称“普光寺道场司差发榜”,落款却署为“三月四日帖”^⑯,这就给我们确定本件的性质带来了难度。

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恐怕仍在于它的下发对象和范围。前已指出,本件文书的下发对象至少包括寺院的住持和徒众,但仅仅这样理解是不够的。诚如仁井田陞先生在引述了文书中“余者人口……任主自折”一段话之后所说的那样:“文书中所说的这段话,并不是对一个寺院的一个庄园说的,而是作为所有敦煌寺院的共同规定来说的。

特别是针对掠夺常住物的有权势者说的。”这个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我要补充的是，文书的下发范围不限于“敦煌寺院”，而是都僧统司管辖下的所有寺院以及广大社会民众。如果是帖，那么其下发对象就只限于都僧统司管辖下的各寺院。但文书同时明确针对社会上的形势户，因此，仅仅向寺院发出“帖”文是不够的，必须向广大社会民众公布，以显示其法律性。这就是说，本件文书应是一件榜而不是帖。

就这件榜文的主体内容而言，虽然其起始原因是龙家和达纳似两部落的投诉，但如前所述，他们自身又是常住百姓的一部分，因此在奉使衙帖文处理他们的投诉时，将有关寺院的人户和寺产即“常住”一并要求加以保护，同时也申明了对违犯规定的处罚措施，这应当是其主体内容。

根据以上讨论，我认为将这件文书定名为《河西都僧统悟真处分常住榜》是恰当的。

五 原榜文的格式和钤印

由于现存榜文已非原始文件，所以从形式上看，它已不再具备榜文的格式。这也正是以往学者们难于把握其性质，从而不能给予准确定名的原因之所在。只要我们将其格式复原出来，面目也就一清二楚了。

为便于了解归义军时代都僧统司榜文的格式，兹节引两件如下：

S. 2575:

1. 应管内外都僧统 榜
2. 普光寺方等道场司。
3. 右奉 处分，令置方等戒坛。
4. 窃闻龙沙境域，冯 佛法以为

5. 基，

(中略)

87. 右件律令，依律戒义，晓众知知，各令

88. 遵守者，故榜。

89. 天成肆年三月六日榜。

90. 应管内外僧统龙瞽。

91. 应管内外都僧统海晏。

S. 2575 号背六：

1. 应管内外都僧统 榜

2. 普光寺方等道场司纳色目印三科。

3. 右奉 处分，令置受戒道场。

(中略)

9. 加减。仍仰准此条疏，不在违越者。

10. 己丑年五月廿六日 榜。

这两件榜文的格式小有差别，第一件完整、规范，第二件则不十分完整，如末尾处(第 10 行)只有年月日榜，而无都僧统的署名。但基本格式则大致相同：第一行是榜题，说明由谁发榜；第二行说明发榜对象；第三行则为“右奉 处分”如何如何，即事由。以下便是正文内容。末尾部分先有几句套话，如 S. 2575 号的 87—88 行，以下便是年月日及署名。将这两件榜的格式同 P. 2187 号现存榜文加以对照，不难发现，沙门愿荣在抄写时，只是摘取了榜文的核心部分，其余套式或被删去，或未抄完，因此也就不再是原始榜文的面貌了。

上引两件榜文均在五代后唐天成四年(929)，上距 P. 2187 号榜文已有 40 余年。但作为公文格式，在短期内则是相对稳定的，一般来说变化不大，因此仍可作为我们复原 P. 2187 号榜文格式的参考。其中

S. 2575 号正面榜文完整、规范,更应成为我们进行复原工作的依据。

需要说明的是,悟真任都僧统的全称是“河西都僧统”^①,而不同于海晏所称“应管内外都僧统”。

现试将 P. 2187 号榜文的格式复原如下:

1. 河西都僧统 榜
2. 诸僧尼寺纲管徒众等。
3. 右奉 处分,令保护常住。
4. 因兹管内清泰,远人来慕于戟门。

(中略)

自守旧例,不许(以下当补足未抄正文)

右件律令,依使衙帖,晓众知知,各令

遵守者,故榜。

年 月 日 榜

都僧统悟真

上面复原出的榜文格式中的文字,未必都同原榜文毫厘不爽,但其基本内容应该相去不远。

原榜文是否也有钤印呢?诚然,现存敦煌文献中由都僧统司发出的榜和帖,并非每件都钤印,但像本件这样重要而又带有法律性质的榜文,没有印信则是不可想象的。我们遍检敦煌文献,从唐末至宋初,都僧统司所用印文只有一种,即“河西都僧统印”,见于 S. 3798、S. 1604、S. 2575、S. 2879 等。其中现知年代最早者是唐天复二年(902)悟真的接任者、都僧统贤照所发帖文(S. 1604)。然而尽管敦煌文献中也留下一些悟真的判辞,以及由他撰写的各类文字,我们却未找到他任都僧统时使用印信的痕迹,故此只能进行推测。我们知道,悟真圆寂于乾宁二

年(895)^⑧,其接任者贤照在七年后(902)的帖文中使用“河西都僧统印”,而悟真在任时的全称也是“河西都僧统”,所以他在任时所用印也只能是同一内容的印文。我认为,P.2187号榜文如果原有印文的话,其印文也应是“河西都僧统印”。

(原载《周一良先生八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217—232页)

注释:

- ① 那波利贞、藤枝晃、仁井田陞三人对文书年代的意见,请参《敦煌学译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4月,第855—856页。
- ② 谢和耐《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中译本,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5月,第134页注①。
- ③ 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中华书局,1987年5月,第152页。
- ④ 参见唐长孺《关于归义军节度的几种资料跋》,载《中华文史论丛》第1辑,1962年;邓文宽《张淮深平定甘州回鹘史事钩沉》,载《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5期。
- ⑤ S.367号。
- ⑥ P.3720及S.5630号。
- ⑦ 《张淮深修功德文》(S.6161加S.3329加S.6973加P.2762加S.11564)云:“诏令承父之任,充沙州刺史”,可证张议谭曾任沙州刺史。
- ⑧ 前揭谢和耐书,中译本第133页注④。
- ⑨ 参见荣新江《归义军及其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初探》,载《敦煌学辑刊》,1986年,第2期。
- ⑩ 那波利贞《梁户考》,载《支那佛教史学》二卷四期,1938年3月。
- ⑪ 藤枝晃《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始末[四·完]》,载《东方学报》(京都版),十三册之二,1942年8月。
- ⑫ 见《敦煌学译文集》第870页注③。
- ⑬ 姜伯勤《论敦煌寺院的“常住百姓”》,载《敦煌研究》试刊第1期,1981年。
- ⑭ 《唐六典》卷四礼部郎中员外郎条。
- ⑮ 参见荣新江《关于沙州归义军都僧统年代的几个问题》,载《敦煌研究》1989年第4期。

⑯ 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四辑，全国图书馆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9月，第146页。

⑰ 见 P. 3720 号第 5 件牒文。

⑱ 见 P. 2856 号背。

三篇敦煌邈真赞研究

——兼论吐蕃统治末期的敦煌僧官

敦煌文献中的邈真赞，是研究归义军历史和敦煌僧政史的重要资料。尤其是近年陆续出版的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以下简称《释录》）^①，郑炳林著《敦煌碑铭赞辑释》（以下简称《辑释》）^②，姜伯勤、项楚、荣新江合著《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以下简称《研究》）^③，均是集大成的著作，为学者们利用这批资料提供了极大方便。今在诸位先生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三篇敦煌邈真赞作进一步的研究。拾遗补缺，聊补未周，不妥之处，还望指正。

本文研究的是伯四六六〇号《邈真赞集》长卷中的三篇。依原卷编排次序，分别为第三四、第三五和第三六篇。今将文字再加释录，对前贤各家之得失以及笔者管见，以校记方式予以说明。

伯四六六〇（三四）

1. 故李教授和尚赞 释门法将善来述

2. 美哉仁贤，忠孝自天。投簪弱冠，削发髻年。枢机发日，

3. 若矢在弦。所檄（彻）^[1]皆中，匪凭鏃穿。八藏穷妙，五部精研。

4. 那^[2]除（馀）^[3]劓^[4]赞，劓^[5]略词繁。纂^[6]制章论，迅切潺湲。

恒为惠剑，

5. 割断爱缠。不假蟾魄，心灯本然。名高一郡，道贯僧□^[7]。

6. 倾城倾郭，奔骤问禅^[8]。

校记：

- [1] 撤(彻)：《释录》、《辑释》作“撤”；《研究》作“檄”并云：“陈(即陈祚龙先生《唐五代敦煌名人遯真赞集》，巴黎，1966年出版。下同，不另出注)、唐、郑皆作撤。应作檄，通撤。”今按，均未谛。陈、唐、郑考虑敦煌俗字偏旁手、木不分，故作“撤”；《研究》重于其义而作“檄(撤)”。撤字音敲，义为敲击。《庄子·至乐》：“庄子之楚，见空髑髅，髑然有形，撤以马捶。”成玄英疏：“撤，打击也。”虽有“击”义，但需与敲、打连义。原字撤，音彻，《尔雅·释木》其义为齐枣，于此意义相去万里。而“彻”义为贯通、穿透。《墨子·备穴》：“为铁钩钜长四尺者，财自足，穴彻，以钩客穴者。”《列子·汤问》：“北山愚公长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彻，曾不若孀妻弱子。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彻”字均为“通”义。原卷上句“若矢在弦”，下句“匪凭鏃穿”，均以射箭为喻。可知此处“撤”为“彻”之同音借字，义为“通”，当作“彻”。
- [2] 那：《释录》、《辑释》作“那”，《研究》作“删”并云：“唐、郑作那，误。”按，原卷是“那”字俗体，释作“那”是，《研究》改误。那通挪，此处用同“挪”，义为移动。宋·欧阳修《文忠集》一〇〇三《论乞赈救饥民札子》：“只闻朝旨令那移近边马及于有官米处出糶。”梅尧臣《依韵和永叔戏作》诗：“不肯那钱买珠翠，任从堆插阶前菊。”均是其用例。
- [3] 除(馥)：原卷作“除”，各家均照录不改，失校。“馥”与下文“赘”义同，正可互文见义。“馥”作“除”，乃抄手误书，当改正。
- [4] 刮：《释录》、《辑释》有，《研究》脱，故成三字句“删除赘”，与原卷四字句体例亦不合。按，原作“刮”是。《集韵》、《韵会》、《正韵》均云：“历各切，音洛，剔也。”于此卷正是剔除之义。“那(挪)余刮赘”即移去衍文，剔除赘文。
- [5] 剿：《释录》、《辑释》有，《研究》脱。按，原作“剿”是。此字音尊。《说文·刀部》：“剿，减也。”段玉裁注：“剿、搏古今字。”知亦可写作“搏”。“剿略词繁”，即删繁就简。以上二句“那(挪)余刮赘，剿略词繁”，正是对前文“八藏穷妙，五部精研”的进一步阐释。
- [6] 纂：《释录》作“纂”，误；陈氏、《辑释》、《研究》作“纂”，是。原卷为俗体，上为草头，盖因敦煌俗字竹、草不分；中为“日”字，又因俗写日、目不分。伯三四〇三《宋雍熙三年丙戌岁(986)具注历日一卷并序》原题“安彦存纂”，其字写法与本卷同，故可确认。

[7] 此字原残。陈氏作“上”，《释录》补“首”，均失韵。今从《辑释》和《研究》暂缺，俟再校。

[8] 此卷正文下原来有诗一首，又见于别卷，今不录。

伯四六六〇(三五)

1. 故沙州缙门三学法主李和尚写真赞

2. 宰相判官兼太学博士从兄李颀撰

3. 五凉甲族，武帝宗枝。派流天外，一胤西陲。柯分叶散，留迹阶墀。

4. 稚^[1]息雕弊，编入皇枝。河陇阻绝，三代于兹。敦煌沦陷，甲子云期^[2]。

5. 宗枋是一，史录生耀(辉)^[3]。厌斯俗务，志乐无为。髻年问道，弱冠披缙。

6. 事亲无怠，味法忘疲。披经讨论，无不知机。精持戒律，白月(日)^[4]无亏。

7. 举朝佥议，迁为道师。河湟畏记(敬)^[5]，相无不知。公名肃肃，道行巍巍。

8. 遭以时疾，药物无施。千万不遂，今也云堕。贤兄心碎，游子怀悲。

9. 四部哀痛，一如荼毗。图形新障(幃)^[6]，写旧容仪。奄(掩)^[7]却青眼，谁当白眉。

10. 两朝钦德，一郡含悲。遐迩瞻仰，无不归依。

校记：

[1] 稚：陈氏作“子”，余从原卷。《研究》作“稚”并云“陈作子”，未加按断。今按，原作“稚”是，陈氏改误。“息”即“子”，“稚息”即“稚子”，义为胄子，即贵族后代。《史记·五帝本纪》：“舜曰：‘然，以夔为典乐，教穉(稚)子。’”裴骃

集解引郑玄曰“国子也”。李颀前云自己和赞主是“五凉甲族，武帝宗枝”，自然是贵族后代，故称“稚息”。

- [2] 期：《辑释》作“期”，《释录》、《研究》从原卷作“朞”。按，原卷是“期”字俗写，故当从《辑释》。期义“周”也（说详下）。
- [3] 耀（辉）：《释录》、《辑释》从原卷作“耀”。《研究》云：“陈作辉。唐·郑照录，出韵，疑当作辉。”按，陈氏校改作“辉”，甚是，当从之。敦煌写卷辉、耀二字多不分。
- [4] 白月（日）：《释录》改作“日”，《辑释》作“月”，《研究》亦作“月”并云：“唐作日，误。”按，校作“日”是。白日犹时间、光阴也。汉·王符《潜夫论·浮侈》：“此等之俦，既不助长农工女，无有益于世，而坐食嘉谷，消费白日，毁败成功。”唐·白居易《浩歌行》：“既无长绳系白日，又无大药驻红颜。”均指光阴。此卷“白日无亏”即不负光阴，亦即坚持不懈之意。
- [5] 记（敬）：陈氏释文作“托”，余作“记”。按，释“托”误，释“记”是。然此字是“敬”之同音借字，需加校正。唐五代河西方音-ŋ尾往往脱落，弟与定、令与礼、迷与名、听与体均互代（见敦煌本《六祖坛经》），可比证。此处“敬”音“记”，故借作“记”。畏敬义为尊敬、敬重。《礼记·大学》：“[人]之其所畏敬而辟焉。”《旧唐书·辅公祐传》：“初，[杜]伏威与公祐少相爱狎，公祐年长，伏威每兄事之，军中咸呼为伯，畏敬与伏威等。”此卷“河湟畏敬（音记），相无不知”，即河湟地区人人敬重，人人皆知。
- [6] 障（幃）：《释录》、《研究》从原卷作“障”，误。《辑释》校作“幃”，甚是。“障”是阻碍之义；“幃”是整幅的布料或绸料。“图形新幃，写旧容仪”，即将旧时容仪画在大幅新布上，此即所谓“遯（写）真”也。
- [7] 奄（掩）：各家均从原卷作“奄”，失校。此乃“掩”之同音借字。下文“青眼”义为知心朋友。唐·权德舆《送卢评事婺州省觐》诗：“客愁青眼别，家喜玉人归。”宋·司马光《同张圣民过杨之美好日投此为谢》诗：“呼儿取次具杯盘，青眼相逢喜无极。”下句“谁当白眉”，白眉者，三国时马良也。《三国志·蜀志·马良传》：“马良，兄弟五人，并有才名，乡里为之谚曰：‘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称之。”后世喻为兄弟或同辈中之杰出者。此件作者李颀乃赞主从兄，故云“掩却青眼，谁当白眉”。义谓掩埋掉我的知心朋友，谁还能像他（赞主）那样充当我兄弟辈中的佼佼者呢？可见作者伤心之极。

伯四六六〇（三六）

1. 敦煌都教授兼摄三学法主陇西李教授阁黎写真赞

2. 释门都法律兼副教授苾刍洪誓述
3. 大哉法主,间^[1]世英首。位高十德,解尽九流。
4. 三端体备^[2],四辩难酬。蕃秦互晓,缙俗齐优。
5. 五乘研激(极)^[3],八藏精修。刊定耶(邪)^[4]正,隔绝旁求。
6. 两邦师训,一郡归投。等然惠炬,遍运慈舟。
7. 逗(透)^[5]根演教,量器传幽。谓寿逾算,将冀遐筹。
8. 闫浮魄散,宝界神游。哀哀地恸,参参(惨惨)^[6]天愁。
9. 花台飞锡,再会无犹(由)^[7]。芳名万代,播美千秋。

校记:

- [1] 间:《释录》作“门”,误。余作“间”,是。
- [2] 体备:《研究》云:“原写备体,旁加乙转符号。唐、郑仍作备体。”按,《研究》说是,当作“体备”。
- [3] 激(极):《释录》作“激”,误。《辑释》、《研究》释作“激”,是。然当校作“极”。研极者,钻研穷究之义。唐·韩愈《与袁相公书》:“穷经究史,章通句解,至于阴阳、军法、声律,悉皆研极原本。”宋·程大昌《演繁露》自序:“以仲舒之识,精通天人性命,而《繁露》之书,事物名义,悉所研极。”可知原卷“激”乃“极”之同音借字,当作“极”。
- [4] 耶(邪):《研究》作“邪”并云:“唐照录,应作邪。陈、郑径作邪。”说是。敦煌写卷“邪”亦作“耶”。
- [5] 逗(透):各家均从原卷作“逗”,失校。按,唐五代河西方音声母“段”、“鍛”不分,故但与坦、当与堂均互借(见敦煌本《六祖坛经》)。同理,此“逗”亦“透”之同音借字,“透根”即彻其根底之义,此处说明赞主“演教”之深刻程度。
- [6] 参参(惨惨):《释录》、《研究》从原卷作“参参”,误;陈氏、《辑释》校作“惨惨”,是。按,参参音“森森”,形容长貌。《后汉书·张衡传》:“修初服之娑娑兮,长余佩之参参。”唐·韩愈《南山》诗:“参参削剑戟,焕焕衔莹琇。”是其义。而惨惨义为忧闷、忧愁。《诗·小雅·正月》:“忧心惨惨,念国之为虐。”郑玄笺:“惨惨,犹戚戚也。”唐·戴叔伦《边城曲》:“胡笳听彻双泪流,羁魂惨惨生边愁。”此卷“哀哀”与“惨惨”、“地恸”与“天愁”均为对文,可知

校作“惨惨”是。

[7] 犹(由):《释录》从原卷作“犹”,失校;《辑释》、《研究》校作“由”,是。二字古互通,此处当作“由”。

当我们仔细诵读这三篇邈真赞时,会感到它们是极为难得的文字。尤其是第三五篇,作者李颀与赞主李教授是同宗从兄弟,对赞主的去世发自内心地悲痛与怀念,令人为之感动。然而,这三篇文字的写成年代却一向未能考明,所涉及的僧政史实也未被揭出,今作考证如下。

据日本学者竺沙雅章先生研究,三篇赞主为同一人,即都教授李惠因^④,这是可以认同的。李惠因其名载于斯二七二九(一)《吐蕃辰年(788)三月沙州僧尼部落米净瞿牒(算使勘牌子历)》^⑤,见此《历》第26行,属报恩寺僧。第三四篇作者善来即索善来,其名见同《历》第24行,属开元寺僧。此外,关于他们的材料就非常少了。

据第三六篇赞文,李惠因辞世时的结衔是“敦煌都教授兼摄三学法主”。都教授是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最高僧官,相当于归义军时代的都僧统。然而李惠因死于何年,三篇赞文又作于何时呢?第三五篇李颀写的赞文为我们提供了准确信息。

在赞文开头,李颀先说明自己同赞主李教授之李姓,是“五凉甲族,武帝宗枝”。后来这个宗族便分散了,其中一枝落在“西陲”,亦即河西地区。尽管“柯分叶散”,但其祖宗却在皇帝宝座留下过踪迹(“留迹阶墀”)。可知他是以贵族后代自诩的。到了唐代,虽已破落(“稚息雕弊”),但仍被唐皇室“编入皇枝”。《旧唐书》卷二四《礼仪四》载:“天宝元年……七月,陇西李氏敦煌、姑藏、绛郡、武阳四房隶于宗正寺。”李颀所云当即此事。然后他十分感慨地说到:“河陇阻绝,三代于兹。敦煌沦陷,甲子云期。宗祊是一,史录生辉。”其中前十六个字是我们研究有关史实和年代的重要依据。

“河陇阻绝，三代于兹”中的“代”字，系避唐太宗李世民名讳而改，当即“三世于兹”。其义是说，从河西陷蕃到写此赞文已有“三世”之久。古人纪年，常用“纪”、“世”书写，一纪为十二年，一世为三十年，甲骨文和金文中的“世”字即三十之义。《论语·子路》：“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宋·邢昺疏曰：“正义曰‘三十年曰世’。此章言如有受天命而王天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也。”可知，赞文中的“三世”就是90年的另一种说法，而不是通常所理解的“三代人”。

“河陇阻绝”是指安史之乱后，唐朝将西北边军调往中原勤王，河西、陇右军防出现空隙，吐蕃乘虚入侵之事。《资治通鉴》卷二一九肃宗至德元载(756)记：“是岁……吐蕃陷威戎、神威、定戎、宣威、制胜、金天、天成等军，石城堡、百谷城、雕窠城。”^⑥是为吐蕃侵陷河陇之始。以此年为河陇阻绝之第一年，后推“三世”亦即90年，相当于唐武宗会昌五年(845)。

再看“敦煌沦陷，甲子云期”。期者，周也。说明从敦煌沦陷到写此卷时已经经历了一个甲子周期，即60年时间。敦煌沦陷的时间，一般认为是在唐德宗贞元二年(786)^⑦。以此年为敦煌陷蕃之第一年，下推一个甲子，也是会昌五年，即公元845年。

根据以上李颙赞文所述史实和年代，我们可以判定，伯四六六〇第三五篇邈真赞撰成于会昌五年(845)，也就是说，都教授李惠因是此年去世的。第三四篇索善来所述赞文虽未提供直接的写成时间，但此篇正文后所写五言八句诗，又见于伯三七二六《杜和尚写真赞》(略有不同)。内云：“苍生已度尽，寂嘿入莲城。”^⑧说明也是在李教授刚去世时写的。第三六篇洪誓所写赞文云：“闫浮魄散，宝界神游。哀哀地恸，惨惨天愁。”“闫浮”、“宝界”均是佛教用语。闫浮即闫浮提，谓生人所居之地。宝界又称宝刹、宝国，均是净土之义^⑨。“闫浮魄散”即已离开人世，“宝界神游”即神魂游于净土。显然，也是赞主李教授刚去世不久撰

成的文字。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伯四六六〇第三四、三五、三六篇邈(写)真赞,均作成于李惠因去世的会昌五年(845)。

吐蕃治下都教授李惠因的死年及三篇邈真赞的撰成年代既已查明,与此相关的一些史实就有重新认识的必要,现分述如下。

(一)李惠因的接任者是著名高僧洪誓,其接任时间为会昌五年(845)。以往竺沙雅章先生认为李惠因的活动年代与宋正勤同时,大略在公元“八一三——八二五年顷”,洪誓又是接任另一高僧荣照的,活动年代在“八三〇年顷——八四八年”,^⑩这个认识看来须加修正。从伯四六六〇第三六篇洪誓的题衔看,李惠因去世时,洪誓的僧职是“都法律兼副教授”,可知李惠因在世时,二人是正副职关系。李惠因去世,由洪誓接任都僧统是顺理成章的。

(二)洪誓任都教授的时间是会昌五年至大中二年(845—848)。李惠因去世后,洪誓接任都教授,已如上述。但大中二年,洪誓即参加了张议潮领导的起义,将吐蕃贵族从敦煌赶走。我们知道,唐朝授予洪誓都僧统的时间是大中五年(851)^⑪。现存敦煌莫高窟的《洪誓碑》中段刻有唐宣宗的诏书,内云“敕洪誓……依前充河西释门都僧统……”^⑫既云“依前”,则说明唐宣宗的诏书只是对洪誓都僧统一职的正式承认而已。它告诉我们,随着敦煌的光复,吐蕃僧官都教授即被废止,而又恢复了敦煌陷蕃前行之有效的唐朝僧官都僧统制度。由此可知,洪誓在吐蕃治下任都教授的实际时间是公元845—848年共3年时间,848年改称都僧统,至851年唐朝正式承认,他任敦煌最高僧官已有6年之久了。

(三)关于伯四六四〇《吴僧统碑》的撰成年代。此碑文为文人窦良骥所撰,题作《吴僧统碑》。据日本学者藤枝晃先生研究,其原名应是S.0779背习字中的“大蕃沙州释门教授和尚洪誓修功德[碑]”。^⑬至于为何改名为《吴僧统碑》,荣新江先生也曾给予了有说服力的解释^⑭。但对此碑文的撰成年代,学者们仍是众说纷纭。其中苏莹辉先生认为:

“此碑作于陷蕃期间(约在开成四年至大中元年间)的可能性较大。”^⑮郑炳林先生在引证各家所考之后说,此碑当作成于公元834年或稍后,并认为“显然苏莹辉先生考证有误”。^⑯现在看来,苏莹辉先生考证的可能时间839—847年较为接近事实,倒是郑炳林先生的意见失之较远。因碑文有云:“使知释门都法律、兼摄副教授十数年矣……又承诏命,迁知释门都教授。”根本没有提到洪誓改任都僧统一事。而据我们上面的考证,洪誓任都教授的时间是公元845—848年期间。此前此后,碑文都不能与史实相符。由此可知,《吴僧统碑》当撰成于公元845—848年之间。

(四)关于敦煌陷蕃的年代。此前学者们多已认同在唐德宗贞元二年(786)。根据前述对伯四六六〇(三五)所述史实的年代考察,看来这是正确的认识。“河陇阻绝”始于至德元载(756)。考虑到古人将事发之当年算作一年,此后的“三世”(90年)应是会昌五年(845)。而赞文又说“敦煌沦陷,甲子云期”,因此,从会昌五年上推一个甲子(60年),正当贞元二年。以往在研究敦煌陷蕃的具体年代上,学者们意见纷繁,其中陈国灿先生力主贞元二年说^⑰。本项研究为陈氏此说提供了强有力的论据,并由此可得确认。

本文所做的工作,不是对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僧政史的全面考察,而是从对三篇邈真赞文字的阐释引发出的一些认识。由于其中所含史实未曾被措意,故而略述管见如上。如果它能对有关问题的研究起一些推进作用,笔者将不胜欣慰。

(原载《出土文献研究》第四辑,中华书局,1998年,第81—87页)

注释:

①《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五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

- ② 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
- ③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
- ④ 《敦煌吐蕃期的僧官制度》,载《布目潮风博士古稀纪念论集》,1990年,汲古书院刊。
- ⑤ 见池田温先生《中国古代籍帐研究》,第503页。
- ⑥ 中华书局标点本《资治通鉴》,第7011页。
- ⑦ 同注②,第14页;又参宁可、郝春文二先生《敦煌的历史和文化》,新华出版社,1993年,第71页。
- ⑧ 同注③,第133页。
- ⑨ 《佛光大辞典》,第6750页下。
- ⑩ 同注④,第326页。
- ⑪ 见《洪誓碑》,录文见李永宁先生《敦煌莫高窟碑文录及有关问题(一)》,载《敦煌研究》试刊第1期,1981年。
- ⑫ 同注⑪,第74页。
- ⑬ 《敦煌千佛洞的中兴》,载《东方学报》(京都版)第35册,1964年,第91—106页。
- ⑭ 《关于沙州都僧统年代的几个问题》,载《敦煌研究》1989年第4期,第70—78页。
- ⑮ 《敦煌资料中的三位河西都僧统》,载苏著《敦煌论集》,台北学生书局,1983年修订三版,第417页。
- ⑯ 同注②,第66页。
- ⑰ 《唐朝吐蕃陷落沙州城的时间问题》,载《敦煌学辑刊》总第七辑,第1—7页。

敦煌邈真赞文献中的唐五代 河西方音通假字例释

在为数众多的敦煌文献中,迄今能够确认其性质属于邈真赞的,共有 95 篇。由于这些材料对于研究归义军历史、唐五代时期的敦煌僧官制度和寺院历史关系巨大,所以一直深受历史学家和敦煌学家们的关注。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学者们不断推出录校或校释文字,并不断有所创新,推进着对邈真赞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迄于 90 年代中期,敦煌邈真赞文献主要辑存于如下作品:(1)陈祚龙《敦煌真赞研究》(以下简称《真赞研究》)①;(2)陈祚龙《敦煌文物随笔》(简称《随笔》)②;(3)陈祚龙《中华佛教文华史散策三集》(简称《散策三》)③;(4)陈祚龙《中华佛教文化史散策四集》(简称《散策四》)④;(5)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四、五辑(简称《释录》)⑤;(6)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简称《辑释》)⑥;(7)姜伯勤、项楚、荣新江合著《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简称《研究》)⑦。其他一些书籍和论文中也有零星的收存,这里不具,我们在以下相关文字中将随时说明。

坦率地说,以上这些作品凝结了作者们的许多辛劳,各自也都取得了不少成绩。不过,释录敦煌文献并且进行校勘是一件十分繁难的工作,很难毕其功于某一役或几役。前人的工作中也还有不少可继续努力的余地。职是之故,2000 年,本人向国家文物局社会科学基金申报了“敦煌邈真赞文献新校与研究”课题,并获批准。其后,我有机会两次

赴巴黎,从法国国家图书馆东方珍本部将敦煌邈真赞文献调出,逐字与原卷进行核对。其他收在英国图书馆的几件邈真赞文献,则有《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的精美图版可资利用。自2004年8月起,至2005年3月底,前后耗时8个月,集中力量,对敦煌邈真赞文献既校且注,完成了32万字的写作。

经过这一道工作,本人对邈真赞文献本身和前人的工作都获得了更为具体的认识。单从校勘的角度讲,需要重校的地方确实不在少数。其中问题之一,便是唐五代河西方音通假字。我认为属于这一类的通假字从而需要校改的共56例,而前人则只认出其中的14例,多数尚未校出。本文后面要做的工作,便是将每个案例逐一勾出,表明自己的看法,以与学界同仁切磋云尔。

这里将涉及到唐五代河西方音的类别问题。根据前辈音韵学家们的研究,大致可区分为如下五类:一、止摄与鱼摄混同互通;二、声母端、定互注;三、声母以审注心;四、韵母青、齐互注;五、韵母侵、庚互通。本文将按照上面的分类进行例释。

还要特别声明的是,本人对于音韵学实在是门外汉,只是将学者们的成果引入自己的整理研究工作。正由于此,在理解上就可能出现这样那样的偏差。因此,本人诚恳地欢迎各界有识者给予批评指正。当然,如果本文的认识还有可取之外,那我将十分欣慰。

一 止摄与鱼摄混同互通(28例)

(1) P. 3718—4《阎子悦写真赞》第30—31行:“遇(偶)因凋瘵,以(预)为生前,遗影家庭,丹青髣髴。”句中“以”字《研究》校作“预”,是;余从原卷,失校。“预为生前”一语在其他真赞文字中多次出现,容易看出。再者,本文下面将有多例“以”、“与”二字混同互通之例,亦可资比证。

(2) P. 3718—9《张清通写真赞并序》第12—13行:“黄沙室内,经岁皆空;图圉圆扉,常然寂静。公之审意(狱)思赵壁(璧),每虑神羊,事听再三……”句中“意”字当校作“狱”,诸家皆失校。这段话是讲赞主治狱有方,故而监狱内经常寂然无声。他在审理狱案时总是想到要完璧归赵,该是谁的就归谁。“神羊”乃獬豸之别种,传说是一种能以其独角辨别邪恶的神兽。作者想说的是,赞主不仅想完璧归赵,而且坚决秉公执法,不避邪恶。由于“意”字失校,诸家无法理解原文含义,断句便五花八门,十分混乱了。

(3) P. 3718—9《张清通写真赞并序》第15—16行:“公之雅则,府主每叹,英明克己,奉国无私,衙举敦煌县令。光荣墨绶,莅职以(与)王奐同年。”句中“以”字《研究》校作“与”,是;余从原卷,失校。赞主受到信任,故而受职任敦煌县令。不过,这是一个七品芝麻官,因此是“墨绶”而非“紫授”。王奐是东汉人,事见《后汉书》本传。敦煌本 P. 2537《略出赢金》“县令篇”云:“王奐为洛阳令,颇有政化,百姓重之,死后立祠,每以弦歌而祭之。”作者说,赞主任敦煌县令的时间与东汉王奐任洛阳令时间一样长。其意是借王奐来表彰赞主的。

(4) P. 3718—11《程政信邈真赞并序》第9—10行:“道迈宝山,法船降临紫塞。谈经海决,德(得)偃(亚)生、睿之(诸)公……”“之”字当校作“诸”。《真赞研究》校“之”为“诸”,是;余从原卷,失校。“生、睿诸公”,指竺道生、释慧睿。二人均是南朝刘宋时名僧,善于讲论,事见《高僧传》卷七本传。作者于此是说,赞主亦善讲论,如同海水决口,能与竺道生、释慧睿诸人相匹敌。

(5) P. 3718—12《梁幸德邈真赞并序》第11行:“皇王畅悦,每诏内燕而传杯,宜依(于)复还,捧授(受)奇琛而至府。”句中“依”字当校作“于”。诸家均从原卷,失校。作者是说,赞主很受曹议金(“皇王”)的赏识,故常常被召入内廷共宴;等到该回去时,手中捧着赏给他的奇珍异

宝而回家。这里是说赞主受赏识的程度。“于”字义“到”、“至”。“宜于复还”即到该回去的时候。

(6) (7) P. 3718—13《索律公邈真赞并序》第3—5行：“一从御众，恩以(与)春露俱柔；勤恪忘疲，威以(与)秋霜比丽。”句中二“以”字，《真赞研究》和《研究》均校作“与”，是；《释录》、《辑释》从原卷，失校。这里讲赞主恩威并施：施恩时，像春天之露水那样温柔；施威时，可与秋天之严霜相比。两句意义均较显豁。

(8) P. 3718—15《阎胜全写真赞并序》第15—17行：“军州叹美，僚佐吹扬。别举崇班，荣迁上品。而又出言依(于)理，执定而山岳无移；发语当途，忠贞而始终不易。”句中“依”字当校作“于”，义即“在”。诸家均从原卷，失校。“出言于理”亦即说话在理。本件第29行云“发言当理，山岳无移”，与序文所言含义相同。

(9) P. 4660—13《张僧政邈真赞》第6—7行：“随机设教，圆融真伪。舟航筏喻，亡(忘)筌得意(鱼)。”句中“意”字《研究》校作“鱼”，是；余从原卷，失校。“筌”是捕鱼用的竹器。“得鱼忘筌”，语出《庄子·外物》：“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比喻得道者而忘其形骸。

(10) P. 4660—16《张禄邈真赞》第6行：“闺门孝感，朋友言孚。家塾文议(语)，子孙徇□。”句中“议”字《真赞研究》作“仪”，余从原卷，均失校。按，“议”当作“语”。“文语”即精辟的话语。王充《论衡·自纪》：“盖贤圣之材鸿，故其文语与俗不通。”

(11) P. 4660—17《索公邈真赞》第8—9行：“虚才敢述，游笔多惭。辄申狂赞，欤(以)讼(颂)美焉。”其中“欤”字当校作“以”。《散策四》、《辑释》作“与”；《释录》、《研究》从原卷，均失校。“虚才”犹不才，是作者自谦之词。“辄申狂赞，以颂美焉”，意即写出这篇志大才疏的赞文，用以歌颂赞主的懿德美行。

(12) P. 4660—20《翟和尚(法荣)邈真赞》第15行:“翼侄谋孙,保期永昌。成基竖业,富与(以)千箱(霜)。”这是撰者对赞主家人的美好祝愿之辞。“成基竖业”,意即在赞主已建立的现成基础上再去立业。“千箱”当校作“千霜”,意即千年之久。李白《古风》之十四:“白骨横千霜,嵯峨蔽榛莽。”故而“富以千霜”即永葆富贵之义也。而此句中“与”、“箱”二字诸家均失校,于是,其意也就难以读出了。

(13) P. 4660—28《翟神庆邈真赞》第4—5行:“礼乐儒雅,洞彻典坟。昔贤糟粕,蕴匱而存。该通博古,谈谕(义)讨论。”句中“谕”字当校作“义”。诸家均从原卷,失校。这里是说赞主不仅知识渊博,而且经常与他人谈论义理。“谈义”即讨论义理。《南齐书·柳世隆传》:“世隆少立功名,晚专以谈义自业。”

(14) P. 4660—32《张金炫邈真赞并序》第2—3行:“阁梨童年落发,学就三冬。先住居金光明伽蓝,依(于)法秀律师受业,门弟数广,独得升堂。”句中“依”字当校作“于”,义即跟从。而诸家均从原卷,失校。表面上看,“依法秀律师受业”句义也通。但揣度作者本意,当是指刚出家不久的张金炫是跟随法秀律师受业学习。虽然法秀弟子很多,但只张金炫能登堂入室,独高于众多弟子。

(15) P. 4660—10《吴洪誓赞》第4行:“禅枝恤(恒)茂(茂),性海澄淤(漪)。”句中“淤”字当校作“漪”。《释录》、《辑释》从原卷,失校;《研究》从原卷并云:“伯4660作漪,较胜。”其实,这个字就该作“漪”,“澄漪”谓清波,当据P. 4660加以校正。可以说,P. 4660作“漪”,是其本该如此;而本件作“淤”,是由于在唐五代河西方音中二字同音,故得成为音借字。前文已有三例“依”、“于”互通例,亦可比证。

(16) P. 3556—1《康贤照邈真赞并序》第4行:“遂得鹅珠进戒,皎皎以(与)秋月齐圆。”句中“以”字当校作“与”。此处文字较难识读。由于不能读顺文字,故《辑释》与《研究》(仅此二家释校)均从原卷,从而失

校。“鹅珠进戒”者，是因佛教有“鹅死珠出”之典，形容持戒严正，故尔清白洁亮如同秋夜之明月。

(17) P. 3556—2《汜福高邈真赞并序》第23—24行：“泊金山白帝，国举贤良，念和尚以(与)众不群，宠锡恩荣之秩(秩)。”句中“以”字当校作“与”。《散策四》、《研究》校作“与”，是；《释录》、《辑释》从原卷，失校。“不群”即不平凡，超出同辈。杜甫《春日忆李白》诗：“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与众不群”即在众人中显得不平凡。

(18) S. 289《李存惠邈真赞并序》第4行：“凡居朋寮，起(去)就独彰于群彦。”本篇录校者，除见于《散策四》、《辑释》与《研究》外，郝春文主编的《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⑧第一卷也有录文。诸家均从原卷，失校。句中“起”字当校作“去”。“去就”犹取舍。汉·董仲舒《春秋繁露·保位权》：“黑白分明，然后民知所去就；民知所去就，然后可以致治。”“去就独彰于群彦”，是说在众多英贤时彦之中，赞主的取舍独显高调，与众不同。

(19) S. 390《汜嗣宗邈真赞并序》第6行：“空持一钵，余资弃舍于(如)尘泥；只具三衣，割己振贫而守道。”句中“于”字当校作“如”，意即像、似。《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一卷释“于”为“如”，是；《辑释》、《研究》从原卷，失校。在唐五代河西方音中，“于”、“如”同音通用。“三衣”即和尚的三种袈裟。这一句是说，赞主(和尚)只空持一个行脚用的饭钵，别的资财像尘埃泥土一样地抛弃了。说明和尚已绝尘缘，了无牵挂。

(20) P. 2991—1《张灵俊写真赞并序》第3—4行：“和尚早岁出家，童祯(真)敦业，心灵以(与)皎月□明，利性(生)而宿因自得。”句中“以”字当校作“与”。《研究》校“以”作“与”，是；《辑释》改“以”为“似”，误；《散策四》从原卷，失校。“皎月”即皎洁的月亮。“月”下一字原脱，当是“齐”或“同”。意思是说，作为小沙弥(童真)的赞主张灵俊，认真刻苦地

学习,心灵像皎洁的月亮那样明亮。

(21) P. 3541《张善才邈真赞并序》第3—4行:“师俗姓张氏,香号善才。诞迹[]居襁褓,以(与)众不群。”句中“以”字当校作“与”。《释录》、《辑释》从原卷,失校;《散策四》、《研究》校“以”为“与”,是。“与众不群”一语,在P. 3556—2《汜福高邈真赞并序》第23—24行中已出现过,其写卷原文也作“以众不群”(见本文前第17条),义即在众人中显得不平凡。

(22) P. 3541《张善才邈真赞并序》第12—13行:“芳声远播,元戎擢法律之班;秉仪五坛,重锡奖三窟之务。”句中“仪”字颇疑当作“御”,若是,“秉御”即治理、管理之义。“仪”与“御”之关系,可否借助“以”、“与”关系来理解?不敢肯定。此处作为问题提出,请方家示正。

(23)、(24) P. 2970《阴善雄邈真赞并序》第11—13行:“扶倾济弱,遣富留贫。行五美以恤黎民,避四知而存清洁。城邑创饰,寺观重修。一县敬仰于(如)神明,万类遵承于(如)父母。”句中二“于”字均当校作“如”,意即像、似。诸家均从原卷,失校。

(25) P. 3390—3《张安信邈真赞并序》第10—11行:“而又谦恭守道,清慎每播于人伦;恪节(敬)居怀,忠贞以传于众类。能存信语(义),行烈冰霜。”句中“语”字当校作“义”,意义显豁。《辑释》校作“义”,是;《真赞研究》与《研究》均从原卷,失校。二字在唐五代河西方音中同音互通,可用前述诸例“以”、“与”互通作比证。

(26)、(27) P. 3633 背《张安左邈真赞并序》第5—6行:“以(与)朋友交,言而守信。后生可畏,以(与)松柏而无差;心境高悬,将蟾蜍而并照。”句中二“以”字均当校作“与”,意义十分明白,无须赘言。前一“以”字,《散策四》、《研究》校作“与”,是;《释录》、《辑释》从原卷,失校。后一“以”字,《散策四》、《研究》校作“与”,是;《释录》、《辑释》改作“如”,误。

(28) MG. 17662《张氏绘佛邈真赞并序》第5行:“笄年而节俭柔和,惟幄之风匪失。标英名于后世,播令仪(誉)于前文。”迄今对此篇邈真赞进行录校的,一是见于雅克·吉埃(Jacques Gies)编《西域美术:集美博物馆藏伯希和收集品》^⑨,一是见于荣新江《敦煌本邈真赞拾遗》^⑩一文。二家释文均作“仪(?)”,表示不很确定。按,此字当释作“仪”,然需再校作“誉”。“令誉”即美誉,美名。《旧五代史·晋书·范延光等传论》:“延光昔为唐臣,绰有令誉,洎逢晋祚,显资狂谋。”

以上属于止摄与鱼摄混同互通者共28例,其中一例尚难确定(第22例)。

二 声母端、定互注(12例)

所谓“声母端、定互注”,用现在的话说,就是d、t不分。比如,本人姓邓(deng),但先父总是说“teng家”如何如何。其他大体可以由此去比证。

(1) (2) P. 3718—4《阎子悦写真赞》第40—41行:“殊功已就,馨名盛传。都衙之列,当(堂)便对宣。一从受位,无悦(党)无偏。”句中“当”字当校作“堂”,朝堂之义;“悦”字当校作“党”,宗派之义。《释录》校“当”为“堂”,是;《辑释》、《真赞研究》、《研究》从原卷,失校。“悦”字诸家均从原卷,皆失校。“当”、“堂”互通的实例,亦见于敦煌本《六祖坛经》。敦博077号《坛经》云:“世人尽传南能北秀,未知根本事由。且秀禅师于南荆府堂阳县玉泉寺住持修行。”神秀住持的玉泉寺在当阳县,史书明文有载。“当”变成“堂”亦是方音作用的结果。此外,P. 2615《八宅经一卷》有“五姓安佛当地法”,显然,“佛当”应作“佛堂”。又,敦煌本《百鸟名〈君臣仪仗〉》有“护泽鸟偏知佛当”句(《敦煌变文集》页851),施谢杰云:“‘别当’显然应该据P. 3716改作‘别堂’。”以上诸例,均可证

明“当”、“堂”互通。

(3) P. 3718—14《张明德邈真赞并序》第 12—13 行：“门承地(悌)义，一爨五代而无殊。”句中“地”字当校作“悌”。诸家均从原卷，失校。“悌义”即兄爱弟恭，以义为重。正由于此，全家五代人才在一锅就餐，说明不分家。古人有“兄弟义居”之说，说的也是同爨用餐而不分居。若是“地义”，便无法说明其含义了。

(4) P. 4660—6《唐悟真邈真赞并序》第 8—10 行：“纵辩泉而江河喷浪，骋舌端而唇际花飞。前贤接踵，后辈人师。逗(透)根演教，药病相宜。”句中“逗”字当校作“透”。诸家均从原卷，失校。“透根”即彻其根本，深入其根源。这里是说悟真很有口辩之材，在演说佛教教义时能深入其根底，对症下药。自然，效果也就非同凡响了。

(5) P. 4660—10《辞弁邈生赞》第 15—16 行：“新崇房院，梵宇连绵。道场幡盖，每馥炉烟。援笔记事，功不唐(当)捐。”句中“唐”字当校作“当”。诸家均从原卷，失校。这是赞文最末一句，撰者是说，拿起笔将赞主事迹记录下来，赞主的功劳不该被抛弃。“当”即应该义。关于此二字同音互通的其他例证，请参本节第 1 例所举。

(6) P. 4660—11《康使君邈真赞并序》第 14—15 行：“图形新障(幃)，粉绘真同。恬(掂)笔记事，丕业无穷。”也是赞文末尾的几句话。句中“恬”字当校作“掂”，义即拿、提。《研究》校“恬”作“舔”，余从原卷，均非是。在上例《辞弁邈生赞》中有“援笔记事”，而本件作“掂笔记事”，义同，“掂笔”与“援笔”均是拿起笔来的意思。

(7) P. 4660—36《李惠因写真赞》第 6—7 行：“等然惠炬，遍运慈舟。逗(透)根演教，量器传幽。”句中“逗”字亦当作“透”。诸家均失校。关于“透根演教”，请参本节第 4 例，这里不再重复。

(8) P. 3556—4《曹法律尼邈真赞并序》第 2 行：“法律闍梨昔(者)，即河西一十[一]州节度使曹大王之侄女也。间生英德(特)，神

授柔和。”句中“德”字当校作“特”。诸家均失校。赞主是一位女性。所以，撰者不仅说她姿貌出色，而且也很柔和。“间生”即秉天地间间气（一种特殊之气）而出生，谓不常有；“英特”谓容貌、仪表英俊、奇特。《宋书·武帝纪中》：“龙颜英特，天授殊姿，君人之表，焕如日月。”可比证。

(9) P. 3556—8《张清净戒邈真赞并序》第14—15行：“秉义（彝）临坛，教迷徒而透（逗）众。”句中“透”字当校作“逗”，引导、疏导之义。诸家均从原卷，失校。杜甫《怀锦水居止》诗之一：“朝朝巫峡水，运逗锦江波。”“逗”亦导义。

(10) P. 2991—1《张灵俊写真赞并序》第10—11行：“芳兰妙义，恒播布于人伦；异类程（澄）凝，逗（投）机缘而辩（辨）化。”句中“逗”字当校作“投”。《散策四》、《辑释》释作“迫”，误；《研究》释作“逗”，是，然失校。“投机缘”意义显豁，不必辞费。“辨”通“遍”，故“辨化”即普遍受化之义。

(11) P. 4638—9《曹良才邈真赞并序》第19—21行：“遂使八方赞美，声传于凤阙之中；四道扬名，德播于丹墀之内。因兹荣高麟阁，位透（逗）齐（斋）坛。”句中“透”字当校作“逗”，义即留。诸家均从原卷，失校。因赞主名显麒麟之阁，又是曹义金之兄，故而祭坛上有其牌位而受祭享。关于“逗”义为“留”，今有“逗留”一词，乃同义复词也。

(12) P. 3556—5《贾清僧正邈影赞并序》第14—15行：“而乃写瓶在念，传火留心。攻七关（观）八并（病）而穷源，击三分二序（季）而尽体（底）。”句中“体”字当校作“底”，诸家均从原卷，失校。“七观”指儒家称《尚书》可供借鉴的七个方面，“八病”指作词在声律上应当避忌的八种弊病，“三分”指三国时天下一分为三，“二季”指夏、商二代之末世。“穷源”、“尽底”，是说赞主能溯其本源和根底，形容造诣深厚。

以上属于“声母端、定互注”者共12例。

三 声母以审注心(3 例)

(1) P. 2482—6 + P. 3268《汜□□图真赞并序》第 24 行:“比望遐寿,为兵师长。何兮逝逼,不容时响(响)。”句中“响”字当校作“响”。《辑释》校作“响”,是;《研究》从原卷,失校。“时响”乃民间用语,即片刻。“不容时响”,即连片刻也不容,此处形容死得很快。

(2) P. 2991—1《张灵俊写真赞并序》第 3—4 行:“和尚早岁出家,童祲(真)敦业,心灵以(与)皎月□明,利性(生)而宿因自得。”句中“性”字当校作“生”。《散策四》、《辑释》、《研究》均从原卷,失校。“利生”即利益众生之义。佛教理念是自利、利他。因此,撰者以为就自利而言,则“宿因自得”,同时赞主也建立了利他的理念。

(3) P. 3556—1《康贤照邈真赞并序》第 11 行:“图圣(形)绵帐,同从来仪。”原卷先写一“真”字,右又书一“圣”字。《辑释》作“圣真”二字,《研究》作“真”,并非是。按,原卷“真”字已废,当以“圣”字为准。然“圣”字又当校作“形”。“绵帐”是画赞主像所用的整幅布帛。而“图形绵帐”一语在真赞文字中多次出现,并非稀见。只有从方音通假的角度,才能将“圣”字校作“形”。

以上属于“声母以审注心”者共 3 例。

四 韵母青、齐互注(6 例)

所谓“韵母青、齐互注”,实际上就是脱落或增加一 η 尾的问题。在敦煌本《六祖坛经》中,我们曾经看到:定与第、令与礼、国与广、迷与明及名、西与星、听与体都存在通假现象。

(1) P. 4660—21《索义辩和尚邈真赞》第 5 行:“应法从师,披缁离

俗。虽有丰饶，情(迄)无记录。”句中“情”字当校作“迄”，义即终、竟。诸家均从原卷，失校。《后汉书·孔融传》：“融负其高气，志在靖难，而才疏意广，迄无成功。”唐·李贤注：“迄，竟也。”赞文此处是说，赞主是富家出身，虽有丰厚资财，但竟无记录，说明他不恋世间之荣华富贵，所以下文便说他“克询无为，匪耽荣禄”。

(2) P. 4660—35《李惠因写真赞》第7行：“举朝金议，迁为道师。河湟畏记(敬)，相无不知。”句中“记”字当校作“敬”。诸家均从原卷，失校。“畏记”不辞。“畏敬”意即尊敬、敬重。《礼记·大学》：“人之其所畏敬而辟焉。”《旧唐书·辅公祐传》：“初，伏威与公祐少相爱狎，公祐年长，伏威每兄事之，军中咸呼为伯，畏敬与伏威等”。“河湟畏敬”是说整个河西地区都十分敬重赞主。

(3) (4) P. 3556—8《张清净戒邈真赞并序》第8—10行：“三千细行，恪节(敬)不犯于教门；八万律仪，谦和每遵而奉式(事)。”第21行：“立性格节(敬)，不犯烦喧。”句中二“节”字当校作“敬”。诸家均从原卷，失校。“恪敬”即谨慎恭敬。唐·李翱《祭杨仆射文》：“公自登朝，及于谢政，善接交友，居官恪敬。”

(5) P. 4638—9《曹良才邈真赞并序》第17—19行：“更乃恪节(敬)当官，不犯清闻之道；差科赋役，无称偏傥(党)之音。”句中“节”当作“敬”。诸家均失校。详参本节上条。

(6) P. 3390—3《张安信邈真赞并序》第10—11行：“而又谦恭守道，清慎每播于人伦；恪节(敬)居怀，忠贞以传于众类。”句中“节”字亦当校作“敬”，诸家均失校。详参本节第3、4条。

以上属于“韵母青、齐互注”者共6例。

五 韵母侵、庚互通(8例)

(1) P. 3718—4《阎子悦写真赞》第25—26行：“人伦谈善，内外无

告怨之声；君臣赞美于一时，恪清（勤）预彰于古昔。”句中“清”字当校作“勤”，诸家均失校。“恪勤”谓恭谨、勤恳。三国·魏·曹植《浮萍篇》：“结发辞亲严，来为君子仇。恪勤在朝夕，无端获罪尤。”《国语·周语上》：“不敢怠业，时序其德，纂修其绪，修其训典，朝夕恪勤。”

(2) P. 3718—11《程政信邈真赞并序》第 10—11 行：“谈经海决，德（得）伷（亚）生、睿之（诸）公；解释论端，辩答世亲（情）之美（迷）。”句中“亲”当校作“情”，诸家均失校。“世情”犹世人、时人。《文选·陆机〈文赋〉》：“练世情之常尤，识前修之所淑。”唐·李周翰注：“练简时人之常过，乃识前贤之所美也。”

(3) P. 3718—14《张明德邈真赞并序》第 21 行：“恪清（勤）为性，守节存忠。”句中“清”字当校作“勤”，诸家均失校。请参本节第 1 条，以免辞费。

(4) P. 2482—5《张怀庆邈真赞并序》第 14—15 行：“而又翹情（勤）向主，倾心共治而分忧；严诫自身，信义乃留于终始。”句中“情”字当校作“勤”，诸家均从原卷，失校。“翹勤”义即殷切盼望。晋·潘岳《西征赋》：“徘徊鄴镐，如渴如饥。心翹勤以仰止，不加敬而自祇。”唐·司空图《寿星集述》：“今上喆御临，元勋振服，英袞赞翹勤之旨，幽人荷旌賁之恩。”

(5) P. 3718—3《张良真写真赞》第 34 行：“从心之岁，翹情（勤）善缘。”句中“情”字亦当校作“勤”，诸家均失校。作者于此意思是说，赞主张良真活到七十岁时，殷切盼望结善缘，也就是下文所说的“投师就业，顿捐盖缠”。此卷“翹勤”意即殷切企盼，较为显豁。

(6) P. 4660—9《张兴信邈真赞》第 5 行：“三惑居贞（正），四知兼避。”句中“贞”字当校作“正”。“贞”字《辑释》误作“怀”，余从原卷，均失校。“三惑”即酒、色、财也。因其能惑乱人之心性，故称。“四知”即天知，神知，子知，我知，指不受不义之财，持身清正，典出《后汉书·杨震

传》。“居正”谓遵守正道，不迷失。唐·李德裕《授狄兼谟兼益王傅郑束之兼益王府长史制》：“[兼谟]历职有声，居正无挠，举其素行，擢在首僚。”

(7) P. 3556—4《曹法律尼邈真赞并序》第6—7行：“登坛秉义，词辩与海口争驰；不对来人，端贞(正)乃冰清月皎。”句中“贞”字亦当校作“正”。诸家均从原卷，失校。“端正”今天仍在用，指正直无邪。

(8) P. 3726《杜和尚写真赞》第11—12行：“不求朱紫贵，高谢帝王庭(廷)。削发清尘境，披缁蹑海精(津)。”句中“精”字当校作“津”。诸家均从原卷，失校。“海津”即海路，“缁”即黑色僧服，“披缁”即穿僧衣，指出家为僧。“蹑”义踩，踏，登上。“披缁蹑海津”，义即出家踏上寻求彼岸世界的道路。

以上属于“韵母侵、庚互通”者共8例。

上面我对发生在敦煌邈真赞文献中的唐五代河西方音通假字进行了一次初步的梳理。由于本人才疏学浅，容有不当或失误之处。如果说“抛砖引玉”是通常人们用的一句谦语，那么，本人用这篇小文“抛砖引玉”，则是完全发自内心。热盼音韵学家与其他方家参与讨论，以便获得真知灼见，实乃吾愿。

(原载《出土文献研究》第七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年，第309—318页)

注释：

- ① 陈祚龙《敦煌真赞研究》，巴黎，1970年。
- ② 陈祚龙《敦煌文物随笔》，台北，商务印书馆，1979年。
- ③ 陈祚龙《中华佛教文化史散策三集》，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1年。
- ④ 陈祚龙《中华佛教文化史散策四集》，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
- ⑤ 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四、五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北京，1990年。

- ⑥ 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 年。
- ⑦ 姜伯勤、项楚、荣新江《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 年。
- ⑧ 郝春文主编《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一卷，科学出版社，2001 年，第 446—447 页。
- ⑨ 东京，讲谈社，1994 年。本件录文见第 320 页。
- ⑩ 载《敦煌学》第二十五辑，台北，2004 年，第 459—464 页，录文见第 461—463 页。

新发现的敦煌写本杨炯《浑天赋》残卷

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曾享誉诗坛，并与其他“三杰”一起为后人称颂。传世杨炯作品本已不多，古写本更属罕见。近年，我们在敦煌文献中发现了一件杨炯的《浑天赋》残卷。

原卷编号 S. 5777，藏英国图书馆。《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曾拟题为《天象赞》。1992 年夏，宋家钰等先生在编辑《英藏敦煌文献》时，对此卷的定名提出疑问。因我曾在敦煌天文历法文献方面用过一些力气，几位先生希望我能提供意见。遵先生们之清命，我反复审览，觉得它有两个特点：(1) 文体属于赋；(2) 内容讲天象。所以我拟名之为“观象赋(?)”。我将此想法告知宋家钰先生，宋先生奋力查找，最终确认它就是杨炯的《浑天赋》残卷。

残卷纸幅大小未详，首尾均缺，残存文字 20 行，整行二十八、九字。除前 2 行和末行下部残破外，其余 17 行文字完整。杨炯《浑天赋》在传世文献中见于《盈川集》卷一、《全唐文》卷一九〇、《文苑英华》卷一八。现据照片将残卷文字进行释录(行次为笔者所加，原为竖行)，并与传世文献比勘，出校记予以说明。

[前缺]

1. 听抱^[1]之碌碌。南斗主爵禄，东辟^[2]主^[3]

2. 林之军所以除暴乱，垒辟^[4]之阵所以备非常。 ^[5]

3. 奎为封豕，参为白虎，胃为天仓，娄为众聚。𪚩^[6]头之北，宰割^[7]其胡虏^[8]；

4. 天毕之阴，蓄泄其云^[9]雨。太阴^[10]积尸之肃杀，参旗九游之部伍。雉^[11]苏之地，

5. 出入于苑园^[12]；万亿之资^[13]，填积于仓庾。 南官则黄龙赋象，朱鸟成形。

6. 五帝之坐^[14]，三光之庭。伤成于钱^[15]，诛成于质^[16]。祸^[17]成于井，德成于衡。执法者，

7. 廷尉之曹，大夫^[18]之象；少微者，储君之位，处士之星。天弧直而狼顾，军市晓

8. 而鸡鸣。三川之交^[19]，鶡^[20]火通其七曜^[21]；七泽之国，翼轸寓其精。河南河北^[22]，象阙于是

9. 乎增峻；左辖右辖，边荒于是(?)^[23]乎自宁。乃有金之散气，水之精液，法清渭^[24]之

10. 横桥，象昆池^[25]之刻石。岁时占其水旱，沧溟应其朝夕^[26]。织妇^[27]之室，汉家之

11. 使^[28]可寻；饮牛之津，海上之人易覩。 日^[29]者众阳之长，人君之尊。天鸡晓唱，云

12. 乌^[30]昼跋。扶桑临于大海，若木照于昆仑。太平太蒙^[31]，所以司其出入；南至北至，

13. 所以肆^[32]其寒温。龙山衡^[33]烛，不能议其光景；夸父弃策，无以方其骏^[34]奔。（此下空二字）

14. 月^[35]者，群阴之纪，上天之使，异姓之王，后妃之事。方诸对而明水洽^[36]，重晕匝而

15. 边风驶。财^[37]盈蚌蛤，则虏骑先侵；适斗麒麟，则暗虚^[38]潜值。 五星者，木为

16. 重华，火为荧或^[39]。镇居戊己^[40]，斯为土德。太白主^[41]西，辰星主北。俯察人事，仰

17. 观天则，北^[42]参右肩之黄，如奎火^[43]星之黑。五才^[44]所以致用，七政由其^[45]不忒。同舍而

18. 有四方，分天而利中国。赤角犯我城，黄角地^[46]之争。五星同色，天^[47]偃兵。趋

19. 前舍为盈，后^[48]舍为缩。盈则侯王不宁，缩则有军^[49]不复。或向而或背，或

20. 迟而或速。金火犯之而甚忧，岁镇居之而有福。观众星之部署，□□^[50]

[后缺]

校记：

- [1] 抱：《文苑英华》(以下简称《英华》)同。《杨炯集》(据中华书局1980年徐明霞点校本)、《全唐文》作“抱”。按，作“抱”是，残卷“手”、“木”不分，作“抱”误。《国语·齐语》：“执抱鼓立于军门，使百姓皆加勇焉。”“抱鼓”于此为星名，即河鼓星。又据三种文献，残卷“抱”下脱“鼓”字。
- [2] 辟：三种文献作“壁”，是。《隋书·天文志》(以下简称《隋志》)：“东壁二星，主文章，天下图书之秘府也。”残卷“辟”为通假字，敦煌写卷中多互代。
- [3] 据三种文献，此行残失文字是：“文章，须女主布帛，牵牛主关梁。羽”。
- [4] 辟：三种文献作“壁”，是。残卷为通假字，敦煌写卷中多互代。
- [5] 据三种文献，此行残失文字是：“西(《英华》作“四”，误)宫则天潢咸池，五车三柱。”
- [6] 毳：三种文献作“旄”，是。残卷为俗体字。《晋书·天文志》(以下简称《晋志》)：“昴七星……又为旄头，胡星也。”
- [7] 割：三种文献作“制”，亦通。以残卷为胜。
- [8] 胡虏：《全唐文》作“边陲”，误。
- [9] 云：《杨炯集》作“雷”，误。

- [10] 太阴:《全唐文》、《英华》作“大陵”,《晋志》、《隋志》作“太陵”,均是。古语“大”、“太”多不分。《杨炯集》作“天陵”,误。残卷“太阴”亦误。
- [11] 樵:三种文献作“樵”,是。残卷误。
- [12] 苑园:三种文献作“园苑”,俱通。
- [13] 资:《全唐文》作“贲”,互通字。
- [14] 坐:《英华》同。《全唐文》、《杨炯集》作“座”。按,敦煌写本二字多通用。此处指“五帝座”,故以“座”为是。
- [15] 钱:三种文献作“钺”,是。《晋志》、《隋志》:“钺一星,附井之前,主伺淫奢而斩之。”残卷“钱”误。
- [16] 质:《英华》作“质”,又注曰“一作钺”。《全唐文》、《杨炯集》作“钺”,是。“钺”即“铁钺”星,“质”乃同音借字。
- [17] 祸:《全唐文》、《英华》作“福”;《杨炯集》作“祸”。《晋志》、《隋志》:“东井八星,天之南门,黄道所经,天之亭候,主水衡事,法令所取平也。王者用法平,则井星明而端列。”《开元占经》卷六十三“东井占一”：“石氏曰：东井堕，天下涌水，井钺去，则水满。甘氏曰：用法平，王者心正，则井星明，行位直。”考上下文义，似当作“福”。
- [18] 大夫:《杨炯集》作“大臣”，误。《晋志》：“东曰左执法，廷尉之象也。西曰右执法，御史大夫之象也。”作“大夫”是。
- [19] 交:《英华》作“郊”，误。
- [20] 鶉:三种文献作“鹑”，是。“鶉火”为南方朱鸟七宿之总称。
- [21] 七:三种文献无，残卷涉下“七泽”致衍。曜:三种文献作“耀”，互通。
- [22] 河南河北:三种文献作“南河北河”，是。《晋志》：“南河曰南戌……北河曰北戌……两河戌间，日月五星之常道也。……南河南三星曰阙丘，主宫门外象魏也。”残卷误。
- [23] 残卷“于乎”右侧似补一“是”字，但照片十分模糊。三种文献有“是”字，是。
- [24] 清渭:《杨炯集》、《全唐文》作“渭水”，《英华》作“清渭”，俱通。按，成语“泾渭分明”谓渭水清，泾水浊，作“清渭”为胜。
- [25] 昆池:《全唐文》同。《杨炯集》作“昆明”，误。《英华》作“昆明”，“明”下注曰“一作池”。昆池乃昆明池之简称，作“昆池”是。
- [26] 朝夕:《英华》同。《杨炯集》、《全唐文》作“潮汐”，误。
- [27] 织妇:三种文献作“织女”，是。残卷“织妇”亦通，但以星名当作“织女”。
- [28] 使:《杨炯集》、《全唐文》同。《英华》作“史”，是。《晋志》：“柱史北一星曰女史，妇人之微者，主传漏，故汉有侍史。”所谓“汉家之史”当即此。女史

星在织女正北的紫微垣中。

[29] 三种文献“日”下有“也”字。

[30] 云乌：三种文献作“灵乌”，是。残卷误。

[31] 太蒙：《杨炯集》作“太象”，校记云：“‘太象’应作‘太蒙’。”按，作“太蒙”是。
《尔雅·释地》：“东至日所出为大平，西至日所入为大蒙。”古语“大”、“太”多不分。

[32] 肆：三种文献作“节”，俱通。

[33] 衡：三种文献作“衙”，是。残卷“衡”误。

[34] 駿：三种文献作“骏”，是。

[35] 三种文献“月”下有“也”字。

[36] 洽：《全唐文》同。《杨炯集》作“浹”。《英华》作“洽”，注曰“一作浹。”俱通，同义异文。

[37] 财：三种文献作“裁”，俱误。《英华》注“一作才”。按，作“才”是。此“才”字与下文“适”为对文。

[38] 暗虚：三种文献作“暗虎”，误。“暗虚”为古天文名词，指地球被太阳所照形成的暗影，月入其中则成月食。

[39] 或：三种文献作“惑”。按，“或”通“惑”。

[40] 已：《杨炯集》同。《全唐文》、《英华》作“巳”，形近致讹。

[41] 主：《全唐文》作“土”，误。

[42] 北：三种文献作“比”，是。敦煌文献中二字多不分。

[43] 火：《全唐文》、《英华》作“大”，是。《杨炯集》作“火”，与残卷同误。

[44] 五才：《全唐文》、《杨炯集》作“五材”。《英华》作“五才”。“才”下又注“一作材”。按，可互通，均指金、木、水、火、土。《左传·襄二年》：“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后汉书·马融传》：“五才之用，无或可废。”

[45] 由其：三种文献作“于焉”，近义异文。传世文献偏文。

[46] 地：《全唐文》同。《杨炯集》、《英华》作“天”。未知孰是，俟再校。

[47] 三种文献“天”下有“下”字，是。残卷脱。

[48] 三种文献“后”前有“退”字，是。残卷脱。

[49] 有军：三种文献作“军旅”，文字更显畅。

[50] 据三种文献，此二残字应是“历七”。

残卷书写不十分工整，错讹衍倒屡见。但有些地方对校勘却有大

用。如第15行有“适斗麒麟，则暗虚潜值”一句。其中“暗虚”，传世文献讹作“暗虎”，盖因“虚”、“虎”形近而致误。残卷对于正确校理这个词起了一锤定音的作用。

传世杨炯《浑天赋》浑然一篇，不加分段。但残卷却有自然段落，用空两字的方法来表示。现存部分“西宫”（第2行，已残，但“西”字仍能识见残痕）下为一段，“南宫”（第5行）下为一段，“日者”（第11行）下为一段，“月者”（第14行）下为一段，“五星者”（第15行）下为一段，共五段文字。《晋志》、《隋志》的“二十八舍”次序，均为东、北、西、南。此残卷有“西宫”、“南宫”，则第1、2行的文字应属北宫。三种传世文献正作如是记载。残卷的分段显示杨炯《浑天赋》原有自然段落。仅此一端。亦可见残卷的价值不容小视。

杨炯在唐宋诗坛虽然名气颇大，但天不假年，约活了43岁（650—693?），大概也属于人们所说的“鬼才”之类。他在《浑天赋》序中说：“显庆五年（660），炯时年十一，待制弘文馆。上元三年（676），始以应制举，补校书郎。朝夕灵台之下，备见铜浑之象。寻返初服，卧疾丘园。二十年而一徙官，斯亦拙之效也。代之言天体者，未知浑、盖孰是；代之言天命者，以为祸福由人。故作《浑天赋》以辩之。”据此可知，《浑天赋》是他二十六岁补校书郎之后的作品。

我国古代的宇宙理论，至汉代，共形成三种观点：盖天说、浑天说和宣夜说。宣夜说虽具有比较彻底的宇宙无限思想，认识论上较为进步，但在实际进行天文观测时用处不大，因此不久便失传。对人们影响最大的是浑、盖两种宇宙观。盖天说最初认为天圆如伞盖，地方如棋盘。这实际只是对天空和大地的一种直观认识，因此屡受批评。后来这种宇宙观又修改为：天像一把向北斜靠着伞，只是没伞把；地则像倒扣着的盘子；天地都是中间高，四周低。这虽比最初的认识前进了一步，但仍不能正确说明日月五星的视运动。浑天说以东汉科学家张衡为代

表。他把天地比做一个鸡蛋：天圆得像蛋壳；地圆得像蛋黄，居于蛋壳内；“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浮”。浑天说虽也以地球为中心，但同天地结构的实际情形相接近，也能十分密合地解释日月五星的视运动。杨炯《浑天赋》中对三种宇宙理论进行了辨析，表明他的主张，这正是他这篇作品以《浑天赋》为题的原因。其后他对日月星辰的描述即本于此。但其真实用意却是借天言“命”，辨别“祸福”是否“由人”。

《浑天赋》文字瑰丽，悦人耳目。杨炯将枯燥的星官概念巧妙地糅合到文学语言之中，读来琅琅上口，意味深长。从残卷保存下来的那部分文字可见一斑。

S. 5777 号杨炯《浑天赋》残卷的确认，为中国文学史研究提供了一份古写本资料。至于此卷的抄写年代，目前尚难考定，估计是在唐代或唐宋之际。

（原载《文物》1993 年第 5 期，第 61—65 页）

敦煌写本《燕子赋》(甲种)“将军”释词

项楚先生在敦煌文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无论海内外,都备受赞扬。不过,任何一位学者的知识都有一定限度,只要超出其所熟悉的范围,就难免要出差错,项先生恐怕也不例外。其对敦煌写本《燕子赋》(甲种)中“将军”一词的解释就难以成立,有必要加以讨论。

项先生在《敦煌本〈燕子赋〉札记》^①一文中曾对“将军”一词列专目解释。他先引了《燕子赋》(甲种)一段原文:“仲春二月,双燕翱翔,欲造宅舍,夫妻平章。东西步度,南北占详,但避将军太岁,自然得福无殃。”然后就江蓝生先生《敦煌写本〈燕子赋〉二种校注之一》^②对“将军”一词的解释提出了批评。诚然,江先生把“将军”解释为“五道将军”确实欠妥,但项先生的解释同样也是错误的。项先生说:“实则‘将军太岁’之‘将军’,即是对‘太岁’的称谓,二者实为一事,无须别觅解释。”他在引过《抱朴子·内篇·地真》中的一段文字后说:“‘太阴’自东汉以后,即是‘太岁’的别称,而‘将军’则是对‘太阴太岁’的称谓。”之后,又引了清人赵翼《陔馀丛考》卷三十四“太岁大将军”条中的文字加以论证,最终得出结论说:“《燕子赋》‘将军太岁’并称,与赵翼所谓‘今术家’者正同。”

按照项先生的解释,太阴等于太岁,太岁又等于将军,于是太阴、太岁、将军三者便毫无差别,因此也就“无须别觅解释”了。然而就我所知,太岁、太阴、大将军这三个词,均是术士所用的年神名称,互不相同,

在敦煌古历中极为常见。我们有根据说明项楚先生在解释“将军”时,将太阴、太岁和将军混三为一。理由如下:

P. 3403《雍熙三年丙戌岁(986)具注历日一卷并序》云:“凡人年内造作,举动百事,先须看太岁及已下诸神将并魁罡,犯之凶,避之吉。今年太岁在丙戌,大将军在午,太阴在申……”

S. 0095《显德三年丙辰岁(956)具注历日并序》云:“凡人年内造作,举动百事,先须看太岁及已下诸神将并魁罡,犯之凶,避之吉。今年太岁在丙辰,大将军在子,太阴在寅……”

其他例证尚多,不烦赘引。由上引二历日已可证明,太岁、太阴、大将军三个年神皎然有别,不可混淆。此外,《燕子赋》中的“将军”就是“大将军”,《燕子赋》的作者为求文字对仗,省去了“大”字,这也是需要说明的,惜项楚先生未予说明。

见于敦煌历日的年神名称很多,并与历日纪年地支间有着固定对应关系。以往前辈学者、天文学史专家陈遵妫先生在《中国天文学史》第三册^③第1644至1645页曾列出一个对照表。但该表有一个明显的失误,即自1645页的“飞鹿”以上的年神方位与年地支对应(应当说明的是,太岁也与年天干对应),而以下的一部分项目,则只与年天干对应,陈表列在一起,极易产生混乱。我在《敦煌古历丛识》一文中,也曾给出一个“年神方位表”,共有三十九项内容。现摘出其中太岁、大将军、太阴在不同年份中的方位列表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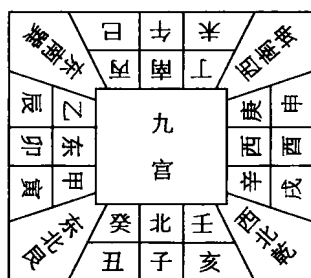
方 位 纪年地支	年神	太阴	大将军	太岁
子		戌	酉	子
丑		亥	酉	丑
寅		子	子	寅

(续表)

方 位 年神 纪年地支	太阴	大将军	太岁
卯	丑	子	卯
辰	寅	子	辰
巳	卯	卯	巳
午	辰	卯	午
未	巳	卯	未
申	午	午	申
酉	未	午	酉
戌	申	午	戌
亥	酉	酉	亥

由此表亦可看出,在不同年份中,术士所说的太岁、太阴、大将军各在不同方位,它们也是不一样的。

为了说明各种年神所在方位不同,下面再给出一个方位图:



这个图就是燕子夫妻在营造宅舍前,“东西步度,南北占详”,要避免开“太岁”、“将军”之凶位,以便趋吉营造的根据图。古时这类图形的方位共二十四个,即十二地支十二个,天干中的甲、乙、丙、丁、庚、辛、壬、癸共八个,以及八卦中的乾、坤、巽、艮四个,各自的位置即如上图。

朱雷先生曾对敦煌写本《燕子赋》中反映的逃户问题进行过深入研究,最终认为:《燕子赋》“甲种写本应作于武周圣历元年‘括客’之后,乙种写本应作于唐玄宗开元年间‘括客’之后”。而且所使用的均是“拟人化”的写作方法^④。正由于此,其中所使用的“占详”方法也应当从其时的现实生活中去寻找。历书中包含许多这一时代人们趋吉避凶的选择事项。因此,我们只有结合当时的实际生活,才能对《燕子赋》中“将军”一词做出切当的解释。

注释:

- ① 载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五辑,第111—112页。
- ② 载《关陇文学论丛·敦煌文学专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
- ③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 ④ 朱雷《敦煌两种写本〈燕子赋〉中所见唐代浮逃户处置的变化及其他》,载《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528页。

敦煌文献《唐贞观八年高士廉 等条举氏族奏抄》辨正

一

敦煌文献位字七十九号，是一件深受学人关注的唐代官文书。数十年来，中外学者反复研究，屡有所获。最早研究者是缪荃孙先生，他定名为《唐贞观条举氏族事件》^①，1931年，陈垣先生编《敦煌劫余录》，取名《姓氏录》。同年，向达先生撰文研究，认为不是显庆《姓氏录》，而是“贞观《氏族志》残卷”^②。五十年代初，牟润孙先生在台北著文，提出另外一种看法：残卷“固非显庆《姓氏录》，而亦绝非贞观《氏族志》”，“或是唐时山东大姓之衰宗破落户为增高卖婚价格所伪托之《氏族志》，且亦可谓之为唐太宗抑压山东大姓政策反响之产品”^③。后来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中又题为“唐贞观《氏族志》（姓氏录）残页”^④。近些年来，随着国内外出现“敦煌学”研究的新高潮，又有不少专家、学者撰文研究。引起重视的是王仲荦、唐耕耦二位先生的论文。王仲荦先生依缪荃孙说，名为《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并当作可信资料逐一考释^⑤。唐耕耦先生则认为：“不是贞观《氏族志》或伪托之《氏族志》，而是有关天下姓望的常识性著作。”^⑥日本学者热心研究这件文书的也不乏其人，如宇都宫清吉、仁井田陞、那波利贞、守屋美都雄、竹田龙儿、

多贺秋五郎、池田温等先生,都不同程度地作过研讨^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宇都宫清吉、仁井田陞和池田温三位先生的观点。宇都宫清吉于1934年提出,该文书是贞观《氏族志》的第一次版本,或者说是贞观《氏族志》的目录总说^⑧。之后,仁井田陞接受了宇都宫清吉的观点,在一篇论文中说:“本文暂时叫作《贞观氏族志》。它是较之贞观十二年第二次的《贞观氏族志》为早的版本,可以说是第一次《贞观氏族志》。初版本为高士廉等所撰,于贞观八年(634)公之于世。”^⑨五十至六十年代,池田温先生连续撰文。他基本接受了牟润孙先生的观点,认为是出自伪托,并称许牟先生否定文书第二部分真实性为“卓见”。此外,池田温先生还认为,这件文书的性质具有“通俗性、普及性”^⑩。

一件不长的敦煌文献,在半个多世纪中,吸引了中外诸多史林高手,竞相撰文,呕心研究,足见其重要。经过专家们多年潜心研讨,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它不是贞观《氏族志》,更不是显庆《姓氏录》。但对其真伪、性质、用途、名称等,时至今日,仍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

原文书前部已残,存47行。内容可分为四部分:前34行条列有关各郡郡姓的数量和姓氏,其中第1、2、7行下半部有残缺,第28行下部空白未写。第二部分由第35至45共11行,记载文书的缘起、修写过程和用途。第三部分仅1行,与第二部分有两行间隔,是抄写者的题记:“大蕃岁次丙辰后三月庚午朔十六日乙酉鲁国唐氏苾当悟真记。”“大蕃岁次丙辰”即唐文宗开成元年(836)。可知,它抄写于吐蕃统治末期。第四部分与题记又有四行间隔,正中大字朱书“勘定”二字,笔锋甚硬,与前三部分笔迹迥异,系另一人所写^⑪。

迄今为止,争论较多的是文书第一、二两部分,其中又以第二部分为最。这是由于它直接关系到文书的真伪、名称、性质和用途。本文重点就是辨正这部分内容,旁及其它。现将文书第二部分逐录如次:

35. 以前太史因尧置九州,今为八千(十)五郡,合三百
36. 九十八姓。今贞观八年五月十日壬(庚)辰,自今已
37. 后,明加禁约:前件郡姓出处,许其通婚媾。结
38. 婚之始,非就委怠(悉),必须精加研究,知其囊(曩)谱,相承
39. 不虚,然可为疋(匹)。其三百九十八姓之外,又二千一
百杂
40. 姓,非史籍所戴(载),虽预三百九十八姓之限,而或媾
41. 官混杂,或从贱入良,营门杂户,慕容商贾之类,
42. 虽有谱,亦不通。如有犯者,剔除籍。[左]光禄大夫兼
43. 吏部尚书、许国公士廉等奉
44. 敕,令臣等定天下氏族。若不别条举,恐无所
45. 冯。准令详事讫,[谨]件录如前。 敕旨:依奏。

文书记录的是贞观八年(634)的事,而现存抄件写成于文宗开成元年(836),上距原件形成已有202年之久。由于是门下“更写件”(详下文)并经传抄,故讹脱甚多。但经过校正,上述引文仍可基本通读。

对于这段涉及文书真伪、性质、用途、名称的文字,究竟应当怎样理解?如何解释才更加合乎唐初的历史实际,合乎情理?

二

首先需要考察的是,文书第二部分的真伪和文书的性质。

前引文书第二部分,涉及到一些唐代史实、官制和公式令文,今逐一考察如下:

(一)文书原形成于贞观八年五月十日,高士廉的散官、职事和封爵分别是:光禄大夫、吏部尚书和许国公。据两《唐书·高士廉传》记

载,高士廉于贞观元年“擢拜侍中,封义兴郡公”,后因故出为安州都督,转益州大都督府长史。贞观五年,“入为吏部尚书,进封许国公”。至贞观十二年,才又拜为尚书左仆射,授申国公。因此,贞观八年时,他正是吏部尚书、许国公。至于其散官品阶,本传均未记载曾为光禄大夫。但查《全唐文》卷一五二许敬宗撰《大唐尚书右仆射司徒申文献公莹兆记》却有“□□(益)州大都督府长史,进位左光禄□□(大夫)”。证明高士廉在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时,散官已进为“左光禄大夫”^⑫。此后,直至贞观九年五月,唐高祖死,因营造山陵制度有功,又进位为特进^⑬。文书记录高士廉贞观八年时散官为“光禄大夫”,前脱“左”字,当补正。可以说,除散官有一脱字外,文书所记高士廉的职事官与封爵,同旧史记载都很一致。

(二) 根据以上补正,文书中高士廉的散官和职事官连署时应是:“[左]光禄大夫兼吏部尚书”(第42—43行)。唐初,左光禄大夫为从二品文散官^⑭,吏部尚书是正三品职事官。《旧唐书·职官志》:“凡九品以上职事,皆带散位,谓之本品。……《武德令》:职事高者解散官,欠一阶不至为兼;职事卑者,不解散官。《贞观令》:以职事高者为守,职事卑者为行,仍各带散位。其欠一阶,依旧为兼。”可知《贞观令》承袭了《武德令》“欠一阶不至为兼”的规定。吏部尚书比左光禄大夫正好低一阶,故高士廉具官是“[左]光禄大夫兼吏部尚书”,完全符合《贞观令》^⑮。

(三) 高士廉署名“士廉”而不具姓。《唐六典》卷八门下省载,官史上书时,“公卿、校尉、诸将不言姓,大夫以下皆言姓。”高士廉为吏部尚书,自属“公卿”,署名不具姓,也合乎令文规定。

(四) 第43—44行“许国公士廉等奉敕”一句,第43行只写到中间,便将“敕”字抬头另起一行平出;第45行“敕旨”二字与上文间空二字之位置。《唐六典》卷四礼部郎中员外郎条:“凡上表、疏、笺、启及判、策、文章,如平阙之式。”原注曰:“谓昊天、后土、天神、地祇、上帝、天帝、庙

号、桃、皇祖妣、皇考、皇妣、先帝、先后、皇帝、天子、陛下、至尊、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皇太子皆平出。宗庙、社稷、太社、太稷神主、山陵、陵号、乘舆、车驾、制书、敕旨、明制、圣化、天恩、慈旨、中宫、御前、阙廷、朝廷之类，并阙字。”文书第44行的“敕”字即代表皇帝、天子等，故须平出；第45行“敕旨”二字，其前依令当有阙字。对照公文，文书这两种写法与公式令规定的平阙式也十分契合。

以上四个问题，除第二条已为牟润孙、唐耕耦二先生所注意，但在解释上均发生错误外，其它向未引起重视。而这四个问题经考察后，除高士廉的散官光禄大夫前脱一“左”字，应予补正，其余各条与唐代史实、官制、公式令文完全相合。牟、唐二位先生研究这件文书用功甚多，但由于忽略了上述问题或未加深究，便对文书第二部分真实性持疑，甚至认为是“无识者所为”^⑩，显然缺少根据。由上述考证可知，它应当是“有识者所为”，从而真实可信。整件文书传抄后错讹满纸，足见抄写者水平不高。可是偏在这些涉及史实和制度的地方却基本无错，这能是偶然的吗？如果说是“无识者所为”，“无识者”能够编造出这样高超的作品吗？

这件文书的性质又如何呢？

由文书“敕旨：依奏”，我们可以确定它是一件奏抄。

《唐六典》卷八门下省：“凡下之通于上，其制有六：一曰奏抄，二曰奏弹，三曰露布，四曰议，五曰表，六曰状。”“奏抄”下又注曰：“为祭祀、支度国用、授六品以下官、断流已下罪及除免官当者，并为奏抄。”这是关于奏抄使用范围的令文规定。但事实上，“奏抄”使用范围绝不限于这几方面。我们试举数例：

《唐会要》卷二六《皇太子见三师礼》条：“太和八年十月，太常礼院奏，今月十七日，皇太子与太师相见，请前一日开崇明门内外门，所司陈设。依奏。”这是关于礼制方面用奏抄的例子。

《唐会要》卷八〇《溢法杂录》条：“[元和]十四年……都省奏，伏准太常博士李虞仲奏，凡官秩合得请溢者，必先葬期请于考功，牒送太常寺礼院……更审条疏，明立节限闻奏者。今与考功郎中萧祐、太常博士李虞仲等商议，具条疏节限如前。敕旨：依奏。”这是关于定溢方面用奏抄的例子。

《唐会要》卷八二《甲库》条：“贞元八年闰十二月，给事中徐岱，中书舍人奚陟、高郢等奏，比来甲敕，只下刑部，不纳门下省甲库，如有失落，无处检覆。今请准制敕，纳一本入门下甲库，以冯检勘。敕旨：依奏。”这是甲库方面用奏抄的例子。

事实上，我们从《唐会要》中还可找到大量百司所上奏抄的节文。它们说明，奏抄实际使用范围绝不限于令文规定。大而言之，除奏弹、露布、议、表、状以外，其它凡有事请施行而上于皇帝者，均可列入奏抄范围。位字七十九号文书正复如是。

我们再考察一下“敕旨”的使用范围。《唐六典》卷九中书省：“凡王言之制有七……五曰敕旨，谓百司承旨而为程式，奏事请施行者。”《新唐书·百官志》：“敕旨，百官奏请施行则用之。”说明“敕旨”是限于百司或百官依照皇帝旨意，承办了某事，奏请准予施行，皇帝批答时的专用语。就位字七十九号文书来说，“敕旨：依奏”正是唐太宗对高士廉等人所上奏抄的批答，与令文规定完全相合而不淆乱。

以上位字七十九号文书众多方面与唐代史实和有关制度都相符合。但是，现存抄件是否就是文书的原始面貌呢？对此，似应再作深入考虑。

依据唐朝官吏上奏惯例，在原奏抄左下方，当有高士廉等人具官封臣名，年月日；送到尚书省后，左、右仆射和左、右丞也当具官封臣名，年月日，然后再转到门下省审议。

《唐六典》官八门下省载：“给事中，掌侍奉左右，分判省事。凡百司

奏抄，侍中审定，则先读而署之，以驳正违失。”据此，到门下省后，给事中先要读过并具官封臣姓名。

同书同卷又载：“其奏抄、露布侍中审，自余不审。”据此，侍中也必须审核并具官封臣名。经过门下省给事中、黄门侍郎、侍中三级长官审议之后，一件奏抄才能进呈皇帝批准。

同书同卷又载：“覆奏画可讫，留门下省为案。更写一通，侍中注制可，印缝、署，送尚书省施行。”据此，原始奏抄皇帝批准后即存入甲库为档，送到尚书省施行的是“更写”的副本，且要求侍中注上“制可”，印缝，并具官封臣名，宣布施行。根据以上法典规定，并参照敦煌文献中的《六条公式令》(P. 2819)，可将文书 45 行以后大致复原如下：

45 冯。准令详事讫，[谨]件录如前。

左光禄大夫兼吏部尚书许国公臣 士廉

(散官)御史大夫(封爵)臣 挺

(散官)中书侍郎(封爵)臣 文本

(散官)礼部侍郎(封爵)臣 德菜

谨奏(或：谨奏以闻，伏听敕旨)

贞观八年五月十日

左(或右)仆射具官封臣名

左(或右)丞具官封臣名

贞观八年五月 日

给事中具官封臣姓名读

黄门侍郎具官封臣名省

侍中具官封臣名审

贞观八年五月 日

敕旨：依奏(当为侍中注，原件应是朱笔)

敕旨如右，请奉

敕付外施行

侍中具官封臣名宣

贞观八年 月 日

这样，作为原始奏抄的副本，在送尚书省施行前的基本面貌就相当清楚了。对照一下文书现存面貌就会发现，现存文书只保留了高士廉等人所上奏抄的核心内容和唐太宗的批答，其它属于公式令规定的套式已被删去。如果说现存文书是原始奏抄的节本，也不为过。

这种情况是如何出现的呢？我们知道，这件文书不是发到某个部门，而是向全国发布的，到尚书省后，需由书手抄写数百乃至上千份，才能满足需要，因此，很可能在交书手抄写时，已做了删繁就简的工作。简化到原奏抄的核心内容和皇帝批准施行，已是最大限度，此外不能再简。

将一件原始奏抄删繁就简以符合某种需要，在史籍中屡见不鲜。如本文前引《唐会要》三例即属此类。不过，史籍中的大量实例是史臣为编史而简化的，而位字七十九号的简化则是为了广泛传布。这两种简化，行文语气略有不同，仔细阅读，即能分辨。

尽管位字七十九号文书的现存面貌只是原文书的节本，但它依旧与唐代史实、官制、公式令文相符合，因而真实可信，性质仍为一件奏抄，殆无疑义。

三

这件文书的用途，或者说，它何以会产生，也是学者们十分关心而又争论颇多的问题。

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应从唐初解决旧士族卖婚问题的有关措施中

寻求答案。

众所周知,魏晋南北朝是门阀士族在政治、经济、社会方面居于垄断地位的时代。至唐初,由于士族自身的腐朽,加以屡次农民战争的沉重打击和军阀混战的震荡,门阀士族衰落了下来。政治上,他们不能再“平流进取,坐致公卿”,失去了世袭做官的特权。经济上,广占田园,荫占成百上千的部曲、佃客,并享受免役特权,也已成为不可能,力量受到损削。但是,在社会上,他们却还有很高的声望,所谓“名虽著于州闾,身未免于贫贱”,^①说的正是这样情况。旧士族的社会地位主要表现于婚媾。他们高自标置,虽已“世代衰微,全无冠盖”,但“犹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间,则多邀钱币。”^②他们或于旧族内部互相婚媾,以维系其高贵血统,挽救垂危的厄运;或与唐朝冠冕联姻,“依托富贵”,恢复力量并扩大已衰的势力。唐朝一些三品以上的达官贵人,也“慕其祖宗,兢结婚媾,多纳货贿,有如贩鬻”,甚至“贬其家门,受屈辱于姻娅”。^③这不仅有丧唐王朝的体统,而且对唐太宗来说,无疑是一种政治离心力。李世民不能不管,他要用行政权力进行干预。

如何干预呢?《贞观政要》卷七《礼乐》记载说:

贞观六年,太宗谓上书左仆射房玄龄曰:“比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广索聘财,以多为贵,论数定约,同于市贾,甚损风俗,有紊礼经。既轻重失宜,理须改革。”乃诏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刊正姓氏。普责天下谱牒,兼据冯史传,剪其浮华,定其真伪,忠贤者褒进,悖逆者贬黜,撰为《氏族志》。

由这段文字可知,“刊正姓氏”是“贞观六年”唐太宗“诏”高士廉等

去做的事情,以及如何做。我们试将其中几句话同前引位字七十九号的有关文句对比如下:

《贞观政要》	位字七十九号文书
“诏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刊正姓氏。”	“[左]光禄大夫兼吏部尚书许国公士廉等奉敕,令臣等定天下氏族。”
“普责天下谱牒。”	“结婚之始,非旧委悉,必须精加研究,知其曩谱。”
“据冯史传。”	“非旧史所载”。
“剪其浮华,定其真伪。”	“或媾官混杂,或从贱入良,营门杂户,慕容商贾之类,虽有谱,亦不通。”

不难看出,《贞观政要》关于“刊正姓氏”的概括性文字,不仅同位字七十九号文书内容相一致,而且主要文句也能部分对应。这既是位字七十九号文书真实性的又一极其有力的证据,同时还告诉我们,《贞观政要》所载“刊正姓氏”与文书记录的“定天下氏族”是一回事,非此莫属。从时间上看,“贞观六年”唐太宗诏高士廉等人“刊正姓氏”,而到“贞观八年五月十日”,高士廉等工作结束,将刊正结果奏上听裁,也十分吻合。

上述考察表明,毫无疑义,位字七十九号文书就是唐初“刊正姓氏”的真实记录。“刊正姓氏”的过程和内容,以及反映出的问题,我们不仅可以通过《贞观政要》,而且更主要的是能通过这件文书来了解。现综合概括如下:(一)贞观六年,唐太宗命高士廉等人“刊正姓氏”,或曰“定天下氏族”,至贞观八年五月十日工作结束,高士廉等将刊正结果奏上听裁;(二)这次工作只限于“刊正姓氏,即“遍责天下谱牒,质诸史籍,考其真伪”,^②将各色假冒牌从士族队伍剔除出去,尚未有修定《氏族志》,更无重划等级的明确意图;(三)由“前件郡姓出处,许其通婚媾”可知,

“刊正姓氏”的目的,在于解决士族之间的婚媾问题;(四)“刊正”后的姓氏门阀观念十分浓重,除去三百九十八姓,其它“非史籍所载,虽预三百九十八姓之限,……虽有谱,亦不通。如有犯者,剔除籍”;(五)由文书“敕旨:依奏”可知,对刊正后形成的门阀观念十分浓重的文件,唐太宗同意过,说明贞观八年时,他还没有压抑旧士族的打算,对如何解决旧士族的卖婚问题尚未形成清楚的认识,这与第二点相一致。

对于此次刊正姓氏的目的和客观效果,我们还可以结合文书第一部分去做探索。这次刊正的结果,只是在全国范围核定了旧史记载的八十五个郡望中的三百九十八姓,允许互通婚媾。文书虽残,但至今尚存六十六郡,二百五十三姓,虽非完璧,也还能窥知大部。残存的郡姓,主要分布在河东、河北、河南、江南四道,正是旧士族和北朝“虏姓”广泛分布的地区。其它山南、淮南、剑南为数极少,岭南没有^①。前缺部分,应是关内道和陇右道,亦即关中士族和关陇军事贵族集聚的所在,郡姓约占总数三分之一。我们虽然无法看到文书中关内、陇右两道郡姓的姓氏,但作为唐朝颁布的官文书,而且又是新定氏族,关陇集团的统治者绝不会将自己排除在外,情理昭然。这样,就可以推测,它是在“刊正姓氏”之后,保障关陇贵族、关中、河东、河北、河南、江南旧士族以及北朝“虏姓”互通婚媾,通过联姻,结成一种政治联盟,以便获得各种社会力量对李唐王朝的支持。但是,这只是李世民的一厢情愿。如前所述,旧士族采取不合作态度。他们自视高贵,互结婚媾;当朝大臣为了提高自己的门望,也竞相与之联姻。“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所不齿。”^②而这个文件又公开允许与旧士族通婚,那么就只能使攀附旧门的风气愈演愈烈。可以说,它根本就是李世民最初解决旧士族卖婚问题的失败记录。不过,也由此获得了教训,唐太宗才决定修一个《氏族志》,划分等级,提高关陇贵族及其附属力量的社会地位,并压抑

旧士族。它表明,唐太宗对如何解决旧士族的卖婚问题经历过一个认识和实践过程,并非一开始就非常明确。以上主要是根据文书本身推测出的认识。

但是,如果细读前引《贞观政要》的文字:“乃诏……刊正姓氏,……忠贤者褒进,悖逆者贬黜,撰为《氏族志》”,则此次“刊正姓氏”就成了贞观十二年修定《氏族志》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如通常所理解,唐太宗在正式修《氏族志》之前,先让高士廉等人辨别真伪,将假冒牌剔除出去,然后再“类其等第以进”。^③这是根据《贞观政要》获得的认识。

从以上分析来看,我们虽然已经证明《贞观政要》所载“刊正姓氏”和文书记录的“定天下氏族”同属一事,但对“刊正姓氏”的目的却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认为,它是修《氏族志》的必要准备,由《贞观政要》得出。这种看法与位字七十九与文书矛盾极大。因为修《氏族志》的目的是压抑旧士族,为众所周知。可是文书却载明,刊正姓氏是为了保障新定氏族互通婚媾。真是风马牛不相及!这该如何解释呢?另一种解释,即如笔者依据文书本身所作的推测,认为“刊正姓氏”是在修《氏族志》之前发生的另外一个独立事件,此事失败,才导致《氏族志》的修定。这种解释,虽然除文书本身之外,还缺少其它证明,但比前一种解释困难要小得多,为了证明我们的认识,有必要对前引《贞观政要》的文字再略作分析。

我们已经明确,“刊正姓氏”发生于贞观六年至八年五月之间,而《氏族志》的最后修成则是在贞观十二年正月,时间接近,并且都是高士廉等四人主持的,这就会出现下述可能,吴兢在修《贞观政要》时,将两件事牵合在一起,合并叙述,并有为唐太宗隐讳“刊正姓氏”,让旧士族与关陇贵族通婚,而结果失败的意图。目前能够看到记载“刊正姓氏”和修撰《氏族志》经过的史籍,主要是《贞观政要》、《旧唐书》、《新唐书》、《唐会要》和《资治通鉴》五部书,全部都是合并叙述,文字也大同小异。

但后四部书成书都晚于《贞观政要》，说明最初抄自《贞观政要》，而后又互相传抄。可能是吴兢过分剪裁省略，或者合并叙述，以及为唐太宗隐讳等原因，才将这两件目的各不相同的事混合在一起，遂使后人产生误解，以致影响了对《氏族志》作出正确评价，也扰乱了我们对位字七十九号文书的正确理解。

《贞观政要》牵合、省略的事例很多，这里仅举一例以为佐证。在前引卷七《礼乐》记述唐太宗命高士廉等“刊正姓氏”，以及贞观十二年修成《氏族志》之后又说：“又诏曰：氏族之美，实系于冠冕，婚姻之道，莫先于仁义”云云，全文引录了唐太宗贞观十六年六月下的《禁卖婚诏》。这道诏令又见于《唐会要》卷八三嫁娶条，颁发时间十分清楚。可是在吴兢笔下，却泯没了下诏的时间。如果没有《唐会要》互证，那就可能使我们误以为它同《氏族志》一样，都是在贞观十二年颁发的。读史者可不慎欤？

附带指出，对于文书第一部分所载各郡郡姓，王仲荦先生考释得极为精详，本文不赘。唐耕耦先生对文书现存六十六个州郡名称，依据汉至唐代的地理著作逐一考察，结果是：“隋唐以前共二十八，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二强；既可算隋唐以前，又可算隋唐时的为二十一，占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二弱。隋唐时期的为十七，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六弱。其中，仅仅果州和临海郡台州，因果州、台州始置于武德四、五年，可说是唐朝新置的，其余六十四郡州可以说都是唐以前的。”这项考察结果极有参考价值。对于“为什么州郡沿用旧称的如此普遍”，唐先生解释说：“由于摘录的材料，时代有先后，编著时又未予加工统一，因而同一卷子所列州郡的时代，有唐初的，隋代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魏晋以前的。”同样很有见地。但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件文书是“有关天下姓望的常识性著作”，就值得商讨了。我们在前引《贞观政要》的文字中看到，唐初刊正姓氏的重要特点是“普责天下谱牒，兼据冯史传”，位字七十九号文

书也说“非史籍所载”云云，一致表明，刊正姓氏的必要步骤，是将现存谱牒与史传记载相对照，必须寻找出历史根据，方能定其真伪。凡是有历史根据的，“相承不虚，然可为匹”；反之，如果“非史籍所载，虽预三百九十八姓之限”，则“虽有谱，亦不通”。换言之，正因为文书第一部分所载郡姓，全能在史传上找到根据，实而不伪，所以给予认可，允许通婚。而史传上的州郡，有属于大九州的，也有州辖郡的，还有自隋以后某州即某郡的，其中又有沿革，基于此，文书中州郡沿用旧称才非常普遍，并且体例不一。考察这个问题，必须把文书当成一个整体，结合文书第二部分和《贞观政要》的有关文字去研究。否则，得出的结论就可能与史实南其辕而北其辙。

四

在前述考察的基础上，再研究一下文书的定名问题。

前辈学者曾给它取过许多名称，已如前述。这些说法不一的名称，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文书的内容和性质？都有必要重新考虑。

比较前贤所定名称，惟有牟润孙先生《唐贞观条举氏族事件》与史实较为接近。但它仍有缺陷。因为用“事件”一词，只能说明唐贞观八年条举过氏族，而不能体现文书的奏抄性质。

那么，用什么名称更能全面概括这件文书，体现其本质特征呢？

前引《贞观政要》“诏……刊正姓氏”，只能说明唐太宗下过刊正姓氏的诏令，而不能体现这件文书是对诏令要求所做工作的答复，因此，不能取名《唐贞观八年高士廉等刊正姓氏奏抄》。如果把唐太宗下过的诏令定名为《唐贞观六年 月 日刊正姓氏诏》，那则是完全正确的。

前引位字七十九号文书云“令臣等定天下氏族”，情况同上。因此，也不能取名《唐贞观八年高士廉等新定天下氏族奏抄》。

幸好,高士廉等人的奏书中有“若不别条举”云云,说明文书是将刊正过的姓氏逐一“条举”,奏上听裁的。据此,将这件文书定名为《唐贞观八年高士廉等条举氏族奏抄》较为合适。这样,就能更加准确地体现文书系有司承旨而为程式,然后奏请施行的奏抄性质。

五

文书第三、四部分前贤论列极少。实在说,如果想对悟真抄写文书的目的和整件文书获得较为全面的认识,详细探讨这两部分内容,则十分必要。

文书第三部分即题记是:“大蕃岁次丙辰后三月庚午朔十六日乙酉鲁国唐氏苾刍悟真记。”

其中纪年,向达先生考证为唐文宗开成元年(836)^{②4},已为学术界所共认。有疑义的是:“后三月庚午朔十六日乙酉”。向先生说:“以长历推之,亦不相合,岂当时边陲陷于吐蕃,致历朔亦异于中土耶?”^{②5}缪荃孙、牟润孙二位先生则认为,这是由于当时敦煌与中原历法不同,致有该年中原闰五月,吐蕃闰三月之别,确为卓见。据陈垣先生《二十史朔闰表》,唐文宗开成元年,中原历四月庚午朔,十六日乙酉,闰五月。题记“后三月庚午朔十六日乙酉”,即敦煌历该年闰三月,朔日亦是庚午,十六日乙酉。两相比较,敦煌历比中原历闰早两月。数十年来,中外学者对敦煌历日反复研讨,证明自河西陷蕃,割断了敦煌同中原王朝的联系,敦煌地区自有其历法系统。翟奉达、翟文进、安彦存都是著名的敦煌历编撰者。所撰历书,一般月朔与中原历不尽相合,置闰也有一到两月之差^{②6}。因此,题记中的纪月比中原历闰早两月实属正常现象。

“鲁国唐氏”何所指?查文书第17行有:“鲁国郡七姓,兖州。夏、孔、车、唐^{②7}、曲、栗、齐。”说明抄写者悟真确认其先人是文书中鲁国郡

的唐姓士族(悟真先人出自中原,详下文)。敦煌文献中,认定自己先人是鲁国郡某姓士族的不只悟真,如 P. 2715《孝经白文》题记有“此是鲁国孔李七探讨之书”,与悟真一样,都认定自己先人是鲁国郡的士族。这种现象,唐人刘知幾在《史通·邑里篇》解释说:“自世重高门,人轻寒族,竞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若仲远之寻郑玄,先云汝南应劭;文举之对曹操,自谓鲁国孔融是也……又近世有班秩不著者,始以州壤自标,若楚国龚遂,渔阳赵壹是也。”龚遂,西汉人;孔融,三国人。其时所谓楚国、鲁国早已亡灭,仅借此标其郡望耳。悟真也是“班秩不著”,自称“鲁国唐氏”,部分理与此同。更何况他还在这件手抄的唐代官文书中找到了自称“鲁国唐氏”的确凿根据哩。

“苾刍”即“比丘”之异译,或曰“佛门弟子”。“悟真”乃唐和尚法号。

悟真和尚的行踪,宋·赞宁《僧史略》中曾有寥寥数语,语焉不详。但敦煌文献中,涉及悟真生平和他从事僧政活动的材料,数量相当可观,是了解悟真生平踪的珍贵资料。现根据研究文书题记的需要,择其要者说明如下:

第一,悟真先人出自中原,本人生于河西。P. 3720 有唐朝敕授悟真和洪誓的告身一件,内云:“盖闻其先出自中土,顷因及瓜之戍,隔为辮发之宗。”^②可知悟真父辈或祖辈是唐朝派往河西戍守的中原军健,因陷蕃而无从返里。同伴另一牒文又载,大中五年,悟真被派往长安进奏天子时,曾与两街千福寺大德写诗酬答。悟真在诗中说:“生居狐狢地,长在碛边城”云云,又可知他本人生于河西。

第二,悟真是张议潮收复河陇的积极赞助者。这除了见于唐朝敕授洪誓和悟真的告身,还为他自己的文字所证实。P. 3720 收有唐朝敕授悟真的四件告身、两件牒文,悟真将它们编在一起时作序说:“特蒙前河西节度使、故太保随军驱使,长为目(孔)目,修表题书,大中五年入京奏事,面对玉阶,特赐章服。”说明他于张议潮举义后,曾入议潮节度幕

府任孔目官，又于大中五年被派往长安谒见天子。S. 930 和 P. 2748《国师唐和尚百岁书》载有悟真所写的十首抒怀诗，其中第七首云：“男儿发愤建功勋，万里崎岖远赴秦。对策圣明天子喜，承恩特立一生身。”更是悟真支持张议潮举义的豪情壮志的写照。

第三，悟真享年约八十岁，抄写文书时年龄约在二十岁左右。据 P. 3720 唐朝敕授悟真四件告身和两件牒文可知，他在大中五年进奏长安后，大中十年（856）升任沙州都僧录；咸通三年（862）升任河西副僧统；咸通十年（869）再升为河西都僧统，直至去世。P. 3100 载有一件《景福二年（893）十一月某日某寺徒众供英等状》，请求让律师善才充任寺主，判辞是：“寺舍广大，众举一人，还须堪任。准状补充，便命勾当。二十七日，都僧统悟真。”说明公元 893 年时他还活着。悟真于乾宁二年（895）谢世。P. 2856《营葬僧统榜》云：“僧统和尚迁化，今月十四日葬。准例排合葬仪，分配如后。”文末纪年为“乾宁二年三月十一日”。日本学者竺沙雅章曾推断悟真享年八十岁^②，大致不误。因为在前引《国师唐和尚百岁书》序中，悟真就已自称“年逾七十”云云。由乾宁二年（895）上推至文书抄成的唐文宗开成元年（836），共是五十九载，悟真又活了八十来岁，故知他是在二十来岁时抄写这件文书的。

明确以上二点，对于认识悟真何以要在题记中强调自己是“鲁国唐氏”十分重要。它不单是一般地借远古的郡望自我标置，而是另具特殊意义。我们知道，吐蕃占领河西约七十年间，将汉人编为部落，残民以逞，致使耕稼失时，百姓如入汤火。沦没为奴婢的河西人民对中原王朝始终盼念，渴望早日收复。长庆二年（822），唐派大理卿刘元鼎与吐蕃论讷罗就盟其国，刘元鼎等汉官“至龙支城，耄老千人拜且泣，问天子安否，言：‘顷从军没于此，今子孙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兵何日来？’言已，皆呜咽。”^③因从军河西而没于吐蕃统治之下的中原军健及其子孙，数十年后，都未忘记自己是唐朝臣民，悌悌惶惶，渴望收复。一

旦张议潮举义，“汉人皆助之”^③，即刻遣使归唐。悟真虽生在河西，又出家为僧，但同样是“未忍忘唐服”的中原军健子孙。他正是以这样的身份来参加张议潮节度幕府，并积极效力的。悟真向往故土和中原王朝的思想，青年时代就铭刻于心，他抄写文书时，强调自己是“鲁国唐氏”，正是这种感情的流露。同时也可看出，文书重抄后错讹满纸，除了传抄之外，与悟真当时年龄较小，文化素养还不很高有关。

但是，仅此还不足以说明悟真抄写这件文书的确切意图，或者说要派什么用场。

历史记载表明，自汉以来，世间为他人撰写墓志、传记、称颂功德以及写其它一些纪念性文字时，常须述及里贯，如果出自士族，更要标明郡望。至唐，此风未消。刘知幾在《史通·邑里篇》中又说：“天长地久，文轨大同，州郡则废置无恒，名目则古今各异。而作者为人立传，每云某所人也，其地皆取旧号，施之于今。”中原如此，河西也不例外；俗间乐于此道，僧界好尚颇同。如南朝梁·慧皎所撰《高僧传》中记有：

竺道生，本姓魏，巨鹿人。寓居彭城，家世仕族。（卷七）

释僧慧，姓皇甫，本安定朝那人，高士谥之苗裔，先人避难，寓居襄阳，世为冠族。（卷八）

他如释慧球、释宝亮、释法通等人的传记，如出一辙。这种风气世代相袭，直至九世纪的敦煌僧界，仍是盛而不衰。就悟真而论，他在升任都僧统前后，曾为别人写过许多邀真赞之类的文字，P. 4660 就有十二件出自悟真之手。在这些文字中，悟真也经常称颂某某人是何处士族或豪族。如：

《前河西都僧统京城内外临坛大德三学教授兼毗尼藏主赐紫

故翟和尚邈真赞》有云：“兹绘像者，何处贤良？翟城贵族，上蔡豪强。”（无纪年）

《敦煌管内僧政兼勾当三窟曹公邈真赞》有云：“武威贵族，历代英雄。”（“于时文德二年岁次己酉六月廿五日记”）

《沙州释门故阴法律邈真赞并序》有云：“敦煌令族，高门上户。”（“大唐广明元年庚子岁六月廿六日记”）

其他如《康使君邈真赞》、《阎公邈真赞》、《阴文通邈真赞》等，均有类似的文句，无须赘述。这些一致表明，悟真晚年多次使用过谱学资料。诚然，这并非限于悟真一人，P. 4660 所载其他人如张球、李颀、法师恒安撰写的，以及一些无撰人的邈真赞，也屡次提到某人是“敦煌豪族，墨池张氏”，或“太原望族，流引敦煌”等，足见此乃风尚使然。

不过，悟真为他人写邈真赞是在晚年，抄写文书时年仅二十来岁，尚无名位，自然还不具备这样的资格。那么，他为何要抄写这件有关氏族的文书呢？这就必须注意文书第四部分的内容。

前已述及，文书第四部分与题记有四行间隔，正中大字朱书“勘定”二字，笔锋甚硬，显系另一人所为。而且在文书第一部分条列各郡郡姓的郡名之上，均有朱笔圆点^②，说明悟真抄完之后，确有另一人将抄本与蓝本逐条对过，证明无误，准许作为定本使用。校勘者是谁？他为何有权确认抄本无误，准许作为定本使用呢？我们只要考虑一下悟真当时的身份是一位出家不久的青年和尚，那么，此人就很可能是悟真所在寺院的高僧。寺院里不存在婚媾问题，高僧需要这类有关氏族的文书，就只能有两种解释：一是写邈真赞或传记时，需要辨别某人是何处士族，这由寺院的实际需要所决定；二是因习尚看重士族、郡望，故用以对僧徒进行谱学知识的教育。如 S. 2052《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一卷并序》就说：“夫人立身在世，姓望为先，若不知之，岂为人子？虽即博学，

姓望殊乖，晚长后生，切须披览。”足见谱学知识乃是当时一般仕子和僧众必备的常识。这两种可能虽系推测，但舍此，很难再作其它解释。令人发笑的是，正是这个被某位高僧认可过的“定”本，却错得一塌糊涂。千余年后，等到它重新面世，学者们才有机会逐步予以订正。

需要说明的是，高僧命悟真抄写这件奏抄，是在原文书形成 202 年之后，其目的在于应写传记之类文字的实际需要，或作为传授谱学知识的教材；而原奏抄则是在刊正姓氏之后，保障新定氏族互通婚媾。因此，不能错误地理解成，文书最初产生就是为了辨别真伪，以便写传记时检核，或作教材使用。二者皎然有别，不容混为一谈。

综合以上辨证，概括如下：位字七十九号文书完全真实可信；其性质是一件奏抄，其现状只是原始奏钞的节本；它的用途同唐初解决士族的卖婚问题有关，也是贞观年间“刊正姓氏”的真实记录；“刊正姓氏”可能是同修《氏族志》既有内在联系，但又目的不同的独立事件；文书第一部分来源复杂，体例不一，是“刊正姓氏”时将现存谱牒同史传记载相核对，逐一找出历史根据的必然结果；文书的名称应该是《唐贞观八年高士廉等条举氏族奏抄》；悟真和尚年轻时受高僧之命抄写它，或是应当时寺院写邈真赞和传记等实际需要，或作为传授谱学知识的教材；抄写时，悟真确认自己先人是文书中鲁国郡的唐姓氏族，故特别标出，并借此寄托对中原故土的怀念。

（原载《中国史研究》1986 年第 1 期，第 160—173 页）

注释：

- ① 缪荃孙《唐贞观条举氏族事件卷跋》，载《辛壬稿》卷三。今见王重民编《敦煌古籍叙录》，中华书局，1979 年，第 101—102 页。
- ② 向达《敦煌丛抄叙录》，载《北平图书馆馆刊》五卷六号。今见《敦煌古籍叙录》，第 101—104 页。
- ③ 牟润孙《敦煌唐写姓氏录残卷考》，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第 3 期，1951 年。

- ④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第1册,第92—93页间插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
- ⑤ 王仲荦《〈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残卷考释》,载《文史》第九辑。
- ⑥ 唐耕耦《敦煌唐写本天下姓望氏族谱残卷若干问题》,载《魏晋隋唐史论辑》第二辑。本文所引唐先生的观点均见此文。唐先生另文《敦煌四件唐写本姓望氏族谱(?)残卷研究》亦论及位字七十九号,载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二辑,可参阅。
- ⑦ 那波利贞《隋唐五代宋社会史》三《打破传统沉滞的社会弊风方针的唐太宗》,第124—125页,见《支那地理历史大系》第七篇,1941年;守屋美都雄《六朝门阀的研究——太原王氏谱系考》,第122—135页,1951年;竹田龙儿《唐代士人郡望》,载《史学》卷二四第41期,1951年;多贺秋五郎《古谱的研究》,见《东洋史学论集》四,1955年。其他各位论文见以下引文注。
- ⑧ 宇都宫清吉《关于唐代贵族的考察》,载《史林》卷一九第3期,1934年。
- ⑨ 仁井田陞《敦煌发现的天下姓望氏族谱》,见《石滨先生古稀纪念东洋学论丛》,1958年。又见《中国法制史研究》第3册《奴隶农奴法·家族村落法》,第614页,1962年。
- ⑩ 池田温《唐代的郡望表》,载《东洋学报》卷四二第三、四号,1959—1960年。《唐朝氏族志之一考察》,见《北海道大学文学部纪要》卷十三第2期,1965年。
- ⑪ “勘定”二字,陈垣《敦煌劫余录》有明确记载,但至许国霖《敦煌杂录》已漏。此后日本学者录文时多有此二字,而中国学者却常常漏掉。笔者曾亲往北京图书馆核实,承蒙薛殿玺先生相助,证明确有此二字,且为朱笔。后细察缩微胶卷,亦依稀可辨。谨致谢忱。
- ⑫ 高士廉散官前脱“左”字,为池田温先生最早发现,谨志于此,不敢掠美。笔者又查《金石萃编》卷四八《高士廉碑》,散官与《莹兆记》全同。“左”字脱掉,可能有二因:一是抄脱,本卷讹脱极多,并不为怪;二是传抄中,有人依唐贞观十一年后光禄大夫不再有左、右之分而臆改。
- ⑬ 《旧唐书·高士廉传》。
- ⑭ 《旧唐书·职官一》:“开府仪同三司,从一品;特进,正二品;左光禄大夫,从一品;右光禄大夫,正二品。”左光禄大夫品级同开府仪同三司,右光禄大夫同特进。依据《唐六典》、《通典》等书记载,唐代不存在散官名称不同,却品级相同。《旧唐书》记载显误。依据文散官次序和品级排列应更正为:“开府仪同三司,从一品;特进,正二品;左光禄大夫,从二品;右光禄大夫,正三品。”旧书原载既有上述两例重复,更缺少了从二品与正三品。经此改正,既

无重复,亦无短缺,且与以下“散骑常侍,从三品;太中大夫,正四品”相属,次第、品级十分明确而不混乱。

- ⑮ 牟润孙先生据《唐六典》卷二“凡任官,阶卑而拟高则曰守,阶高而拟卑则曰行”,用以考察高士廉散官与职事官连署用“兼”,认为不合唐典,实误,已为唐耕耦先生指出。但唐先生又忽略了唐初光禄大夫有左、右之分,而用贞观十一年后的“光禄大夫,从二品”,检查高士廉散官与职事官连署用“兼”,认为合乎唐典,亦未深究。

⑯ 同注⑥。

⑰ 《唐会要》卷八三《嫁娶》,贞观十六年六月《禁卖婚诏》。

⑱ 同注⑬。

⑲ 同注⑰。

⑳ 《资治通鉴》卷一九五贞观十二年正月条。

㉑ 参见前揭唐耕耦《敦煌唐写本天下姓望氏族谱残卷的若干问题》。

㉒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12页。

㉓ 同注⑬。

㉔ 见《北平图书馆馆刊》六卷六号向达先生文。

㉕ 同注②。

㉖ 参见施萍婷《敦煌历日研究》,载《一九八三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编上》,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

㉗ “唐”姓许国霖《敦煌杂录》作“庚”,实误。

㉘ 这件告身又有刻碑,现存敦煌研究院。马世长先生有录文,见《文物》1978年第12期,第32页。

㉙ 竺沙雅章《敦煌的僧官制度》,载《东方学报》(京都版)第31册。

㉚ 《新唐书·吐蕃传》。

㉛ 同注⑩。

㉜ 这些朱笔圆点,向为研究者所忽略,至为可惜。

敦煌吐鲁番文献重文符号释读举隅

重文符号,是古人在书写文字时,为节省时间,对相邻或相近出现的文字和句子使用的一种代号。肇端于上古,中经秦汉,又历中古,以至近世,在手写文字中均大量存在。

本文仅就敦煌吐鲁番文献中的重文符号举其大要。首先分类归并,每类举出数例,以明其义例;其次就笔者所见,对某些重文符号释读错误加以辨正;再次,对于某些残破过甚而又含有重文符号的文书和写本,运用重文义例增补文字,以求对出土文献获得更多的认识。

一 单字重文

所谓单字重文,即相邻或相近的两个字完全相同,将后一字用重文符号替代。但就其具体用法,在敦煌吐鲁番文献中又有几种不同情况,大致可分为四类。

(一) 重复文字必须相属,不能断句例。

例一:吐鲁番文书《西凉建初十四年(481)韩渠妻随葬衣物疏》:“急急如律令。”^①这本是巫者咒语,见敦煌文献 S. 0318《洞渊神咒经·斩鬼品第七》:“若复不出鬼者,命病人不差,大魔王、小魔王等身斩百段,必不恕矣。一一如儿语,如太上口敕,不得留停,急急如律令。”这里“急急”不用重文,是其比。也有的衣物疏中作“事事从君命”^②或“事々依

移”，③同样用了重文符号，但重文符号同其本字间均不能断句。

例二：吐鲁番文书《唐西州高昌县崇化乡里正史玄政纳龙朔三年（663）粮抄》：“十九日史々志敏、史高未、史令狐阴□。”④此例重一“史”字，但两个“史”字意义有别。前一“史”字指州县胥吏，是流外官名称，其后面两人名前均有一“史”字是其证；重复的“史”字则是史志敏的姓。类似这样字同义不同而又不能断句的重文还有吐鲁番文书《唐某人于张悦仁等边夏田残契》：“夏左部々田”。⑤此二“部”字仍须连读。“左部”乃水渠名称，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六册第250页第4行、第251页第10行、第254页第9行、第255页第3行，其位置在高昌城东五里；“部田”乃均田土地名称，与“常田”相对而言，应予以注意。

依理而言，这类重文是重文符号中最简单的一种，现在仍被使用。至于用于人名昵称的重复文字，自古迄今，屡见不鲜。吐鲁番文书中有一件《高昌□子等施僧尼财物疏》，昵称人名大量出现，今节录原释文如下：

舌々：四尺三寸，通々：一尺五寸，奴々：二尺五寸半，𠂔々：三尺六寸半，奴々：三尺一寸半，□□：一尺九寸半，近々：九寸半⑥。

根据该书编辑体例，凡人名均在其左侧加一专名线。可是上引诸例仅在人名第一字旁划线，而对其所重复的人名文字却未做相同的处理。这样，这些人名便不完整，每个人名后的重文符号也无所相属了。

（二）重复文字不能相属，必须断句例。换言之，本字是上句的末一字，重文符号则是下句的第一字，因此二者之间必须断句。

例一：敦煌文献 P. 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其学院内东厢有先圣太师庙堂，々内有素□ 先圣及先师颜子之象。”

例二：吐鲁番文书《唐咸亨三年（672）新妇为阿公录在生功德疏》：

“阿公从身亡日，々画佛一躯。至四十九日，拟成四十九躯佛。”^⑦

例三：敦煌文献 P. 2627《史记·管蔡世家第五》：“文侯十四年，楚庄王伐陈，杀夏徵舒。十五年，楚围郑，々降楚，々复释之。”

(三) 重复文字自然停顿，无需句读例。如敦煌文献 S. 5643 不知名《舞谱》(行次为笔者所加)：

1. 令送 令々送 舞送 舞々送 捋送 捋々送 据送 据々送(中略)

4. 舞々 々捋々 々々 々々々 々々 据々々 送头 々々送

舞谱中的重文符号全是单字重文，只要将重文符号读成它前面的本字即可^⑧，无需句读。虽然仅见于《舞谱》这一特殊形式，却也代表了单字重文的一个类型。

(四) 注文接正文用重文符号例。此类多见于经史子集四部书中。但若再细分，又有两种不同情况。一种是重文符号同它所重复的字紧相衔接；另一种则不衔接，但意义清楚无误。下举数例：

例一：敦煌文献 S. 0085《春秋左传杜注》：文公十六年，“楚子乘驹，会师于临品(注略)，分为二队。”(原双行小注：“々，部也。两道攻之。”)

例二：吐鲁番文书《唐景龙四年(710)卜天寿抄孔氏本郑氏注〈论语〉》：“仁者安仁，智者仁。”(原双行小注：“々者安乐仁道，智者利仁为之。”) ^⑨

上举二例，是注文所用重文符号直接承接正文的例子。下面再举重文与正文不相衔接，但所代替的仍是这个字的例子。

例三：敦煌文献 P. 3798《切韵残页》：“枕，房々……咙，喉々；穉，黍々。”

例四：敦煌文献 P. 3696《切韵残页》：“枝，树々”；“鰕，鱼々”；“璃，瑠々”；“蜎，蛤々”。

二 双 字 重 文

所谓双字重文,即原型作“ABAB”,书写者为节省时间,写成了“A々B々”型,也有一些写成“AB々々”型,但今人释读时,必须还原为“ABAB”型,并加以正确句读,否则文义便滞碍难通。

例一:敦煌文献 P. 2668《唐天宝二年李荃(筌)进〈阉外春秋〉表》:“臣荃(筌)诚惶诚恐,顿々首々,死々罪々,谨言。”这一重文的原型见于吐鲁番文书《西凉建初四年(408)秀才对策文》:“□□顿首顿□□”^⑩;“臣谿诚惶诚□(恐),死罪死罪”^⑪;“□□首顿首,死罪死罪”^⑫。两相比较即可看出,其原型“ABAB”是如何变成“A々B々”的。

例二:敦煌文献 S. 3326《全天星图》,每月图后均有说明文字,内有几例双字重文。如正月图后说明文字为:“自危十六度至奎四度,于辰在亥,为诶々訾々者叹貌,卫之分也(野)。”其中带重文的句子当读如“为诶訾。诶訾者,叹貌”云云。

例三:敦煌文献 S. 0304《大方等大集经卷三十一》:“佛言:善々哉々。”毫无疑义,应当读作:“佛言:善哉! 善哉!”

至于将原型“ABAB”写成“AB々々”的,也有一些例证。如:

例一:敦煌本《六祖坛经》,北图冈字四八号和敦博 077 号同有:“何名般若? 々々は智慧。”而 S. 5475 号则作:“何名般若? 般若是智慧。”英藏本不用重文符号,正是其原型。

例二:《坛经》北图冈字四八号和敦博 077 号同有:“何名摩诃? 摩诃者是大。”而英藏本作:“何名摩々诃々者是大。”恰说明双字重文的“AB々々”型和“A々B々”型含义相同。简言之,双字重文的特征是将原型“ABAB”写作“A々B々”型,释读时必须加以还原。但这不等于说,凡是写作“A々B々”型的文句都属于双字重文,并要还原为“ABAB”型。

事实上,古文献中存在一些“形双实单”或“形单实双”的重文符号,我们需要依靠必备的知识加以辨别,不可将其简单化。例如:

敦煌文献 S. 6203《大唐李府君修功德碑记》:“爰因蒐练之暇,以申礼敬之诚,揭竿操矛,阃战以从。……隐々珍々,荡谷摇川而至于斯窟也。”^⑬按,本段中的“隐隐轸轸”又作“殷殷轸轸”,“隐”乃“殷”之借字。《汉书》卷八十七上《杨雄传》之《校猎赋》:“徽车轻武,鸿纲捷猎,殷殷轸轸,被陵缘阪……”师古注:“殷轸,盛也。……殷读曰隐。”可知殷轸本可独立成词。又见《淮南子·兵略训》:“甲坚兵利,车固马良,畜积给足,士卒殷轸,此军之大资也。”其义仍为众多繁盛。但在上引《大唐李府君修功德碑记》中,“隐隐轸轸”却不能读成“隐轸隐轸”,它是单字重文而非双字重文。

敦煌文献 P. 3195 唐·冯待微《恶美人怨》^⑭诗一首,内有“岁々年年征战间^⑮,侍君惟幕损红颜”句。很显然,“岁岁年年”也是单字重文而非双字重文。

吐鲁番文书《唐□文悦与阿婆、阿裴书稿》:“□文悦千々万々再拜:阿婆、阿裴已下合家大小口平安好在不?”^⑯从字面意义看:“千千万万”似乎也说得通;但若细加追究,本句重文只能读作“千万千万”,是双字重文而非单字重文。我们试引吐鲁番文书中的一些书信。《唐总章元年(668)海堆与阿郎阿婆家书》:“阿郎、阿婆:千万问信(讯)。”^⑰《唐李贺子上阿郎、阿婆书二》:“贺子、鼠儿,并得平安,千万再拜阿郎、阿婆。”^⑱可知在古代书信中,其基本格式是“千万再拜”、“千万问讯”,而有些人为了强调,写成“千万千万”云云,基本含义并无不同。

在明确上述双字重文义例的基础上,即可检查一下某些出版物在释读中出现的失误和不当。

《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收有 P. 3608、P. 3252《唐垂拱职制户婚厩库律残卷》。其中户婚律释文中有:“诸嫁娶违律,祖父母、父

母主婚者，独坐主婚（注文略）。若期亲尊长主婚者，主婚为首，男女为从。事由男女，为々首々，主婚为从。”^①其末句若依双字重文义例，则当读作“事由男女，为首为首，主婚为从。”意思不通。经检原件，原作“事由男々女々为首，主婚为从。”故此句当读作：“事由男女，男女为首，主婚为从。”与传世本《唐律疏议》第195条《嫁娶违律》完全一致。可知原件不误，考释者将重文符号误植而致误。

同上书收有P.3813《文明判集残卷》。释文中有：“行盗理合计赃，定罪须知多々少，々既无正数，不可悬科。”^②内中重文句子，若依单字重文义例，当读作：“定罪须知多多少，少既无正数”；若依双字重文义例，则当读作：“定罪须知多少多，少既无正数。”均无法读通。其实，这是一个双字重文，原作“定罪须知多々少々既无正数”，读作：“定罪须知多少，多少既无正数。”可知这是由对双字重文断句不当产生的失误。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收有北图位字79号文书。释文中有：“结婚之始，非旧委怠（悉），必须精加研究，知其谱囊，谱囊相承不虚，然可为正。”^③按，原件“谱囊”二字傍有两个符号，作“知其谱／囊·相承不虚。”显然，释文者是按照双字重文去处理的。但“谱囊”不词，无从定义。我认为“囊”字乃“曩”字之借，“谱”后的符号是一倒钩符，故当读作“曩谱”。曩即旧也，曩谱即旧谱。如此，上下文义方可贯通^④。“曩”字后的黑点是抄写者临时点断句子，不可将这句话当作双字重文去处理。

我们还可依据双字重文义例去增补某些残破过甚的出土文献，以求对它们获得更多的认识。

吐鲁番文书《唐海隆家书》中有“□叔千々万王耶酿（爷娘）。 ”^⑤关于“千千万万”这一双字重文，前已举例并加辨正。显然，本句“万”后脱一重文符号，释读时当予补足并出注说明。

吐鲁番文书《唐贞观二十年（646）赵义深自洛州致西州阿婆家书》

中有如下两行残字：

14. [] 深等作兄弟时，努力慈孝，看阿婆、阿兄，莫辞辛苦。脱为相 []

15. [] 々力々天能报人(下略)^②

第15行上部残失，残存文字应如何理解？《唐李贺子上阿郎、阿婆书三》中有：“语 [] 好努々力々，看待阿郎、阿婆。”^②《唐书牍稿》有“昨日索隐儿去，……努々力々，所须何物，请即日相报，当送。”^③根据这两件书信中“努力努力”的用法，可将上引赵义深家书第15行增补并释读如下：

努力努力，天能报人。

增补后文字仍有残缺，但意义却比原文明确多了。再结合这封信的上文，可知赵义深在这里是劝勉他的兄弟们要保重自爱，并“看(侍)阿婆、阿兄，莫辞辛苦。”若能如此，自然会得到上苍的善报。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双字重文的断句问题。一般来说，双字重文所重复的多是一个词，故潘重规先生称之为“叠词符”。有些双字重文本身并不需要句读，如前举“千々万々”、“顿々首々”，但许多情况下必须断句。如果我们仅将重文符号回改并加以断句，那么只需将“A々B々”型或“AB々々”型还原为“ABAB”型并加以正确断句即可。可是，如果既想保持古文献的原始风貌，又要使用现代标点符号断句，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敦煌文献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线索。P. 2872《史书五行志》有如下记载：

“秦始皇即位。彗星四见。蝗虫蔽天。冬雷夏陈。石陨原郡。大人出临[]兆。妖孽并见。营惑守心。星拂(拂)大々角々。以土终不改二世立。天重其恶。”原文多已圈点，惟“以土”和“终不改”后漏掉圈点符号。“大角”是星名。“星拂大角，大角以土，终不改”，原文是在“大角”重文后圈点的，虽然第二个“大角”当属下读。从这个意义上说，《敦

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除个别断句有误外，其对双字重文的处理方法是符合古例的，也是可取的。《敦煌社会文献真迹释录》却有可商之处。如第一辑第107页第77行，原文作“移檄郡々国々多应之”，释文为“移檄郡郡国国(郡国，郡国)多应之。”释文者并未真正认识这一双字重文的含义，于是在括弧中加以改正，未免费辞。

三 三字和三字以上重文

敦煌吐鲁番文献中，单字和双字重文用例最多，而三字和三字以上重文也不乏实例。有的则是单字、双字、三字及三字以上重文在一段文字中同时出现。这就要求我们逐一审视，具体对待。

例一：吐鲁番出土《唐写本〈论语〉郑氏注〈雍也〉〈述而〉残卷》：“子见男(南)子，々路不悦(注略)。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々厌々之々。’”^⑦此段“天厌之，天厌之”用了三字重文。

例二：敦煌文献 P. 2157《律戒本疏》：“尼僧住止要依々聚々落々，给大々界々，内有三处。”此段前有三字重文，后有双字重文，当读作：“尼僧住止要依聚落，依聚落给大界，大界内有三处。”

例三：敦煌文献 P. 2627《史记·管蔡世家第五》：“平侯九年卒，灵侯班^⑧之孙东国攻平侯子而自立，是为悼々侯々，父曰隐々太々子々有々[者]^⑨，灵侯之太子。”此段前有双字重文，后有四字重文。带重文的句子当读作：“是为悼侯。悼侯父曰隐太子有。隐太子有者，灵侯之太子。”除个别文字或脱或别，与传世本《史记》完全一致。

例四：敦煌文献 P. 2157《律戒本疏》：“不自阢□告僧，々以自(白)佛。々言：从今听忆々念々比々尼々法々，僧中种种。”本段有三处单字重文，一处五字重文。当读作：“不自阢□告僧，僧以白佛。佛言：从今忆念比尼法。忆念比尼法，僧中种种。”

上举四例,包括三字和三字以上重文,以及单字、双字重文在这些文字中的交替使用。其共同特征是,重文符号紧随它所重复的文字。至于多字重文符号不紧随它所重复的文字,我在敦煌吐鲁番文献中见到的尚太少。不过,我在《日本国现在书目录》中却见到了这样的例证。

《日本国现在书目录》又称《本朝现在书目录》(尾题)、《现在书目录》(河海抄)等,是日本藤原佐世(?—897)奉敕撰成的。全书一卷,现存者为十二或十三世纪的略抄孤本。下引该书中的一段(行次为笔者所加。为方便阅读,迳录时将重文符号所代替的文字放在其后的括弧内):

1. 十九刑法家(目录五百八十卷,私略之。)
3. 唐永徽律十二卷,々々々々(唐永徽律)疏卅卷(伏无忌等撰)
6. (前略)唐永
7. 徽格五卷、垂拱格二卷、々々(垂拱)后常行格十五卷、々々(垂拱)留司、
8. 格二卷、开元格十卷、々々々(开元格)私记一卷、々々(开元)新格五卷。
9. (前略)开元皇口敕一卷
10. 々々(开元)后格九卷(后略)。

众所周知,唐朝时许多日本留学生和学问僧都曾在中国搜集汉文典籍并携归日本。《现在书目录》中明确标明一些书是著名学者吉备真备从唐朝带回去的。又据严绍璁先生研究,此书的分类,除有两处小改外,全本自《隋书·经籍志》^⑩。而《隋书》是唐初由魏征领衔官修的,藤原佐世这部目录又撰成于唐末,因此可以推测,《现在书目录》中抄录的

那些唐代法律书名,同样是这一时代重文符号使用风貌的一个侧面。

从使用重文的角度去考察,不难发现其中保留了双字重文(垂拱、开元)、三字重文(开元格)和四字重文(唐永徽律)的不同用例。但它们用以重复的文字,均不紧随已经写出的本字,而是借用上句的文字使用重文符号以行代替。其中有些用法并不严密,如第8行“开元格十卷,々々々(开元格)私记一卷”,二者关系是严密的,但其后“々々(开元)新格五卷”与上文关系就不十分严密。不过,这里并不影响重文符号意义的明确性。这也说明,唐人在使用重文符号时虽有一定之规存在,但只要不影响文义的明确性,适当地灵活运用也是被认可的。

不过,这部书中重文符号的漏衍也不少见,这里不再详论。

重文符号的漏衍现象在敦煌吐鲁番文献和传世文献中同样存在。漏掉重文者,如敦煌本《六祖坛经》,北图冈字四八号和敦博077号同有:“不可将福以为功德,々々在法身”云云,而S.5475号作“不可将福以为功德,在法身”云云。两相比较,可知英藏本《坛经》漏掉了“功德”二字的重文符号。又如《全唐文》卷914收有禅宗六祖惠(慧)能所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序》,有“何名般若?是梵语,唐言智慧。”而敦煌本《六祖坛经》也有相似的文句:“何名般若?般若是智慧。”可以看出,《全唐文》中的那句话本作“何名般若?々々は梵语,唐言智慧。”“般若”二字的重文符号在流传中漏掉了,当予补足。衍重文符号者,如P.2635《类林残卷》:“项羽为汉兵所围,自知当败……乃歌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々不々逝々兮其那何々,虞々兮々奈汝何!”原注“出项羽传”。同《史记·项羽本纪》及《汉书·项籍传》比较,可以说其中重文用法同我们所见义例是一致的,但写本“何”字后的重文符号却是衍文。这也说明,在释读出土文献和整理传世文献时,不可拘泥于古写本或传抄本,对漏、衍的重文符号要认真分析,进而才能按断。

四 整 句 重 文

这一类型,笔者所见不多,但同样可以举出实例以证明其存在。

例一,敦煌文献 P. 2529《毛诗·齐风·东方之日》:“东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々我々室々兮々,履我发兮。”《毛诗》中的这句话须重读一遍,与传世本《诗经》完全相同。每句虽只重复四字,但却是完整的句子,同上节所举四字重文依然有别。

例二:S. 1524《大方等陀罗尼经卷第一》:“阿々菟々那々多々嚧々
嚧々,复得究追,……”

这里第一句必须整句重读一遍。

例三:P. 3442 杜友晋《吉凶书仪》之《子姪及孙丧告答尊长书》:“名言(原双行小注:告兄弟云白):非意食(仓)卒,某子姪夭折;悲念伤悼,不自胜任。伏惟 哀念伤恻,何可为怀。痛々当々奈々何々……”引文末句“痛当奈何”也须整句重读一遍。

关于重文符号的书写形式,一般是“、”、“々”、“ㄣ”,本文为排字方便,一律改为“々”。此外还有一些其他书写形式,且容易同一些汉字相混淆,此项可参郭在贻、黄征、张涌泉三位先生的《敦煌写本书写特例发微》^①一文,这里不赘。

(原载《文献》1994 年第 1 期,第 160—173 页)

注释:

- ①《吐鲁番出土文书》释文本,第一册,文物出版社,1981 年,第 15 页第 13 行。
以下凡引此书,只具册数、页码和行次,不具墓葬编号和文书顺序编号。
- ② 同上书第三册,第 123 页第 12 行。
- ③ 同上书第四册,《补遗》第 5 页第 10 行。
- ④ 同上书第七册,第 387 页第 3 行。

- ⑤ 同上书第六册,第 158 页第 2 行。
- ⑥ 同上书第二册,第 123—124 页第 2—3 行。
- ⑦ 同上书第七册,第 73 页第 91—92 行。
- ⑧ 参见柴剑虹《敦煌舞谱的整理与分析》(一)(二),分载《敦煌研究》1987 年第 4 期、1988 年第 1 期。
- ⑨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七册,第 540 页第 83—84 行。
- ⑩ 同上书第一册,第 114 页第 10 行。
- ⑪ 同上书第一册,第 114 页第 15—16 行。
- ⑫ 同上书第一册,第 117 页第 44 行。
- ⑬ 此件《修功德碑记》,敦煌莫高窟今有碑石留存,见李永宁《敦煌莫高窟碑文录及有关问题》(一),载《敦煌研究》试刊第 1 期,1981 年。
- ⑭ 《全唐诗》卷 773 作“虞姬怨”,是。写本“恶”字当是“虞”字之讹。
- ⑮ 征战间:《全唐诗》作“事征战”。
- ⑯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四册,第 265 页第 1—2 行。
- ⑰ 同上书第五册,第 161 页第 1 行。
- ⑱ 同上书第六册,第 393 页第(一)之第 1 行。
- ⑲ 中华书局 1989 年出版,第 53 页第 158—160 行。
- ⑳ 见《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第 438 页第 27—28 行。
- ㉑ 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 年出版,第 87 页第 38—40 行。
- ㉒ 参拙作《敦煌文献〈唐贞观八年高士廉等条举氏族奏钞〉辨正》,载《中国史研究》1986 年第 1 期。
- ㉓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四册,第 266 页第 7 行。
- ㉔ 同上书第五册,第 10 页。
- ㉕ 同上书第六册,第 395 页第 4—5 行。
- ㉖ 同上书第九册,第 142 至 143 页第 8—9 行。
- ㉗ 同上书第八册,第 360 页第 9—12 行。
- ㉘ 班:今本《史记》作“般”。
- ㉙ 有:今本《史记》作“友”。者:原脱,据今本《史记》补。
- ㉚ 严绍璁:《日本手抄室生寺本〈本朝见在书目〉考略》,载上海古籍出版社《古籍整理与研究》总第 1 期,1986 年。
- ㉛ 见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编《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 年出版。

史道德族出西域胡人的天文学考察

《文物》1985年第11期发表《宁夏固原唐史道德墓清理简报》后，就史道德的族属问题，学术界曾展开讨论^①。1996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罗丰先生编著的《固原南郊隋唐墓地》一书，公布了包括史道德在内的五位史姓人物墓志及其出土文物，扩大了我们思考史道德族属问题的范围。然而，除了明确史索岩同史道德是叔侄关系外，也未能提供更直接的材料，史道德的族属问题依然作为悬案而存在。

研究史道德族属问题的关键性困难在于：墓志称“其先建康飞桥人事”。建康地处甘肃酒泉，位居河西走廊。而唐代林宝在《元和姓纂》卷六“建康史氏”条云：“今隶酒泉郡，史丹裔孙、后汉归义侯苞之后。至晋永嘉乱，避地河西，因居建康。”据此，建康史氏是汉人从内地迁去的。这样，就很难认为史道德家族源出西域胡人。

为了对史道德先祖的民族所出获得较为明确的认识，这里我们要用古天文知识对其墓志中的相关文句加以释读。先录墓志原文一段于下：

公讳道德，字万安，其先建康飞桥人事。原夫金方列界，控绝地之长城；玉斗分墟，抗垂天之巨鼎。棱威边鄙，挺秀河湟。盟会蕃酋，西穷月窟之野；疏濬太史，东朝日域之溟。于是族茂中原，名流函夏。正辞直道，史鱼睿谔于卫朝；补缺拾遗，史丹翼亮于汉代。

龙光迭袭，龟剑联华，绵庆缔基，斯之谓矣。远祖因宦来徙平高（按，即固原），其后子孙家焉，故为今县人也。

对于这段叙述史道德家族历史的文字，如果只关注头尾，就会认为，其祖先原在甘肃酒泉一带，后来因官而迁至宁夏固原，至史道德去世的仪凤三年（678），已成为固原人。墓志语义是完整的，而且在理解上也不存在困难。但是这却是很不够的。因为墓志开头还有其他文字，特别自“原夫金方列界”至“东朝日域之溟”共 50 个字，并非全是溢美之词，而是隐含着一些实在的内容。现对关键词句考释如下：

（一）“原夫”。唐人撰写墓志时，有一些程式化的语言，此即其一。“原夫”、“若夫”、“其先”所引出的文字，一般都是追述墓主祖先之所从来的。例如：

《大唐张君墓志》：“君讳通，字进达，清河人也。源夫大汉之初，辑宁区宇，殄櫜枪于垓下，消薄蚀于鸿门。……”^②

《唐故颜君墓志铭并序》：“公姓颜，讳相，字仁肃，河南洛阳人也。源夫洙泗弘风，颜回著昭邻之美；海沂虚尚，颜盍驰高节之誉。于后……”^③

《唐故杨君墓志铭并序》：“君讳贵，字元宗，弘农华阴人也。原夫本系，出自有周。”^④

《唐故南阳张府君墓志铭并序》：“君讳怀文，河南洛阳人也。原夫良居汉幄，是曰师臣；华处晋朝，实惟鼎辅。”^⑤

由上引可知，“原夫”又作“源夫”，确有追根溯源之意，史道德墓志中的“原夫”无别。换言之，墓志此下的一段文字，当是追述其先祖来历的。

（二）“金方列界”。《隋书·五行上》引《洪范五行传》曰：“金者西方，万物既成，杀气之始也。”中古时代，方位同天干、五行相配时有以下

顺口溜：东方甲乙木，南方丙丁火，中央戊己土，西方庚辛金，北方壬癸水。这是时人极为熟悉的常识，可知“金方”即西方。“列界”之“列”，即“裂”之古字。“裂界”同“裂地”，指分野。“金方列界”是说其分野在西方。

（三）“控绝地之长城”。“控”谓“控扼”，即占有。“绝地”指极远的地方。《汉书·韩安国传》：“自三代之盛，夷狄不与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强弗能服也，以为远方绝地不牧之民，不足烦中国也。”《后汉书·马援传》：“人情岂乐久屯绝地，不乐归哉？”“长城”此处似非实指，当是泛喻边塞防御系统。“金方列界，控绝地之长城”大意是说，从分野来看，其先祖在西方绝远之地，而且曾拥有大片土地。

（四）“玉斗分墟”。“玉斗”即玉衡，指观测天文的仪器。北周庾信《燕射歌辞·宫调曲》：“玉斗调元协，金沙富国租。”“分墟”与“列界”为对文，“列界”是指地上的分野，“分墟”则是指天区的划分。我们知道，古天文许多星官名词是由地上搬到天上的。因此，“玉斗分墟”就是用玉衡观测天空而划分之。

（五）“抗垂天之大昴”。“抗”即对也。《史记·陆贾传》：“今足下反天性，弃冠带，欲以区区之越与天子抗衡为敌国，祸且及身矣。”索隐引崔浩曰：“抗，对也。”今有“对抗”一词，亦是同义复词。“大昴”指二十八宿中的昴宿。首先，我们知道，古人将二十八宿划分为四陆，与四方相配，东方七宿为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七宿为斗、牛、女、虚、危、室、壁，西方七宿为奎、娄、胃、昂、毕、觜、参，南方七宿为井、鬼、柳、星、张、翼、轸。昴宿配位于西方，墓志上文“金方”亦指西方，二者一致。其次，昴宿在古代天文星占中是用来代表少数民族的“胡星”。《隋书·天文志》：“昴七星，天之耳目也，主西方，主狱事。又为旄头，胡星又主丧。昴、毕间为天街，天子出，旄头罕毕以前驱，此其义也。”“昴……大而数尽动，若跳跃者，胡兵大起。一星独跳跃，余不动者，胡欲犯边疆

也。”引文与《晋书·天文志》略同。唐《开元占经》卷六二“昴宿占”亦有意义相同的文字记载。在中古时代的具体星占实践中，“昴”宿的天文现象也是同地面上的“胡”或“虏”的动向相联系。如《魏书·天象志三》记：

太祖皇始元年夏六月，有星彗于髦头（按，即昴宿，见上引《隋书·天文志》文，“旄头”同“髦头”）。彗所以去秽布新也，皇天以黜无道，建有德，故或凭之以昌，或由之以亡。自五胡蹂躏生人，力正诸夏，百有余年，莫能建经始之谋而底定其命。是秋，太祖启冀方之地，实始芟夷涤除之，有德教之音，人伦之象焉。

太宗永兴二年五月己亥，月掩昴。昴为髦头之兵，虏君忧之。

泰常三年十月辛巳，有大流星出昴，历天津，乃分为三，须臾有声。占曰：“车骑满野，非丧即会。”明年四月，帝有事于东庙，蕃服之君以其职来祭者，盖数百国也。

（太平真君）十年五月，彗星出于昴北。此天所以涤除天街而祸髦头之国也。时间岁讨蠕蠕。

可知，昴宿七星代表胡人而成为“胡星”，毋庸置疑。因此，“玉斗分墟，抗垂天之大昴”，其义是说，如用玉衡指向天区加以观测，与之相对的正是那个代表胡人的“胡星”——昴宿。

（六）“陵威边鄙”。当指史道德先祖在西方绝域曾有威势；“挺秀河湟”，当是炫耀史道德的先人在河西亦有荣光，与前文的“其先建康飞桥人事”相呼应。文中均有溢美之词，但文义不难理解，不赘。

（七）“盟会蕃酋，西穷月窟之野”。“盟会”犹会盟，此处用为动词。《史记·楚世家》：“宋襄公欲为盟会，召楚。”《汉书·地理志上》：“至春秋时，尚有数十国，五伯迭兴，总其盟会。”“蕃酋”当指少数民族国君或

酋长,意义显明。“月竈”即月窟,指极西之地。《文选》颜延之《宋郊祀歌》之一:“月竈来宾,日际奉上。”吕延济注:“竈,窟也。月竈,西极。”亦作“月域”。此二句是说,史道德先祖曾在极西之地同蕃人国君结盟,且为盟主。

(八)“疏澜太史,东朝日域之溟”。“澜”本义为大波浪,引申为流派。疏澜即远枝,疏属。“太史”指汉人史姓之祖史佚。《元和姓纂》卷六史姓云:“周太史史佚之后。”“疏澜太史”是说史道德家族是周太史史佚的远枝。“日域”是“月竈”的对文,指极东之地。此二句大意是说,作为周太史史佚的远枝,由极西而向东方迁徙过来。

通过以上疏证,墓志“原夫”及其以下 50 个字的意义应该说是比较清楚了。在这段文字中,同西方或西域有关的词语有“金方”、“大昴”、“月竈”,同胡人有关的词语有“大昴”、“蕃酋”。将这些词语的综合含义理解为“西域胡人”,恐不为过。墓志作者自地至天,由西而东,讲了个周遍,但概括言之,地在极西,在汉人眼中自然是胡地,天又是胡天(大昴),那么,这简直就是一片胡天胡地了。它所要说明的史道德族出西域胡人也就不言自明。

这里仍有一个问题需加讨论。就多数墓志来说,用“其先”二字引出下文追述先祖也就够了,但史道德墓志在“其先建康飞桥人事”之后,又用“原夫”引出另一段追述先祖的文字。墓志同时说史道德先祖是西域胡人,又说是汉族史姓远枝,并以春秋时卫国之史鱼、汉代之史丹为其同宗而自相标榜,岂非荒谬?这确实是风马牛不相及,但放诸唐初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并考之于胡人在汉化过程中表现出的某些特征,仍可给予合理的解释。

唐承魏晋南北朝士族门阀之余韵,社会心理上仍以出身贵族名门而自高,因此,所谓的高门大族也就有不少冒牌存在于世。唐人刘知幾在《史通·邑里篇》曾论道:“自世重高门,人轻寒族,竞以姓望所出,邑

里相矜。……碑颂所勒，茅土定名，虚引他邦，冒为己邑。若乃称袁则饰之陈郡，言杜系之京邑，姓卯金者咸曰彭城，氏禾女者皆云钜鹿……凡此诸失，皆由积习相传，浸以成俗，迷而不返。”显然，史道德墓志称其先人为周太史史佚之疏属，且与史鱼、史丹攀附，也只能目为唐初这种恶劣“积习”的表现之一了。

这些攀附行为，除了全社会风气使然外，作为西域胡人的史氏家族，同时也就具有了胡人汉化过程中的一些特征。胡人汉化后，多以汉人先哲名王为其先祖，这在唐代诸多蕃将中均有表现。如，原为契丹酋帅的李楷洛，身后碑称其为汉代李陵之后^⑥；突厥出身的将领李怀让，也冒认李陵为其先祖^⑦。但是透过这些假冒行为，我们也看到，很多胡人在汉地久居之后，汉化程度日趋加深，从而产生了与汉民族共同的民族意识和心理状态，这也正是民族融合的一个侧面。史道德家族概莫能外。

史道德家族也有与众不同的地方。那就是，虽也冒称汉人史佚之后，但又不愿意数典忘祖。在墓志中同时将这两层意思表达出来，实在是一个困难。不过，墓志作者却处理得极为巧妙：用显白的文字公开同汉族史姓名人攀附，用隐晦的文字说出其真实族出，可谓用心良苦！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攀附内容自然是于史无征，属于假冒；而曲折表达族出西域胡人者，才属于历史的真实。

（原载《'98 法门寺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658—661 页）

注释：

- ① 参见：赵超《对史道德墓志及其族属的一点看法》，载《文物》1986 年第 12 期；罗丰《也谈史道德族属及相关问题——答赵超同志》，载《文物》1988 年第 8 期；马驰《史道德的族属、籍贯及后人》，载《文物》1991 年第 5 期。

② 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04页。

③ 同注②，第198页。

④ 同注②，第205页。

⑤ 同注②，第320页。

⑥ 《全唐文》卷四二二，杨炎撰《云麾将军李府君神道碑》。

⑦ 《文苑英华》卷九五一，常袞撰《华州刺史李公墓志铭》。

中国古代历日文化对柬埔寨的影响

——(元)周达观《真腊风土记》读记

元朝人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实在是一部奇书。全书记载真腊国(今柬埔寨)社会风情 40 则，8500 字左右，实在比不得今人一篇文章的篇幅。然而，却因了它，十九世纪的法国博物学家亨利·穆奥(Herni-Mouhot)按图索骥，寻找出在热带丛林中沉睡了数百年之久的吴哥古迹，给人类文明增加了一份巨大的文化遗产，足见此书价值不可小觑。

不久前，我自费前往吴哥古迹参观。由于十多年来一直关心中国古代历日文化在东亚及东南亚地区的影响，所以，我曾托中国政府吴哥保护工作站雇用的柬籍华裔蔡先生寻找一份当代柬人使用的历日(或称“通书”)，未果。后来发现，我借住的中国文物研究所刘江先生的房间就挂着一本柬埔寨一家华人银行印制的 2006 年挂历。摘下来仔细观看，大体包含有三种内容：一是公历(西历)日期和星期，这在全世界是一致的，无特殊之处；二是柬埔寨节日，包括国王和王后的生日；三是中国农历，包括农历月日和春节日期，其余内容不见。由于内容简单，所以也并未引起我的重视。

回来后，因为撰写游记《文明的辉煌与断裂》，才将《真腊风土记》细读一过。这一读，才发现在周达观的笔下，早有中国古代历日文化对柬埔寨发生影响的记录，仅仅是我疏忽和未能及时拜读而已。

《真腊风土记》第十三则“正朔时序”有相关记载，今择其要者抄录

如下：“每用中国十月以为正月。是月也，名为佳得。”“国中人亦有通天文者。日月薄蚀皆能推算，但是大小尽却与中国不同。中国闰岁，则彼亦必置闰，但只闰九月，殊不可晓。一夜只分四更。每七日一轮。亦如中国所谓开、闭、建、除之类。……何日可出东方，何日可出西方，虽妇女皆能算之。十二生肖亦与中国同，但所呼之名异耳。如以马为‘卜赛’，呼鸡为‘蛮’，呼猪为‘直卢’，呼牛为‘个’之类也。”^①

我读罢这段文字，真是兴奋莫名。这里涉及的几乎全是中国古代历日文化的内容。现疏释如后，并对前人的某些解释申述我的不同见解。

（一）柬埔寨人当时行用的是中国秦朝的历法。“每用中国十月以为正月。是月也，名为佳得。”“中国闰岁，则彼亦必置闰，但只闰九月，殊不可晓。”周达观“殊不可晓”的这段历日内容，实际就是中国秦朝的历日制度。依据“三正说”，夏历正月为年首，殷历十二月为年首，周历十一月为年首，秦历则以十月为年首。这一点得到近世出土秦汉历日的充分证明。1993年湖北关沮周家台30号秦墓出土的《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历日》即以十月为年首，并将闰月作为“后九月”放在年末^②。同墓出土的《秦二世元年（前209）历日》虽无闰月，但也是将十月放在岁首的^③。湖北云梦出土的秦简《编年记》第三简记有：“五十六年，后九月，昭死。正月，遽（速）产。”^④闰月也设作“后九月”并置于岁末。山东银雀山二号汉墓出土的《元光元年（前134）历谱》也是将闰月称作“后九月”并放置在九月之后的^⑤。出土资料和文献记载每每表明，以十月为岁首，将闰月置于年末，设为“后九月”，是秦朝历法的基本特征，沿用至汉初百余年。只是到了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改行《太初历》，才将年首放在夏历建寅月（正月），并以无中气之月置闰，行用至今。

周氏《真腊风土记》说：“每用中国十月以为正月。是月也，名为佳得。”根据周氏原文记载，他是在元成宗铁穆耳元贞元年（1295）奉诏做

准备,次年(1296)随使出访真腊,逗留年余,于1297年返回元朝的。真腊人称每年岁首十月为“佳得”,当是记音,因为真腊文字与汉文迥异。此二字实际当作“嘉德”。《左传·桓六年》:“[六年春正月]奉酒醴以告曰:嘉粟旨酒。谓其上下皆有佳德,而无违心也。”显然,此时“嘉德”还是指美德,并作为祭祀用语来使用。至汉代,“嘉德”意义已有变化。后汉崔骃《缝铭》曰:“惟岁之始,承天嘉德。皇灵愿国,丝缓充贄以朝迪。”^⑥此时,“嘉德”与“岁始”相连,几乎成了其代名词。由此我以为,柬人将十月,即他们当时行用中国秦历的年首称作“嘉德”,正是“岁始”之义,二者十分契合一致。“嘉德”是其本字,“佳得”乃周达观未稽之音讹也。

百余年前的1902年,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先生曾将《真腊风土记》译为法文并加注释^⑦。此后他又不断修订,但直至告别人世亦未完成。身后,由戴密微(P. Demiville)和戈岱司(G. Coedes)整理,作为遗著第三种于1951年出版。戈岱司本人对《真腊风土记》也情有独钟,曾作过两次补注^⑧。但是,由于戴、戈二氏不了解中国古代历法,所以未能给周达观的这段记载以正确解读。伯希和说:“按,佳得应为 Katik(今读若 Kadak)即梵文之迦刺底迦(Kartika)月是已。但现在柬埔寨人之正月为 cet 月,即梵文之制咀罗(caitra)月是已,此月在阳历三四月间。”伯氏从梵文去找“佳得”对音,自然不甚了了。他不知当时柬人使用的乃中国秦历,且“佳得”为“嘉德”之同音异写。

至于戈岱司,则走得更远。戈氏云:“在周达观时,真腊每年开始于迦刺底迦月,但当时铭刻中所记年月,大部分仅用制咀罗年(即与今柬埔寨年同,新年开始于制咀罗月)。用迦刺底迦年者,在铭刻中仅见一例。此或由于每年之开始(至少官方新年)由国王任意决定,依时代而异。周达观所记各月之节日及月份,乃指真腊历,不指中国历。”^⑨恰恰相反,周达观所记乃柬人行用的中国秦历,而非真腊历。

我国著名考古、中外关系史专家夏鼐先生在其所著《真腊风土记校注》一书中,引过伯、戈二氏的注释及补注后,发表了如下见解:“许肇琳^⑩亦以为佳得乃柬语 katik 之对音,但此为腊月而非正月。柬语‘正月’为 migasa(末伽萨),可能周氏张冠李戴(《浅释》第20页)。今按,柬埔寨古今历法不同。吴哥时代可能以‘佳得’月为正月,但真腊铭刻中,多以制咀罗月为正月。伯氏、戈氏以为现今柬埔寨人仍以此月为正月。许氏云云,或近年其历法又有变更欤?末伽萨月在迦刺底迦年为二月,在制咀罗年为九月,皆非正月。要之,不能谓‘周氏张冠李戴’。”夏先生认为周达观没有张冠李戴是正确的认识,但也感到矛盾重重,难获正解。而我们用中国秦历以及“佳得”乃“嘉德”的对音给予释读,似乎通畅无碍了。

这里有一个问题。周达观去真腊时已是十三世纪之末,而中国早在公元前二世纪时已改用《太初历》,放弃秦历不用了。虽然十三世纪时柬埔寨人行用中国秦历,但恐怕不能说此前千余年他们已开始行用中国秦历。我怀疑,至十三世纪时,真腊同中国来往已经很多。真腊的天文历算者此前从某种途径获得了在中国已废的秦代历法并加以奉行,而未行用中国王朝已改进了多次的当代历法。所谓礼失求诸野,此之谓也。

(二)“每七日一轮”,即星期制度。伯氏云:“按,即印度之星期,每日以行星一名名之。”^⑪对此,夏先生补充并纠正说:“今按,印度每周七日以七曜日名之。其中五日为五行星,余二日为日曜日及月曜日,并非每日皆以行星之一名之也。”夏氏看法正确,不可将日、月均视作“行星”。星期制度是外来文明,九世纪的敦煌具注历日已在使用。但因与中国人的旬假制有别,后来又被中国人放弃不用。重新行用是辛亥革命后普遍行用公历时的事。柬人用星期制度,自然是外来文化,并非受汉历之影响。但它是直接来自印度或西方,还是伴随使用汉历而间接

引入？现在无法说明。如果它是间接从中国引入的，那么认为此亦为受中国古代历日文化的影响，或不为过。

（三）建除十二客。周达观云：“亦如中国所谓开、闭、建、除之类。”伯氏、戈氏、夏氏对这句话都未加注释。起初，我将此句与上句“每七日一轮，亦如……”连读，意思是，每七天一个周期，也就像中国所谓建除十二客之类。仔细玩味，发现这样读不妥。为何？因为七曜日用来注历时是按七曜周期下排，无重复之日。但建除却不然，每个“星命月”之第一日必须重复上个星命月最末一日所注建除一次，如惊蛰二月节那一天所注与其前一日所注建除相同，这是由它的排列规则所决定的。正由于此，建除与星期制度无可比性，必须单独说明。亦即是说，周达观所看到其时行用的真腊历日，其中也有用建除十二客注历的内容。建除十二客共十二个字，其排列次序为建、除、满、平、定、执、破、危、成、收、开、闭。因周氏对此排序不熟悉，故说成“开、闭、建、除之类”。虽不准确，但无伤大雅。

迄今所见，建除十二客是中国古代历日文化中最古老的一项内容。它在睡虎地秦简和甘肃天水放马滩秦简《日书》中已有记载^⑫。至晚从汉代开始，它已用于直接注历^⑬。一直到当代中国的台湾、香港、澳门地区和日本、泰国等正在行用的“通书”，建除仍是一项常见的历注^⑭。换言之，建除注历在东亚、东南亚地区的历注中影响广泛。周达观所见柬人行用的中国历日制度，包含有建除历注，顺理成章，自不待言。

（四）“往亡”与“归忌”。周氏又云：“何日可出东方，何日可出西方，虽妇女皆能算之。”伯、戈、夏三氏于此亦未解读。实在说，这正是中国古代历注中的“往亡”与“归忌”。“往亡”与“归忌”是相对而言的，“往亡”即不宜去，“归忌”则是不宜回。秦汉时代人们对出行与回归的宜与不宜十分看重，这在战国秦汉《日书》中已有反映^⑮。东汉思想家王充在《论衡·辨崇篇》中批判说：“涂（途）上之暴尸，未必出以往亡；室中之

殡柩，未必还以归忌。”^⑩虽然王充的批评十分正确，但在社会生活中，俗人仍十分看重往亡与归忌。及至后世，它们便被堂而皇之地编入“具注历日”，成为人们日常出行与回归的指导了。周达观说“虽妇女皆能算之”，说明它在柬埔寨时人中的影响十分深广。至于有关往亡原始立义及排列规则的讨论，读者可参看刘乐贤博士《简帛数术文献探论》第七章“往亡考”一节^⑪，此处不赘，以免辞费。我只想说明，中国历注中的往亡与归忌在十三世纪时的柬埔寨已十分普及。

（五）十二生肖与十二生肖塔。周氏又云：“十二生肖亦与中国同，但所呼之名异耳。”伯氏就“十二生肖”注云：“按，柬埔寨与占婆、暹罗并用十二生肖，与中国同。其合干支为一甲子，与中国制无异，似由中国输入者也。现在柬埔寨之十二生肖，为一牛(chlau)、二虎(khal)、三兔(thas)、四龙(ron)、五蛇(msan)、六马(momi)、七山羊(mome)、八猴(rok)、九鸡(roka)、十狗(ca)、十一猪(kor)、十二鼠(cut)。”^⑫伯氏所见的十二生肖为上世纪初时，除鼠由首位变为末位外，其余次序与我国全同。此外，他还就其所见，证明越南、泰国不仅与中国十二生肖相同，而且六十甲子在那里也十分盛行，为我们论证中国古代历日文化对柬埔寨有重大影响，平添了一份证据。不过，周达观所见的十二生肖次序如何，他未交待，我们不能猜测，故尚未了然。

毋庸赘言，十二生肖是中国古代历日文化的一项重要而且极其普及的内容。因为每一个中国人出生后，一有记忆，父母便要告知你的属性。十二生肖的传世文献记载，最早见于东汉王充《论衡·物势篇》，但出土材料已然将其形成体系的年代加以提前。迄今所知最早关于生肖的完整资料见于甘肃天水放马滩秦简《日书》^⑬。

这里，我想就十二生肖在柬埔寨的影响提供一项文物佐证。在大吴哥城中心阅台（今称“斗象台”或“象群广场”）的对面（东面），有用角砾石垒砌而成的石塔，共十二座，以该都城东西门之间为中轴线，左右

各六座，被人们称作“十二生肖塔”。关于这十二座小塔，周达观在《真腊风土记》第十四则“争讼”中做了如下记述：“又两家争讼，莫辨曲直。国宫之对岸有小石塔十二座，令二人各坐一塔中。塔之外，两家自以亲属互相堤防。或坐一二日，或坐三四日。其无理者，必获证候而出，或身上生疮疥，或咳嗽发热之类。有理者略无纤事。以此剖判曲直，谓之天狱。盖其土神之灵，有如此也。”^②

对于“小石塔十二座”，伯希和注云：“按今王宫之前，实有砖塔十二座。”^③于此，夏鼐先生作了一条长校注：

今按：王宫之前十二座小塔，据巴曼提《吴哥指南》，乃红礬石（laterite）所建（1950年版85页）；陈正祥实地观察，亦认为乃红礬石建造（《研究》^④55页，注167），则周氏不误而伯氏误也。此十二塔位于王宫之前，分列御道（即胜利大街）之两侧，即在王宫前“大广场”内，靠近王宫之一边。……此十二小塔，今名绳索舞人塔（柬埔寨语：prasat suorprat）。本地人俗传古时演杂技走绳，以皮索横架两塔之间，走绳者手持孔雀羽数束，在索上来回走动，且走且舞，故名。实则此为齐东野语，不足信也。塔建于阇那跋摩七世（1181—1215）时，可能为大广场中举行盛会时达官贵人所住憩之所，并非庙宇或佛塔。（见巴氏《吴哥指南》85—86页）

按：张衡《西京赋》有“走索”一名。薛综注云：“所谓舞绠者也”，则此十二塔亦可依世俗传说而称之为“舞绠塔”。《真腊风土记》以为塔为争讼者所暂居以候神断之所，则为另一种传说，或较近于事实欤！陈正祥云：“有人认为是该国当时十二省用以向国王宣誓效忠的誓坛。同时被用作仓库，照《风土记》所说，似乎又兼为监狱。”（《研究》55页注167）实则《风土记》所云，乃争讼者所暂居以候神断之所，并非关禁判罪者之监狱。其建筑形式，不似仓库；

石塔东侧另有所谓“仓库”(kleang)者二座。至于誓坛之说,其建筑形式,亦不类祭坛,且当时该国属郡(省),不止十二,见第三十三则“属郡”。故十二塔之真正用途,实殊难言,姑且阙疑可也^③。

我在柬埔寨参观时,曾对此十二石塔拍了几张照片。从照片上看,此十二塔无论如何不可能是誓坛、监狱、仓库,抑或官员举行盛会时的休憩之所,无须赘辩。至于像周达观所记其被用作神明判罪的“天狱”,或如俗传其为演杂技走索之用,都不无可能。不过,我认为即使这些用途全有过,也当是后起的。然其本始用途为何?

与我同在中国文物研究所供职数十年的古建保护专家姜怀英高工告诉我,此组石塔名为“十二生肖塔”。他是1996年开始到吴哥,担负中国政府吴哥保护项目负责人的,在那里工作了10年之久。姜工的这个认识或许也是来自传说,尚未获得书证。但我认为,它比上引其他各种解释更趋合理。我不知道,当年这十二座石塔的顶部是否各供奉着一个生肖雕像?今因塌毁而难确证。不过,可以想象,当年的主广场平台以大象群雕为主题,其对面的十二座石塔上各塑一个生肖,从艺术角度看,恐怕是十分协调的。当然,艺术美感比不得科学考索,这所谓“十二生肖塔”还有待确证,但至少在认识上为我们开了一条新路。

综上所述,元人周达现在其《真腊风土记》第十三则“正朔时序”中所述十三世纪末叶,柬埔寨行用的历法与岁时,除星期制度外,均是受中国古代历日文化影响的产物,殆无疑义。

(原载《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2辑,
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07—218页)

注释:

① 夏鼐《真腊风土记校注》,中华书局《中外交通史籍丛刊》收,2000年,第

120—122 页。

- ② 彭锦华《周家台 30 号秦墓竹简“秦始皇三十四年历谱”释文与考释》，载《文物》1999 年第 6 期，第 63—69 页，“后九月”见第 66 页下。
- ③ 同上《文物》，彩版三《木牍(30:22)局部》。
- ④ 《睡虎地秦墓竹简》释文第 6 页，文物出版社，1990 年。
- ⑤ 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释文》插页《元光元年历谱(复原表)》，文物出版社，1985 年。我称该历为《建元七年(元光元年)历日》。
- ⑥ 清·严可均校辑《全后汉文》，第 716 页，中华书局，1958 年影印本。
- ⑦ 伯希和《真腊风土记笺注》，冯承钧译文，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七编，第 120—171 页。与本文讨论问题直接相关的部分见第 150—152 页，商务印书馆，1995 年。
- ⑧ 戈岱司《真腊风土记补注》，冯承钧译文，见《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二编，第 114—119 页，商务印书馆，1995 年。“再补注”见本文注⑨。
- ⑨ 《真腊风土记再补注》，1933 年《通报》卷 30 第 226 页。转自夏鼐《真腊风土记校注》，中华书局，2000 年，第 122—123 页。
- ⑩ 指许氏《〈真腊风土记〉中柬埔寨语浅释》，1979 年中山大学油印本初稿。夏氏简称为《浅释》。
- ⑪ 同注⑦，第 152 页。
- ⑫ 见《中国方术概观·选择卷》(上)，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 年，第 6—7、17—18、56—57 页。
- ⑬ 参见陈久金《敦煌、居延汉简中的历谱》，载《中国古代天文文物论集》，第 111—136 页，文物出版社，1989 年。
- ⑭ 见拙作《敦煌历日与当代东亚民用通书的文化关联》，载拙著《敦煌吐鲁番天文历法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 79—104 页。
- ⑮ 同注⑫，第 32、66 页。
- ⑯ 《论衡注释》，第 1396 页，中华书局，1979 年。
- ⑰ 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年。详见该书第 297—313 页。
- ⑱ 同注⑦，第 152 页。
- ⑲ 同注⑫，第 8—9 页。
- ⑳ 同注①，第 129 页。
- ㉑ 同注⑦，第 153 页。
- ㉒ 指陈正祥《真腊风土记研究》，1975 年香港中文大学刊本。夏氏简称为《研究》。
- ㉓ 同注①，第 131—132 页。

王珣《伯远帖》与“伯远”考

敦煌文献 P. 2640《常何墓碑》是一篇著名的唐代文献，于研究唐初“玄武门事变”关系至巨。其中第 31—33 行有云：“倾产周穷，捐生拯难。嘉宾狎至，侠侣争归。名亚于信陵，事逾于伯远。”显然，这里是用“信陵”和“伯远”二人的赫赫名声来比拟墓主常何的。信陵即信陵君，战国魏安釐王异母弟，礼贤下士，有食客三千人，其行迹见《史记·魏公子列传》。然而，此处所言“伯远”者，究系何人？

日前因撰写《敦煌写本〈常何墓碑〉校注》，上引文中“伯远”便成了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同门学长赵和平教授曾提示，此人是否与晋代王珣有关？赵学兄之所以如此提示，显然是想到了王珣《伯远帖》的缘故。这就迫使我必须做一番艰苦考索的功夫。最终究明，《伯远帖》之伯远者，乃王珣堂兄弟王穆也。

《晋书》卷六十五为著名宰相王导列传，并附其子王悦、王恬、王洽、王协、王劭、王荟、王洽之子王珣、王劭之子王谧诸传。显然，《伯远帖》的作者王珣与王谧是堂兄弟，而且都是王导的孙子。

《王协传》又云：“协字敬祖，元帝抚军参军，袭爵武冈侯，早卒，无子，以弟劭子谧为嗣。”说明王谧乃王劭亲生儿子，过继到其兄王协家为子。而《王谧传》又说“谧字稚远”。

《王劭传》则说：“三子：穆、默、恢，穆，临海太守。”由此可知，出继给王协为嗣的王谧与王穆、王默、王恢四人全是王劭的亲生儿子，也都是

《伯远帖》的作者王珣的堂兄弟。

在涉及上述王劭四个儿子的史传资料中,与王谧有关的较多,其余三人的材料少得可怜。然而,关于王穆,唐人李延寿在《南史》中比《晋书》提供了更多的资料。《南史》卷二十三《王球传》云:“[王]球字蒨玉,司徒[王]谧之子。”“王彧字景文,[王]球从子也。祖[王]穆,字伯远,司徒[王]谧之长兄,位临海太守。”^①概而言之,王穆和王谧是亲兄弟,王球是王谧之子,当然就是王穆的侄子;王彧是王穆的孙子,自然也是王谧的侄孙,王球从侄。他们都是东晋著名宰相王导的后代。

史传涉及王穆的史实委实过少,仅云“位临海太守”。虽仅寥寥五字,其价值却十分珍贵:它不仅使我们确认王穆即《伯远帖》之“伯远”,而且使通读《伯远帖》成为可能。

为便于讨论,现将《伯远帖》释文如下:

珣顿首顿首:伯远胜业情期,群从之宝。自以羸患,志在优游。始获此出,意不尅申。分别如昨,永为畴古。远隔岭峤,不相瞻临。

现在对该帖中的几个词语稍作疏释如下:

胜业:“胜”义美,胜业即成功的事业。

情期:即情谊。《南史·王昙首附孙王俭传》:“赵充国犹能自举西零之任,况卿与我情期异常。”

群从:堂兄弟与诸子侄。《晋书·阮咸传》:“群从昆弟,莫不以放达为行。”

羸患:即羸弱之身躯,久治不愈之痼疾。《南史·隐逸传上·戴颙》:“颙十六遭父忧,几于毁灭,因此长抱羸患。”

岭峤:江南五岭地区之泛称。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八“湘水条”云:“越城峤水,南出越城之峤。峤,即五岭之西岭也,秦置五岭之

成,是其一焉。”“冯水又左合萌渚之水,水南出于萌渚之峤,五岭之第四岭也。”卷三十九“钟水条”：“部山,即部龙之峤也,五岭之第三岭也。”“耒水又西,黄水注之,水出县西黄岭山,山则骑田之峤,五岭之第二岭也。”“赣水条”云：“彭水所发,东入湖汉水,庾仲初谓大庾峤水北入豫章,注于江者也。”“大庾峤”即著名之大庾岭。这既是“岭”“峤”连称的原因,也指出了“岭峤”的大体方位,即五岭地区。

畴古:往昔、古往。《晋书·徐广传》：“自圣代有造《中兴记》者,道历帝典,焕乎史策。而太和以降,世历三朝,玄风圣迹,倏为畴古。”

瞻临：“瞻”谓看视,“临”谓莅止。“不相瞻临”即不能亲自看望之义。

那么,王穆所任“太守”的“临海”位居何处呢?《晋书·地理下》扬州临海郡：“吴置,统县八,户一万八千。”^②其所统八县即：章安、临海、始丰、永宁、宁海、松阳、安固、横阳。其临海郡郡治约在今浙江省临海市东南,相当于台州的沿海地区。

《伯远帖》说“远隔岭峤,不相瞻临”,意即我同你之间有五岭相隔,距离遥远,不能亲去看望。这说明王珣给王穆写此信时,王穆正在临海太守任上。否则,“远隔岭峤,不相瞻临”,便无从谈起。

我们还想知道的是,王珣是从哪里给王穆写这封信的?其时他个人境遇如何?

《伯远帖》又云：“自以羸患,志在优游。始获此出,意不尅申。”意思是说,我自己健康不好,为痼疾所累,本志在于优游山水度日。但“始获此出”,竟然不能遂我本愿。这里的“始获此出”所指为何?

据《晋书·王珣传》载,王珣弱冠之时,与另一门阀士族谢玄(宰相谢安之侄)同作桓温之“掾”(属吏)，“俱为温所敬重”。“珣兄弟皆谢氏婿,以猜嫌致隙。太傅[谢]安既与王珣绝婚,又离[王]珣(王珣弟)妻,由是二族遂成仇衅。时希[谢]安旨,乃出珣为豫章太守,不之官。”也就

是说，王、谢二族因婚姻问题发生不快，有人便秉承谢安旨意，“出”王珣为豫章太守（治所在今江西省南昌市），但“不之官”，也就是并未到任。这或许与王珣健康不佳有关。不过，他终究是受到了谢氏的排挤。《伯远帖》所言“始获此出”之“出”，即本传所言“出”为豫章太守，但未曾到任。这也透露出，王珣写此信时，身处逆境，情绪低落。东晋都城为建康，则“始获”排挤的王珣是从建康给王穆写这封信的。建康在今江苏省南京市，临海郡在今浙江省台州市，一北一南，粗略地说成“远隔岭峤”，也未尝不可。

《王珣传》在讲过上述不愉快的事情之后又说：“[谢]安卒后，迁侍中，孝武深杖之。”谢安死于公元385年^③，则王珣受其挤兑，“出”为豫章太守，并写信将此情形告诉王穆，必然在此一时间之前。它使我们知道，《伯远帖》的产生时间下限不得晚于公元385年。

王珣的生卒年代为公元350年至401年^④，享年五十二岁^⑤。《王珣传》说他“弱冠与陈郡谢玄为桓温掾，俱为温所敬重”。而王谢二族发生婚姻纠葛是此后的事。“弱冠”指二十岁，则王珣写此信必在其本人20岁后，即公元370年之后。此即《伯远帖》形成年代之上限。至此，我们可以说，王珣《伯远帖》产生于公元370—385年的16年间，殆无疑义。同时也可获知，王穆任临海太守也在这16年中。

在前述考证与疏释的基础上，现将《伯远帖》的大意用白话表述如下：

王珣这厢有礼了。伯远，无论是事业的成功，还是与大家的深情厚谊，在我们兄弟辈中，你都是出类拔萃，堪称瑰宝的。至于我自己，因痼疾缠身，本无意于仕宦，而志在优游山水之间。可是，近来却被“出”为豫章太守，就更不能遂我本愿了。回想我们分别时的情形，历历在目，犹如昨日。但事实上却永为过往之事了。你我之间今有五岭相隔，道路悬远，就是想前去看望你，也是不能够啊！

以上管见妥否,还望方家赐正。

注释:

- ① 中华书局标点本《南史》,第 631—632 页。
- ② 中华书局标点本《晋书》,第 461 页。
- ③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 年,第 1312 页。
- ④ 《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 年,第 575 页。
- ⑤ 《晋书·王珣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 757 页。

著 译 目 录

一 专 著

- (1)《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
- (2)《敦煌吐鲁番学耕耘录》，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
- (3)《大梵寺佛音——敦煌莫高窟〈坛经〉读本》，台北如闻出版社，1997。
- (4)《敦煌吐鲁番出土历书》，收在《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天文卷》第一册，河南教育出版社，1997。
- (5)《敦博本禅籍录校》（与荣新江合作），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 (6)《敦煌吐鲁番天文历法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
- (7)《六祖坛经——敦煌〈坛经〉读本》，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
- (8)《我国古代的伟大科学家张衡》，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

二 论 文

(一) 隋唐史

- (1)《官吏考课与唐王朝的盛衰》，载《敦煌学辑刊》1984年第2期，第132—139页。
- (2)《唐前期三次官修谱牒浅析》，载《唐史学会论文集》第2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5—67页。
- (3)《隋对陈朝旧域的经营——兼论江南河的开凿》，载《运河访古》，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76--293页。
- (4)《近十年唐代士庶问题研究述评》，载《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第4集，

三秦出版社,1991年,第24—47页。

(5)《使主,使副,使头,使君》,载《中国文物报》1998年7月22日第3版。

(6)《史道德族出西域胡人的天文学考察》,载《'98法门寺唐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11月,第658—661页。

(7)《关于唐姚无陂墓墓主的下葬时间》,载《文物》2003年第12期,第42页。

(8)《唐太宗唯才是举》,载《中国青年》1979年第12期,第16—17页。

(二) 归义军、河西历史

(1)《张淮深平定甘州回鹘史事钩沉》,载《北大学报》(哲社版)1986年第5期,第86—98页。

(2)《“凉州节院使押衙刘少晏状”新探》,载《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2期,第62—68页。

(3)《也谈张淮深之死》,载《敦煌研究》1988年第1期,第76—79页。

(4)《归义军张氏家族的封爵与郡望》,载《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第600—614页。

(5)《敦煌文献“河西都僧统悟真处分常住榜”管窥》,载《周一良先生八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217—232页。

(6)《张淮深变文“驄马政”释词》,载《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第26期。

(三) 均田制、土族

(1)《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代均田制研究》,载《中国文化》第2期,1990年,第9—11页。

(2)《北魏末年修改地、赋、户令内容的复原与研究》,载《出土文献研究续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263—276页。

(3)《敦煌文书位字七十九号——“唐贞观八年五月十日高士廉等条举氏族奏抄”辨正》,载《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1期,第73—86页。

(四) 天文学史

(1)《“万祀千龄,令人景仰”——纪念伟大的科学家张衡诞生1900周年》(与陈久金合作),载《光明日报》1978年6月22日。

(2)《凉山彝族天文历法调查报告》(与陈宗祥、王胜利合作),载《中国天文学史文集》第二集,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01—148页。

(3)《黎族天文历法调查报告》(与陈久金、王胜利合作),同上书,第77—85页。

(4)《赫哲族天文历法调查报告》(与王胜利合作),同上书,第71—76页。

(5)《鄂伦春族天文历法调查报告》(与王胜利合作),同上书,第61—70页。

(6)《鄂伦春、赫哲族的物候和天文知识说明了什么——关于天文学萌芽的几个问题》,同上书,第46—60页。

(7)《凉山彝族二十八宿初探》(与陈宗祥合作),载《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1979年第1期,第66—75页。

(8)《跋吐鲁番文书中的两件唐历》,载《文物》1986年第12期,第58—62页。

(9)《敦煌文献S.2620号“唐年神方位图”试释》,载《文物》1988年第2期,第63—68页。

(10)《敦煌文献中的天文历法》,载《文史知识》1988年第8期,第48—53页。

(11)《敦煌残历定年》(与席泽宗合作),载《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总第12期,1989年,第12—22页。

(12)《敦煌古历丛议》,载《敦煌学辑刊》1989年第1期,第107—118页。

(13)《比“步天歌”更古老的通俗识星作品——“玄象诗”》,载《文物》1990年第3期,第61—65页。

(14)《天水放马滩秦简“月建”应名“建除”》,载《文物》1990年第9期,第83—84页。

(15)《吐鲁番出土“唐开元八年具注历”释文补正》,载《文物》1992年第6期,第92—93页。

(16)《敦煌吐鲁番历日略论》,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第3期,第40—48页。

(17)《关于敦煌历日研究的几点意见》,载《敦煌研究》1993年第1期,第69—72页。

(18)《重新面世的敦煌写本“大历序”》,载香港《九州学刊》6卷4期,第155—158页。

(19)《吐鲁番新出“高昌延寿七年历日”考》,载《文物》1996年第2期,第34—40页。

(20)《敦煌历日中的“年神方位图”及其功能》,载《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1996年,第254—259页。

(21)《敦煌历日的现代流变——香港民用历书文化探源》,载《潘石禅先生九秩华诞敦煌学特刊》,1996年,第249—266页。

(22)《敦煌本北魏历日与中国古代月食预报》,载《敦煌吐鲁番学研究文

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360—372页。

(23)《敦煌吐鲁番历日的整理研究与展望》，载《古天文与中华传统文化国际研讨会会议论文集》，1998年7月，第33—36页。

(24)《跋两篇敦煌佛教天文学文献》，载《文物》2000年第1期，第83—88页。

(25)《敦煌学科技著作评介》，载《书品》2000年第3期，第51—55页。

(26)《敦煌三篇具注历日佚文校考》，载《敦煌研究》2000年第3期，第108—112页。

(27)《黑城出土〈宋淳熙九年(1182)具注历日〉考》，载《华学》第4辑，第131—135页。

(28)《敦煌历日与当代东亚民用通书的文化关联》，载北京大学《国学研究》第八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35—356页。又作为法国远东学院北京中心《历史、考古与社会——中法学术系列讲座》第十号单独出版，中华书局，2006年9月。

(29)《吐鲁番出土〈明永乐五年丁亥岁(1407)具注历日〉考》，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63—268页。

(30)《传统历书以二十八宿注历的连续性》，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第173—175页。

(31)《黑城出土〈宋嘉定四年辛未岁(1121)具注历日〉三断片考》，载自著《敦煌吐鲁番天文历法研究》，第271—289页。

(32)《从“历日”到“具注历日”的转变——兼论历谱与历书的区别》，载《2000年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历史文化卷上》，甘肃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195—206页。

(33)《“洛州无影”补说》，载《文史》2003年第3期，第194—197页。

(34)《出土秦汉简牍“历日”正名》，载《文物》2003年第4期，第44—47页。

(35)《敦煌历日与出土战国秦汉〈日书〉的文化关联》，载《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先生纪念文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5月，第292—301页。

(36)《尹湾汉墓出土历谱补说》，载《简帛研究二〇〇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51—455页。

(37)《〈金天会十三年乙卯岁(1135)历日〉疏证》，载《文物》2004年第10期，第72—75页。

(38)《敦煌具注历日与〈四时纂要〉的比较研究》，载《敦煌研究》2004年第1期，第62—66页。

(39)《敦煌历日文献研究的历史追忆》，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7卷，中华

书局,2004年,第290—297页。

(40)《〈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零拾》,载《庆祝吴其昱先生八秩华诞敦煌学特刊》,台北天津出版社,2000年1月,第141—156页。

(41)《中国古代历日文化及其影响》,载《敦煌与丝路文化学术讲座》第2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第125—134页。

(42)《居延新简〈东汉永元二年(90)历日〉考》,载《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第284—288页。

(43)《敦煌具注历日选择神煞释证》,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8卷,中华书局,2005年,第167—206页。

(44)书评《天文文物研究的鸿篇佳作——〈席泽宗院士自选集〉读后》,载《中国文物报》2003年10月8日第4版。

(45)书评《马王堆天文文物研究的新葩——〈马王堆天文书考释〉评介》,载《中国文物报》2004年8月4日第4版。

(46)《出土历日掠影》,载《文物天地》1997年第2期,第26—29页。

(47)《隋唐历史典籍校正三则——兼论S.3326星图的定名问题》,载自著《敦煌吐鲁番天文历法研究》,第25—37页。

(48)《北大图书馆藏两件敦煌文献补说》,载《北京图书馆馆刊》1996年第4期,第90—91页。

(49)《我国发现的现存最早雕版印刷品——〈唐大和八年甲寅岁(834)具注历日〉》,载《中国文物报》2000年2月2日第3版,署名“苏雅”。

(50)《两篇敦煌具注历日补释与新校》,载《出土文献研究》第六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60—265页。

(51)《“吐蕃纪年法”的再认识》,载《敦煌研究》2006年第6期,第97—102页。

(52)《莫高窟北区出土〈元至正二十八年戊申岁(1368)具注历日〉残页考》,载《敦煌研究》2006年第2期,第83—85页。

(53)《中国古代历日文化对柬埔寨的影响——〈元〉周达观〈真腊风土记〉读记》,载《中华文史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辑(总第86辑),第207—218页。

(54)《黑城出土〈西夏皇建元年庚午岁(1210)具注历日〉残片考》,载《文物》2007年第8期,第85—87页。

(55)《跋敦煌文献中的两次日食记录》,刘进宝、高田时雄主编《转型期的敦煌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531—538页。

(56)《北魏历书曾有精确月食预报》,载《光明日报》1993年7月18日第6

版,署名“苏雅”。

(57)《敦煌天文气象占写本概述》(与刘乐贤合作),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9卷,中华书局,2006年,第409—424页。

(58)《东西方星空的成功对话》(书评),载《科学时报》2005年12月22日B4版。

(59)英文论文 The Cultural Source of Hong Kong Civil Calendar,载 Kuan Yu Chen and Sun Xiaochun ed. FRONTIERS OF ORIENTAL ASTRONOMY (《东方天文学前沿》),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pp. 217—222。

(60)法文论文(与刘乐贤合作)《敦煌天文气象占写本概述》,载 Marc Kalinowski ed. Divination et société dans la Chine médiévale, Étude des manuscrits de Dunhuang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et de la British Library, pp. 34—79。

(五) 禅籍研究

(1)《英藏敦煌本〈六祖坛经〉通借字刍议》,载《敦煌研究》1994年第1期,第79—87页。

(2)《关于敦博本禅籍的几个问题》(与荣新江合作),载《敦煌学辑刊》1994年第2期,第5—16页。

(3)《评〈敦煌新本六祖坛经〉》,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95—409页。

(4)《“坛经校释”订补》,载《文史》总第42期,中华书局,1997年,第83—104页。

(5)《敦煌本〈六祖坛经〉书写形式和符号发微》,载《出土文献研究》第3辑,中华书局,1998年,第228—233页。

(6)《英藏敦煌本“六祖坛经”的河西特色——以方音通假为依据的探索》,载《1994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宗教文史卷·上》,甘肃民族出版社,2000年6月,第105—119页。

(7)《也谈〈六祖坛经〉中的“獼猴”》,收在自著《敦煌吐鲁番学耕耘录》中,第219—232页。

(8)《陈寅恪“禅宗六祖传法偈之分析”证补》,同上,第203—206页。

(9)《“六祖坛经”——投入地忘一次》,载《象白莲花一样的正确说教》,台北如闻出版社,1996年,第181—192页。

(10)《近年敦煌本〈六祖坛经〉整理工作评介》,载《周绍良先生欣开九秩庆寿文集》,中华书局,1997年,第196—207页。

(11)《敦煌本〈六祖坛经〉口语词释》,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3卷,北京大

学出版社,1998年,第97—103页。

(12)《评〈藏外佛教文献〉(第1辑)》,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73—378页。

(13)《敦煌本〈六祖坛经〉的整理与研究》(演讲稿),载《敦煌与丝路文化学术讲座》,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438—466页。

(14)《重读〈敦煌坛经新书〉——纪念潘重规先生逝世一周年》,载台湾《敦煌学》第二十五辑,台湾敦煌学会编印,2004年,第589—596页。

(六) 语言、文学

(1)《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校注》(与赵和平合作),载《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80年第5期,第64—81页;第6期,第32—37页。

(2)《新发现的敦煌写本杨炯“浑天赋”残卷》,载《文物》1993年第5期,第61—65页。

(3)《敦煌写本杨炯“浑天赋”残卷的发现与确认》,载《文物天地》1993年第2期,第36—37页。

(4)《敦煌写本〈燕子赋〉(甲种)“将军”释词》,载《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第23期,第29—31页。

(5)《敦煌文献中的“去”字》,载《中国文化》总第9期,1993年,第166—168页。

(七) 其他敦煌吐鲁番文献

(1)《敦煌写本“百行章”述略》,载《文物》1984年第9期,第65—66页。

(2)《敦煌写本“百行章”校释》,载《敦煌研究》1985年第2期,第71—98页。

(3)《跋敦煌写本“百行章”》,载《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编下》,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9—107页。

(4)《三篇敦煌遯真赞研究——兼论吐蕃统治末期的敦煌僧官》,载《出土文献研究》第4辑,中华书局,1998年,第81—87页。

(5)《敦煌遯真赞中的唐五代河西方音通假字例释》,载《出土文献研究》第7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09—318页。

(6)《敦煌本〈刘庆力遯真赞并序〉校注并跋》,载《出土文献研究》第8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20—224页。

(7)《敦煌本〈阴处士碑〉校注》,载《出土文献研究》第9辑,中华书局,2010年,第267—285页。

(8)《敦煌本〈张灵俊写真赞并序〉校注并跋》,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0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09—316页。

(9)《敦煌写本〈常何墓碑〉校注》，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1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69—390页。

(10)《敦煌吐鲁番文献重文符号释读举隅》，载《文献》1994年第1期，第160—173页。

(11)《吐鲁番出土唐写本〈储先生百玉碑〉残卷小考》，载《庆祝宁可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62—265页。

(八) 其他

(1)《敦煌学的早期开拓者——罗振玉》，载《文物天地》1990年第4期，第2—4页。

(2)《斛律光寨巡礼》，载《文物天地》1992年第3期，第14—15页。

(3)《弥勒知我心》，载台湾《南海》第145期，第24—28页。

(4)《中华佛海一巨书——介绍“乾隆版大藏经”的新印本》，载台湾《南海》第131期，第14—17页。

(5)法译汉(与吕敏合作)，(法)戴密微原著《中国历史上的“会昌灭佛”》，载《法国汉学》第7辑，中华书局，2002年，第68—77页。

(6)《魁北克旧城》，载《文物天地》2002年第3期，第36—37页。

(7)《学术尊严感言》，载《中国文物报》2002年3月8日第8版，署名“苏雅”。

(8)《敦煌吐鲁番研究弁言》，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9)《〈法国汉学〉第5辑(敦煌学专号)编后记》，载《法国汉学》第5辑，中华书局，2000年11月，第336—337页。

(10)《深切怀念周一良先生》，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3—25页。

(11)《敦煌文献研究的世纪回眸》，载《中国考古学跨世纪的回顾与前瞻(1999年西陵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28—138页。

(12)《〈二十世纪出土的第一支汉文简牍〉献疑》，载《中国文物报》2001年2月7日第7版。

(13)《“二十世纪出土的第一支汉文简牍”新释——再与胡平生先生商榷》，载《中国文物报》2001年5月30日第7版。

(14)《敦煌学大辞典·天文历法》，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第603—614页。

(15)《唐代文化·科技与技术数文化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568—1647页。

(16)英译汉，(俄)邱古耶夫斯基原著《敦煌汉文文书概要》，载《敦煌研究》

1991年第2期,第109—112页。

(17)《佛教文物的新葩——〈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评介》,载《中国书讯》1996年第3期(总第3期),第14页。

(18)《“天马”的“猛志”,骗子的野心》,载《体育报》1974年2月22日第2版。

(19)《新版〈辞源〉“六骏”条正误》,载《中国历史大辞典通讯》1984年第3期,第60页。

(20)《新版〈辞源〉“僧统”条补正》,载《中国历史大辞典通讯》1985年第1期,第46页。

(21)《二十世纪唐研究·文化卷·科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613—632页。

(22)《对学术事业怀敬畏之心》,载《中国文物报》2003年6月20日第8版。

(23)《〈无垢经〉题记研究拾补》,载《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5期,第80—81页。

(24)《评施萍婷〈敦煌习学集〉(上、下)》,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9卷,中华书局,2006年,第486—491页。

(25)《“敦煌学”断想》,载刘进宝主编《百年敦煌学》,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4—90页。

(26)《文明的辉煌与断裂》,载《中国文物报》2006年4月21日第4版。

(27)《王珣〈伯远帖〉与“伯远”考》,载《书法丛刊》,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3期,第30—32页。

(28)《国家图书馆藏明代大统历日汇编前言》,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第1—10页。

(29)《我与周大德的忘年交》,载《周绍良先生纪念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第17—18页。

(30)《尝拟雄心胜丈夫——清代女天文学家王贞仪》,载《天文史话》,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第16—17页。

(31)《“师范”解义》,载《北京晚报》1985年9月7日第7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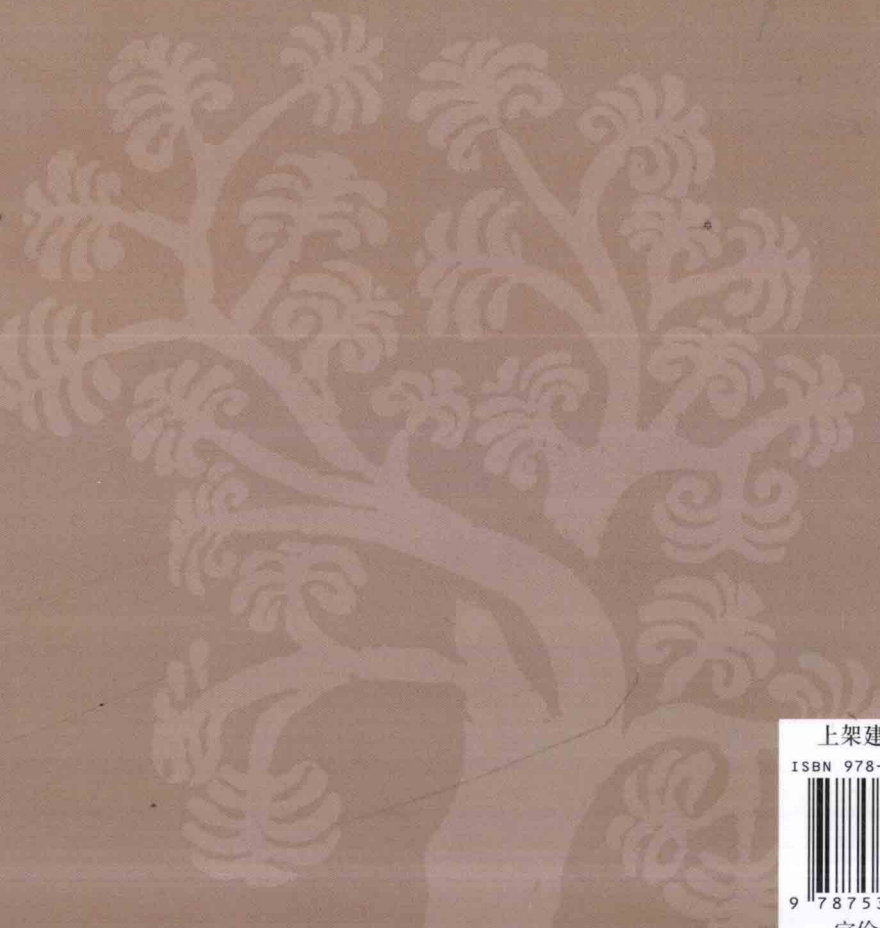
(32)《通俗生动的科学史新篇——〈中国天文学简史〉评介》,载《光明日报》1980年1月21日第4版(又见《中国出版年鉴》1980年,第242页)。

(33)《敦煌遗书》,载《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第139—140页。

(34)《千古一书,蔚为大观——文物出版社刷印〈乾隆版大藏经〉记略》,载

《人民日报》(海外版)1994年8月2日第11版《文化》栏,署名“闻悟”。

(35)《个中甘苦唯自知——我的治学之道与得失》,载《唐研究纵横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50—58页。



上架建议：中国史

ISBN 978-7-5325-5747-9



9 787532 557479 >

定价：48.00元

易文网：www.ewen.cc